**毛泽东大传之**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章**

**“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

**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话说1935年11月2日，毛泽东等到达陕甘晋省委和苏维埃驻地陕西甘泉县下寺湾，与彭德怀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说：

“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15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貌。”

此时，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从富县（解放前为鄜县）稻左堡赶回下寺湾。他们先碰见了贾拓夫，又见到了李维汉，被李维汉引领到毛泽东和张闻天处。毛泽东告诉程子华，他准备下午到红15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立刻派人到前线富县张村驿，要徐海东马上返回甘泉道佐铺的军团部。

徐海东自从读了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红15军团决定打个胜仗，庆祝两军大会师。此时张村驿战斗刚刚打响，徐海东立即命令停止进攻。他骑上马向军团部疾驰，由于心急，把警卫员和通讯员都远远甩在了后面。

从张村驿到军团部驻地道佐铺有65公里，徐海东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当他跳下马时，大白马如从水中捞出来一样，他自己的衣衫也湿透了。他走进窑洞，刚洗过脸，毛泽东就到了。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一行人是在程子华、郭洪涛陪同下，从下寺湾越梢山来到道佐铺红15军团部的，和毛泽东等人同来的还有贾拓夫、李一氓。毛泽东不等别人介绍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问道：

“你是海东同志吗？”

徐海东激动地说：

“报告毛主席，我是徐海东。”

毛泽东说：

“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

徐海东连声说：

“还是毛主席你们辛苦啊！”

毛泽东很喜欢徐海东那朴实、爽朗的性格。他一直面带微笑亲切地看着徐海东，赞扬红15军团在劳山和榆林桥的战斗打得好。徐海东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谈话转入正题，毛泽东主持召开双方联席会议。徐海东首先向毛泽东等汇报了陕北的敌情。毛泽东要看地图，张池明马上送来一张军用地图。

张池明，1917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学名张家相，后改名张赤民，抗战后期才更名为张池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非常激动。

毛泽东和众人认真研究了直罗镇一带的地形：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东距富县西离合水各约50公里，形同锁钥。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占据该地，就可以以此为据点，东西互相沟通，完成其构筑葫芦河封锁线的计划，因此这一带是其必争之地。但是，直罗镇距东北军后方比较远，它如果深入此地，又势必疲劳孤立，补给增援也会发生困难。据此，红军可乘其立足未稳，有把握将其歼灭。所以直罗镇也是有利于红军围歼东北军的一个好战场。

毛泽东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歼灭东北军。其作战原则是：将东北军先头部队诱入直罗镇，乘其立足未稳，集中红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之，得手后，继续围歼其后续部队。同时派出兵力牵制东北军，阻击其西援，以保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3次围剿，现在要消灭富县直罗镇方面的敌人。在直罗镇战役前，必须先拿下张村驿一带的反动据点，创造战场，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通道。”

他又引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话说：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

徐海东表示，一定要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第3次“围剿”。

毛泽东临别时，送给徐海东一部电台。他对徐海东说：

“先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的下寺湾听取了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的政治、军事及“肃反”运动的情况汇报。

这西北苏区的情况说起来还挺复杂的，牵涉到一些领导人之间数十年的恩恩怨怨，笔者不得不在这里交代清楚。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西北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两块根据地，一是谢子长开辟的“陕北”，一是刘志丹开辟的“陕甘边”。由于这两块根据地的自然条件、队伍来源不同，领导者的出身也不同，因此他们在工作方针、斗争策略方面也就有所不同，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两个派系。尽管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两个派系之间还是产生了不少矛盾，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而积怨甚深。

谢子长，原名世元，曾改名为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919年他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翌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2年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办的军事干部培训学校——学兵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后改为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丁镇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刘培基（前清秀才）都是私塾先生。1921年刘志丹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4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初入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第1团2连，后转入炮兵科，1926年毕业并随军东征。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谢子长与白明善、唐澍、李象九、阎红彦等人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第3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发动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武装暴动——清涧起义，在西北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阎红彦率一队人马活捉了县长张反之。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一个贫农家庭，9岁时曾上过半年私塾，后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1925年4月，他经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清涧起义后，部队改编为旅，李象九任旅长，孟澄斋任参谋长，下辖3个营，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分别担任营长，全旅近千人，一千多支枪。清涧起义使井岳秀万分惊恐，急令高双成率部围攻。由于起义部队行动方向不够明确，战术应变不够灵活主动，不得不仓促突围，除谢子长营和韩起胜营冲出外，其他人员冲散，辎重全部丢失。11月，曾去省委汇报的唐澍和省委派遣的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革命军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继续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沿途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汇报。

1928年5月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下，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举行起义。谢子长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

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3旅，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在华县瓜坡镇宣布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尔后，起义部队在华县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为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刘继曾为政治委员，王泰吉为参谋长，吴浩然为军党委书记，原第3旅旅长许权中为总顾问。全军千余人，设4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在榆林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1929年7月，刘志丹任陕西省委候补常委，后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工作，创建了南梁游击队。

1930年8月，谢子长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

1931年2月，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到山西组织红军游击队，后入吕梁山区组建游击队，4月下旬，他与吴岱峰、拓克宽、杨重远一起在孝义县娄底村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拓克宽任大队长，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9月，拓克宽牺牲后，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率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10月初，阎红彦与吴岱峰等率部突袭玉家湾，进攻瓦窑堡，后转移到延川永平镇休整。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英雄。

1931年10月间，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指示，和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等将陕北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及晋西游击大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共800余人，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谢子长的陕北游击队与阎红彦的晋西游击大队合为第1支队，阎红彦任第1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为第2支队。11月下旬，谢子长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党委书记，刘志丹、阎红彦、荣子卿为党委委员。

1931年底，“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来到甘肃正宁县，在三嘉塬一带驻扎。眼看农历新年就要到了，部队里还缺衣少粮。为了弄些年货，刘志丹的部下2支队的赵连璧（被民间称为神枪赵二娃）带了一部分人去打土豪，没收土豪白洋1000多元，还有几匹骡子，几头肥猪。他们给2支队每人发了几十元白洋。

大年初一这一天，谢子长为贯彻省委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清洗内部不纯分子的指示，开始对部队进行整训。在整训中，他和刘志丹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主张干革命必须打出红旗，而刘志丹却要坚持“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尔后，谢子长在一个打粮食的场上开会，他站在辘轴上刚说了一句“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马上就有人上前把刘志丹的枪给下了，接着又去抓赵连璧。这赵连璧是双手使枪，他将两把盒子枪一摆，意思是你们要干什么？旁边有人“啪”的一枪就把赵连璧给打死了。

这次流血事件是西北3支游击队在大联合后的首次冲突，此后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在一年之内竟轮番换了4任总指挥。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有史料称为陕甘游击总队），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李杰夫任政委。阎红彦任第1支队支队长。

3月下旬，刘志丹到西安找陕西省委申诉，详细汇报了谢子长、阎红彦缴他的枪、杀死赵连璧的“三嘉塬事件”。不久，陕西省委来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5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新任总指挥刘志丹指挥下进军陕北。

6月，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以甘肃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

8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进行“左”倾整训。阎红彦因对“左”倾冒险主义给部队作战带来的损失提出意见，被中共陕西省委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有反革命嫌疑”，被撤销了总指挥职务。

8月30日，谢子长出任陕甘游击队第4任总指挥。

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12月24日，陕甘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部队开到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进行整训。杜衡指责谢子长和阎红彦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主义”等错误，撤销了二人的领导职务，并决定给他们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二人离开部队，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阎红彦自此离开了陕北。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10月间他到了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研究班学习军事，直到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他才被派回到陕北，本传后边另有叙述。

再说杜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由他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并指定选举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为团长；刘志丹任第2团政治处长、参谋长。

不久，刘志丹创建了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5月，杜衡（后不久叛变）再次来到红26军，按照“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创建苏区。红26军2团从陕甘边根据地南下关中平原，在渭南、华县地区被国民党军击败，损失惨重，只剩下刘志丹、王世泰等数十人，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9月，刘志丹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恢复红26军。刘志丹先后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

就在这11月间，谢子长在上海受训结束，回到了陕北，被中共北方代表委派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壮大了第2、第3支队，并和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一起组建了第4、第5支队，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郭洪涛，1909年11月16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东区姬岔乡黑圪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郭洪涛任中共榆林特支书记，后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长。

1934年4月，刘志丹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5月，刘志丹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由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不久，谢子长率部南下，在甘肃华池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42师会合。这是陕北两个派系的第2次合作。

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26军42师党委和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指示，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26军1933年5月南下失败的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并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发言中也严厉批评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

红26军一些领导人的不满情绪使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刘志丹说，现在大敌当前，关于这个党内认识问题，稍后再说。这样，会议就没有再争论下去。会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陕甘边党政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阎家洼子会议是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派系之间矛盾的延续。

8月下旬，谢子长兼任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率红42师第3团及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陕甘边苏区的第1次“围剿”。

1935年1月下旬，刘志丹曾去探望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谢子长。据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见面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刘志丹坐在谢子长旁边，拉着他的手，说你得好好养伤，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这个事，一个是研究怎么粉碎第2次围剿，他们两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很多事情都讲在一起了。两个人讨论到联合作战的问题，并准备成立西北军委。对于军委主席由谁来担任，刘志丹和谢子长各执己见。两个人争来争去，谢就说这个主席要刘志丹当，现在这个伤势情况，他也不能活动，也不能工作，这个主席由刘来负责，统一由刘来指挥就行。刘志丹就不赞成，说不行，还是谢做这个主席。两个人为这个事吵了不少。最后谢子长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指定刘志丹做军委主席。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二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统一领导。

由此看来，谢子长和刘志丹之间的矛盾基本化解了。但在谢子长身后，两个派系之间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事情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

后来在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将谢子长的遗骸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为谢子长墓撰写了277字的碑文。1942年，边区政府为纪念谢子长将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1935年5月，红26军与由陕北独立师改编的红27军84师会合，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担任总指挥。8月，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到黄河东岸，粉碎了国民党军第2次“围剿”，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红25军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陕北的落脚点。

此时的刘志丹再也想不到，一股暗流正在向西北苏区涌来。朱理治、聂洪钧分别受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委派，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先后来到了西北苏区。

朱理治、聂洪钧受命来陕北的起因有二：一是早在1934年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说：“42师一贯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地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地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第二个起因是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在1934年10月26日也向北方代表孔原并上海中央局写了《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延川县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3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陕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

朱理治提出的“左”倾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这使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其后，由朱理治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就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人参加。会议秘密通过了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但此时的红26军和红27军都由刘志丹统领，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还没有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的实力，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就使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强有力的军事支持。

此时的红25军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这支部队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一路转战，一路“肃反”，在1935年4月到了陕南后，还误杀了杨虎城17路军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并由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军队有了猜疑。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延川县永坪，和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

9月17日，朱理治在红25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的支持下，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3人为“中央代表”，夺取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成立了中共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红15军团。

9月18日，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由红25军改编的第75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由红26军改编的第78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后崔田民代）；由红27军改编的第81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参谋长李宗贵，政治部主任张树才。全军团共7000余人。

此后，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采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从鄂豫皖带来的极左思想和“肃反经验”，以红25军为后盾，打着“中央代表”的旗帜和“反右倾”的幌子，进行“肃反”。

10月6日，戴季英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逮捕入狱，宣布他们的罪名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右派是反革命。郭洪涛对这种过火的做法曾表示反对。当时朱理治征求郭洪涛的意见，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可后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原红26军和陕甘边被杀干部就多达200余人。

这便是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直至红25军来到西北后，又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指示说：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立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他马上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去陕北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安定县瓦窑堡，接管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首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他还嘱咐王首道：

“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汇报会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鉴于西北“左”倾主义乱抓乱杀的严重局面，提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把遵义会议未解决的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毛泽东说：

“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尚未被粉碎，最迫切的事情是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我们马上就要上前线去，中央机关也要向瓦窑堡转移。政治问题以后再说。”

周恩来的提议被搁置下来。会议接着讨论了中央对外名义和部队的建制问题。毛泽东说：

“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比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3次围剿问题。同15军团会合后，15军团编制应保存，26、27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1军团，成立1方面军。”

众人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 彭德怀

成员有：王稼祥 聂鸿钧 林彪 徐海东 程子华 郭洪涛

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根据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博古、邓发、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刘少奇、李维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去安定县瓦窑堡；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作战部队南下和红15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3次围剿。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布告说：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由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担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部部长，由罗梓铭担任工农检查局局长。

毛泽东又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通令说：

“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9同志为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接着，毛泽东在下寺湾召集陕甘支队战斗部队和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他详细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说明了整个战役的部署和战法，给各部下达了作战任务。他还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拳打洪教头的故事说：

“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毛泽东这番深入浅出的话，使大家充满胜利的信心。

11月4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南下到达甘泉县桥镇，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57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前进。

11月5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将陕甘支队第1、第2纵队合编为红1军团，共7200余人，由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

红15军团归入红1方面军建制。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调中央红军的周士第为参谋长。辖第75师、第78师、第81师和1个骑兵团。

命令任命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还任命了各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负责干部22人。

全军共5个师又4个团，约1万多人。

徐海东从红15军团每个连队中抽出3挺机枪和一部分其它枪支弹药，又从经理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药品，支援红1军团；并将在劳山、榆林桥战斗中入伍的解放战士（指被俘后经过教育加入革命队伍的士兵，后同），全部补充给红1军团。徐海东还强调说，红15军团要学习中央红军的好作风，要搞好团结，不要搞宗派、拉山头。

在1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到达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

“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毛泽东致电徐海东，要求红15军团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并对黑水寺方向游击，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芦河能否徒涉的情况。

11月6日，毛泽东率红1军团到达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井子地区。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等，要求部队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鼓动；还要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详加调查。

是日晚，毛泽东收到林彪关于调查情况的电报。

11月7日，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攻下了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东北军东进。徐海东用电台向毛泽东报告了胜利消息及军事行动。

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

11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徐海东，要他们迅速肃清国民党坐探，并要红15军团在消灭张村驿团匪后，继续消灭附近久原、套通、金村一带团匪。

是日晚上，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询问在张村驿地域打土匪的情况；并电示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11月13日，毛泽东就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彭德怀、周恩来说：

“拟于18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1、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2、军事政治教育；3、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4、地方工作计划；5、筹粮计划；6、筹款计划。”

11月13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16日，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大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以15个团与川军十几个旅开始争夺名山县百丈关。到22日，经过7昼夜血战，毙伤川军15000人，红军也伤亡了近万人。百丈关之战，成为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他们在国民党军队的跟踪追击、重兵压迫、堡垒封锁之下，南下或东进都已经不可能了。

11月18日，毛泽东在富县直罗镇以东的东村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程子华、徐海东、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张云逸、萧劲光、郭述申、朱理治、朱瑞、张纯清。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说：

“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将红军集中于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与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取甘泉、延安。”

11月19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组织红1、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查看地形，研究战役的具体部署。彭德怀与林彪、徐海东、聂荣臻、程子华、贺晋年、周士第等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后，带领众人策马驱驰约15公里，到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山前，下马登上山头，俯瞰山脚下的直罗镇。

这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镇子的北半面，有一条小河。一条大道从西往东穿过镇子中央，镇子东头，是一座古老的小寨子。寨子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了，可那一圈用石头砌起来的寨墙却大部分完好。

指挥员们几十架望远镜对着山下从左到右，从东往西，仔细观察着道路、山头、镇子及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条小沟，一家孤立房屋，都是他们观察研究的对象。他们一面观察，一面小声交谈：“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了直罗镇，就如同钻进了口袋一样。”大家还一致认为，为防止敌军利用镇东头倒塌的寨墙做固守的据点，最好赶紧把它彻底拆除掉。

这天晚上，红15军团奉命派出1个营去拆除镇东头那个寨子，尔后留下一个排在直罗镇警戒。

红15军团主力已经集结在张村驿一带，积极投入战前准备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就在11月19日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的另一支大部队红2、红6军团也开始了大的战略行动，这便是贺龙、任弼时根据毛泽东的电令，与关向应、萧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近2万人突围北上。

就在这红2、红6军团突围开始前后，有两个故事不得不说：一个是李贞和甘泗淇两位将军的美满姻缘；另一个是历史上绝无仅有惊心动魄而又非常巧合的贺炳炎、余秋里两位断臂将军的故事。

在突围前的一天，贺龙将一个个子不高、留着短发的女干部叫到跟前谈话。这名女干部就是红2军团的组织部长李贞。贺龙对李贞说：

“中央红军长征已经走了很久了，我们也要开始长征了。长征很远很苦，我给你介绍个伴吧。他叫甘泗淇，是红18师的政委，是留苏的学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

李贞说：

“长征路上这么多人，还要找什么伴嘛？他文化那么高，我却大字识不了几个。再说，现在是行军打仗，子弹又不认得人，要是我死了，他就得担心，他死了，我也要担心。我看还是等长征以后再说吧！”

李贞，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6岁时就当了童养媳，名字一直叫“旦娃子”，直到18岁参加革命，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李贞。肃反扩大化时，她的丈夫张启龙被扣押审查，一封要求离婚的信交到了她手里。李贞哭得很伤心，不同意离婚。可是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离婚，李贞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

贺龙见李贞不答应，就又找到甘泗淇说：

“红2军团有个女同志叫李贞，她作战勇敢，又会做饭，女同志不多，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呀！”

甘泗淇，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更名为甘泗淇。甘泗淇回国后，受党中央派遣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党代表。

贺龙为了撮合甘泗淇与李贞，不久便将李贞调到了红6军团，与甘泗淇在一起工作。甘泗淇与李贞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了解也多了。甘泗淇几次主动找李贞长谈，谈工作，谈理想，一直谈到了爱情。他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见知识渊博的甘泗淇平易近人，又关心她的工作，就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了。在突围开始前，甘泗淇和李贞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由贺龙主婚，甘泗淇与李贞结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1955年授衔，甘泗淇为上将，李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少将。

这才是：月老热心牵线，将军夫妇千古彪炳；

战友情深结缘，革命史册佳话流芳。

再说在红2、红6军团突围开始后，红2军团红5师师长贺炳炎率部担任前卫。他领着第18团在翻越瓦屋塘东山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他本人第6次负伤。

贺炳炎过去负伤，包好绷带，照样冲锋杀敌，而且伤口也好得快，战友们开玩笑说他是血性好。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他的右臂被炸成了肉泥，骨头全碎了，只有一点皮肉连着肩膀。医生说：

“师长的右臂完全断了，看来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抢救，就有生命危险。”

此时医疗器械已经驮运走在了前边，手术锯一时无法取回。医生无奈，就从老乡家里借来了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做手术。眼看就要动手了，医务人员将药箱子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麻醉药。有人提出用吗啡，贺炳炎对身边的贺龙笑着说：

“老总，你放心，那吗啡我是绝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医生找来4个力气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

“不用他们，我挺得住。”

说着，他就把一条毛巾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医生开始用锯子锯贺炳炎的残肢了，可他那只握木锯的手禁不住微微发抖。贺炳炎说：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锯吧！”

贺炳炎忍着剧痛，嘴里紧紧地咬着毛巾，用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周围的人们咬着牙看着他，忍不住掉下泪来。医生将贺炳炎的残臂锯下后，又用钢锉锉平了骨面，最后缝合了皮肉。手术终于做完了，贺炳炎的汗水像水浇一样，湿透了全身。因为战况紧急，他躺在担架上继续前进了。手术后不久，他又见到了贺龙，眼含热泪问道：

“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后来，贺炳炎伤口未愈就坚持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行军作战了。

无独有偶，贺炳炎是由第18团政委升任红5师师长的，接任他团政委一职的是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的余秋里。贺炳炎在离开第18团3个月后失去了右臂，而余秋里却是在贺炳炎断臂3个月后的1936年3月失去了左臂。这可真是历史的巧合。

那还是在黔西北乌蒙山的战斗中，余秋里的左臂被一排子机枪子弹击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伤势非常严重，他的左手腕关节、尺骨、臂骨之间已经被击碎。可是他不顾伤痛，咬牙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士们把他硬捆在担架上，才送下山去。

这天晚上宿营时，余秋里的左臂肿得明晃晃的，疼得他无法入睡，就叫勤务兵打来一桶冷水，将负伤的左臂放到冷水中镇痛。因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的伤口开始溃烂化脓，竟生出了蛆。每一次换药，都疼得他咬紧牙关，大汗淋漓。可真是祸不单行，在抢渡金沙江时，他又从担架上掉入水中，引起高烧不止。

余秋里的左臂日渐干枯发黑，神经已经坏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左臂已经彻底不行了。如同贺炳炎一样，医生在为余秋里做截肢手术时，也没有麻醉药和专用的截肢器械。于是医生又一次使用了木工锯，剧烈的疼痛使余秋里几次昏了过去。他醒来之后，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

“老总，敌人打断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有一口气，我就革命到底！”

更巧的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贺炳炎和余秋里这两位大难不死的独臂将军，再次并肩战斗，他们在八路军独立第3支队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冀中大地的人们对这两位独臂将军指挥的第3支队称之为“一把手”的队伍，日伪军只要一听说对手是“一把手”的队伍，便闻风丧胆。1955年授衔时，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军衔，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正是：一对难兄弟，两个铁将军。

人称一把手，麾下惊鬼神。

欲知红2、红6军团突围结果如何，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笔者在本章中将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直至红25军到了西北后又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此不惜笔墨详细叙述一番，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人想在这一段历史上搅浑水，甚至利用小说《刘志丹》和批判小说《刘志丹》事件，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其用心是极其恶毒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笔者还要在本传后边的部分章节中，将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后续纠葛，进一步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望读者诸君明察。

**第2章**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

**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

**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话说1935年11月19日，东北军第57军109师师长牛元峰带着他这一支西路军先头部队，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沿着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东推进。

11月20日，张闻天派人致函毛泽东，通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林育英回国的情况。

林育英是在11月19日来到瓦窑堡的。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化名为张浩，扮成商人，带着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还有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码，由莫斯科取道蒙古国归国，他牵着骆驼，跋山涉水，终于在11月19日来到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机关。

关于林育英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他于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字祚培，又名林仲丹等。他是林彪的堂兄，林彪称其为八哥。林育英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恽代英和堂弟林育南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次年夏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北、湖南工作。1929年初，他化缘乞讨到上海工作。1930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东北工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至1935年，林育英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再说11月20日下午，红1方面军在阎家村北山的警戒部队，有意识地“惹牛”、“牵牛”，且战且退，将109师诱入直罗镇。东北军的后续部队第57军军部和111师主力及106师也到达黑水寺一线，进到张家湾附近地区。

牛元峰占领直罗镇后，一面向上级报捷，邀功请赏，一面杀鸡宰羊，大吃大喝。

这天晚上，毛泽东下达了战斗命令。按照预先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由北向南，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和红13团由南向北，连夜向直罗镇方向奔袭而来。到拂晓前，红1方面军南北两路俱已进入战斗位置，将直罗镇团团围住。

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附近，在这里能够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再指示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人说：

“一定要打歼灭战！”

11月21日晨5时半，红1方面军的冲锋号吹响了，南北两路部队对被围的109师发起了猛攻。南面红军的枪声一响，109师立刻向北撤，北边的红军攻下来了，109师又掉头往南跑。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1方面军就歼灭了109师师部及其两个多团，牛元峰率残部1个多营的兵力，逃入镇子东头曾经被红15军团拆除而他们又连夜修补过的寨子里，固守待援。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解围。

此时，毛泽东早已把目光由直罗镇转向了增援之敌，决心抓住各路敌军协同较差的弱点，集中红1方面军主力，以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歼灭增援之敌。因此，他留下周恩来、彭德怀在直罗镇指挥红15军团一部围歼109师残部，并阻击由东边富县方向来援之敌117师；另外以羊泉镇、道佐铺两地游击队逼近富县，大造声势，摆出红军主力马上要攻打富县的姿态，牵制、迷惑国民党军，袭扰第67军后方，阻其出援。他自己则亲率红1、红15军团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57军第106、第111两个师。

第111师在安家川以东地区与红1军团一接触，董英斌就命令其向西退至黑水寺地区，向106师靠拢。董英斌竭力避战，毛泽东则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认为第57军已是惊弓之鸟，必须迅速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乘胜扩大战果。

11月23日8时，毛泽东确定以“包围黑水寺，整个解决董英斌”为新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以红1军团主力进至黑水寺东北之韩家河、甘沟门、王家庄地区，准备对黑水寺实施进攻；由聂荣臻率领第1团、第13团及军团侦察连，从北面实施迂回，进至黑水寺以西的龙益湾、王家角以北地区，阻敌西逃，并打击由西边来援之敌；以红15军团主力秘密进至黑水寺以北，控制黑水寺至太白镇之间二三十公里的地区，确保孤立董英斌部。

11月23日下午，董英斌见势不妙，惧怕被歼，立即率第106、111师及军部沿葫芦河向西撤退，逃往太白镇。毛泽东下令部队分3路追击。

11月24日，红1军团一部在聂荣臻指挥下，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追歼了国民党军106师第617团。

毛泽东得知106师师长沈克过去跟红军有些关系，就让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回去，捎话说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东北军的所有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

此时，在东线的敌117师得知第57军主力全部后撤了，红军主力已回师东进，便急忙撤回了富县县城。

徐海东派红15军团的一支部队攻了一次直罗镇东头的寨子，没有攻下来，便组织了6挺机枪，要沿着一条沟再次发动进攻。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来到前沿，问明了情况，说：

“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11月24日晚，牛元峰待援无望，便收拾残兵败将500余人，趁着夜色向西逃跑。头部负伤的红15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带着红75师225团和少共营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头牛追回来！”他们一口气追了十几公里，在直罗镇西南一座山上，全部歼灭了109师残部，活捉其师长牛元峰。就在这天晚上，牛元峰被打死了。

关于牛元峰之死，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正好相反的两个版本。一是徐海东曾回忆说：“在直罗镇战斗中，担负围困敌牛元峰师残部的红军战士伤亡很大，那天他们活捉了牛元峰之后没有请示，就喊着为战友报仇把他给杀了。”另一个则是曾参加过直罗镇战役的东北军109师参谋处长沈叔明在《东北军一0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中记述说：“牛元峰突出土围子后，身边还有四五十个人，盲目向西南方走去。”“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赶的红军越来越接近，甚至人数和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缴械，缴械’。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1个团，活捉师长、参谋长、团级以上军官10余人，毙伤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长短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台，子弹22万多发，大大补充和改善了红1方面军的武器装备。

11月26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封《致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公开信》。

据李一氓回忆说：“他写好以后，就交给我，拿去油印。因为这个地方纸张不好买，不过印了百多份。印好后就派人送给1军团和15军团管理俘虏的单位，指示在释放俘虏的时候，尽量发给他们，要他们带回东北军去。我记得这封信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完全是毛泽东的文风。信中有这样的句子：‘11月21日之役，足下亲率4师之众，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自当历历在目。109师一上战场全军覆没，贵军长亦不得不星夜潜逃，不逃则已，一逃二百余里，暂借合水聊定惊魂。’当时我对这封信的遣词用字、谋篇布局非常欣赏，读了一遍又一遍。”

再说直罗镇战役后，徐海东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块住窑洞，一块行军、开会、吃饭，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了。有一天，毛泽东问起徐海东的家庭情况。徐海东说，我家7代人都做窑工，一家人中有66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还说，我的母亲为我受了许多苦，我十分想念母亲。现在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毛泽东说：

“你是一个好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

徐海东喜欢和毛泽东在一起，觉得毛泽东既没有官架子，也从不显摆领导威风，说起话来亲切随和，生活更不讲究，和他这个粗人没有什么不同。他非常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一次，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说，在鄂豫皖苏区和在长征途中“肃反”运动出现了扩大化，原红25军中至今还有300多人背着“改组派”、“第三党”、“AB团”和“反革命嫌疑”的黑锅。他还说：

“这些人也不像反革命，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要统统释放，这些同志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他们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

徐海东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竟然看得这样清楚，还如此干脆并彻底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等人的错误，这使他非常敬佩。后来他曾经回忆说：“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觉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此后不久，毛泽东便接见了被徐海东放出来的原西北苏区一个重要领导人汪锋。

汪锋，原名王钧治，1910年12月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他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0年秋被推举为蓝田县委工委负责人；1931年到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部队学习军事，并做地下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同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秋任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特委改为三原中心县委时任县委副书记，领导了渭北新字区和武字区的农民暴动，建立了新、武两区游击根据地。1933年3月，他任红26军代政委，与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同年任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领导了汉中南区的分粮斗争以及北山、南山两区的游击战，发动了安康起义，领导了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创建工作，1934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1935年春，他奉中央局指派回陕南与杨虎城警备第3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及红25军联系。张汉民被红25军误杀后，汪锋遭拘禁。1935年7月他随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一直被错误关押。

汪锋被释放后，贾拓夫通知他到前总驻地富县西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汪锋立即赶到前总驻地东村，杨尚昆接待了他，并告诉他说，这次是毛主席调你来的，你的工作将由主席当面指示。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东村一个群众家的土窑中接见了汪锋，询问了陕西许多领导人的情况，汪锋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又问到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情况。他对汪锋说：

“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汪锋说：

“17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西北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魏野畴等。也有不少同志在这支部队中做过工作，杨虎城将军的周围就有不少同情中共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汪锋所说的杜斌丞是国民党中将杜聿明的堂哥，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参政。杜斌丞到西安后被任命为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高级参议，后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毛泽东听了汪锋的介绍，又说：

“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全国人民呼吁一致抗日，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要反对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团结一切开明的爱国绅士，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的过去不要耿耿于怀，只要他们现在有民族气节，就要将他们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经常受到蒋介石的排斥与打击，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是想削弱杂牌军，让他们与红军两败俱伤。西北军和东北军同蒋介石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丢了东三省，代人受过，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东北军中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同蒋嫡系胡宗南的矛盾日益尖锐，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存在着反蒋抗日的思想。在抗日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保存东北军、西北军，不断壮大抗日力量，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可能性很大。”

毛泽东还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治路线。他说：

“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员接触，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同他们往来，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方法就不行了！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用旧瓶子装新酒。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达到政治上的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自己发展，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那些最右的反动势力，要坚决打击之。”

“我们的方针就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原则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推动全国的大联合。”

毛泽东还一再叮嘱汪锋：

“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正确的分析判断，谈判时多鼓励抗日士兵，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了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要把各方面工作都想到想细，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与汪锋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汪锋表示，自己长期在陕西省委军委会工作，对17路军的历史和各层人士都非常熟悉。困难和危险是存在的，但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尽力搞好这次谈判。

此后汪锋在红1方面军前线总指挥部住了4天，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

11月下旬，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红1军团供给部长杨至诚为解决全军团过冬问题，正急得团团转。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要解决过冬问题，至少缺2000到3000块银元。毛泽东看了报告，叫来杨至诚，商量说：

“我们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杨至诚说：

“主席，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毛泽东说：

“他们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或许会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他点着一支烟，继续对杨至诚说：

“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先去跑一趟，咱们不借3000，也不借2000，来一个折中2500。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说罢，他提起笔写道：

海东同志：

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

杨至诚带着借条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纵马来找徐海东。二人寒暄过后，杨至诚将借条递给徐海东，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十分不安，连连说：

“哎呀！都怪我太粗心了！”

杨至诚说：

“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很困难，要是……”

徐海东说：

“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得多。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款过去。”

徐海东送走杨至诚，找来供给部长，将毛泽东写的借条递给他看。此时红15军团准备把仅有的7000块钱用来改善部队的伙食和添置冬装。徐海东说，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钱送给红1军团。供给部长说：

“老军长，这钱是该借，可是我们过冬也需要钱，你连一件大衣都没有……”

徐海东打断他的话，动情地说：

“我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了11省，爬雪山，过草地，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饿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

供给部长见徐海东如此坚决，便不再说什么，匆匆告辞，带人将5000块大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患了病，毛泽东几次催他去看病治疗，可吴吉清却满不在乎，以为是不服陕北水土，自己这么年轻，顶一顶就能过去了。谁知到了第5天，他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疼爱地责备他说：

“强汉抗不过病！”

毛泽东马上派医生给吴吉清打针吃药，第2天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他就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1方面军野战医院。医生诊断吴吉清患的是重伤寒。毛泽东知道后赶到医院看望吴吉清，吴吉清怕毛泽东被传染，苦苦请求他赶快离开，没想到毛泽东却坐了下来，安慰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

吴吉清入院七八天，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医生误以为他没有生的希望了，就将他送入了太平间。前来探望的同事发现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拿起电话对野战医院负责人说：

“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把他治好。”

他搁下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把自己的备用药也拿了过来。吴吉清终于获得了第2次生命。

11月28日，毛泽东起草并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全文如下：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蒂的统治。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地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受尽了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本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出席红1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直罗镇战役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

“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2、战略与战役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3、战斗准备的充足。4、群众与我们一致。”

毛泽东还说：

“如果没有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的‘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的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算是举行了奠基礼。”“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现时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分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5个省份去。”“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5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

鉴于牛元峰被打死一事，毛泽东提出了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那就是一律不杀、优待释放。

红1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后来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

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了直罗镇大捷。电文中还说：

“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第3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故意夸大南下途中的个别胜利，并且还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汪锋，要他立即动身去西安绥靖公署见杨虎城等人。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以后，杨虎城结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大革命时期，杨虎城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策应北伐战争。蒋介石、冯玉祥叛变革命后，杨虎城向贺龙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组织，未被批准。在杨虎城的西北军里，有不少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过杨部的政治主任。1931年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热河省，杨虎城向蒋介石要求，将他的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

后来汪锋与杨虎城见面后，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

“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均应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鄙人等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两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后来，汪锋与杨虎城3次会谈，多次与杜斌丞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世英也到西安与杨虎城会谈，就西北军与红军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再说12月6日，毛泽东为会见林育英，筹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离开了东村红1方面军司令部，经甘泉、安塞去瓦窑堡。

12月8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林育英等人，约定12月10日在安塞见面。

12月11日，毛泽东一行人晚一天到了安塞。据随行的警卫员陈昌奉在《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文中回忆，当晚毛泽东等人夜宿于离安塞城八九里的一个小村子。

这时，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等人已在安塞城等候毛泽东，双方竟未接上头。

12月13日，毛泽东一行径直到了瓦窑堡。

瓦窑堡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清涧县，西连安塞县，南接延川县和延安市，北界靖边、横山、子洲县。城内只有三四百户人家。

毛泽东在瓦窑堡的住处开始是被安排在二道街，他来后又搬进了中山街北侧中盛店院内。这院里共有8孔窑洞，分为两排。第1排靠东侧第1孔窑洞是通向后院的通道。毛泽东住在第2排靠西侧的两孔窑洞中。这两孔窑洞之间有一个通道，西侧第1孔为会客室，有木桌、木椅、条凳和地炉，第2孔是卧室兼办公室，有炕，窗前有木桌椅。

安排已定，毛泽东会见了不久前回到陕北的原陕北第3号领导人阎红彦。

阎红彦是在1935年4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和刘长胜一起带着密电码，回国寻找战略转移中的中央红军的。他们一路寻访，好不容易在北平打听到了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便直奔陕北而来，终于在12月间到了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和负责人。

12月14日深夜，张闻天等人收到毛泽东已经回到瓦窑堡的电报，遂立即返回。

12月15日，林育英回到瓦窑堡后见到了毛泽东。

本传第二卷中已经说过，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曾请恽代英派人协助文化书社办一个织布厂。恽代英很快便让林育英到了长沙，协助文化书社办厂。毛泽东由此结识了林育英。二人没想到多年后竟是在陕北重逢，说起青年时期的旧情，自然是十分高兴。

此后，毛泽东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在11月10日结婚了，便立即赶往张闻天夫妇家里，非要闹一闹洞房不可。他一进窑洞就大声嚷开了：

“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张闻天是一个文文气气的书生，一碰到开玩笑的事，嘴就笨多了，不知该如何说好。还是刘英伶俐泼辣，她说：

“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

“那就不承认！”

毛泽东不依不饶，闹了一阵子，又说：

“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你们这叫作：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说：

“我可不是美人啊！”

毛泽东说：

“怎么不是？洛甫是开明君主，你就是开明娘娘。我就自封个毛大帅吧！”

尔后，毛泽东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5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人“案件”的情况汇报。他气愤地说：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一天上午，周恩来带着刚刚被释放的刘志丹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早早站在门外迎接，一见刘志丹来了，就笑着走上前去和刘志丹握手，拉着刘志丹往里走，边走边说：

“志丹同志，快请到窑洞里坐，里面有火。”

刘志丹热泪盈眶地说：

“毛主席，你好啊！我们终于盼来了主席！盼来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把刘志丹让进窑洞，落座后，他说：

“志丹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

“主席，我前些年已经坐过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毛泽东说：

“我们找你可费劲啦！原来你却在牢房里，听说他们在牢房里还给你戴上了手铐脚镣！”

周恩来看着刘志丹憔悴的样子，也说：

“‘左’字号的班房也厉害得很嘛！”

刘志丹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好好的吗？”

毛泽东说：

“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对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说：

“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使我们回到家了嘛。”

刘志丹说：

“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说：

“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看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然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正说话间，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背着5岁的女儿真娃（即刘力贞）来了。刘志丹看到多日不见的女儿，抱起来亲了又亲。毛泽东吩咐贺子珍接待同桂荣母女。贺子珍生病正躺在床上，急忙起来招呼客人落座，端上茶水。细心的同桂荣问贺子珍：

“毛主席为啥冬天还拖着单鞋？”

贺子珍说：

“他的脚在长征时冻下病，天冷就发肿，有双棉鞋太紧穿不成。”

同桂荣向贺子珍要了张纸，剪下毛泽东的鞋样，说是要为他做一双棉鞋、棉垫。就在这时，刘志丹要告辞了，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感谢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跟着主席和党中央革命到底！”

在数十年后，习仲勋、马文瑞等和刘志丹一起被关押的原西北苏区领导干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是无限感慨，他们都曾这样说过：“那时，多亏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苏区，解救了一大批同志，不然，我们哪会有今天啊！”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重视和使用原西北苏区那些开拓者？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初到陕北，为了不让尾追之敌祸害西北苏区，亲自策划并指挥直罗镇一役，一战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尔后他又连续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全部释放原西北苏区和红25军中被“左”倾路线执行者关押的数百名领导干部；二是释放了东北军中的被俘者，并派出汪锋等使者，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三是致电张国焘等人，通报了陕北的大好局面，意在争取红4方面军北上。这一切无不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谋略家的胸襟和高瞻远瞩。而早已陷入困境的张国焘却在复电中狂妄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两相比较，二人的优劣、胜败立分矣！对于他们后来各自的结局，读史者切不可以天命视之。**

**第3章**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话说1935年12月16日，林育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给红4方面军的张国焘发去了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请转电4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1、4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1、4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1、3军团（应是指红4方面军与原红1方面军的1、3军团——笔者注）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 16日9时（陕北来）

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召开。

田家院内共有坐北朝南砖窑5孔，左起第2孔是张闻天的住室，会议是在中间的窑洞内召开的。会场里有两张并列的八仙桌，有6条木条凳，炕上还有一张小桌。

参加瓦窑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

列席会议的有李维汉、林育英、杨尚昆、吴亮平、郭洪涛、李德等。

张闻天主持会议，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其它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张国焘问题和党的军事战略及策略路线。

1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起草并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全文如下：

亲爱的内蒙古全体民众们！现在我们是处在全世界大变动的关头。**你们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还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望速择之。

野心勃勃、凶焰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全世界，必先占领全中国，这个野蛮计划，现在已逐步实现，首受其害者为东3省、华北5省的民众和内蒙古的整个民族。狡猾卑鄙、口蜜腹剑的日本强盗，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的目的，它准备把你们的土地作战场，人民当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不信，请看朝鲜、台湾、东3省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动、耕种、牧畜的种种自由。一切政治经济的权限，完全操在日本倭奴之手。再看日本帝国主义在察哈尔的军事布防与军事设备，及兴安总署与其它的一切阴谋，便可以了然内蒙古民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何况还有恬不知耻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不独自命为宗主国，并进而把内蒙古整个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以黄河以南、阴山以北，并时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军阀，不断地侵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蒙古民族之灭亡。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所有的英勇红军，在数年来的英勇战斗，无数次地给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中国红军已经成长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纪录，胜利地达到了北上抗日的预定计划。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与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持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由此本政府向你们宣言：

一、认为原来内蒙古6盟、24部、49旗，察哈尔与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古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3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词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一切权力。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地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己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凡在内蒙古区域内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生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居住等的自由。

四、首先将井岳秀等占领的把兔湾（今巴图湾——笔者注），与高石秀所占的区域及两个盐池，交还内蒙古人民，并将长城附近，如宁条梁、安边、定边等地划为商业区域，以发展你我双方间的贸易。

五、我们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或其他的武装队伍，绝对没有向草地进攻的企图，但你们亦不要允许中国军阀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向我们进攻，加速你们自己的灭亡。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总之，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蒙古民族向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一旦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的子孙为可欺也。请为熟思，并望互派代表以建伟业，则不胜幸甚！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12月22日，林育英给张国焘18日复电回了一封电报。

张国焘在12月18日发给林育英的复电中是这样说的：“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即伪第二中央——笔者注）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

林育英按照政治局的意见在给张国焘的回电中说：

“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地尽量地向兄等传达，特别是抗日讨蒋的中心策略与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与步骤。共产国际及绍禹诸同志对4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12月22日这一天，瓦窑堡田家院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与会者在讨论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在讨论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时，出现了不少意见分歧，甚至是争论。

此时，中共中央、红1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北根据地，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1方面军的兵力只有万余人。根据地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而且根据地周围的敌情也仍然比较严重：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有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4、第86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因此，红1方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而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的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会前曾征求过军事指挥员们的意见，主张向南发展的代表人物是林彪，主张向北发展的代表人物是彭德怀，唯独没有人赞成向东发展。而今在与会者中也是这样，有的主张红1方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找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

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军事问题报告，提出了东进的战略方针。他说：

“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哈尔滨、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工作。

关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地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实行战役的内线作战和战略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行动方针是分3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过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5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000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入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

毛泽东在报告中表扬了胡耀邦。这个时期，毛泽东和胡耀邦有了较多的接触，毛泽东见了胡耀邦总是热情地叫他“小胡”，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不断地给予鼓励和指点。据红3军团的报告说：胡耀邦在长征到达贵州某地时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领筹粮，那位首领坚持说没有粮食。胡耀邦发现那位首领和他谈话时眼睛不时地盯住一个地方，心中有了数，经过耐心说服，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毛泽东说，要像胡耀邦一样善于筹粮。

毛泽东最后说：

“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说：

“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

林育英说：

“泽东同志将9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这一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一致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决议》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宣传和实际行动上，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1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确保下一步东征时的后方安全，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黄河东征的准备。第二步，实行东征，进入山西作战，求得击破同日军勾结的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5县以上地区成为初期的苏区，扩大部队和筹措给养，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

接下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他说：

“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新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搬出了党内历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理论，反驳说：

“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说：

“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确实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间势力’是危险的。但这只能说明它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们的软弱性，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我们已经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这又恰恰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问题的另一面，我们也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毛泽东和博古的争执“言辞之尖锐激烈，是我入党以来首次听到的。在毛泽东同志发言时，博古同志躺在张闻天的床上，默不作声”。

与会者中还出现了另一种论点：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即国民党的营垒是不会发生破裂的。针对这种错误论点，毛泽东批评说：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19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这没有错吧？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这也没有错吧？可是大家不会忘记，他们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就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当然，这种例子不止于蔡廷锴他们，还有冯玉祥、马占山等的抗日行为。”

最后，毛泽东还不无幽默地批评持这种论点的人说：

“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计划》中规定：

第一，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红1方面军主力向南进击，给富县、洛川进犯之东北军以打击，制止敌人的北犯。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以刘志丹为军长的红28军和以萧劲光为军长的红29军。由新组建的红28军刘志丹部等部队，在北线给进犯之敌第86师以打击。第二，扩大红军，充实东征部队的实力。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5000人扩红计划。第三，中央调集300名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加强技术训练。第五，各部队指挥员实地勘察渡河地点，拟订渡河作战计划。第六，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

是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2城，赤化宜川、洛川2县。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担任白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

《决议》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决议》同时强调说：“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令他为东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去考察一下渡河点和敌情。彭德怀本来是主张向北发展的，接电后他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二是怕不能保证撤回陕北根据地。他复电给毛泽东，说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的联系。毛泽东看了电报很不高兴，回电说：

“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彭德怀只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带着电台到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在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12月27日，毛泽东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时，讲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他说：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毛泽东还说：

“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复电给朱德，通报说：

“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1月初，国共双方的接触比较频繁了。共产党方面周小舟、吕振羽同国民党方面的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多次接触。周小舟带去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名义写给曾养甫、谌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双方就避免军事冲突、停止攻击对方的宣传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东征山西问题。周恩来报告了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分析对比。

此时，红1、红15军团兵力已经增至12700余人。

会议决定：东征从2月开始，到7月结束，时间为半年。

1月13日，张闻天按照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致电张国焘说：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4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1月16日，张闻天以中央秘书处的名义将12月25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并望其负责转告2、6军团。

1月16日这一天，回到陕北苏区的高福源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陪同下，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前边已经讲过，在直罗镇战役后，红1方面军释放了东北军的全部俘虏。此一时期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是从教育释放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开始的。

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15军团俘虏的。他原是北平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和张学良关系好，又有强烈的抗日要求，红军待之如宾。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

彭德怀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红军包围在甘泉的东北军110师看看，彭德怀同意让他去。数天后，高福源从110师回来了，他对彭德怀说：

“抗日救亡大事只能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爱民。”

一天晚上，高福源在彭德怀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说他们都要求抗日，东北军将士们普遍要求打回东北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怀说：

“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

高福源闻言，高兴极了，问：

“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彭德怀说：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高福源迫不及待地说：

“明早可以吗？”

彭德怀说：

“好吧！欢送你。”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送给高福源200元钱，派骑兵把他送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防线以外。高福源首先见到了王以哲，随后他回到西安，向张学良痛哭陈词，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大概过了一个星期，高福源乘坐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附近上空，掷下大批报纸刊物。

高福源这次回陕北苏区来，是受张学良之命，请红军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的。毛泽东紧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

“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又说：

“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应该认清，你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这是东北军的希望所在。张学良将军表示愿意与红军谈判，实行联合抗日，很好。”

继高福源之后，毛泽东还接见了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109师参谋长刘德裕。刘德裕被放回西安后，也向张学良做了一定的工作。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邓发、刘少奇、凯丰、李维汉、林伯渠、吴亮平、郭洪涛、李德。

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做目前行动方针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再次肯定1936年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

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参加政治局工作。

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凯丰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参加后方工作。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

会议决定，东征开始的具体时间为2月中旬。决定由毛泽民担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保障后勤供给。

欲知红1方面军东征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一是确定了红1方面军东进的战略方针，二是提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路线。整个会议过程的争论和结果，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政治策略方面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这是他的那些文武伙伴们所不能企及的。关于东征问题，毛泽东首先强调：“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说的是，要师出有名！其结论则是：“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这是多么高远的战略眼光啊！

**第4章**

**“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

**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

**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话说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签署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暂不公布。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1883年10月出生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9岁入私塾，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方面的投机。1902年，他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3年6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中国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中国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辛亥革命爆发后，阎锡山在山西起义，被公推为山西都督，至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1926年，他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1930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战败，10月宣布下野。1932年2月，蒋介石复任命他为太原绥靖主任。1935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阎锡山不仅不思国难，反而提出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

且说毛泽东提议周恩来在陕北做好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同张学良谈判，请高福源先回洛川，做好相互之间的电台联络。

1月20日，张国焘给林育英发来一封电报，顽固坚持分裂立场。该电全文如下：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 1月20日

1月22日，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4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1月 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提议说：

“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

1月 24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初一，张闻天复电给朱德，说：

“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

1月24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电张国焘和朱德，电文如下：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24日

林育英这封电报在南下红军中引起极大震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1月25日，彭德怀仍主张红1方面军向北而不是向东发展，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说：

“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

1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了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早日踏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徐海东、刘志丹等红军指挥员的名义，起草并用公开信的方式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全文如下：

张副司令、于主席、王军长、何军长、董军长、万军长并转东北军各师团长及全体将士：

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了，在这4年中间，不但东3省3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3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因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和卖国头子蒋介石是不喜欢东北军的。自东北军退出东3省后，蒋介石总是不给东北军一个休息整理的地方与时间。他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因为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他把东北军今天调到豫鄂皖边去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来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要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人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你们想蒋介石卖国贼的毒计可恨不可恨？！

蒋介石不但要东北军打红军，而且处处压迫东北军。他不给东北军一块好地方，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比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他也是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兵的待遇是极不平等的。东北军官兵的薪饷，哪里及得上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一半？东北军官兵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赡家养子更是说不上。蒋介石的毒计还不止此，他把他自己法西斯蒂的党羽派到东北军内，监视东北军官兵的行动，到处挑拨离间，威逼利诱，破坏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以瓦解东北军。人员的补充，武器弹药的补充，东北军从蒋介石那里是得不到的。总之，蒋介石是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军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教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教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险不危险呢？东北军现在是在彷徨歧路上面，东北军现在是在困难的中间。东北军内部现在没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军心涣散，上下不团结。东北军长此下去，好不危险！

试想，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一错不能再错，一误岂堪再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哪一个爱国的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摩拳擦掌，挺身而出，愿意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呢？哪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部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那时，哪一个中国人，不愿意拥护东北军爱戴东北军，在精神上物质上援助东北军。哪一个有热血的爱国男儿不愿意投效东北军，共同杀贼，为中华民族伸义愤，争光荣！哪一个东北军将士，不将成为全中国的民族英雄，闻名全中国全世界，试问大丈夫立功救国，不当如是耶？

东北军在过去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长城各口之战，声震华夏。使当日以东北军的全力，与全中国人民的拥护而抗战到底，那东3省是早已收复了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如此猖獗的。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重整旗鼓，发扬当时抗日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是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的响亮的回答，也是东北军抗日的鲜明的口号。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它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敢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素闻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定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号召。在4万万同胞中，甘心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甘心做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来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中国人。拿4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无力抗日”，是蒋介石辈汉奸卖国贼欺骗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口号，而不是我们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都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意竭诚招待。同时苏维埃制度的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

书不尽意，敬布腹心，望公等熟思之。顺致

民族革命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彭德怀 林 彪 叶剑英

杨尚昆 聂荣臻 朱 瑞 程子华 徐海东

张云逸 郭述申 刘志丹 陈 光 刘亚楼

彭雪枫 萧 华 杨 森 高 岗 阎红彦等同启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踏上东征之路。

1月27日，张国焘针对1月16日张闻天以中央秘书处名义告知他12月25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的电报，在发给林育英和张闻天的电文中说：

“此处对兄处12月25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认为兄等不将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预先电商我们，不将国际的决议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告知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由此可以看出，张国焘虽然态度还很勉强，而且带有埋怨的语气，但实际上他搞分裂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

1月28日，毛泽东到达延长县城。彭德怀在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考察已经忙了一个多月，他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很高兴，批准了彭德怀的渡河计划。

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主持召开东征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东征形势与任务的动员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东征的任务是：

“1、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调动他在陕北的4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苏区新的‘围剿’。2、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3、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会议宣布：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领导成员有：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敌军部长李涛，民主部长刘晓。

参加东征的红军主力部队是：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辖红1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红2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红4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

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下辖红75、78、81师。

参加东征的还有红28军（1935年12月由陕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军长刘志丹（兼），政委宋任穷，副军长杨森、政治部主任伍晋南，参谋长唐延杰。下辖3个团，1200多人，步枪670支，轻机枪5挺。

黄河游击师（由陕北红军独立团和几个县独立营合编而成）：由阎红彦任司令，蔡树藩任政委，下辖数百人，其任务是发动群众解决东征的渡船问题。

东征军总兵力共约20000余人。

会议部署了兵力，确定统一渡河时间为2月20日20时，还确定了东征路线。

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渡河先锋师师长刘亚楼，向彭德怀提出红1军团渡河时间问题，他说：

“司令员，统一时间这很重要，可是我们师部的几块表总走不到一起，其他几个团长的表也快慢不一。我们常常为确定一个人是否准时，发生争执。”

刘亚楼一句话点出了一个被大家忽视的大问题。因为此时部队负责人所戴的表，都是缴获的旧表，没有几个走时准确的。彭德怀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也一时无法表态。彭德怀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一商量，就向红1军团发出一个特别命令：“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从20日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命令一传达，部队里立时流传出一个笑话，说是：“谁的官大，谁的表准”。因为林彪不戴表，在红1军团除了林彪，那就是聂荣臻政委官最大，他那只忽快忽慢的旧表居然成了掌握渡河时间的标准表。

1月28日下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甘泉县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会后各部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组织编制，进行整顿训练。

1月29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刊登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即后来的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谈话称：

“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

1936年2月3日，毛泽东率领东征总部机关，从延长向清涧进发。他身穿青色棉布大衣，拄着一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马夫牵着一匹枣红马，跟在他后面。

在一个小山沟休息时，毛泽东召集随行秘书、机要人员、警卫班和电台工作人员开会，他说：

“今天我向你们讲两件事，第一，要注意保密。第二，大家要搞好群众关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了解群众情况，多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2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三，毛泽东翻山越岭，从川口过无定河，行程30多公里，到达清涧县袁家沟，住在白育才家的5孔窑洞里。随后东征军总部100多人也先后到达。

是日晚，大雪从天而降，毛泽东好不欢喜。

2月6日一大早，毛泽东等人冒着风雪到毗邻黄河的高家洼察看地形。他站在白雪皑皑的黄土高原上，极目远望，雪花纷飞的北国风光一片苍茫，不由得诗兴大发，回到袁家沟住的窑洞里，在一张小方桌上，挥笔写下了气势磅礴雄浑豪放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月12日，毛泽东为保证红军主力东渡后渡口的巩固，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周恩来，拟调红28军第1团由刘志丹、宋任穷二人中一人指挥，由河东向山西军渡、柳林、中阳行动；以阎红彦、蔡树藩所部黄河游击师巩固东岸沿河地区，以便集中主力向正东并在以后转到东南方向作战。

2月14日，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分两路集结于黄河西岸。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黄河西岸的袁家沟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

“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2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说：

“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2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正式公布在1月19日签署的讨伐令。这是毛泽东用近似于1920年为文化书社售书起草广告那种特有的极通俗的笔调书写的一篇文告。敬录全文如下，供读者诸君欣赏：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一、英勇的抗日红军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民众，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吗？现在是中华亡国灭种的日子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北京及华北占去，他还要占全中国，要把4万万人都当亡国奴。亡国灭种的大祸压在我们头上了，危机情形到了极点了。

二、4万万同胞都不肯当亡国奴，偏有一班汉奸卖国贼丧尽天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来灭自己的中国。没有这班汉奸卖国贼，我们中国的地方是不会亡到日本手里的，不打倒这班汉奸卖国贼，是不能保护中国地方的。汉奸卖国贼的头子是蒋介石，还有阎锡山、宋哲元一班子，他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三、阎锡山同蒋介石、宋哲元搭伙，出卖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山西、绥远卖了24年地皮，害得两省人民怨天恨地，他养了许多兵不去打日本，单来打同胞。他指挥孙楚、李生达等拼命进攻抗日根据地的陕北苏区，害得陕北人民妻离子散。最近得到惊人的消息：阎锡山接了日本皇帝的命令，秘密把山西卖去，又在太原开会，要趁着黄河结冰，要大举进攻陕西省。因此，黄河两岸人民纷纷告急，纷纷请求本会，出兵讨伐卖国贼阎锡山，救山西救陕西。

四、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这个万恶的阎锡山，打倒阎锡山救山西，打倒阎锡山救陕西，打倒阎锡山救华北，打倒阎锡山救东3省，打倒阎锡山剪除蒋介石的爪牙，打倒阎锡山响应抗日运动，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军委主席 毛泽东

副 主 席 周恩来 彭德怀

这一天，毛泽东为红1军团的指挥员们送行，他随口吟出一句诗：“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众人不知毛泽东所云何意，面面相觑。有一个指挥员询问毛泽东，毛泽东笑而不答。邓华略思片刻，说：

“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送别》诗的前两句，为我们送行呢。”

说罢便背诵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邓华，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郴县一个3代书香世家，原名多华，字秋实。邓华幼好古学，博览群书，与他人儿戏时，常持扁担作长矛，口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1928年初春，邓华随工农革命军第7师2团进郴县做宣传工作，已经初显其文才。他书写标语曰：“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如今世界太不公，富的富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邓华在长征途中，率部突破西安至兰州的公路，歼敌一部，缴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白金龙牌香烟5箱。上个月28日那一天，邓华到陕北延长县临真镇参加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见到邓华，问：

“你那个‘白金龙’还有没有？”

邓华从军衣右上口袋里摸出一支，递给毛泽东。他见聂荣臻、朱瑞也站在一旁，就又摸出了两支。毛泽东笑着说：

“邓华同志，财不露白呢。”

邓华说：

“否也，是细水长流嘛！”

2月20日晚8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率领早已集结在黄河西岸的红1、红15军团指战员，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沿黄河西岸50余公里的各个渡口，用小船、羊皮筏子同时渡河。

红15军团渡河先头部队从河口一带渡河，在河东登岸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便一举将河边守军歼灭。阎锡山在义牒的守军望风而逃。

红1军团从沟口下面的牛锦钵渡河，由红2师第5团的24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在柳林县三交镇的坪上村首先登岸。次日拂晓时分，5团进占三交镇，全歼阎锡山军1个营，乘胜进占留誉镇。

2月21日凌晨，毛泽东随红15军团一部出发，赶往渡口。他在7时、8时20分、12时、20时先后对前线部队发出电示：

“截敌追敌”；“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等。

在毛泽东指挥下，东征军兵分3路，一路沿黄河北上，袭击军渡，围攻柳林；一路进逼中阳，继续东进；一路进占义牒，猛攻石楼。

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说：

“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200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

2月23日这一天，东征军全部控制了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各个渡口，毛泽东随刘志丹、徐海东的15军团到石楼，彭德怀随1军团到留誉镇。

此时，东征军已经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

东征军突然渡河东进，令阎锡山恐慌不已，他一面急令孙楚迅速率军由陕北返回河东、柳林、离石、中阳、石楼一带，与东征军作战；一面电令中阳、石楼守军固守待援。

2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为打破晋军的封堵，建立作战根据地，又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

2月27日，红1军团发起总攻。阎锡山调派增援中阳的晋军，是被他称为“满天飞”的王牌之一的独2旅，一色的外国装备。当独2旅行至中阳县的关上村、刘家坪一带时，被红1军团层层包围，成了瓮中之鳖。独2旅旅部、两个团及其炮兵连全部被歼。红1军团俘敌400多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山炮3门。

此时，还有3个消息令毛泽东非常高兴。第一个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于2月25日抵达洛川，与67军军长王以哲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1、互不侵犯；2、建立交通和通商；3、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与彭德怀联名致电李克农，通报了东征军战果。电文中说：

“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200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李生达等部队共3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永和等县广大地区。”

第二个让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是，董健吾作为南京的密使于2月27日到达了瓦窑堡。

原来，蒋介石打算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系，他找到宋子文，要宋子文找一合适人选为密使，传递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宋子文又去找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董健吾。

董健吾的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上他不仅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而且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特科的成员。此人既与蒋介石有交情，也与毛泽东有交往，还与宋子文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交情颇深，又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联系。就这样，他这位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特科成员，竟然成了国民政府的密使。

国共双方在协商派遣董健吾为密使一事上特别慎重，所以双方各自的出面人员，都自认为是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都是CC系，如陈立夫、张冲等人，共产党派出的大都是特科的人，如李克农、刘鼎等。

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专门接见了他，提出了与共产党谈判的条件：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就托董健吾将此药带给中共中央，还要董健吾将关于国共合作的一封重要信件，当面交给毛泽东。

董健吾是在1月份与一位22岁的小伙子张子华一同赴陕北的。到了西安，董健吾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求见张学良。他见到张学良后，出示了一份由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他对张学良说：“希望通过东北军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见此人来历不凡，当场没有答应他。送走董健吾后，张学良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方面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共产党方面联络，瓦窑堡回电说，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他前往瓦窑堡。2月19日，董健吾与张子华2人乘坐一架“波音”飞机，从西安飞往延安。驻延安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1个骑兵连，护送董健吾2人前往瓦窑堡。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迎接他们。

2月27日这一天，林伯渠、李维汉、吴亮平、袁国平在窑洞设宴，为董健吾2人洗尘。董健吾急于要见毛泽东，可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和刘志丹也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一人在瓦窑堡。

当晚，董健吾2人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将国民党愿意和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告诉了博古。博古于深夜将南京来人及谈话结果，电告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他还介绍说：

“董系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10余人。”

毛泽东收到电报时，北方局情报部长王世英正在向他汇报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这就是令毛泽东高兴的第3个消息。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与林彪同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是资深情报工作负责人。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派汪锋去做杨虎城的工作，王世英是由北方局南汉宸派往杨虎城部的。汪锋与王世英在2月一起回到了陕北苏区。毛泽东得知后，立即电召他到山西前线汇报与杨虎城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王世英的汇报，完全同意他和汪锋与杨虎城商定的和17路军建立统战关系的各项原则：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签订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红军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3、17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共产党方面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毛泽东让王世英返回华北，要他在路过西安时将上述原则转告杨虎城，请杨虎城提前建立交通站，愈快愈好。毛泽东还特别指示王世英，要转告杨虎城，请他注意搞好同东北军的关系。

这正是：覆巢无完卵，统战当为先。

毛公识大义，群力着先鞭。

欲知中国共产党与张、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和《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是两份风格迥异的文告。前者大众化、口语化，极通俗直白，显然是写给山西的普通老百姓和出身于平民阶层的晋军士官的。这样的文告，自然也是东征军指战员们边战斗、边宣传的极好材料。后者则是情理兼备，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于褒奖之中寄予期望。无疑是一副促使东北军上层人物走上反蒋抗日道路的清醒剂。诸君读之，不可不细细地体味毛公之深意。

**第5章**

**“既然像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

**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话说红1军团在关上村一战，打得阎锡山心惊胆战，他急忙调动7个师的兵力，在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灵石、蒲县一带组成第2道防线，阻止东征军继续东进。

1936年2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等说：

“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4县交界处，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东南西北4方面各50里地区的群众工作。”

2月28日这一天，中共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在洛川密谈达成口头协定：

1、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在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3、延安、甘泉两城现驻67军部队所需粮、柴、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购买；4、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东北军两个营换防；5、恢复红白通商，往来苏区和白区的办货人员均穿便衣，红军与67军有保护之责。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特此布告。

总 司 令 彭德怀

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

3月2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周恩来，要他们和董健吾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回南京复命，表示不能去石楼。张子华说，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

张子华其实也是一名中共中央机关特科的成员，董健吾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张子华却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

在3月2日这一天，阎红彦、蔡树藩率领的黄河游击师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和晋西北游击队合编为红30军，由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下辖3个团，计1000余人。其任务是牵制北线之晋军。

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褒扬2局的工作“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属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的一大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有劳绩的”。

原来曾希圣领导的2局在东征战役开始后，对阎锡山军队进行了技术侦察，控制了晋军的各部电台密码，及时掌握了晋军、东北军、西北军及入晋增援的中央军的动态，为毛泽东决策及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彭德怀特地从缴获的物资里选了一批斜纹布送给2局作为奖励，让他们每人做了一套制服。

3月4日中午，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复电博古：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 毛 彭

4日12时

博古将毛泽东3人的复电转交给董健吾，又交给他3枚苏区银币和一套布币，作为回赠宋庆龄的礼物。

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当天，向宋庆龄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问候。宋庆龄非常高兴，称赞董健吾做了一件“益国非浅”的事。

至此，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国共两党终于打通了已经中断将近10年的联系。

3月4日这一天，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张学良说：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张学良除了同意李克农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外，还希望会见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双方约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中共中央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再次商谈，地点以延安为宜，时间由共产党方面决定。

李克农在会见后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洛川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并指示李克农赴山西石楼，向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作详细汇报。

此时，毛泽东和东征军总部随红15军团前进至孝义以西的大麦郊；1军团也向这一带靠拢。而驻守孝义、介休等地的阎锡山部队也正在向这一带集结，企图阻止红军于同蒲路以西。

3月10日，东征军总部指挥部设在大麦郊北郭家掌的一座小山上，毛泽东在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

郭家掌对面左前方就是晋军据守的兑九峪，晋军打过来的炮弹不断落在指挥部的后面。警卫人员劝毛泽东暂时隐蔽一下，他却依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山头上观察前方战况。

下午3点多钟，一科的余参谋忽然发现前面山沟里出现了一股晋军，他们利用死角极端隐蔽地朝郭家掌山上偷偷地摸过来。毛泽东身边什么部队也没有，情况十分危急。余参谋急忙组织几个警卫人员到前面山坡上进行阻击，他又劝毛泽东到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土洞子里暂时避一下。

不一会儿，山坡下响起了枪声，子弹哗哗哗地打到山顶上。山沟里的晋军突然受到打击，回头就跑了。

兑九峪战斗，东征军击溃了晋军第2、第3两个纵队，阎锡山怕蚀老本，急忙命令他的部队缩回汾阳、孝义、介休几个县城，一面组织地方民团配合其主力沿同蒲路、汾河设防，一面致电蒋介石火速增援。

几天以后，东征军总部转移到交口县双池镇。毛泽东、彭德怀根据晋军的部署，决定东征军主力部队转入北上南下作战：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15军团北上作战，由林彪、聂荣臻率红1军团沿着同蒲路南下作战，打乱阎锡山的防御部署，使晋军首尾不能相顾。

毛泽东还决定，由叶剑英率领只有两个连兵力的特务团，带着一部电台和少数参谋警卫人员，一共不到500人，跟着他离开东征军主力部队向晋西一带转移。毛泽东召集特务团和电台的干部开了一个动员会，他说：

“左右两路军已经打出去了，我们是‘中路军’，中路军队伍虽小，但是要做大事情。”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微笑着说：

“现在敌人驻守汾阳、孝义、介休等地的二十几个团，将来要‘扫荡’我们，要把我们晋西的红军赶回陕北。好！就让他来扫荡！可是我们暂时还不准备回陕北，而要在晋西一带跟敌人兜圈子。我们要准备多跑些路。”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情和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认真研究，商定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道赴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此后，毛泽东带着特务团几乎天天行军，路线飘忽不定，时而向南，时而向北，在孝义、灵石以西，中阳以南，石楼、隰县以东的范围内转来转去。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打土豪、扩红、筹款。

有一次，部队在一个小山村宿营，准备在拂晓时出发，晋军突然打起炮来，小山村内外尘土飞扬，炮弹震得人们耳朵嗡嗡直响。一位负责人跑来催促毛泽东说：

“主席，敌人朝我们打炮了，快走吧！”

毛泽东却镇定地说：

“慌什么！过一会儿再走，等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

果不其然，晋军打了一阵就停下了。毛泽东这才从容地起身上路。

此后，毛泽东和晋军就像捉迷藏一样，晋军追得紧，他率特务团就走得快；晋军追得慢，他们就走得慢；晋军停下来，毛泽东就让部队休息。双方宿营地常常相距不过七八公里。

一天宿营后，毛泽东专门去看望电台的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微笑着对大家说：

“这些天，你们有点提心吊胆吧？阎锡山的队伍战斗力不强，看来是名不虚传。我们一渡河，他们就把沿河堡垒丢掉了。石楼城里敌人4个团，被我们的叶剑英总参谋长带领的一个小团围住就不敢出来。他的‘满天飞’部队跟我们1军团一碰，就变成了‘满山飞’，看来也不经打。我们摸到了他这点底，所以敢欺侮他。只要你们电台的工作做好，把所有的来往电报，能及时收进来发出去，使我能够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就不会出问题。”

后来，有一个新战士掉了队，被晋军捉了去。由此晋军知道了毛泽东的行踪。第二天，太原和南京电台便广播说：“晋西共匪已被国军击溃，据俘匪供称，毛泽东仅率少数残匪落荒而逃……”

自此，晋军对毛泽东率领的这一支小部队追得是越发的紧了。毛泽东给红15军团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徐海东等人追在特务团后面的晋军的活动情况。不久，就听到了红15军团在中阳县东南的师庄村歼灭了晋军1个团和1个炮兵营的消息，连晋军的团长也活捉了。

毛泽东了解了红15军团的情况后，致电南线的林彪说：北线红15军团伤亡大，扩军困难，兵员缺乏，希望1军团拨一部分兵力给15军团。林彪看了电报，对聂荣臻说：

“1军团也缺员，没有多的几个兵！”

聂荣臻到部队下边了解情况，下边反映说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于是，他和林彪就复电毛泽东说：1军团也严重缺员，请求免拨。毛泽东看了电报非常生气，他认为林彪是严重的本位主义。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孝义县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

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华北的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

“过去提‘巩固向前发展’是对的，今天则是‘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为此，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在战役上要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

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以此一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3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山西已占区域的主要工作“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会晤。

会议还决定：张闻天等政治局成员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即回后方瓦窑堡。

3月下旬，上海地下党代表刘鼎奉命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

3月29日，毛泽东根据晋西会议精神及蒋军入晋援助阎锡山的新情况，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通电中说：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为了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迈进。如今最大卖国贼蒋介石，丧心病狂，不顾民族存亡，甘为日本帝国主义奴隶，不允红军抗日要求，竟以六七师之兵力入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为了民族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红军愿争先驱，誓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

1936年4月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没有山西即不能同日军进行大规模作战。

4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就东征军的行动计划和陕甘部队的扩编等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及红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宋时轮、红29军军长萧劲光，命令：

“1军团暂不去晋东南，明日开始转入蒲县地区集中训练，准备作战。”红15军团和红28军南进，集中在临县、离石、中阳地区猛烈扩红和做群众工作。立即编成红31军。陕甘扩红全部编入红29、红31军。准备开辟永和关、三交镇以北两处渡口，以1军团负责南面，15军团负责北面。

4月5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宣言》揭露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动员全部武装力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揭露了蒋介石派出10多个师协助阎锡山及命令张学良、杨虎城部进攻陕甘苏区。《宣言》说：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我们誓以全力消灭拦阻我先锋军抗日去路与捣乱抗日后方的汉奸卖国贼军队，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计划，以争取迅速的对日直接作战。《宣言》同时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国家于灭亡。”

4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志丹、宋任穷并告徐海东、程子华说：

红28军要逐步向南，走一二天即展开工作，休息整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接近，然后收齐队伍再跃进一步，再散开工作。红15军团到三交镇时，应即展开三交南北一线，休息扩红。

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通报双方谈判的有关事项：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电文中所说的肤施，是延安的别称。

4月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

红1军团继续留在晋西南开展工作，“直至敌情不许可继续留此区域时，然后离开此区域，转至另一区域”，并要求红1军团在晋西南尽可能完成如下任务：打仗、训练新兵；发动群众，造成游击区域；粉碎沿河封锁线一段；继续扩红。

4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延安东北之川口。因风雨交加，张学良未能按时赶到，且电讯中断。

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王以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刘鼎飞抵延安。

晚8时，周恩来、李克农一行人入城，与张学良正式会谈。张学良说：

“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还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战线里来的。”

周恩来同意把张学良的这个意见报告给中共中央。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直到次日凌晨4时，会谈才结束。

张学良在周恩来告别时，赠给他一册《申报》60周年纪念大地图。他还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共同保卫中国！”

此后，周恩来将张学良提出的把蒋介石“团结到抗日战线里来”的意见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经过对国内形势反复认真地分析研究，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是在政治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他在复电中说：

“既然像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4月9日晚，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在致张闻天的电报中建议说：

“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4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命令红78师选择有利地形，采取节节抵抗的办法，消耗敌军，迟滞其南进时间。

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

“你们须在一星期内从永和、大宁、吉县方面打开一缺口，完成与后方交通之任务。”

4月11日，毛泽东复电林彪、聂荣臻，通报了周恩来9日晚与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谈判的结果：（一）认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是唯一出路；对十大政纲待张学良研究后，提出意见。（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红4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张可斡旋阻挡红2、红6军团道路的国民党中央军。（三）张部赴苏联代表由欧洲去，张保护中共代表由新疆赴苏联。（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张说如红军与日军交战，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五）张部未公开表明抗战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要其进占苏区的命令。（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部办，并供给子弹。（七）互派代表常驻。（八）张认为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红军如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东北军第53军军长万福麟不打红军。

4月1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

“同意你们首先集中全部兵力在乡宁、吉县、大宁、蒲县地域找寻作战机会，求得在此地域打一二仗，消灭敌1、2个团，这是最好的方针。”“只要能打一胜仗，打破封锁线就不是迫切问题了。”

4月12日，彭德怀致电位于山西临县白文镇的刘志丹、宋任穷说：

“为了配合左路军紧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的联系，保证我军背靠老苏区，着令28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刘志丹、宋任穷立即率红28军南下。

4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并转红l军团全体指战员，列举了东征军近期在作战、筹款、解决被服、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成绩。

4月13日这一天，红28军到达三交镇（今柳林）附近。

三交镇是坐落在山西中阳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渡口，南北两面环山，两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征军主力部队分进南北后，三交镇复为晋军占领，并有重兵把守，沿河筑有坚固的工事。刘志丹对指挥员们说：

“越往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宁苏区的联系。”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红28军指挥部设在南山顶上的党家山，距1团阵地不远。1团很快从东南面攻上山，进展顺利，接连拿下敌人的许多碉堡。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刘志丹便命令1团向北山攻击，与2团夹击北山之敌。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这时才发现，原来的情报不准确，以为敌人只有1个营，实际上是1个团部、两个营，还有1个炮兵连。刘志丹和宋任穷决定，宋任穷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刘志丹到1团阵地去看看。就在1团的阵地上，刘志丹不幸中弹，为国捐躯。宋任穷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再克三交镇，打开了山陕之间的通道。

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目睹了刘志丹牺牲时的情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刘志丹同志迎风站在高处，观察和谛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就在刘志丹指挥着红军战士对敌人重新发起攻击的时候，敌人的机枪突然射来一阵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我们亲爱的军长的生命。当时我曾几次拉过刘志丹的衣服，让他姿势低一点，防止危险。谁知就在我最后一次拉他时，见他两只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不禁惊叫了一声，上前忙把他抱住，同时急喊警卫员说：“快去叫医生。”子弹是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去的，很可能是伤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他的面色迅速地变得蜡黄。当我抱着他下到山包后边时，他已昏迷过去，呼吸极度微弱。停了一下，他神志有些清醒了，他那种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还想为党为人民做更多事情的精神，似乎一下子全都迸发出来，用劲挣扎着。低声告诉我：“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接下来只见他嘴唇嚅动，却再也听不见声音了。当医生来到时，刘志丹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就在这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特务团转移到赵家沟，这是一个深山里的小村庄，离大路比较远。毛泽东在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

“我们到山西一个多月了，歼灭了阎锡山1万多人的兵力。左路军深入晋西北，右路军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广泛发动了群众，扩大了7000余名红军，筹款50余万元。左右两路军获得了这样大的成果，我们‘中路军’成绩怎么样呢？我们牵制了敌人，便于左右两路军顺利发展。”

毛泽东终于道破了3月中旬双池镇分兵的天机。

原来，红15军团受命北上，威胁太原，主要目的是要调动晋军。阎锡山怕他的老巢被抄，急忙派了十几个团尾随追赶。红15军团就牵着这股晋军主力一直跑到岚县、兴县一带，与3月底渡过黄河的红28军会师，突然掉头南下，在兴县康宁镇、中阳县金罗镇歼灭了一部分晋军。毛泽东率领的“中路军”，则是一方面“办大事”，另一方面要引着一部分晋军主力兜圈子，既减轻了北路军的压力，又策应了南路军的行动。这北路军和“中路军”的行动果然迷惑了阎老西，造成了他在人烟稠密、物产富饶的晋南一带兵力空虚的局面。这就给林彪的南路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红1军团横扫过去，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襄陵，一直打到晋南重镇侯马，一路上消灭民团，宣传抗日，打土豪，筹款，扩军。就这样，红军计划半年东征的目的，在很短时间内就已经达到了。

毛泽东这一招，使阎锡山胆战心惊。他接二连三向南京发电报，请求蒋介石救援。于是，蒋介石就派出10个师增援山西：5个师由正太路西进，阻挡红军继续向东发展；5个师由风陵渡北渡黄河，沿黄河东岸向北推进，企图截断红军退路，与阎锡山主力形成夹击之势。

4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决定“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这正是：抗日救国前锋东征，红军处处占主动；

统一战线首倡大义，元戎每每筹良谋。

欲知东征军回师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关于刘志丹之死，数十年之后有关人员先后写了一些回忆文章，其中有不少细节上的差异。比较突出的是宋任穷说刘志丹被抬到军部后停止了呼吸，与本传上述材料有所不同。还有一个自称是刘志丹警卫员的说，刘志丹受伤后被送回陕北，因伤重不治身亡（这是本传修改前引用的材料，裴周玉曾撰文批驳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运”分子、自由派作家叫王若望的人，便趁机抹黑共产党，写出了一个所谓的“政治谋杀”的研究“新成果”。他胡说“是什么人打黑枪把刘将军打死？由于实现这一阴谋的是党内特务头子康生部署的，所以凶手肯定得到保护并且还有奖赏，永远不会破案。”王若望哪里知道，**彼时的康生还远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这个偏于一隅的刘志丹，他怎么会认识？又焉能飞回山西部署打黑枪？就连这样的无稽之谈，后来又被一些人拿来说事，他们在互联网上散布谣言，说刘志丹是被毛泽东害死的。请问：同是受“左”倾路线残酷迫害的人，毛泽东既然救了他，为什么又要将他害死呢？那些人一点历史知识都没有，只会凭空造谣，无异于狂犬吠日，岂不是枉费心机？！

**第6章**

**“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

**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

**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

话说1936年4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封亲笔信。

这封信是鲁迅在3月底以他和茅盾的名义，写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鲁迅将信写好后，交给了美国朋友史沫特莱，请史沫特莱设法转交。史沫特莱又托人转道巴黎，好不容易才送到了陕北瓦窑堡。鲁迅在信中写道：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地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鲁迅 茅盾 1936年3月29日

鲁迅为了庆贺工农红军的胜利，又特地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是了解鲁迅的。就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那是他在陕西第4中学只有两间房子的图书馆里，发现了鲁迅著作的选本，非常高兴，当下就借走了3本。几天后，秘书替他还书时，又借走几本新的。第3次，秘书把鲁迅著作选本全部借走了。毛泽东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读完了这些著作。

毛泽东读了鲁迅的信，决定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陕北到上海去，以便加强与鲁迅、茅盾的联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从与冯雪峰相识后，关系一直很好。就是在长征的艰苦日子里，毛泽东深知冯雪峰和自己一样嗜好纸烟，也曾经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特意送给冯雪峰。

在冯雪峰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找他谈话。毛泽东交代他到上海后，要先去看望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然后再去联系党员，开展工作。

冯雪峰到上海后，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去看望了鲁迅。他在谈话中把毛泽东等人介绍给鲁迅，还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当冯雪峰谈到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和统一战线思想时，鲁迅总是静静地谛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央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表露出亲切、信任的神态。

冯雪峰在拜会宋庆龄时，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宋庆龄的赞赏。

此后，鲁迅又委托冯雪峰将他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抵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特意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

在这期间，冯雪峰参加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为此与周扬结怨。

在这个4月份，还有两件事需要交代：一是中共中央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通知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留德学生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部做联络工作，并沟通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二是王世英受毛泽东之命，于4月下旬途经韩城再度与杨虎城会晤，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杨虎城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承诺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4月1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军团自明日起，以两个师打大宁马头关至永和关之河防，尔后在永和、大宁、隰县之间准备作战；以两个师相机夺取大宁，不论夺得与否，应位于大宁及蒲县、大宁、隰县3县之交，阻止蒲县、吉县之敌急进。

4月17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宋任穷说：

“责成你们在大宁、蒲县、永和区域，创造一个300人左右的游击支队，配备干部和武装，以便尔后你们向另一区域移动时，增加晋西南化为苏区的力量。”

4月2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军团引诱大宁之国民党军第69师第203旅和第214旅西进而歼灭之。

4月2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邓发，要邓发即刻动身去苏联，并提出邓发赴苏商谈军事方面的任务是：

1. 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二）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四）技术帮助问题。（五）人员帮助问题。

4月2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张云逸，通报了山西国民党军设防和本月底或下月初将有数路向我进攻的情况，以及在陕西的张学良、王以哲、杨虎城部的调动情况。

4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红28军军长宋任穷、政治委员蔡树藩，红30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阎红彦并告周恩来，针对山西国民党军对东征军的大举进攻，对红1、红15军团和红28、红30军的行动作了部署。并说总部于明日率第1分队由交口县康城镇出发，以3天到永和县桑壁镇与林、聂开会。

4月24日这一天，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追悼大会在瓦窑堡举行。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主持了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刘志丹的遗体被送到瓦窑堡南门外桃树坬安葬。中央派人把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用担架抬了来。同桂荣要开棺再看刘志丹一眼，周恩来劝道：

“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

后来在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为纪念刘志丹，把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说：

“目前在山西方面，阎军和蒋军共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在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而在神府地区，在靖边、安边、定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时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这也是红军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4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张闻天说：

“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

电文中提议在延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等问题。并提出了关于行动方向的两个方案：

“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大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28军、30军去神府区域。此两方案请你及政治局各同志考虑，我们亦正在考虑。”

接着，毛泽东就西渡黄河的部署问题，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周恩来说：

“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先渡，5月3号前渡完。”

4月底，国民党救援山西的先头步兵师在芮城县风陵渡渡河北上，已经插到东征军左右两路军的前头，迫近尚在河东等待红军主力部队的毛泽东所部和东征军总部，企图抢占黄河渡口。毛泽东为了避免在渡河以前与这个先头师纠缠，延缓整个渡河计划，就和彭德怀商量说：

“德怀，我想给敌人先头师师长写一封信，要他就地扎营，不准再向前移动，你看如何？”

彭德怀说：

“要得，要得。诸葛亮抚琴一曲退魏兵，主席的信也会使敌人停止前进的。”

于是，毛泽东就给那个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军一兵一卒的损耗，都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信的最后还警告他说，贵部必须就地止步，不准再向前移动。否则我军以数万之师，南北夹击，贵军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军先头师师长看了这封晓以民族大义的信后，不知是出于爱国心之发现，还是害怕中计被歼，真的乖乖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命令”，不再前进一步了。

毛泽东闻报，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用湖南口音唱起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个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936年5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部署了东征军各部渡河时间、地点及顺序；规定部队白天休息，夜间渡河。

是日晚，东征军各部开始按照部署从山西永和、大宁地区的清水关、铁罗关等渡口西渡黄河。

5月5日，东征军全部渡河完毕，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东征战役历时75天结束。

是役，东征军不但迫使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晋军撤回山西，还歼灭了晋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其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及大批弹药，炮20余门，扩红8000余人，筹款50余万银元及大批物资。

东征军在30多个县（有学者考证是38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连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也承认：“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5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各兵团负责人，下达了工作方针，要求各部以10天为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行动的时间。各部队依照自己的情况，定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整理组织及总结在山西作战经验的具体办法。

工作方针还规定了红1方面军的政治口号及在10天内由军委召集一次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由军团及军召集一次庆祝胜利并追悼刘志丹的大会。

5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以他和朱德的名义正式发表。他在通电中写道：

自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浦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10师以上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阻拦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悔改，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为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及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监督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4月28日的提议，在延长县交口大相寺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

“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的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地步！中间分子的态度也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做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就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方向。”

毛泽东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说：

“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受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去，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关于干部的培养问题，毛泽东说：

“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张闻天和彭德怀也在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决定红1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就在此时，受毛泽东委派的王世英电告中共中央说，他已经和杨虎城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络，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第17路军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此以后，杨虎城的第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富县一线的部队，与红军之间处于休战状态，再未发生实际上的冲突。不久，杨虎城在西安、富县建立了交通站，为红军转运了大批军用物资，双方率先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5月13日，毛泽东在交口大相寺主持召开红1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他还批评了红1军团不愿调出新兵补充红15军团的本位主义。

聂荣臻代表红1军团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明西征的3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促进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出席了会议；吴亮平、李德列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学校的组织等问题。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瑞卿、杨尚昆5人组成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等担任教员。

毛泽东推荐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子昆为校务部主任，袁国平为副主任。

罗瑞卿是在第4次反“围剿”结束后，受“左”倾路线的排挤，被免去红4军政委职务，调到红1军团部担任保卫局局长。

毛泽东知人善任，他选择林彪出任红军大学校长是因为他最了解林彪。林彪也确实是最佳人选，因为林彪对部队对下级指挥员的教育独具特色。据杨成武回忆说：

“第3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应召跑了七八十里去见林彪，他要搞‘围点打援’和‘网开一面’的教学课。我到了那里，也没课本，只有十几个战士。一个战士是‘白军’，几个红军各代表一支部队迂回包围，而后‘攻打白军’。‘白军’叫喊救命，另一个‘白军’开始出动增援，另几名红军埋伏出击，将‘援军’在旷野里一举歼灭。接着是‘网开一面’。3名红军包围‘白军’，留下一条路，路上几名红军埋伏于两侧。红军攻击得猛烈，‘白军’只好弃城逃跑，在路上一下子就被歼灭掉了。这时林彪说：‘今天演习完了，下去多想想这堂课内容。’这一课真胜读10年书。”

林彪的这一课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演习。杨成武后来还曾经回忆说：

“还有件事印象深。我从‘红大’毕业后，中央军委任命我为红1师师长，林彪同我谈话，教我‘怎样当师长’。我有记录的习惯，从当兵到现在，开会或同上级谈话，全记录。这次林彪的谈话我做了详细记录，共9条内容，厚厚一本。陈光、罗瑞卿、刘亚楼当时都知道，并且都拿去看过，认为对部队建设很有价值。后来我将这个记录发表了，题目是《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

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成立陕甘宁省委”的电令，与此同时，成立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由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由甘泉下寺湾移至甘肃环县河连湾。

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土地部、裁判部、内务部、粮食部、教育部及保卫局等。先后下辖定边、安边、赤安、华池、赤庆、环县、曲子、静宁、盐池、豫旺、豫海、固北、定环等13个县苏维埃政府。其中豫海县是回民自治政府，它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回族自治政府。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征战役计划》：

以红1方面军红1、红15军团和红81师、骑兵师等共17000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聂鹤亭任副参谋长。

全军共分为3路：以红1军团为左路军，由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下辖红1、红2、红4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8000人。以红15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下辖红73、红75、红78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6000人。中路军由聂鹤亭指挥，下辖红28、红29、红81师和军委直属骑兵团。

《西征战役计划》中另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和陕北地方部队、游击队，留在苏区南线、东线，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其它国民党军。以红28军出陕南，会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74师在鄂豫陕边开展斗争。

战役计划颁布后，毛泽东去看望电台工作人员，他说：

“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一块鲁班石一样。你们知道‘鲁班石’的故事吗？”

接着，他讲起了鲁班石的故事，他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一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他们辛辛苦苦干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既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了。于是，匠人们便四处寻找，不知找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捶草的石头。搬去一试，大小正好合适。一打听才知道，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来的。原来，鲁班从此路过时，量了桥身，又看了看准备的石料，就知道缺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就悄悄按照规格尺码凿好了这块石头，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作‘鲁班石’。”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一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

毛泽东知道有一些工作人员不安心工作，不愿待在后方，想到前线去，他就说：

“我们干革命的，就要听党的话。党需要我们在哪里工作，就要到哪里去。革命的事业总要有个分工嘛，不能随个人挑挑拣拣。如果有人对革命工作还有贵贱之分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后来，左路军红1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15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

毛泽东也准备离开延川县交口大相寺了，他交代警卫员贺清华等人说：

“我们走的时候，要认真检查群众纪律，把老乡的窑洞、院子打扫干净，把东西放整齐，把水缸挑满水。”

5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林育英、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等人联名致电正在长征途中的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等人，告之以目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红1方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情况，欢迎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北上。电文中说：

“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

5月20日这一天，大相寺的老乡们有的站在窑畔上，有的站在山坡、沟旁、路边，等候欢送毛泽东。毛泽东一走出院门，老乡们就排成了长长的欢送队伍。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老乡们挥手告别。

这是一支小小的队伍，和毛泽东同行的只有贺清华几个警卫员及挑夫班和马夫。挑夫班挑着毛泽东的铁皮文件箱和简单的行李，马夫牵着毛泽东的小黄马，警卫员们就护卫在毛泽东身前身后，形影不离。

毛泽东的小黄马是在长征路上一次战斗中的战利品，它体形很好，身长适中，高矮相宜，身上除了脊背上的长毛是黑色以外，通身上下都黄得闪光。小黄马走起路来稳似行船，跋山涉水不费劲，枪炮轰鸣不受惊，的确是一匹好战马。毛泽东每到一处宿营，都要嘱咐工作人员好好照料它。

陕北的5月天，一早一晚寒气袭人，当午的太阳却是火辣辣的。毛泽东行军时一般都不骑马，而是和大家一起步行。贺清华跟在他身边，看见他脸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就把身上背着的伞递给他。毛泽东抬头看看太阳，说：

“我不用，你打上吧。”

贺清华说：

“主席，你刚到陕北不久，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早就习惯了，还是你打上吧。”

毛泽东仍然没有接伞，微笑着摇摇头，迈开大步往前赶路了。这一天，他们一行人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下来。毛泽东吃过饭就在小油灯下办公。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一行人又开始赶路了。这一天天气凉爽，毛泽东一路上给贺清华等人讲了不少有趣的事情。眼看快到永坪了，他对贺清华说：

“一会儿路过永坪的时候，你可以回家去看看。”

贺清华说：

“永坪离我家还有十好几里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那等咱们到了瓦窑堡之后，给你几天假吧。你不是到过瓦窑堡吗？”

贺清华说：

“到过，在城里二道街给一个杂货铺老板当过小伙计。”

毛泽东初到瓦窑堡时就住在二道街，那里他熟悉，就问道：

“你对瓦窑堡很熟悉嘛！给那个老板干活好不好哇？”

贺清华就把他在杂货铺挨打挨骂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以及家乡“闹红”，自己如何参加红军的情况说了一遍。说话间，众人已经过了永坪，到了源流湾。这里是川道，比较开阔。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警卫员们喊道：

“敌机！”

毛泽东抬头看看飞机来的方向，说：

“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要让它发现。”

贺清华跑进路旁的一孔废窑洞，看看没有坍塌的危险，就请毛泽东到里面隐蔽，留几个人在外边担任警戒。毛泽东坐在地上喝了几口水，飞机的轰鸣声逐渐小了，就走出窑洞，说：

“敌机飞走了，我们也歇好了，继续上路吧。”

走过新寨河，翻过黑山子梁，就是瓦窑堡。毛泽东一行人走进枣树梁，远远看见有骑兵列队迎候。毛泽东检阅了骑兵，就向山下走去。先期从大相寺回到瓦窑堡的周恩来与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等人一起，在山下迎候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路两边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和部队，学生们敲着洋鼓，吹着洋号，欢迎口号此起彼伏。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们招手示意，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南门。

欲知毛泽东回到瓦窑堡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是一篇难得的政治文告类之佳作。可以说，像这样义正词严而又极其精辟的通电，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请看：《通电》向全国昭示，我红军东征，师出有名，名在抗日救国。意思是我要抗日，你要卖国，我就不得不打你！《通电》同时又昭示红军回师有因：我们要去直接同日军开战，你却以重兵拦路。为了顾全救亡大局，为保存“国防实力”，为不损伤“违反自己良心”而进攻红军的“爱国军人们”，红军不得不主动回师，以示诚意。接下来，毛泽东在通电“进言”里，不再称蒋介石、阎锡山为卖国贼，而改称为“蒋介石氏”、“阎锡山氏”；不再称国民党军为反动军队，而改称其有不少是“爱国军人”；不再称蒋介石集团为反动派，而改称其为“南京政府当局诸公”。且不说他以“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相警告，单就这种称谓上的重大变化，就已经是高妙之极了。

**第7章**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

**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

**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

话说毛泽东回到瓦窑堡后住在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的一个巷子里，这里共有5孔窑洞，中间的一孔是他的卧室，挨着左边的一孔有门相通，是他的办公室，室内地下有一个不到2平米的小防空洞。

1936年5月23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说：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的重心应放在东北军第57军，集中力量在3个月内有大的进步。”

会议决定今后不在东北军内组织哗变，不再进行军事打击，并且可以给以一定的让步，争取在东北军内开展公开的工作。

5月25日，毛泽东与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等致电西方野战军暨红4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等并转红2、红6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说：

“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电文中还说：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渡黄河后向陕、甘、宁发展，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

5月25日，毛泽东起草并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说，抗日人民红军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回汉密切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正在窑洞内一张古式旧方桌旁挥毫疾书，警卫员引领着被东征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来到了窑洞前。毛泽东起身把郭登瀛让进窑洞里坐下，询问了晋军的素质、军事装备以及官兵的思想状况，又谈到了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诚恳地对郭登瀛说：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

郭登瀛听着毛泽东的一番大道理，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指着即将写完的信说：

“郭团长，我要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郭登瀛说：

“有什么事需要干，我愿意效劳。”

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放你回去。我想请郭团长把我给阎锡山先生的这封信送到太原去，你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

郭登瀛满口答应。毛泽东又嘱咐说：

“另外，还有一些意见在信上没有写得那么具体，请你代为转达。敝党敝军进入山西，只为抗日，别无它求。但抗日得有块地盘，否则，打完了仗，没个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因此希望能在绥远让给我们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行，那么在雁北让给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我们是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共同打日本。”

郭登瀛在陕北这一段时间，亲眼见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与士兵一样穿补丁衣服，吃一样的饭菜，毫无个人私利，已经特别赞赏他们的人格。现在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很受感动。他说：

“我已经把您的话一字一句都记下了，回去一定劝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再也不打内战了。”

后来郭登瀛回到太原后立即求见阎锡山，当面报告了他被俘后的情况，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阎锡山打开信一看，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5月5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顷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在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阎锡山看完信，很是佩服毛泽东的眼力，蒋介石压迫日甚，确实是他的一块心病。最令他头痛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不但赖在山西不走，而且，陈诚还拉拢收买他的高级将领李生达，又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阎锡山后悔当初不该一再邀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晋，现在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对身边的亲信说：

“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毛泽东为了从阎锡山的内部逼阎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又分别致信晋绥军中对阎锡山有影响的第66师师长杨效欧和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李生达。毛泽东在信中说：

“日事相斫，停战议和，共赴国难，实为今日之天经地义。”“盼商之百川先生派遣代表，共商大计，以利于国家民族。”

毛泽东还给阎锡山的老搭档、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写信说：

“红军者，抗日讨逆之先锋，非欲与晋军为敌人。”

他在信中向赵戴文解释了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希望赵戴文在抗日降日之间“熟图而择之”。

5月2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阎红彦、蔡树藩说：蒋介石、阎锡山以30个团入陕，有消息说本月底晋军将渡过黄河。红30军应以主力位于吴堡县宋家川之线以南，迟滞国民党晋绥军前进。

5月26日这一天，马鸿逵、马鸿宾发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立即调其第35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其防地交由东北军派部接替。

毛泽东立即致电东北军张学良说，不要妨碍红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他又致电彭德怀说，已电张学良让出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红1军团应进至华池县元城镇，以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熊正平第115师主力由庆阳北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则坚决打击之。

5月27日，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各部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

5月28日，红1军团从吴起镇出发西进。

5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研究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

“我们在6、7、8月要以洪德城为中心创造新的根据地。我们的工作：第一，在安塞以西、洪德城附近四五百里地区做赤化工作；第二，对东北军完成主要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政治上的，内部的团结，干部的创造等；第三，坚持陕北游击战争。”

5月29日早饭后，军委通讯员来找张爱萍，说：

“毛主席请你去一趟。”

张爱萍听说毛泽东要找他，心里便“咯噔”了一下，脚步不由自主地沉重起来。

原来，张爱萍是在长征结束后奉调到军委骑兵团工作的。在东征期间，为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骑兵团在盐池、定边、靖边、榆林一线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在奉调回瓦窑堡休整途中，在青阳岔听群众反映说，县政府被国民党井岳秀的部队抢去了一些衣物，还抓走了人。“追！”张爱萍当即下了命令。骑兵团追上了敌人，消灭其一部分，又抓了40多个俘虏，还夺回了东西，可没想到在返回的路上中了敌人的伏击，张爱萍也受了伤。

张爱萍边走边想，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打胜仗去见毛主席！”如今自己打了败仗，有何颜面去见主席呢？见了主席该说什么好呢？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正在看书，抬眼看了看他，把书本扣在桌子上，平静地问道：

“怎么听说你在谈‘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这声音不大，却使张爱萍的心率顿时加快了，他心想：糟了！这句气头上的话，主席怎么会知道了？那还是在两天前，他在招待所门口碰上了曾经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那人皮笑肉不笑地问他：“过去是百战百胜，这回怎么掉进落马湖了？”张爱萍本来心情就不好，怎能容他如此讥笑，当即顶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如今毛泽东一见面便提起此话，他只好如实回答：

“那是说的一句气话。”

“气话！”毛泽东抽着烟，沉吟片刻，又说：“我看，你还没接受教训，没承认错误吧？”

“组织上给我处分都接受了，怎么还会不承认错误呢？”

毛泽东看张爱萍有些委屈，便说：

“坐下谈。”

待张爱萍坐定，他的口气温和多了，说：

“你呀，过去的仗都打得不错嘛，这次怎么在打胜仗的同时又打了败仗呢？你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找到吃败仗的原因。是的，是没有百战百胜的军事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句话也是不错的。但作为我们带兵的人，不能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你说不是吗？”

张爱萍点了点头。毛泽东开始问起部队的情况，又问张爱萍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张爱萍说：

“我想到红军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

“很好嘛！”毛泽东说：“要达到智勇兼备，重要的途径是学习。红大正准备开学，去学几个月吧！”

说罢，他提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递给张爱萍说：

“拿着它，我是你入学的介绍人。”

5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及军团方面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等，通知说：红2、红6军团6月可到甘孜。4方面军已接受我们的方针，将于6月底北上。对张国焘的关系，暂时取协商方式，已告诉张国焘，我们与他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以协和团结为目标。

毛泽东还分析了6、7、8三个月的形势，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布防情况，并说：

“西北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争取东北军，为6、7、8月之三个基本任务。”

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倡导的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正式创办，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

“红大”第1期学员共有1065人。其中的第一科由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这第一科的38名学员全是师团级以上干部，如：彭雪枫、刘亚楼、谭政、郭述申、周士第、杨立三、张爱萍、杨成武、王平、苏振华、赵尔陆、宋裕和、贾拓夫、彭加伦、符竹庭、张经武、武亭、洪水、莫文骅、张达志、谭冠三、童小鹏、萧文玖、许建国、邓飞、周建屏、罗宝连、张树才、贺晋年等。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刚满20岁，平均年龄27岁。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出席了“红大”第一期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典礼上致词祝贺，把“红大”称之为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他又说：

“你们现在是上山学道，学成之后下山济世。学道练道，重在个人修行。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是学生，我们大家又都是先生。”

毛泽东还说：

“形势发展很快，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大家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研究些问题，学习时间不超过半年，真正做到学有所成，炼出正果。”

6月1日，毛泽东为了向甘、宁广大回汉人民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提出了“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创立抗日联合战线”等20条救国救民的主张。《布告》号召全国人民、各党派、各团体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红军的主张，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奋斗。

瓦窑堡市的街头上到处都贴有“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全城一派抗日气氛。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杨至诚并告萧劲光、李富春、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说：

“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组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不另设机关）。”“决在吴起镇附近设小后方，选择适当地点成立小规模的兵工、被服、鞋袜各厂”，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叶季壮负责。

6月2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命令红1军团主力向环县急进，占该县后准备占领洪德城；以一部在庆阳、曲子之线；以1个团附1个骑兵连准备在2天内占领三岔。

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左权、聂荣臻、朱瑞等，指示对昨天在红1军团进占阜城的战斗中投降红军的国民党军第35师第105旅旅长冶成章要特别优待，治好其伤口后送到后方一谈，尔后送其回宁夏。电文中同时对优待俘虏中的回民、训练和释放俘虏等问题作出了部署。

6月3日，北上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塘县甲洼与红4方面军的红32军会合。

前边已经说过，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在2月15日至16日遭到了国民党军薛岳部6个师的猛烈进攻，天全、芦山、宝兴、灵关相继被占。至此，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失败。中共中央及时给他们提出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经过讨论，中央提出的第一方案获得通过。他们在北上到达甘孜、新龙等地时，已经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人了，不得不将部队整编为5个军28个团；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

在红2、红6军团4月28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向贺龙、任弼时等人致电祝贺。他在电文中说：“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2、6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徐向前也总结了以前的教训，他对其他领导人说：“我们几个方面军就像兄弟一样，是一家人，上次我们同老大没有搞好，吵了架，这次要注意。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我们要学他们的长处，取长补短。”

于是，红4方面军又像上次迎接中央红军一样，派出了红32军一部保证红2、红6军团的侧翼安全，并迎接红2、红6军团。

6月初的一天早上，贺子珍请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和她的女儿刘力贞吃饭。毛泽东一见到同桂荣就关切地问道：

“刘嫂子，病好些了吧？”

“好多了。”同桂荣说罢，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您的年龄比志丹和我都大，我不敢当这称呼，你再不要叫……”

毛泽东却微笑着说：

“革命同志如同弟兄，大家都叫你刘嫂子，我怎能不叫呢？”

说罢，他招呼同桂荣坐下，又打着手势说：

“没有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还没个落脚地哩！”

同桂荣说：

“如果主席不来的话，陕北革命也早被‘肃反’完了。”

说话间，贺子珍端来了饭菜，对同桂荣说：

“大姐，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一点吧。”

毛泽东亲切地给同桂荣母女夹菜，劝她们多吃一点。

6月上旬，红军大学已经开学几天了，有一天，毛泽东走进1科学员的教室，学员们站起来热烈鼓掌。他微笑着摆摆手，让大家坐下，说道：

“我帮你们请了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

他又说：

“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人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毛泽东给学员们讲的第一课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于这个题目太大，他只能边写教材边讲课。

有天晚上，红大几个学员散步经过毛泽东的窑洞门口，见他点着小马灯，正写着什么，便走了进去。毛泽东见学员们来了，就放下笔，询问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情况，学习情况，还征求了对他讲课的意见。学员们都说他讲得好。

“你呢？”毛泽东问张爱萍：“我倒想听听你的感受。”

张爱萍说：

“我觉得你有许多话是针对我讲的。”

“哟嗬，是吗？”

毛泽东笑了。张爱萍说：

“你批评指挥员鲁莽时，我头都不敢抬。”

“还这么严重呀！”毛泽东又笑了：“那也很可能是针对你讲的。不过，我有些话也不一定就指哪个人。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打仗很勇敢，心也不错。总怕放走一个敌人，怕敌人打烂群众的坛坛罐罐，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就顾不得其它了，就鲁莽蛮干了。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学员们齐声回答。毛泽东最后说：

“听说你们读书都很用功，联系实际的精神也很好。不过也要注意休息和娱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每天吃饭后可以出去跑跑嘛，不要老蹲在窑洞里。我已经给林彪、罗瑞卿同志讲了，要他们每天到窑洞里去赶你们出去。”

他说着伸开两臂，做了个“赶”的姿势。学员们都笑了起来。

6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说：

“横山、定边间500里工作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宁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81师与28军骑兵团全力担负，在一个半月内（7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庆阳、洪德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应以红1军团及陕甘宁红军主力于7月半完成初步赤化。

6月6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说：昨日来电中谈及的西方野战军的进一步作战行动部署甚妥，“但为蓄积部队精力，以利西面战斗计，两军团似宜各在原地多休息两天，9号左右开始西进。”

6月6日这一天，张国焘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他还说：

“我们双方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国际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团回国的有林育英等。在陕北方面，现有8个中央委员，7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7个中央委员，3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几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6月7日，毛泽东决定红28军参加西征作战。

6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电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通报了西方野战军在西征战役第一阶段中的战果，并说：“目前野战军已完成第一步作战任务，正胜利地向西猛烈进展中。”

6月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说：

“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

电文中还提出了对回民工作的政策及三大禁条、四项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民族团结。

6月8日，毛泽东就“两广事变”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

原来在不久前，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他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更希望西南的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待遇等。”

6月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对其来电中谈及的与鄂王及张学良司令代表谈判的内容及原则表示同意。同时要他注意建立与鄂托旗的通商关系，以便通过该旗与阿拉善旗建立友好关系。

6月1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指示由彭德怀根据联合抗日与回人自决两原则负责与宁夏各方势力联系。并说“安边、定边的外交争取要用大力，旦八等寨子亦然。庆阳方向则着重东北军。”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研究“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还说：

“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要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大会，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要使西南从不是武装民众抗日变为武装民众抗日。”

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起草并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全文如下：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大批增兵冀察以直接占领华北，组织全国性的走私，以破坏中国关税制度与国民经济，发动福建自治运动以侵略华南。无一不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预定计划，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前进。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但丝毫没有抵抗的表示，而且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镇压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救亡运动，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抗日，签订《中日防共协定》，引狼入室，排除异己企图创立个人独裁，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为所欲为。一切有良心的，有热血的爱国军人爱国同胞，际此日本强盗无耻汉奸横行华夏之时，无不义愤填胸，誓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

两广此次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并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出兵一致抗日，义声所播，全国人民无不振奋。我们谨代表全苏区抗日人民与抗日红军对两广爱国军人爱国同胞表示敬意与拥护，并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我们更号召全中国爱国军人自告奋勇，出兵响应，全中国爱国同胞再接再厉，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以配合两广的起义，务使此次抗日的军事发动扩大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改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中国人民红军更愿首先全部集中河北，担任抗日先锋军的任务，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然而自两广发难以来，蒋介石南京政府不但丝毫没有接受两广请求的任何诚意表示，而且一再迁移时日，公开诬蔑两广当局为鼓动内战破坏团结，而暗中却调集大军企图拦阻两广军队北上抗日，挑拨离间，发动内战以捣乱抗日战线。对于蒋介石的这种罪恶行为，全国人民决不宽恕！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应该要求蒋介石立即实现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时要求与赞助蒋介石军队中很多有良心有热血的爱国将校，立即脱离蒋介石的降日政策自动率领部队与两广及红军联合北上抗日！

事急矣！全中国的爱国军人爱国同胞大家立即紧密地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向着日本帝国主义一致进攻！中国人民现在比无论什么时候更迫切的要求着坚固的抗日的联合战线。蒋介石所要召集的一切降日卖国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或御用的国民大会我们都要坚决反对。我们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政治的，社会的，职业的团体与武装队伍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大会，并立刻实现下列的纲领：

1. 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二）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三）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四）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直接对日作战。（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六）保证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八）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民族，联合日本国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

这是全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抗日救国的纲领，也应该是两广出师抗日的纲领。我们竭诚希望两广的爱国领袖们能够到处大胆地发动与拥护抗日人民的爱国运动，大量地武装与组织抗日人民，联合全国人民，为这一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相信只有当抗日的武装与抗日的人民打成一片，只有抗日的武装变成抗日人民的武装时，两广所发动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拥护两广出师北上抗日！

全中国爱国军人联合两广一起打日本！

反对蒋介石拦阻两广义师北上抗日！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捣乱抗日！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反对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与国民大会！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私，没收一切私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中国人民抗日的联合战线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6月1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鉴于陕北各路敌军正向瓦窑堡地区推进，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说：东北军已分3路向瓦窑堡进攻，命令阎红彦、蔡树藩率红30军返回延川，准备侧击由清涧或由永坪向瓦窑堡进逼之敌。

毛泽东、周恩来同时电令红29军副军长谢嵩、政治委员甘渭汉率在韩城地区活动的红29军主力到延川、冯家坪之间待命。

6月14日这一天，西方野战军领导人提出西征作战第二阶段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

据此，西方野战军各部先后攻占定边、盐池、豫旺堡及豫旺城，歼灭国民党军和民团千人以上。

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李富春、萧劲光并转杨至诚，通报了东北军分3路向瓦窑堡进攻的情况，并说：

“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定搬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

6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说：

为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的马步青、马步芳和宁夏马鸿宾，红4方面军同红2、红6军团会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先生们：

当着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最后一瞬间，我们已顾不得你们还是对于我们怀着何等深刻的仇怨，还是集中全力向红军和苏区进攻，并在全国各地拘捕杀戮我们的同志，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以挽救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灭亡，我们在屡次提议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被你们拒绝之后，再一次地向你们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

一切对外投降、退让与不抵抗的政策，是招来亡国灭种大祸的根本原因。为要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只有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武装抗战。这已经是不可争辩的真理，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你们对于这个极明显的真理，当然比别人看得更明白。然而你们政府的负责人，如果不是甘心背叛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不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武装抗战？为什么要用一切力量去阻止与镇压其他军队和全国人民对日抗战？为什么尽撤华北内蒙一切的军队和党部，继续承认日本一切无理的要求，对日屈辱退让到底？

你们中有人说：“红军妨害你们抗日”。然而红军从“九一八”以来，已屡次宣言，向你们及全国各党派和军队提议：“愿意抛开一切仇怨，与你们联合一致抗日”，你们为什么屡次拒绝红军的这个提议？为什么继续集中全国的军队和资源去进攻红军，阻止红军抗日？

我们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及全国民众宣言：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

我们欢迎贵党领袖冯玉祥先生的抗日言论与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张；我们同意贵党西南执行部及许多领袖的抗日救国通电；我们拥护西南抗日救国军的动员令与改编；我们还欢迎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党员来参加与领导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

我们愿意以全力支持西南诸领袖抗日救国的英勇事业，只要西南诸领袖坚决执行抗日反汉奸的政策到底，并实现民主自由。我们愿意在一切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与西南诸领袖密切合作。今后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意以全力支持他们。

我们与红军不妨害任何人抗日救国的行动，我们坚决拥护全国抗日领袖与抗日民众诚意地团结起来实现中国的统一。

我们认为用“破坏统一”与“内战”的罪名去责备西南抗日的英勇行动，是无理由的。如果没有人执行帝国主义的意志用武力去阻止西南的抗日行动，内战就不会发生。而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全国对日抗战的一致中才能求得。我们反对强迫西南取消对日抗战来实现统一，但我们赞成南京及全国各地立即宣布对日作战去与西南统一。因此我们反对任何进攻西南的军事行动！

不立即动员全国对日作战，国家任何形式上的统一与纲纪，都是不能维持的。因为政府任全国沦亡而不急起挽救，且多方镇压人民的救国运动，这就是政府最大的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就是严重地破坏国家民族的纲纪。人民对这样的政府，是再没有义务来遵守他的法律命令，人民为着救国有权利来推翻这样的政府。

对日立即抗战与否？是目前解决中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现在已经到了决定问题的最后一分钟。日本帝国主义也已明白的告诉你们：“你们只有在投降与抗战中找一条路走。”如果有人决心要走投降的可耻的死路，那我们不去说他，让他去继续“剿共”与“讨伐西南”，在各种借口之下消灭他一切的政敌与抗日的力量，让他去继续对日“提携”“合作”，用“长期抵抗”“秘密准备”“等待机会”等言辞去欺隐民众。然而民众是要走抗战的生路的，民众也热烈地盼望你们之中任何人走上抗战的生路。这就要求你们立即接受西南抗日救国的请求与我们对于你们的提议，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与对西南的军事监视，立即将军队开入华北内蒙对日作战，肃清汉奸，废除一切屈辱的条约，并立即实现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另颁民主的宪法，召集全国各党各派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的国防政府，联合苏联与世界一切的反日力量。只有这些要求的完全实现，才能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取得全国民众的拥护与世界反日力量的帮助，创立最强有力的威权政府，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相信贵党有不少的军政领袖与党员，同样是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女，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能够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英勇奋战。我们盼望这一切的民族英雄与忠诚的爱国志士，立即同我们诚意的携手，抛开以往一切的仇怨，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同奋斗！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我们伸着手向着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们！

我们盼望你们对于我们这个诚恳的提议给以善意的考虑！我们等候你们对于我们这个提议的任何答复！最后，向你们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6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规定对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是：

“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对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

指示要求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要采取争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工作，是使下层广大官兵团结在抗日政治目标下，给上层以推动。

6月21日，东北军高双成部乘虚向瓦窑堡市袭来。

这一天中午，瓦窑堡西北的安定县川里突然传来了枪声，贺清华一时摸不清情况，急忙跑进窑洞，向正在休息的毛泽东报告说：

“毛主席，可能有敌情，安定县川里在打枪。”

毛泽东说：

“请参谋长来。”

贺清华跑到隔壁去找张云逸，没有找到，留守人员说：

“张参谋长一听到枪声，就亲自带领通讯连、保卫队、红军大学的学员以及保卫局凡是能参加战斗的同志，赶往西门外同敌人作战去了。”

不一会儿，张云逸回来了，报告毛泽东：

“敌人是石湾的一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我们在瓦窑堡的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以及红大的学员，人少，枪少，子弹也不多，每人只有两三粒土造的子弹和手榴弹。主席，敌我力量悬殊，最好现在就转移。”

正在此时，周恩来也赶来了。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镇静地说：

“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

此时，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听起来已经很近了。几个警卫员早已把毛泽东的文件、用具收拾好，还牵来了小黄马，单等毛泽东出发。贺清华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张云逸一点不着急的样子，就走进窑洞说：

“主席，该走了吧！”

毛泽东慢慢侧过身子，不慌不忙地说：

“没有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我们从南门出去嘛。”

贺清华只好回到院子里，心里直发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摸摸小黄马，看看毛泽东的行装，又爬上毛泽东住的窑洞顶上，向枪声最激烈的米粮山望去，只见那里不断冒起股股尘烟，看样子敌人快要冲进城里来了。他急忙下了窑顶，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请他快动身。毛泽东平静地问：

“机关都走了没有？”

“早走了！”

周恩来、张云逸也说：

“主席，动身吧！”

毛泽东又扫视了一遍窑洞，看看没有落下什么东西，说：

“好，咱们现在走吧。”

大家离开下河滩，穿过二道街，子弹“啾啾”尖叫着从头顶上空掠过。贺清华和其他警卫员们环卫着毛泽东，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当他们走到南门时，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来犯之敌已经进了西门。

毛泽东刚走出南门，发现有一个战士从半山腰上顺着城墙根背下来一名伤员，立刻迎上前去。贺清华认出那位伤员是保卫队的李科长，只见他伤势非常严重，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已经昏迷过去了。毛泽东不顾头顶上空飞掠的子弹，在伤员身旁停下来，招手让担架队把他的担架抬过来，把李科长放在担架上，查看他的伤口。李科长身上不断地滴着鲜血，把铺在担架上毛泽东的被褥都染红了。李科长慢慢睁开眼睛，一见是毛泽东站在他面前，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还留在后边，因为说不出话，急得他吃力地摆着手，意思是请毛泽东赶快离开火线。毛泽东安慰了李科长几句，转身交代说，路上小心一点，好好照顾伤员。他看着担架在前边走了，这才移动了脚步。当他转移到保安阎家砭时，秘书告诉他说：

“保卫队李科长牺牲了。”

毛泽东一听非常难过，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沉痛地说：

“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通知他本单位开个追悼会。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干部。对于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应该好好地纪念他们。”

6月24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抵达甘孜。

萧克曾回忆说：“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2、6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1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错误，他们4方面军南下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6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红2、红6军团与红4方面军会师后，红4方面军举行了欢迎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说：

“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率领的1方面军会合。”

6月2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红4方面军“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并说：“两广事变”爆发，时局发展，“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匪浅”。

6月27日，红4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决定分为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

6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请令盐池、定边部队运送5000斤食盐到吴起镇。

6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通报了全国抗日反蒋形势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情况。电文中还说：

“全国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估计革命已走向了新阶段，是完全正确的。南京方面答复我们的信中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我们出兵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6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

“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由1或15军团担负。”

1936年7月1日，毛泽东在去保安途中，以他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68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及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中说：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1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你们尚保存伟大的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7月1日这一天，贺龙、任弼时等会见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和朱德等人。

任弼时与张国焘进行了个别谈话。张国焘要任弼时散发污蔑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材料，任弼时毫不含糊地拒绝了。张国焘企图以多数压少数，采取欺骗拉拢、挑拨离间、封官许愿，控制红2、红6军团。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要一致。任弼时说：

“惟有在党中央12月会议决定的基础上，才能一致。”

张国焘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用红军总政委的名义迫使红2、红6军团同他同流合污。任弼时质问他说：

“谁作报告？发生争论谁作结论？不能以多数压迫少数。”

任弼时又告诉张国焘说：

“我们2、6军团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有最高信仰。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那么，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贺龙也烧毁了张国焘派人送到红2军团中的反党小册子《国焘讲座》，制止了张国焘派到红2军团“工作团”的反党活动。贺龙对红2军团的干部们说：

“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真中央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红1方面军会合。我们大家都要听毛主席的，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谁要不听毛主席的，反对毛主席，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朱德和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人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

7月2日，徐向前率领由红9军、红4军第12师、红31军第93师、独立师及方面军总部组成的中路纵队，从炉霍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7月3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等率领红4军第10师、11师，红30军第88师和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的红2、红6军团组成左路纵队，从甘孜出发，经东谷、两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

由董振堂军长率领红5军、红31军第91师组成右路纵队，为后卫。

7月5日，毛泽东等人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电令：由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2方面军。

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按照军委电令组成了红2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

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兼），政委关向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红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张子意。

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

7月5日至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要刘鼎大胆做促进东北军抗日的工作，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

7月6日，任弼时等致电中央和军委，报告了红2、红6军团长征的情况：费时7个多月，行程1万余里，伤亡约5300余人；出发时17000余人，现有14000余人，红2军团9000余人，红6军团5300余人，武器比从湖南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

7月10日，由董振堂率领的右路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欲知红军3大主力能否会合在一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红军3大主力会师前，毛泽东一方面指挥西方野战军开辟陕甘宁新苏区，一方面联络、催促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北上与红1方面军会师，同时，他还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东北军、西北军和利用“两广事变”迫蒋抗日的统战工作上。这三项工作有文有武，文武并重，把民主革命的眼前利益和民族革命的长远利益有条不紊地结合在了一起，充分显示出了一位革命家、战略家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胆识，真真令人佩服之至。

**第8章**

**“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的**

**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

**争的局面。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

**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的壮大。”**

话说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不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会议显示了国民党内求团结、外御侵略的意向。

7月11日，毛泽东率领机关工作人员经过桑树、凉水湾、安塞等地，终于到达了保安。

在瓦窑堡担任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科长和监督、印刷苏维埃纸币的贺子珍，已经先期到达这里。

保安又称赤安县，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安塞、甘泉县，西靠吴起，南界富县和甘肃省合水、华池县，北接靖边县。原赤安县志曾记载：“赤安，延安之瘠地也。”

保安县城在小石山、太平山、瓦窑山的环抱之中，人称“斗城”，小而雅，城垣、垛口完好无缺。城外东北角，有座支离破碎的旧城，南面钟楼山上，也有座故城。三城连珠，沿诸山而立。这一带因北靠长城，在古代是边陲要塞。

保安全城人口不足400，房屋不过百间，而大大小小的庙宇却有十几座，什么龙王庙、娘娘庙、财神庙、土地庙、山神庙等等。人们传说，保安城是“庙比房多，神比人多”，可见其经济文化之落后。因此，在保安想找一孔好的窑洞居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毛泽东与贺子珍被安排在保安县城内小石山烽火台下炮楼山中类似溶洞又似人工开凿的石洞里。这种石洞俗称石窑，一排5孔。毛泽东夫妇住了一孔，其它几孔里住着警卫班、担架班、特务班等人员。

毛泽东住的这孔石窑与其它几孔石窑一样，既无门框，也无门板，所不同的只是大石窑里还套了个小石窑。大石窑里有一张没有油漆的木桌子，3个粗制的木凳，一个火盆，一盏马灯。小石窑里有一个盘石炕，高个子坐上去，一不小心就会碰头。石窑里边黑洞洞的，下雨时，洞顶还时不时地往下渗水，朝夕都能听到积水盆里发出的“铜壶滴漏”声。因此，石洞内就格外潮湿。后来，毛泽东就是在这个石洞里，接待过苏联专家阿尔洛夫、德国的李德、美国记者斯诺，及国际援华医生美国的海德姆、印度的柯棣华和奥地利的罗生特。

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不远的北山坡上。

红军大学迁到了保安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里。这些山洞不知荒废了多少年代，积了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一进去，一群群的蝙蝠扑面而飞。学员们全成了清洁工，他们动手清理了卫生以后，又动手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人说：“嗬！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

毛泽东来了，表扬他们是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建立“最高学府”。毛泽东又说：

“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

毛泽东总算在保安安下家了，可在立灶做饭的时候连个灶台都没有，工作人员只好在地上用3块石头架着锅做饭。没有专职炊事员，就由4个警卫员凑合着做。毛泽东的伙食标准跟大家一样，只是除了3顿饭外，每天晚上给他准备一两个烤山药蛋或者老玉米当夜餐。此时最困难的是吃菜，警卫员经常要跑很远的路，才能买回一点儿干豆角和山药蛋。警卫员们听说几十里以外的永宁山一带可以买到鸡，大伙一商量，就瞒着毛泽东派贺清华跑一趟。贺清华把鸡买回来了，还捎了一些毛泽东最爱吃的辣椒。大伙高兴极了，杀鸡的杀鸡，生火的生火。班长挽起袖子，做了一道大家闻所未闻的南方名菜“白斩鸡”。开饭了，贺清华端着这道名菜和几个烧好的辣椒，高高兴兴地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还在办公，抬头看了看，说：

“呵，哪儿来的鸡呀？”

“跟老乡买的。”

于是，贺清华便说起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一直听着，没有做声，等他讲完了，才摇摇头说：

“你们这件事没做好啊。”

贺清华莫名其妙地望着毛泽东，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大家的生活都很苦嘛，我应该和大家一样，不能搞特殊。”

“不，主席……”

毛泽东知道贺清华要解释什么，不等他说下去，就转了个话题说：

“我这个湖南人爱吃辣的，有点辣椒，我就可以多吃点饭了。”

说着就拿起一个辣椒，咬了一口，看着贺清华笑了。

7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我昨天到保安，周恩来尚在安塞，28军恐7月底或8月初才好南下，目前仍在原地执行任务，待命。”

7月13日清晨，毛泽东在石窑里工作了一夜，他搁下笔走出窑洞，迎着晨曦伸伸双臂，呼吸着新鲜空气。军委机要科科长叶子龙疾步走来，将一份电报递给他，说：

“主席，这是东线指挥部周恩来同志刚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浏览了一下电文，笑着说：

“好啊！那两个美国人已经到了安塞县恩来同志的指挥部了。”

毛泽东在院子里走了几步，略一思索，对叶子龙说：

“子龙，你去通知一下接待的同志，这是第一次到我们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和医生，一定要安排好他们的吃住和采访活动。”

毛泽东所说的那两个美国人，一个是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医生乔治·海德姆。

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的祖父曾是美国驻中国广州的第一位领事。斯诺年轻时曾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后来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始从事新闻工作。自1929年始，斯诺曾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以及两广、云南、台湾等地，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九·一八”事变后，斯诺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往采访。返沪后，又经历了上海“一·二八”抗战。他根据所见所闻，于1932年底完成了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颂扬东北和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他还根据第二手资料，在此书中对江西苏区也进行了报道。斯诺在上海期间，同宋庆龄建立了友谊，经宋庆龄介绍，又结识了鲁迅。1933年秋，斯诺执教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他同青年学生中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来往密切。斯诺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渴望知道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想，在这些年国共的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实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于是，斯诺萌发了访问苏区的愿望。斯诺请求宋庆龄为他牵线搭桥，以便进入苏区后起码受到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至于被当作间谍杀头；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在上海的美国进步医生乔治·海德姆也要求到苏区考察。宋庆龄对他们的要求热情支持，为他们安排了联络地点和接头人，宋庆龄还用药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秘密的介绍信。这样，斯诺就与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斯诺带着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从北平启程，在郑州与从上海来的海德姆会合，一起前往西安，开始了他的首次西北苏区之旅。张学良为他们进入苏区提供了方便，斯诺和海德姆乘坐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延安，然后步行前往红军前沿司令部的所在地安塞。7月12日，斯诺和海德姆到达安塞前线，接待他们的是一个长着一脸浓密的大胡子、温文尔雅的军人，这位军人用英语和斯诺谈话，使斯诺大为吃惊。在交谈中，斯诺才知道，他面前的这位军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对斯诺说：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能够讲真话。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欢迎到苏区来访问的任何一位记者。阻止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苏区的情况。”

“我要见毛泽东先生。”

斯诺提出了要求。他和后来到延安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一样，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见一见那个有着时价25万大洋、不论死活都要缉拿到的毛泽东，要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周恩来告诉斯诺说：

“我可以安排你们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在保安，我现在就将你们的要求电告毛泽东主席，马上派人护送你们去保安。”

斯诺闻言，喜出望外。周恩来给斯诺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说：

“这是我的意见，你是否愿意照办，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想你将发现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旅行。”

斯诺接受了周恩来为他拟定的采访计划。第二天一大早，他和海德姆便随着一个由近40人组成的护送物资的交通队出发了。

7月13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红2、红4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这样，打马步芳、毛炳文、王均十分有利，可使红军“战略上大占优势”。

毛泽东还在电报中向他们通报了“两广事变”的情况。

7月14日，毛泽东电示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说：

“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更多的忍耐性。要扩大和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

电令中还说：对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7月15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一起，抵达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首都、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城。

斯诺是第一个来到陕北采访的外国记者，海德姆是第一个来苏区考察的美国医生，毛泽东非常重视。斯诺和海德姆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几乎所有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出面迎接，毛泽东也出席了欢迎斯诺和海德姆的仪式。欢迎群众打出的横幅标语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欢迎美国医生来苏区考察”。

斯诺被安排在距毛泽东住处很近的一间朝阳通风的房间里。

7月15日晚上，毛泽东正式会见来自大洋彼岸的斯诺和海德姆。当斯诺和海德姆来到毛泽东住的院子门口时，毛泽东身穿一套和普通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佩戴着两个红布做的领章，微笑着在院子里迎候客人。他和斯诺、海德姆紧紧握手，连声说：

“欢迎，欢迎我们的贵客！”

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坚毅的表情，睿智的目光，和蔼可亲的态度，瞬间征服了两位客人。斯诺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他是这样描绘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点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目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瞬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而国民党宣传的那个鲁莽、无知、凶暴的匪首形象，和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

毛泽东将客人让进窑洞里，坐在没有靠背的木凳子上，警卫员端上开水。斯诺打量着这间简陋空旷的石窑，四壁毫无装饰，只挂着一些地图，木板床上铺着简朴的被褥，挂着一顶蚊帐。毛泽东请客人喝茶，他笑着说：

“蒋介石对我们造谣污蔑，封锁得很厉害，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真不容易啊！”

担任翻译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斯诺二人，两位客人都很激动。斯诺说：

“我们一进入红区，就发现这是一个崭新的天地，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红区的新气象，已经证明了蒋介石的宣传是骗人的，是荒谬的。”

毛泽东点燃了烟，吸了一口，对斯诺说：

“周恩来同志在电报中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到我们根据地采访，我们都欢迎。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所看到的，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们的采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们方便和帮助。”

斯诺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非常兴奋。他没有想到共产党能给他采访自由，于是站起身高兴地说：

“我会公正如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你们的情况。”

“好的，希望你能如实报道。”毛泽东也很高兴，随即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对斯诺说：“不过，你的报道蒋委员长看到了，要大发脾气的。”

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感染了屋里所有的人，他们也跟着笑起来。毛泽东又对海德姆说：

“请您——海德姆博士，特别到我们每一个医院去看看，希望你能对苏区医疗条件的改善、医生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另外，我们计划创办一所医科大学，也请你结合考察，提出一个筹建方案。”

海德姆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又突然问斯诺：

“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

斯诺坦诚地说：

“我开始是盲目地到中国来撞大运的，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你这次到我们红区里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

斯诺听毛泽东如此说，很高兴，他说：

“当我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蹂躏，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劳苦大众的悲惨，使我受到了很大震动，产生了深刻的同情心。后来，我为了寻找中国的希望之火，结识了鲁迅先生，他帮助我找到了一把了解中国的钥匙。我花了5年时间，翻译一本《活的中国》。这本书收录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这本书马上就要在美国出版了。”

毛泽东赞扬说：

“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到了子夜，警卫员为他们送来了简单的夜餐。斯诺看到有西红柿炒辣椒，惊奇地问：

“保安还有西红柿？”

警卫员解释说：

“这是周副主席从东线指挥部给毛主席捎回来的，今晚为了招待您，主席特意让炒了一点。”

毛泽东告诉斯诺说：

“这是延安天主教堂的神甫送给东北军的，东北军又送给周恩来同志几个，他舍不得吃，又给我送了回来。”

他一边说一边为斯诺、海德姆夹了几块西红柿，亲切让客，他说：

“西红柿在这里是非常新鲜的蔬菜，是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你们要多吃一点。”

斯诺表示感谢，说是在北平倒是容易买到。毛泽东说：

“西红柿从欧洲传入中国才几十年时间，民间还没有大量栽种。传入你们美国可能要比中国还要晚一些吧？”

斯诺说：

“传入美国的时间，我想不比中国晚多少，因为西红柿的老家在南美洲秘鲁的森林里，它是16世纪被一个英国公爵从南美洲带到欧洲的。”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

“听说西红柿原来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叫‘狼桃’。由于它的枝叶分泌出来的汁液，气味难闻，一直被人们视为有毒之果。直到18世纪末，法国的一个画家在为西红柿写生时，被它艳丽的色泽和鲜美的浆果所吸引，产生了品尝的念头。他在品尝之前，穿好了入殓的衣服，就吃了一个。他觉得很好，并无难受之感。然而这可口的滋味，使他更加恐惧，就干脆躺在床上，等待死神的召唤。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并没有死。于是，西红柿食用之谜揭开了，立即风靡世界，成为人们争相食用的最佳蔬菜，这个名气不大的画家，也就因此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斯诺听了毛泽东这番话，立刻明白了他的巧妙的寓意，更加佩服毛泽东的才智。他说：

“我准备到红区来的时候，也是下了和那位品尝西红柿的法国画家一样的决心！”

毛泽东诙谐地说：

“你也是下定了死的决心来我们红区，准备‘品尝’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喽。”

斯诺说：

“我准备来红区的时候，白区流传着许多谣言，说红区一片焦土，草木不生。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说你是青面獠牙的吃人魔王。红区内流行着天花、伤寒、霍乱、斑疹、鼠疫等等疾病。我来的时候，身上注射了许多种预防针。”

毛泽东哈哈大笑，风趣地说：

“蒋介石老兄把我们说得比‘狼桃’还可怕呀！”

斯诺也笑了，他说：

“我那时确实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红区的。因为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准确而真实地讲清红区的情况。红区是一块‘未知之地’，是一个最大的谜。为了探明这一切，值得我冒一次生命危险。”

毛泽东肯定地说：

“你这个险冒得好！你将会和那个法国画家一样，成为世界上传奇式的人物。”

斯诺也兴奋地说：

“红区的一切都是新闻，都是世界上的头号新闻。这些新闻报道出去以后，一定会和西红柿一样，风靡世界。”

毛泽东似乎是在做总结，他说：

“你来中国不是为了‘撞大运’么？我看你已经撞上大运了。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向世界如实报道出去，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毛泽东是一个不愿受束缚的人，为了在炎热的夏天长时间聊天更舒服一些，他当着斯诺、海德姆的面就脱去了长裤。他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说：

“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注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所有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我们要接受一切合法的外资来完成我们建设的计划，我们否认一切足以影响中国独立主权的外国投资，坚决反对一切政治借款。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谈话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次谈话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在谈话临近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阴阳颠倒，夜晚工作，上午睡觉，只好邀请我们的客人晚上听我介绍喽。白天你们可以进行其它参观访问。”

斯诺问：

“主席先生，听说你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天明才休息。难道你的身体是铁打的，就不知道疲倦么？”

毛泽东说：

“这是少年时代经常参加田间劳动，学生时代坚持长跑、爬山、游泳等活动锻炼出来的，不过不是铁打的。”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用英语说：

“祝你们晚安！”

7月16日晚，毛泽东与斯诺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斯诺曾经这样记述：“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在这天晚上的访谈中，毛泽东回答了斯诺提出的许多问题。斯诺问：

“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毛泽东回答说：

“要有3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阵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3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斯诺问：

“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毛泽东说：

“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的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7月17日，西方野战军在曲子成立了陕甘独立师，下属3个团，其中两个团是由曲子、华池、庆阳、合水4支游击队组建的；由姚喆任师长，黎林任政委，尹国赤任参谋长。

同时，还成立了以马青年为师长的回民独立师。

7月17日这一天，何柱国以骑6师向西方野战军作试探性进攻。红1军团一举将其击溃。

7月18日晚，毛泽东与斯诺、海德姆谈中国内政问题。

7月19日晚，毛泽东与斯诺、海德姆继续谈中国内政问题。

毛泽东一连在两个晚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说明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介绍了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

7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说：

红78、红81师调预旺，红28军调定边、盐池。“现安边、靖边之线防御力量甚少，感吴起镇、保安之线颇受威胁。”请周恩来令红30军迅速开往新城堡；“萧劲光、赖传珠将吴起镇以北部署情况电告。”

7月22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以他们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

“目前汤恩伯、杨虎城、高桂滋、高双成、张学良、何柱国、于学忠、马鸿逵各部共150余团，在蒋介石命令压迫下，向陕甘宁进攻，毛炳文全部、马步芳一部已被我吸引到甘北附近，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2、4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1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3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2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说：

“西方野战军集中之后，宜作10天训练计划，准备对何柱国部作战。10天后如果还没有良好作战机会，则再训练10天。目前休息、训练是主要要求。”

此时，何柱国鉴于西方野战军已有充分准备，加之张学良已经从南京回到西安，遂停止了进攻。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另一封电报中提出了“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并用的原则”，他在电文中写道：

“分散以到班为止，集中以到独立师为止，中间有排、连、团的各种形式，依照敌情及苏区巩固的程度而适宜配置之。在敌情严重及苏区尚未巩固之时，应偏重于分散配置。”

他在电报中还谈到了过去中央苏区及今春陕北苏区地方武装配置过于集中的教训，并对陕甘宁苏区地方武装的配置作了部署。

7月23日晚，毛泽东同斯诺、海德姆谈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主张，谈话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现阶段的外交政策和抗日主张、以及统一战线政策，并驳斥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的说法。他说：

“共产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卫的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那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未有任何政治力量。虽然它的本质与第二国际大不相同，组织上却没有多大的分别。正如有人说，某国的内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因此，第二国际就是独裁者，这是极端可笑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或共产国际的统治。为的仅只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方案，方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的扩大了。”“还有最后一点显然是最重要的，即这全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毛泽东还说：

“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以上那些国家的。至于我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的国家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国中间，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意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我们都把他们当作朋友，请他们合作。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的国家意大利、德国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

当斯诺问及如何看待不平等条约问题时，毛泽东说：

“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对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它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

毛泽东在谈到外援问题时说：

“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它各国接受了许多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且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对于中华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他还强调说：

“要抗日成功，中国需要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单独进行下去！”“抗日战争要延长多长时间，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

毛泽东预言，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他说：

“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的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的壮大。”“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高涨，大批的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毛泽东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10年，战争结束时，中国的革命队伍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战斗更有经验，更得民心，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他毫不讳言地说：

“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抗日战争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

欲知毛泽东和斯诺、海德姆的谈话还有什么惊人之语，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斯诺的时间，距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尚有一年时间，可他对中国未来的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的预料，后来的历史是全部地印证了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如何预知祸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如何神机妙算，明朝的刘伯温怎么前知500年、后知500年，殊不知这些全部是小说家的无稽之谈。**请诸君翻一翻正史，包括世界史在内，能够预知未来、料事如神，可有出毛泽东其右者？毛泽东说：“要抗日成功，中国需要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这是多么的坦诚！在说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单独进行下去！”这是多么的豪迈！毛泽东还毫不讳言地说：“**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抗日战争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这又是何等的光明磊落！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他才是值得称道的伟大的人民领袖！

**第9章**

**“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

**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

**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话说斯诺经过几次采访，毛泽东的个性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尔只有林彪插嘴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点相一致，虽然他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斯诺在保安还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广泛交谈。他还参观了红军大学，采访了红军战士，观看了红军剧社演出的文艺节目，又到农村与农民交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为了全面、准确地报道苏区的情况，他决定和海德姆一起到前线去，在红军中进行广泛采访活动。毛泽东为了便利斯诺二人的采访活动，派人给他俩各送去一套红军服装。斯诺在临行前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斯诺说没有了，他对毛泽东给他们准备红军服装表示感谢。他说：

“我们穿上这套红军服装，工作就非常方便了。”

毛泽东说：

“穿上这套服装，老百姓就会把你们当成亲人一样，不会把你们当成‘洋鬼子’看待了。”

斯诺拿出照相机，对毛泽东说：

“我想给你拍两张照片，可以吗？”

毛泽东说：

“行啊！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斯诺请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照了一张全身像。斯诺拧过胶卷后，要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像，毛泽东说；

“好！你就照吧！”

斯诺说：

“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

警卫员李长久连忙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帽子太小，毛泽东戴不上。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说：

“戴我这顶照吧！”

毛泽东把斯诺的帽子戴上试了试，虽然小了一点，还算能戴上。于是，斯诺就以石窑为背景，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照片——《毛主席在保安》。

后来从7月底到9月中旬，斯诺、海德姆由黄华陪同，在甘肃、宁夏红军前线部队采访、考察，他们多次同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蔡树藩等红军高级指挥员进行交谈。斯诺获得了许多资料，拍下了许多照片。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蔡树藩是这样写的：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的红军将领。”

斯诺还记载了采访徐海东的情形。他问徐海东：

“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

徐海东答道：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4方面军。”

斯诺看着徐海东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他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3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毙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

“66个人？”

斯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徐海东继续说：

“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3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5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到了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了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百里、南北3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斯诺在前线1个多月的采访期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一再问起斯诺的行止。

且说1936年7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问题。他在发言中肯定了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强调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过去确定的3条，即：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还说：

“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重点在敌军较多的庆阳方面。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

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并转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李富春等人说：

你们两个月来英勇地战斗，已完成了在西方创建根据地、在东方坚持游击战争、在南方发展统一战线这三大任务的第一阶段要求。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

7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2、红4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询问红2、红4方面军两部的行动情况。电报中说：

“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及林育英、李维汉、杨尚昆、冯文彬、伍修权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了加强白区的组织建设、党的领导、情报工作、外交工作等。

会议决定：整个统一战线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毛泽东负责，白区工作由博古负责，西北白区工作由李维汉负责。

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在预旺地区集结休整，准备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西征战役胜利结束。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歼灭、俘获国民党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各200多公里的新苏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材；为迎接红2、红4方面军北上，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8月1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签署通令，决定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红军大学和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由周恩来指挥红29、红30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保安城卫戍司令。

毛泽东还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对红4方面军第3次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表示祝贺。还通报了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副总司令王均部的布防情况，又说：

“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4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后，宜迅速北进。2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除包座到哈达铺之外，最好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8月3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

“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赞同来电中提出的进军洮河、岷州、西固，出击天水、兰州的行动计划。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8月5日，红2、红4方面军分3路纵队，分别从包座等地出发，挺进甘南。

第1纵队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组成，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由包座、旺藏寺北上。

第2纵队由红4、红31军组成，在王树声领导下北上。

第3纵队由红2方面军组成，策应第1、第2纵队。

8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与杨尚昆为总政治部出版《长征记》征稿，致电各部队说：

“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

8月初，国共双方南京谈判告一段落。周小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此前，潘汉年自莫斯科回沪，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进行了谈判。此时也转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谈判情况。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保安召开会议，研究周小舟、潘汉年带回的信息：国民党方面希望共产党方面派出正式代表就国共合作问题谈判。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

周恩来说，同南京方面谈判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二、明确表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

“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我们还可以与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国民党各派，同时分别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目前阶段，我们要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我们则一面坚持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8月9日，毛泽东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致信张学良，建议东北军根据红2、4方面军北上，“两广事变”的发展及日军对绥蒙进攻等情况，同红军合作开创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援绥，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并建议张学良不要去南京，防备蒋介石的暗害阴谋。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蒋介石对抗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我们3月提出谈判5条原则后，他们在5月答复时提出4项办法：1、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3、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4、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4条，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4条是：1、尊奉三民主义；2、服从委员长指挥；3、取消红军改编国军；4、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4条同5月的4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

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蒋介石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地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中间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地抗日。

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的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合适。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8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17名红1方面军和陕甘宁地方红军指挥员说：

“我3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你们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2、4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3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8月12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通报了8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与政治策略：

“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该电还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电文中说：

根据红军3大主力会合、东北军和我们联盟等情况，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中共中央夺取宁夏的计划是：

1、在9月底以前，红1、红4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待部队整理后，分别由有力一部攻击陇西与河州，相机消灭毛炳文部，调动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2、10月和11月，实行3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3、从12月起，3个方面军中以1个方面军担任保卫陕甘宁苏区、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的进攻的任务；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4、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伪蒙军的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战运动，使之进到更高阶段。

8月13日，毛泽东为了促使杨虎城坚定联共抗日立场，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到西安去见杨虎城。

这一天，张文彬随同做东北军改造工作的叶剑英和到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及做17路军工作的汪锋等人一起，向西安进发。

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写道：

虎城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公祺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杜斌丞的信中写道：

“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

后来，张文彬作为共产党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给受命进攻苏区的西北军84师师长高桂滋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培五（高桂滋字培五——笔者注）师长阁下：

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1927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4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

1. 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2、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3、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4、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5、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6、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7、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8、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儒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专此。

顺颂勋祺

　　 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再说在8月1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20名红1方面军和陕甘宁地方红军指挥员说：

“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才，至少可做联络交通。”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红1方面军8月至9月中旬，仍以训练休养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9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大根据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及第57军军长董英斌部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2、4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9、10月间北上时，红1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红2、红4方面军在固原、海原地区会合。

接着，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如果红4方面军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步芳、打毛炳文、打王均都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

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他在信中写道：

“张金吾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29军继续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6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8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分别致信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3人。他在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信中写道：

明轩（宋哲元字明轩——笔者注）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29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份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3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专此。即请勋祺

弟 毛泽东 拜启

毛泽东在由党的代表南汉宸送给在“绥远抗战”的傅作义的信中写道：

作义主席先生勋鉴：

涿州之战，久闻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分别为伪蒙古军军长和副司令——笔者注）向绥迫近，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拜启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到阎锡山部当见习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中原大战后，任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代主席、主席。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傅作义请缨抗战，率第35军由绥远开往察哈尔、热河。5月23日，在怀柔一战重创日军。1935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8月14日，毛泽东致信易礼容，其中问到了老朋友李达，他写道：

“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笔者注），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

8月18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发布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中说：根据最近中央对土地政策的新规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保护。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8月19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说：应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哥老会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8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征询拟以红1方面军独立攻宁夏，红4方面军独立攻青海，红2方面军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箝制敌人等作战部署的意见。

8月22日，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说：

4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1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岷吸引胡宗南部。

彭德怀在前方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说：这完全是鬼话，张国焘的目的是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1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

彭德怀还说：张国焘的打算事实上很少可能实现，因为渡河必须要有器材，过河既无桥梁，又无渡河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森严。

8月25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关于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2、红4方面军任务的训令。命令：2、4方面军9至11月在甘南活动，消灭国民党军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9至11月间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争取回民大量加入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预旺苏区，策应红2、红4方面军的作战。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6年5月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领——笔者注）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4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5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29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10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么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的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地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么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么，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份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8月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程子华等，指示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抓紧对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5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7师师长马鸿逵、第35师师长马鸿宾的争取工作。

8月30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林育英、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说：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准备冬季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与陕北、甘北相呼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地区。

8月31日，西方野战军为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开始向西运动：红1军团进占宁夏海原以东七营一线，包围了七营镇的东北军骑兵师1个团；红15军团占领同心城南的王家团庄、高崖一线，马鸿逵部仓皇而逃。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还为中共中央拟定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全文如下：

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这个协定草案作为国共两党谈判的依据，派潘汉年等人送交国民党有关人士。

中央确定上述方针后，打电报给红军派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通知刘鼎由西安返回陕北。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刘鼎，让刘鼎把党中央新的策略方针转告张学良，请张学良今后大力劝蒋抗日。

刘鼎向毛泽东转述了张学良提出的一个设想，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

毛泽东说：

“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

刘鼎回到西安后，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张学良听了，觉得中国共产党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深受感动，决心以劝蒋为己任，积极进行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工作。

这正是：说六国，竭精殚虑，连横抗秦；

讲原则，停战逼蒋，团结救国。

欲知后来张学良如何劝蒋抗日，待后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8月13日写给杨虎城及高桂滋的信，到8月14日写给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的信，再到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一路走来做了大量的文案工作。那一篇篇文章犹如璀璨的明珠，光芒四射。其中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更是一篇政论性的力作。他一改先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抨击，而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逐条地批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其宣言中的诸多错误提法，引导和推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及“全体党员”走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确道路。通篇文章论点有理，批评有据，真诚寓于批评之中，期望溢于字里行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懂得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特别是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要么不讲统一战线，要么无原则地求团结，这些人真应该好好学一学毛泽东！

**第10章**

**“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

**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国民**

**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话说1936年9月3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国民党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请潘汉年回保安，以讨论统一战线及西南问题。

接着，毛泽东给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17师师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交给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和中共中央交通员孙作宾，要孙作宾“面陈孙军长”。

原来在1936年4月间，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运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后，省委机关和工作人员随时有被破坏和被逮捕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孙作宾和严克伦即赴陕北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孙作宾在6月底临行前，杜斌丞先生特地转告他说，杨虎城和孙蔚如都要求你们给共产党中央传话，说他们的部队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孙作宾立即找孙蔚如面谈。孙蔚如说：“现在日寇侵华日急，蒋介石不谋攘外，反而假‘安内’之名进行内战。去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今年又发表‘五五通电’（即毛泽东、朱德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笔者注），我都反复看过了，愿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孙作宾对孙蔚如的谈话由衷赞许，并请他给毛泽东写封信。孙蔚如婉言解释说：“我过去在陕南驻军时，曾给红4方面军张国焘写过互不侵犯的信，张不守信用，公诸报端，蒋介石看到了，几乎把我整死。这次还是口头捎话好。”孙作宾到陕北后，先在安塞真武洞见了叶剑英，在保安见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向他们汇报了陕西省委连遭破坏和几次组建临时省委坚持斗争的情况。然后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安排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在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一孔石窑里接见了孙作宾，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你们在地下工作辛苦了！”孙作宾向他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和孙蔚如的政治态度。当汇报到孙蔚如不愿写信的原因时，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很讲信用的，张国焘那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他答应一定给孙蔚如先生复一封信。到了9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就给孙蔚如写了一封要孙作宾面交的信，他写道：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

9月间，毛泽东为了加强高级干部的学习，在和周恩来、博古致红军西方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刘晓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说：

“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10本，先交富春，停3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10天寄一次。”

9月7日，毛泽东致电红28军军长宋时轮并转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说：哥老会首领回族人马怀蔺在宁夏有群众基础，我们应优待和帮助他，委任他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1路游击司令。马怀蔺由保安赴定边，应派兵沿途接送。

马怀蔺，原名马相如，1892年出生在宁夏吴忠大寨子一个殷实而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父母主张“耕读传家”，将其送进学堂和清真寺读书念经。马怀蔺中学毕业后，不但文采出众，而且中文、阿文、书法也都很好。青年时期的马怀蔺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动荡时代，辛亥革命的火种传到吴忠后，他毅然加入了哥老会，秘密组织回汉人民开展反清斗争，成为吴忠地区的首领。1928年马怀蔺在绥远结识了刘志丹、高岗等陕北共产党人。就在不久前，马怀蔺动员好友金三寿（建国后为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存标、金风岐几位青年投奔红军，他们到了盐池县王乐井乡郑家堡子，游击队员将他们引见了三边特委军事部长高岗。高岗高兴地对他们说：“太欢迎你们了，中国革命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你们代表着宁夏的回族人民来参加革命，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向党中央作汇报。”很快，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指示说让他们尽快到保安来。不久，马怀蔺等人到了保安高桥，见路边沿途贴着“欢迎回族领袖马怀蔺”等大幅标语，都特别兴奋。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接待了他们。郭洪涛对马怀蔺说：“你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回族同志来参加革命，精神难能可贵，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重视你们，将来解放宁夏也要依靠你们回族群众的力量。”马怀蔺说：“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我们一定依靠党的领导，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两天后，郭洪涛带着马怀蔺和金三寿、马存标等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穿着灰白色旧军服，抽着烟，踱着步正等待客人。郭洪涛走上前说：

“主席，他们来了。”

然后转身向马怀蔺介绍说：

“这就是毛主席。”

马怀蔺几个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握手说：

“欢迎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他把客人让进窑洞里，坐在几个小马扎上，给每人递了支烟，指着警卫员端上来的水杯，风趣地说：

“放心地喝吧，回族同志们，杯子是涮过的。我可不是马鸿逵说的‘魔鬼’，你们回族人说的依布里斯，要杀回灭教，也不是传说中的神。我跟你们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我只是要和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回族人民，一道来砸烂当今人吃人的旧制度。”

毛泽东见客人们有点紧张，又说：

“你们不要拘束，不必客气，随便谈谈。”

他在谈话中又询问了宁夏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回族人民的信仰，生活习惯等。他还问马怀蔺：

“将来我们解放宁夏，你看要多少人马？”

马怀蔺回答说：

“有一个军就行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不行吧！”

马怀蔺说：

“宁夏的回民多，不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去的军队再多也不行。红军是仁义之师，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老百姓肯定欢迎红军。”

9月8日，毛泽东阅读陕西当地的报纸，看到报纸内容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5周年了，邵力子主政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却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本传前面曾多次说到邵力子是共产党员，可他后来何以会主政陕西呢？原来早在1926年8月，邵力子和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向邵力子建议：“这次到莫斯科去，你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邵力子按照这一指示，正式退出了共产党。1933年4月，邵力子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毛泽东回想起邵力子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现在怎么会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便提笔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做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泣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10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

顺颂勋祺！

毛泽东

尔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王均各写了一封信。他在给朱绍良的信中写道：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附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启

他在给王均的信中写道：

治平（王均字治平——笔者注）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10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即朱德，和王均是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的同学——笔者注）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量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顺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说：

“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一下。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红2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国民党军王均部。红4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另由周恩来指挥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与南京的谈判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已派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9月9日，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准备以两个军西渡黄河，以主力跟进，实行其“西进计划”，要自行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9月10日，毛泽东尚不知张国焘还坚持“西进计划”，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告之国民党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3个师准备进攻通渭，红4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2方面军提前北进。红2方面军应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指示红1军团第2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为红2方面军移至通渭以北休息创造条件。

9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贾拓夫说：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他的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组织游击队，并了解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情况。

9月1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出《静宁战役计划》，尔后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要求红4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电报中还说：“不让胡部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

张国焘拒绝执行军委的《静宁战役计划》，他致电红4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说：“我们大计，以快向西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

9月14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就占领宁夏的部署，联名以“绝对秘密”的电报发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文中说：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2、4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1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的一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一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4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1、4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张国焘对中共中央这一“绝对秘密”的电示置若罔闻，坚持要红4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循化、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发展。

9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胡宗南主力前进甚速，故令4方面军速控制静宁、会宁大道。”聂荣臻部应直下静宁、隆德间，策应红4方面军。

毛泽东又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致任弼时、贺龙、刘伯承，通报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情况和1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并以1个师出隆德大道，策应红4方面军的情况。电文中还说：

“4方面军宜在5天至7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李维汉、林彪、叶剑英、王观澜、宋任穷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和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肯定了统一战线的成绩，重申“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改“反蒋”为“联蒋”，运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建立和平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党要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地位，反对关门主义。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中说：

“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与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地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身上了。”

“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份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分化与动摇。”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坚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的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说：

“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给朱德、张国焘并转贺龙、任弼时的电报中强调说：

“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以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需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3州等坚固城池。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1、4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

9月16日，毛泽东因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地区推进，又以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说：

“胡宗南部大部已到西安，现陆续西进，胡本人到西安。4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1、4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

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似有我以1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率第1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止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4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聂荣臻，指示聂荣臻所率之红1军团第1师应以1个团附骑兵一部在明日先敌胡宗南部占领界石铺，另派一部直达隆德、静宁道上扰乱敌人，以配合红4方面军行动。

毛泽东还以他与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说：红1军团第1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4方面军主力务须在3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9月1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在红4方面军打击胡宗南部的部署与决心未明之前，红1军团主力暂时宜在现地待机。

9月18日这一天，西北局在甘肃岷县以西三十里铺举行的讨论红4方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会议已经开了3天。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继入甘西的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

会议结束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将会议决定电告在前线指挥部的徐向前、周纯全，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命令，部署红4方面军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前进。

9月18日晚，毛泽东分别致信宋庆龄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及蒋光鼐、蔡廷锴。他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一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悟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

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做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在给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等人的信中写道：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为，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毛泽东在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写道：

“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即陈铭枢）先生及19路军各同志。”“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

毛泽东还分别致信各界名人，其中有文艺界、教育界的郭沫若、沈雁冰、周谷城等人。周谷城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来到上海的。他接到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的长信，很是惊讶。

毛泽东在这些信函中阐述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9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任弼时、贺龙说：

“3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

毛泽东又以他与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贺龙说：

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会给帮助。

电文中针对张国焘要红1方面军单独攻宁夏及红4方面军西进的错误主张说：

红1方面军独攻宁夏会顾此失彼，使进攻宁夏计划失败，也会使你们攻甘西的计划失败，只有集中占领宁夏才可避免失败。“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1日，毛泽东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说：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4同志的意见，“以6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3个方面军，周恩来同志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赴前线，与朱、张、陈3同志一起工作。主席团地点宜设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9月21日这一天，一向阳奉阴违的张国焘赶到甘肃漳县红4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他说：

“陕甘北部地区粮产不丰，人口稀少，不可能为大部队解决粮食。主力向河西、兰州以北地带开进，既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又吸引了胡宗南部，减轻了1方面军的压力，还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意图，对于方面军的粮食也可以较好的解决。”

在张国焘的煽动下，漳县会议推翻了西北局会议的决定，红4方面军各部掉头西进。

9月22日，朱德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及2方面军领导人，报告张国焘推翻西北局会议决定、坚持西进的情况。朱德还声明说：

“周子昆、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责任。”

朱德同时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会议的决定表示反对；又下令红4方面军各部暂时停止一切行动；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4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此时，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已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他也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9月22日晚，毛泽东分别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和蒋光鼐、蔡廷锴，还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及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67军军长王以哲。

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20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条，行之于1925年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全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赫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流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共70人，其余略——笔者注）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在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说：

“当今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光荣的19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热忱爱国如先生”。

毛泽东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信，是因为在“两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派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云广英化名为林秀，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进行统战工作。后来蒋介石在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威胁的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免去陈济棠所任各职；裁撤粤、桂两派设立的党政机关。李宗仁、白崇禧虽然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但他们深知蒋介石总有一天会收拾他们。为了生存，李宗仁、白崇禧便和李济深在9月间决定联共反蒋抗日，派钱寿康、刘仲容为代表，携带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赴陕北，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联络，希望与中共中央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形成鼎足之势。毛泽东对桂系的协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然后由秘书誊写两份，并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封信，一并交钱寿康二人带回。在为钱寿康、刘仲容送行时，毛泽东说：

“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它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还对刘仲容说：

“刘先生，你回广西去，要动员李先生、白先生，将本事用在抗日上。”

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除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的信中写道：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

毛泽东在给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写道：

鼎芳（王以哲字鼎芳——笔者注）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公祺。

毛泽东 1936年9月

9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前方的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接朱德来电，“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避免胡宗南部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1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说：已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

9月23日晚，毛泽东同9月22日从红军前线回到保安的斯诺谈统一战线问题。这次谈话内容经斯诺整理后发表，其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

“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它政党能够进行合作。”“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斯诺将毛泽东谈话记录全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对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9月24日，毛泽东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复电任弼时说：

“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9月24日，红4方面军撤出甘肃通渭，开始西进。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4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24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1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

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说：

“4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2方面军北上问题。”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国焘动摇，老总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24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西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将先据乐都，且先据永登、凉州，遮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毛泽东又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说：

“4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1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2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张国焘给中央连复两电。他在电文中说：

“如4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560里，敌决不能限制我于青海角。”“现4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

毛泽东一见张国焘这后一封电报，顿时有了主意。他和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王稼祥商量说，既然张国焘还有顾忌中央明令禁止之心，我们何不如此这般一番，管教他乖乖地回头北上。众人听毛泽东细细道来，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开始分头起草电文。

9月27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说：

“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中央认为，我1、4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如4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路，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因此，中央认为，4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徐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1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2方面军仍在外翼歼敌，则万无一失。……务请朱、张、徐、陈4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分别致电红1、红2、红4方面军，发布命令说：

“4方面军应即北上，与1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2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牵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1、2、4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毛泽东紧跟着又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中说：

“中央命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电文中还说：兰凉线虽然只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敌如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困难。

至此，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与周恩来、彭德怀电告张国焘说：

“宁夏人口120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

至此，张国焘已经无话可说了，他只好致电中共中央和红2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需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1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向部队发了一通指示，说：

“西进计划因今天受到地形、时间限制，决定仍向东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向静宁、定西大路与1方面军会合。”

9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前敌总指挥部名义，下达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计划中命令说：

“4方面军应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1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朱德、张国焘来电，红4方面军停止西渡转向北进。为策应红4方面军北上，红2师立即南下，红1师在原地区与第2师相呼应。其余任务不变。

9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说：

“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这才叫：争论随着电波飞，祸心难改耍泼皮。

任你猴子筋斗快，撒尿还在我手里。

欲知红军3大主力如何会师，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已经持续一年了。张国焘毕竟做贼心虚，不得不表示，**西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这就露出了他的软肋。毛泽东看准了这一点，与林育英等人几番电波，便将其击得骨软筋酥，最终乖乖地听话了。而在统战方面，毛泽东的工作面也进一步拓展，从宋庆龄到邵力子、蔡元培，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从西北军的孙蔚如到东北军的于学忠等，且力度也越来越大。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努力，不久便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也正是在他的引导下，中国终于出现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第11章**

**“为保卫西北而战！保卫华北而战！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

**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话说1936年9月30日，红4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开始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北上。此时已经延误了10天左右时间，失去了进占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等地的先机，国民党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各部相继逼近这一地区，中央和军委制定的以打击胡宗南为主要目标的《静会战役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9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就在这一天，刘伯承与汪荣华喜结良缘。

原来在红4方面军二过草地时，刘伯承初次见到了刚被分配到总参谋部4局的汪荣华。这位来自大别山的少女，淳朴端庄，勤劳聪慧，14岁就瞒着父母参加了红军。叱咤风云、身经百战的刘伯承，一见汪荣华，怦然心动，以笔代言，平生第一次用蝇头小楷写下了情书，倾吐心声。二人终于结成了终身伴侣，从此恩爱一生，整整走过人生的半个世纪，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始终是一对模范夫妇。

话分两头。且说斯诺、海德姆在9月底从前线回到了保安。海德姆向毛泽东提交了他的考察报告，并表示要留下来和红军一起战斗。毛泽东非常高兴，当即决定聘请他担任军委卫生部的顾问兼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而此时的斯诺，对苏区的采访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了，可他感到不足的是，毛泽东始终没有谈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斯诺交给毛泽东一个采访计划，提出了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请求毛泽东谈谈他个人的历史。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一贯靠集体智慧和才能。至于个人，那是无关紧要的。”

斯诺没有办法，只好使出了激将法。一天晚上，他对毛泽东说：

“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于是，斯诺就把社会上关于毛泽东死亡的各种传说和一些流行的谣言，如实地告诉了毛泽东：有人说毛泽东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的消息则强调毛泽东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还有一条消息说毛泽东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斯诺还把本书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共产国际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上刊登毛泽东讣告的事，也说了出来！这些谣言和消息，有的是毛泽东知道的，有的是他闻所未闻的。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觉得对于这些无稽之谈倒也很有辟谣的必要。于是他看了看斯诺提纲中所提的问题，思索了一会儿，便说道：

“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平生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斯诺高兴得叫了起来：

“好极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0月初的十几个晚上，毛泽东将自己的生平告诉了斯诺。他从自己的家庭出身、童年时代、求学生活，一直谈到共产党的诞生、红军的创建、中央苏区的建设和5次反“围剿”的斗争。

他们的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谈到十一二点，毛泽东要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困难的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曾深情地提及他的另一位老师。他说：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的窑洞里依然是烟雾弥漫，斯诺仍然在奋笔疾书。毛泽东谈到了新民学会。他还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917年10月），湖北成立了另一个团体，叫作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长久地注视着桌上蜡烛毕剥的火花，那目光像是一个跋涉在黑夜里的行人看到了远处的灯光。他打着手势继续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目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恽代英译的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察普的《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很重视他与斯诺的谈话，他经常搁下大堆的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同斯诺彻夜长谈。在毛泽东看来，他与斯诺的谈话，绝非一般私人朋友式的交谈。斯诺是这样理解毛泽东的，他写道：

“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再说1936年10月1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转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建议他们发一通知给各部队，要求各部队“对一切白军相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一律以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

10月2日，西方野战军红15军团先头部队73师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20多个小时，行程150多公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之前夺取了甘肃会宁县城，为红军3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

“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红军进攻时，我军才在自卫的方式上给予必要的回击。”“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10月7日，红1军团红1师在会宁地区的青江驿同红4方面军红4军先头部队第9师会师。

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4军主力、红31军到达会宁，与红1军团红1师及红15军团73师会师。

10月10日，红2方面军在艰苦的北进中渡过了渭河。

这一天，古老的会宁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鲜艳的红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会师的指战员们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希望，会宁城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红4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中共中央发了致敬电。他们在电文说：

“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1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敬仰钦佩。”

一年前，当红1、红4方面军在巴西分手时，毛泽东曾经预言：“一年后，4方面军会回来的。”如今刚好过去了1年，两个方面军果真又在一个旗帜下团聚在一起了。

是日黄昏，红1、红4方面军各调一部分部队在会宁西津门内的文庙大成殿内举行了隆重的联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红1军团红1师师长陈赓来到了会场。

朱德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宣读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彭司令员兼政委，贺总指挥，任政委，徐总指挥，陈政委转一二四方面军各军事政治机关各军师团营连排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

（甲）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1第2第4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谨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致之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张国焘同志，周恩来同志，彭德怀同志，林彪同志，徐向前同志，陈昌浩同志，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萧克同志，徐海东同志之前，致之于各军军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师师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团团长同志政委同志之前，致之于各级参谋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各级政治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全体红色军事政治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光荣的民族英雄之前。

（乙）**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丙）我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也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我们是它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回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

（丁）**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万岁！

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独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通电宣读已毕，红1师的指战员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送给红4方面军的战友，把会师大会推向了高潮。两军战友眼含热泪，悲喜交集地拥抱在一起，互致问候。

10月11日，中革军委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纲领》规定：

“4方面军以1个军率造船技术部队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取得攻击中卫与定远营的渡河点，加速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任务。4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地休整，派多支部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通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纲领》还规定：红2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尔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并威胁胡宗南部侧翼，迟滞其西进，再后准备以主力或一部接替红1方面军在固原北部的防务。红1方面军主力应逐次转移到同心城地区休整，红28、红29军集中定边、盐池，以一部逼近灵武，侦察宁夏情况。

《作战纲领》要求：各部在11月1日前休整、补充、扩大，从11月中旬起，以红1方面军主力和红4方面军的3个军进攻宁夏；以红4方面军另两个军、红2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

话分两头。且说斯诺十几天的采访快要结束了，他翻着采访本问毛泽东：

“你多次谈到恽代英这个人。而我在几个月的采访中也曾多次听人谈论他，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甘地。他的人品很高尚，而且他似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不知这样评价是否合适？”

毛泽东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说：

“你的评价是正确的。恽代英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我与他有着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对个人经历部分的谈话相当慎重，他生怕斯诺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或记错了什么地方。他要求斯诺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后，交给黄华翻译成中文，由他亲自审阅，修改了少数地方。再由黄华再翻译成英文，交还给斯诺。

斯诺也感觉到：“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个人的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历史，也是共产主义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斯诺还注意到，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斯诺同样感兴趣，她就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毛泽东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贺子珍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在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贺子珍常常会送来一碟酸枣或者炒辣椒。

斯诺这样描述了毛泽东给他讲述往事时的神情和他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又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说到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的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相当重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抢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兄弟。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毛泽东也不愿意穿鞋的。”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去毛泽东那里坐坐，只有一次是属于例外。那一天，斯诺夜访毛泽东，毛泽东一见有人带几本新哲学书来，当即要求斯诺改日再谈。此后，毛泽东一连用三四个夜晚，专心攻读那几本书。

在毛泽东和斯诺几十个夜晚的长谈中，所谈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谈时局、谈政策、谈红军之外，也谈生活中的许多趣事、闲话。未谈正题之前，他总要说一两个小故事。

毛泽东态度平易近人，说话又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斯诺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斯诺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学识和才干：

“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不可否认，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会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可以用毛的政治智慧，来说明他在共产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这说明不了指战员们和老乡们对他的爱戴。在说话时，他善于把很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有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话和家常的比喻。他从来不向听众说大话，而且，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之间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沟通的。”

斯诺还发现毛泽东“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熟悉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

斯诺在陕北苏区生活了近4个月，以“离家”的心情，将要告别红色中国的临时首府保安。毛泽东为保证他的路途安全，先后4次给红军驻西安张学良部的代表刘鼎打电报，要他请张学良所部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派车来接斯诺。

10月12日晨，斯诺吃过早饭后来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正在伏案疾书，见斯诺笑容满面地进了门，忙起身招呼他就座。斯诺问道：

“主席，又在忙着些什么呢？”

毛泽东说：

“一个抗日的高潮必将到来，我正在赶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你们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的反响如何？”

“共产党在宣言中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甚至连国民党中的许多爱国人士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

“为什么会得到各党派赞成呢？”

“因为日本的侵略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而且，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解放的基本原则，符合各党派的根本利益。”

“我这次在吴旗、宁夏、甘肃等地看到红军战士在前线上主动后撤，避免和国民党军队交手，他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见中国共产党真是说到做到啊！”

毛泽东肯定地说：

“我们拥护议会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即实现孙逸仙的遗嘱，坚持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如果国民党开展这一运动，我们准备同它合作，并且支持他们，组成反帝统一战线。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斯诺感慨地说：

“主席，我这次来陕北苏区，在红军中间待了将近4个月，和你们党40多位高级将领交流了思想和看法，使我真正看到了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抗日决心，言行一致的思想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党政军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团结合作有诚心。因此，你们的号召，无论对什么阶级都是有感召力的。”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

“我早就很想找机会突破为期已达9年的军事封锁，亲眼看看中国共产党，你们的红军，你们的边区，很想揭开这个谜，看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些什么打算？中国的领导力量究竟在哪里？这次保安之行，解答了我关心的问题。我看到了共产党领导力量之所在，看到了红军的军情、精神、训练、纪律、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从政治上来说，红军真可谓是一支铁打的军队。”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是第一个来苏区的外国记者，凡受过你采访的同志都赞扬你勤奋，尊重事实，善于探索研究，而且公正。我们中国人爱说一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就得参加革命。你深入苏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你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不毛之地辛勤采访，寻找红军，追求真理的结果。”

斯诺谦虚地说：

“主席过奖了，我做得还不够。要说做了一点工作，也是经过千锤百炼具备良好品质勇于献身精神的年轻红军将士对我的感染，他们毫无杂念，极纯洁的思想令人敬佩。”

毛泽东站了起来，踱了几步，说：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成了世界名人，你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揭破了红军这个人们不解之谜，你的发现和哥伦布的发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你们探索寻求的精神，将为世人共仰。”

斯诺也高兴地站了起来，说：

“主席，我在中国生活的几年中，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日本要鲸吞中国，并且要在亚洲扩张侵略。但是日本要控制中国必将引起震惊世界的抵抗，亚洲人民将奋起反击，东方只有在一场战争中才能产生深刻的变革。我的这些见解受到当时西方国家决策人的嘲笑。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不会抵抗，日本很快征服中国以后，就会北上进攻苏联。我是一个‘密苏里人’，遇事总要找出是非曲直，弄清真相。我在苏区的所见所闻雄辩地证明中国有办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中国有希望。”

毛泽东说：

“我相信你会如实公正报道你在苏区的所见所闻。”

“请主席相信，我会如实报道苏区之行的，中外人民将看到一个红星照耀的中国。我明天就回北平。”

这时贺清华进来了，给斯诺和毛泽东的杯子里添满了开水。斯诺一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下午3点半。毛泽东吩咐贺清华说：

“你给管灶的同志说，让他们用保安特产备好下午饭，我们为斯诺先生饯行。”

贺清华转身去安排饭菜。毛泽东对斯诺说：

“你要启程回北平了，准备工作都安排好了吗？”

斯诺回答说：

“一切都安排好了，今天是来向你告别的。”

“好，应该马上回去。”毛泽东指着军用地图说：“你看张学良的东北友军从这些战线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它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换防。现在，只有洛川还有东北军的一个师与红军毗邻。等蒋介石把门都堵死了，你要回北平就困难了。所以，你得赶紧离开苏区，我们已给你做好了一切安排。”

“感谢主席和苏区领导想得周到。”斯诺说：“说实在的，这里的领导好，群众朴实，山清水秀，一派和平景象。我已经和你们的干部、战士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实在不愿意离去。但是，我要很快把我在陕北苏区的采访真实地报道给国统区人民，报道给世界人民，就必须赶快回北平。”

毛泽东笑着说：

“这说明我们这些杀人放火的‘赤匪’，把你这个外国人也‘赤化’了啊！”

“我刚进入红区时，真担心你们会杀我，会把我的东西抢走，可现在简直不想离开这里。”

“你这次回去，就成了世界上的知名人士，你是第一个全面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

“我一定将你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事业的广大劳动人民感到兴奋和鼓舞。”

说话间，贺清华与大师傅端来了饭菜，有小米饭，有山药蛋，南瓜，还有炒辣椒。毛泽东热情地请斯诺用餐，笑着说：

“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这是保安的特产，营养丰富，耐人品味，不知斯诺先生是否喜欢吃？”

“喜欢吃。”斯诺说：“我们美国人还把南瓜与山药当作佳肴品尝呢！”

“保安的生活艰苦，这里条件差，你的身体却比来时健壮了。”

“是的，保安的小米、洋芋很有营养，这些山里长出来的东西，竟使我增加了体重。初来保安时，我不习惯吃小米，极想咖啡、黄油、面包、牛奶，竟然依照《字林西报》上介绍巧克力蛋糕烘制法试做蛋糕。伟大的试验失败后，我只得乖乖地吃小米，久而久之，才嚼出小米的甘甜味道来。今天，我是在保安吃最后一顿小米，要吃得饱饱的才能放碗。”

饭后，斯诺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告辞，他说：

“我很幸运，有机会到陕北苏区来，记录了这里正在展开的一页历史，我是一个记者，有责任把它公诸于人民。主席，再见了！”

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希望你以后再来。”

斯诺肯定地说：

“以后一定再来！”

“斯诺先生，祝你一路平安，早日抵达北平！”

毛泽东一直把斯诺送出院门外，驻足看着他渐渐远去。

第二天，乔治·海德姆恋恋不舍地为斯诺送行。斯诺把自己的一件黄色鹿皮夹克留给海德姆作纪念。海德姆紧紧握着斯诺的手，郑重嘱咐道：

“你回去写文章时，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上海有我的许多朋友，如果国民党政府知道我在苏区，我的那些朋友就会受到牵连。美国还有我的一家人，我在苏区的事暴露了，他们的处境也会很危险。”

自此以后，乔治·海德姆便成了“马海德同志”或“马大夫”，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忠实地实践着毛泽东的重托。

斯诺则在10月22日到了西安，11月初返回北平。他先在美国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苏区之行的消息。11月12日，他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分期刊出。随后，美、英多家报刊，接连发表斯诺所写关于苏区的报道，以及斯诺在苏区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斯诺还参加和召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介绍他的苏区之行。

在斯诺的支持下，1937年3月由王福时等人编译的中文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秘密出版。此书是关于斯诺对苏区介绍的大量材料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斯诺称赞此书是“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斯诺的前妻韦尔斯形容此书说：“对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

后来斯诺在1937年7月完成了全面反映他苏区之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10月，《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立时被许多评论家称为是“真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此后该书一版再版，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流传，轰动了整个世界。

胡愈之等人在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于1938年2月在上海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取名为《西行漫记》。当毛泽东看到《西行漫记》时，十分高兴地说：

“这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春，斯诺在苏联采访3名女游击队员，问道：“是谁教会你们打仗的？”她们回答说：“只有几个老同志，能教我们一些。我们从一本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学到了许多知识。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里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3名女游击队员再也没有想到，站在她们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

斯诺在1944年还从一位缅甸青年那里得知，在缅甸的德钦族抗日游击队里，《西行漫记》中关于红军活动的事迹，被作为组织开展游击战的指导范例。

《红星照耀中国》更大的影响还是在中国。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通过《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从各地奔赴红星的所在地，不断补充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

且说在10月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说：

“《十月份作战纲领》完全同意，请迅速进行。”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电文中说：

3个方面军会合后，为统一作战指挥，请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指挥3个方面军的前线作战事宜。3个方面军对朱德、张国焘两总的报告，朱德、张国焘两总对3个方面军的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革军委一份，以便密切前后方的联系。

10月15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单方面发布停战命令。全文如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须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便。（四）如果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防碍举动，并愿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3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0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陈伯钧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伯钧同志：

闻你在6军（陈伯钧7月4日已调入2方面军任6军团军团长——笔者注），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出席会议，林育英列席会议。毛泽东发言说：

“由于中央策略的正确，2方面军的赞助，全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的影响，4方面军的同志大部分是拥护中央路线的。”

与会者认为：张国焘的错误是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的错误，是机会主义性质的，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为使红4方面军拥护和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议决定：派林育英代表中共中央到4方面军传达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10月16日这一天，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报告红4方面军军以上干部配备情况：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4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千，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第10、11、12师。

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第13、14、15师。

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25、26、27师。

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88、89、90师。

红31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91、92、93师。

另有甘肃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委何畏，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刘希平。

欲知红4方面军果能顺利到达陕北否？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实际上是为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在抗战时期的总纲领。《通电》中那些深刻而又正确的内涵，别说是张国焘等野心家及当时的国民党人士，就是在他身边的人，恐怕都不可能深刻理解。特别是《通电》中的一些重要原则（**见（乙）（丁）两部分**），**在他人看来，这些话可能是策略，或者说是大话，是空话。这些后来都曾经被一些人所忽视、所不赞成。**历史不是都一一验证了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吗？知毛泽东者，从历史到今天，究竟有多少人呢？

**第12章**

**“我们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

**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

**愿意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

话说1936年10月18日拂晓时分，红2方面军红6军团总务处长朱家胜带领一些勤杂人员，首先与红1方面军接应部队见了面。红2方面军右纵队到达静宁、会宁交界的老君铺，与红1方面军第2师5团会师。

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悼念鲁迅逝世发出3封电报：一封是《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一封是《为追悼和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还有一封是《为悼念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毛泽东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写道：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同时，毛泽东在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中要求为鲁迅遗体举行国葬。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全苏区为鲁迅先生下半旗致哀。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冯雪峰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中。

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被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

鲁迅墓在1956年迁移到虹口公园时，毛泽东为其墓碑题写了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鲁迅先生之墓”。

后来，冯雪峰在1936年底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指示王尧山整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材料，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为此他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王尧山任书记。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冯雪峰领导。

且说在10月21日，红2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及关向应率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聂荣臻、左权等在平丰镇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亲切会面。

10月22日，红2方面军到达西吉县的隆德将台堡，同红1方面军红2师会师。红2师把5万块大洋、20头肥牛、2000只羊、数万斤粮食、1000套棉衣等物资，送给了红2方面军。两军指战员在将台堡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贺龙兴奋极了，他动情地说：

“这下子真要见到毛主席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我们都集合在毛主席的大旗下面，革命一定会发展，一定会胜利。”

10月22日这一天，蒋介石来到西安督战，在华清池向张学良部署“剿共计划”。

此前，张学良曾在9月22日《为陈明抗日主张致蒋介石电》中第一次劝谏蒋介石，他说：“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

这一次，张学良对蒋介石“剿共计划”表示反对，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他还说：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是全东北军将士的希望，亦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蒋介石训斥道：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士气问题，我来解决，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

张学良争辩说：

“我认为内战肯定调动不灵。要是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当。风吹草动，兵随将走，但这个应该是良将，并真正爱国爱民的，还必须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路，那就糟了。士兵们因为不明真相，也可能暂时会跟他走，但他迟早是会被抛弃的。再说，你有你的理，他们也有他们的理，譬如他们会说，日本侵略我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要把中国的老百姓变成亡国奴，这，我们是绝不答应的。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蒋介石断然道：

“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党之前，我不会谈抗日之事。”

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西兰大道，并继续前进，红军处在南北夹击之中，宁夏战役已经无法实施。毛炳文、王均、胡宗南等部由南向北大举进攻。红4方面军5军与胡宗南部激战于通渭县华家岭。红5军损失1000余人，枪600余支，副军长罗南辉牺牲。

10月22日晚，毛泽东致函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说：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需要10种至15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50部，共价不过100至300元。”“在11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毛泽东嘱咐由叶剑英经手选择，由刘鼎经手购买。他还告诫叶剑英和刘鼎说：

“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要节约又节约，”“一切费用均需报账。”

毛泽东又给叶剑英写信说：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按照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再说红军3大主力会师，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调动260个团的优势兵力，欲乘红军十分疲劳立足未稳之际，从东南西3面夹击红军，仅在静宁、会宁地区就集中了5个军的兵力，分4路向北进犯：一路是第3军王均部，一路是第37军毛炳文部，这两路为左路军，由会宁地区出发，直扑靖远；一路为胡宗南的第1军，共4个师，为中路军，由静宁地区出发，向海原杀来；一路为东北军第67军王以哲部和何柱国部骑兵军，为右路军，由隆德地区出发，向固原的黑城镇、七营方向进攻。

毛泽东指示红军主力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的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对毛炳文、王均部予以牵制；对东北军采取统一战线的方针。

10月24日，中革军委指示红军总部和各方面军，先在预设地区集中3个方面军的主力击破南敌，除去后顾之忧，而后再进攻宁夏。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

就在24日这一天，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第30军在甘肃靖远上游5公里处的红嘴子偷偷西渡黄河，因船在河心沙滩搁浅未能成功。

这一天，中共中央得悉张国焘又命令红9军西渡黄河，立即致电张国焘说：

“9军似以暂不渡河为宜，而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4、5两军主力是否足够？”

10月25日，红30军88师第263团从靖远上游8公里处虎豹口渡河成功，抢占了黄河西岸滩头阵地，红30军全军相继过河。

10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

“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30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溃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在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向北。”

中革军委决定：红4方面军的红9军暂不渡黄河，而以另外1个军渡河向30军跟进，这两个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地区，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中卫情形。第二步以1个军攻占战略要地定远营。

红4方面军除渡河两个军以外，其余3个军与红2方面军主力对付南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可停止其推进。

红1方面军主力在红4方面军渡河的两个军控制黄河西岸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进占宁夏金积、灵武地带。在南线敌人受到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红4方面军的红9军即从中宁渡河。

10月25日下午4时，张国焘盗用朱德、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军委及2、4方面军负责人，电文如下：

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

甲、控制西兰大路10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30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一、1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王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4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挡胡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3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3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略目的。

丁、布置：一、1、4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24日的电所提意见，4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1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二、2方面军除4师向七营开进，接替1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之马营和其西之靖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三、1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75师，应俟2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11月17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朱、张、彭

10月25日，毛泽东派彭雪枫化名为彭雨峰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前往绥远，同傅作义商谈合作抗日事宜。毛泽东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写道：

宜生主席先生勋鉴：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晋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3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贸然向抗战地区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郭团长致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

戎绥

毛泽东

信写好了，毛泽东伫立在窗前，不住地抽着烟，一缕缕烟雾在空中缭绕。忽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彭雪枫。他把写给傅作义的信拿过来，又看了一下，交给彭雪枫，说：

“雪枫同志，你的任务是，把这封信交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手里。今后，你是中共中央驻太原的代表，秘密与阎锡山谈判，争取阎锡山与我们合作抗日。”

彭雪枫说：

“主席，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毛泽东说：

“正因为艰巨，才特派你彭雪枫同志赴晋，认识认识那位老奸巨猾的军阀的嘛！我们回师陕北后，蒋介石的5个师借剿红军之名，开进河东道，想挤掉阎锡山。日寇西侵，灾难深重，严重威胁太原。最近阎锡山派员来，希望我们派代表去山西，与他先秘密接触谈判。他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派人前来请我军代表入晋是真诚的。但是，我与恩来商量，你还是先去绥远，与傅作义将军接洽，由傅作义向阎锡山转致我意，再赴太原见阎锡山，更为妥当。”

彭雪枫说：

“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碰到困难设法克服。”

10月25日，蒋介石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令其3个月内将陕北红军消灭掉。张学良不同意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蒋介石严厉训斥。游华山途中，张学良借景生情，诵《游华山有感》：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10月26日，毛泽东以46名中央及军界领导人的名义起草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全文如下：

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阎主任，傅主席，杨主任，朱主任，于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陈总指挥，王治平军长，胡军长，毛军长，王鼎方军长，董军长，何军长，孙军长，冯军长，汤军长，萧军长，高培五军长，高双成军长，邓军长，暨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师旅团长公鉴:

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8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时至今日，贵党政府犹欲以捣乱抗日后方加罪于苏维埃和红军吗？诸先生亲在西北，应知真相。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现在全国红军主力3个方面军已会合于西北，正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乃蒋先生忽于绥东告急大祸临头之际，不加调兵力增援绥远，反而派来甘肃进攻红军。这是谁来捣乱抗日后方？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吗？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诸先生纵欲继续内战，全中国的人民，诸先生的部下，也决不会再让诸先生自相残杀了吧！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便；（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么未免大错。在10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地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我们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地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

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彭德怀 林 彪 贺 龙 任弼时

徐向前 陈昌浩 王稼祥 刘伯承 叶剑英 徐海东 萧 克 罗炳辉

董振堂 杨尚昆 关向应 左 权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罗瑞卿

陈伯钧 王 震 张子意 陈再道 王宏坤 黄 超 孙玉清 陈海松

程世才 李先念 周纯全 周子昆 李卓然 何 畏 王维舟 阎红彦

陈先瑞 周 昆 袁国平 宋时轮 宋任穷 朱瑞等 同启

10月26日，张国焘不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擅自命令红9军和4方面军指挥部西渡黄河。

10月26日晚9时，毛泽东针对张国焘10月25日下午4时电中的阴谋致电彭德怀说：

“1、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2、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3、30军占领永登是对的。9军必须占领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1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4、4军及5军、31军，2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5、1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10月27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转聂荣臻、左权说：

“甲、大帅（指张国焘——笔者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钟、陈昌浩3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丁、前25日前以朱、张、彭3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10月27日，中革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

“目前作战重点应注重击南敌，停止过河。”“4方面军30、9两军及指挥部过河后，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过河部队应“以1个军向中卫延伸，1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10月27日这一天，张国焘电示4方面军指挥部：4军、31军将在靖远下游渡河；命令他们将在河包口的船只顺水放下，接应红4军和红31军。

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报告说：

“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此点不仅是证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着继续向甘、凉、肃以至新疆逃跑之实质及一贯路线。”

10月28日，陈昌浩连电中革军委，提出要求：不分散红4方面军，红31军、红4军都要过河西去。

10月29日，彭德怀鉴于敌情变化，致电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集中3个方面军的力量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一两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二敌。

10月29日，张国焘电示4方面军总指挥部，谎称：

“已得毛主席同意，4军、31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

这一天，担负掩护任务的红4军、红31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在会宁郭城驿地区与尾追的胡宗南部激战后，拉到靖远县西北的三角城准备过河，可胡宗南部已经控制了渡口，把红4军、红31军和张国焘阻拦在了黄河东岸。

10月29日这一天，蒋介石以避寿为名从西安返回洛阳，部署围剿西北红军。张学良派飞机从太原接来阎锡山同往洛阳见蒋介石，并联合在洛阳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共同向蒋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见他们人多势众，便厉声问张学良等人：

“你们只答应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张学良哀求蒋介石允许东北军参加绥远抗战，蒋介石不但不答应，反而破口大骂：

“娘希匹！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

10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再次强调说：

“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打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除9军、30军已过河外，其余1、2方面军全部，4方面军之3个军，统照德怀29日部署使用。”

就在10月30日这一天，红5军也在张国焘的欺骗下渡过了黄河。这样，在黄河以西的红军共有3个军和4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其兵力有：

红9军：辖25、27师，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每支枪平均子弹15发。

红30军：辖88、89师，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每支枪平均子弹25发。

红5军：辖13、14师，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每支枪平均子弹5发。

骑兵师：共200人马，枪200支，每支枪平均子弹25发。

此外，还有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先锋团、回民支队等，全军共计21800余人。

而在黄河西岸的国民党军，正规军有马步青的骑兵第5师16014人马，马步芳的第2军25000人；民团107个团，人数多达15万余人。马步芳见红军渡河西来，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投入了10万兵力阻击红军。

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红军3个军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坚持下，组成了西路军，张国焘、陈昌浩信誓旦旦地要打通与苏联接壤的国际线。

此一去也，分明是：羊入虎口，巾帼受辱；龙困浅滩，壮士不归。

1936年11月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阅兵时训话，指桑骂槐地说：

“共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处？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党同声相应，甘心为共党下面的二等汉奸。任何想与共党联合的人都是连殷汝耕（大汉奸——笔者注）都不如。”

在场的许多人都看到，正洗耳恭听的张学良顿时面色惨白。张学良后来曾这样说：“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产党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一批据说是北京大学教授转来的一批物资，他立刻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中写道：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火腿、时表各物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的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想到，他收到的这批物资竟是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期的朋友许德珩托人送来的。

当年，毛泽东离开北京后，许德珩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学生领袖之一，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事件。后来，他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初回国后，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翻译出版，这是第一个中文译本。1936年，许德珩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与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徐冰发生了联系。一天，徐冰和他的夫人张晓梅来到许德珩家，谈到了陕北的情况，许德珩非常关心毛泽东和红军的处境，他问徐冰：

“陕北现在最缺什么？”

徐冰说：

“现在，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北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钟表。”

许德珩当即决定拿出自己的钱，去买一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泽东。徐冰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于是，许德珩拿出自己的积蓄，让夫人劳君展和张晓梅到东安市场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回到家里，张晓梅问：

“要不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

许德珩和劳君展说：

“不要，不要！”

当这些物品辗转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只知道是北京大学教授所赠，但不知道是何人所赠了。他这封感谢信，许德珩自然没有收到。一直到了1982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时，才将这封信的复印件交给许德珩看。

11月，毛泽东开始阅读李达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称赞说：

“这部书翻译得及时。”

到1937年4月，在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就用毛笔、红蓝铅笔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出了近13000字的批语，其中最长的一条多达1200字左右。毛泽东还用约10种符号，在书的原文中分别作出标记。

11月7日，由于毛泽东的信息从四面八方纷纷飘向阎锡山的办公桌上，阎锡山这天专门召集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会开会，听听各方对山西形势的反应。阎锡山说：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是守中立，还是帮助日本反共，或者联合红军抗日。”

经过表决，与会者绝大多数赞同“联共抗日”。于是，阎锡山派出专员到陕北秘密同共产党联系，要求毛泽东派出全权代表到太原洽谈。

11月10日，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她曾在桃源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1922年到上海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1923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12月以“丁玲”为笔名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她与丈夫胡也频及沈从文等人组织了《红黑社》，出版《红黑》半月刊。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初，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丁玲没有后退，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主编；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了她，关押在南京。1936年9月，丁玲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被国民党囚禁了3年多的南京，经上海、北平、西安到达陕北苏区。她是第一个来到苏区的知名作家。

11月10日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丁玲。周恩来先来了，他依然是保留着长征路上蓄下的大胡子。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披着一件棉大衣，微笑着走了进来。他的颧骨突出，脸显得很长，一头浓密的头发，几乎像个大锅盖扣在头上，本来就很高的身材，因为消瘦，再加上衣服太肥，就显得更瘦了。坐在门槛上的周恩来笑着说：

“主席今天漂亮了，刮了脸啦！”

毛泽东也笑着说：

“我还没有理发呢。”

毛泽东满面笑容和丁玲握手，亲切地问：

“你就是丁玲？大作家！我读了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你的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嘛。”

丁玲见到了除鲁迅之外她最敬仰的人。她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窑洞里摆了四五桌宴席，丰盛而不奢华。张闻天、博古、凯丰、林伯渠、徐特立及中宣部的人员都出席了欢迎会。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主持宴会，丁玲被安排在首席。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晚会开得很热烈，到很晚方散。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毛泽东专程到丁玲住的大院看望丁玲。当时和丁玲同住一间窑洞的李夫，在《女战士丁玲》中记录了毛泽东这次走访的实况和她自己的感受：

“外边和街上非常的黑，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等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是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了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一个最高的革命领袖能够这样平民化，恐怕全中国只有在苏区才能找到。他们谈到过去的朋友、牺牲了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谈到湖南的乡情和安徽的名胜，旧小说和新文学。毛泽东旧文学的根底极好，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诗词家。他看过《红楼梦》。据丁玲告诉我说，他曾作过一篇《红楼梦》的文章，有好几万字长。毛泽东说贾宝玉是可以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据我所知，丁玲对毛泽东非常钦佩，曾说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革命领袖。”

在保安的几次晤谈中，毛泽东征询丁玲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丁玲提出建立文艺俱乐部，以组织苏区文艺运动的基本队伍。毛泽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建议成立正式的文艺团体。

11月15日，丁玲主持召开了一个有34人参加的成立文艺团体的筹备会。此后，经过紧张的筹备，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征请会员、草拟会章等项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11月19日，红1军团奉命隐蔽于环县山城堡以南，红15军团隐蔽于山城堡以北，红2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红31军一部也在此集结待命。

胡宗南占领同心城后，为抢头功令其第1军主力两个师孤军深入，直插盐池，19日占领惠安堡；20日廖昂的78师第232旅及另1个团进占山城堡地区，孤立突出，翼侧暴露。

11月21日下午，红15军团和红1军团第2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方向进攻，断其退路，其他各部红军向山城堡进逼。

是日黄昏，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乘232旅变换阵地之机，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国民党军232旅及另1个团。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胡宗南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山城堡战役歼灭胡宗南1个旅又2个团，计15000余人，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对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

11月22日，毛泽东就此致电潘汉年说：

“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潘汉年是在10月间去上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他首先拜会了宋庆龄，向宋庆龄转呈了毛泽东写给她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信。宋庆龄完全拥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张，把毛泽东的嘱托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四处奔波，帮助潘汉年联络各方人士接洽。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果夫、张冲开始进行谈判。

11月22日下午，苏区文艺团体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凯丰出席了大会。由李伯钊主持了会议，丁玲汇报了文艺团体筹备的经过。

会议确定了文艺团体的宗旨和任务是：

“培养无产者作家，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是目前的重大任务。特别在现时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把全国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创作倾向的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领导，扩大巩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力量，更是党和苏维埃新政策下的迫切要求。”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全体会员通过，把文艺团体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还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他说：

“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我们要文武双全。”

会场上爆发出热烈持久的掌声。毛泽东清了清嗓子又说：

“要抗日我们首先要停止内战。我们要从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要发展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张闻天、博古也在会上讲了话。

大会结束后进行了文艺表演。毛泽东说的一段笑话，李伯钊唱的一支情歌，都赢得了全场人的喝彩。

11月23日，丁玲在中国文艺协会第一次干事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会议结束后，丁玲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拜访毛泽东。此时在陕北的作家们大多都还担负着一定的实际工作。丁玲也要求毛泽东给她安排一点工作。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丁玲，一个文艺协会主任，又是大作家，不静心写作，你还打算做什么事呀？”

丁玲爽快地说：

“当红军。”

“当红军？”

“我要上前线当红军！”

毛泽东一听更高兴了，笑着说：

“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与胡宗南的最后一仗，现在还赶得上，你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

毛泽东立即让工作人员通知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让丁玲跟随他奔赴前线。11月23日这一天，也就是丁玲在保安住了12天之后，便以一个红军女战士的身份上了陇东前线。

后来，丁玲成为以聂荣臻为政委、以左权为代理军团长的红1方面红1军团中的一员。在前线，她结识了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左权、萧克、陈伯钧等红军将领，写下了《速写彭德怀》、《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一页日记》、《到前线去》等描写红军战斗生活的作品。

欲知丁玲后来如何发展，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本传前面讲到了张国焘被迫北上以后依然是贼心不死，要把红4方面军作为私人势力拉到黄河西边去，为其东山再起做准备，最终将红5、红9、红30军中的21800余人送入虎口，生还者仅有700余人。而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为了民族大义，先是以46名中央及军界领导人的名义起草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在劝诫无果的情况下，指挥山城堡一役歼灭胡宗南1个旅又两个团计15000多人，最终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两相比较，张国焘的奸诈、愚蠢与毛泽东的诚挚、果敢自然是相去甚远了。笔者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近些年一些网站载文称，关于“西路军”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这个所谓的“新突破”，就是发现了毛泽东及军委让4方面军某军西渡黄河的电文。他们以此为根据，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颠倒历史，极力为张国焘及其追随者开脱，把西路军全军覆没的责任强加在毛泽东和中央身上。这无疑是反毛大合唱中的一个重要插曲，读史者不可不加以认真辨析。

**第13章**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

**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

**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作逼蒋抗日嘛！”**

话说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发出《为请缨援绥抗战致蒋介石电》，电文中说：

“每念家仇国难从集一身，早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

他向蒋介石提出请求：

“迅颁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

蒋介石在张学良的电文上用毛笔批了6个字：“时机尚未成熟。”而后又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5分钟之坚定力也。”

11月29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洛阳，布置“剿共”，并向东北军和17路军施加压力说：如再不积极进攻红军，便将他们调往安徽和福建。

11月底，被胡宗南军队阻于黄河东岸的张国焘与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由会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与毛泽东会面。

朱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二人共话别后情形，谈至深夜，意犹未尽。

毛泽东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二人都很激动，紧紧握手，相见恨晚。他们在谈话中回顾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和近10年的内战情形。

何长工和毛泽东交谈了两个下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4方面军和红32军的情况，对自己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南下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安慰他说：

“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些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

周恩来也说：

“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啊！”

有一天，周恩来通知耿飚，军委调他到4方面军红4军任参谋长，问他有什么意见。耿飚见周恩来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便说：

“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1方面军好，4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恩来告诉耿飚说：

“毛主席要和你谈话。”

耿飚心想，大概是为去红4军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准备着挨批。可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却笑着对他说：

“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耿飚随着毛泽东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泽东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耿飚说：

“你讲的是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哎，叫你到4方面军去哩。”

“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1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

“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耿飚问道：“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停下脚步望着耿飚，严肃地说：

“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耿飚却认真地说：

“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嗨，”毛泽东笑了，说：“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4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飚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很愉快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部于11月24日在百灵庙全歼日伪军，取得大捷，便起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吾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地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即胡宗南——笔者注）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1、2、4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这一天，毛泽东还以他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19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幡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8个团向绥东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 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 同上

12月2日，张学良自驾军用飞机，单身一个人，不带枪、不带卫兵，飞到洛阳。他此行抱必死之心，准备向蒋介石强谏，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曾放出话来，蒋介石如果不满，可以将徒手的他随时随地当场打死，故谓之“尸谏”。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谈话是从南京国民政府逮捕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的“七君子事件”开始的。

原来早在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尔后，史良又在1936年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活动中，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1936年11月23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就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领导人，并将他们移送至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

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7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再说张学良这一回一见蒋介石，便质问道：

“他们犯什么罪？如果说他们有罪，那就是爱国之罪！”

他指斥蒋介石：

“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气得浑身发颤，猛地一拍桌子，吼道：

“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如不然，就把你换掉！”

张学良面无惧色地说：

“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吗？其实骂你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在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

他逼视着蒋介石，大声嚷道：

“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不许抗日，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蒋介石冷冷地说：

“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宣传！”

张学良毫不退让，说：

“好吧，学良在西安恭候了！”

说罢，他一转身，“咣当”一声，摔门而去。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12月2日这一天，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会师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将军委2局、3局进行组织调整，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部门合并，组成统一的中革军委2局，任命曾希圣为局长。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等人由南京到瓦窑堡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他。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汉年到南京会晤陈立夫。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再飞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西北中共红军。

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领导人中的“抗日派”孙科说：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的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孙科字哲生——笔者注）先生。”

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冯玉祥，他在信中写道：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300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笔者注）犹不悟也。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者。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详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勋祺!

　　 毛泽东 手启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先后任北洋军阀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反蒋抗日。

12月初，毛泽东还在为红军大学学员撰写着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写好一部分就去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授。随从的警卫员贺清华他们几个人也跟着旁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也明白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

天气太冷了，贺清华担心毛泽东写书时冻病了，就去供给处领了一些木炭，在办公桌下生起炭火，让毛泽东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取暖。毛泽东说：

“离规定烤火时间还有5天，你想想，这么多的中央机关，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烧多少木炭啊！这些木炭又要多少树木才能烧成呢？我们现在很困难，腰包里还很空，千万不能大手大脚，要设法节约每一个铜板，用在革命事业上。再说大家都没有开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贺清华说：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务很重，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大家什么时候烤火，你们给我生火盆，好么？把领来的木炭送回供给处，到大家都开始烤火时，你们再去领，一定要把今天烧了的扣回去。”

贺清华不敢违拗，噙着眼泪“嗯”了一声，把木炭送回去了。终于等到了规定的烤火时间，贺清华这才为毛泽东领来了木炭，生起了炭火。

有一天，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还在写作。贺清华进门给他添开水，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心里一惊：坏了，准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糊了，可掀开褥子一瞧，好好的，便又手忙脚乱地找了一通，猛然见办公桌下飘出一缕烟儿，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泽东的脚从炭火盆上拉下来，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着了，着了！”

毛泽东被贺清华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停住笔，低头一看，脚上的棉鞋还在冒烟呢！贺清华忙把这只棉鞋脱下来，在地上使劲地摔打，火星灭了，鞋帮上留下一个大黑窟窿。他说：

“你看，都快烧透了，再晚一会儿，就……”

毛泽东笑了笑说：

“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坏脚，不要紧的嘛。”

说着把鞋拿过去，看了看，又穿在脚上，拿起笔继续写作，还催着贺清华去休息。

几天后，毛泽东就停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写作。据他自己讲，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只完成了5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它问题要写，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且说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军委委员。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为副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12月7日晚，张学良只身前往临潼华清池拜谒蒋介石，就抗日、联共问题，再一次向蒋介石苦谏，他说：

“日本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目前共产党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我所知，共产党不但主张抗日，而且愿意拥护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说到痛处，张学良泣不成声：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是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完全是你所决定，而我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我之所以抱着这种隐忍态度，完全是为了维护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

尽管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依然无动于衷。他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欺骗。最后，他竟然说：

“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12月9日，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1万多人上街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并决定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马上用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请蒋介石接见这些游行学生。不料蒋介石竟在电话中怒斥他说：

“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张学良怕出事，乘车追赶游行学生到十里铺，在灞桥的一个土坡上向学生讲话，劝学生回城。他说：

“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用事实答复你们，请相信我吧！”

12月10日，张学良来到华清池，把学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不但不理会学生们的抗日要求，反而斥责张学良说：

“你失掉了国府大员的身份，站在学生立场说话，你必须以武力弹压，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制止这些学生。”

12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张学良说：

“陈立夫第3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兵谏之前，张学良对杨虎城说：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便送他回南京。”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的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率1连亲信卫兵，乘汽车开往临潼华清池。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依山而建的5间厅里，由他带来的二三十名随身侍卫负责警卫华清池内院。同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还有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部警卫由宪兵第1团派1个排担任，外围由东北军105师的1个团担任警戒。

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3枪，带头冲进华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武装。混战中，蒋介石的秘书萧乃华、少将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陆军上将兼广州行营参谋长钱大钧肩部胸部被打伤。王玉瓒等人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与蒋介石的侍卫队发生枪战。蒋介石那二三十名侍卫很快就死的死，伤的伤。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5间厅前平台上，见蒋介石住的3号厅门半掩着，王玉瓒飞步闯入卧室。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一个士兵跟进来，见蒋介石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顺手装入衣袋里。刘桂五等人也跟进室内，他们摸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温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众人不敢怠慢，立即分头搜寻。

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和呼喊声惊醒，来不及穿衣穿鞋，披着睡衣，仓皇跳墙逃到骊山躲藏，身边竟没有一个侍卫。

黎明时分，士兵们终于从骊山搜出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8点多钟，蒋介石被架上汽车，由谭海、孙铭九等人押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所在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

与东北军捉蒋的同时，西北军宪兵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军政大员；解除了在西安的蒋介石嫡系警宪的武装，接管了机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净利落。他们随即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宋美龄、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12月12日上午8时许，中革军委2局校译股长陈初福接过译电员递给他的一份电报，这是驻西安代表刘鼎发来的急电。他一看，电文上缺字很多，连不成句，上面有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时，局长曾希圣来了。他接过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曾希圣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

稍后，译电员又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名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周恩来急匆匆走进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此时刚刚躺下休息。周恩来说：

“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毛泽东说：

“恩来同志，难道有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

周恩来说：

“主席，这件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毛泽东接过两份电报，迅速浏览了一遍。只见张学良、杨虎城发来的电报上写着：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看罢，他对周恩来说：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正在此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来送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跳起来，问道：

“真的吗？”

毛泽东挥一下手中的电报，说：

“真的！”

贺清华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战友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他：

“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关切地说：

“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陆续来了。毛泽东将电报交给众人传阅一遍，大家都很激动，都说应该把蒋介石杀了。毛泽东说：

“不能杀。绝对不能再打内战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起草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并将西安事变通报共产国际及前线部队。为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他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此时，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激动地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按计划将事先拟好的抗日救国之8项主张通电全国：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5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8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 杨虎城 朱绍良 马占山 于学忠 陈 诚 邵力子

蒋鼎文 陈调元 卫立煌 钱大钧 何柱国 冯钦哉 孙蔚如

陈继承 王以哲 万耀煌 董英斌 缪澂流 叩

从上边签署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原定的东北军、西北军几名领导人之外，又加上了被扣的一些中央系的军政要员。他们的目的是想增加通电的力量，但这样做并未收到预定的效果，那么多的中央军政要员突然反蒋，反而令人产生了怀疑。同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亦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即先后向中央军投靠。53军军长万福麟不仅未按命令执行，还将拟率部去扼守黄河大铁桥，控制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予以扣押。在洛阳的黄大定也归顺了中央军，让出了洛阳。在潼关附近的冯钦哉通过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等联系，亦突然倒戈，使徐庭瑶的“讨逆军”得以通过潼关进入渭南地区。

且说在12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人继续开会，他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地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等表示赞成中央的决定。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作者，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作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他还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领导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行动。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2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央军委也向内部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时，宋美龄让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端纳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请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张学良同意让飞机在机场降落。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处理。”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戏中有戏。”

端纳从蒋介石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并无害他之意，就劝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话，又看了宋美龄的信，态度就转变了。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转到了金家巷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里。

12月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

“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2月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

“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

12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领衔发表由他起草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全文如下：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为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8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

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

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

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20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而此时的南京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却正在搞着策反的小动作，15日致电劝西北军冯钦哉倒戈有功的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对其加以赞扬，并要冯钦哉转发他写给杨虎城的电报文稿，企图间离杨虎城与张学良，且想通过杨虎城营救蒋介石。电报内容如下：

樊军长崧甫弟鉴：

冯钦哉力持大义自拔反正，中央同人极为嘉佩，吾弟潜移默化之功亦至伟大。惟杨虎城身在陕垣，是否被迫真意不明，而冯系其旧部当知底蕴。如能嘱冯密劝杨就近营救介公脱险，事机极为顺易，此层最为要着，即盼图之。并附托冯转杨一电，文曰：

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先后奉上各电迄未得复至深系念。自介公被劫持以来，中央同人极端愤慨。群以为吾兄追随介公有年关系最切，得吾兄保卫当不虞有他。惟时已数日迄无表示，中外惊疑至深且巨，意之环境所关不得不稍有所待。汉卿真意何在，道阻不得其详，弟意以为救国抗敌之念既同，则所有问题当不妨开诚商洽。当此外患重重之际，若陡挟介公一人以居奇，则恐愈久愈陷纠纷。不特陡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且亦贻民族以无穷之祸。中央负全国安危之重责，为求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出以断然之处置。在他人别有作用甘为虎伥固无论矣。惟念吾兄革命历史素极光明，忖以私心绝不甘与之玉石俱焚，实在意料之中。是以为今之计，吾兄果能力劝汉卿悬崖勒马，导入正轨，护送介公安然回京，则满天阴霾自可立即消弭。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而吾兄为自身革命光荣计，亦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最大之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殊勋，党国利赖讵有涯涘。冯钦哉兄与吾兄相从，历有年所，今竟力主正义，薄海同饮，证实观人及友之道，即料知吾兄必早然计及矣。盖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旋乾转坤化戾为祥，端赖吾兄非他人任。忝在神契敢布腹心。

弟 孔祥熙 咸

此电请托冯密为转去，仍盼随时电告为祷。熙 咸

12月16日凌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一行18人从保安去延安乘飞机到西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他们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欲知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革命”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而且**大凡要革命的，都是要革别人的命，而不是要革自己的命**。翻遍人类历史，**不但要革别人的命，而且要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泽东**。这才是真革命。蒋介石常常把革命挂在嘴上，他在训斥张学良的时候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他所说的“革命”，就是要革别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他哪里知道，报应马上就要到了！蒋介石是这样，像蒋介石一样甚至还不如蒋介石的一类人，也会是这样。古人云：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可以说任何爱做梦，做美梦的“革命”者们，到头来都不过是痴儿说梦罢了。

**第14章**

**“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

**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

**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话说1936年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说：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义举，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1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说：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刻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12月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说：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俟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收到了共产国际于16日发来的指示电，但是由于译码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来。毛泽东只好复电张学良说：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马上搜集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

也就在这一天早晨，蒋介石给南京的何应钦写了一个手令：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 手启

12月17日晚，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在延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与在西安的叶剑英会合后，立即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说：

“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

“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它对全国抗日战线的形成，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将东北军、17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防务，必要时侧击甘南的胡宗南，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统一行动，红军加入由东北军、17路军已经宣告成立的抗日联军西北军委。

周恩来等人又同杨虎城进行了长谈。

当晚，周恩来将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在电文中说：

“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报告的这一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转变到保蒋和平。

是日晚至次日，东北军两个师撤离延安，红军81师进入延安，接替了东北军的防务。

12月18日上午，蒋鼎文奉命回到南京，将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了何应钦，果然发生了效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两天。毛泽东说：

“西安事变的发展无非是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个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会议决定：当天先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仍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其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尧，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机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内也发出了由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中说：

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指示中还说明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张闻天还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让他们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做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还要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便确定对策。

12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工作人员搜集来的苏联《真理报》等报纸自14日以来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毛泽东又拿起那份翻译不出来的12月16日来自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的指示电，哈哈大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

12月20日这一天，陕北红军应张学良的要求，以红1方面军的红1、红15军团和红4方面军的红4、红31军，由定边地区南下。

12月2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说：

“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地采取了这种方针。”

12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5项要求：

1、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2、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3、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4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5、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将以上提案电告周恩来，并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于右任进行谈判；还嘱咐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并告知红军愿意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12月21日，彭雪枫、周小舟致电中央，将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态度开始明朗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彭雪枫是在接受毛泽东交代任务后，于11月12日途经绥远辗转到太原的，他代表中共中央开始与阎锡山正式谈判。阎锡山对彭雪枫的到来，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政训处长梁化之参与其事，连他的老搭档赵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枫抓住与梁化之频繁接头的机会，催促阎锡山答复共产党方面提出的问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彭雪枫的努力下，双方的徒步通讯站、通商及共产党方面人员交通过境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久，毛泽东又派周小舟以他的秘书身份，到太原协助彭雪枫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周小舟还报告说：阎锡山在12月21日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益利害为前提，缩小异点，扩大同点。”后来他还说：“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12月 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4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1月15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

敬颂公祺！

毛泽东　敬上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复信中写道：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2月22日于陕北苏区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19路军中上层军官、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梅龚彬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

12月23日上午，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中楼正式举行3方会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1日来电精神，提出共产党的六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看了共产党的提案，表示他个人同意，同时表示还须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传达。

这天下午，南京、西安和中共3方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领袖、放蒋问题进行了讨论。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方面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我党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周恩来还说，除了蒋介石，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约定次日接着谈判。

12月24日，南京、西安、中共3方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出席，西安方面是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宋美龄说：

“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了让西安方面早日放出蒋介石，在谈判中做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承诺。周恩来非常高兴，谈判结束后，立即把这些承诺归纳为10条，电传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撤）。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政治领袖，我们可先发表消息，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做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在是日午饭后，宋子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6项承诺交给了张学良、周恩来，全文如下：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7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至此，双方意见已经非常接近，最后3方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方法。

谈判达成协议后，蒋介石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回南京分条逐条执行。

周恩来及时把蒋介石答复张学良的6项承诺及最后达成的6项协议，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并说蒋介石不愿意在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他说：

**“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12月24日晚，宋美龄、宋子文带着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一见面，周恩来说：

“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恩来坐。他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说：

“不是已经说好了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只要你们都听我的指挥。我让美龄、子文、汉卿代表我和你谈判一切问题。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不签字，怕夜长梦多，再生不测，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经洛阳回南京。他不听夫人的劝说，独自冲下了楼。 张学良的车子开到大门口，遇见了杨虎城，急忙刹住车说：

“虎城兄，委员长要走了，快到机场去送送。”

于是，两辆轿车向机场疾驶。机场外早已有一两千学生和群众在等候。杨虎城下车后，与蒋介石握手告别。蒋介石怕群众不让他走，急急忙忙对张学良、杨虎城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说一遍，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得承认。”

他说完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张学良已经坐进了飞机驾驶舱。周恩来赶到飞机场，飞机已经升上了天空，飞向了洛阳。他惋惜而无奈地说：

“晚了，汉卿成了窦尔敦了！”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12月26日，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至甘肃庆阳地区待命。

12月26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对张杨的训词》。训词称：

“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它之人更可知矢。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

“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鲁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祗知有国不知其它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上就扣留了张学良。

12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为了使红军大学的学员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个正确的认识，专门给他们作了一次报告，他说：

“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有人担心地问：

“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风趣地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路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此前，毛泽东鉴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经决定让红军大学第1批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回到部队中去。所以他又对这些即将奔赴前线去的学员们说：

“**我送你们一根打狗棒，就是4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听说有些可能被留在红大当教员的人写信给总政治部，要求到前线去，便话头一转，又慢条斯理地说：

“我听说有不少同学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鸟翼蓝天，鱼翔水底。好嘛！不过——”

他突然提高了语调：

“这里我郑重宣布：凡是写报名信的，统统留下。没写信的可以出校。”

刘亚楼、张爱萍等一些写报名信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哭笑不得。只听毛泽东又说：

“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这里也是广阔的天空，有你们的用武之地。”

不少写报名信的学员，还真的被留下来了，其中就有刘亚楼、张爱萍。组织上安排刘亚楼担任红军大学的训练部长。他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整点行装准备返回部队，很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我这个没有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

毛泽东闻知此事，立刻找刘亚楼谈话，他说：

“刘亚楼哇，听说你有一种理论。”

刘亚楼一听，十分惊讶，说：

“主席，我可没什么理论。”

毛泽东说：

“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这就是一种理论。听说是你发明的。”

刘亚楼连忙解释说：

“我是说我到前线去可能更合适些。”

毛泽东认真地说：

“工作合不合适，要看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要知道，办学校是一项根本的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有意见你就来找我谈，不要随便发明什么理论。军委决定了，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好。”

毛泽东的话，在刘亚楼听来，字字千斤，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惭愧地低下了头，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

12月27日，中共中央对内发了一个《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示》中说：

蒋介石、宋子文接受抗日主张与释放蒋介石，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地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六）在严肃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12月28日，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敦促蒋介石实践在西安达成的协议，起草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10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10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3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3字改为革命派3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10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15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这正是：老蒋一生耍猴子，小张着道又入笼。

有道是权术本是双刃剑，谁人凭持事有成？

君不见，新莽持之尸身碎；项城持之帝梦空。

君不见，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到头来冰山遇着火山融。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请看后面详述。

东方翁曰：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因共产国际来电翻译不出来，复电张学良说：尚未接到远方来电。后来他从其它资料上才了解到：《真理报》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一怒之下，他把16日那封翻译不出来的电报撕得粉碎。事后他又指示答复共产国际说：“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采取了这种方针**。”人们常常把没有恶意的谎言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据此，我们也可以把毛泽东给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复电，称之为策略的谎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智慧的确非同一般！想当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满意却又不敢反抗；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亦步亦趋；而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中央则是把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当成了尚方宝剑。此时若非毛泽东主持大局，中共中央再按照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去做，岂不又要坏了大事么？

**第15章**

**“延安是个大地方，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咱们要到陕北的**

**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

**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

话说1937年1月1日，丁玲在庆阳前线收到聂荣臻转来的毛泽东发给她的电报，她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一首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手捧电报，读了一遍又一遍，兴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1937年元旦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代表潘汉年，要求他与陈立夫、宋子文接洽，督促蒋介石制裁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尽快撤兵，以免爆发新的内战。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要求在两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深入政治工作，主要的在团结干部。”

1月4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示他与国民党恢复谈判。

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时，要坚持3个条件：1、立即撤兵；2、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3、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

1月6日，潘汉年在南京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人，就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纲领问题进行磋商。

1月初，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出生了。为贺子珍接生的是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同桂荣曾经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冬季的早上，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气喘吁吁地跑到同桂荣家里，对同桂荣说：

“快！快！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

同桂荣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泽东住的地方，老远就听到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泽东看见同桂荣来了，说：

“刘嫂子，快来呀！”

同桂荣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冻得直打哆嗦。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同桂荣很生气地埋怨说：

“怎么能挑选这个地方生娃呀！”

毛泽东说：

“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

同桂荣便不再说什么了，先让贺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不一会儿，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毛泽东听到婴儿的哭声，走过来风趣地说：

“哟，就生了？真快呀，像鸡下蛋一样，一滑溜就下来了。”

一句话逗得同桂荣与贺子珍都乐了。这时，急急赶来的医生为娃娃扎了脐带，同桂荣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包裹好。众人将贺子珍母女抬回窑洞。同桂荣双手托着娃娃仔细端详着她的长相，看看娃娃长得像毛泽东还是像贺子珍。这娃娃生在苦难的岁月里，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着看人，真叫人心痛。同桂荣看了一会儿，就笑吟吟地把娃娃放在贺子珍身边，跑回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准备好的鸡蛋。

半年前刘志丹的牺牲，使同桂荣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她的记忆，慌忙中一时间怎么也想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那碗鸡蛋。当她推开毛泽东的房门时，看见贺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是谁送来的。同桂荣端着鸡蛋木呆呆地站在贺子珍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

毛泽东尽管已经是4个儿子、3个女儿的爸爸了，可是在这动荡的年代，以前的那几个孩子都没有在他身边。杨开慧生的岸英、岸青、岸龙一直没有确切消息。贺子珍生的小毛托给了毛泽覃、贺怡抚养，她后来生的两个女儿也都送了人。现在43岁的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女娃的诞生，听到了娃娃的第一声啼哭，对这个小生命格外爱怜。他抱起娃娃，仔细端详着：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他又看看疲惫的贺子珍，自言自语地说：

“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

康克清、邓颖超、刘英、钟月林闻讯都赶来祝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她们问：

“子珍生了？顺利不顺利？”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

邓颖超抱起娃娃，看看她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

“真是个小娇娃呀，一个小娇娇。”

毛泽东闻言，忽然记起了《西京杂记》中的一段话，便诵道：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对，就叫娇娇！”

后来，有人叫娇娇“毛娇娇”，有人叫娇娇“贺娇娇”。娇娇长大了，就叫同桂荣“同妈妈”，或者叫“刘妈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娇娇从苏联回国，还托人送给同桂荣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

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迁往延安。

延安城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城墙环绕，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周围有嘉岭山，俗称宝塔山，还有清凉山、凤凰山和万花山。清凉山又称太和山，位于城区东北部；凤凰山是城区的西北屏障与主要依托；万花山位于城区西南15公里处。

毛泽东在3天的行军途中精神很好，一路上有说有笑。快到延安了，他对身边的人说：

“在陕北，延安是个大地方呵，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到陕北的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现在刚解放，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警卫员们回答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记住。”

1月13日，毛泽东一行到了杨家岭沟口，延河边和对岸大砭沟一带都挤满了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和各界代表一一握手。有一个老乡怕毛泽东走不了结了冰的延河，牵来了一匹头扎红布花球、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高头大马，请毛泽东骑着过河。毛泽东婉辞后，还是踏着冰走到了河对岸。早已集结在这里的延安、甘泉、富县的万余名市民农民顿时欢呼起来。

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襁褓中的毛娇娇，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城隍庙边李家石窑洞里。这个窑洞和陕北其它的窑洞一样，就是在土山上打一个洞，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糊的花窗格，地面铺着灰石头，后面是在黄土山腹中整理出来的平面。

这是3间用石灰水刷白了的窑洞，其中的一间作为毛泽东的书房，桌上点着蜡烛，近处有一瓶烧酒，还有一个装满书籍的书架。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个木制洗盆了。毛泽东一直不适应北方农民睡的炕，尽管他在保安时曾经尝试着睡过。因此他的卧室里还是摆放着一张南方式的木床，用4个杆子挂着一顶蚊帐。

1月14日，延安各界隆重集会，欢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红军到陕北是为了北上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要抗日，单靠红军是不行的，必须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执行铁的纪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强监督，增进军民团结，坚决把抗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结束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设宴为毛泽东等接风洗尘。

自此以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变化，直接参与打仗的日子对他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有一天，他对马夫侯登科说：

“老侯啊，你喂的那匹马，在长征中为我们帮了大忙，这功劳要给你记上。现在你愿意改行吗？”

老侯舍不得离开毛泽东，他实实在在地说：

“如果工作需要的话，我仍然愿意跟着主席当马夫。”

毛泽东问：

“许多人都到前方当干部去了，你还在这里喂马，你愿意做这个工作吗？”

侯登科说：

“别人当干部，人家年轻有文化。我年龄大了，又没有文化，我愿意给主席当一辈子马夫。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光荣的。主席现在虽然不骑马了，可眼下通讯员送电报送信件送报纸，还需要这匹马呀。”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说：

“你愿意干这个工作，我也欢迎你在我身边工作。那你就再喂一段马吧。”

此时，毛泽东还热心关照着警卫员们进学校去学习。陈昌奉给他端来了洗脸水。他对陈昌奉说：

“你已经跟着我6年了，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

陈昌奉说：

“一想到将要离开首长，就感到非常难过。”

说着，他那大颗大颗的眼泪滴到了洗脸盆里。毛泽东把准备好的本子和铅笔送给陈昌奉，嘱咐他说：

“去好好学习吧。这里是你的家，有空了回来看看。”

1月间，毛泽东曾致电李克农说：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历史的演义。”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丛书为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演义小说作家蔡东藩所著。

蔡东藩（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浙江省山阴县临浦（今杭州市萧山区）人。他14岁中秀才，后进京朝考，名列优贡，分发福建候补知县，因不满官场恶习，数月即称病回乡。辛亥革命后，他曾先后在杭州及绍兴等地教书；1916年开始著述，用1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这是一部风靡海内外的章回体通俗历史丛书，内有《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100回、《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100回、《两晋通俗演义》100回、《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唐史通俗演义》100回、《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宋史通俗演义》100回、《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明史通俗演义》100回、《清史通俗演义》100回、《民国通俗演义》120回，共11部。全书1040回，600多万字，记述了上起秦始皇、下至民国九年共2166年的历史，行文流畅，生动有趣。他在《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进行了抨击，为此曾收到了迫其修改的恐吓信及子弹，蔡东藩不为所动，不变初衷。加上他另撰的《西太后演义》，著述总计700余万字。通俗的文字，精彩的点评，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文明历史波澜壮阔的演进过程。因此，蔡东藩被世人称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李克农从西安等地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弄到延安后，毛泽东爱不释手，连续阅读，对其中精彩的部分反复翻看。

1月20日，红军大学在延安举行第2期开学典礼，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由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副校长兼教育长。毛泽东只在“抗大”教育委员会任主席。

这第2期分为14个大队，共有学员1362名。其中有红军干部753人。这些红军干部除少数团级外，大多数是师、军及军团级的干部。加上甘肃庆阳“抗大”步校1400多名学员，第2期共有学员2700余人。

抗大的教员阵容也相当强大，毛泽东作了很多著名的讲演，张闻天讲授战略学，博古讲授哲学，凯丰、吴亮平讲授战术学，徐特立讲授中国文学。

1月21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受到重大挫折，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仅存的14000余人东返。

1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20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同志牺牲，5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路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电文中所说的红5军军长董振堂是在1月20日从甘肃高台县突围的。出城前，董振堂召开了50人的干部会，他号召说：“英勇战斗，把尸首留给敌人，后人是会给我们报仇的！”在率部突围时，董振堂跳城而下，摔断腿部。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1岁。马步青割下董振堂的头颅，送到武威，用酒精泡在玻璃盒内，准备送往南京请功。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求他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

潘汉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

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已于21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10天行程到达黄河边，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下旬，由于何应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仍然陈兵潼关，交通阻断，李宗仁在西北的特使刘仲容欲回广西不能，周恩来便提出欢迎他到延安住一段时间。刘仲容征得李宗仁同意后，便来到了延安。

刘仲容，1903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今桃江县），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他回国后长期担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成为桂系的智囊人物。

毛泽东邀请刘仲容到家中做客，在谈话中孜孜不倦地向他谈了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抗战的光明前景，并仔细地询问了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还对李宗仁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他说：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后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的诺言，发动抗日战争。只要包括广西当局在内的各方面努力督促，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又强调说：

“经过‘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发生重要变化，不要多久，全面抗日的局面就要实现。希望李宗仁、白崇禧二位先生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

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了刘仲容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的情况，勉励他读一点革命的书籍，并劝他不要急忙回去，可以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

此后，毛泽东在政治上、生活上对刘仲容关怀备至。毛泽东讲课，刘仲容都去听，地方上开会，也邀请他参加。到4月间，毛泽东派人送刘仲容回广西，并告诉他：

“一路上都会有人保护你，你放心好了。”

毛泽东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介绍刘仲容的情况，要刘仲容带上，途经武汉时交给周恩来。自此以后，刘仲容的工作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有时也由董必武、叶剑英安排工作。

1月2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同意红军支持东北军打一仗。他还说：

“已经交好的朋友不能放弃，搞好原朋友的关系，不会影响将来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我们要维护‘三位一体’。他们两个军要打仗，我们同意联合打，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失败也在一起，不能丢下张、杨，失去张、杨这样的朋友。”

1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带着翻译吴莉莉在丁玲的陪同下，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说起这个史沫特莱，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1892年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16岁那年，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1916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开始投身于激荡的政治活动。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的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参加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1928年3月，史沫特莱因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被捕。出狱后，她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史沫特莱在德国期间，继续参加支持印度独立和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活动，成为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活跃的人物。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1933年，史沫特莱的第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1934年，她的又一部著名报告文学集《中国红军在前进》，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这部书是史沫特莱根据在上海期间接触到的来自江西苏区的人们的叙述，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资料写成的。这是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使史沫特莱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她和鲁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曾经暗中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讯联络和聚会的场所。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5位作家遇害后，史沫特莱应鲁迅要求，将他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译成英文，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1936年春，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会见了从西北苏区来的冯雪峰，听他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随后，她参加了为红军募集药品的工作。在西安事变前，她前往西北采访。在西安，红军驻西安的代表接见了她，并为她安排了住处。在西安事变期间，她曾在电台用英语把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了广播，并会见了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1937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西安，进入苏区，在红1军团司令部受到左权、陆定一热情接待，还见到了她在上海时期结识的朋友丁玲。在丁玲陪同下，史沫特莱又先后会见了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领导人。随后，她和丁玲一起到了延安。

丁玲一回到延安，下午便去看望毛泽东，她对毛泽东说：

“我收到《临江仙》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她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前线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很满意，问道：

“丁玲，你还想干什么？”

丁玲还是初识毛泽东不久的那句话，“当红军”。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给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指定由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签发了丁玲任职的命令。丁玲深知毛泽东对她的信任和希望，但她又感到为难，她说：

“当主任，我能行吗？”

毛泽东鼓励她说：

“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你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会了。”

丁玲仍然觉得有困难，就说：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毛泽东说：

“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先的是要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的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丁玲被毛泽东说服了，她说：

“那我就试试吧。”

毛泽东还告诉她说：

“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毛泽东语重心长一番教育，深深打动了丁玲，她鼓足勇气，决心到中央警卫团去走马上任。直到晚年她还兴奋地说：

“我现在仍然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新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做出贡献。”

就是在这一次会见时，毛泽东曾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送给了丁玲。后来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河防一度紧张，丁玲为了珍藏这份文献，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寄给了在重庆的好友胡风，嘱胡风代为保管，这才使后人能够有幸看到这首著名的词章和潇洒飘逸的毛体书法精品。

后来在2月间，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走马上任。她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不吃小灶，与战士们一起吃小米杂粮，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喜欢。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一文。后来丁玲离开了警卫团，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毛泽东认为她不深入实际了，批评她的住处“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说她是“名士气派”。丁玲认真总结了她在警卫团的那一段工作，后悔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我实在应该从这里开步走，好好当红军。毛主席教导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个的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此后的一个时期，丁玲和毛泽东的交往比较多。毛泽东每周到红军大学讲哲学，警卫员都通知丁玲去听课。丁玲也时常到毛泽东的窑洞和毛泽东聊天，他们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话题除了工作、学习外，常常从李白、李商隐谈到韩愈、柳宗元，谈到苏轼与宋词，谈到曹雪芹与《红楼梦》。毛泽东学识渊博，妙语惊人，丁玲自愧弗如。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也能引发他的文学情思，他常常谈着谈着就诗情逸飞，朗声背诵他喜爱的诗词，挥笔抄写自己以前的诗词。

再说史沫特莱到延安后，最吸引她的正和斯诺所写的一样：“毛泽东是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昂贵的东方人的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可是后来，史沫特莱却是这样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我初到延安的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决定在午夜去拜访他。掀开一个棉门帘，进入了一个黑乎乎的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间一张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根长蜡烛，照耀着一堆堆书籍和文件报纸，也照着低矮的窑洞里低矮的泥土天花板。隐约可见一个男人站立的身影，他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正好处在背光的地方。我看到一团黑色的衣物上覆盖着一件摊开的棉袄大衣。他站在泥土地面上一块稍高的地方，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黑暗的窑洞中只点燃一根孤零零的蜡烛，使洞中的景物显得阴森美静，如同岁月侵蚀的古代壁画景象。那颀长而又令人生畏的身影向我们姗姗走来，大声说道：“欢迎，欢迎。”说着便伸出他那修长、纤细、柔嫩有如女人的手，紧紧握住我们。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互相打量着对方。毛泽东有一副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是富于女性美的嘴唇。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对他的倜傥气质和洞中阴暗的景色极不适应，以至毛泽东当时说了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

1月30日，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把他的老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徐特立，从绥德接回延安，准备为这位老战士举行60大寿庆祝会。他还给老师写了一封祝贺信。他写道：

徐老同志：

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地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的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是“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不是处处表现自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责任的紧要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的学习你，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60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7年1月30日于延安

这正是：祝寿古来信万千，唯有此信不一般。师德人病两相照，毛公高意字行间。

这一天，朱德也提前为徐特立祝寿发了一封贺电，电文如下：

徐老头，你是一个革命职业家，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教育家，你一生能勤工俭学，能耐苦耐劳，反抗社会不平制度，并要征服自然，你是一个百折不屈的老革命家。你是封建社会里生长的人，从小就背叛封建社会的习惯，就染着了资本主义革命气习，嗜好着民主自由平等的味道，参加了中国一贯的民族革命。

你为得要看穿资本主义的西洋镜，曾跑到了最标本式的欧洲巴黎等地去勤工俭学，仍是不合你的脾胃。毕竟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党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是死心塌地的做了下去。

我俩在同一战线中奋斗，在南昌暴动至东征中央苏区，至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至今天，都在一路。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是你的耐劳忍苦的模范，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

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进的人。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你总是推着他前进的。

此祝　徐老头万岁！

朱德

这天下午，丁玲和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一起来到徐梦秋的住处，他们3个人买了一块红缎子，正在那里凑句子，要写一首诗为徐特立祝寿。正在此时，毛泽东来了，看到他们那个认真的样子，高兴得笑了起来。丁玲把他们写的诗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点评道：

“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1月31日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到徐特立的窑洞，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提前一天为老人“暖寿”。毛泽东送给老师一盒寿糕，盒子上有他亲笔书写的6个字：“坚强的老战士”。众人在欢乐的气氛中和徐特立一起吃了“长寿面”。

1937年1、2月间，冯雪峰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多次的长谈中，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对冯雪峰等人主持的鲁迅治丧工作给予了肯定。

1937年2月1日，《解放日报》出版了庆祝徐特立60大寿特刊，刊发了毛泽东的贺信和题词，还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题词。延安各界人士冒着严寒，从瑞雪纷飞中来到中央会议厅，参加中共中央为徐特立举行的祝寿大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会祝贺。

朱德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热情而真挚的贺词，他说：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佩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在答词中恳切地说：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毛主席。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但是，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

徐特立还说：

“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

欲知毛泽东和徐特立后来的交谊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写给徐特立60大寿的贺信，绝不同于一般的祝寿应酬之作。贺信开首3句话“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便开了历史的先河。作为伟大的人民领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紧接着，毛泽东从8个方面赞扬了徐老“特立独行”的高贵品质，并相对应地揭露和批评了叛党投敌、在困难面前畏葸不前、本来是“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心里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以脱离群众为快乐、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只愿意拣轻松事做和遇到担责任的紧要关头就躲避，等等丑陋现象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目的是以徐特立为榜样，在陕甘宁苏区大局初定之后，给延安各界树立起一个道德标杆——“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并在党政军内开展一场广泛的思想教育运动。从历史上看，在相对稳定的新形势下开展这种思想教育运动，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说明了毛泽东处理事务的前瞻性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

**第16章**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

**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

话说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因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主张和扣押张学良的蒋介石讲和而心怀不满，枪杀了卧病在床的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因事先避入杨虎城公馆，幸免。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了孙铭九等人杀害王以哲的错误，并和刘鼎等到王以哲家吊唁。

2月3日，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立即向西安开拔，声称要杀孙铭九等人，为王以哲将军报仇。周恩来派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2月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杨虎城等并转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遇害表示哀悼，他在电文中写道：

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芳先生家属诸君大鉴：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2月6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车上装载着军鞋、军衣等物，还有《左派幼稚病》等一些小册子。

早在1935年，范长江曾在川北、甘南一带采访，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西北的近况，分析了红军的动向及未来的前景。这一系列报道，轰动了全国。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被震惊得不知所措，他从傅作义那里获悉，中国共产党已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已到达西安。他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采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谈话中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范长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访，向毛泽东请教。周恩来当即表示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了范长江的请求。这样，范长江就成为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国统区记者。

在驶往陕北的车上，博古、罗瑞卿成为继周恩来之后范长江在中共方面的两个重要采访对象。范长江问起他们各自的简历，以及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情况，博古和罗瑞卿都作了回答。范长江一边倾听，一边做着详细记录。

2月9日下午，博古、罗瑞卿、范长江等人经过了3天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在进入延安的途中和落脚的抗日军政大学门上，范长江看到有很多欢迎他的标语，没想到中共中央对他的访问竟然如此重视。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先后采访了吴亮平、刘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张闻天等人，将他们的音容笑貌、仪表风采，一一写进了通讯中。

是日晚，中共中央为范长江举行了欢迎宴会。

晚上近10点，范长江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后来曾经描述了见到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和范长江谈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

“走上宪政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革运动。”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见到过一些小册子，那里边强调说，反对日本侵略必须首先武装保卫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他对这种主张疑惑不解，便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

“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停止阶级斗争，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先缩小内在矛盾，解决外在矛盾。”

毛泽东的谈话，使范长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长江提出要求说，他希望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搜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毛泽东说：

“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宣战，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范长江这才意识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这次会见时间长达10小时，当他起身告辞时，东方已经发亮，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不久，他就发表了长篇通讯《陕北之行》。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暨中国国民党党员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行。当此日寇猖獗，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之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即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A）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B）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C）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D）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此前从2月9日开始，一直到2月10日、12日，毛泽东一连3次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指示说：

1、坚持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政治立场。“勿要再让”。2、关于军事问题：可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4个军，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按中央军待遇领受。我党参加国防委员会、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规定我军防地。南方各省游击队可改为民团，但不能调到陕北。拒绝政训员、联络员的设置。3、关于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党参加各党派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求得我党不被逮捕不受破坏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这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蒋介石闻之大怒，他严厉申斥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范长江的文章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大公报》不应当发表；并责令张季鸾严格检查范长江的文章、信件。

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决议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提出4项苛刻的要求之外，还自始至终摇唇鼓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10年内战中污蔑共产党的谎言。为了让读者诸君领略一下蒋介石和他的笔杆子及同一类政治骗子说假话的厚颜无耻，特将这个《决议》的全文抄录如下：

本党以历史之使命，奉总理遗教，致力国民革命，以建设国家，复兴民族，本春秋无外之恉，对于世界殷殷焉蕲至于大同之治，对于国内更断无町畦畛域之见，惟求集中国力，奠定统一之基，以维护中国之自由平等。故凡服膺三民主义，遵奉革命方略，而愿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者，无不引为同志，而竭诚容纳，此为总理创立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迄中国国民党一贯之精神。是以兴中同盟时代，延致具有民族意识之志士，十三年改组时，则容纳共产党员个人加入本党，史实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当时本党犹力予容忍，冀其自悟。逮国民革命军出衡湘，克武汉，乃复遮断本党与民众之连系，播植赤化之祸种，以谋颠覆本党革命建国之基础，阻挠东下沪宁之师，牵掣北定郑汴之役，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倡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本党为巩固党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计，乃不得不当机立断，以有清党之役。此共产党人以自绝于国民，自绝于本党，往事历历，为当世所共见共闻者也。嗣复一面鼓其邪说，荧惑青年，一面结集成队，四出骚扰，为患十年余，荼毒十数省，远之如武汉、南昌、广州、长沙之变乱，以及粤之陆、海丰，闽之龙岩、永定，赣之吉安、上饶、永新、铜鼓、弋阳，湘之平江、浏阳、华容，鄂之沔阳、黄安、监利，豫之商城、潢川等县，匪踪所至，田畴为墟。又复伪立政府，致赣、粤、闽、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躏最久，人民之苦痛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责，对于毒害人民之匪类，自不得不予以荡除，数年以来，节节清剿，赖我将士智勇忠诚，秉持三民主义，牺牲奋斗，卒能抉其根株，凡经匪众盘踞而国军克复之地，立即为之区处条理，招辑流亡，不数月而渐复旧观，民获安居，咸庆得所。以我宽仁，易彼残暴，相形之下，妇孺皆知。彼等自江西总崩溃后，由湘、黔、滇边境而四川，而甘、陕、宁、晋、青等省，于人民则裹胁之后，继以残杀，于庐舍则摧毁焚烧，惟恐不尽，城市农村之经济，莫不尽力破坏，鲜有孑遗，是皆陈事昭彰，无待缕举。其尤可痛心疾首者，九一八以来，国难严重，全国国民在统一政府之下，实行集中国力，精诚团结，悉心建设，充实国防，以御外侮，犹恐不及。而共产党人乃乘国定危急存亡之际，肆意扰乱，于淞沪之役，则猛攻赣州，长城各口之役，则猛攻抚州，危及南昌，使抗战之师，为之牵制，其它破坏国防，摧残民力之事，更变本加厉，言念及此，举国共愤。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授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惟是鉴往思来，不容再误，非彼等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束身为中华民国良善之国民，则中央为保持国家之治安，维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计，不能置亿万人永久之利害于不顾，而姑息少数巧言暴行之徒，以贻民族无穷之殷忧。就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言之：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兼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要之，凡独立自主之国，断不能容许有反国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团体，亦决不容忍任何残害民生，毁弃道德之行为。本党负建国立人之责，共产党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国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具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体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国同胞昭告者也。

2月22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的闭幕宣言中，对于上述内容再度强调说：

“至于共产分子，近日虽假共同御侮之口号以号召，然征之往事，十三年以来，扬言加入本党以从事国民革命，而实则破坏国民革命。十六年以来，以暴动手法，危害民国，使国家对外之力量为之减削，人民无量数之生命财产为之荡析，种种罪恶，实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本党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决不忍数年以来，掷其血汗以从事剿匪工作之武装同志及一切同志，怀功亏一篑之痛，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免贻将来无穷之戚，而又奠民族复兴之基，此当明白为天下告者也。”

至于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所提的5项要求，三中全会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及。直到2月24日，蒋介石才在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中提出了“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3个问题，算是对中共中央的要求有了一个间接的答复。

2月26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在甘肃临泽县倪家营子又陷入马步青、马步芳的重兵包围。

2月27日，中革军委为了接应西路军，一方面将红4、红31、红28、红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林育英为政委的援西军，自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另一方面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此时，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正在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他们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5项要求和4项保证。国民党代表则根据2月21日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强硬地宣称：“中共武装必须解除”，“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要把共产党的军队缩编为3000人，继之增加为5000人，后来又提出编为两个师8个团1.5万人，“不能再多”。而所编“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关于陕甘宁苏区，国民党代表提出要划归相关各省。后来又允许成立一行政区，由国民党派任正职长官。还提出要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此数。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5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费内开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针对西安及全国反蒋派的活动指示说：

“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一方面向蒋建议，去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的政策，改为实际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的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除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

3月1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会欢迎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的集会。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史沫特莱，就统一战线问题、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等同她进行了第一次长谈。《谈话记录》在3月16日至4月3日刊登在《新中华报》第338期至343期上，全文如下：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你去年秋季跟斯诺记者所谈的，基本上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如果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1. 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一）国内的和平统一；（二）对日抗战；（三）人民的民主自由；（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六）改善人民生活；（七）发展工商业；（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史沫特莱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1927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愿在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19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1935年8月1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同年12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年8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之前夜，乃于2月10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史沫特莱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毛泽东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10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史沫特莱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毛泽东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作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15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史沫特莱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么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毛泽东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与广田三原则，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第二，交还东北4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史沫特莱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毛泽东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史沫特莱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毛泽东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4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史沫特莱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毛泽东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史沫特莱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等类和平公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毛泽东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史沫特莱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毛泽东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史沫特莱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毛泽东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10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5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5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史沫特莱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度过这个战争吗？

毛泽东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度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毛泽东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4年前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造谣。

史沫特莱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毛泽东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笔者注）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10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史沫特莱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毛泽东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予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10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作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作“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作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史沫特莱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如何？

毛泽东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1924年至1927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8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3月5日，毛泽东就国共双方谈判中的军事、政党和边区问题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1、总部直属队可编为两个特务团，每团1500人。2、在我党发表合作宣言的同时，国民党也发表宣言，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3、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制为宜；经费每个月30万。4、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题了词，他写的是：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 毛泽东”

3月8日，国共双方在西安的谈判中意见大体一致，周恩来便将谈判结果拟成条文，电告蒋介石。

3月10日，国民党代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节外生枝，对8日拟成的条文作了原则性的修改。谈判双方在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苏区隶属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

3月10日晚，毛泽东在写给斯诺的信中，附上了他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他在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3月10日于延安

3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致中央书记处并告彭、任、刘、张电》中汇报说，顾祝同与贺衷寒已经将原条文大加修改，使之明显具有收编性质。新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1. 中国共产党今后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请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其在适当期内公开各节，可面报领袖候核。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改编军队，指定现在之地区，遵照地方行政区之规划，执行中央统一政令，其行政人员得由地方及中央任命。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3个师，服从军委会及蒋委员长一切命令：子、各级军政人员第一步得由部队长保荐呈请军委会任命；丑、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改编后逐渐派遣；寅、政工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同回部队工作；卯、现有骑兵改编问题及设指挥部一节，候请示后再定。

四、请求参加国民大会及国防会议，由中央决定后通知。

五、部队改编后应积极整理，以备国防上需要及随时调动至前线参加作战。

六、各事接洽妥善，望将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之真谛宣告国人。

毛泽东等立即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指示说：

“贺、顾所提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彼方所提如：一、划去民选，二、分裂苏区，三、派遣副佐人员，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员，五、缩小红军至3万人，六、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七、改要求为请求，八、服从一切命令，九、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后限度：一、3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1万5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9千人。”

电报中还说：“抗战准备”、“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释放政治犯”、“民意的国民大会”，“必须与苏区问题同时解决”。

3月11日这一天，西路军在突围撤退中遭受重大损失。此时由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各部已经抵达甘肃镇原、固原地区，得悉西路军失败，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停止西进，就地待命，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告急说：

西路军人员已经“不满3000……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全军决死战斗待援，希望适时反攻”。

3月13日，西路军在肃南县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将剩余的2000多人编为两个支队，分散到祁连山打游击：以红30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以红9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

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王树声、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黄火青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支队的行动。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

3月13日晚，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并转张冲：

“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经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周提15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共产党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故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开会。”

3月14日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来电直接抄送顾祝同和张冲，并准备立即返回延安。顾祝同不得不请张冲转告周恩来：“此事实为贺（衷寒）所弄坏”，要张冲根据原案再谈。张冲也向周恩来说明贺案作废，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应停止西安谈判的指示明确加以拒绝。他说：

“贺案作废固好，原案做基础我方仍有意见。”“每个国防师人数至少1万5千，骑兵要求一个团，地方武装人数亦应有规定，河西问题须有办法，等等，这些均须回延讨论。”

在顾祝同的坚持下，周恩来又与他们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谈，并根据中央的意见，提出要直接与蒋介石面谈。

3月16日，蒋介石致电周恩来称：“请约恩来兄22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一切皆要严守秘密。”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

3月间，彭雪枫将他在太原的工作情况电告毛泽东：经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在太原新满城街30号设立电台，彭雪枫以上海某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称“彭公馆”，从此正式沟通了太原与陕北的空中联系。阎锡山暗示说：“鉴于眼下情况，与贵党的关系尚不能公开化。”

毛泽东看了彭雪枫的报告，十分高兴，他对周恩来说：

“可以答复彭雪枫，应当尊重阎百川先生。”

3月19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拟好的谈判条件回到西安。张冲到机场迎接。

3月20日，周恩来将带来文件交给张冲，其主要内容是：

甲、中共方面承认：

一、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二、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有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五、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部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交通队、卫生队、修械所、教导队等。在3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红军原有骑兵合编为一个骑兵团。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4万3千人。六、其余处置：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

乙、国民党方面保证：

一、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二、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使共产党亦能参加。五、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

3月22日，周恩来与张冲同机飞往上海。

3月下旬，西路军已经有1万多人战死，8000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1936年10月出发时的21800余人，幸存下来的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缠身的王树声在踏上西征之路时率领的是千军万马，回到延安的仅有8个人。王树声本人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讨才回到了延安。

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在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下，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4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

西路军中沦为乞丐的领导人不止王树声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强、杜义德、郑维山、陈明义等无不沦为乞丐，他们也是一路乞讨，死里逃生，方才回到了延安。领导人员尚且如此，而那成千上万的战士们，特别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女战士们，他（她）们所遭受的杀戮和蹂躏，又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不堪啊！

当西路军惨败的电文传到延安后，那一天晚上，一阵阵哨声把抗大学员们召集在操场上，林彪走上讲台，面色严肃，声音低沉，传达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他还没讲完，会场上已经是哭声一片，许仕有和红4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一般。林彪用手敲击着桌子，要求大家安静。可会场上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下来，林彪不得不草草宣布解散。

许仕有被搀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一场大哭。王建安、陈赓红着眼睛苦苦相劝，许仕有还是绝食了一天。

毛泽东感觉到，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口头上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他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这一天，周恩来与张冲转赴杭州，准备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蒋介石谈判。

3月24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的意见，以信函的方式递交蒋介石。

3月25日，周恩来会晤宋美龄，提交了中共中央15条书面意见。

次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他特别声明说：

“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一、领导全民族的抗日，保证领土主权完整，达到民族独立和解放；二、实现国内和平统一、民主自由，达到民权主义为成功；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民生的幸福。”

蒋介石则表示，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和他本人合作。周恩来又强调说：

“一、中共非投降，红军非改编，而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愿意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种合作立场完全是诚意的、互信的，愿意坚持到底的。

1. 中共这种大的改变，必须给以解释的机会与时间，并望谅解其困难”，因此有些问题必须声明和解决，如：（一）苏区改成边区（18县）；（二）红军改编3个师后，人数请容许在4万人以上；（三）请设立指挥总部；（四）中央军政人员只任联络；（五）学校办完这一期；（六）增加红军防地。

“三、以后一切都预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离心的，并愿以拥护统一及抗日之精神影响各省。”

蒋介石听后，故作轻松地说：

“这是小节，容易解决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行政区可以保持完整，你们可以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确定，我也决不再打共产党了。”

蒋介石还说，只要共产党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周恩来见他如此坦诚，便在3月30日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延安看了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非常高兴，就挥毫写下了一封龙飞凤舞的亲笔信：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仅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字，匡我不逮。

致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3月29日24时

信中提到的“谈话”，是指他3月1日同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祭黄陵文”是他撰写的清明节祭黄帝陵的祭文。

原来，国民政府在3月份决定清明节派员祭扫黄帝陵，并通知共产党派陕北苏维埃政府人员参加。毛泽东感觉这是一个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于是便挥笔写下了一篇极其精彩的四言古体祭文。其全文待后详录，以飨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师生列队在广场召开批判张国焘的大会，毛泽东、张国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

上午8时，会议开始了，毛泽东先讲了话，提出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接下来是代表发言，会议秩序井然，可是当发言人说到西路军惨败之时，有两个学员突然闯上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着他的头要他认罪。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制止。会场又恢复了平静。

许仕有年少时在少林寺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毛泽东允许后，钱钧清了清嗓子，说出了张国焘一段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钱钧说：

“我们军中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搞了十几次腐化……”

“不许你污蔑我！”张国焘听不下去了，不等钱钧说完，一拍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啊，我张国焘是搞马列主义的，怎能搞这个呢……”

他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会场上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振臂高呼：

“打倒假马列主义者张国焘！”“张国焘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剥去画皮，还其真面目！”“让他讲清楚！”

口号声淹没了张国焘的辩驳，他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妈拉个屁，你还赖账！”

钱钧更是火气冲天，他一边骂一边冲上主席台，脱下一只鞋子，照着张国焘的长脸，“啪”地就是一击。张国焘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镜，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

张国焘以手捂着脸，大声叫喊。此时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一切都发生了。身手敏捷的钱钧已经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打，高声问道：

“谁打的？”

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答道：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毛泽东说着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

钱钧又一次立正：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会又继续进行了。许仕有再也难以平静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开了锅。他是了解钱钧的，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没想到张国焘的生活竟是这样的腐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又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排斥异己的政治错误，想到了被张国焘活埋的二哥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杀害的战友，这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可是错误归错误，也不能墙倒众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同志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与上述略有不同，说的是张国焘在一次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检讨会上，许多来自红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他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钱钧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主席台，脱下布鞋，朝他脸上打去。全场震惊。张国焘起身捂脸，举起一只手吼道：

“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赔礼道歉。他说：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说道：

“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毛泽东说：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张国焘依然是满腹牢骚：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

“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4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给中央政治局写检讨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对他暂时不做组织结论。

欲知张国焘能否改过自新，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就西路军的惨败，与其说2万多名红军指战员是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杀戮，倒不如说是张国焘的罪恶之手葬送了他们。张国焘这个以肃反为名屠杀了无数革命志士的刽子手，后来在叛党投敌之后，身无立锥之居，最终流落在异国他乡，落得个冻饿而毙于加拿大的可悲下场。这可真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前车之鉴，后来作恶者能不慎之乎？

**第17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

**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话说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批判张国焘大会的第二天，学员们分组讨论，继续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1队的批判会上，许仕有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他要求发言：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

队长陈赓在鄂豫皖曾经当过许仕有的师长，熟知他的秉性，见他要放炮，就含而不露地劝道：

“仕有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

许仕有根本不理会陈赓的好意，走上讲台，着着实实放了一炮，他说：

“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吗？中央红军不也是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4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4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休要讲了！”

有人出来制止许仕有。许仕有怒目圆睁，吼道：

“我的舌头我的嘴，谁敢说不让讲！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这是哪家的道理！真让人想不通……”

“许仕有，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

有人喊道。许仕有也针锋相对：

“不准你胡说八道！”

他终于把众人惹怒了，不少人振臂高呼：

“你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大别山的土匪！”“打倒张国焘！”

众人的呼声盖过了他的声音，气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一位年轻的学员吼道：

“呸，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呢！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匪……”

许仕有突然说不下去了，双手捂着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陈赓赶紧让人把他送进了医院。

有一天，抗大警卫连在清算“国焘路线”时，连指导员问战士：

“到底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

有人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有人说毛泽东的学问大。于是大家围绕着“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争论。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是战士们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对说“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评。事后，他将清算“国焘路线”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报告给毛泽东。

其实，在清算“国焘路线”中出现的“土匪”一说和围绕着“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的争论，还真的与凯丰有着直接的关系！

早在2月27日，凯丰就发表了洋洋3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他在文章中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的4方面军贬低成了“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4方面军的人带来了很大压力，同时也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再说毛泽东听了凯丰的汇报，站了起来，责问他说：

“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4方面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

“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道：“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4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过去在4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他点燃一支烟，又严肃地对凯丰说：

“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该负责的4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尽管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指示，可在抗大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时候还是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据时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回忆说：“在3月间，红军大学政治部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布置在红大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我在1队学习，1队支部谁去参加这个会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向我传达。2队4方面军干部多，支部书记是谢富治，派了两个委员去开会。听他们说政治部说了3条：一条说4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4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4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2队参加会议的两个人回去后，开支部委员会时如实传达，一下子就把政治部布置的内容泄露出来了。2队4方面军的人很多，大家想不通，吵吵起来，吵得很激烈、很凶。由于1队、2队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不在一个食堂吃饭，但可以听到2队的吵嚷声。我事后听说，2队许多人提出问题：说我们是土匪、军阀，蒋介石就是这样骂我们的。我们打蒋介石，打国民党，有什么错？蒋介石骂我们，因为他们是敌人，你们也这样骂，是什么问题？另外，说4方面军是张国焘收买的，张国焘1931年才从上海到鄂豫皖的，我们这些人早的是1927年、晚的是1930年就参军、参加革命的，那时候是谁收买的？这样说不对嘛！2队吵得很厉害，反映到了红大政治部，要政治部派人解释这个事，但政治部没人来作解释。”

1937年4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抗日军政大学突然发生了。

此前，延安的公安部门曾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除了警卫人员以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共中央将报告批转给中革军委，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枪支弹药的工作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了。抗大当然也不例外。此时，红4方面军的一部分学员本来就憋着一股子气，对立情绪很大，这一来就更紧张了。住在医院的许仕有不但带头拒绝缴枪，而且还破口大骂，弄得收枪者下不来台。到医院看望许仕有的红4方面军的一部分营、团、师、军级干部，也都是牢骚满腹，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这对许仕有触动很大。他看着这些一起出生入死为穷人打天下的战友们眼下都感到没了出路，左思右想，便做出了一个出乎常人意料的决定。他对刘世模、詹道奎、王建安、朱德崇（后于1939年投敌）、吴世安、洪学智、陈再道等人说：

“你们就知道淌眼泪，哭有什么屁用！”

大家都说：

“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办呐？”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走？到哪？”

许仕有胸有成竹地说：

“回四川找刘子才（又名涛，安徽六安人，红4方面军转移时被留下打游击，任巴山游击队司令员，后来在1940年春被捕，6月在四川南江被国民政府杀害——笔者注）去！他们还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此后，众人便秘密串联，愿意走的人越来越多，到第3天已经有2个营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愿意走。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许仕有作了详细计划，准备在4月4日夜10时，趁人们熟睡之时出发，从城北墙下的一个水道里出城，步行7天7夜，到达四川巴山与刘子才会合。许仕有还画了一张路线图，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藏在身上备用。

转眼到了4月4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抗大教职员、学员们大多都到延安城内和宝塔山、清凉山等地去玩了。准备出走的学员们都不动声色地采购食品，整理着行装。许仕有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抗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携枪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着。许仕有对这次行动充满了自信，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竟然在他最信任的老战友、红4军前政委王建安身上发生了。

原来，王建安在关键时刻幡然醒悟了。对于此次行动，他一开始就有些迟疑，尔后由迟疑到动摇，由动摇到否定。他感到不能这么干，但他又深知许仕有的脾气，单凭自己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这次行动的。事不宜迟，否则将铸成大错。这天上午10点多，他将众人出走计划报告给了第2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富治一听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后改名为邓飞），邓富连闻言大惊失色，看了看表，已是11点钟，便跑步去找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了一遍。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让邓富连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他自己则马上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可跑了几处都没找到，只得直接去找校长林彪。他打听到林彪在毛泽东住处开会，便飞奔而去。毛泽东住在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离学校不远，过一条街很快就到了。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显得异常冷静，说道：

“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

他让莫文骅先回校，不动声色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应急准备，待他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

莫文骅急忙回到了学校，向保卫科及身边的人告知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谢富治及保卫科负责人等开会，宣布党中央、毛泽东的决定，立即将许仕有等一伙人逮捕。

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城关镇丰岗谢家垱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小时候，他放过牛，喂过猪，种过地，也时断时续读过私塾；青年时当过手工工人，他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着一些同龄青年。1926年谢富治参加了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不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排长、副连长。从1932年起，他曾任宣传队队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9军26师政治部主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参加红4方面军长征，曾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县委书记。

且说4月4日下午4时，一阵刺耳的哨声响彻抗大1、2队的驻地。臂戴红袖章的值班员站在院子中央，口中喊道：

“紧急集合，不准带枪！”

此时的许仕有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哨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计划不会泄露。于是他随着1队的学员们走出宿舍，进了一个教室。他注意到2队的学员进了另一个教室。

就在此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率领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冲进校园，缴了抗大警卫连的枪。因为这个连原是红4方面军的警卫连。接着，警卫团又迅速包围了1、2队进入的教室。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学员宿舍收缴所有的手枪。

两个教室里的安排是，第1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开会，第2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开会，而傅钟、谢富治二人则分别到1队、2队宣布许仕有等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决定。

两个警卫战士抱着一捆麻绳走进1队的教室，“呯”的一声关上了门。许仕有见状，方知大祸临头了。早已等候在教室里的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钟走上讲台，简单说明了原委，就一个一个地宣读名单，喊一个，警卫战士捆一个，包括王建安在内。许仕有是最后一个被点到名字的，他走出前排，冷笑一声道：

“你们来啊，上来绑吧！”

两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一边一个，刚抓住许仕有的手，不意许仕有突然发力，将两个警卫战士打倒在地。学员们大哗。许仕有傲慢地将双手反剪背后，得意地说：

“你们来捆吧！”

说时迟，那时快，8名警卫战士一拥而上，将许仕有按倒在地，瞬间捆了个结结实实。许仕有破口大骂：

“娘日的，你们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你们是强盗！你们是土匪！只要我许仕有不死，总有报仇雪恨的一天。”

“快堵上他那狗嘴，别让他满嘴喷粪！”

傅钟一声令下，警卫战士立即用手绢塞住了许仕有的嘴巴。

晚饭后，许仕有被押进一间审讯室，接受了中央成立的“许仕有反革命集团”高级军事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主诉人傅钟问道：

“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许仕有说：

“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了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

“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们要打一块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

“我不是3岁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人负责。”

“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想走？”

“谁告的密，你就去问谁吧。”

“这次行动听说是你策划的？”

“是，一切计划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许仕有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去：

“给，这是我准备留给毛泽东的信，是我写的，拿去吧，算作证据。”

许仕有回到关押室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正遇上同班学员小张给他送行李来了。

“谁让你送的？”

许仕有冷眼相向。小张说：

“陈赓队长。”

“外面有什么风声？”

小张小声说：

“陈赓队长让我转告你，要你小心点，现在外面讲得好厉害，说你组织反革命集团，领导暴动，还要抢去张国焘，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

“娘的屁，全是胡说八道。”

“不要乱骂，还是小心点好。我要走了，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许仕有想了一下，说：

“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带个口信给我老婆雷明珍，叫她来一趟。”

自此许仕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着雷明珍出现，可是半个月过去了，雷明珍还是没有出现。这雷明珍是一位投奔延安来的革命女青年，经人介绍后不久，二人便结了婚，每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正在如胶似漆的爱恋之中。许仕有盼望老婆来，是要当面向她陈述这次出走的真相，他相信雷明珍是会理解自己的。盼来盼去雷明珍始终没有来，可他委托捎话的那个小张又出现了。小张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

“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一条烟。”

许仕有问：

“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没有？”

小张叹了一口气，说：

“雷明珍已经提升为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抗大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

说着，就拿出一封没有信封的信递给许仕有。许仕有急不可待地展开一看，犹如五雷轰顶，只见信上写着：

许仕有：

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卫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看后签字。

雷明珍

许仕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所爱的人竟然这么不理解他，恨恨地说：

“我许仕有今生今世算是瞎了眼！”

他抖动着手，连划3根火柴才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他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要骂娘，骂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

“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哩！”

说罢，他掐灭烟头，要过笔，唰唰唰，在信上写了“坚决离婚！许仕有”，交给小张。

众人的指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许仕有把这一切都记在了毛泽东的账上。他像一头困兽一样，大骂中央，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一定会有人报告中央，自己就能快点死。然而人们似乎把他遗忘了，既没有人提审，也没有人来探望他。

此时，军事法庭已经把一些大的问题基本弄清楚了。在如何处理许仕有这些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枪毙算了，少个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非那么严重，不能枪毙。

毛泽东感觉许仕有的问题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在看了许仕有写给他的信后，更坚定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为此还批评了不少人，他说：

“许仕有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不起好作用，把事情做绝了，把人家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掐灭烟头，拉开窗帘，天色还灰蒙蒙的。他走到门前拉开门，对哨兵说：

“通知司机出车！”

哨兵问：

“主席，这天还不亮，你要到哪里去？”

“到抗大！”

天将破晓之时，许仕有似睡非睡，隐隐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片刻间，“哗啦”一声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持枪的战士，其中一位高个子说：

“许仕有，你自由了。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提毛泽东则罢，一提起毛泽东，许仕有顿时怒火中烧，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不去！”

此时，抗大值班室的值班员，刚接待了毛泽东的前卫车，还没有来得及将毛泽东要来的消息告诉校方主要领导，毛泽东的车子也到了，驶进了校园大门，罗瑞卿紧随着毛泽东走了过来。值班员急忙迎上去，敬礼问好：

“主席，您早！”

毛泽东问：

“电话接到了吧？”

“接到了，校方领导我还没来得及通知。”

“不用惊动他们啦，过后通知他们一声。我来看看许军长，他住哪儿？”

值班员用手指着一片丛林，说：

“不远，就在那儿。我给你们带路。”

恰在此时，奉命通知许仕有的那两位战士跑了过来，向毛泽东敬礼报告说：

“主席，我们已经通知许仕有了。”

毛泽东边走边纠正道：

“不，你们应该叫他许军长。”

“是！主席”

两位战士吐了吐舌头。毛泽东一行人来到窑洞前，值班员说：

“到了，许军长就住在这里。”

说着紧走几步先进了窑洞，对许仕有说：

“许军长，毛主席来看望你了。”

许仕有两眼充满了敌意，不屑地说：

“他来就来呗，何必大惊小怪。我许仕有是被抓的人，还有什么看不看的。”

毛泽东低着头进了窑洞，立在许仕有面前，说道：

“许军长，让你吃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4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

毛泽东说罢，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炕上的许仕有连鞠3个躬。许仕有可不吃这一套，在他看来，毛泽东这样做，完全是虚假和做作。他攥紧拳头，瞬间起身冲向毛泽东，挥拳就打。幸亏卫士们眼疾手快，上去便抓住了他的拳头。许仕有一边挣扎一边骂道：

“可惜我手中没有枪！要有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

罗瑞卿也不等毛泽东发话，吼道：

“还愣住干啥？还不快给我抓起来！”

卫士们一齐动手，三下五去二就把许仕有捆了个四蹄倒栽葱。许仕有还不住地吼叫：

“你们捆吧，捆得越结实越好！你们杀吧，杀头不过是碗大个疤！反正我许仕有这口气非出不可！”

吼罢又是一阵狂笑。毛泽东对许仕有在红4方面军的情况了解得还不是很多，只是从徐向前那里得知他善打恶仗硬仗。他对许仕有的初步印象是：敢作敢当，粗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断，文化低了一些，是一个讲义气的草莽英雄。许仕有现在要动手打他，更加深了他对许仕有的这种看法。不过，风言风语传说许仕有与张国焘有勾结，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心想，且看一看他的下一步表现再说吧。

许仕有经过这一番闹腾，被再度关了禁闭，心里反倒平静多了。每当休息以后，他就在屋里抡起那唯一的木凳挥舞，练起了功夫。后来，他提出要见毛泽东一面，要当面和毛泽东理论理论。主管许仕有这一案的傅钟将他的要求告诉了毛泽东：

“主席，许仕有要求见你一面，要当面与你理论。”

毛泽东说：

“让他来，我现在等他。”

傅钟告诉许仕有说：

“许仕有，你准备一下，主席要见你。”

许仕有闻听此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尽管是个粗人，却也有细心处，心想：他毛泽东既然要见我，我何不再试一试他的诚意，于是就又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震惊的要求，他说：

“既然毛泽东给我面子，我领情。你再问一问毛泽东，我许仕有是军人出身，可不可以带枪去见他？”

此话一出，不要说傅钟，就连其他在场的人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大家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许仕有上次与主席见面，要打主席，这一次若是让他带枪去，他还不毙了主席？恰在此时，值班员走来说：

“毛主席来电话，请傅钟同志去接。”

傅钟来到值班室，拿起电话说：

“我是傅钟，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在那一端说：

“情况怎么样？”

“这里情况有变，许仕有又变卦了，说是要带枪见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主席，这……”

“就这么办了！”

毛泽东的语气不容辩驳，说完就放下了话筒。傅钟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给罗瑞卿挂电话，嘱咐他做好毛泽东的安全工作。罗瑞卿接了电话，顿感如临大敌，许仕有的粗鲁他已经领教过，让他带枪见毛泽东，岂非儿戏，闹出大乱子如何了得？他马上和属下商量，在毛泽东办公室内外加强警备。

再说傅钟来到许仕有的住处，如实将毛泽东的话告诉给他：

“主席说，你可以带枪去，按主席的意见，也可以装子弹。”

傅钟让警卫员将许仕有的驳壳枪和子弹还给他。毛泽东的胆量和大度，完全出乎许仕有意料之外，这一次反倒是他感到震惊了，自己本来是给毛泽东出一个难题，试探他一下，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是如此的光明磊落，这绝非一般人的心胸和气度。许仕有接过驳壳枪的一霎那，任是再粗鲁的汉子手也禁不住微微抖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子弹推上了枪膛。傅钟已经观察到了许仕有那微妙的变化，但是他还是忍不住交代了一句：

“请你对毛主席的安全负责！”

许仕有也不说话，将驳壳枪插入腰间，抬腿上了日式吉普车。傅钟将许仕有送到毛泽东的住地，许仕有下了车，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握在手中，径自朝毛泽东住的院子里走去。许仕有以为，此时院子里一定是卫士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可是一路走来，并未见有一兵一卒，静悄悄的。他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门口，见毛泽东正坐在办公桌前，燃着一支烟，徐徐吐着烟雾，那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彻底征服了这位大别山里的汉子。

“是许仕有同志来了吗？”

许仕有听到毛泽东的呼唤，心如潮涌，进得屋来“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毛泽东面前，双手高举着驳壳枪，说：

“主席，我把枪交给您！我没有谋杀主席的意思，有的只是对您的歉意。”

许仕有低下头，泪流满面。毛泽东赶忙上前，用双手将许仕有搀起来，拉着他的手，让他坐下来，把一杯水送到他的面前，说：

“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你许仕有是武将，没有你们这一班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噢！你说是不是？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边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包括4方面军的同志，我们也应谅解。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的事，与4方面军的干部无关。”

毛泽东此时也非常激动，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许仕有还是不放心，问道：

“主席，我的错处您能谅解吗？”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不是说过了嘛，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请你记住。”

许仕有问：

“哪几句话？”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

“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当然喽，除我例外。”

许仕有说：

“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

说起许仕有的名字，毛泽东分析道：

“在你的名字中，‘仕’字的官味太浓，‘有’字的财气太重，是否将‘仕’改为‘世’，将‘有’改为‘友’？这样，意思就是共产党人希望世界和平，人民世代友好。”

许仕有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从此改名叫许世友。他看看天色不早，要告辞了，就对毛泽东说：

“对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还认识不清。回去以后，我要向4方面军的干部讲，把您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不讲团结的人站不住脚。”

后来在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认定许世友等人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将其中的多数人予以释放，对少数人以“企图拖枪逃跑未遂”罪从轻判决，分别判处许世友等人6个月至1年半的徒刑：其中许世友1年半，刘世模1年，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各8个月，王建安6个月，并发给他们每人一张纸条，算是通知。

欲知毛泽东和许世友后来的关系如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在中国二十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有两个不可同日而语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他们两个不但一生交恶，而且在性格、学识、为人处世方面也都截然相反。蒋介石是以狡黠见长，而毛泽东则是以坦诚著称。蒋介石是以权术谋事笼络人，而**毛泽东则是以人格及才智谋事征服人**。正像他对许世友所说的那样：“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岂止是许世友，**且不说国民党和民主党、民主人士及那些外国人，单就共产党内绝大多数的领袖人物，前面已经讲过的，后边还要讲到的，除了像张国焘、王明等一类死不悔改的人物外，哪一个不是在斗争中“打”出来的战友和朋友？**毛泽东一生充满了激情，为革命理想而斗争，为人民事业而斗争，从来都是以教育人、改造人为己任，这大概就是根源于他所说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缘故吧！

另：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康生早些年就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因此，他不可能参与处理许世友事件。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和毛泽东等人接王明、康生回国时的情形，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8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12年没见，康生也有6年半了。”可是在许多史料中，都说是康生如何如何处理许世友等出走事件。将傅钟说成康生，要么是记忆有误，要么是以讹传讹，要么是故意抹黑康生，以证明他是一个一贯整人的人。这一类史料，读者不可不辨析。

**第18章**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

**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话说1937年4月5日是清明节，这个节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厮杀了10年的两个阵营的领袖，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到黄陵，一起祭奠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黄帝。

黄陵县位于陕西中北部，原称中部县，因黄帝陵在其境内而得名。黄帝陵在县城北面一公里处的桥山上，南距西安约150公里。

4月5日晨，旭日东升，万里晴空，陕北高原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桥山之上6万余棵古柏郁郁葱葱，黄帝陵墓前香烟缭绕，供品祭器摆设庄严整齐。

上午10时，中国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特派代表林伯渠，各自携带祭文，同步来到桥山，列队鸣炮致祭，并各自宣读己方的祭文。

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云：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矩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尚飨！

国民政府祭文云：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谨以香醴庶羞代表敬祭于桥陵，其辞曰：惟帝智周万物，泽被瀛寰。拯群生于涂炭，固国本于金汤。涿鹿征诸侯之兵，辔野成一统之业。干戈以定祸乱，制作以开太平。盛德鸿规，于今攸赖。今值清明之良辰，援修祀之旧典。园寝葱郁，如瞻弓剑之威仪；庭燎通明，恍接云门之雅奏。所冀在天灵爽、鉴此精诚；默启邦人，同心一德，化灾疹为祥和，跻一世于仁寿。庶凭鸿贶，以集丕功。备礼洁诚，伏维歆格！

林伯渠诵读的祭文则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是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其文也词新意锐，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祭文中的陈词老调大不相同。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4月间的一天，在落日时分，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聊天，毛泽东欣然前往。他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看到吴莉莉穿上了色彩鲜艳的羊毛衫和裙子，就笑着说：

“吴小姐穿这身衣服越发漂亮了！”

毛泽东夸奖的这位吴莉莉，1911年出生于河南，原名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其父是清末民初的盐务官员，家境优良。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她的前夫是北大一位很有些名气的青年教授。离婚后，她作为生活秘书和翻译，与史沫特莱一起到了延安。毛泽东经常接受史沫特莱长时间的采访，吴莉莉就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3个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或一整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毛泽东有时还要和她们一起吃饭。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吴莉莉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一个文学爱好者，更能理解毛泽东的革命情怀。在延安，吴莉莉还表现出了她的话剧天分，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引起了轰动，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

再说吴莉莉见毛泽东夸她，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这身衣服可招来了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的作风。”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说：

“啊，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还真不简单哩！”

史沫特莱说：

“你还笑哩，我看你领导下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好外语，了解外国生活，学会跳交谊舞。”

毛泽东说：

“学外语，我很愿意学。但学跳舞，我不喜欢。”

史沫特莱说：

“你真是个清教徒主义者，连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

毛泽东随口说：

“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不准备出国去。你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的军队，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吴小姐穿这身衣服，对延安倒是个改造。”

他又对吴莉莉说：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史沫特莱和毛泽东聊着，吴莉莉烧菜做饭，3人共进晚餐。吃过饭，史沫特莱打开留声机，放出了《西波涅》舞曲，说：

“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说：

“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学跳舞。”

史沫特莱只好先同吴莉莉跳了一曲，然后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深深鞠了一躬，伸出双手说：

“主席，我教你跳。”

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站起身来。史沫特莱就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如何迈步，如何跟紧音乐节奏。毛泽东跟着史沫特莱跳来跳去，别扭得出了一身汗，只好歇歇再跳。渐渐的，他对这种狂热的活动产生了兴趣，才感觉到跳舞确实是一种放松精神、换换脑子、运动休息的好方法。史沫特莱见毛泽东对跳舞的看法有了改变，就不失时机地建议在延安推广这一种西方娱乐——交际舞。不久，她就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交际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她和翻译吴莉莉。周末到了，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引起了轰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现在门口时，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笑着说：

“史沫特莱小姐，你真不简单哩！把咱们的彭大将军也请来跳舞了。”

彭德怀连忙摆手，认真地说：

“主席，我不是来学跳舞的。我是来看热闹的。”

在轻快的舞曲中，人们翩翩起舞，史沫特莱和朱德，海伦和周恩来，原本都是跳得比较好的。而毛泽东还不老练，就跟着吴莉莉学，贺龙也有舞伴带着。唯有彭德怀说啥也不肯下场。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场接着一场跳着，一直跳了3个小时才结束。史沫特莱不无骄傲地说：

“我也许会因此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是交谊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史沫特莱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交往，改变了她原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她后来曾经写道：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少数的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人气质，但是，他像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观望和等待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所欲为。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能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大会上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的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拥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一类小说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每一个其它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民族或另一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

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交往，与他和斯诺的交往相比较，更富于私人朋友之间交往的性质和轻松活跃的气氛。史沫特莱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她这样记述了她与毛泽东的交往：

“我写条子去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国人要求我唱歌，在他们尽力而为之后，中国人或是唱，或是讲故事，或是全体参加一次讨论。”“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3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任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还要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吴莉莉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根据史沫特莱的提议和要求，毛泽东很努力地想要掌握这些不熟悉的调子和歌词：

“人们说你将从这个河谷离去……”他用低沉的声音哼着：“我们将怀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

可他缺乏的就是歌咏的天赋。那位将要当他英语教师的史沫特莱有点失望，面有不悦之色。她请求毛泽东不要再唱下去。

毛泽东还积极地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

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对各种各样的灾祸挑战。她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她给上海的朋友，给在西安的朋友王安娜，北平的朋友斯诺写信，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捕鼠器。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史沫特莱这种像传教士一样的热情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灭鼠，共产党其它有名望的党员也就开始学毛泽东的样子，参加灭鼠战斗。

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做了许多工作。她除了继续写文章和报道，还为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秘密邀请函，敦促他们访问延安；她还种花种菜。

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很快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来到了延安。厄尔·利夫和毛泽东会谈以后，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毛泽东等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以及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还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毛泽东，会说出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他们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中国的斯大林，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是最无私的人。”甚至形容他像高居于奥林匹克之巅的阿波罗神。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又是一个谦虚的直率的容易相处的“好伙伴”。他会随时走到你的住处同你聊天、玩牌；喜欢“毫不惹眼的坐在观众的中间观看演出”，或在舞场上“和其他客人一样，平等地站在队伍里”，等待姑娘们的邀请。他生活简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毛泽东“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说：“辣椒是穷人的大荤”，并宣扬“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用辣椒招待客人，他边吃边谈，纵论辣椒的特性，进而发挥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说：

“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就多。”

说罢，他朗声大笑，情不自禁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支《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不可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这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烘，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还嗜好烟草，长征路上曾“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到延安后，则自辟一块烟田，以保障他那“无节制”的烟瘾。“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毛泽东。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征服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延安期间和毛泽东接触频繁，谈笑风生，由此曾引起了贺子珍的不愉快。贺子珍尤其是对吴莉莉特别反感。

吴莉莉本是一位演员，而且很有天分，来到延安后还不时地客串戏剧表演。平日里，她也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风姿绰约，涂着口红，烫发披肩。毛泽东是一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自然就多了一些。这本是极正常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把无中生有的话传到贺子珍耳朵里，甚至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贺子珍本来就对这两个新派人物看不惯，听了这些风言风语，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吴莉莉接触越多，她越反感。由此，她与毛泽东的情感交流就越来越少了，争吵反而越来越多了。她本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如今她赌气不再当家属了，要求独立工作。同时，她觉得生下娇娇这个女儿不是时候，一气之下，便把4个月的娇娇送到了老乡家里，自己要去学习。很多人劝她说：

“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坚决地说：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她的愿望，于是，她便高高兴兴地到抗大学习去了。

就在这时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也出现了，她就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

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笔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犹他州大学毕业，并通过了文职人员考试。这年8月，她来到了中国。1932年底，尼姆和斯诺结婚，婚后住在北平。她是《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的记者，同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尼姆同情中国革命，是斯诺西北之行的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斯诺在他来苏区之前有所犹豫的时候，是尼姆鼓励了他，她说：“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去。如果我能去，我会同你一起去的。”

在1937年初，尼姆从黄敬那里得知延安将在5月初召开一次有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认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极好的采访机会。

这里所说黄敬，就是本传后边要说到的青岛学生领袖、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家人保释出狱，到北大数学系学习，改名为黄敬，成为北平学生领袖，尔后成为北方局的领导干部。正是在黄敬等人的安排下，尼姆由北平出发了，她于4月23日到达了西安。这时的西安已经由胡宗南控制，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将受到严格禁止。尼姆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此时党中央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因此办事处对尼姆的请求不敢贸然答应，便向延安发去电报请示。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是斯诺的夫人，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请求。办事处就将接头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了尼姆，要她设法前往三原联系。4月30日，尼姆到达三原，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她的密探，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踏上了苏区的土地。

她一到延安，就急着要见毛泽东。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在向世界介绍宣传他和中国革命方面，其贡献是可以与斯诺相提并论的。

毛泽东在尼姆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会见了她。陪同尼姆的王福时将他和斯诺夫妇合作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

尼姆是这样描绘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是待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神秘的统治权。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着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完全不像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像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的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尼姆告诉毛泽东说：斯诺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了整理斯诺采访资料的工作。她认为“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埃德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和其他几个人的简要生平。”

她还对毛泽东说：“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

尼姆后来曾说：“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啊！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摘要糅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地引用毛的讲话。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述革命经历一样。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平生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地认为，应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二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恐怕在我离开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重新跟他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平生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的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正是在整理斯诺的材料的过程中，尼姆萌生了来苏区的念头，她对毛泽东说：

“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它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和尼姆等人进行了亲切交谈。这次谈话记录后经王福时整理，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再说贺子珍此时在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习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她同其他学员们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毛泽东虽然搬到了凤凰山下的一个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二里路，可是住在学员集体宿舍的贺子珍除了星期日外，还是很少回家。

以前，他们夫妻俩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谁家烟囱不冒烟，谁家夫妻不拌嘴。再好的夫妻也免不了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这都很正常。那时候的毛泽东生起气来会对贺子珍来一点“政治威胁”，说要开除贺子珍的党籍，或者是给贺子珍一次口头处分。可事后他一冷静下来，又往往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笑着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儿响叮当。”贺子珍见他如此说也就破涕为笑了。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猜忌越来越重了。

一天晚上，毛泽东去拜访史沫特莱，恰好吴莉莉、尼姆正和史沫特莱在一起用餐。吴莉莉和延安其他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十分崇拜毛泽东。她在酒酣耳热之际，大胆地要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这一绯闻传到贺子珍耳朵里，贺子珍就非常愤怒地指责毛泽东是移情别恋。毛泽东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她心里掀起了狂涛巨浪，认为毛泽东变了，和在井冈山与瑞金的时候不一样了，因此，她的火气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次，贺子珍回家路过一个窑洞门口，看见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料到毛泽东一定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闯。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和他在一起的是史沫特莱和吴莉莉。三人谈兴正浓，个个神采飞扬。贺子珍见到这般情形，脑海里立时浮现出以前听到的那些传言，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屋子里本来热闹的气氛一扫而光，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性格活泼的吴莉莉想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没想到贺子珍嘴里说着“你少来这一套”，手上又甩带推，力气也大了点，一下子把吴莉莉推得立足不稳，几乎摔倒。吴莉莉立即嚷了起来，连哭带闹。史沫特莱看不下去了，就为吴莉莉抱打不平，对着贺子珍气势汹汹地指手画脚。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贺子珍也是气昏了头，对着史沫特莱就是一个耳光。没有劝架经验的小伙子一看这架势，本是想保护贺子珍的，却拉着了贺子珍的手。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在贺子珍的右眼上，贺子珍的眼睛顿时充血，黑了一圈。史沫特莱正要再次出手，毛泽东看不下去了，立时发了话，对贺子珍说：

“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

他又对史沫特莱说：

“你不能再打！有什么话，你对我说！”

说罢，拉着贺子珍就走了。此后，贺子珍的右眼肿得像个大核桃似的，无法出门，别人问她眼睛怎么啦，她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了。

不久，吴莉莉也因这次风波影响太大，无法再待下去了，便离开了延安。

欲知毛泽东与贺子珍后来的关系如何？请看后边的内容。

东方翁曰：贺子珍对毛泽东的误会，只要冷静下来，应该是可以消除的。以前斯诺在苏区采访时，她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表现得还是不错的。如今围着毛泽东转的是几个花枝招展的外来女人，她就沉不住气了。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通过外国友人向国统区、向全世界介绍苏区及领导人的真实情况，以打破国民党的谣言，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因此毛泽东才会竭尽所能处理好与友人的关系，花费大量的精力向他（她）们提供令外界震惊的宣传材料。严格地说，这都是党内的外交事务，毛泽东和外国友人及其助手谈话、活动的地方，都属于外务场所。身为党内领袖的夫人，以前在山村打游击的时候耍耍“小女人”的性子，打打闹闹，还属于夫妻之间的“家事”，如今在外务场所竟然对外宾大打出手，这就严重了。事后她还不思悔过，又一直闹下去，最终闹出了一个10年夫妻劳燕分飞、悔之终生的结果，岂不可惜！

**第19章**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

**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子弹，**

**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话说1937年4月25日上午9时，周恩来为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和副参谋长张云逸、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及4名警卫员，还有负责护送的西北保卫处特务队的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共计25人，乘卡车从延安南门兵站出发去西安。

卡车穿过红军防区三十里铺兵站，沿着盘山公路驶进距延安60多里的劳山北麓的湫沿山。这里山险林密，人烟稀少，豺狼出没，土匪横行。卡车转过峡谷，刚刚进入两山间的一段平地，突然从正前方传来“叭”的一声响。陈友才警惕地问：

“什么声？”

坐在车后边的警卫员刘久洲答道：

“像是放羊人的鞭子声。”

另一个战士说：

“不对，这里是高山密林，怎么会有人放羊呢？”

说话间，劫匪们的子弹如雨点般射来，射向驾驶室，射向汽车轮胎。车上部分战士牺牲，司机的腿部受重伤，鲜血直流。子弹又打穿了汽车的轮胎，卡车躺在了公路中间。周恩来当即命令：

“快下车，散开还击！”

他推开车门，跳出驾驶室，伏在前车轮胎后，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跳下车保护周恩来转移，命令陈国桥率战士们掩护。保卫处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精选而来的，个个英勇善战，可惜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陈友才已经被子弹打伤了腿，他命令警卫员刘久洲、陈贤仁、向三光、曹鸿都护卫周恩来撤下公路，向右侧树林转移。他自己为了吸引敌人火力，壮烈牺牲。陈国桥继续指挥顽强反击，又命令曹鸿都这4个警卫员先撤，曹鸿都非要一起打，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

“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

曹鸿都只好带人先撤，等追上周恩来时他的3个伙伴也都牺牲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住去路，曹鸿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向树林转移。

枪声惊动了驻守在附近山头的通讯班，他们急忙与步兵一连联络，但电话线早被割断。他们立即通过另一条线路直接向红军总参谋部一局值班参谋报告。毛泽东闻讯，没来得及戴帽子，鞋子趿拉着，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并下令总参谋长刘伯承集中机关与中央首长的坐骑，交由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集合警卫员前往救援。他还叮嘱黄霖：

“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西北保卫处处长周兴率领集结起来的部队火速奔赴劳山，其中有蔡顺礼集中起来的骑兵，有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的保卫处特务队骑兵排，还有延属军分区独立团和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集合的民兵等。

下午4时，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都5人徒步回到了三十里铺。

黄霖率领的警卫员们首先赶到三十里铺。随后，蔡顺礼、于桑带领的几十个骑兵陆续赶到。张云逸令黄霖护送周恩来等回延安，自己则立即率领一部分人马赶往湫沿山的伏击现场营救。

此时，劫匪已经散去，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持着作战姿势。还有刘久洲、温太林等4个重伤员一息尚存，立即被众人救起。张云逸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于桑带领战士们收殓了烈士们的遗体。

4月26日一早，周恩来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

4月27日，红军总参谋部在延安为壮烈牺牲的陈友才、陈国桥等烈士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萧劲光主持，张云逸致悼词。追悼会后，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宝塔山下。

接下来，周兴亲自布置了剿匪行动。

周兴，1905年出生于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父亲是做爆竹营生的。周兴年轻时做过染坊学徒，1925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入共产党，1927 年随朱德的公安局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周兴先后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侦察部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中，周兴任红1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后来，斯诺在采访毛泽东的时候问：“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再说周兴命保卫处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张丕谋在老沟了解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很少回家，行为反常，只有土匪“坐地大爷”李凤山来李青伍家中联络。张丕谋就秘密逮捕李凤山，审讯查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很快将土匪四面包围。土匪头子李青伍落网，这才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

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劳山事件之前还在三十里铺附近抢劫了东北军的车队。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商旅信息。周恩来出行之前，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便带人等候在湫沿山，劫掠财物。

4月底，红4方面军西路军的左支队余部到了甘肃、新疆交界处新疆一侧的哈密县星星峡。中共中央联络在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带领满载衣服、药品、食物的40辆汽车，赶往星星峡迎接这支尚存400余名红军指战员的队伍。

而此时的徐向前已经到达了援西军驻地。而陈昌浩则从河西民乐县花家寨回了他的湖北老家。后来他又在8月间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曾编纂了一部《近代世界革命史》。

1937年5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260人，列席代表74人。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动员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对日抗战。

张闻天首先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并通过了大会议程：1．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2．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共分3个部分：1、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2、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3、我们的领导责任；一共讲了20个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地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他明确地说：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他在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他说：

“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毛泽东还说，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可以做些让步，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当然“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

“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他在第三部分中讲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他说：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依现实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强调说，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陈独秀的尾巴主义。

在党代会期间，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带领着红军高级指挥员们去看望尼姆，为支持尼姆准备写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交给尼姆34份领导人的简单自传。此后，尼姆又对一些人进行了重点采访。

尼姆看得出来，这些活动都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是每件事的主宰。”

史沫特莱在会议期间则担任了红军指挥员们的舞蹈教师。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这样记述：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映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做这种努力，他配合我做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一次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5月7日上午，刘少奇在党代会上作了发言。

据刘子久回忆说，会上还印发了刘少奇的两篇文章：《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这两篇文章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不能不引起与会代表们的广泛注意。

原来，刘少奇曾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连从天津给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4封长信。他在信中强烈地提出：“我要求你们切实注意‘左’倾的问题。12月决议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则的转变，而在今天则是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甚至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结果。我和全国的事实都要求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

刘少奇已经认定，他所提出的反对“左”倾的问题已经不是日常工作性质的问题，而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将会“引起深远的结果”的大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左”倾错误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他写道：“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10年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已成了一种传统。”

他这样说仍嫌不够，接着又写道：“必须还得着重地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

这已经越出了对当前白区中“左”倾思想批判的范围，而扩大到对党的10年历史，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如何估价的问题了。他还写道：“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转变过去的错误传统，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觉得转变过去传统的必要。他们认为现在的转变，只是形势变更后政策的转变。他们满足于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还不知道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的。”“这些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

刘子久所说的会上印发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就是上述刘少奇那4封长信中的重要两封。这些信中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指责，对博古、张闻天等人来说，自然是一种严重刺激。

5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结论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它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在“讨论这些意见”时，谈到了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尔后，他又谈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关于干部问题，他说：

“在一个4亿5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迅速地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完成。”

此后，会议讨论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5月7日这一天，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们被拉到了新疆迪化（1954年改称乌鲁木齐），仅存的师级以上干部有：西路军总部参谋长李特，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五局局长欧阳毅，卫生部长苏静观，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5军政委黄超，红9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其中的李特和黄超在1938年初被王明污为托派分子，枪杀于迪化。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他们到鄂豫皖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4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张国焘甚至说，李特之死对他是一种“重大的刺激”，成为他“最后决定脱离中共”的重要原因。

5月10日，博古在党代会上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会议认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毫无疑义的是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而这一变更的关键，就是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宣布全国代表会议结束。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党代会结束后，由于会议期间印发了刘少奇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使得与会者及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30多位代表对白区工作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共中央决定接着召开白区工作会议。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工部长刘少奇出席政治局会议，对他准备提交给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作了说明。这个报告共分3个部分，其中的第1部分批评了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

张闻天对刘少奇提交的这份报告很不满意，当场宣布说，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第1部分暂不报告。

5月16日傍晚，罗荣桓和林月琴的新婚典礼在延安举行。35岁的新郎罗荣桓与新娘同属虎，比林月琴大12岁。

夫妻二人是去年相识的，那时林月琴22岁，端庄秀丽，人虽年轻却已经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经历。说来也奇怪，原先并不打算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的罗荣桓，自从与林月琴相见几次之后，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爱情是个非常甜蜜的东西，罗荣桓在恋爱的日子里常常夜不能寐。正值青春芳龄的林月琴，也为能找到罗荣桓这样又是大学生人又淳朴厚实的如意郎君眼睛里常常闪着异彩。

婚期定好后，林月琴把罗荣桓的旧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毯子用碱水洗干净，搭设了一张双人木床，加上从老乡家借来的一套老式桌椅，新房就算布置好了。远在西安的井冈山时期的一个老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人给罗荣桓捎来一袋子面粉。罗荣桓请几个炊事班战士全部擀成面条，招待客人。

结婚这天下午5点多钟，十几个客人及政治部的干事、警卫员、马夫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吃着罗荣桓、林月琴的喜面，还闹着要新郎新娘共吃一口面，气氛非常热烈。

婚后几天，罗荣桓奉命上了前线。又过了不久，据传在西路军中牺牲了的林月琴的前夫吴先恩（湖北红安县人，红9军供给部长，1955年授中将衔）回到了延安。消息传来，林月琴甚是尴尬，毛泽东亦震惊不已。他知道此事若处理不好，闹出矛盾，又会造成1、4两个方面军的不团结，不利于抗日救国大业。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林月琴叫来，听听她的想法。林月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招呼她坐下，又为她倒茶，亲切地说：

“你就是林月琴同志，打过仗吗？”

林月琴自豪地说：

“在4方面军，我有一营妇女工兵哩！”

毛泽东笑了，说：

“噢，还是个营长哩。你们结婚吃了什么？”

林月琴说吃了一顿面条。毛泽东笑着说：

“好啊，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毛泽东说：

“罗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他原则性强。他这个同志爱吃辣椒，你们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习惯？”

林月琴笑而不答。毛泽东说：“月琴同志，你们新婚不久，我就把荣桓派去前线，战事紧张，没得办法哦。你不会怨我吧？”

林月琴说：

“主席，我哪能怨你呢！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顾儿女私情？”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后认真地说：

“你前夫已回延安了，你准备和他和好吗？不过这是你的事，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我批准你去见见他，罗荣桓有意见我来解释。你同他商量后再告诉我，这样对你们3个人来说，都是公正、公平，也算仁至义尽。”

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诚恳地说：

“毛主席，他已让人带口信给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你说，我还该去找他吗？”

“拿得起，放得下，好哇！这样的同志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口说无凭，信以为实。月琴同志，是否让他将心里话写出来，白纸黑字，永难反悔呢？”

林月琴听了毛泽东的话，连连点头。不久，她见到了吴先恩，说明了自己的态度，二人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后来在1955年授衔时，林月琴被授予全军唯一的女大校。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中央会议厅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上海的代表等，共20多人。

这天上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只讲了第3部分的提纲。

5月20日及其以后，白区工作会议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激烈争论，先后有24人发言，多数人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批评，有的十分尖锐，集中反映在3个问题上：（1）关于对白区工作的估计。（2）关于对“左”倾错误的历史传统的认识。（3）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也有人不赞成对报告全盘否定，不同意某些过激批评。

会外，代表中对刘少奇不满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激烈。李雪峰回忆道：“少奇同志对过去工作作风的批评比较尖锐，语气重。”“因此，有些同志觉得我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辛辛苦苦在下面工作，怎么都错了？”李昌回忆说：有的人当时“嚎啕大哭，说以前死的同志白死了？”还有16个人联名写了意见书。吴德回忆说：“我们这个屋的大部分都签了字，我也签了名。显然，这是错误的。关于这件事，建国后，少奇同志见我时讲过：你那时还年轻，不懂得什么路线斗争。”

5月23日，周恩来、林伯渠携带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去见蒋介石。

5月24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蒋介石以个人谈话方式承认：1、开放言论；2、集中人才；3、赦免政治犯。

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5月24日这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要谈下列两个问题：

“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

电报中还说，中央要求周恩来拟定具体意见电告中央。

5月25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复电，在回电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又提出下列各点：

“1、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2、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可以并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4个师，1师长林彪，2师长贺龙、3师长徐向前，4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6个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也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5月27日，中共中央为迎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宣布白区工作会议休会。

5月29日下午5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一行18人，在涂思宗、萧致平率领下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陕北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是日晚，苏区政府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欢迎词。他说：

这次欢迎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与那时不同，民族危机比那时严重，因此，今天国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大的。过去10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民族危机严重，如果国共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考察团此来，使国共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致词中还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只是临时的策略。他说：

考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欢迎会，就是国共合作的表现。我们希望两党长期合作下去，并且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做。

毛泽东还说：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长的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章怎样写，共产党的笔已经在手里了。”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城南门外大操场召开五卅纪念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他还就某些人怀疑国共两党是否有诚意合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接待。此后，他们又先后考察了关中、甘肃东部的红军驻地。考察团表示，愿将苏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193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白区工作会议上的争论，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刘少奇、关向应、凯丰。

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刘少奇的报告和刘少奇3月4日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他准备了一个提交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取代刘少奇的报告。他准备提交的报告的第1部分中说：“四中全会后，犯了一些错误，然而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且对于这些部分的错误，都经过了自己的力量而克服与纠正了。”

6月2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发言，为自己作了辩解。他刚讲完，立刻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仍是不同意说党内存在着一个“左”的错误传统。凯丰说：

“少奇同志有许多地方说得过火，是由于对历史条件的忽略。”“我们说，在10年中，对于左倾是斗争过的，而克服了；克服而又发生又是一件事。对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都是坚决斗争过的，而且是克服过的，虽然有时没有完全克服，这是由于许多同志认为左倾比右倾好些，另方面，因为反对左又来一个右，因为要反对主要的右倾，所以对左不能不放松些。就是假定有这样的左，也不是不变的，有时缩小，有时扩大。在总的说有个传统是不对的。”

博古讲得更直截了当。他一开始就说：

“少奇同志的提法是：六次大会的任务没有完成，原因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我想，问题这样的提法根本不对。”“假如像少奇同志的提法，1917年前的苏联的党那就要认为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以组织的破坏而说过去都是错的。我们党过去有没有缺点？有。我同意洛甫说的6点，但不能说是一贯的左倾盲动关门主义的传统。如果这样说，那便认为我们是勃朗基主义的党。少奇同志的估计与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估计是相反的。我们的传统是革命的传统。我们只能说我们有过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有一线牵连的。”“我以为两重性的转变是对的。但少奇同志对后一种转变又有一个弱点，只看到左的，不看到右的。”

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7个问题：

1、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是因为什么？3、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4、少奇的错误。5、党的路线是否正确？6、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7、几个问题——合法非法问题，少奇过去的问题，今后对付这类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以上提出的问题中说道：

“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他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他也批评刘少奇不对的地方：（1）把问题扩大化一般化了；（2）非辩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观点是不对的；（3）过于强调了主观能动性，而主观指导也受着客观可能性的限制；（4）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还说：党在15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也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党内还没有克服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的提出来解决。

6月间，毛泽东鉴于王稼祥病情恶化，决定送他去苏联疗伤，还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护他到苏联去。王稼祥在贺诚陪同下经西安到上海，又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乘西伯利亚火车于7月抵达莫斯科。苏联医生从他腹部取出了折磨他4年多的弹片和腐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稼祥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进行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草案不屑一顾，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对周恩来说：

“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则共产党隐藏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共产党应避开实干，不要太大，不必力争目前不能实现的要求，以便将来发展。”“化多党为一党，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派均取消，加入这一党，党内是可以有派的。你们可以进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

蒋介石设计的方案是：由国共两党干部共同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成员由他指定，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将来视情况允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党，并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凄凄惨惨地说：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周恩来力争红军改编为4个师，45000人，地方部队10000人，工兵10000人，部队设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司令。

蒋介石说只给3个师的番号，45000人，在3个师上面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之。他还说：

“红军改编后，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周恩来提出了中共中央拟定的边区政府组成人员：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蒋介石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人士担任边区政府正职。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

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绝不让步，领导机关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坚持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据理力争。他们在谈判中明确告诉蒋介石：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作，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任何政党。”

不久，国民党派出高级参谋4人，副主任1人，到达西安。毛泽东果断决定：

“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

6月6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复会，由于毛泽东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扭转了对刘少奇不利的局面。张闻天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加进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评价的一部分内容。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结论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说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上海等地的代表，在谈话中强调了白区工作要深入群众、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提高。后来，他又根据白区工作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完整地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党的正确路线和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白区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6月10日这天，毛泽东在接见参加白区工作会议的上海等地代表后，又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列席会议。刘少奇说：

“关于华北党的政治问题已解决了，今天解决具体问题。”

毛泽东谈了宣传问题和组织问题。他说：

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来进行政治动员，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会议决定仍派刘少奇为中央代表，并改组了北方局。

再说在6月上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来到了延安。

彭泽湘，又名一苇、祖康、若愚、岳渔，1899年11月5日出生在湖南岳阳，1919年1月中学毕业后到了北京，6月考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赴俄赈灾代表团，12月经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介绍，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12月经罗亦农和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共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书记。1924年秋，他奉调回国出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5年8月接替王若飞任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主要从事军事统战工作，直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1926年9月，他赴沪出任中共鄂区区委书记。不久，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出任唐生智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唐生智向右转后，他奉命离开唐部，从上海转道苏联学习，1927年10月入列宁学院学习，1928年7月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秋回国，先后任上海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宣传部长、区委书记。他和前任何孟雄、蔡博真一样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后因不接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在1931年1月被开除党籍。他与逃到上海避难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活动，劝说19路军蔡廷锴联共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后，他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主持政府秘书处工作，1934年1月遭到蒋介石通缉，被迫逃往香港，与李济深等一起继续为反蒋抗日进行活动，并与人一起恢复建立第三党。1935年11月，他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书记。1937年春，他到北平从事抗日联合战线工作，同老朋友李锡九过从甚密，并结识了杨秀峰、张友渔、张东荪一批教授，李锡九告诉他说：

“毛泽东先生知道你到了北平，他请你到延安去一趟。”

彭泽湘闻言，非常高兴，欣然启程，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一路顺利到达延安，张闻天首先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延安饭店休息。第二天，毛泽东接待了他，初次见面，难免有一般礼仪上的寒暄，毛泽东说：

“欢迎你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你多住些日子。”

彭泽湘说：

“我向往延安已久，现在能到延安来，衷心感谢毛先生的邀请。”

从次日起，毛泽东连续4个晚上到延安饭店看望彭泽湘。他每次都带上一包前门香烟，同彭泽湘一边抽烟，一边恳谈。他分析了国家目前的形势，谈到了中国的历史，询问了上海、北平和两广的情况以及李济深、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彭泽湘反映了一些情况，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在交谈中，毛泽东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令彭泽湘深为感动和敬佩。最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彭泽湘在延安期间受到了中共中央的亲切款待，从政治思想上获得了启迪和教益。一个星期后，他要离开延安了，林伯渠送来了毛泽东书写的几封信，托他转交给北平的教授张东荪、郭大中、张友渔、杨秀峰等人。

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王世英说：

“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们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在上海的潘汉年说：

“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后来，彭泽湘于7月5日回到北平，向诸人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又召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华北局和北平市的负责人何世琨、王一帆、张云川、周惠生及其他全体干部、部分骨干开会，介绍延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谈到自己的亲身感受时，他说：

“我这次去延安见到毛泽东先生，开了眼界，很有收获。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我们，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要我们坚持抗日，中国人是可以打到底的。”

且说6月18日，周恩来等代表因国共双方谈判依然没有结果，就奉命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6月18日这一天，徐向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一些人埋怨说：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他一个光杆司令回来干什么？徐向前顶着巨大压力，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深知西路军的失败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徐向前，便爽朗地安慰徐向前说：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徐向前被毛泽东充满信任、关怀、爱护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思想包袱一下子卸掉了。

6月25日，毛泽东在何香凝托人送来的廖仲恺著《双清词草》的扉页，看到柳亚子为何香凝的“寒之友社”成员的作画题写的一首诗，对柳亚子顿生思念之情，便给何香凝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10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作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6月25日

毛泽东在信中称赞的老朋友柳亚子，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1929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居住，获悉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十分兴奋，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旗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人自注“两列宁”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是最早运用诗歌形式歌颂毛泽东的诗句。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协助何香凝组织国难救护队，担任副主席兼经济部长，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1932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柳亚子写下了《怀人三载》，诗云：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欲知毛泽东何时才能与老友柳亚子重逢，请读者诸君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刘少奇属于海归宗派主义小圈子里不被重用且受排斥的少数人之一。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人研究其原因，是否因其性格所致，不得而知。他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连给张闻天写了4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长信，向“左”倾宗派主义小集团发难，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引发了激烈争论和众人的围攻。毛泽东明白，彻底清算“左”倾路线的时机还不成熟，刘少奇这种不择时机的出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但他又不能丧失原则，于是便在政治局会议上抹了一把稀泥，既指出“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刘少奇的缺点，又肯定了刘少奇“基本上是正确的”，不但稳定了推动全民抗战的大局，而且也改变了会议不利于刘少奇的局面。同时，他还不动声色地送王稼祥去苏联就“医”，一来治病，二来寻找机会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内的真实情况，其良苦用心恐怕是政治局里其他人都想不到的。后来在全民抗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彻底斗败了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后，他才下定决心，彻底清算党内“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的影响，从前方召回刘少奇，与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党内3人领导核心，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这整个过程无不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胆识和非凡谋略，这也正是他和刘少奇的重要区别之一。

**第20章**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

**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

**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话说1937年夏，美国记者尼姆送给毛泽东一个提问的长单子，一连作了几次访问。毛泽东对尼姆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许多是请求解释一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问题。他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

“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

毛泽东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尼姆：

“你的意见是什么？”

他的反问使尼姆有些不安。后来尼姆才明白，毛泽东真的是想知道，对这些问题，像她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毛泽东安排时间让尼姆做了一次采访，以表示友好。尼姆采访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欣赏智力的挑战，他知道尼姆学过黑格尔，在尼姆的采访中同她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愿意和尼姆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使尼姆非常高兴。尼姆心想：“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令尼姆遗憾的是两天后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毛泽东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个共同写作的计划便无法再继续下去，只好让他的助手吴亮平还有张闻天帮助她去完成其余的部分了。

1937年7月7日，蒋介石电邀中共中央代表博古、林伯渠、周恩来上庐山谈判国共合作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再次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又派南汉宸以红军代表身份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其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北京西南丰台紧靠卢沟桥（亦称芦沟桥，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

下午7时30分，日军开始在该地带演习。

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在演习中“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守城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

晚零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来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宛平城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的军队，并认为其“失踪者”已经进入宛平城，要求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

“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驻守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日本军国主义何以如此猖狂？中国的军事力量果真不能抵御侵略者的进攻吗？请看事实：在1937年这一年，国民政府的军事和国防建设费用已经达到了13.7亿元以上，占财政总支出的65.5%。到7月份为止，中央军已经整训了50个步兵师，每个步兵师下设两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1个野炮兵团，加上工兵、辎重、卫生、特务等兵种，每师计13854人，马3508匹，各类火炮84门，并配备了坦克等重型武器。同时，中央军将空军整编为9个大队，全国设262个机场，拥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军事工业也有了显著发展，已经能够制造德国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仿法国式迫击炮及各类炮弹。加上其它各地军阀的武装力量，应该说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了。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完全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出现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文如下：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7日夜10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地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29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7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贺 龙

林 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7月9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等红军指挥员的名义，起草并发出《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通电》，全文如下：

庐山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汪主席，太原阎副委员长，并转国民政府各院部长，西安行营顾主任、何副主任，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钧鉴，各省军政长官勋鉴：

日本法西斯蒂肆其侵略故智，惹起虞晚卢沟桥宛平事变，杀伤我国军民，强占我国土地。此种盗匪行为流血惨剧，不特破坏国际信义，且为日寇侵占华北之信号。证明日寇灭亡我国之野心变本加厉。我冀察当局及29军将士为自卫而抗战，誓保国土与城共存亡，忠义勇烈，不愧为我大中华民族之男儿。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谨此电闻，翘待钧命。

　　 彭德怀 贺 龙 刘伯承 林 彪 徐向前 叶剑英 左 权

萧 克 徐海东 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叩

7月13日，延安各机关共产党员与工作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７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党内指示中说，当前我们工作的总方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推动国民党蒋介石彻底转变政策，促使其下决心进行抗战；另一方面我们共产党和红军自己要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的步骤。

接着，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去他的亲笔信，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同时，他指定张云逸奔走于国民党两广当局：“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

他还与张闻天致电叶剑英，要他与救国会及各方面联系，“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7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任弼时等下达“10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要求红军各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时命令红军各路领导人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集中，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前线参战问题，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向他们传达中央决定和红军的任务。

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面交给蒋介石，要求尽快公布，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再次重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就红军改编与国共合作等问题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这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起草于7月4日，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地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地党部：

日本已发动大规模的进攻，29军正英勇抗战，华北各地救亡运动正在扩大起来，中国政府正派兵增援。根据上述情况，为执行本党7月8号宣言所述坚决保卫平津，同日寇血战到底之总方针，各地此时最紧急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如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各地党应即派出适当人员出面，向当地党政军学警商各界接洽，组织这类团体。如此种统一的组织一时不能得到多数同意，可先发动各界组织各自的救亡团体。同时宣传组织统一团体之必要，以待时机一到，即成立此项组织。如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加入此项组织，即先由人民方面各团体发起自行组织，而要求国民党当局批准立案。如国民党方面号召组织这类团体如北平市各界联合会，则我们即可加入工作。对国民党每一抗战的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坚决反对挑拨离间的阴谋。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取得信仰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对各界中之纠纷，共产党员应以调停人之资格，出任和解。总之为求得迅速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执行坚决抗战保卫国土的总方针，各地组织及同志应以无限的热忱及毅力，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完成中央给你们的使命。

中央书记处

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10天了，蒋介石一面与日寇继续谈判，一面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的谈话，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他说：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在谈话中还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7月17日这一天，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蒋介石坚持将红军改编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的参谋长、所有副职均由南京委派；管理教育必须属于国民党军队行营；师上面只许设政治部指挥军队，由周恩来为主任，他的亲信康泽为副主任；要求朱德、毛泽东出洋。

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毫无效果。同时，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借故拖延发表，后来一直拖到1937年9月22日才由中央通讯社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题发表了这个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又发表谈话，说明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7月18日，延安抗日救国会召开社会各界声援平津抗战将士大会。

这一天，天气很好，数千人聚集在宝塔山下。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首先请刚刚来到延安准备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介绍平津的情况。刘澜涛讲了华北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以及日寇对平津、华北侵略的种种暴行。他还说：

“必须坚决抗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

刘澜涛讲完后，毛泽东同他亲切握手。这是刘澜涛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接着，毛泽东在大会上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最新情况。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尔后大声疾呼：

“不起来抵抗，就不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幻想，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日子到来了！”

据报载：毛泽东的“演词激昂，听众均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大会通过了致29军将士电，会后还举行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示威游行。

7月20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情况的汇报后，在复电中明确指示：

“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的方针。”

此一时期，党和红军内部出现了新的右倾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早在1937年春，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3团团长兼政委何鸣与国民党驻军157师谈判达成协议，将红3团1000余人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兼政委，卢胜任副大队长。7月16日，157师以集中点验发饷为名要求红3团集中到福建漳浦县城孔庙。红3团在何鸣带领下未作任何戒备即全部进入操场集合，随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缴长短枪540余支，绝大多数人被遣散，特委书记张敏等13人被害，只有副团长卢胜率领数十人突围成功。这就是“漳浦事件”，又称“何鸣事件”。

何鸣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庐山与南京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林伯渠、博古，要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使之责令制造事端的广东军阀余汉谋交还何鸣部枪支。

7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卢沟桥事件正在扩大中。日本政府已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大批日军正由日本朝鲜满洲伪国输送来华，这是日寇直接武装占领华北的整个计划的开始，其首先目的是在直接占领平津。

二、29军将士对于日寇的进攻，到处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其最高将领宋哲元，张自忠等则在动摇中。他们企图以对日让步来保持他们在平津及冀察的地位。但他们的这种倾向将遭受29军将士及华北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三、在日寇进攻开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从新开始大规模的酝酿与发动，到处发生着援助华北的行动，组织着各种救亡团体，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动摇妥协。许多国民革命军将领及国民党地方党部公开通电同情抗战，要求抗战。

四、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氏对于此次事变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军事上亦已调动军队向河北晋绥边境集中增援并已下令全国准备应战。但是否已最后放弃暂时妥协的企图则尚属疑问。南京亲日派势力，采取隐秘的方式活动着。

五、国际上英法对中国虽表示某些同情的论调，但他们不赞成中国今天实行全国性的抗战，希望中日妥协。他们这种态度，客观上将有利于日本。美国还保持着静观态度。苏联正在严密注意事变的发展，加强远东的防卫与警戒。德意正在西班牙以新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响应日本。日本法西斯蒂有可能向苏联同时实行挑衅，以引起德意向苏联的进攻，以造成世界大战。

六、我们认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挽救平津与华北与全国免于沦亡的唯一出路。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但这种妥协对于中国完全不利，它只能把平津华北葬送给日寇作为以后继续侵略的有利阵地。

七、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这一总任务下我们主张：

（甲）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乙）全国人民总动员，立刻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丙）全面地抵抗，不但要在军事上实行抵抗，而且必须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丁）统一地积极地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戊）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

八、在全苏区必须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进行援助抗战将士的运动，并号召全苏区人民与红军指战员准备立即抗战。红军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准备立即向华北出动，执行对日直接作战的神圣任务。

中央书记处

7月22日晚，彭雪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拜会阎锡山。彭雪枫问：

“我红军即将入晋开赴抗日前线，阎主任准备如何指挥晋军协同作战？”

阎锡山说：

“此事我已反复考虑，拟用两个原则：1、事先商量。2、临时拟定计划布置，即时通报贵军，由贵军自行酌情行动。”

阎锡山说罢，也郑重其事地问彭雪枫说：

“将来平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贵军是否南下？或采取适当战略？彭将军现在不必回答，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先生及延安诸公考虑。”

第二天，彭雪枫将与阎锡山会晤的结果电告毛泽东，并报告说：阎锡山欲赠我军七九子弹、中正子弹各50万发，冲锋机关枪200支，并为驻晋办事处配备汽车。

7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操坪上给学员们作报告，他说：

“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看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着毯子走。延安不需要你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

7月23日晚，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他首先重述了抗战的正确方针，同时又指出：

“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为着实现坚决抗战必须采用的正确办法，即“八大纲领”：1、全国军队的总动员。2、全国人民的总动员。3、改革政治机构。4、抗日的外交。5、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6、国防教育。7、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8、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他分析了中国的“两个前途”：一个是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用“八大纲领”的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退让的方针，采用与“八大纲领”相反的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此一时期，毛泽东还在做着另一件大事，就是在这7月间和后来的8月间，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教育全党，克服存在于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他在每一次课后，都要组织学员们认真讨论，尔后还要补充、完善一下授课大纲。如是者多次反复，他对哲学基本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创造性发挥，为这门深奥的哲学理论通俗化、平民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在《实践论》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法，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且说在7月26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根据毛泽东7月20 日“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的指示，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7月27日，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达西安时，中共中央要他们“即去云阳（红军主要指挥员大多在此——笔者注）商定改编”事宜。在这一指示电中，中央还提出可以将下列各点请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达给南京的蒋介石：

“（1）8月15号则编好，20日出动抗日；（2）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3）3个师4.5万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4）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5）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6）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此时，彭雪枫再晤阎锡山，向阎锡山提出红军向山西开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建议，阎锡山表示赞成。他要彭雪枫转告毛泽东：

“请求贵军会合进军1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

7月28日，阎锡山复信给毛泽东说：

“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及先生抗日主张，至为敬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为日寇攻陷。

7月31日，阎锡山会见彭雪枫，他说：

“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1937年8月1日，延安召开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作演讲。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来了！平津失守了！如果我们还不动员起来抗战，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苏区是全国抗日模范区。在这个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指国民党当局——笔者注）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动摇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做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我希望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对于这个悲痛的教训，有所警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

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8月1日这一天，“抗大”第3期举行开学典礼。这一期学员共有1372人，其中有红军干部616人。

8月3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就蒋介石8月1日通过张冲急电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一事，确定赴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需要解决的问题：（1）发表国共合作宣言；（2）确定政治纲领；（3）决定国防计划；（4）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5）红军作战方针。

从8月3日起，大批人员从延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一天晚上，张爱萍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叫他去一趟。张爱萍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问他在抗大的工作怎么样？还有没有其它想法？张爱萍说：

“我还是想到前线去。但我绝对无条件服从组织上安排。我现在是边学边教，边教边学，这的确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只是感到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不像过去那么有信心了。”

“学然后知不足嘛。”毛泽东说：“觉得自己懂得少，是好现象，是进步的表现。只是不能以此减弱了信心。学识是无穷尽的，要活到老学到老。”

接着，他向张爱萍传授了读书的方法和技巧。

隔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张爱萍送来一封信，叮嘱张爱萍不应该感觉到自己懂得少而降低信心。他在信中还说：“一般地讲，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末了，毛泽东还叫张爱萍再去他那里一趟。

张爱萍不知毛泽东还有什么安排，要谈什么话题，便一溜小跑赶到了他的窑洞。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今天叫你来，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

张爱萍以为毛泽东是在试探他，便坐下来望着毛泽东，只是笑，没有说话。

“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

毛泽东非常认真。张爱萍兴奋地问：

“真的？去哪个部队？”

“怎么样，你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吧？”毛泽东笑着说：“到上海去。”

张爱萍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他想离开抗大是为了到部队去，到前线去。而到上海又是干地下工作，就像“犍牛掉在枯井里”。他说：

“我不愿意到那里去。”

毛泽东说：

“到那里不能甩开膀子干是吧？不哟，同志！那里很重要，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领它，我们必须加强那里的工作。我们要成立浙江省军委。你去当军委书记。现在浙江省委书记刘晓同志在那里，你去协助他把省军委组建起来。”

张爱萍还是不愿意去，嗫嚅道：

“我有困难，干不了。”

“干得了，干得了！”毛泽东说着扬了扬右臂：“我们研究过了，你在那里做过秘密工作，你去最合适。”

接着，他详细分析了日本人必将进攻上海、蒋介石则一定会撤逃的原因；还讲了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说明张爱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在市郊区开展游击战争；最后问张爱萍还有什么要求。话说到这个份上，张爱萍再推辞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了，便提出要带几个人一同去。

“可以，可以。”

毛泽东满口应承着，当即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明此事。罗瑞卿在电话那端说：

“让爱萍自己挑，他要谁给谁。”

张爱萍后来回忆说：“几天之后，我同余立金、彭林、吴克华等同志离开了延安，奔赴上海。途经西安时，便听到上海打响了的消息，更加钦敬毛主席高远的战略眼光，从而进一步感受到肩头上的重负。”

且说8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

8月6日，延安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致闭幕词，他说：

“运动大会精神很好，我们应该把这一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每个人民中去。因为我们体育运动应该是大家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要唤起民众坚决打日本，坚决抗战是要每个人民参加的，正好像体育运动也要大家参加一样。”

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

“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这一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各部队中去。”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的代表姚琮及何应钦、顾祝同、邵力子、张冲等百余人的隆重迎接。

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从此公开活动。

8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举行谈判。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南京代表坚持由国民党派去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坚决拒绝，双方激烈争执。国民政府代表康泽回忆说：双方“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

8月13日，尼姆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的10点主张告诉了她。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睛里闪着光亮，他说：

“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10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

毛泽东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给尼姆留下了深刻印象。尼姆对毛泽东的评价是：

“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是忍耐——他一直等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8月13日傍晚5时，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下令全军进入战斗状态，严密警戒。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不和南京政府谈和平，要严厉惩罚南京政府，当晚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下令：“第二空袭部队对南京、广德；第三空袭部队对南昌；第十战队及第一水雷战队飞行机对虹桥机场予以突袭。”当夜，**日本近卫内阁**召开临时会议，决定陆军派兵上海；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断固膺惩”南京政府。由于东海台风，日本海军对于中国各地的空袭延迟至8月14日开始，首先袭击了杭州、广德。8月14日，中国空军对上海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实行了轰炸。这一事件被称为“八一三事变”。此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的淞沪会战开始。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于12月23日离沪赴香港。

8月14日这一天，蒋介石鉴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这才发表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书》中说：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

同时，蒋介石对内也做了让步，他发表讲话说：

“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欲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竭诚接纳。”

8月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将全国划为4个战区：平汉、津浦两线为第1战区，蒋介石任司令长官；晋察冀为第2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江苏、浙江为第3战区，顾祝同为司令长官；闽粤为第4战区，余汉谋为司令长官。

8月中，中国文协主任丁玲和文协的吴奚如响应毛泽东关于文学家也应到前线去、配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号召，准备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由于参加的人多，后来扩大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巡回演出。

丁玲和吴奚如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正副主任。丁玲思想准备不足，她认为，让她这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是不合适的。毛泽东在和她研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针时，几次和她谈话，毛泽东说：

“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线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要向群众和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的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他兴致非常高，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就找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面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

丁玲连连点头称是，又问毛泽东：

“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不清楚，让他们去前线是否合适？”

毛泽东说：

“这不要紧。对他们，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不要有成见，更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帮助他们。”

丁玲说：

“明白了，主席。但现在我们的节目还不晓得怎么搞才好。”

毛泽东说：

“宣传要做到使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

由于史沫特莱的勤奋工作，受到共产党人的好评。毛泽东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提出要丁玲向史沫特莱学习。

此时，尼姆也打算去前线当战地记者，她就此事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起初怀疑她能否胜任这种工作，后经尼姆反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写一封证明信，把她介绍给前线的邓小平。

再说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出发前汇报演出。丁玲亲自登台，在诗人张天虚的新剧《王老爷》中，扮演剧中一个红军工作人员。

此前，中央领导人如果看戏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再从前台跳下去就座。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了不影响演出，不影响观众，立新规树新风，在演出中禁止其他任何人从后台上前台下。这一次毛泽东迟到了，工作人员既兴奋又为难，兴奋的是毛泽东不请自来，为难的是谁也不敢让毛泽东从后台进去，只好硬着头皮向他汇报了团里的新规定，让他等到这个节目结束后再从前台下去看戏。毛泽东一听，笑嘻嘻地说：

“好嘛，遵守你们的规定。”

于是他就站在一侧看演出。就在此时，丁玲身穿着原来的一身灰军装，系皮带，打裹腿，也没有怎么化妆，只在脸上涂了一点油彩，门帘一挑就上了台。台下有不少机关里的观众平日里和她都很熟悉，见她出其不意地上场亮相，轰地一声炸了窝。丁玲偷眼一瞥，看见台下一张张笑脸盯着她，一下子懵了。

毛泽东听到丁玲在台上的道白和台下的笑声，忍不住走到台前一角，从侧幕的缝隙中望望台上。丁玲一脸的窘迫样，说台词也是很重的湖南口音，看着她这本色的表演，毛泽东不禁哑然失笑，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丁玲哇，这个丁玲——”

丁玲表演完了，下台时看见毛泽东正站在戏台侧幕旁边注视着她，更觉得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却笑呵呵地对她说：

“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在晚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下去。”

丁玲代表西北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誓，她说：

“我们的服务团虽小，但她好像小河流水一样，慢慢深入大河，聚汇成若干河的水，变成一股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流中。我们要誓死打倒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各位见面。”

8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甲、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

（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

因为彼方的一再拖延，致使党与红军至今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当此国难极端严重，要求彼方迅速解决上列问题。

乙、要求国民党迅速承认并立即实行下列各项，使红军得着必要基础，以便迅速出动，有效的作战。

（一）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二）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但此项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三原补充，一部分在太原补充）；（三）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五）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并使用兵力；（六）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韩城渡河前进）；（七）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交阎百川节制。

上述7项如不迅速决定，将使红军处于不利地位，有利于日寇而不利于抗战。

丙、请依据上述10项与国民党谈判，务求实现。

中央书记处

8月18日这一天，国共南京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原来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严重受挫，蒋介石这才被迫对共产党方面做出让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共45000人，军中一切职务均由中共方面自行安排。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了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18集团军的番号。”

再说8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党员，经过交涉，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3人当天获释。随后，陶铸、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等也都获得释放。

8月21日，周恩来、朱德离开南京前往西安，谈判中的未竟事宜交由叶剑英等继续交涉。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北的冯家村红军指挥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他们是：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博古 朱德 任弼时 关向应 凯丰 张国焘

出席会议的还有红军和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是：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林育英 林彪 聂荣臻 罗荣桓 张文彬 萧劲光 林伯渠 徐向前 周建屏 傅钟 周子昆

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的议程是：1、政治任务问题；2、军事问题；3、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

（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他还提出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原则，这就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建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是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张闻天在补充报告和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周恩来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

接下来，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林育英、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等人都发了言。

大家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和原则，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表示疑义，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恩来、林彪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有的人提出红军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不同意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陕甘宁边区要留守备部队的主张；有的人还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队指挥上要多集中。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来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常委会议还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由周恩来任书记。

8月24日，毛泽东就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做总结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还说：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抗战爆发后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原则分歧，这次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

8月25日，洛川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把他7月23日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八大纲领”，发展成为著名的“十大救国纲领 ”，这就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日本租界。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洛川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育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这11个人分别代表了党和军队的方方面面：徐向前来自红4方面军；任弼时、贺龙来自红2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来自红1方面军；周恩来、林育英、刘伯承、叶剑英来自原中共中央机关。

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萧劲光为总参谋长，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同意党的政治路线，愿意做点实际工作。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欲知洛川会议后红军如何实施改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对日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原则后，特别是针对后者强调了“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不少领导人对他在这两方面的科学论断都提出了疑义。**彭德怀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恩来、林彪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有的人提出红军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不同意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陕甘宁边区要留守备部队的主张；**有的人还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队指挥上要多集中。**由此不难看出，党内依然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苗头。这些错误后来不但没有被纠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在军事上表现为“百团大战”，在政治上表现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都险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有些人至今对延安整风颇有微词，那就请他们从此处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是如何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吧！

**第21章**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

**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话说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全文如下：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1军团、15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115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1938年3月在山西携款潜逃，不知所终——笔者注）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

第2方面军、28军、27军等部（包括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前委直一部——笔者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

第4方面军及29军、30军等部（包括陕甘宁独立1、2、3、4团——笔者注），合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副主任。

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以上3个师共有6个旅15个团：

115师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政委萧华，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辖第685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兼政委邓华；第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第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陆绍武。辖第687团，团长张绍东（1938年叛变投敌），副团长韩振纪，副团长田守尧（1943年牺牲）；第688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

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黄永胜；教导队，队长孙毅；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留守处，主任陈先瑞。

全师共计15000人。

120师下辖：第358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兼副旅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辖714团，团长顿星云、政委彭得大、参谋长张新华；715团，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参谋长喻楚杰；716团，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参谋长刘子云；第359旅，旅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刘子奇；辖717团，团长刘转连、政委刘礼年、参谋长陈松岳；718团，团长陈宗尧、政委罗章。

120师教导团，团长彭绍辉、政委冼恒汉、副团长苏启胜；留守处，主任贺晋年，副主任王兆相。

全师共计14000余人。

129师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辖第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第770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辖第771团，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第772团，团长叶成焕（1938年牺牲），副团长王近山。

129师师教导团，团长张贤约，政训处主任袁鸿化（1943年牺牲）；留守处，主任阎红彦，副主任甘渭汉。

全师共计13000余人。

另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韦杰，代团长黄鹄显，政委邱创成。

以萧劲光任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有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共计4000余人，保卫陕甘宁边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校长兼政委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傅钟。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了就职通电。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一经传达，一枚枚的国民党帽徽摆在了红军指战员面前，它将在一天之内全部戴在他们的头上。很多人想不通，也有的拒不换装。总政给全军指战员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的奖章，又经过各级领导细致的思想工作，战士们才收起红军帽徽，不少人换装时还是流下了眼泪，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在八路军前方部队设立军委分会，受中央军委委托，为华北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任弼时任秘书长。在各师设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领导。

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途经西安准备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等人说：

“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量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

1937年9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附近的杨家湾正式创立，简称“陕公”。由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党组书记兼关中分校校长，李逸民任副校长，邵式平任教育长，周纯全任生活指导主任，袁福清任教务处主任。

毛泽东亲自为“陕公”制定了校训：“忠诚、团结、紧张、活泼”。他还审定了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校歌。

“陕公”是按照洛川会议期间的决定成立的一所特殊的新式学校，从8月下旬开始招生，9月1日这一天编班上课，学员有5个班，约300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

中共中央明确规定：“陕公”是党领导的、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日干部为目的的干部学校。对学员施以短期的革命训练后，分配到实际工作中去。普通班学习时间3至4个月，高级研究班为6个月。学校还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如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哲学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为了更好地管理学校，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有各方面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的董事委员会，成员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高岗、张仲实、成仿吾等。

9月初，尼姆离开延安。毛泽东在她临行前告诉她说：

“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

后来，尼姆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被称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姐妹篇，中译本曾名为《续西行漫记》。1949年尼姆同斯诺离婚后一直住在美国。她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条件下，写出了17部书稿，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有关的。她的一位朋友问她：“你的这些书稿都不能出版，你还要写下去吗？”尼姆坚定地回答：“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写的，我是为后世写的。”

与尼姆一起离开延安的还有史沫特莱。此时史沫特莱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采访朱德，准备为朱德写一部传记。她认为中国人十有八九是农民，而朱德是农民的代表，写出了朱德也就是写出了中国的农民。“七七”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的传记和上前线去写战争，哪一件更重要？”

毛泽东告诉她：

“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重要。”

于是，史沫特莱就离开了延安，带着伤病前往华北前线。此后她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美国治疗。她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1943年，她出版的《中国的反击》一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当她在伦敦逗留期间，不幸因病去世。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按照她生前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竖立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这正是：异邦巾帼，万里奔波，为主义不分国界；

域外芳心，如铁如磐，留汗青魂系中华。

且说9月初的一天下午，5时许，毛泽东到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道奎和朱德崇等人被隔离的地方来看望他们。他跟着一位秘书大步走向许世友等人，身后还有四五个人远远地站着。许世友自然是认识毛泽东的，其他人却都不认得。毛泽东问洪学智等人：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洪学智等一个个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又问他们身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他们都说很好，在这儿的生活比在抗大时好，天天都吃大米饭，还有白菜哩。寒暄过后，毛泽东把话头转入正题，问道：

“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

众人都不作声。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还有顾虑，就说：

“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过去有一些人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

许世友等人听明白了，也相信了毛泽东所说的话，大家都很感动。毛泽东又问他们：

“平时都做些什么，学了些什么？”

众人回答说，教员来讲了课，解答我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平时还看点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见他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便趁机说道：

“你们想出去工作吗？你们想出去工作，马上就可以在边区分配工作。”

洪学智却说：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继续学习，过去战争年代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太少，很需要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毛泽东又问其他人：

“你们还有要工作的吗？有，可以出去工作，不一定一起走，可以陆续分配。”

他们都说没有，现在需要学习，要补理论这一课。毛泽东便说：

“要学习，这一期不行了，马上要毕业了。你们要学习，就得到下一期了。”

众人说下一期也可以。毛泽东当场拍板，让他们等到下一期继续到抗大学习。

不久，许世友等人就全部被释放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平了反。”重获自由以后的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他们不仅是抗大第3期的学员，也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许世友担任抗大校务部副部长；洪学智担任抗大1支队支队长、第4大队副大队长。王建安在第3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詹道奎在第3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第10大队政治处主任。

9月2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上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跟着朱德高声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此后，在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开始前，八路军的指挥员们正三三两两聊着天。朱德和刘伯承也显得特别开心，摄影记者徐肖冰急忙抢镜头。刘伯承对着徐肖冰伸出一只手，说：

“你拍我们两个？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是对头，曾经交过手的？”

徐肖冰一门心思在取景，随口问道：

“是下棋，还是打球？”

“下的啥子棋哟，我们是真枪实弹交过手哩！”

刘伯承那只好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徐肖冰感到非常惊讶，便放下照相机问道：

“真的？开玩笑吧？”

“哪个跟你开玩笑，你问总司令。”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要得。打过几仗。”

刘伯承笑着问徐肖冰：

“你说我们两个，哪个能打赢？”

徐肖冰看看两位大领导，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信你们俩会闹误会。”

“你不信我，你还不信总司令？”

朱德微笑着解释：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四川，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军阀部队。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也不懂马列主义。我们是‘各为其主’，打过几仗。”

徐肖冰见他这样说，忍不住好奇地问：

“谁打赢了？”

刘伯承指着朱德笑着说：

“总司令打了6个月的胜仗，升为精锐混成旅旅长，名震天府。可是我刘伯承打败了他，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

徐肖冰听得目瞪口呆，觉得这玩笑在大庭广众之下未免开得太大了，没想到朱德却乐呵呵的，说：

“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因为我的部队纪律还不好，跟当地老百姓关系不好，我们驻了5年就返回了云南。那个时候没有共产党，不懂马列主义。打仗不光是要讲战术，更要讲人心。”

刘伯承也笑呵呵地说：

“那个时候你要有了马列主义，我刘伯承就该倒霉了，非捉了俘虏不可。”

徐肖冰见他二人笑得如此开心，瞬间便按下了快门。

9月3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到陕西潼关，坐船过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派秘书梁化之到风陵渡迎接，周恩来等随即乘小火车北上。

此后一直到1937年11月25日，周恩来因为要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回到了延安。

9月4日，毛泽东给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发电，告诉他说：

“此间组织战地服务团，丁玲为主任，共50余人。决定由延安过河，经吉县、太原到红军服务。请交涉沿途通过事宜。”

9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代表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抵达太原，会见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

9月5日晚，在延安的延河边发生了一桩震惊陕甘宁边区的“情杀案”。杀人凶手竟然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年轻指挥员黄克功，而被害者则是一名少女，名叫刘茜。

黄克功，年26岁。他在少年时代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立过大功。他担任过师宣传科长、团政委、旅政委。到延安后，黄克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第2期第15队队长。

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早年在山西太原市友人中学读书，思想进步，曾担任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负责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一路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15队学习。刘茜不仅年少貌美，而且能歌善舞。

延安的女青年们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进入抗大第15队学习的刘茜，很快便爱上了年轻帅气的队长黄克功。二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之后便公开了。陕北公学成立后，抗大第15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3期第6队队长，刘茜仍留在陕北公学，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生嫉妒，又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对他不忠诚，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于是便多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

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拒绝结婚。她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这态度永远下去好了！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刘茜强调了爱情的共同基础，她写道：“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地来了，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对于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刘茜认为：“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

此外，两人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交友问题上。黄克功认为刘茜“随处滥找爱人”。而刘茜则辩解称：“我们像亲兄妹一般地过着生活来到延安，但我们是同学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我们一块儿游山玩水，一块儿打球，一块儿讨论，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现在仍是那般的。”

黄克功觉得“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他不甘心结束这段恋情，就在9月5日那个月明星稀的晚上，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言语之间强迫刘茜答应与他结婚。遭到刘茜拒绝后，黄克功说刘茜不忠贞，刘茜却说双方都有另找爱人的选择权。两人的口角越来越厉害，黄克功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威胁刘茜，逼婚未遂，便完全失去理智，对准刘茜扣动了扳机，“砰，砰”两声，刘茜应声倒在血泊中，年仅16岁。

事件发生后，罗瑞卿将黄克功逮捕入狱，并将案情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赶到抗大研究处理意见，他神色严肃地说：

“我们正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

边区高等法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以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审判庭，审理此案。在审判庭调查审理此案期间，国统区的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将这个案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满。延安各界及广大军民也是群情激愤，舆论纷纷。

9月6日，陕北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拒绝国民党方面派遣任何人参与。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9人组成边区政府主席团，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国民政府承认划出陕西省的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旧称葭县）、清涧、吴堡，甘肃省的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宁夏的盐池、神府、关中部分地区，一共有25个县市，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之募补区。

9月7日，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赶往代县太和岭口阎锡山行营指挥部，与阎锡山会谈。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客人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9月4日关于“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与阎锡山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谈。双方商定：

（一）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二）在第二战区行营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发动群众，不干涉县政；（四）国民政府给红军补充的物品，二战区兵站帮助运输。

阎锡山还向中共中央代表扼要介绍了大同会战预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并建议周恩来等去大同见见傅作义。

是日晚，周恩来一行到达大同，同傅作义谈了两三个小时。傅作义表示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

9月7日晚，毛泽东撰写了短小精悍影响深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全文如次：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做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1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2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3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4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5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6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处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7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8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9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10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11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11种。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9月8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等，说明西北战地服务团动身时间和行程，要求办事处派人携通行证到吉县迎接。

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名致电林伯渠，全文如下：

伯渠：

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3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3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洛 毛

9月10日这一天，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致电毛泽东说，根据湘鄂赣边区游击队在武汉的谈判代表刘玉堂、黄耀南的电报和书信报告得知，他们在与国民党谈判改编问题时，已经允许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在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抗日军第1 游击支队”中安插副司令、参谋长、副官主任、军需主任、副官等6 人，且防区有一部分与保安团混驻一地。

毛泽东当即复电林伯渠说：

“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兄不待董（指董必武——笔者注）到即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董老已在中部途中。请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湘鄂赣省委和军区主要负责人，抗日军第1 游击支队司令员——笔者注）换任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董老到后，坚持下列原则：1、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个人。2、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混杂，不争移驻大地方。3、一定的足够的饷款。4、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

后来，湘鄂赣省委在董必武指导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纠正了谈判中出现的失误，对国民党军派来的人，或用下层群众反对的办法予以驱逐，或将其束之高阁般地孤立起来，或用其它办法迫其辞职，最后使他们全部离开了游击支队。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的番号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正、副总指挥改为正、副总司令。

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嘱咐他“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并强调说：

“这一方针的基本原则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9月16日，毛泽东复电给正在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他说：

“我3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拟以115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中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120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129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6日，日军一部从山西天镇南下广灵，关东军由蔚县西进。阎锡山拟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并希望八路军115师参加作战。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聂、雪枫：

（甲）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

（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丙）请你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

（丁）115师现到何处？

毛 16日

林彪复电毛泽东说：

“想以陈光的第343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

9月17日，日军沿平汉、同蒲西路，向国民党华北防线的恒山支点合围。毛泽东决定改变八路军原来的部署。他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文中说：根据华北日军大迂回进攻的形势，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3省的战略中枢，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阎锡山指挥的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

他还说：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因此，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用。“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建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壮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115师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任弼时说：恒山山脉是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接合部，敌主力必从此进。林彪师现已当了正面，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贺龙师决不能再用此方，应速向晋西北转进。

9月19日，毛泽东在回复贺龙、关向应并告朱、彭、任的电报中说：

“19日电悉，你师集中忻县待命转向晋西北活动，候周、彭（雪枫）与阎交涉防地后，听朱、彭（德怀）命令执行。”

接着，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说：

贺龙率领的120师主力“应速赴晋西北：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五台、定襄、盂县地区狭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因此，贺龙师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冀，向绥远与大同展开游击，方能给进攻太原之敌以相当有效的钳制。所以，贺龙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如叫再去五台则失去战略意义。”

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这是一个有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的委员有4人，他们是：彭雪枫、邓小平、程子华、南汉宸。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政治部副部长，另有中共党员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

续范亭，名培模，1893年出生于山西省崞县。1909年续范亭加入中国同盟会；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6混成旅旅长；1933年任国民党新编第1军参谋长；1935年改任第1军总参议。他是一位爱国忧民、刚直不阿、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国民党军将军，12月26日，为抗议国民政府不抵抗日军的入侵，在南京中山陵写下5首绝命诗，尔后剖腹自杀以明志，经抢救得以脱险。抗战爆发后，续范亭先后任第二战区高级参议、暂编第1师师长。

9月21日，彭德怀将其与阎锡山商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说：

“昨晚赴雁见阎，20日黄昏汇报……我提百二十师出晋西北，（开始）阎不十分赞成，黄绍竑坚决反对。我一度坚持后，（阎同意）以一旅（358旅）及120师直属队去晋西北，以神池为指挥中心，小部伸出左云（敌已逼近左云）、右玉，向敌袭击，并发动与组织五寨、岢岚、河曲、偏关地域群众，主力即在神池、宁武集结训练。”

9月21日晚，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心理，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说：

“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以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毛泽东还强调说：

“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

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在谈到林彪决定“以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时说：

“这种1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9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行33人，从延安出发。后来在10月1日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在6个月里辗转3000余里。此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足迹踏遍了华北的万水千山，他们在华北大地上奋斗了6年。其间，丁玲还曾在1938年间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共活动了四个半月。

9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

彭雪枫在9月18日来电报告说，阎锡山9月16日在太和岭口召见他，请他转告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将来万一“不利形势到来时，以八路军会合晋绥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五台山纵横200里，周围600里，共26个口子，民众20余万，配合晋绥及八路军其他部分定可与敌周旋，那时则请中央军守太原及太行山脉，我们则以主力位于五台山。”阎锡山表示：“如毛、朱先生同意，希望早告我，以便预先存买粮食、衣服、弹药之种种准备。”

阎锡山与彭雪枫还谈到今后对八路军的指挥问题。他表示拟采用两个原则：一是“事先互相商议”，二是“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他对彭雪枫说：“八路军作战主动，不用督促，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嗣后两军协同必须互取短长。”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雪枫同志并告周，朱彭任，林聂，贺萧，刘徐张：

巧电悉。关于阎先生所提，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有下列意见：

甲、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4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乙、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可双方派人察看，并计划一切，不宜迟缓。

丙、同时应该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及部署与准备，因为敌人必将先行占领该地神池、宁武一带，以与东边占领恒山山脉之行动相配合，取得居高临下之势，然后进攻太原。

丁、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如将必要资材之准备、迁移等。资材集中于五台一处，是不妥的。

戊、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己、上述部署及计划，并不妨碍争取以主力在长城一带举行有利的决战之现时计划。

庚、关于阎先生诚意合作与商量指挥之表示，我们甚为佩服与感谢。

辛、上述游击战争意见，望即提供阎先生考虑，倘承采纳，抗战幸甚。

毛泽东 23日午

9月23日这一天，阎锡山将平型关战役的最新战况电告朱德：22日夜日军忽然偷袭平型关阵地，发生激烈战斗。他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朱德同彭德怀立即电令林彪说：

“115师应即向平型关附近开进，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左翼。”

9月25日，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并告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萧克、关向应、徐向前、林育英说：

“阎锡山面许我军驻区群众由我独立负责，不好之县长允更换，组织之游击队允予发枪。我工作之区域可实行减租减息。”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他在电文中写道：

周并转胡服、尚昆、朱瑞并告朱、彭、任：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竑等再谈一次，请酌。

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丁、请以整个华北的部署见告。

毛泽东 25日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转告林彪，他写道：

朱、彭、任、周并告林彪:

甲、依据现时敌攻保定、代州并向石家庄、太原，对灵、涞、广、蔚4县似乎没有多兵据守的情况，依据蒋阎谈决在保定取决战方针，在晋西北取固守方针的情况，为阻敌南占太原、石家庄支持华北的持久战起见，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15000至20000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定前进，广、灵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涞之间向北突击（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恢复灵、涞、广、蔚4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建立群众的及堡垒的根据地。如此若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请你们考虑之后向蒋阎建议。

乙、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并候蔚、涞之敌脱离蔚、涞，攻至满城附近，灵、广之敌，脱离灵、广攻至繁峙附近，上述4县兵力极少之际（此时涿州之敌当攻至徐水附近，大同之敌当攻至雁门关附近），然后使用我林师全部向北突出，依情况再分成无数小支或分成二、三个集团，向着恒山山脉以东以西以北广大地区敌之空处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若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若仅派遣战术支队那是无益的。

丙、如同意上述意见就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那时应以王震部位于策应前方保持后路之地区，贺师在晋西北之使用同此原则。

丁、如出击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

戊、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见蒋19日部署电），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一支奇兵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在仅仅剩义武一着污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

己、如能实现上述计划，即使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没有某些地方失守之代价，不能取得敌后活动的便利。

庚、实行上述计划须在灵、涞、广、蔚敌军甚少之条件下，须有敌后方敌兵不易活动，而我步兵易于活动之地形条件。

辛、以上作为各种提议，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25日

毛泽东这一非常重要的战略计划，由于平型关伏击战已经打响，便被搁置了起来。

9月25日这一天，林彪、聂荣臻指挥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的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的山地，伏击日寇板垣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杨得志、李天佑等率部冲锋陷阵。杨得志率领的685团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他所辖的2营5连连长曾贤生，一个人就刺死了10多个日本兵。

据林彪的老部下阎仲川的儿子阎明在《平型关往事》一文中写道：“战前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他‘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至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林彪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与日军一战。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安排部队埋伏，等候日军到来。林彪命3个团在两侧埋伏，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弋，牵制日军。这次伏击，115师算是全师出动。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进入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平型关伏击战，115师“除缴获汽车82辆，大炮1门，炮弹2000余发，步枪数百支，打死敌人1000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之日文地图”。

115师在此战中也伤亡了1500余人，其中团级干部3人，营级干部5人。他们最大的教训是把日军包围分割冲垮之后，还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认为日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要他们投降，结果遭到钻在汽车底下的顽敌突然射击，致使部队伤亡陡增。林彪后来在10月17日写成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总结出12条经验教训，送给了毛泽东。

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贺电纷纷从全国各地飞向八路军总部，飞向115师师部。

9月26日，毛泽东复电给朱德、彭德怀说：

“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他在电文中又说：

“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3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的游击战略计划，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接着，毛泽东还就平型关伏击战对外宣传问题，向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指示。

9月26日这一天，蒋介石亦复电朱德、彭德怀说：

“25日电悉，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蒋介石还复朱德一电说：“电悉，接诵捷报，无比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随后，115师即在当地活动，派出地方工作团，发动群众抗日运动。120师率358旅进入管涔山区，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西、以南展开，并派出地方工作团，深入晋西北各县开展群众工作。359旅派出一部，进入河北平山、井陉地区发动群众。

9月27日，毛泽东将平型关伏击战战况电告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

9月28日，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原来在“八一三事变”之后，叶挺曾向蒋介石建议说，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并说改编后番号叫“新四军”。他之所以称之为“新四军”，是因为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中有个第4军（在北伐的8个军中第4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被称为铁军。叶挺任第4军直属独立团团长），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是红4军。叶挺就是希望这支新编部队能够继承“铁军”和红4军的优良传统。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在他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要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毛泽东虽然认可“新四军”这个番号，但对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却不完全放心，因为叶挺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所以关于“新四军”军长的人选，就推荐了其他人。国民党表示反对。他们随之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指挥“新四军”，共产党也不同意。就在两党争执不下之际，蒋介石竟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共产党暂时没有表态。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徐向前、林育英说：

“我129师（缺一团）接电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9月28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贺龙、关向应说：

“敌约千人进至马邑，阎电驻朔县守军由贺（龙）指挥，共同消灭该敌。”

9月29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的电报中说：

“华北大局非常危险，”“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9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发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后来此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他在文章中写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情形。”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它的老政策。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队。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领导敌后抗战，容后再叙。

东方翁曰：对于平型关伏击战的评价，抗战时期称之为大捷，自然是出于形势和宣传的需要。即便如此，毛泽东也仅仅是称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好像没有怎么兴奋。作为历史，后人有必要为其正名。阎明在《平型关往事》中谓之“惨胜”，亦不为过。战前，林彪还不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他是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的。人们常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叫得不偿失；杀敌一千自伤二千，叫损兵折将。在平型关伏击战中，林彪投入了绝对优势兵力，虽然全歼了敌人，却付出了惨重代价（歼敌1000多，自损1500余）。这已经不是得不偿失，而是损兵折将了！林彪打仗很会算计，如果知道是这么个结果，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打的。照这样打下去，那15000人的老本要不多久就拼光了。林彪毕竟是个聪明人，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中总结说：“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这说明他在“惨胜”之后，已经理解并接受了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了。

**第22章**

**“对个别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的这类错误，应在报纸上有适当**

**的批评。批评的态度应以说服为主，暂时可不指其名。这类左**

**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话说1937年9月间，艾思奇、周扬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从白区辗转来到延安时，十分高兴地说：

“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于是，他便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近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抄录了一些”，是他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信写好后，他叫秘书胡乔木马上送给艾思奇。

艾思奇接到毛泽东的信，正站在窑洞门前看，突然，传来一个很亲切的声音：

“你就是艾思奇同志吧！”

艾思奇抬头一看，来人竟是毛泽东。原来，毛泽东让胡乔木送走信后，感到言犹未尽，于是便来找艾思奇交谈。艾思奇急忙上前，将毛泽东迎进屋里。此时屋里除了一个土炕外，连一把椅子都没有，他便请毛泽东坐在炕沿上，还要到屋外去借茶杯给客人倒水，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以文会友，我们早该是朋友了嘛！老朋友见面，随便一点好。”

说罢，他一面审视着极为简陋的住房，一面端详着瘦弱的艾思奇，又说：

“生活条件艰苦，委屈你了，年轻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你出生的家庭环境优裕，又长期在条件较好的日本、上海学习和工作，希望你既做革命的理论家，又要做吃苦耐劳的实干家。”

艾思奇听着这些暖心的话语，深受教育。就这样，他们就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广泛交谈起来，这第一次会面一直谈到很晚才结束。

也就在这年的9月间，正在忙于指挥数万大军进入敌后抗战的毛泽东，后院却失了火，已经结婚10年的妻子贺子珍要离他而去了。

此时的贺子珍，由思想上的烦恼联系到了身体上的痛楚，她想动手术把身上的弹片取出来，然而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做不了这个手术，她便决定到西安转赴正处于淞沪会战战火纷飞中的大上海，到那儿去取弹片。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非常懊恼地说：“我生孩子生怕了。”于是，她那本来要走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就极力挽留她。他心里非常清楚，贺子珍此时不顾自身安危要去上海的主要原因，还是对自己有成见，便诚恳地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3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贺子珍的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又拿出了以前不顾一切的劲头，把女儿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拔腿就走了。

贺子珍到了西安后，因上海战事吃紧无法前往，便滞留在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此时，毛泽东很着急，托人捎口信，请她回延安，还给她捎去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去了和解的愿望。但贺子珍已经铁了心，决不回头。她用自己的津贴给毛泽东买了一床新被，并让人给他捎回了一方白手绢，在上面写了诀别信，自己仍然留在西安，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后来她受王明、康生11月从苏联经新疆迪化、兰州、西安回延安的启发，觉得上海不能去就去苏联，到那里去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就与11月来到西安准备赴苏联治病的蔡树藩、钟赤兵、徐梦秋以及张闻天夫人刘英一起，乘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托谢觉哉劝回贺子珍，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去苏联。多年后谢觉哉非常后悔地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不久，贺子珍一行乘坐运送军火的飞机飞抵新疆迪化，住在以邓发为主任的八路军驻新疆迪化办事处。正当贺子珍等待飞机去苏联时，毛泽东又捎去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贺子珍依然不理会毛泽东的召唤。此后，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干部，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贺子珍回延安的好机会，可她还是没有回去。最后，除了徐梦秋留在新疆当盛世才的教育厅长外，贺子珍一行乘车到达阿拉木图，在那里搭上火车直达莫斯科。替代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把贺子珍安排在郊外的东方大学分校住宿，由苏联人陪同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一切安顿好了以后，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发去一封电报，仍然要她回延安。从国内到苏联的人，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让她回延安。可贺子珍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还没有好转，就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长得完全像毛泽东，她的奶水不够孩子吃，孩子一半靠牛奶，一半靠米汤喂养。她还说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等到两年后学业完成了，才能回去；并在信中又一次提出和毛泽东离婚。毛泽东这一次同意了，并正式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贺子珍给毛泽东写有诀别信的那一方白手绢，毛泽东一直保存在他的铁箱子里。直到1938年10月，贺子珍最终永远地失去了毛泽东。这的确是一段读来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且说1937年10月1日，国民党第二战区为组织由晋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联合发动的太原、忻口保卫战，将作战地域划为左中右3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63师、独立第３旅等10个团划归八路军指挥。

这一天，朱德、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说：

“阎以第63师及章旅（第33军独立旅）另某团共10个团，交18集团军指挥，守五台地区。林、聂注意与章旅联络，并帮助其进驻神堂堡、龙泉关、石咀地区之工事设置。”

10月4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并报毛泽东说：

“陈长捷升61军军长，指挥步兵约10个团，仍在台怀附近，陈本人尚听我们的话，明5日派徐向前同志前往帮助指挥，望你们注意与之联络，尽量从政治上帮助。”

10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他写道：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张即林育英，下同——笔者注）：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10月6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的住处仍然亮着灯光，他依然在研究忻口会战的计划。忻口会战即将开始，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显然是重视了晋北方向的防御，忽视了晋东方面的防御，而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必沿正太路向西进攻。他十分担心这一点，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提出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他写道：

周、朱、彭并告林、聂：

关于作战问题之补充意见：

甲、程潜放弃石家庄、集中兵力守太行山山地是正确的，但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右翼除朱怀冰外尚有些什么兵力，能达到坚守任务否？

乙、进入山西之敌，判断总数似不过两师半。为保卫晋北已经占领之数十县，至少分散一个师，则攻太原者似至多不过一师半。雁门关以南又须沿途分兵守备，则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似将不过一个师左右，已处于我3面包围中。如果龙泉关、娘子关能坚守一个月，又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因为我方兵力数量在15万以上，红军与卫立煌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

丙、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3点：1、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2、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3、敌后方之破坏。

丁、为达上述目的：1、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2、要求卫军4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3、红军林、贺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戊、为此目的，我115师主力不但不应出河北，亦不宜位于龙泉关，似应第一步移至豆村、台怀之线，以便适时袭击大营、沙河、繁峙线，并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北越长城出至浑源、应县，以此为中心，分为若干支队，采取夜间行动，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115师这一行动（如再加南京两个师更好），配合贺师主力在左云、右玉、平鲁、朔县之行动，将引起山西敌军正面攻击之停顿，甚至暂时部分地后退，并将引起平汉线敌军停止深入石家庄以南，而采取以一部守备北平、石家庄线，以另一部转向灵、涞、广、蔚地区对付我军。在115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2000至2500，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

己、因此，在经过你们的详细考虑后，如果基本上同意此方针，便请执行下列步骤：1、要求程、阎确定龙泉关、娘子关新增守备兵力是何部何人，何时到达，保证东面之安全。2、要求程、阎派2个师出恒山北段。3、要求程、阎补充我军步枪3000至3500支，机关枪30至35挺，并允许补充新兵5000至7000人。4、115师之教导营应开至太原为中心之地区，实行扩红，不要开到河北去，因为到那里扩红是靠不住的；骑兵营应随主力行动。总部及贺师亦应派人去太原地区扩红。5、刘师主力或全部使用于正太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庚、以上意见请详加考虑电复。

此电写完，接朱、彭本日6时电，我们意见已根本一致，但不知林、聂尚有不同意见否？又向阎、程建议，要求他们十分注意秘密，他们部署最好不用无线电，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 6日1时

10月9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要他们询问“新四军”军长候选人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获知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

10月10日，毛泽东、谭政致电任弼时、邓小平、罗荣桓、关向应、林育英说：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建立，主任为任弼时（毛泽东代理）、副主任为谭政，即日开始办公。规定政治机关每7天报告1次。八路军总政治部及师政治部直接报告中央军委，但中央军委对各师指示仍经过八路军政治部。报告事项为：敌我政治情况；部队政治情况及纪律情况；地方工作情况。

10月10日下午，枪杀女青年刘茜的抗大学员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列举了他在革命中的功绩，请求赦免他的死罪，好让他死在抗日的前线上。

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个关于处理黄克功案件的明确态度。

原来，黄克功在法院审判庭调查、取证期间，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犯罪经过。审判长特意问他：

“你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

黄克功讲述了许多战斗的概况，人们从他那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法庭旁听席上有许多人竞相发言，说黄克功参加革命后为党工作多年，立有大功，应宽大处理，民族解放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给他个改过的机会，主张免他死刑；还有不少老红军战士为之痛哭流涕。

雷经天见群众呼声太高，就给毛泽东写了那一封信，与黄克功写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信一并呈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黄克功和雷经天的信，依然主张边区政府司法机关应依法办事。他认为，功劳归功劳，功过不能相抵，杀人应当偿命。不能因为黄克功是党的干部，又立过大功，就不依法处置。于是，他就给雷经天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依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的大院里举行黄克功情杀案公审大会。法官、陪审员、起诉人、证人、辩护人和法警进入了会场，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等人也各就各位。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

黄克功被带了上来。当法官让他发表个人申诉时，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他唯一申诉的就是一句话：“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这声音不高，但整个会场却听得清清楚楚。审判长雷经天问道：

“你还有什么请求？”

黄克功说：

“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黄克功的声音越来越低，但那低沉的声音充满了感染力。

法院休庭片刻后重新开庭。审判长雷经天当众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黄克功听了以后深深地低下了头。雷经天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没有任何反抗，也没有表现出抵触、激动或者消沉的情绪。他拉了拉衬衣角，平静地朝会场看了一眼，举起一只胳膊高喊：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

左边的法警下意识地拉下了他的胳膊。他低声说：

“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

他再次向天空望了一眼，便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此后的一天下午，抗大的学员们像往常一样，在延安府衙门广场上，列队坐在场院平地上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这一回专门讲了青年人恋爱问题的3个原则，让学员们吸取黄克功的教训。他说：

“第一个原则即政治上一致的原则。我们现在的革命任务是抗日救国，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男女之间的爱情首先要有这个基础，我们能爱敌人吗？能同汉奸、卖国贼谈情吗？只有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才有可能说到此人可爱不可爱。第二个原则即是双方自愿，绝非单方面愿意。我们反对男尊女卑，我们反对大男子主义，更不能有变相的强迫。第三个原则即是不妨碍工作。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再说10月12日这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由共产党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其领导，决定成立新四军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0月13日，毛泽东在以他和张闻天的名义发给潘汉年、刘晓（为保密二人被称之为“小开、刘小二”）并告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的《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中写道：

小开、刘小二同志并告博、叶、周、胡、林：

甲、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

乙、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它的错误政策的寿命。

丙、对于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对个别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的这类错误，应在报纸上有适当的批评。批评的态度应以说服为主，暂时可不指其名。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丁、国民党在华北失败后，气焰大杀，其内部如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实力派对国民党老政策均表不满，更由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国际形势的转变，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完全的优势。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造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地开展。

洛 毛

10月13日，忻口会战正式开始。此前，周恩来在10月10日致电毛泽东说：担心日军如猛攻忻口，卫立煌部是否有极大胜利把握，尚难判断。

为此，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并转博古和叶剑英，他写道：

周朱彭并告博叶：

甲、周灰电判断是正确的，北面忻口反攻无充分把握，东面娘子关守备亦不大可靠。

乙、因此，朱彭任12日重新划分区域之部署是正确的，129师的使用须慎重。

丙、华北弱点在军队太杂，无一个主力军。红军在力求配合作战，争取华北持久的原则下，须同时顾到友军不可靠时的处置。

丁、可否向蒋程阎提议任命黄绍雄为娘子关、龙泉关沿太行山脉以东各军（红军不在内）之总司令，以统一指挥确保娘子关。因娘子关不失则太原虽失仍可支持，如娘子关失守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失掉了全局意义。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

　　 毛泽东 13日午

是日下午，毛泽东反复考虑后，又郑重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请他们向蒋介石、阎锡山等说明：太原失守并不可怕。他还说：

“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应实行如下的部署：

一、以现有太行山脉以东各部，并增加生力军5个至10个师，位于龙泉关、娘子关及其以东地区，以黄绍雄为总司令，并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分向进攻之敌及平汉线举行运动中的歼灭战，以达确保该两关及整个恒山山脉之目的。

二、以卫立煌、郝梦麟、刘茂恩各部，另加川军两个师，以卫立煌为总司令，位于太原以东寿阳、盂县地区，除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外，以运动歼灭战，对付太原之敌。

三、以红军115师、晋军陈长捷部，另加桂军两师、骑兵一师，位于五台地区，以一部除向平型关、沙河、代县、崞县、原平线袭击外，主力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向北夺取恒山北段，并袭击平绥线。

四、以红军129师，位于正太路以南平定、晋阳、榆次南部之地区，创造根据地，准备万一不利时之南面防御战。

五、以红军120师主力配合晋军主力15个团左右，位于晋西北直至外长城一带，确保该地区，袭击太原、大同线。

六、以晋军20个团左右，配合红军120师之陈伯钧部，位于太原以西之汾阳、孝义直至离石、中阳地区，反抗敌军西进。

1. 以晋军之余部，位于太原以南之太谷、平遥地区，完成对太原之四面包围。”

10月14日，国民党第53军130师691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主持召开了全团官兵代表会议，决定691团脱离东北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由他担任司令员，并在所属各总队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使这个部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武装力量。

吕正操，1904年1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毛祁镇山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加入张学良的卫队旅，次年考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1929年任东北军第116师16旅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东北军116师647团团长，率部到热河参加对日军作战。他在与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接触中，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9月，吕正操在北平建立了东北武装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不久被张学良选调到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重返东北军647团任职。1937年初，吕正操任新编691团团长。1937年5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吕正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在1938年5月，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根据晋察冀军区命令，与河北游击军等冀中抗日军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3纵队司令员。

10月16日，毛泽东在发给林彪的电报中说：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即蒋介石和何应钦）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动摇此方针。”

10月16日，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克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成立八路军前方军委分会（即“华北军分会”）、各师军政委员会，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和领导。

此后，在忻口会战中，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国民党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115师遵照毛泽东“向北突击，掏其空虚后方”的指示，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并先后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灵丘、广灵、蔚县、阳原、涞源等地；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南数县，直逼省府保定。

在此期间，115师突袭日本总兵站原平镇，在雁门关设伏，围困代县，先后毙俘日军2300余人，焚毁汽车120多辆，断绝交通，使前线日军军需匮乏，各种兵器不能充分发挥效能，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

120师则切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占领雁门关，收复了雁北数县。

10月18日，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在雁门关伏击战中，取得了摧毁敌人汽车百余辆，歼敌数百人的胜利。

10月19日，陈锡联、曾绍山率领129师769团以第3营为主力的部队，在代县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5架，歼灭敌守备队100余人。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大规模摧毁敌机，辉煌战绩立时传遍了全中国。

曾绍山，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第4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师政治部秘书、师司令部参谋；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民家庭，3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过着艰难的生活。10岁那年，陈锡联给地主放牛，因在夜里耽误了给牛添加草料，被地主打了一顿。之后，他和母亲一起讨饭度日。14岁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军的游击队。有一次，担任红4军10师30团团部指导员的陈锡联，和几个小伙伴因肚子饿，一起在镇上买了几个油饼吃。有人说他们组织什么委员会，要搞阴谋活动，张国焘知道了，指示把陈锡联等人抓起来，准备枪毙。徐向前闻讯，跑去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巴馋，哪懂什么委员会呀！批评教育一下，放掉他们吧。”后来，陈锡联常说，是徐总指挥救了他一命。

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演说。敬录全文如次：

同志们：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先锋队的任务。当为这个伟大的民族的自卫战争迅速的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先锋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是不谋私利的，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的；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如果只是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奋斗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学习革命道理一样，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儿有真理，有自由，是创造革命青年的场所。

**鲁迅是从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经历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和平、自由而斗争。**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稳定，那样清楚。托派成了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远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先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的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一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左的、革命的，等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献给敌人作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迫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他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愤恨的一切。他往往是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定的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但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也没有假慈悲、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打倒它，使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精神，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的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完全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2日中午，毛泽东、张国焘、萧劲光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彭雪枫的电报中写道：

周、朱、彭、任及雪枫：

甲、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乙、主要方法自己造枪。丙、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延长设立兵工厂造枪，即造土枪也好。丁、如何？盼复。

毛泽东 张国焘 萧劲光 22日午

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复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

此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曾在10月19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说：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职权降低，使政治工作及部队建设受到了损失。为此，建议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公开，职权与过去的政委相同，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对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旅设政治处，各旅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党代表指挥下进行政治工作，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为指导员。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职，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朱彭任邓并告周：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洛 毛 22日

毛泽东又复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

此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10月21日就华北八路军的部署给八路军各师领导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第120师在晋西北、绥东发动和组织群众，王震率717团在五台山以北豆村、台怀一带，准备进至阜平、平山以西地域。第115师第343旅位于灵丘、上寨附近，小部经廊下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第344旅在阜平东北，随时准备南移。预备旅相机袭击灵丘、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易县、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第129师到达正太路以南，即开展进入太行山区的群众工作。总部直属队在盂县及五台以东地区发动群众。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朱彭任并告周：

甲、21日电悉。你们意见与我们意见是一致的，不是要总部及115师主力马上移至正太路南，而是要不被敌人隔断，确实保证于适当时机能够南移。请你们注意选择这个适当的时机，并立即布置恒山、五台山一切必要工作，并请考虑将总部特务团全部留驻五台山的问题，将来可另造一个特务团。

乙、将来南移时，第一步115师可用一个旅到汾河以西之吕梁山脉，另一个旅及师直属部队在太岳山脉夹河而阵，并可配合在太行山脉之129师作战。总部第一步亦可在汾河以东，只要不被隔断就不怕。

丙、总部经晋西北向南似不如经晋东南向西为好，总部以确保安全为第一。

毛泽东 22日

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他写的是：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新校舍落成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要与同志们说的，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结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和联系群众。过去10年的经验均证明着，你们这次挖窑洞也证明着，将来在抗战过程中还要证明着，如能如此，可以战胜一切！

克服自然困难，战胜泥土和克服活的敌人，与战胜日寇虽然在很多方面相同，然而有很多方面不完全相同，它将更艰苦更困难些，所以在抗战中，不独要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方针，还要善于运用战略与战术，还要善于组织动员领导群众与争取同盟军等等工作，补充起来才行。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陆续发扬与发挥起来，战胜日本，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10月25日晨，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他写道：

朱彭：

24日电悉。

甲、你们是否准备以陈光旅使用于正太路？我以为是必要的，并且徐海东旅主力似亦有南下作战的必要，留一部配合总部特务团及杨（杨成武——笔者注）支队在西北一带已足。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

乙、为确实截断雁门南北大道起见，王震部似以加入雁门关一带配合宋（宋时轮——笔者注）支队作战为有利。

毛泽东 25日5时

10月25日上午，毛泽东就八路军129师771团在七亘村遭到日军袭击一事，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

原来在10月22日中午，八路军771团抢先赶到平定县石门口，抢占了有利地势，他们刚刚稳住阵脚，日军就赶来了，向着石门口连续多次发起进攻，但始终都无法通过，被迫撤走。771团也随即撤出战斗，回到七亘村休息。

是日晚，刘伯承派人告诉771团，第一，不能把自己侧翼全部放心的交给友军，必须严加防范。第二，旧工事不可靠，并嘱咐386旅旅长陈赓随时准备接应771团。但771团还是轻敌了，完全把左翼交给了国军，也没有对地形进行认真查看，没有多派岗哨和暗哨。

10月25日凌晨，日军第40旅团的一个大队外带300多骑兵从河北井陉方向迅速占领了石门口，尔后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绕了过去，从左翼和正面对771团形成了包围，大约离771团驻地200米的时候，被查岗的771团1连连长发现，随即开枪示警，部队避免了被全部包圆的厄运。日军偷袭不成，当即便开炮强攻。771团仓促应战，上下乱成一锅粥。3连5班8名战士以7人伤亡的代价，居然挡住了日军的进攻，掩护大部突围撤到了附近山上，利用夜色与山势与日军很快形成对峙之势。

大约在凌晨3点左右，刘伯承接到陈赓急电：771团遭到日军突然袭击，部队已被打散。刘伯承立刻命令陈赓驰援七亘村。日军见状况不妙，便抽兵撤退。

刘伯承很快就七亘村被袭一事电告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当即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

朱彭任，林聂罗，贺关萧，刘徐张各同志并转各级负责同志：

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欲知129师后来战绩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1938年2月才到延安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根据道听途说写了一段文字，其中后边的几句话非常惊人。她说：“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噫嘻！一个到延安就不可能与贺子珍（1937年9月离开延安）碰面的“作家”，竟然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说这位女革命家是一个放荡的女子！这个终生受惠于毛泽东的女人，这个和那位耿直的革命家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夫人，竟然在恩人身后往领袖身上泼污水！由这样的人写历史，岂不谬乎！岂止是贺子珍，这个“史学工作者”写江青也是如此！可见毛泽东身后的“文人无行”到了何等的程度？！

**第23章**

**“右倾投降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记取1927年陈独秀投降**

**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而不是重犯那种错误。”**

话说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会见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年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他先是在奥克兰大学取得了文学硕士，后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还曾在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学意大利文，之后到伦敦《泰晤士报》工作，1936年作为罗得斯奖学金的访问学者来到中国，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一些英国报刊纷纷委托他报道中国的情况。因受埃德加·斯诺夫妇和当时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立即启程赶到西安，采访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并同史沫特莱一起志愿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向外界广播，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他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曾多次会见他，并回答了他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之间的访谈录后来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这是一份很多人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特将全文抄录如次。

贝问：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毛答：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问：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答：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抗战不能挽救危机。同时，也开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国家认识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这些就是已经产生了的结果。

问：日本的目的你以为是什么？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多少？

答：日本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华北和上海，第二步是占领中国的其他区域。说到日寇实现其计划的程度，由于中国的抗战至今还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察哈尔、绥远3省，山西亦在危急中。唯有实行民众和政府一致的抗战，才能挽救这个危局。

问：据你的意见，中国的抗战也有它的成绩没有？如果说到教训，则教训在何处？

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你多谈一谈。首先来说，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这表现在：

（一）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

（二）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

（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

（四）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听说日寇资财的消耗是每天二千万日元；人员的消耗尚无统计，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4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

（五）从战争取得了教训。这是用土地和血肉换来的。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份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这也同时是一个团结问题。中国各党派间虽然较前团结，但是还远远地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数还没有释放，党禁并没有完全开放。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这里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作“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要胜利必须政治上军事上都采取和现时大有区别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教训。

问：那么，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答：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积极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军事上说来，亦须实行全盘的改革，主要地是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无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这些政治军事条件，都在我们发布的十大纲领中提出来了。这些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的精神。只有实行这些，战争才能胜利。

问：共产党如何使这个纲领实行起来？

答：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还很狭小，必须把它扩大起来，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说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问：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关心它的行动的人确是很多的。我现在向你说明一个大概。

先说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3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次，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问题。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3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

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他中国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问：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中国军队？

答：完全能够适用。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1924年到1927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924年到1927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

问：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问：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3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3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

问：据你看，这种危险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

问：两种情况中何种可能为多？

答：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抗日战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问：请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答：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

问：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

答：一点也不冲突。共产党还在1936年8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3点：

（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

（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

（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

从这3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需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问：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问：难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问：那么，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答：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问：为什么？

答：15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1924年到1927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1927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10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经过我们不断地努力，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问：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问：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答：那个停止是对的。停止的是国民党过去准备召集的国民大会，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贝特兰在这次访谈后，就离开了延安，到晋南前线的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采访，还冒着生命危险随一支小分队遍访华北战线前沿地区。他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萧克、左权、关向应等人，并作了详细记录。后来，他以公正客观的报道和有关著作，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且说10月26日拂晓，刘伯承获悉驻守井陉测鱼镇日军第20师团的辎重部队在300多名步兵掩护下，向西开进，便指挥129师第386旅772团在七亘村设伏待敌。

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3营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向它的本队突然发起火力袭击，陡坡顶上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也像冰雹似的砸向敌群。日军顿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战士们随着一片喊杀声，奋勇跳入敌群，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两个多小时后，枪声、喊杀声渐渐沉寂了下来。此战共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一批军用物资。

胜利的消息很快就在七亘村一带传开了，附近的孔氏村、南泉村、北泉村推派代表抬着大肥猪，送到第386旅旅部，给八路军庆贺胜利。

这一天，刘伯承又得到了一个情报，说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便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设伏。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日军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刘伯承为迷惑日军，让772团主力第3营在27日当着来七亘村收尸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敌人再也想不到3营绕了一圈又返回了，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10月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七亘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第772团3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772团第3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这次日军已有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3营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负责增援的第2营因天雨路滑没能按时赶到，因此第3营没能将敌军全歼。战至黄昏后，敌人乘夜色突围而出，一部分向西逃往山西平定，大部分则向东退回测鱼镇。

这次伏击战虽然只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但却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军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敌人的包围中成功突围。

再说忻口会战的正面战场，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10月26日，国民党守军放弃娘子关，全线后撤。娘子关一失，日军迅速占领平定、阳泉、昔阳一线，对太原和忻口形成了大包围。

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他写道：

朱彭：

甲、苏联远东军似对满洲日本有所示威，华北日军有一部出关一部回国说，但未证实，请勿下达致起轻敌之心。

乙、我右翼主力既集中正太路，如打得好当能有效制止敌进。我前提120师主力北上未见答复，仍盼考虑。我意只留一团在原平以西，主力两团，以宋（宋时轮——笔者注）团全部位于大同、怀仁、岱岳、左云、右玉至平鲁地区，分数支队，主力袭击铁路沿线，一部开辟西面工作；另一团位于山阴、雁门关、朔县地区，主力袭击铁道，一部开辟朔县工作，目的在保证切断运输大道，又能发展北面工作。

丙、王兆相部暂在原地待命，如86师（以高双成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笔者注）不占神府苏区交涉有效，则该师可以不回，使其在晋补充整理，交涉无效时，再电告调回。

毛泽东

10月30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的沾尚地区，准备袭击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城东的清凉山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同学们都穿上新军装，彩旗飘扬、歌声嘹亮，一片欢腾。中共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团体派出了七八十名代表前来庆贺。毛泽东在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抗战形势作了精辟分析，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批判了唯武器论和战必败论。他还说：

“现在的抗战虽然进行得不顺利，上海危急，敌人在华北已突破娘子关，向太原逼进，但我们决不要悲观。我们应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如：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性质是正义的，国内也比较团结，有广泛的国际同情，等等。因此，只要坚决执行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人民战争，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去打击敌人，我们是一定能战胜敌人的。”

尔后，毛泽东听了在延安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建议，给他在牛津大学学英语时的学友、如今的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

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并代表正在与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的全体中国人民，向英国人民和您所领导的英国工党送上良好的祝愿。

我们特别请求您的党派支持任何在英国组织的对中国的实际援助。

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到日本侵华的真相后将响应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提供实际援助，并将敦促英国政府采取积极抵抗的政策来应对这一最终将给英国人民带来同等威胁的危险。

**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民主国家和平阵线万岁！**

谨致问候

　　 毛泽东 朱德

这封信由贝特兰译为英文，用打字机打出，**末尾的署名是毛泽东亲笔用汉字和英文签名**。贝特兰又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上写着“如果自己恰巧充当了一个友好使命的中间人，将为此感到荣幸”等字样，并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因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也许是贝特兰的话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他把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下来，历经数代而未遭损毁。

后来在2015 年12月15日，苏富比拍卖行在伦敦将这一封特殊的信件拍卖，最终以60.5万英镑（约合48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一名匿名的中国收藏家买走。艾德礼的儿媳安妮在拍卖此信时表示，虽然艾德礼家族将这封信视为珍宝，但她希望这封信件能被更多的人所知。

再说11月2日，阎锡山命令卫立煌指挥的正面守军撤出忻口阵地，回防太原外围，协助傅作义部固守太原。

晚9时，卫立煌部不得不撤离忻口阵地，退往太原。就在他们后撤时，遭到日军主力追击，损失重大，无法组织新防线，被迫退到汾河西岸。

忻口战役开创了抗战以来华北各次战役中最有利的局面。中国军民坚守近1个月，日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一步。此战共毙伤日军四五万人，由于国民党指挥上的错误，中国军队亦伤亡了10万人左右。

11月3日，叶挺由南京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会见叶挺时，亲切地对他说：

“你是我们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的旗号，而叶挺正是这支红军的总司令。接着，毛泽东向叶挺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解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还陪同叶挺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词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激动地说：

“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后来在11月9日，叶挺告别了毛泽东等人，到武汉筹建新四军军部。

再说11月初，日军第20师团第40旅团先头第79联队主力逼近昔阳城西马道岭。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以第686团第2营在马道岭节节抗击，迟滞、疲惫日军，掩护旅主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伏击部署；以第686团占领昔阳广阳镇以南瑶村、前小寒以北高地，担任主攻；以第685团第3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686团歼灭进入伏击区的日军。

11月4日下午1时许，日军先头两个联队4000余人通过伏击区进至寿阳县松塔镇。八路军预伏部队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其先头主力，当日军辎重部队进至广阳地区时，预伏部队突然开火并发起冲击，将其队形分割成两段，经4小时激战，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这是115师继平型关伏击战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冒进，进至松塔的两个联队于6日撤回广阳，接应由昔阳以西沾尚镇西进的后续部队。

11月7日，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指挥所部及第385旅第769团，在第115师第343旅的配合下，再次于广阳以东地区设伏。

下午5时许，当由沾尚镇西进的日军先头部队300余人进至大寒口、中山村、户封村伏击区时，设伏部队迅即发起攻击。日军据村顽抗，八路军英勇冲杀，经1小时激战，歼日军250余人。

八路军第115、第129师在广阳地区两次伏击作战，共歼日军千余人，迫使日军改道由广阳以北之上、下龙泉西犯，迟滞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达一周之久。

11月7日这一天，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115师1个独立团，1个骑兵营，还有一些干部，共约3000人马，开辟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遵照毛泽东关于“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很快打开了局面。

11月8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周，朱彭任并告林聂，贺萧关，刘徐张：

甲、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

乙、判断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以前，山西残兵不至退出，刘湘部队亦有开入山西可能，阎卫孙曾冯赵邓孙等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即游击战争亦恐不能好好支持。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丙、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估计转移至开始工作至少20天，工作见效（动作后）再须10天，彼时恐敌已深入汾河流域，并占领孝义等处。转移后徐旅以汾阳为中心，陈旅以蒲县为中心为合宜。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

丁、文年生、阎红彦、白志文所部，担任从佳县（原葭州、葭县，1964年因“葭”字生僻改为佳县——笔者注）至延长之河防。陈奇涵为绥、米、清、佳、吴5县警备司令，郭洪涛为政委，指挥文、阎全部。文部已在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布防完毕。阎部明日由延安出发，接防于瓦窑堡、清涧城、河口、马家坪一带。何长工为两延河防司令，指挥白部督造船，附监护运输。萧劲光为河防总指挥，扼住西岸，拒敌于河东，才能有力地保护河西，支援贺师全师在吕梁管涔两山脉左侧之第一等重要任务。

戊、129师全部在晋东南，120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请周经绥德返延。

毛泽东

11月9日，太原失守。

参加太原保卫战的原是阎锡山第二战区晋绥军的主力，可卫立煌部一败退，守城兵力就薄弱了。早在11月5日，从太原以东娘子关方向过来的日军第20师团和第109师团占领榆次。11月6日，从太原以北忻口方向过来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第5师团兵临太原城下，负责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始与日军交火。11月7日，两路日军在日空军配合下，对太原发动总攻。11月8日夜，攻城日军突破北面城垣，中国守军誓死不退，反复拉锯争夺，死亡异常惨重。11月9日，太原城防总司令傅作义见局势已无法挽回，下令所部向西突围，太原遂告陷落。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刘少奇、杨尚昆、彭雪枫：

朱彭任并告周转胡杨彭：

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晋西北之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之五台、孟县、蔚县、广灵、灵丘，晋东南之昔阳、和顺、辽县、晋城，晋西南之离石、中阳、孝义、灵石、蒲县等处敌军均将向之前进，因此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番）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大批靠近铁路公路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敌快要到之地区先工作，敌暂不到之地区后工作，各军大溃，阎亦无主，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办军饷实行自治，扩大部队，打击汉奸，招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做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我齐亥电请周转与胡杨雪枫）。

毛泽东 11月9日4时

11月11日，淞沪会战中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撤出上海。

原来在10月下旬，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后方撤离，以求保存实力与日军再战。然而就在军队撤退时，蒋介石却突然下达了停止撤退的命令，要求各部回防。刚撤退又突然停止撤退，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给中国军队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到了11月5日，日军为加强攻势，派出第18师团和第6师团从金山卫登陆。蒋介石再次下令撤退。此时部队序列已乱，整个撤退成了大溃退。第三集团军副司令官顾祝同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行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11月8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大乱，整个阵线动摇。”11月11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市长俞鸿钧发出告别上海市民书，宣告上海沦陷。

此战前后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计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共75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共有29个要点，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报告中说：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人民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关于“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他说：

“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

“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笔者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毛泽东最后说：

“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毛泽东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引起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的极力反对，直到后来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右的倾向才基本上得到了克服。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人：

朱彭任及恩来胡服尚昆并告林聂，贺萧关，刘徐张诸同志：

甲、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于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

乙、山西各军大溃，除刘湘汤恩伯外，暂时均不能作战。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山西统治阶级及各军领袖已动摇无主了。

丙、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丁、林师徐旅速到吴城镇地区，准备与贺师之贺廖支队配合作战，打几个小胜仗。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准备打几个小胜仗。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多打小胜仗。荣臻军区以杨团为基础成立第一独立师是很对的，还应以总部特务营为基础准备成立第二独立师。以上均请朱彭迅即处理。

戊、向南方及四川招兵计划暂时是不可能的。扩红方法主要经过扩大游击队，其次则向大地方招募。目前汾阳以东、介休以北虽已不可能，但汾阳以西以南、介休以南还是可能。请总部、林师注意及时抓一把，再迟亦将不可能了。过去一切计划应以太原、娘子关失守为基点，今后一切计划应以军渡、临汾、蒲县、晋城失守为基点；晋西北应以宁武、尚池、五寨失守为基点，晋东北应以五台、蔚县、广灵、灵丘、阜平失守为基点。以上均请考虑及之。　　 毛泽东 13日

11月15日，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此前，周恩来在11月13日先后给毛泽东等人两份电报。前一份电报中说，沪、宁的求和空气渐浓，晋局也危，建议：（一）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一切动员的中心；（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同我们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八路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财；（六）加强各军区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后一份电报中说，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但目前我们仍以在取得南京当局和阎锡山的同意和接济的情况下布置华北游击战，较易于争取友军，扩大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电报还谈到同卫立煌、黄绍竑商谈的情况，建议在同阎锡山、彭德怀商谈后再返延安。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周并告朱彭任：

甲、周元亥电悉。

乙、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丙、同意与朱彭任、阎黄卫见面后回延安，回时取道延长为宜，请朱、彭、任快点过汾河会商，以在隰县为宜。

毛泽东 15日12时

11月16日，毛泽东以他和张闻天及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发了一份电报：

高岗同志：

（一）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内蒙各旗盟王有的已动摇倾日，有的徘徊无主。日寇正利用德王及沙王，企图造成内蒙傀儡政府。归绥、包头失守后，马占山等部集于新五原附近，如日伪再西进，恐难支持目前形势，亟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蒙境，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三边。

（二）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北出东西乌审旗、鄂托克旗一带，行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其任务是：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卫绥远”的口号去发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对德王、沙王采取批评态度），同时进行广大的蒙汉民族工作，组织与武装他们，建立新的抗日游击队与扩大自己。乙、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

（三）省委蒙民部最大部分工作人员必须随你进入蒙地工作。定边只留一二人，任招待联络之责。

（四）骑兵团及支队经过数日整理动员及准备工作后即可出动。如无皮衣可从盐税局拨2000元购皮衣。

毛　洛 萧 16日

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向内蒙出动，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又交给了八路军120师。

11月17日晚，毛泽东以他和萧劲光的名义致电120师的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和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6团团长王兆相和副团长孙超群，并致朱德、彭德怀、周恩来：

贺萧关甘，王孙并致朱彭，周：

甲、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地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乙、已将整个河防线由神府马镇到宜川临真河划分3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指挥之。

１、从临真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设两延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以警备5团为河防部队。２、从河口到佳县归5县警备区指挥，以718团及警备3团为河防部队。３、从佳县到马镇设神府区河防司令部，以神府保安营任河防部队。

丙、为保障河东部队必要时实施西渡，拟选择以下地段之渡河要点：１、从三交到绥、米各渡口。２、两延间之马头及平渡两渡口。３、神府河防区内选择二三渡口（预备晋西北各兵团使用）。

丁、每一渡河地段备置船20只以上，大船每只可容百人，并征集必须的水手舵手。为隐蔽我之企图，这些船只应隐蔽河之西岸并派兵看管，防敌毁坏及刺探。其他各渡口之船只，除在必要任交通的渡口上留下一二只渡船外，其余一律或集中他处或停泊西岸，并准备必要时破坏之。

戊、凡对我军不需用之渡口，应依照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彻底破坏，并在沿河某些要点上，特别在我渡河地段上，利用天然险要，或破坏或构筑相当程度工事。其具体布置由各河防司令部负责侦察计划，并告我们。

己、两延及5县河防区已着手布置。关于神府区，请贺萧直接派人，或令王兆相派得力干部为该河防区司令员，前往侦察布置一切与指挥担任该段河防之保安部队，并请转达神府特委知照。

毛　萧 17号晚

11月1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他明确告知与会者说：

“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

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中说：“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属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奉命向全世界播发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尔后，中央党政人员纷纷乘轮西上，中央通讯社与中央电台人员也撤离南京，经长沙而往重庆。

11月间，柯仲平从武汉辗转来到了延安。

柯仲平，云南广南县人。他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柯仲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秘书。此后他先后3次被捕；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柯仲平归国到了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柯仲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

“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

不久，柯仲平便担任了边区文教副主任一职。

在入冬后的某一天，中央党校在学员们吃午饭的时候，通知说下午2点在礼堂听报告，要求学员们按时入座，不得迟到。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在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在瑞金建立的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首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长征到陕北后，中央党校以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由董必武任校长。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中央党校也随之迁入延安东郊桥儿沟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开始有学员出出进进。2点钟以前，四五百名学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2点整，毛泽东在党校校长李维汉的陪同下，出现在讲台上，礼堂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毛泽东穿着打有补丁的棉军装，没有扎绑腿，脚上是黑布鞋。他的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亲切地向学员们招手，示意大家坐下来。

毛泽东走到主席台中央，在一个长木桌后面坐下来，开始讲哲学问题。他的精彩演讲不时地被学员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中间休息时，毛泽东走下主席台，来到学员们中间。方志纯很想上去向他问好，但又怕他不记得自己了。

本传第三卷已经讲过，方志纯曾和邵式平一起在1933年初见过毛泽东一面，并汇报了工作。在第4次反围剿中，红10军被改编为红11军。反围剿胜利以后，方志纯、邵式平被调离红11军，另行分配了工作。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方志纯被留在闽赣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党的地下工作，邵式平调任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邵式平调任红5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方志纯则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从南方风尘仆仆地奔向陕北，于1937年10月间到了延安，被组织上安排在中央党校第13班学习，任班长、党支部书记。

再说就在方志纯正犹豫时，毛泽东发现了他，并主动和他打招呼。方志纯赶忙上前几步，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伸出手，用力握着方志纯的手，热情地说：

“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

方志纯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既激动，又高兴。毛泽东告诉他说：

“邵式平同志早就来了。”

方志纯说：

“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有时间到我那里去谈谈。”

“好，好。”

方志纯连声答应着。毛泽东返回讲台上继续演讲。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李维汉挽留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吃晚饭。会场摆上几个桌子，就变成了餐厅。十几个学员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品尝着延安生产的散装白酒。一位女青年端着一杯酒来到毛泽东跟前，用标准的国语说道：

“毛主席，你刚才的讲话真好，我很受教育，我这个新学员敬你一杯。”

这位女青年头戴八角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乌发，身上穿着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细，脚上穿的是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式鞋子。因为女学员很少，毛泽东认出了她就是坐在最前排听报告的那位做着记录的女青年，他接过酒杯，说了一声：“谢谢。”那女青年见毛泽东没喝酒，也不便勉强，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毛泽东问李维汉：

“这个女同志叫什么？她从哪里来？”

李维汉说：

“她叫江青，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毛泽东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此时，江青同桌的人见她很活跃，就让她代表大家向毛泽东敬酒。于是，江青再次来到毛泽东面前，她说：

“毛主席，这杯酒是我们全桌人敬你的，你一定得喝呀！”

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声“谢谢大家”，微笑着问道：

“江青同志，你来延安吃小米习惯吗？”

江青说：

“小米饭可好吃啦，我完全习惯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她好好锻炼。晚饭后，毛泽东要走了，江青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毛主席，你讲的话很重要，我是个新党员，学习中会碰到许多问题，理解不了，要请你给解答。”

毛泽东说：

“那好办，可以找同学找教员研究，也可以找校部和校长。”

江青说：

“那还解决不了呢？”

毛泽东说：

“如果还有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反映给我，大家一起讨论，总可以解决嘛。”

江青，1914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母亲栾氏，家里开着一个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

早在李德文60岁那一年，30来岁的栾氏从诸城县西南100多公里外的临沂地区一路逃荒要饭，来到了诸城东关。李德文看她年轻貌美，便讨为小老婆。他的正室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因此他就满心盼望着栾氏再给他生一个儿子。当他看到栾氏生了一个女婴时，心就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

封建时代的男人都希望多生男孩子，李德文也是如此。所以他时常把新生女儿叫作“进孩”，“李进孩”。后来人们知道江青的另一个名字叫李进，那就是从“李进孩”化来的。母亲栾氏则为女儿起了一个小名，叫李淑蒙，意思是让女儿纯洁无瑕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可江青却违背了母亲的心愿，生就一个倔强性格。稍长时，母亲为她缠脚，她不情愿，白天刚缠上，晚上她就撕掉了。到头来，她的脚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李德文本来是由一个学徒才辛辛苦苦地干到了一个作坊主，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可在江青出生后，他为了发财把全部家当典入了土地，没承想却赔了本，为此和那家地主反目成仇，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李德文让算命先生给他测八字，算命先生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小老婆的缘故。于是，他便挥着拳头对栾氏吼骂：“你是个败家的祸根！”自此以后，他的脾气愈发乖戾、暴躁，稍不如意便对栾氏拳打脚踢。曾经在江青的心灵上留下巨大创伤的事，是发生在一个元宵节里。那一天，李德文喝了酒回到家，栾氏战战兢兢地伺候他，一不小心打了只碗。李德文又是打又是骂，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打在了栾氏的背上，第二次又打在栾氏的手上，竟打断了栾氏一根小手指。小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又迁怒于她，一巴掌打下来，打掉了她一颗牙齿。母亲背起女儿离家出走，给一个地主家当了佣人。李德文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江青很小就开始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这位薛校长给起的。薛先生说：

江青“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薛先生还说，江青的性格从小就像一个男孩子。

江青爱读书，小小年纪就读过不少古典小说。她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浒传》中一百单八条好汉。她曾天真地对大她13岁的哥哥李干卿说：

“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1926年，12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栾氏再无力供应女儿读书。这年冬天，栾氏带着女儿千里迢迢投奔江青在天津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丈夫叫王克铭，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一名军官。江青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无声电影，那时叫“默片”。

1928年底，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母女又随王克铭一家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要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路。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栾氏心酸落泪了，她说：

“你一个还不到15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

1929年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面向社会招生，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2元的津贴。江青马上报了名。刚刚15岁的她，高高的身材，秀丽的面庞，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放射着青春光泽的黝黑大辫子，刚一出场，就像一枝新荷露出了水面，艳惊四座。她的文学底蕴也发挥了作用，虽是土腔土调，但谈吐清晰，稳健大方，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她眼神都不同凡响，透出一股英气。加上学校的女生太少，主考官吴瑞燕女士马上拍板录取了她。

山东省立实验剧院这次在北平、天津、济南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共有40余人，除了江青外，还有崔嵬、魏鹤龄、马君介、郭建英、陈宗娥、王墨琴等，分习编剧与理论、表演、音乐、舞台美术4科。

这个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院址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在济南文庙。由于文庙太大，学生们入夜便不敢出宿舍随便走动。有男学生出主意说，谁敢半夜走上大成殿，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就算他真的不怕鬼神。男生们也只是空口说说而已，谁也不敢去做。可江青偏不信这个邪，她就在半夜间去拿了那顶平天冠来。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唬住了。

实验剧院教授的是京昆和话剧，应聘来院任教的有文学家陈祖怀、孙师毅，戏剧家万籁天、丁子明、赵明义、兰馥清，音乐家何笑鸣、陈田鹤、王义山。京剧方面，梅兰芳的老师郭际湘，尚小云的老师孙怡云等，都曾任教。还有一位白俄罗斯舞蹈教师皮特罗维奇担任舞蹈课。院长赵太侔还经常约请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文学家洪深、徐志摩、梁实秋为通讯导师。江青不仅广泛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习表演现代戏，而且还接触各种乐器。后来，她不仅演唱得好，还拉得一手好二胡。每逢周六、周日晚上，实验剧院都对外售票，组织学生登台演出。江青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之中，她在悲剧中的表演催人泪下，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出了更多的泪水。院长和老师都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1930年9月，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这年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院长赵太侔出任刚刚创立的青岛大学文学系教授。年仅16岁的江青和一些同学随着剧院教务主任王泊生及其夫人吴瑞燕到北平去演出。出发前，江青没有告诉母亲，只是到了火车站才给母亲发了一封信。

在北平的几个月里，江青主演过《玉堂春》。由于她衣着寒酸，被褥单薄，生活非常苦寒，加之演出又不经常，在北平根本不适宜她发展，于是她又回到了济南，到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在济南、青岛、烟台一带演出。

1931年初春，江青去青岛大学投奔既是街坊又是老师的赵太侔，赵太侔安排她到文学系作旁听生，攻读艺术理论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考虑到江青生活困难，赵太侔就和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员兼管理员，负责填写卡片和收发图书，每月30元薪水。她给母亲寄回10元，留下20元自己花销。这个工作同时使江青可以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许多读物。

江青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她常常去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她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写过短篇小说，还写诗歌，拿去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要求她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她的作品经常在学校文艺园地和其它刊物上发表。

“九·一八”事变后，江青对赵太侔说：

“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赵太侔立即反问：

“你也要去捣乱？你也想惹麻烦吗？”

江青吓得不敢再说什么，转身离去。从此，倔强的她再也不去听他的课了。

此时，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江青也投入了学生运动。她参加了学生领袖之一的俞启威组织的“海鸥剧社”，到工厂和农村去演出。她曾经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和《湖上惨事》。自此以后，她就成为学校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俞启威是赵太侔的内弟，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名门望族，比江青年长3岁。江青原是在赵太侔的家里认识了赵太侔的夫人、田汉创办的“南国社”成员、话剧界的明星俞珊，通过俞珊又认识了她的弟弟俞启威。

早在1930年冬，俞启威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1931年夏，他正式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32年，他与化名为王林的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王韬同住一室，不久就被王韬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俞启威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几的样子。他对自己的身高深感遗憾，就拼命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展运动。他对自己的一头黑色卷发也不那么满意，于是就常常搽发油将卷发梳平。此时的江青也在地下党组织引导下，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她对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使她对俞启威那油头粉面的样子有些厌恶。

1932年初，江青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

1932年2月，江青在化名为李春亭、1月20日刚刚上任的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和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韬的主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王韬和俞启威。

江青面对着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宣誓已毕，市委书记祖茂林讲了话，对江青表示祝贺，同时提出了一个让江青难以接受的任务。他说：

“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建立一个党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组织会随时通知你。”

这个只有19岁的大姑娘为难了。祖茂林看出了江青的犹豫，就说：

“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

江青想想刚才的誓言，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对市委书记祖茂林和俞启威说：

“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此后，俞启威也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后来，这对假夫妻在一起工作了5个月，为青岛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6月间，由于叛徒高振东告密，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了严重破坏，市委书记祖茂林和李伟仁、张梦荪、陈文其、武家澍、杨建成等相继被捕，青岛市委、各区委和富士纱厂等支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近80人。俞启威也同时被捕入狱，王林只身逃往上海避难（可参看徐明清自述）。从此，江青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欲知江青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江青的入党时间，叶永烈曾经这样说过：“由于种种原因，江青这人令人真假难辨。我在写作《江青传》时不能不做许多辨伪工作，关于江青入党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江青的入党经过，有着各种说法。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在其所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回忆江青在延安整风时曾对他说过的两句话：‘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明明是1932年入党，硬说我是1935年！’江青究竟是1932年入党，还是1935年入党？内中颇为曲折，我为此进行了详细查证。其实，江青既不是1932年入党，也不是1935年入党，而是在1933年2月入党的。”“她的入党介绍人不是‘姓王的’，她也绝不可能忘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的名字。因为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她的前夫黄敬。”“至于那个“姓王的”，叫王林（原名王韬）。他原是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黄敬进入青岛大学物理系，与王林同住一屋。黄敬受王林影响加入中共。所以，王林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则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叶永烈所说的这个黄敬，就是本传中的俞启威后来出狱后的化名。他的这个考证，看似言之凿凿，其实也有明显的漏洞。第一，中共六大、七大党章规定，入党介绍人必须是1至3个人，叶永烈何以断言江青的介绍人就只有黄敬一人？江青说有个“姓王”的介绍她入党，这明显与叶永烈提到的王林是一致的。请不要忘记王林彼时的身份，他用的是化名，那时候一个新党员对地下党上级的本名和化名分不清，以致多年后忘记了名字，这不是很正常的吗？第二，中共青岛市委是在1932年6月遭到严重破坏的。市委书记祖茂林在青岛海泊桥水场被逮捕（次年8月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王林1979年6月20日曾著有《忆李春亭（祖茂林）烈士》一文），王林立即逃往上海避难。由此推断，1932年入党的黄敬应是在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与同校同学同室的王林一起介绍江青入党。有资料说，黄敬在1933年已经成为青岛市委组织部长。请动脑筋想一想，他还是一个刚入党的青年学生，这可能吗？第三，徐明清暮年的自述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明：江青是在1932年到上海的。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上海的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等组织，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是田汉的弟弟田沅。正因为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如此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在后来的一天，他把江青安排到了这里。徐明清记得，一天，田沅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后来的江青，而当时的名字叫李鹤。田沅介绍说，李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晨更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会唱歌、演戏，“晨更工学团”当时正好缺教员，就把江青留了下来。综上所述，完全可以断定，江青说她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真实可信的。叶永烈披着史学家的外衣，往往在细枝末节处篡改历史。本传在其它问题上还要讲到这一点，敬请读者关注。

**第24章**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话说在1932年夏末秋初，江青拿着几十元的积蓄，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她要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江青一路上心绪不宁，加之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一路上向她大献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怀好意，就更加愁烦了。使她更想不到的，在前面等着她的那些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一些人，更把她看作一块大肥肉。殊不知这个18岁的年轻女子，竟是一朵刺儿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最终酿出了一段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历史公案。

话休絮烦，且说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来接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拍摄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导演史东山。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来接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叫来的出租车，慌乱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党的临时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根据地，上海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人，整天东躲西藏，根本找不到。这样，江青只好暂且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魏鹤龄家里住了下来。

江青通过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荐，终于见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此时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党的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江青来到田汉家里，田汉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后来，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她说：

“你不住在家，我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说：

“我的内人回湖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她来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没回来之前你可以住。”  
  不久，廖沫沙的爱人回到上海，发现江青住在他们家里，很不高兴地对廖沫沙说：

“我们马上找个地方搬家，不住这里了。”

她几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们当天在另一条弄堂里找了个过街楼。回去收拾东西搬家时，江青问他们搬到哪里了，还说：

“过几天我再去看望你们。”

廖沫沙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天后她还真的找上门来，不好意思地说：

“廖先生，田汉干扰太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厨房说：

“那你只能住那儿了。”  
  江青只好说：

“我先到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

后来，江青又千方百计地见到了周扬和阳翰笙。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出生，湖南益阳人，1927年5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带组织关系而脱党。1928年，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党，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参加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周扬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因为保养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

江青急于见周扬，是要汇报自己在青岛的革命经历，请求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一来是因为漂泊不定，不能长期寄人篱下，二来是手头拮据，急于找份工作。但周扬和田汉却非常谨慎，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一是说她没有组织介绍信，二是说对她并不了解，只是和她谈一些在演艺方面的设想。倒是田汉的五弟剧联成员田沅对江青一见钟情，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无奈，只好化名为“李鹤”，到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店员识字班当了一名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

“晨更工学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一所专门为贫苦子女接受教育而设立的学校。后来成为王观澜夫人的共产党员徐明清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这里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只是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3人同住一座小楼顶上的阁楼里，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3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晨更工学团”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产党员王洞若，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左翼联盟的陈企霞，也都在这里工作。由于周扬、田汉等人没有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纳江青的党组织关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学团”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社。后来徐明清看江青表现不错，就作为她的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不开心的事，就是田沅老在她屁股后头追着，弄得大家议论纷纷。江青就贸然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说：“请把你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来，田汉就把田沅调走了。

1934年，上海爆发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党、团组织只好进行转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暂避风头。她在北平待了3个月，到北大当了旁听生，系统地听了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

1934年5月底，“晨更工学团”党组织通知江青回上海，安排她在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张淑贞。这所夜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是由地下党组织控制。江青在这里度过了她在上海时期最愉快的时光。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中传唱；她拉的婉转悠扬的二胡独奏曲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她用张淑贞的名字公开发表了《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河山》等文章。

1934年9月，“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通过关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由孙达生为介绍人，重新吸收她入党。党支部书记王洞若和她谈了话，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认出了她。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地下党员，江青来上海时，他也参加了送行。一晃一年多，两人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江青回到夜校后向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做了汇报。王洞若说，他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的组织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江青第二次和乐若见面时，因为彼此通过党组织相互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多了。乐若说江青不被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交代说：

“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党组织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她很多注意事项。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见面，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此时，特务出现了。

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叫声“快跑！”一溜烟逃脱了。江青由于路径不熟，被特务抓住了衣服。她大声喊：

“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

特务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脸上，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江青仍然拼死挣扎，大声说：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经黑了，江青装着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张秘密表格放进嘴里吞了下去。到了警察局，特务头子听说乐若跑了，只抓了个不知任何情况的女人，大发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经完全冷静下来，她知道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罪的。无论特务们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散步，自己有正当职业，是学校的老师。被看押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女工学员，是江青的学生，马上就要无罪释放了。江青托她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说明情况。因为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左翼联盟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又出面保释，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无罪释放了。

江青出狱时骨瘦如柴，还发着低烧。党组织安排回浙江临海县度假探亲的徐明清将江青带到她的老家疗养一个时期。

1935年2月初，已经康复的江青要求回上海。徐明清向组织做了汇报，组织上认为，现在她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先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于是，江青回到济南，探望了母亲和姐姐，尔后又在北平一直待到1935年5月。

此时，江青接到党的外围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通知，要她以演员的身份回上海工作，化名为蓝苹。这是因为，党组织考虑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有江青两个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天，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们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尽管江青想从事工人运动，不愿再去演戏，但这是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江青回到上海后，正赶上协会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编剧导演经过测试，决定由赵丹、江青主演该剧。江青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反复阅读鲁迅1923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与娜拉一样具有叛逆性格的21岁的江青，在演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鲁迅先生也曾去观看了演出。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民报》、《晨报》都载文高度评价了江青的演出。《晨报》上有评论说：“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演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发现第二个有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江青的大幅剧照。巨幅广告上写着：“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直追闺怨名剧！堪称独创风格！”

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女人，她的鼻子稍微上翘，嘴唇稍厚。但她的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目丹唇，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挺迷人的。她从不搽一点粉，也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青春俏丽。《民报》记者李成曾经称赞她在舞台下“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此时的江青虽然已经成了明星，可她在生活上还是比较艰苦的，就想着节省几个钱，补贴家用。她把大部分收入寄给母亲和姐姐，留下很少一部分自己花销。与她同岁的好朋友秦桂贞曾问她：

“你怎么不吃水果？”

江青把手一摊说：

“没钱呀！”

秦桂贞还发现，江青到了月底一回到住处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之类的东西充饥。秦桂贞问她：

“吃过晚饭了吗？”

江青说：

“没饭票了！”

就在话剧《娜拉》演出期间，导演之一的张庚迷上了江青。他曾经对人说：“她是我的人，别碰她”。但江青却处处使张庚碰壁，无论他如何恳求，江青也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家。有一次，张庚终于开口向江青求婚，遭到了江青直截了当的拒绝。张庚恼羞成怒，就到处散布谣言报复她。

此时还有一个与江青同岁的影评作家、上海艺华电影公司的编剧马骥良，笔名唐纳，在看了江青主演的话剧《娜拉》后，也迷上了江青。

唐纳长得一表人才，多才多艺，为人热情，性格却像吴语一样软绵绵的，人称“奶油小生”。他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仍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

后来，江青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在《自由神》一片中饰演了一个配角。袁牧之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时，邀请唐纳领衔主演，于是唐纳便从“艺华”调入“电通”，同时主编《电影画报》。江青在《都市风光》中也饰演了一个角色，并担任场记。在拍摄期间，江青和唐纳朝夕相处，年轻人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事。有一次，周扬来找江青，告诫她说：

“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江青却说：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周扬断然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她说：“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周扬说：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再次摇摇头，说：

“不知道。”

唐纳真诚地爱着江青，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江青提出要结婚，却遭到了江青的反对。江青从父亲欺侮母亲联想到她所接触的一些男人，得出了一个过激的结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她的叛逆性格在《民报》记者李成采访她的时候，又一次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那是在1935年8月4日下午，李成在采访时问道：

“小姐结婚没有？”

江青笑嘻嘻地说：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的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没有把恋爱看得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李成不等她把话说完，抢上去问：

“小姐可否把爱人的名字告诉我？”

江青说：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是女人，更应该从重重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的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它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在上海有不少了解江青的人都说，看上去她俏丽淳朴，可性格却像个男人。对于报纸上的大肆炒作，她并没有像别的成功女演员那样陶醉，相反的，倒是对于自己的表演说出了一番很有见地的理性认识。1936年1月1日，她在《大晚报》上发表了《随笔之类》一文，提出了不同意“天才”一说的见解。她写道：“很明显的例子，如果让一个生活在洋楼，出入坐汽车，对于下级生活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个女工，试问能够成功吗？我并不是说小姐不能扮演女工，这只是说决定她的成功或失败的，是她的生活经验和她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天才！”“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演员，他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社会深刻地认识，而且他还需要许多工具——各种艺术理论、文学、科学等书籍，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加深刻地去解剖并认识他周围的现象。”

1936年6月到8月间，江青看到了周扬发表在《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3篇文章。在这个时期，她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以鲁迅为首的提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周扬为首的提倡的“国防文学”之争。周扬以党的领导者的身份，组织一些人围攻鲁迅，鲁迅便称他们中的4人为打上门来的“四条汉子”。鲁迅还说：“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恨起来了。”

鲁迅说周扬等人是：“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江青认为，鲁迅先生说得有道理，周扬说得太霸道。联系周扬对唐纳的态度，反映了周扬等人“唯我马首是瞻”的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

此时，周扬为证明他的“国防文学”观点，树立夏衍创作的新编历史剧《赛金花》为样板，说这个剧写出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

周扬所鼓吹的这个剧本描写的是在民国二十五年冬日，在京城天桥附近的老屋中，年老的赛金花因拖欠房租被房东赶走，因世态炎凉而不胜感慨——赛金花幼年时因家贫即入娼门，14岁被状元洪钧纳为妾室，后洪钧去世，赛金花被逼离开洪家，6年后卖身为妓。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众多京师大员沦为阶下囚，赛金花为了全城百姓的利益，牺牲自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周旋，后受命促成《辛丑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撤走，两宫回銮，赛金花却被当作国之将亡的妖孽赶出京城。

1936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3人一起找到江青，商量由她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

“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得多。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12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心里想到的却是鲁迅对于左联解散的辛辣评价：“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只听夏衍接着说：

“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觉得这话特别刺耳，微微一笑说：

“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事后对另一个女演员说：

“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角演员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10个导演9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谁知隔墙有耳，从此，性格倔强的江青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在周扬、夏衍、张庚选择由王莹主演《赛金花》的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满天飞：“蓝苹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蓝小姐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噩耗传来，一向喜欢鲁迅杂文的22岁的江青，于10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念鲁迅先生》一文。11月15日，她又在《绸缪》月刊上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一文。她描写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她写道：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十万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地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1937年5月14日，江青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用华丽的辞藻、激昂的情绪、独到的观点，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入了一丝光亮。她在文章中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的生活”的陈腐观点。

江青宣称演员应该是创造者，她说：“当一个演员确实地知道自己有着演戏才能的时候，就得拿出坚决的意志和毅力来教育自己，使自己能支配自己，能把自己的精神和身体配合在不同的场合中。因为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物是恰巧同你一样的，就是有所谓适合自己性格的角色，但那也不过是那个角色的某一部分和你相近，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并且演戏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生活，所以演员在舞台上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而完成的一种艺术（不是生活），而不是毫无变化地把自己硬搬了出来（我并没有否认演员个人的人格一贯地作用于他一切人物的表现中）。如果这样，那就没有创造的表现，没有创造就不能成活的艺术，而是无生命的东西。”

她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

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

江青最后写道：“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阶段，经自己融化在纯正的、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此时，倔强而叛逆的江青已经厌烦了唐纳的无休止的纠缠，厌烦了报纸上纷纷扬扬的桃色渲染和那些道貌岸然的无耻文人的攻击。她不愿意做阮玲玉第二，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不愿再当演员的想法，要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王洞若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立即着手进行联系。他写信给在西安的徐明清说：

“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王洞若还告诉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江青在离开上海前，兴奋地告诉与她同岁的好友秦桂贞说：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就在这5月间，江青离开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此时，姐夫已经去世，她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了奔赴延安之路。

如果说不满17岁的江青，离开济南投奔青岛大学的老师是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话，那么，此时23岁的她投奔延安，则是决定了她数十年后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归宿。

此一去也，有分教：旧怨新仇来心底，拳经脚法各有术。

欲知江青到延安以后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江青在1937年5月14日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中提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这种艺术主张竟出自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的笔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的确是十分难得的。难怪在20多年后，在她的指导下，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一幕幕的为劳动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精品，这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第25章**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

**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话说1937年7月下旬，江青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来到西安。她按照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指示，在西安找到了陕西省立北大街幼稚园主任徐明清。

徐明清是在1935年4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上海关押了3个月，被解往杭州反省院，一年多后被保释出来，组织上重新安排了她的工作，此时在党内的职务是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江青和徐明清再次相见，分外高兴。徐明清带着她来到西安七贤庄中共中央办事处，见到了办事处负责人博古。博古了解了江青的情况后，同意她去延安，让她搬到办事处住，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江青在办事处填写登记表时，想到李云鹤是她的学名，蓝苹是艺名，现在即将进入革命圣地，应该有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响亮名字。她想起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中的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江青”。

江青在办事处认识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后来不久在延安成为叶剑英夫人的危拱之，还有也等待着去延安的李丽莲、陈兰英等人。

1937年8月，江青与其他一起去延安的人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离开西安北上，行至中途遇上了大雨，无法前进，众人只得改乘马匹。从未骑过马的江青两天后才非常艰难地到达了洛川。

8月25日，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叶子龙和一些与会者听说新来了一批知识分子，便相约前去迎接。江青和每一位领导人握手，这是叶子龙第一次见到江青。这天晚上，江青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

次日，一个即将回延安的车队整装待发，当江青等人登上一辆汽车时，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英姿勃勃，迈着稳健的步伐在众人的目光下走向一辆汽车，有人指着他说：“那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江青第一次远远地看见毛泽东。

江青到延安后，被安排在第二招待所食宿。她在住宿登记表上自豪地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江青。党组织在安排工作之前，对她的党籍问题进行了例行审查。不久，化名为黄敬的俞启威到延安参加会议，徐明清也调到了延安。由于他们的证明，江青被恢复了1932年的党籍。党组织安排江青进行农村调查工作，以便她适应陕北的生活，同时也考验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江青脱去半旧的蓝色旗袍，换上陕北农村妇女黑蓝色的衣服，头上包着头巾，和农民打成一片，向党组织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决定让她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7年11月间，江青搬进了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宿舍，开始了在党校的学习生活。她穿着女八路的服装，扎着腰带，梳着两条辫子，辫稍上还系上了不太显眼的蓝带子，显得干练、活泼、俏丽，生气勃勃。她是四五百名学员中仅有的10个女生之一。自此，在党校的学习成为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前面已经讲了江青那天在中央党校聆听毛泽东演讲的哲学以及向毛泽东敬酒的情形。那时的江青的确对于哲学这门学问还知之甚少，因此听得很吃力，她不停地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记得也很费劲。她感到有不少问题自己还弄不明白，于是就在那天晚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用楷书字体工工整整地写着：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于1932年入党，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先后在舞台和电影中演出。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12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中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如能得到你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3时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3次了，这幸福的第4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12班学员 江 青

这一封信，且不说她那一手写得很好的楷体字和流畅的文笔，单是那苦难的出身和经历以及泼辣的个性，都会引起毛泽东的好奇与欣赏。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这封信送进城去，送到了毛泽东的警卫战士手里。

就在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住所。毛泽东的房间里已经重新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文件都放到了后面，用报纸盖上。毛泽东悠然地点着一支烟，对坐在对面的江青说：

“你能够提出问题，说明你学习很认真，我很高兴和你一块儿探讨。”

江青虽然鼓起勇气来见毛泽东，可当她真正面对这位传奇式的领袖的时候，还是十分紧张的。毛泽东本来就平易近人，态度温和，再加上他那拉家常似的谈话，很快就使江青平静了许多。她聆听着毛泽东的解答，也不断地回答着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江青反应快，又善解人意，当毛泽东要吸烟时，她立即把烟拿来递在毛泽东手里，并且还给他点燃好。她发现毛泽东的茶水凉了，就轻轻地换上热的，把茶杯放到伸手可取的位置，而且还把茶杯的把儿正对着毛泽东伸手的方向，拿起来非常方便。时间过得很快，谈话已经过了两个多钟头。秘书来报告说：

“主席，该去开会了。”

毛泽东结束了谈话，把江青送到门口，握着她的手说：

“再见！希望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来。”

江青走到值班卫士面前，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你，再见！”

下一个周日，江青又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两个人已经熟悉了，江青就一面说话，一面手脚麻利地替毛泽东收拾着房间。

后来，江青经常不断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大部分都是在周日。有时毛泽东还让她在这里吃饭。吃饭前，江青主动拿来毛巾递给毛泽东擦手擦脸。毛泽东需要看书时，江青会马上把书取来，翻到毛泽东要看的那一部分。晚上离开时，毛泽东为了她的安全，就让警卫员送她。江青不会骑马，警卫员就从马厩里选出一匹最老实的马，让她骑上，自己在前边牵着马缰，把她送到桥儿沟，再骑马回来。

话分两头，再说1937年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通知方志纯说：

“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见你。”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方志纯是在1937年10月间从南方来到了延安，被组织上安排在中央党校第13班学习。

是日下午4点多钟，方志纯随着李富春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前，见毛泽东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站在门口迎接他，就赶紧上前握手问好。走进窑洞，方志纯打量了一下四壁，墙上唯有一张军用地图。室内的摆设也非常简陋，一张办公用的方桌和几条板凳，还有几把椅子。方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以及笔墨纸砚等。毛泽东热情招呼方志纯在一把椅子上落坐，关切地问：

“从南方来，生活习惯吗？”

“还可以！”方志纯回答说：“不习惯，慢慢习惯就是了。”

毛泽东笑着说：

“这就好，四海为家嘛！不怕苦，还要不怕死，随时准备掉脑袋。我们红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陕北，牺牲了多少人！留在南方的同志，也有不少人牺牲了！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本传已经说过，早在1934年7月，**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在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前，命令寻淮洲、粟裕等率领的红7军团6000多人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不久，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又命令方志敏新组建的红10军与红7军团余部组成红10军团，共计10000余人，从赣东北苏区出发，北上抗日，以偏师吸引国民党军主力。**这红10军团以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为参谋长，刘英为政治部主任；下辖19师、20师、21师。19师由原红7军团余部改编而成，师长寻淮洲，政委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政治部主任刘英；20师由新红10军一部改编而成，师长、政委分别由刘畴西、乐少华兼任；21师由新红10军另一部改编而成，师长胡天桃。**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还指示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军团行动。12月间，红10军团在安徽太平县古竹溪遭数倍敌军袭击，部队损失惨重。1935年1月，方志敏等率领部队返回赣东北苏区，途经太平县谭家桥镇乌泥关、白亭、石门岗一带，被国民党军王耀武部团团围住。1月29日，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红10军团仅有粟裕率领的800余人突出重围。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年仅36岁。

方志纯见毛泽东提起了方志敏，心情沉重地说：

“起初我不知道他牺牲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的。”

“志敏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毛泽东面色凝重，严肃地说：“**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左’倾错误路线断送了他。**”

方志纯有些激动了，他说：

“主席，你在瑞金那次就跟我们说过，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可是……”

“那已经成为历史啰！”毛泽东感慨地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其实当时不但不应该把你们红10军调离赣东北，相反，应当把红军主力往你们那边靠，往武夷山靠。如果这样，恐怕也不至于失败得那样惨。”**

方志纯忿忿地说：

“‘左’倾错误路线真是害死人！”

“这是个沉重的教训，要好好吸取。”毛泽东沉默了片刻，又关心地问：“现在赣东北怎么样？”

“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会越来越好。”毛泽东说罢，又问方志纯：“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方志纯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鼓励道：

“不要紧，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就大胆地说吧。”

方志纯这才说：

“主席，打了十几年仗，现在我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好嘛，想学习，这是好事嘛！”毛泽东笑吟吟地说：“现在，你不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吗？应该趁这个机会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高认识。”

他又对坐在一旁的李富春说：

“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

李富春说：

“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方志纯见夜幕已经降临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好哇，方志纯同志，你想学习，今后有的是机会！”

令方志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之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他又被派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党校潜心学习了整整3个年头。

且说此时的西北高原已经是寒风凛冽，可毛泽东穿的那件旧棉衣早就不成样子了，却就是不肯换新的。警卫员们自作主张，找到管理部门，让给毛泽东做了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新棉衣。他们也知道，直接把新棉衣拿给毛泽东，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要。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才想出个办法，趁他休息时把旧棉衣偷偷拿走，等他醒来没有了旧棉衣，就只好穿新的了。然后等把旧棉衣拆洗一下再做好，两件换着穿。众人依计而行，换了新棉衣，三下五除二就把旧棉衣给拆了。这一拆才知道，那旧棉布已经糟了，就是神仙也难以再照原样缝起来了。毛泽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旧棉衣不见了，就把警卫员叫进来，指着新棉衣问：

“这是哪个的衣服？我的那件棉衣呢？”

“这是管理局给你做的。”

“我有棉衣嘛。我不要！还是把我的那件拿来。”

“那件……那件棉衣都让我们给拆了，想洗洗再缝好。看样子，那布破得缝不起来了。你还是……”

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着。毛泽东看着警卫员着急的样子，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那，你看怎么办？”

警卫员一看有门儿了，马上高兴地说：

“主席，这件棉衣挺好，你就穿吧。”

“这样吧，你拿上它，给我换件灰布棉衣，和你穿的这件一样。”

说着，他拿起新棉衣，又指指警卫员的衣服。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好去照办了。

11月27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回信。

原来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长沙长郡中学担任庶务的表兄文运昌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莫立本，希望到延安投奔革命，文运昌便写信介绍他到延安找毛泽东。莫立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向毛泽东转交了文运昌的信。文运昌在信中除了介绍莫立本，还倾诉了兄弟离别之情，又说到了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钦以70岁的高龄在1929年以“共匪头目亲属”罪，遭到许克祥部的捆绑关押，花了不少钱财方才保释脱险，但从此一病不起，已于今年6月27日去世。毛泽东看到八舅父因受连累致死，心中非常内疚，悲痛万分。不久，他又收到了文运昌的一封信，说在长沙教书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难，想到延安谋生，希望毛泽东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帮助。

由此，毛泽东就给表兄写了这封回信。这是他与外婆家的联系中断了整整10年后寄出的第一封信。他在信封上写着：长沙南门外36号，文运昌先生收。他在信中写道：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今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以做到。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费给周文楠，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缘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劳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劳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周文楠一事，是指此前组织上给在湖南的周文楠寄出的一封信和20块银元，要周文楠到延安工作。信中提到的刘霖生先生是他的一位姨表兄，前清秀才，为人正直刚毅，思想求新不迂腐。

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强调乡下亲人不要来此谋事，此处并无薪水，然而韶山的热血青年们还是一批一批地朝着延安千里跋涉。岂止是韶山的青年，全国各地大批的青年人也都纷纷拥向延安。

中共中央为了教育这些青年，决定在安武堡举办青训班。组织上派吴朝祥担任青训班女生队政治协理员。吴朝祥临行前，毛泽东约她谈话。毛泽东说：

“你要通过谈心，开座谈会，了解哪些同志出身于穷人家庭，哪些同志出身于富人家庭。了解她们参加革命的理想和志愿，了解她们的个性、爱好与特征，根据她们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就是俗语所说的‘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到青训班学习的，有不少人老家是东北的，她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尝过当亡国奴的痛苦，要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让她们现身说法，教育大家懂得只有坚持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工作中要注意走群众路线，培养骨干，启发群众自我教育。对知识分子，既要看到她们要求救国要求革命的优点，也要正确对待她们的弱点和不足。比如，大城市来的女同志，烫了发，抹口红，搽胭脂，不要看不惯，更不要讽刺，要慢慢诱导他们转变生活作风。”

吴朝祥，女，1918年出生于四川通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少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红4方面军长征。后来她在抗战时期曾先后任中国女子大学校务处副处长，辽东军区第2医院政治委员。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以他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发了一份电报：

高岗同志：

（一）张、范（盘踞在定边、安边和靖边的土匪头子张廷芝和范玉山——笔者注）两匪据守土围，强攻土围须有严密的侦察，周详的计划，并对围内及围外之敌须有严密的警戒，不可疏忽。

（二）即请将土围巩固状况，匪之兵力工事，设备粮草柴水之供给，群众条件及匪外援之可能性，详细查明告我。

（三）27军（指以贺晋年为军长的原红27军，全国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在三边地区剿匪——笔者注）是否有迫击炮，攻坚的火力如何，均请告，在未有十分把握以前不可轻动。

毛　萧 28日15时

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及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迪化经西安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他是在迪化登上专机的。

王明在回国前，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康生、邓发以及刚从南俄疗养回来的王稼祥。季米特洛夫说：需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征询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想回国工作。”

季米特洛夫说：

“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邓发同志去新疆工作。”

之后在11月11日，王明、王稼祥、康生、邓发在季米特洛夫陪同下，拜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

斯大林问王稼祥：

“红军还有多少人？”

王稼祥说：

“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万人了。”

王明插话说：

“还有30多万人。”

王稼祥毫不客气地立即纠正说：

“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人，不是30多万人。”

斯大林说：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

王稼祥知道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他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和在党内的威望更不可能全面了解。而王明常年在苏联，颇受斯大林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他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毛主席主张抗日，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听了，高兴地说：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现在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另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季米特洛夫曾经记载了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的谈话要点。斯大林说：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4）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5）现在中国人所处的条件比我们在1918—1920年时的条件更加有利。当时在我们这里，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在中国，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把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了。

（6）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7）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生产飞机。飞机容易生产，但是运输很困难。（我们会提供制造飞机的材料！）必须创立飞机制造业。还要生产坦克。（制造坦克的材料我们能够提供！）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

（8）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9）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10）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可能独吞猎物。

（11）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

（12）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武汉的八路军和党的合适的代表。

斯大林谈话中的基本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知不知道这个谈话内容？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有关资料。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王明回国后却反其道而行之，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中国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又一次上了这个政治骗子的贼船。

季米特洛夫在王明临行前，特意嘱咐他说：

“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后，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就是他们要推你为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11月14日，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到了新疆迪化。王明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决了一直追随张国焘的李特、黄超。

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作茧自缚难逃脱。

人不公道天公道，天道循环命难活。

与枪决李特、黄超的同时，王明还借盛世才之手逮捕了曾经与他进行过斗争的俞秀松。

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说过，俞秀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25年第二次赴苏，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党团书记。其间，他与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对王明一伙在副校长米夫支持下的宗派主义活动表示不满和反感。俞秀松曾几次找王明谈话，诚恳地希望他改正。王明表面虚心接受，内心却记下了仇恨。1927年11月，俞秀松进入列宁学院深造和工作，多次遭到王明等人的陷害。俞秀松、周达文对王明无中生有的诬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2年7月，董亦湘、周达文、俞秀松由联共（布）中央先后派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工作。1935年6月，联共（布）中央决定以俞秀松为组长的25人小组进入新疆工作。1937年苏联清党时，董亦湘遭王明陷害，被捕入狱。1937年7月14日，周达文因被王明诬陷，苏联内务人民部以“托洛茨基右派反苏组织成员”的罪名，将其逮捕。接着，王明又借回国途经新疆之机，逮捕了俞秀松。后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1938年4月13日判处周达文死刑。俞秀松在1939年2月21日被杀害。董亦湘在1939年5月29日被迫害致死。

再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前往机场迎接王明。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第一次见面，彼此热情握手，很是高兴。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此时，毛泽东也迎接了第一批从家乡韶山来到延安的亲人。他们是毛泽全、毛泽青和堂侄毛远耀、毛远翥兄弟。

毛远耀，字卓夫，1912年出生。毛远翥，字任夫，号自财，1918年出生。

本传第三卷已经说过，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他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韶山党支部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到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不久印刷厂迁往天津。后来在1931年，毛远耀和毛特夫随堂叔毛泽民从天津迁回上海中共中央出版部工作。1933年5月，秘密印刷厂被国民政府查禁，毛特夫奉命去赣东北苏区；毛远耀留在上海秘密活动。1936年，毛特夫和毛远耀及妻子胡觉民又先后回到了韶山，以教书为生。

毛泽全一行到延安后首先见到了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由毛泽民安排，在第3天，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毛泽全4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接家乡来的客人。毛远翥看到他穿着灰军装，头戴八角帽，脸有点清瘦，一双睿智的眼睛却炯炯有神，便兴奋地喊了一声：“三叔。”其他3个人也高兴地叫着：“三哥。”“三叔。”毛泽东笑着朝他们走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说：

“你们来了，好哇！”他指着毛泽青说：“你是泽青——万才老弟。”又指着毛泽全说：“你是十二老弟——泽全。”最后指着毛远耀兄弟说：“你是远耀，你父亲是智珠四哥。你是远翥，是远耀的弟弟吧。家里人还好吧？”

毛远翥觉得三叔离家十多年了，还记得家乡的亲人，心里热乎乎的，忙说：

“都好，谢谢三叔。”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家乡许多事情，还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钟志申等烈士的情况。待众人回答后，他又问：

“庞叔侃是如何牺牲的？在哪里被杀的？”

“1927年10月，被杀害于湘潭十七总的柳林巷。”毛远耀说：“是敌人用梭镖捅死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你们到延安来，这里生活是很艰苦的呀！”

毛泽全说：

“我不怕吃苦！”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们愿意干点什么工作呢？”

这几个人来延安只是想着干革命，至于做什么工作却没有想过。毛泽东一问，他们一时都没有回答上来。还是毛远翥说了一句：

“我们听三叔的安排。”

“听党的安排！”毛泽东纠正说。他指着毛泽全、毛远耀：“好！你们二人去抗大学习。”

在他看来，毛泽全、毛远耀读过一些书，有些文化，是可造就的。他又指着毛泽青和毛远翥说：

“你们俩去中央印刷厂做学徒。”

几个人见毛泽东把他们分作两处，一处是学习，一处是工作，不知如何是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没有说话。毛泽东见了，就安慰他们说：

“你们去工厂，去抗大，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学习的目的是为将来更好的工作，更好地干革命。”

他见毛泽青和毛远翥仍然不言不语，又说道：

“你们两人去印刷厂，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将来还有专门学习的机会。”

11月底，毛泽东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那里获悉：小弟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一家有了下落，而且还搬回了韶山。

原来在1928年春，毛楚雄还不到一岁，母亲周文楠就被捕入狱了，幼小的他只好由外婆周陈轩和舅舅周自娱抚养。为了安全，外婆让他改姓周。1930年，彭德怀率部攻下长沙，周文楠被营救出狱。8月，周文楠随彭德怀的部队撤往苏区，毛楚雄留在长沙与外婆和舅舅相依为命。1935年，毛泽覃牺牲时毛楚雄才8岁，在桂园附近一所小学读书，外婆将父亲牺牲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失声痛哭。1937年5月，周陈轩遇见了一位韶山妇女，继之与韶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1月间，徐特立、王凌波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毛楚雄的族兄毛特夫立即向徐特立报告了毛楚雄一家的情况。徐特立指示说：“今后要好好照顾他们。”11月底，毛特夫、近门叔叔毛泽连将毛楚雄和外婆、舅舅接回韶山上屋场居住。外婆激动地说：

“楚雄，你是韶山人，从今天起，你不再姓周，该姓毛了。”

毛楚雄懂事地点点头，说：

“好，我本来姓毛，我叫毛楚雄！”

不久，徐特立派王凌波去看望了毛楚雄和他的外婆周陈轩、舅舅周自娱。

毛泽东得到这个好消息，心里很是高兴。自此，心中便时时牵挂着小弟的这个遗孤。

1937年12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单独会见了21岁的堂弟毛泽青。他说：

“万才老弟，你到延安来了很好哇！”

毛泽青说：

“我是来找三哥一起干革命，为穷人谋出路的。”

毛泽青号运才、咏才，韶山方言把“咏”说成“万”，故人称万才。他祖父是毛德臣，姐姐是毛泽建，胞兄是毛泽连，因之他是毛泽东同一曾祖的再从堂弟，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十，是同辈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毛泽东笑着说：

“万才老弟，你为什么想到要为穷人找出路呢？”

毛泽青说：

“因为我也是穷人，好人总是受压迫受剥削。”

“那你为什么到延安来呢？”

“因为三哥在延安，共产党在延安。只有跟着三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闹翻身，穷人才有出路。”

“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严肃地说：“万才老弟，我要告诉你，到我这里来，要官没有，要干革命有的是。当然，干革命还得要有武器才行啊！”

他说着，从皮箱里取出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掂了掂，递给毛泽青。

“送给我？”

毛泽青凝视着三哥，手却没有伸出去。

“不会打枪吗？”毛泽东见堂弟既惊奇又犹豫不决，就说：“老弟呀，不要因为不会打枪就不敢要枪，不会可以学嘛，干革命从来就是边学边干的。”

1937年12月5日晚，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任弼时，他写道：

朱任：

对进攻冀察晋边区之敌，除上月29日电及你们来电外，请注意以下各点：

（一）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二）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三）同蒲、正太路必须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四）注意在敌后方破坏伪组织、伪军。（五）加紧瓦解敌军工作。（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地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

毛　彭 5日22时

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原来在王明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真诚地希望与他搞好团结，一道工作。然而王明一到延安就把季米特洛夫交代他的话抛在了脑后，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神气十足地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要讨论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政局和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11月7日来到延安的项英也参加了会议，共13人。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在他的长篇报告中，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否定了洛川会议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3种势力的提法，不同意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谁领导谁的提法。他说：

“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他还批评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的一些观点，抹煞国共两党之间“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极力夸大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说：

“相信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蒋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中国政治制度已开始走上民主进步，人民已经‘有充分民主自由’，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要加入国民政府。”

因此，他指责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后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够，妨碍了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他**提出了一套放弃党的领导权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王明历来以能言善辩著称，又能熟练地背诵马列主义的著名警句，还写过《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因此唬住了很多人。大家都觉得他很能干，很有前途。同时，在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自称是“国际路线”而实际兜售右倾投降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像王明这样的一个极具欺骗性的报告，却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像彭德怀那样既不支持毛泽东路线，也没有拥护和反对王明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人，也为数不少。

王明投降主义的出现，声势吓人，颇为张扬。毛泽东及时敏锐地看出了问题，并与之进行抗争。他虽然没有在会议上作报告，却在两次发言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只有实行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他既拒绝王明的错误理论，又没有批评共产国际。他说：

“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就会使自己投降到国民党方面去。”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江青的确有几个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一个出身于木工手工业家庭，都有一个自私暴躁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都有过吃苦受罪的体验。其次，两人都爱学习，都有过比较艰苦的自学经历，也都做过大学旁听生；当然就两人的水平来说，不可同日而语。再次，两人在婚姻问题上的观念也有相似之处，都反对旧的婚姻观念。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们两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倔强和叛逆性格。正是基于这诸多的共同点，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谈得来。在贺子珍走了之后，追求毛泽东的女青年不乏其人，但毛泽东最终选择江青结为夫妻而没有选择别的女子，应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

**第26章**

**“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

**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话说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曾经吹嘘的“南京保卫战”仅仅经过近半月的激战便失利了。战役最高指挥官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36师掩护下渡江而去。他所下达的突围命令，只有第66、第83军两部遵照执行，成功突围。其余各部混乱不堪，惨不忍睹。南京陷落。

早在攻陷南京之前，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就策划了将南京的中国军民包围并屠杀的罪恶计划。据第6师团23联队第4中队第3分队分队长中野忠之寿笔供：“1937年12月11日以后，于江苏省下关及长江上，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针：决定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围，将中国抗日军人及抗日爱国人民从东南西北加以包围，逐次压缩包围圈，以实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杀。”

在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奸淫、放火、抢劫和血腥大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在日军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战后，据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

12月13日这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以林伯渠、张国焘、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为成员的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此时，“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在继续进行着，正讨论如何对待陈独秀愿意回到党内工作的问题。

原来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并没有吸取教训，也不承认错误，可他对毛泽东的敬佩却一直没有改变，不但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还对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大为赞赏。他认为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5人参加，陈独秀鼓励其他4人都去，而他则拒绝参加。1929年以后，陈独秀攻击“六大”路线。此一时期，他的观点与苏联托洛茨基不谋而合。10月1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决议案》。1931年5月，在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经胡适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才被释放出来。托派分子又请他出面把托派组织起来，他的回答是“各奔前程”。托洛茨基邀请他到美国会面，他拒绝了。胡适拉他去美国，说有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去写自传，他说：我的生活简单，用不着去美国。胡适、张伯苓和周佛海拉他进国防参议会，还说蒋介石答应给他5个名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蒋介石打算让陈独秀出任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斥蒋介石是“异想天开”。蒋介石又派朱家骅找陈独秀，请他另组一个“新共党”，给他10万元经费，他还是不为所动。他就是一门心思找中共中央联系，先是让他的代表罗汉先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表示愿意回到党内，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讨论陈独秀的请求时，王明坚决反对让他回到党内。他说：

“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

有人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王明说：

“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

毛泽东与陈独秀还是有感情的，但他更坚持党的原则，他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真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3个条件时，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

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其它关系，则在上述3个条件实现后，再行考虑。”

毛泽东的主张和他提出的这3个条件，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尔后，毛泽东与张闻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南京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去了上述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文。可陈独秀却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的3个条件，他说：

“我已经不是托派，所以没有发表声明脱离托派的必要。我们过去没有错误，所以也没有承认错误的必要。”

后来，董必武在1938年8月代表党组织多次去看望在四川江津县城的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与偏见，写一个书面检查，回到党内工作。陈独秀却依然说：

“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因私废公，中共中央也就没有让陈独秀回到党内。斯时已经叛变投敌的张国焘趁机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再将陈独秀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用以对付延安的宣传。蒋介石便让戴笠和胡宗南以私人身份，带了水果和茅台酒等礼品秘密拜访陈独秀。陈独秀拒不接见，戴笠、胡宗南找到高语罕通融，这才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说：

“我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问政治，更不曾有何政治活动，本人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这正是：月转圆缺光辉在，竹生枝杈气节直。

陈公本是拓荒者，局限执拗两误之。

后来，陈独秀在1942年5月27日因患高血压病逝于江津县城10公里外鹤山坪石墙院，终年63岁。

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曾经对陈独秀作了正确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再说1937年12月13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政治局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

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党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

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召集大会。

四、党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政治局暂提议为下列各项：

1、10年奋斗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奋斗的基本方针。2、如何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胜利。3、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4、在新工作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5、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此大会议程应交六中全会审核及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决定。

五、为有系统的进行一切有关召集七次大会的准备工作，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准备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织之：

1、毛泽东 2、陈绍禹 3、朱德 4、周恩来 5、项英 6、张闻天 7、张国焘 8、秦邦宪 9、赵容（即康生——笔者注） 10、廖陈云（即陈云——笔者注） 11、王稼祥 12、彭德怀 13、任弼时 14、邓发 15刘少奇 16、何克全 17、林祖涵 18、吴玉章 19、董必武 20、徐特立 21、曾山 22、张鼎丞 23、陈毅 24、杨靖宇 25、高岗

准备委员会之主席为毛泽东同志，书记为陈绍禹同志，为便利于进行经常工作，决定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由下列同志组织之：

1、毛泽东 2、张闻天 3、赵容 4、廖陈云 5、陈绍禹

六、准备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责任，在于在中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和扩大民众积极参加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准备工作。

七、各级党部对于大会之应行具体准备工作，由准备委员会秘书处拟定交政治局批准后通知全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1937年12月13日通过（签名 略）

12月14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王明原本善于拉帮结派，故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有些得势，因此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毛泽东身处此境，为了抗日大局，不得不在策略上让了一步。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张闻天竟然在这关键时刻，要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王明。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于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中央不再设立总书记职务，重新改组书记处，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

**会议决定增补刚刚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加上原书记处的张闻天、毛泽东，改组为新的5人书记处。免去了博古、周恩来、项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决定，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维汉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任中央敌区工委书记，康生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凯丰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为长江局委员、组织部长。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中共东南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丕显为青年部长，陈少敏为妇女部长，温仰春为秘书长，领导新四军工作。东南分局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

就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与王明“打了一个平局”。

由于蒋介石希望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可以组团去武汉一趟，同国民党谈判，但应很快回延安工作。

12月16日，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任弼时，他写道：

朱、任：

甲、根据聂电，平汉路以东地区现甚空虚，拟向东派出两支队游击。（一）由129师以步兵一个营附骑兵一连，深入到磁县、沙河、赵县以东之永年、广平、曲周、广宗、清河、平乡、南宫、新河、枣强广大地区活动。（二）荣臻以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组成支队，深入到石家庄、保定、定县之线以东，沧石公路以北，天津、霸县至定兴公路以南地区活动。首先即须破坏保定、高阳、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机动地区，其次沧石路之破坏亦很重要。

乙、该两支队须配足得力的军政干部及无线电台番号、独用密本。

丙、该两支队任务：（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遗散武器，扩大本身。

丁、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毛泽东　彭德怀 16日

12月17日，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以769团4个步兵连队、1个机枪连队、1个骑兵连队组成东进纵队，由386旅副旅长陈再道任司令员，东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12月18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到达汉口。

12月21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等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会见了蒋介石。王明在会见中就如何改善工农处境、调动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低三下四地乞求蒋介石说：

“我们甚望贤明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对各地有产阶级分子采取说服和立法的办法，使他们改正对于劳苦大众的态度，使他们对劳动群众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以便提高劳动者法权地位和改善劳动者痛苦生活。”

蒋介石一见王明，就高兴了。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说，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就留在了武汉。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7人组成，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不经过中共中央，擅自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他自己为副书记。王明的目的又一次达到了。

此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5人，他们是：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项英，毛泽东不得不再退让一步，予以承认。从此，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多次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他头脑发热，幻想总有一天会成为“七大”的总书记。因此，他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此时，叶挺、项英在日本租界的大和街26号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分析抗战形势，总结上海和南京失陷的教训，研究当前的工作和任务，标志着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

12月25日这一天，王明在武汉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公开吹捧蒋介石领导了全国军民“5个半月的英勇抗战”，提出了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六大纲领”，其中在第2条中强调：“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部队，有组织的进行征募兵役运动，使我国在持久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他企图以这个“六大纲领”与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抗。

12月27日，王明在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竟然说国民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说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说“国民党内部”“绝没有什么法西斯蒂一类的组织”。

后来他于1938年1月在武汉大学所作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中，否定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说：

“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它的条件。”“抗日高于一切”。

他提出了毫无原则毫无立场的所谓对友党友军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说对友党友军要：“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潮对新四军工作及武汉地区抗日救亡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时，武汉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和蚁社等进步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颇为活跃，社会影响很大。王明为了表示诚意，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下令这些团体到国民政府登记，结果一个个被国民党下令解散。王明将这些抗日团体的一部分干部输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了。

12月30日，毛泽东以他和张闻天等人的名义起草了给正在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一封重要电报，他写道：

“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3万至5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三、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及浙赣路之敌。四、鄂赣军区，准备攻击占领沿江及南浔路之敌。五、汉水军区，准备攻击占领平汉南段之敌。六、豫西军区，准备攻击平汉中段之敌。乙、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钳制作用，须建立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并指挥鲁东游击战争。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此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以上意见请考虑后向蒋提议。”

12月底，西路军部分干部经新疆、兰州、西安回到延安，他们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曾传六、李天焕。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

“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大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的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西路军失败了，但这不是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底的一天中午，校长办公室通知刚到抗大学习不久的陈先瑞说：

“下午3点，你到毛主席家里去一趟。”

陈先瑞，1914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今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给地主放牛，受尽欺凌。1929年8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 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4方面军手枪团班长，红25军手枪团分队长、中队长，红25军224团1营政委和223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鄂豫皖第1至5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 月，他随红25军长征，12 月到达陕南，月底，奉命带领223团七连和少数干部到鄂陕边区的湖北陨西、陕西山阳、镇安等地打游击，开辟鄂陕根据地，组建了鄂陕游击师。他被任命为司令。1935年2 月，鄂陕游击师改为鄂陕游击师总司令部，陈先瑞任司令员，统一指挥鄂陕边区的3、4、5、6、7、9路游击师和华阳游击大队，参加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7 月，红25军离开陕南西征北上后，陈先瑞继续领导和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9 月，鄂豫陕特委成立并组建红74师，陈先瑞任特委常委、红74师师长，率部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游击战争，部队由组建时的700 多人发展到2000 多人。1936年12 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红74师改编为南路抗日军（对内仍称红74师），陈先瑞任军长。1937年红74师在三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留守处，陈先瑞任留守处主任。同年10 月，他改任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团长。

且说这天下午3时许，陈先瑞准时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陈先瑞，国民党的报纸把你的名字写成‘陈光瑞’，不管是‘先’还是‘光’，反正你在陕南坚持斗争挺有点名气，在国民党那里是挂了号的。人家动用几万军队围攻你们，就是没搞倒你们，这说明国民党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人家还要活捉你，赏1万大洋。你知道吗？1万大洋可不少啊！”

陈先瑞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见毛泽东说起他的情况如数家珍，感到非常惊奇。毛泽东看到他吃惊的样子，爽朗地笑了。陈先瑞在桌旁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来，毛泽东坐在桌子的对面。他伸手从旁边的书堆上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支点燃了，抽起来。陈先瑞趁这个机会，打量了一下简陋的房间，又观察了一下毛泽东，只见他穿着一身旧的灰棉衣，身材挺魁伟，头发往后梳着，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很不平凡的感觉。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说：

“鄂豫皖边区闹革命是比较早的，出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你15岁就当红军了，也是一个红小鬼呀。”

接着，毛泽东问起红25军在鄂豫皖时期和在长征中的情况，又问了红74师在鄂豫陕边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

“你们在陕南干得好，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进攻你们，你们不但没垮，反而发展壮大了。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两千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们过去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总结。现在有了陕甘宁这块根据地，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

毛泽东又问陈先瑞参加抗大学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困难？陈先瑞说：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我是有决心学好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党决定办抗大，就是要有计划地把高级干部调来培训。现在，我们有很多红军干部，革命信念很坚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实战经验，但就是理论水平不高，文化学习不够，军事理论素养较低，光实干，不会讲，不能写，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挥艺术，这是不行的。我们办抗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批批来，一步步提高。你这次来学习，也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的。你们部队的任务很重，好在离部队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随时回去处理。你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政治和军事理论，联系过去的斗争经历，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毛泽东站了起来，说：

“就谈到这里吧。请你来做客，就要给客人饭吃呀！”

警卫员把饭菜端了上来，很简单，一荤三素，外加一盘辣椒。毛泽东一边往陈先瑞碗里夹菜，一边说：

“菜不好，但要吃饱，到我这里做客可不能饿着。”

饭后，陈先瑞起身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你今后常来做客。”

1938年1月1日，延安工会和工人合作社举办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帮助组织者策划以外，还亲自带头捐款捐物进行赞助。

组委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展览会之前发出了一个《缘起书》，说明展览会的宗旨是：“为着更广泛地动员和鼓励战时生产，提高工人的热忱和纪律性，奖励改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完成工人阶级在国防经济建设中，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任务。通过这一竞赛运动，在国防生产战线上，将有千万个劳动英雄产生出来。”

展览会展示的工业品有迫击炮、高射机关枪、手榴弹；有延长油厂的原油，自造的油墨、甲油、汽油；有定边盐场生产的盐，矿场的石炭、木炭、石灰；有女工织的布、手巾、裹腿，有工人合作社鞋厂生产的鞋子；还有铁器、木器、铜器、瓷器、窑器以及衣服和糖果。展品有115种420件。参加这次展览会的人数，签名者为3527人。

1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说：

“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

展览组委会给获奖单位和个人发了奖，奖状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

1月初，林育英因以前多次受伤，头疼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就这样还是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他难以坚持正常工作，便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他的病情，建议中央将他调回延安疗养。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治病。毛泽东提议由34岁的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

刘华清回忆说：“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护送邓小平政委到辽县第129师上任的任务。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1月6日，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从汉口到达南昌，与陈毅等人会合，在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内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正式对外办公。

在此期间，项英等首先建立了新四军的领导机构，正式确定：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其次健全军部内部机构设置。司令部建立参谋处、军法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秘书处，政治部建立组织部、敌工部、民运部，并开始工作。同时还分批派员赴各地传达中央指示，动员、指导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指挥部队向安徽歙县岩寺集结，筹备各种军需物资，建立新四军兵站。

1月6日这一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来到延安访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接待了他，并为他设宴洗尘。谈话中，梁漱溟问起他这次专程来延安拜访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张闻天介绍说，毛泽东既是书记处书记，又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每天要处理的事务都非常繁杂。他的习惯又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因此要见他只能安排在夜间。

是日傍晚6时许，梁漱溟便被人引领到一处地方来拜会毛泽东，毛泽东一见他就说：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到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女婿。”

毛泽东一席话，使梁漱溟惊愕得说不出话，顿了顿，他才频频点头，连声说：

“是的，有这事，有这事，好记性！”

梁漱溟，原名叫梁焕鼎，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比毛泽东大70天。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民国后担任《民国报》记者。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成为国民党党员。1916年10月，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印度哲学教师。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他的堂兄梁焕奎结识了一位知交，那就是杨怀中先生。杨怀中常到梁焕奎家中去，一来二去，梁漱溟与杨怀中逐渐相熟。梁漱溟得知杨怀中也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位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学者，便与他讨论哲学问题，还时常到杨怀中家中造访。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3月以前，梁漱溟晚间去杨怀中家，常常见到一个高个子湖南青年为他开大门。他们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未互通姓名。梁漱溟在客厅与杨怀中交谈，这个青年也从不加入。梁漱溟以为他是杨怀中湖南的亲友或同乡，就没有问过。后来杨怀中告诉梁漱溟：

“这位青年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他叫毛泽东。”

杨怀中还说，经他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白天上班和学习，晚上回杨家住宿。梁漱溟并没有记住毛泽东这个名字。杨怀中病故后，因其身后萧条，蔡元培校长出面发动募捐，资助杨家办丧事，梁漱溟也是出资者之一。1920年，梁漱溟著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与批评。1924年，他辞去北大工作，到华南、华东一带考察，主张乡村建设。从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率领他的信徒，从事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而此时的蒋介石为了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最高国务会议”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邀请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借以装点门面。梁漱溟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也在蒋介石邀请之列。于是，他就成为参议会的参议员。不久，参议会被国民参政会所取代，梁漱溟也随之成了参政员。

梁漱溟着实没有想到，如今站在自己面前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是20年前那个经常替他开门的同龄的湖南高个子青年。他望着眼前的毛泽东，顿时产生了一种老熟人重新相逢的感觉。毛泽东豪爽热情的笑声，更使他那书生气的拘谨在片刻间化为乌有。

他们这第一次谈话的地点，不是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而是被安排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6点时分天已擦黑，工作人员掌上了灯。时值隆冬，延安的气候非常寒冷，屋里却显得异常暖和。毛泽东对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散热的缘故。二人叙旧已毕，谈话转入了正题。梁漱溟首先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

“我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我个人心中也十分悲观。不知道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来到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没有插话，只是抽烟，喝水。等梁漱溟说完了，他面露笑容，十分果断而斩钉截铁地说：

“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口气就这么肯定，神态这么坚决，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他又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分析了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他还说：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3个战略阶段。在3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将由敌强我弱转化为敌弱我强，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说：

“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他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件，他看过、听过，个别交谈也有过几次，但从来没有毛泽东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他接着说：

“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受益良多。”

毛泽东谦虚地说：

“梁先生过奖了。”

梁漱溟话锋一转，询问起有关国共两党合作和国家统一问题，毛泽东一一作答。梁漱溟又说：

“在我看来，中国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回答说：

“梁先生的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

听到毛泽东如此说，梁漱溟感到振奋和鼓舞，索性将自己对中国建设问题的看法，全部兜了出来。毛泽东等他说完了，强调说，在目前应当一切服从抗战。梁漱溟则说：

“这在我也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一事。我认为，此一决定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一则，真心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根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二则抗战必求他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如果我们自己的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使梁漱溟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竟然再次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转眼间，已是后半夜了。毛泽东客气地说：

“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我们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漱溟起身告辞，将他的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他说：

“我先送您一本书，请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泽东说：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

此后，毛泽东又先后与梁漱溟长谈了7次，据梁漱溟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8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6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

1月7日，毛泽东与梁漱溟进行了第二次长谈，也是从下午 6点开始的。这次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双方欲罢不能。梁漱溟称这次长谈为“互不相让的争论”。

他们谈话的内容是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取出一卷纸，纸上已将梁漱溟书中的要点全部摘录排列得井井有条。他说：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过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他说：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表示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能苟同，他说：

“中国社会和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阶级。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在中国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

梁漱溟引用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坚持主张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说服不了谁。梁漱溟总是坚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

毛泽东说：

“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它社会相似的一般性。”

梁漱溟马上反驳：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性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乎？”

毛泽东不得不叹息道：

“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

他们的争论虽然激烈，互不相让，但二人都没有动气。梁漱溟后来在《访问延安》一文中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还描述了他和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情形：“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后退一步。我们的争论很激烈，但毛主席从没有动气。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好像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的心情，退出他的住室。”

梁漱溟后来在93岁时，再次向采访他的记者描述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他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留存，听下回分解吧。’”

欲知毛泽东和梁漱溟后来的关系怎样？请往下慢慢看。

东方翁曰：从上一章末到本章讲述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又同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比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次斗争更艰难，更具有危险性。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共中央首先占有领导地位的优势，其次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因此，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战胜一个拥兵自重的莽夫，虽有惊险，但还是有充分的自信和完全的把握的。而这次同王明的斗争，毛泽东除了智慧，就没有其它优势了。一是王明打着国际旗号，二是党内大多数领导成员都站到了王明一边；更要命的是，张闻天竟然要将总书记让给王明。毛泽东好不容易不动声色地同王明打了一个平手，周恩来又擅自将长江局书记让给了王明。长江局里的政治局委员就有5人，使王明实际上拥有了第二中央。**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继续让步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像以前将王稼祥送去苏联治病一样，决定将任弼时派到共产国际任职，争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以期实施绝地反击**。实际上，毛泽东同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斗争是终其一生的大事情，只要认真研究一番党内斗争的全过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第27章**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

**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话说1938年1月10日，聂荣臻领导的115师一部宣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并通电全国，宣告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对此，王明却说这样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应该“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

不管王明高兴不高兴，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1938年初，刘伯承率领的129师主力开创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贺龙率领的120师在大力开展晋西北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游击队和自卫军及各种群众组织，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先后发动了二三十次抗日起义，在冀鲁边、鲁西、太西、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区，奠定了抗日基础。

1月12日晚，毛泽东给艾思奇写了一封回信。

艾思奇是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聆听了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后，认为很有必要在延安开展鲁迅研究，但苦于手头资料有限，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借阅《鲁迅全集》，并谈到了其它一些问题。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儿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 1月12日夜

艾思奇看了毛泽东的信，犹豫再三！心想，去还是不去呢？今晚是星期三，若是不去，岂不是失去了请教的难得机会，这是何等的珍贵呵！于是，他便立马去拜访了毛泽东，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谈兴大发，竟通宵长谈，忘记了时间。

这次长谈使艾思奇了解到毛泽东读过的哲学著作竟是那么多，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穆勒、歌德；从中国古代哲学到当代国内外哲学家，都涉猎到了！而且他那恢宏的哲学思想，剖析问题的尖锐、深刻程度，更是令人折服。他们越谈越投缘。毛泽东抽着烟，在窑洞里慢慢踱步。当他们谈到“实事求是”问题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篇文章里，对‘实事求是’这句话有新解。‘实事求是’并不是像普通意味上的小心翼翼地循规蹈矩之谓，而是能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法则以决定方针动向之谓。是不是这样的？”

艾思奇没想到毛泽东读自己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一文读得这么认真、这么细心，连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的新解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由得为之感动和敬佩。当艾思奇走出凤凰山麓吴家院毛泽东的窑洞时，天色已经破晓了。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要有一套《鲁迅全集》。

后来在8月份，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第一版600万字的20卷本《鲁迅全集》，分为甲、乙、丙3种纪念本。甲种纪念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乙种纪念本是皮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丙种本为普通的平装本。乙种纪念本编号印制200套，非卖品。经艾思奇联系，出版社赠给延安两套乙种纪念本。毛泽东得到的一套编号为第58号。自此，他常常秉烛夜读，认真地圈圈划划，批批点点。后来，他一直把这套书带到了中南海。

1月25日，梁漱溟经过20天的参观、访问和会谈，就要离开延安返回西安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场为他送行。临别之际，毛泽东请梁漱溟多提意见，梁漱溟说：

“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

毛泽东说：

“不行，这是客套话。”

他非要梁漱溟提出批评不可，态度十分诚恳。梁漱溟便直率地说：

“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点头微笑，表示谢意。他还说：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说罢，二人握手，互道后会有期。后来梁漱溟果真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回到武汉就找了《反杜林论》阅读。

梁漱溟在延安曾参观考察了边区的党政机关、学校、乡村。延安的几所学校像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艺、机械学校等的办学模式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学校）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吃饭总是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在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再说1月间，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影响下，傅作义派周北峰到延安面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即派潘纪文为党的驻傅作义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青年学生也从延安前往河曲傅作义部。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和从西安招来的青年担任。潘纪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主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傅作义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组织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引起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不久，傅作义不得不礼送潘纪文等人出境。

1月30日，陕北公学第一期学生毕业，毛泽东为他们题了词。这是他为陕北公学第2次题词，他写的是：

**“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

1938年春，毛泽东在一个横格本上写了7页的《读书日记》，日记开头即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从这个《读书日记》看，他从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读了李达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从3月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5日，他写的是：“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在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后经过修改和扩充，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1936年，李达的《经济学大纲》也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李达将这两本书先后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称《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致信李达，称赞他是“真正的人”。

据郭化若回忆，在和李达取得联系后，毛泽东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他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笔者注），我已经读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10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还寄来一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它10遍。”

后来在1939年1月，李达受冯玉祥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祥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毛泽东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此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而留在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却误会了，以为李达是在“拿一把”，他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后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周恩来回重庆后对博古这种做法很不满，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

1938年2月初，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在赣州河西三宝经堂病逝，享年68岁。此时贺敏学在江西大余县池江任新四军办事处主任，贺怡亦因工作关系不在父母身边。项英、陈毅、杨尚奎等人指示在信丰油山的游击队凑了100元银洋作为贺焕文的安葬费，派人送往赣州。贺敏学、贺怡赶到赣州，与地方党组织一起将父亲葬于赣州城郊。

贺敏学与贺怡为了让母亲温杜秀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派人将老人送到延安，跟着贺子珍过日子。可是贺子珍早已去了苏联，毛泽东就把岳母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奉养，直到1941年老人病逝。毛泽东把岳母安葬后，还为老人立了一块石碑。

后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温杜秀的坟墓挖了。在延安收复后，毛泽东自己拿出10块银元，请当地老乡为岳母重新修了坟墓。这也是毛泽东做为女婿的赤诚孝心，着实令人钦敬。

2月4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发展，破坏敌之铁路交通，打击和牵制敌人。

2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据此重提创建冀东根据地的雾灵山计划。他分别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等，请他们即刻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是干部配备。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派5000人去冀东所需要的半年经费和装备。

冀东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现在，为配合国民党军徐州会战取得胜利，实施这一计划的时机成熟了。

2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发展雾灵山游击战争的电报给前方。

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说，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

后来在1938年5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在毛泽东4月21日指示的再一次催促下，抽调第120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1个支队，在平西（今北京以西）宛平县斋堂、杜家庄地区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辖第11、第12支队和独立营、骑兵大队，共5000余人。5月31日，八路军第4纵队由平西斋堂出发，向冀东挺进，开始了创建冀东、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县的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的竹沟等地集结整编。

不久，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除琼崖地区冯白驹领导的游击队和拒不下山的游击队外，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都集结到了指定地域，他们是：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领导的闽西南游击队，约有1200人，500多支枪。

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有920余人，500多支枪。

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游击队，有1100人，350支枪。

黄道领导的闽浙赣游击队，有929人，319支枪，3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

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游击队，有600人，200支枪。

钟得胜领导的闽赣游击队，有300人，150支枪。

关英等人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队，有398人，75支枪。

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队，有335人，200支枪。

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和桂东游击队，有450人，215支枪。

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有900多人，500支枪。

周骏鸣领导的豫南桐柏山游击队，有600人左右。

刘厚总（后来，他枪杀了项英等人）、李林领导的两部分湘南游击队，合计300余人。

吴德标领导的闽中特务大队，近200人。

经过统编，新四军全军共有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

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16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第1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2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享喜，参谋长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萧国生。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第3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部主任钟国楚；第4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参谋长王胜，政治部主任缪海涛。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第5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桂蓬州，政治部主任刘文；第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参谋长黄元炎，政治部主任源英平。

第4支队：由鄂豫皖红28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第7团，团长曹玉福，副团长杨克志，参谋长林英坚，政治部主任胡继亭；第8团，团长周骏鸣，副团长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徐祥茅；第9团，团长顾士多，副团长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部主任郑重。

另以湘南及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军部特务营。李林任副营长，吴德标任2连连长。

再说在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因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2月22日。”

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等，表示同意，并提出请王明准备政治报告。

2月9日，王明、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不能不公开答复之机会。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长江局1月份在武汉创办的机关报——笔者注）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在初春的一天，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领着一位左翼青年作家来拜会毛泽东。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舒群。

舒群是在报道了平型关伏击战之后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他在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里拾得了《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4本莎士比亚名著和《石索》、《三希堂》各两卷残帖，如获至宝。到延安之后，他认识了被毛泽东誉为“江南才子”的朱光，两人一见如故。朱光便引他来见毛泽东。

舒群虽然是初次见到毛泽东，但却似与故人重逢，欣喜不已，立即将挎包里的《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石索》、《三希堂》一一拿了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承想朱光眼疾手快，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名著夺了过去，说：

“这些归我。”

毛泽东顿时急了，连连说：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朱光却笑嘻嘻地说：

“见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说，剧本理应归我。”

“谁说应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就喜欢读他的书，《资本论》里还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圣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过，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说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岂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依然面无愧色，强词夺理：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书帖归你，剧本归我。”

舒群见他们二人各不相让，急忙进行调停，说是可以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见他如此说，只得留下《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将《哈姆莱特》、《仲夏夜之梦》和《三希堂》交还给毛泽东。他笑嘻嘻地问毛泽东：

“这样分配总算合理了吧？”

毛泽东看了一眼这位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江南才子”，只得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

“权既在你手，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虽是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怎么不能？”朱光说：“你先听我背诵一段独白：‘且慢，在你们未去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绩，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用不着说了。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未来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

他的语言节奏及表演神态无不恰到好处，只是粤音有点浓重。毛泽东说：

“你的口音不够国语化。”

朱光毫不谦虚地说：

“我的表演，超群出众，精彩绝伦。”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欣赏领教？”

“岂敢！岂敢！”

就这样，毛泽东眼睁睁地看着朱光把到手的“宝贝”给夺走了一半。这才叫：

一个是嗜读如命，见书眼开。

一个是闻剧起舞，横刀夺爱。

这小友耍赖，说是见面就要分一半；

惹领袖侧目，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很无奈。

且说2月11日晚7时，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全文如下：

同志们！

今天的反侵略大会，不仅是延安的，而且是全国的，全国各地在这几天均举行同样的大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反对侵略战争。这个大会又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在明天，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几十国代表都参加，表示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开始。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种侵略阵线，破坏世界的和平，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这样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过去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伟大的世界运动，还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动员全世界地区的大运动，现在是全世界大多数好人向着世界上少数坏人算总账的时候。

因为中国今天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的全国大团结，现在已经有了基础。正在向着前途扩大，尽管暂时打了一些败仗，失了一些土地，但这样伟大的团结，是力量无比的，加上世界与日本人民的援助，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有3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3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主要因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这3种统一战线，正如日初升，向着日益巩固，日益扩大的方向走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因此今天延安城的大会，有它的全国性及世界性的意义。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人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日本国内的广大人民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这个目标就是反侵略，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这样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的大团结，其力量是如何伟大，这种伟大的力量是无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去，最后把它打倒，因此我们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设是必然的。

2月14日，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

“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现首先以第1支队出动，第2支队则在第1支队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叶挺偕陈毅今晨去绩溪会晤顾祝同，要求新四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苏浙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机动任务。如不能取得所希望要求，则一面到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不在岩寺集结停留。”

2月14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延长、延川、宜川3个县残疾医院的200多个伤员在延长集中，要到延安找毛泽东请愿。两延河防司令员何长工听说这么多人要到延安去找毛泽东，这还了得，就立即前去做工作。

原来，这几个县的残疾医院都是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成立的，住院的主要是长征中和抗战初期负伤的一些病员。医院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生活设施简陋。再加上有些伤员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以及医务人员态度生硬，对伤残病人关心不够，有的伤病员就不愿意在这里生活，要去延安找毛泽东反映问题。何长工了解到这些情况，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在电话中指示说：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我们确实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你转告伤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专门找来何长工，商量怎样改进医疗状况。他还特别提出这个医院的名字不好，“残废医院”这个名称对伤病员人格不尊重，建议把医院名字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并任命何长工为总院长。

尔后，在毛泽东指导下，延安专门召开了荣誉军人教导院工作会议，有60多位伤病员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从客观上说，边区条件确实很苦，伤员同志都来延安不大可能。从主观上说，我们有官僚主义，本来工作可以搞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没有抓紧解决大家的困难。这方面大家批评得对，要求到延安来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过去工作没有搞好，具体谁负什么责任就不要追究了，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去抓这一工作。”

会后，毛泽东还针对伤病员的具体情况，让周恩来负责同国民党方面联系、交涉，允许一些南方来的伤病员回老家去，把他们照顾好。后来经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将1000多名不习惯北方生活的残废军人，送回了南方老家。

2月1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提出了关于115师分3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

朱彭林左并告周叶：

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3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你们考虑下述问题并电复。

甲、用115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乙、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

丙、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

丁、如第一步实行后，河南、武汉危急，则或不去山东，将第三步改为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东，而以陈旅出安徽，此时当另以129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这时当依情况再定。

戊、但115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

己、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之政治作用很明显不必说，从抗日军事战略说来，也是必要与有利的。问题是比较带冒险性，实际可能程度如何，主要是大小河流障碍能否克服问题。

庚、如经你们考虑认为可行时，则请周叶向国民党接洽出河北的各种必须事件，但切不可提出出黄河以南的问题，第二步以下完全不要提。

　　 毛　滕 15日

接着，毛泽东又给项英、陈毅发了一封回电，指示说：

“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4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有1个在茅山山脉，另1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发动策应。”

后来在2月20日，根据新四军的命令，第1、2、3支队向岩寺集中，第4支队向合肥、舒城、无为地区集中。

2月15日，毛泽东给范长江写了一封长信，回答了他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阐述民主政治与党领导军队的意见。

原来，范长江在接到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给他的信后，非常兴奋，一连给毛泽东写了好几封信，继续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在给15日的复信中说：

“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的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我在去年5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

毛泽东还在信中对范长江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表示赞赏。

不久，范长江与胡愈之等人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的新闻事业机关“国际新闻社”，向海内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1939年，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工作。

2月15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1、抗战形势及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问题。2、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

2月22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第6、7、8、9、10队学生毕业题词。这是他第3次为陕北公学题词，他写的是：

“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

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长江局关于政治局会议决议：1、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委托绍禹、恩来两同志作为向政治局会议之建议；2、会议日期建议以两日为限；3、长江局由绍禹、恩来同志回去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议后立即返汉；4，会议后请求中央多派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

在2月间的一个午后，毛泽东身穿一件灰色棉军装，脚穿棉布鞋，正坐在一张藤椅上伏案批阅文件。警卫员小王揭开窑洞门帘，轻声报告说：

“主席，朱仲丽医生来了。”

“好，请进！”

一位身着棉军装年龄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女子，随着毛泽东召唤，轻盈地步入窑洞。毛泽东将毛笔放在盛满墨汁的大砚池上，合拢文件，站起来转过身子，指着身边的椅子对那名女子微笑着说：

“请坐。”

“毛叔叔，你健旺！”

女子乖巧地脱口而出，向毛泽东表示了很亲近的问候。她又忙不迭地将右手举到帽檐上，两腿并拢，喊了一声：

“毛主席，敬礼！”

毛泽东看着这女子的一番动作，禁不住笑了起来，说：

“来，坐这儿。”

你道这位年轻女子是谁？她就是萧劲光夫人朱慕慈的小妹朱仲丽。朱氏姊妹的父亲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朱慕慈是朱剑凡的长女，朱仲丽是朱剑凡最小的女儿，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毛泽东在20年代和朱剑凡是忘年之交，经常到朱剑凡家里去拜访。那时仅有数岁的朱仲丽管毛泽东叫“毛叔叔”，而毛泽东则亲昵地称她为“八妹子”。

毛泽东看着朱仲丽有点拘束的样子，就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时间过得真快呀！你长大了。我在长沙看见你的时候，你刚学会讲几句话，走几步路，今天倒会向我敬礼了！”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望着朱仲丽又说：

“噢，是个医生了。读了几年？”

朱仲丽回答说：

“读了5年，实习2年，才算毕业。先是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后来又到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医院。”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不错嘛，一共7年，是医学硕士喽。牌子响当当的。”

“我的经验不多。”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突然又问道：

“你是想当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医生，还是想当一个‘蒙古大夫’呢？”

朱仲丽说：

“我不当卖狗皮膏药的医生，因为狗皮膏药百病都治，又百病治不好。也不当‘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病人，敷衍了事。当然，我也不愿意当像交易行里做买卖的医生哩！”

“咦？倒看不出你很会讲话哩，我也受到了你这个医生的启发啦！”

毛泽东说完，开怀大笑起来。朱仲丽连忙说：

“哪里。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种医生，是专门为老爷太太们服务的。你来边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医生，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

毛泽东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接着说：

“当医生的人，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还要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缺乏这个基础，就容易成为自私自利的医生了。”

他见朱仲丽不住点头，又说：

“现在，你是个大医生了，要记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为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是的。毛主席，我记住了。我一定不骄傲。当年我爸爸有学问又有钱，为了革命，也没有骄傲过。”

毛泽东见朱仲丽提起朱剑凡，沉默片刻，问道：

“他何时去世的？”

“我爸爸逃难到上海，开了一个地下酒店，忧国忧民，痛恨蒋介石，向往苏区，忧出胃病来，1931年竟不治而去。”

“你爸爸是个好人，是一个难得的教育革命家！我年轻时，在长沙闹革命，曾住在你爸爸办的周南女校内，吃饭住宿都不叫我付钱。他过早地去世了，很可惜。你到延安的革命行列里来，是继承父志喽！”

“是的，毛主席。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是爸爸的遗愿。”

朱仲丽说完，起身将双手一直捧着放在膝上的礼品，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说：

“毛主席，我妈妈问候你，叫我带来一包火焙鲫鱼，虽然只有这么一点儿，却都是家乡味儿。”

她说着把包打开，拣出一条3寸长的火焙鲫鱼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鱼就放在嘴里嚼。朱仲丽问：

“好吃吗？”

毛泽东边嚼边点头，说：

“好吃，好吃！我好久没有吃到家乡的火焙鲫鱼了。”

他重新点燃一支香烟，接着说：

“今日看见你长大了，当医生了，很高兴。从今天起，我有病，就请你来看，你愿意吗？”

朱仲丽高兴地说：

“愿意，愿意！不过我作为医生，第一请求你多散步；第二请求你少吸烟，最好戒掉；第三个，增加睡眠的时间……”

毛泽东不待她说完，就说：

“你大概还有第4个要求。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今天早晨4点钟才睡觉，起床到现在只喝了杯茶，还没有吃早饭的话，是不是要我多吃一点饭？”

朱仲丽是何等乖巧伶俐的人，闻言立即站起身来，说：

“哎呀！那您快点吃早饭吧，我告辞了。”

毛泽东也站起身，握着朱仲丽的手，说：

“好吧，我不留你了，写信问候你妈妈。”

欲知毛泽东此后与朱仲丽交往的情况，请耐心往后看。

东方翁曰：王明等人从2月7日建议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到2月15日、23日致电中央，越权安排政治局会议的具体内容及时间要求等等；其间，他还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文章，完全以太上皇自居，真可谓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了！历史上的短命闹剧大抵如此。当是时也，毛泽东只能隐忍不发，权且让他们表演一番罢了！

**第28章**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话说1938年2月下旬，林育英从前线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毛泽东见他的病情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就和张闻天说：

“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但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心里很难过。”

张闻天说：

“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

“还未想到。”

毛泽东说：

“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

“这个办法可以。”张闻天极力赞成：“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此后，中共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不久，苏联派来的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林育英对此事并不知情，飞机来了，别人才告诉他说，是专门接他去苏联治病的。林育英说：

“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只好遵从他的意见，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飞回去，便将延安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上专机，去了苏联。

2月27日，从武汉回到延安的王明、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8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明、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会议一直开到3月1日，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推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应召在2月下旬从抗日前线回到了延安。

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没有写成一个决议，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他还说：自1937年12月以来的3个月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进步。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个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我们对领导中国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热烈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更大的发展，更大的增强，以领导我国军民抗战；我们不仅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使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

王明同时否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说：

“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八路军新占的区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在军事上，王明把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5个统一”，发展为“7个统一”，即：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还主张八路军、新四军要进行正规战。他说：要坚决地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王明的意见引起了在王明回国之前就主张打大仗打运动战的那一部分人的共鸣。所以他的主张再度为与会多数人所拥护。就**在这紧要关头，跟着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康生，却反对王明的意见。他当着王明和张国焘的面说：**

**“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呢？还不和张国焘一样断送了红军？这个历史的错误，我们再也不要犯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再说在2月27日这一天，日军第20师团占领山西临汾，第109师团西犯，占领军渡、碛口。

2月28日晨，毛泽东致电林彪等人说：

“敌从军渡、碛口两点猛击河西，准备渡河，绥德危急。”“应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派出足够的工作员大力发动石楼、永和两县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渡河点。”“主力应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2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的力量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性。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

毛泽东还说，在军事指挥关系上，八路军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主要战术是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从游击队发展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根据地，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据点。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张闻天、任弼时、康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虽有进步，但是合作中确实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他还提议，“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运工作上去。与国民党的谈判则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在战区，发展党最为有利。”

1938年3月1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发布为召开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

毛泽东鉴于王明等人在武汉的非法活动已经对中共中央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同时也由于武汉战事吃紧，便在会议上提议说：

“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了。”

**会议在表决毛泽东的提议时，只有康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其余人都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经过争论，会议最后决定，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王明虽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由于毛泽东的巧妙抗争，最终仍像“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一样，没能通过一个正式决议或形成一个统一文件，这就使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再度获得成功。政治局中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或附和他，致使右倾投降主义在会议上占了上风。此时的王明已经昏昏然飘飘然了，他认为，到七大时自己坐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后来在武汉的工作中，便不知天高地厚，目无党纪党规，随心所欲，乱来一气了，先是以个人名义在3月11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3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诡称“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扬；尔后，他又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受毛泽东派遣，立即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他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八路军武器援助。

3月1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鉴于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后来在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总额150名，任期一年，正副议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现任官吏不得为参政员，中央各院、部、会长官得出席会议，但不参加其表决。国民参政会的一切决议须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

随后，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共产党方面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邓颖超7人被选为参政员。

再说3月2日清晨，林彪穿着一件黄色日军大衣，骑着大马，带着115师直属队一个骑兵班遛马兜风。说起他胯下的这匹坐骑，可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此时115师的防区与晋军的防区相邻，林彪一时兴起，未及多想，一马当先便进入了阎锡山第19军防区内的山西隰县千客庄。驻防的19军哨兵带队班长远远望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飞驰而来，误以为是日本骑兵来袭，慌乱中来不及仔细辨认，便下令开枪。只听得“嗒、嗒、嗒”一阵枪响，其中一发子弹击中了林彪的胸部。随后赶来的骑兵见师长受伤落马，立即找来担架，将他抬回师部卫生所。师卫生部副部长听到消息后，一边命令部下准备药品和医疗器械，一边带着医务人员来到林彪身边，仔细检查他的伤势，发现子弹打断了两根肋骨，并未伤及内脏，便立即对伤口清理消毒，贴上生肌药。

115师政委罗荣桓将林彪受伤的情况电告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消息后，都给林彪发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暲来为林彪治疗。林彪刚满30岁，年轻气壮，在傅连暲的精心治疗下，身体恢复比较快，7天伤口都快愈合了。但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建议送林彪到后方休养。毛泽东回电指示，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林彪的师长职务，将林彪送回延安疗伤。

林彪回到延安后，各机关、各学校的负责人和师生们纷纷前往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育英等人也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林彪见到林育英，吃力地握着他的手，说：

“八哥，日本人没打着我，却意外地被国民党的哨兵给伤了。真没有料到。”

林育英惋惜地说：

“当初，咱们弟兄离开延安的时候，都下了决心，一定抓住这次到前线的机会，多消灭一些日本鬼子，为中华民族争口气。没有想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因病回了后方，你又因伤回了延安。”

林彪难过地说：

“我这回伤得比较重，恐怕一下子难以上前线了。”

林育英安慰他说：

“养伤不能急，还要心情愉快。你个性内向，不爱讲话，养病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此后，林育英每隔一两天总要去看看林彪。林彪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症，这一枪又伤及了脊神经，日后给林彪带来了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由于长期使用一些吗啡和杜冷丁之类的药物，久而久之，反而服药成瘾，还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此是后话。

再说3月3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6至10队的毕业典礼，发表了题目为《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的讲话，他说：

“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有陕公中国就不会亡。”“你们是进步分子，是创造新中国的分子。因此，陕公代表着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个缩图。”“我们陕公的方向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走这个方向便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中国抗日的总的方向必然是胜利的。”

毛泽东最后说：

“你们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3月4日，毛泽东托去苏联的人给两个儿子带去了一封亲笔信。

原来在这3月初，从苏联回来的人给他捎来了两个儿子的照片，他高兴得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完没了。

本传前边说过，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将被送到上海的毛岸英哥仨安置在董健吾的家里。后来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董健吾也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武汉，毛岸英兄弟3人的生活就无着落了，他们终日流浪街头，居无定所。岸英、岸青到烧饼铺当学徒，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就靠卖报、捡破烂、帮助推人力车挣几个小钱维持生命。不久，幼小的老三毛岸龙与两个哥哥失散了，有资料说他是经不起折腾，病饿而死了。他唯一留在世上的是一张在大同幼稚园与小朋友们的合影。透过泛黄的照片，他那充满稚气的小脸还依稀可见。再后来，毛岸青在卖报时看到了一则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上面写着：“军息：伪中央区所属之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鳝口东北大山中，本月26日，经我毛炳文部24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击毙……”毛岸青看着看着，眼泪模糊了双眼，妈妈死了，小弟弟失踪了，小叔叔也死了，他越想越恨，从口袋里掏出半支粉笔，在漆黑的电线杆上写下了“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巡捕和便衣特务看到了，跑过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岸青倒在了水泥地上。毛岸英闻讯赶来，见弟弟已经昏了过去，鼻孔、眼角流着鲜血。毛岸青苏醒后就听不到声音了，他被打成了脑震荡。还是在冯雪峰到了上海以后，才找到了他们，小哥俩终于结束了流浪街头的生活。1936年6月底，地下党组织通过张学良的关系，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一同带出国去。1937年初，李杜一行几经辗转，到达了莫斯科。毛岸英、毛岸青先后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和伊万诺夫城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从此与父亲有了联系。

毛泽东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上写道：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给我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此时的毛岸英、毛岸青不仅得到了父亲的关爱，同时也得到了贺妈妈的呵护。

那是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干部模样的女人，来到毛岸英、毛岸青在儿童院的住处。阿烈耶夫叫着他们的俄文名字说：

“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毛岸英哥俩一愣，心想，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来看我们呢？他俩打量着来人，只见她30岁上下，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微笑。她回头问阿烈耶夫：

“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阿烈耶夫说：

“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这是弟弟岸青，叫戈勒。”

阿烈耶夫介绍罢，又对毛岸英哥俩说：

“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现在东方大学学习。”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叫文英。”贺子珍脸上洋溢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毛岸英哥俩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是太生疏了。他们既不向贺子珍喊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的事儿。贺子珍见两个孩子不说话，又补充道：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

阿烈耶夫见他们已经接上了头，招呼贺子珍坐下就走了。贺子珍见哥俩的床铺又脏又乱，就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为他们收拾起来。整理好后，又弯腰把床下清理好。把他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洗净、晾开。毛岸英哥俩看到贺子珍忙里忙外，觉得过意不去，也就跟着干起来。忙完了，3个人才坐了下来。贺子珍把削了皮的苹果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手里。毛岸英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贺子珍面前。

贺子珍所在的东方大学离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去看毛岸英哥俩。她每个月领到的70卢布津贴除了自己开销，其余的全用在了小哥俩身上。渐渐地，小哥俩就主动地到贺子珍住的共产国际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来玩了。1938年5月，毛岸英、毛岸青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贺子珍，不知道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就决定去看看她。哥俩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他们明白，这是父亲的又一个儿子。

“哎唷，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那高高大大的额头，很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小弟弟还真像爸爸。”

毛岸青说着就去轻轻地摸他的小手腕。贺子珍见小哥俩高兴，就说：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从此，贺子珍的小房间就成了毛岸英哥俩与亲人团聚的家。贺子珍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如何爬雪山，如何过草地，讲他们的爸爸，也讲自己负伤的痛苦经历，还给他们唱江西民歌。毛岸英也帮助贺子珍学习俄语。

贺子珍满月后，为了回到东方大学读书，就把孩子送到了婴儿室。小孩在10个月的时候患了感冒，贺子珍怕影响学习，不想请假，仍然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婴儿室的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小孩转为肺炎，没来得及送医院就夭折了。贺子珍流着泪把孩子葬在郊外的一处公墓里。

有一天，毛岸英哥俩回到这个温暖的家里，发现贺子珍变了，衣衫不整，也不梳洗，无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再一看，她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的、呆呆的样子。毛岸英诧异之际，突然发现小弟弟没有在房间里，急切地问：

“弟弟呢？小弟弟呢？”

贺子珍闻言，忍不住悲痛，嚎啕大哭起来。毛岸英这才知道可爱的小弟弟因患肺炎而夭折了。哥俩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如涌泉般地哭了起来。稍顷，毛岸英劝贺子珍说：

“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贺子珍闻言，渐渐止住了哭声。不久，毛泽东再婚的消息，隐隐约约地传到了他们那里，贺子珍还不怎么相信。毛岸英和弟弟想方设法使她高兴，有时讲故事，有时说笑话，只是闭口不提他们时时都会想到的那个人——他们的爸爸毛泽东。

且说在3月6日，毛泽东给彭雪枫回复了一封电报。

此前，彭雪枫在对鄂豫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后，在3月1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说：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绝对必要。党从现在起，即应重新估计这一地域，目前应：1、迅速发展并健全党的组织；2、轮番训练大批当地的党军群众工作干部；3、相机扩大而重心在于提高高（敬亭）周（骏鸣）两部军事政治水平。

为此，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雪枫：

电悉。甲：观察甚当。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乙、干部可从抗大、陕公毕业生酌派一部给你们，并望从豫南各县优秀青年中挑选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学习。丙、经费不足可否斟酌考虑向民众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将变化，熬过短时期就有办法。丁、你们中心根据地在何县何区？派人来走何路到何地与何人接触？即告。陇海路即将隔断，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县至泌阳、桐柏这几条路。

毛泽东

3月间，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毛慎仪与文静纯的女儿章淼洪，在表哥文赐生的护送下，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来到了延安。

原来在1937年，王淑兰突然接到了毛泽民从延安发来的一封信，要求把女儿毛远志送到延安学习和工作。是年年底，王淑兰把女儿送到了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把她们和章淼洪等一起护送到了武汉。

毛远志到延安时，爸爸和钱希钧已经去苏联了。第二天，她带上妈妈特意做的云片糕，来看望伯父。毛泽东见到远道而来的侄女非常高兴，一边吃着云片糕，一边说：

“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了。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毛远志回答说：

“妈妈送我到了武汉，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毛泽东说：“四嫂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你还有个大哥，你知道么？”

毛远志说：

“不知道。”

毛泽东说：

“可惜他活到7岁时，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治疗，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

毛远志想起妈妈嘱咐的话，就对伯伯说：

“临行前，妈妈一再交代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不要打搅您。”

她还说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毛泽东说：

“你年龄还小了点。”

说着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毛远志念，毛远志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他笑着说：

“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

毛泽东提笔给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毛远志去延安鲁迅小学读书。毛远志又和伯父说了一会儿话，不便久留，就要告辞。临走前，她向大伯讲述了妈妈讨米干革命的经历，向大伯提出建议说，组织上是否可以给予妈妈一点资助。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应，要她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向上级反映。后来，毛远志将她妈妈的情况反映到陈云那里，陈云说：

“需要寄多少钱？”

毛远志说：

“20元就够了。”

陈云说：

“不算多。你提出的要求太低了。”

毛远志刚到延安，不习惯吃陕北的小米饭，加上她有胃病，有时就到食堂找米饭锅巴，用热水泡泡吃。毛泽东的一位秘书看到了，给了她一块钱，叫她每天花5分钱买碗粥喝。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毛远志叫去，说：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毛远志听了伯父的劝告，开始练着吃小米饭，很快也就适应了。

欲知毛泽东的亲人们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三月政治局会议”可真够凶险的！张闻天要让总书记在前，周恩来让出长江局书记在后。更为严重的是**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在国外的王稼祥之外，只有康生、任弼时、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而在反对王明去武汉的问题上，就只有康生一个人支持毛泽东了。其他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反水，站到了王明一边。**毛泽东又处在了十分孤立的地位。遵义会议后刚刚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却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不动声色地派出了任弼时，后来又派出了刘亚楼，他要来一个釜底抽薪。这的确是高明之举！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 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 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这就是毛泽东在党内屡遭孤立的真实原因。

**第29章**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话说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第4次为陕北公学题词。

陕北公学为争取各界对学校的援助，编了一本小册子《援助陕公》，请毛泽东题词一并出版。毛泽东的题词是：

“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它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它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任务，我认为也应当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

3月11日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为准备第二天将要召开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请郭化若去书写几副挽联。郭化若看了几位老领导撰写的挽联稿子，觉得写得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修改，就派人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

晚11时，经毛泽东修改的稿子送回来了，郭化若看着改过的稿子，一幅比一幅改得好，既符合挽联的格式，又讲究平仄，还有新思想新风格，便开始挥笔书写。

大约在凌晨1时半，毛泽东办公室又送来了稿子。郭化若一看，这稿子是毛泽东亲自拟的，一共有3副，一副比一副精妙。等他用毛笔书写完了，手稿也被大家抢光了。这3副挽联的内容，后来他只记得其中的一副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3月12日，延安各界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

有人请毛泽东为他题词，毛泽东写道：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4期5大队成立大会上讲话说：

“你们一定要在学习的短短时期中完成学习计划，主要的是要学得一个方向，一种作风。方向是革命的方针，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其次说到作风，便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你们要练习爬山，因为‘爬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具体任务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非吃苦耐劳，努力爬山不可！否则便成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再加上明确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学习军事知识，你们便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了！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这两个冲锋有机的、统一的配合起来，便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到抗大来可以学习3样：（1）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些，你们便可出去当教员，当排长也是教员，当新闻记者也是教员，教一切和你们接近的人。”

3月21日，王明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提出了3个问题：一、关于各党派团结巩固与扩大的问题；二、关于建立民意机关的问题；三、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问题。他不经中共中央批准，将提议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中共中央讨论了这个提议。毛泽东认为，有许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在提议中明确的提出来，如没有明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和悲观失望的倾向；没有明确提出武装民众；没有明确提出改善民生。

3月21日这一天，萧军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延安，走进陕甘宁边区招待所，迎面碰上了昔日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的老朋友丁玲。丁玲问起他的情况，他便说：

“年初以来，我应李公朴的邀请，一直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如今要去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可惜有战争，路不通了，只好先在这里住下。”

萧军，东北流亡作家，青年时期曾在张学良的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九·一八”事变后，萧军、萧红夫妇从东北辗转到了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在文学上进步很大，其作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呼兰河传》在全国和上海有一定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两人又回到了北方。二人分手后，萧红去了香港，萧军辗转来到了延安。

3月22日上午，丁玲与聂绀弩一起来见毛泽东，汇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情况，顺便提起了萧军不请自来的事。毛泽东对萧军闻名已久，知道他是鲁迅亲手培养起来的左翼作家，以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震动文坛，于是就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看望萧军。和培元来到招待所，向萧军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提出可以安排时间让他见一见毛泽东。一向以武人自居的萧军一来是年轻孤傲，不愿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二来是对于毛泽东缺乏了解，听和培元如此说，便婉言拒绝道：

“我是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的，到延安是路过，待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丁玲见到萧军，不无责备地说：

“既然来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一见的。”

萧军也觉得自己有失礼貌，便点头答应去见毛泽东。正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招待所。只见他身着一套半旧的灰色军装，与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人一一握手。丁玲把萧军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上前一步，紧紧握着萧军的手，关切地问长问短。尔后，他邀请众人一起在招待所共进午餐。

萧军晚年回想起这一往事还感到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新来延安的何思敬、萧军、徐懋庸等七八个人和从前线归来的丁玲、聂绀弩等人。

徐懋庸曾任上海“左联”常委、秘书长。1936年“左联”解散后，在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他在8月1日给鲁迅的信中说了一些错误的话，鲁迅就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他。此后，徐懋庸心情很苦闷，处境也很困难，他只好于1937年底从上海出发，奔赴陕北，辗转数月，终于在1938年3月间来到了延安。

宴会开始后，张国焘首先致词，然后请萧军等人发言。萧军、徐懋庸和丁玲推让了一番，徐懋庸就开始发言了，他说：

“我来到延安以后，感觉延安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中，我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模糊的，所以要在延安好好学习。”

接着，丁玲报告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情况，然后是萧军发言，其大意是不同意延安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这一方针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最后是康生讲话，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党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了。

3月25日，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托，另行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8项建议。其中第2项建议是：“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

中共中央将此件电告长江局，要王明提交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3月下旬，“抗大”第3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应邀参加了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

此前，他了解到有些从大城市来到“抗大”的青年学员，因校舍简陋，教材教员缺乏，更没有教具，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劳动又多，受不了苦，就发牢骚说怪话，个别人甚至还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吧。”针对这些情况，为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他在讲话中没有批评发牢骚讲怪话的学员，而是首先从劳动创造人、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道理讲起，然后话锋一转，说到了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非常诚恳地说：

“抗大不断在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而学校又要办好，缺乏经费，好的法宝只有一个，这就叫艰苦奋斗。抗大学生几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都已配了一些必要的勤务人员，不够用也不能再补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烧，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如果从前线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来代替抗大的学生担任这些日常的劳动，这样做是增强了抗战力量，还是减少了抗战力量呢？我们办抗大是为了抗战，那么那种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是能办还是不能办呢？”

毛泽东要求学员们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用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比喻，勉励学员们要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说：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很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机灵，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西游记》中的那匹白马，他说：

“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典礼结束后，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说，抗大一些担任党政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干部不安心留在后方，纷纷要求上前线去，请毛泽东给干部们做做思想工作。毛泽东便让罗瑞卿召集干部开会。他在干部会议上首先说，大家的工作很辛苦，向大家表示问候和感谢。然后他又说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拥护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目前一件迫切需要办的事，是办一所全民性的大学校，培养我党我军的抗日战争的领导干部，这个任务落在了你们抗大全体干部的肩上，你们是干部的干部，工作岗位十分重要，也十分光荣。现在全国人民心向延安，因为清凉山上有3面大旗：一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爱国的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向延安涌来，要求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要求学习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要求学习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接待他们呢？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革命的骨干。

你们要求离开学校到前方去，直接参加对日寇的作战，这种精神可嘉，主观动机很好，但是不符合革命形势的客观需要。学校是母鸡，下出来的蛋是干部。允许你们上前线，把学校关门停办，等于杀鸡取蛋。前方确实迫切需要大量的领导干部，可是要把账算清楚，究竟是你们这一两百人去前方起的作用大，还是经过努力工作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前方起的作用大？是留着母鸡下蛋好，还是杀鸡取蛋好？请大家做结论吧！”

毛泽东最后鼓励大家说：

“希望你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下决心在抗大工作20年，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不要使那些等待进抗大学习的男女青年们失望。”

这一时期，毛泽东要罗瑞卿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写一本书，论述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作为抗日战争丛书的一部分。毛泽东为了使他专心写书，让他搬到凤凰山与自己同住。罗瑞卿也非常高兴同毛泽东在一起，这样，他在写作中遇到难点和疑问，就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请教。

在罗瑞卿写书期间，毛泽东常常主动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对他的写作进行指导，使罗瑞卿在思想上、理论上受益匪浅。这本书写成付印时，毛泽东又为他题写了书名：《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罗瑞卿平时对己对人都要求得非常严格，使一些人对他敬而远之。毛泽东开导他说：

“你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有必要的灵活性，注意团结同志。”

后来，毛泽东还在一封信中告诉他说：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3月29日早上，毛泽东已经工作了一天一夜，他告诉警卫员翟作军说：

“下午我要到陕北公学去作报告，你在两点钟叫醒我。”

下午两点时分，翟作军轻轻推开毛泽东的房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只见毛泽东侧着身子睡得正香，就不忍心叫醒他。翟作军心想：“主席太辛苦啦，叫他多睡一会儿吧。”便又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3点钟的时候，毛泽东睡醒了，隔着房间问：

“警卫员，几点钟啦？”

翟作军赶紧过去报告说：

“主席，3点了。”

“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他嘴里嘟哝着，赶快起身穿衣服。翟作军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支支吾吾地说：

“我，我忘了。”

毛泽东心里明白，翟作军是有意叫他多睡一会儿，就说：

“少睡会儿觉没有关系，耽误了报告的时间，可就误了事了。记住，下次不可以这样。”

说罢，他匆匆洗过脸，吃了点饭，就到清凉山陕北公学演讲了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制定公布了《抗战救国纲领》；决定国民党实行总裁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

关于党政关系，大会决定：“中央采取以党统政形态，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形态，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于政形态。”

为加强党内独裁及国民党对政权机构的控制，大会决定扩大特务机构，成立中央调查局，即“中统”，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训练委员会。

3月30日，白求恩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抵达延安。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他是著名的外科医生，1935年在美国加入共产党。1936年，西班牙发生内战，德、意法西斯趁机侵入西班牙，白求恩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反动军队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志愿奔赴前线，参加国际纵队，做了大量的战场救护工作。1937年5月，他回到了加拿大。

3月31日晚11时，白求恩身着八路军灰布军装，应邀来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里。毛泽东迎上前去，白求恩庄重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军礼。毛泽东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来延安。”

说罢握着白求恩的手，把他请进窑洞里，分坐在桌子的两边。白求恩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皮夹，捧在手中，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皮夹一看，里边是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愉快地点点头，说道：

“你们来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和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问候。毛泽东询问了他们一路上的旅行情况，询问了白求恩在西班牙从事战场救护的情况。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还说：

“在中国的抗战中，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毛泽东说：

“很不幸，目前重伤员中死亡的人太多了。”

白求恩说：

“他们有很多是可以救活的。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们治疗，我敢说，75%的伤员，一定可以得到抢救。”

“75%？”毛泽东惊奇地重复了一句，又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极了，那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前线很需要你这样医术高明的大夫。”

接着，他向白求恩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变化。他满怀信心地说：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白求恩对毛泽东的观点深信不疑，要求马上到前线去，他说：

“在那里，我将使75%的伤员迅速恢复健康。”

毛泽东答应由八路军卫生部安排他的工作，并关切地说：

“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请你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他还说：

“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接着，他把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演绎了一遍，最后又说：

“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毛泽东和白求恩谈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深夜才结束。他把白求恩送出窑洞，在门口握着白求恩的手说：

“请你向加拿大和美国朋友转达我的谢意！你们到前线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写信来。”

这次会见，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在3月31日谈话后的日记里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里和毛泽东同志面对面地坐着，倾听着他那从容不迫地言谈的时候，我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回忆道：“白求恩在会见了毛泽东之后说：‘这是一位盖世的天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八路军卫生部对白求恩的工作问题，研究了几次，因为意见不统一，都没能定下来。有的人说他年近半百，身体需要照顾，应该留在延安工作。有的人说，应当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到前线去。最后一次会议，白求恩也参加了，当他听到还有人不同意他去前线时，忽然跳了起来，抄起圈椅，朝窗户砸去，椅子冲断窗棂，摔到院子里。白求恩叫道：

“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什么咖啡、嫩牛肉、冰淇淋，软绵绵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早就有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

与会人员被白求恩近乎鲁莽的行为震惊了，大家只好都同意他上前线去。事后，白求恩对马海德说：

“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要向扶着拐棍的伤员道歉。”

后来在5月2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离开延安，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5月中旬，白求恩一行来到陕西东北部的神府县贺家川八路军的医院里，当他看到一些伤员因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治疗而造成残疾时，非常难过。他不顾旅途劳累，连夜为伤员治疗。5月17日夜里，白求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个医院的情况。他写道：“这儿伤员的残疾，许多是可以避免的。我们面临三个重大问题：1、改进对医疗人员的训练；2、获得更多的药品和装备；3、建立专科医院。”他向毛泽东建议，培训医疗人员，加强对医疗工作的领导和管理。6月6日，白求恩抵达山西岚县后，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他说道：“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为其美丽的国家而与野蛮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6月17日下午，白求恩来到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烈欢迎。白求恩上下打量着聂荣臻，连声说：“No！No！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聂荣臻和一众人等，听了白求恩不着边际的嘀咕，一时摸不着头脑，都愣了神。翻译解释说，是毛泽东在接见白求恩时曾经如何如何说的，大家这才哈哈大笑。白求恩向聂荣臻请求马上开展工作。第二天，白求恩就来到后方医院，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且说1938年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陈云、李富春及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陪同下，来到清凉山下的山谷里，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1600多名学生的开学典礼。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开始了风趣而幽默的讲演，他说：

“今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送给你们，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他还说：

“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共产党为什么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它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毛泽东的话音一停，陕北公学教育长邵式平领着师生们高呼口号：

“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习艰苦奋斗！”

典礼结束后，毛泽东拉着萧军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徐懋庸等人来到操场上，和学员们一起会餐。在春寒料峭中，粗陋的木桌上摆着几碟菜，没有凳子，大家围站在桌子的周围，没有杯子，就用一只大碗盛满酒，你一口我一口的轮流着喝。毛泽东对身边的徐懋庸说：

“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他所说的文章，是徐懋庸应《新中华报》负责人向仲华之约撰写的《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采用。

徐懋庸得到领袖的赞许和鼓励，自然是十分高兴。那生性豪爽的萧军，听着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话语，也愈发兴奋。他洒脱地喝着酒，只觉得心里是一片火热。

是日晚，毛泽东应邀为山西阎锡山驻汉口办事处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题词：

“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奋斗。”

4月1日这一天，王明复电中共中央，他以来不及送交为理由，拒绝将毛泽东3月2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8项建议送交国民党。他在复电中说：

“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天已闭幕，你们所写的东西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王明的行为已经发展到了危害共产党的肌体、涣散共产党的团结，并有可能断送毛泽东艰难开创的中国革命局面的地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但是，如何处理王明问题，毛泽东深知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起码是默许。同时，处理王明问题必然会牵扯到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所以，此时的毛泽东深思熟虑、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再一次表现出了他那高超的斗争艺术。

4月初，毛泽东决定让刘亚楼去苏联“治病”，并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刘亚楼出国前，毛泽东在办公室召见了他，笑着问道：

“这次没听说你发明什么理论吧？”

刘亚楼想到当年毛泽东让他当红军大学训练部长，自己还发牢骚，不好意思地笑了，就说：

“感谢主席，给了我这个学习机会。”

毛泽东特别嘱咐说：

“你这一次去莫斯科要办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学习，为党争光，多学军事，少学政治。第二件事是要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你**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后来，刘亚楼在苏联将近8年，在1945年8月9日，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

再说清明节又要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民间习俗，准备派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去中部县黄陵祭祖。

4月1日晚上，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提出，他要去黄陵扫墓。此时的张国焘一直还在中央领导机构中，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平时他只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毛泽东对张国焘说：

“当前抗日形势很紧张，延安有许多事情要做，你身为政府副主席，就不要去了。”

4月2日，张国焘又去找毛泽东，执意请求去祭黄陵。毛泽东无奈地说：

“昨晚我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去呀？如果你没有去过黄陵，转转也可以。不过，你祭陵完毕，就马上回延安！”

毛泽东和张国焘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这天延安干部子弟学校的周六歌舞晚会上。张国焘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能歌善舞，自然也在节目中扮演了角色。但令张国焘不高兴的是，儿子扮演的竟然是一个叫张慕焘的反面人物，一个叛徒。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张国焘后来说，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他马上站了起来，撕下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

“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4月3日，张国焘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1个警卫班，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出发，下午到达了黄陵。

是日晚，张国焘背着身边的警卫员，去国民党的代表西北行营主任、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的住处，和蒋鼎文及以前和他有过交往的谷正鼎、李贻燕等，密谈到深夜。

4月4日，张国焘和蒋鼎文祭罢黄陵，并肩而行，李贻燕紧紧挎着张国焘的右臂，谷正鼎紧步其后。蒋鼎文对张国焘说：

“蒋委员长请你去西安谈谈，他正在西安等着你。”

张国焘遂对张海和陆秘书说：

“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点事。”

张海说：

“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说：

“我要去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一些重要事情。”

说完，他就钻进了蒋鼎文派来的小车里，张海也只好跟了进去。到西安后，张海问张国焘：

“去八路军办事处吗？”

张国焘说：

“不，先住在西京招待所吧。”

4月5日，张国焘吩咐张海去订到武汉的火车票。张海订好火车票后，马上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负责人林伯渠，说张国焘弄不好要走。林伯渠立即赶往火车站，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说：

“林主席，我到武汉去一趟。”

林伯渠问：

“中央批准了吗？”

“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

“你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批准擅自行动呢？”

“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

“国焘同志，请你不要走，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协商嘛。”

“谢谢你，伯渠同志，我一定要到武汉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国焘走了。他马上回到办事处，将张国焘去武汉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请他拍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要周恩来设法截住张国焘。

张国焘一到汉口车站就被李克农截住了。李克农在国共两党的知情人中间，威名远扬，尤其是叛徒特务更是望而生畏。张国焘身边的两个特务一看来者是李克农，也顾不了张国焘了，转身便跑。此后好多天，国民党特务再无法与张国焘接触。周恩来和张国焘进行了长谈。

此时，在抗大学习的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来找毛泽东，她痛哭流涕地说：

“主席呀，怎么办呢？你得给我做主啊。这个老家伙丢下我们母子俩跑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哇……”

毛泽东说：

“张国焘，我们和他一起干革命20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

毛泽东还想继续挽救张国焘。他双手叉腰，在窑洞里踱了几步，又对杨子烈说：

“这样吧，现在你可以去武汉，劝说劝说，做做工作。希望你们一起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他，对过去的错误，改了就好嘛！”

后来在杨子烈母子上路时，毛泽东还指示有关部门给了她500元法币做路费。结果杨子烈也一去不复返了。

且说4月5日这天下午，毛泽东第7次来到陕北公学，给学生们作了关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问题的报告，对两党为什么能够第二次合作，如何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和国共两党应该互相尊重等问题，一一作了阐述。同时，他也驳斥了有人借口“统一”要取消共产党的谬论。他说：

“目前谁也不能吞并谁，国民党要取消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是另外组织一个党，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

4月初，延安文艺界举行关于话剧《血祭上海》的座谈会。

早在1938年初春，延安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组织抗大、陕北公学等机关六七十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公演了4幕话剧《血祭上海》，连演20天，观众多达数万人，轰动一时。

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他说要用最大的力量给予帮助。座谈会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为纪念已故大文豪鲁迅，艺术学院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7人联名签署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一文正式发表，说明了设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原因、宗旨和任务。

鲁迅艺术学院建在延安北门外。毛泽东亲自担任院长，并提名由周扬任鲁艺副院长。

前边已经说过，周扬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9月间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原来，中共中央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推荐，周扬、艾思奇、李初黎一行人来到延安工作。周扬到延安后，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

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4期3大队成立大会上讲话说：

“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你们在这里学习，就是要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即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都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须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即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他。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

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由朱光担任艺术学院秘书长。

朱光，原名朱光琛，1906年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7岁丧母，11岁丧父，小时候常常辍学。他自幼热爱书画，能双手执笔写字。1927年，朱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广西省委书记，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发起组织“上海艺术剧社”；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4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长，马列学院秘书长，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7年他在延安同丁玲一道领导了“中国文艺协会”。他带领的戏剧组在延安先后演出了话剧《炭矿夫》、《广州暴动》、《秘密》和《血祭上海》，被毛泽东称为“江南才子”。

毛泽东在鲁艺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文艺工作者要坚决地到战场上去，不要在楼上不肯下来，或者下了一半又要上去。日本帝国主义是条野牛，要过黄河到陕北来吃草，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就可以了解它如何过黄河；如何奸淫抢劫，老百姓如何组织起来，拿起梭镖矛枪，八路军如何打它，如何在平型关拉着牛尾巴，扯掉了几根毛等等。或者绘成画，谱成歌，演成戏，写成文章，岂不妙哉?”

毛泽东把文艺上的提高比作“大树”，把文艺上的普及比作“豆芽菜”，即树苗，他说：

“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能有大树呢?”“《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毛泽东对群众中丰富的语言是高度赞扬的。他说：

“夏天的夜晚，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不用任何古典。他们讲的故事内容是那么丰富，用了许多新典，极美丽的口头言辞。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因此，大众语言，要从实际生活中去学习。”

关于文艺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和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的统一战线；第二种是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他称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为“山上”的人，称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为“亭子间”的人。他说：

“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时代里，从前遥相呼应的两部分人现在见面了，结成统一战线。但是，这两部分人各有自己的毛病。亭子间的人自以为是，摆架子，写了本小书，便以为自己不是天下第一便是天下第二。山上的人也摆架子，是老粗的架子，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呐！’”“亭子间的作品形式精，内容较空，可以比方为做出的菜，是‘好看不好吃’；山上的作品有内容则形式粗，可以比方为‘好吃不好看’。艺术作品，就应把两者统一起来，做到既好看又好吃。”“应该去掉这两种坏现象，大家要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进行创作、演出。”

关于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

“现在艺术派别上也需要统一战线，如鲁迅先生所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风花雪月派、鸳鸯蝴蝶派，或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然而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在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

欲知毛泽东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有什么高论，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请读者注意王明在3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毛泽东在3月25日为中共中央另行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以及王明在4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复电。这3个历史资料已经说明了党内极不正常的现象。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长江局，理应服从中央指挥；作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王明，也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工作；可王明一伙在复电中竟然声称：“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他们显然是以党的决策者自居，凌驾于中央之上了。在武汉的政治局人数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还公然提出中央书记处不具备合法性，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可见王明一伙人已经专横跋扈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第30章**

**“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

**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

**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

**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话说1938年4月中旬，江青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以陈正人为厅长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不久，中央为了加强对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和教学工作，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鲁艺，于是江青又从教育厅来到鲁艺教务处工作，兼任戏剧课指导员和教师。在这里，江青又和张庚相遇了。现存的《鲁艺通告》上载有这样的内容：“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江青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在鲁艺的演出活动中，先后饰演了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的女主角和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毛泽东观看了《被糟蹋了的人》和《打渔杀家》后，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越来越多了，他已经了解了江青在上海4年的经历，因此，他和江青谈论的话题最多的就是30年代的上海。毛泽东说他对左翼联盟的情况不甚了了，江青便介绍道：

“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是在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委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仍奇，钱杏邨，洪灵非等7人。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讲道：‘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变成右倾。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

毛泽东插话说：

“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是1930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就，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又谈到了周扬、田汉等人和鲁迅的矛盾，她说：

“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反对鲁迅，散布许多攻击鲁迅的言论。1934年11月4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表达了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接着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田汉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的态度多么的明确。”

江青还谈到了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的分歧。毛泽东说：

“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重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于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像鲁迅那样的文化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

江青从领袖的谈话中找到了知音。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她的文章上批道：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

江青看着毛泽东的批示，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后来，毛泽东又问起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江青说：

“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他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提出鲁迅与托派分子有联系；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机拉拢鲁迅，一个托派分子公然写信寄给鲁迅，恶毒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赠送给鲁迅。真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拢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缘故。’这里说的某几个战友，就是指周扬他们。实际上，鲁迅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对周扬他们的批驳。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就把自己不光与托洛茨基分子区别开，也和周扬他们划清了界限。鲁迅在信中还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止是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些话，是1936年6月9日鲁迅怀着极大的气愤抱病写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扬他们的痛处，对‘国防文学’理论是个极大的嘲弄。所以，这封信，在当时被周扬他们把持的《文学月报》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们的心虚。不光如此，在隔了一个多月，8月1日，周扬又指使徐懋庸趁着鲁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骂鲁迅先生对‘国防文学’的看法是‘助长恶劣的倾向’，指责鲁迅这也‘不对’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言行进行‘打击’，施行‘实际解决’，等等。”

江青的一番介绍和分析，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两个口号之争的真实情况和实质问题，联想到党内一些领导人不怎么赞成鲁迅，说什么周扬等与鲁迅的论战无非是“个人之争”，至多是“宗派之争”。在江青告辞时，他便把刘少奇1936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2卷第1号上的文章《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找出来交给江青，让她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刘少奇在文章中写道：

“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做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不同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各打50大板的说法，她仿照毛泽东批示的办法，提笔在这本杂志上写道：

“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

毛泽东看着江青的批语，禁不住笑了。江青的字写得很好，一笔一划显示出良好的楷书功底。她写的文章，字里行间，又洋溢着才气，展示出较深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

毛泽东再看看眼前的江青，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鹅蛋形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肢苗条，笑声动人；加上微翘的鼻子和稍厚的嘴唇，表情真是迷人。这样的文字出自这样的女子之手，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心中一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说：

“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你愿意吗？”

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

“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在这一年的暮春时节，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全体学员转入抗大，编为女生大队。在举行庆典这天，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出席了大会。女生大队队长张琴秋和江青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据欧阳山尊回忆说：边区教育厅的江青“很令人瞩目”，“可能这是她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除了江青，那位女生大队队长张琴秋也非等闲之人。她是唯一在红军作战机关和部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女性，还是一位海归美女，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5年。徐向前称赞她是“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在川陕根据地时，张琴秋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女战士在军队内担任的最高职务），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许世友、洪学智、陈再道、刘华清等都是她的下属。1935年初任红4方面军组建的妇女独立师师长，下辖两个团，2000余人。红2、4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2、4两个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她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1936年，妇女独立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随后参加西征。张琴秋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在西路军远征途中，她已临近分娩，仍负责指挥总部机关的直属部队，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在敌人骑兵的包围下，将孩子生在了戈壁滩上。西路军全军覆没后，张琴秋因产后身体虚弱被俘，被押往南京。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

且说毛泽东在抗大女生大队庆典上讲了话，他说：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妇女是最受压迫的，从来就没有自主的权利。出嫁以前一切听父亲的，出了嫁听从丈夫的，丈夫死了以后还要听从儿子的，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是控制妇女的法律，中国妇女被紧紧地绑在这种封建道德上，没有一点自由。今天你们在这里集合开会，成立女生大队，意义非常重大，就是要你们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妇女的解放需要和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也无从谈起，所以你们首先应该争取民族的解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时才能使全国妇女得到解放。”

毛泽东的话赢得会场上掌声不断，口号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在台下听讲的张文秋，凝视着台上的毛泽东，一时间感慨万千。武昌一别，已有10载。在这10年间，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留下了岸英、岸青、岸龙3个没妈的儿子；张文秋的丈夫刘谦初也被韩复榘杀害了，留下了一个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刘思齐。

散会时，张文秋随着人流从毛泽东身边经过，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她，说道：

“张国兰同志，你好啊！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张文秋激动地说：

“报告毛主席，我现在叫张一平。来到延安已快一年了。”

“噢，改了名字。你不够朋友哪！”毛泽东幽默地说：“来延安都一年了，也不去看望老朋友？”

“主席，我一定去拜望您！”

半个月后，张文秋特地去杨家岭拜望毛泽东，见一位面颊瘦削高鼻梁头发花白的人正和毛泽东交谈，她想退出来，毛泽东却向她招手说：

“快进来吧。”

张文秋进了窑洞，毛泽东站起来，向她介绍说：

“这是刘少奇同志，我们党的负责人，先认识一下吧。”

刘少奇热情地和她握手。毛泽东接着介绍说：

“这是张一平同志，前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的爱人，现在抗大学习。早些年，谦初同志已经在济南不幸遇害。”

刘少奇说：

“哦，刘谦初同志，我听说过。他是一位坚强不屈的同志，牺牲得很英勇。”

毛泽东问起武昌别后情形，张文秋便把她和刘谦初的经历及诀别叙述了一番。

那是在1929年七八月间，她和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的丈夫刘谦初先后被捕。这年冬天，张文秋因怀孕被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她走到男牢前，一再要求典狱长要和丈夫见一面。获准后，她上前紧紧地抓住刘谦初的手，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流。刘谦初问张文秋：

“你出去后到哪儿去啊？”

他见张文秋抽泣着直摇头，就用暗语说：

“先到律师李化南家住几天，再设法到上海找妈去。”

张文秋知道丈夫说的妈就是党，这才点点头，说：

“谦初，你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

“这是乳名，再起个大号。”

“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中国有句古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就叫个‘思齐’吧。”

后来，刘谦初在1931年4月5日和其他11位共产党人被押赴刑场，就义之时，年仅34岁。不久，地下党组织将刘谦初临刑前用暗语写的一封遗书转交给张文秋。他在遗书中的称谓是张文秋搞地下工作时的化名，遗书中所说的“母亲”就是党组织，“兄弟”即同志。这封遗书是这样写的：

丽娟：

我在临死之际，向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你要紧紧记着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孝敬母亲，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你要保重身体，好好抚育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带着年幼的女儿刘思齐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她奉调回延安，化名张一平，带着女儿刘思齐一路奔波，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介绍她认识了陈振亚。陈振亚在北伐战争时，经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了平江起义，后跟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成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他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和反围剿的斗争。1930年，他在激战中受重伤，失去了一条腿，现在也奉调去延安。此后，由陈振亚护送张文秋母女于1937年9月来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组织上分配张文秋到边区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不久，中央为了培养一批女干部，成立了一个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学员有五百余人，校长是危拱之，张文秋受命担任总务主任兼文化教员。想不到在抗大第3期的学员支援“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挖窑洞时，张文秋与陈振亚又相见了。这一年，陈振亚已经37岁了，多年戎马生涯，使他无暇顾及个人的婚姻大事。恰在这时，张文秋走进了他的生活。经过半年多的接触，他们于1937年冬结为夫妻。正是因为前不久中央将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转入抗大，编为女生大队，张文秋才得以再次见到了毛泽东。

再说4月14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任弼时在报告中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报告时，任弼时又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王稼祥也补充说：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它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就是这个统一战线是与国民党第一次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都有武装。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在中共中央有毛泽东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任弼时的报告和王稼祥的说明，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此后，任弼时又和王稼祥分别到各国代表团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们向各国共产党人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情况。许多其它党的代表听了以后说：

“毛泽东真伟大，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要向中国同志学习。”

4月15日，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山东台儿庄战役结束。

此次战役是由李宗仁、李品仙等国民党将领指挥的，历时一个月。中方参战兵力有：中央系汤恩伯第20军团，西北系庞炳勋第3军团、冯治安第19军团、张自忠59军、孙连仲第2集团军，山东孙桐宣第3集团军，桂系李品仙11集团军、廖磊21集团军、徐源泉20集团军，川军邓锡候22集团军、杨森27集团军，总兵力超过40万（另一说国民党军参战约29万人）。日军兵力为矶谷廉介第10师团、坂垣征四郎第5师团，约5万人。中方伤亡约5万余人，日军伤亡约2万余人（日军自报伤亡11984人）。

台儿庄战役是继平型关伏击战之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对台儿庄战役评价说：“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国民党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在此役中率部坚守通往台儿庄的咽喉之县，血战3天3夜，壮烈殉国，为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国民政府在武汉公祭王铭章将军，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齐光，《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等，前往参加。吴克坚致悼词说：“王师长等殉国烈士的鲜血，不仅洗涤了他们在川军20年的罪愆，而且更加振奋了全国军民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他们是对得起四川的父老、对得起国家的。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他的死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他的勋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

毛泽东为王铭章将军题写了挽联，以他和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的名义发往武汉：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早在台儿庄战役结束前夕，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与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等人组成的摄制组在1938年4月初来到中国，辗转于武汉、台儿庄、西安等多地，计划拍摄一部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在《中央新影·老故事》中，《纪录经典》系列纪录片总导演北师大艺术传媒学院副教授张同道，曾向记者介绍了伊文思一生的创作以及1938年中国之行中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1938年的中国之行，张同道说，伊文思在来华的飞机上研究中国，读的是斯诺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辗转到了武汉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很客气地招待伊文思一行。

在武汉，伊文思和卡帕很快与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副书记周恩来**取得了联系。

本传前面曾经讲过，**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竭力吹嘘“蒋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他还提出了一套放弃共产党领导权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竟然被党内高层多数人接受了。**12月23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代表团和中央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周恩来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将长江局书记让给了王明，自任副书记**。这样，在武汉就形成了**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中共“第二中央”**。

当伊文思来到武汉的时候，周恩来正好也在武汉。他与伊文思摄制组见了面。周恩来对伊文思摄制组访问延安的计划表示欢迎，并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他们准备车辆。

不久，伊文思一行先到郑州，再到徐州战场，在台儿庄见到了李宗仁。张同道说，4月中旬，拍摄完台儿庄战役尾声之后，伊文思等人更加坚定了要去延安的想法。以“到中国西北拍摄长城”为借口，伊文思、卡帕等在1938年5月到达了西安。宋美龄获悉伊文思要去延安，便指示她的部下黄少将发电报阻拦。黄少将在电文中说：

**“你要想拍游击队，到处都是，不用去延安。夫人要我告诉你，中国只有一支军队，就是委员长领导的军队，没有别的什么军队。”**

伊文思一行决定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便再次联系了在武汉的周恩来。周恩来接到伊文思的求助电报，鉴于宋美龄的态度，给伊文思发去电报，劝告他说：

“你们能到延安去固然好，但是如果现在强行去延安，你们很可能回不了武汉。**你不要再去了。一旦要是让国民党知道是我们安排你去延安，那么你将来拍的这个影片也要受到伤害。在国际上，谁愿意看一个共产党抗战的故事呢？而且暴露了两个政府这样一个现实，外国人会不理解，不利于中国抗战。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伊文思无奈，只好又返回了武汉。他向周恩来提出，要拍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武汉的领导人。周恩来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人开会的场面，被伊文思等摄入了纪录片。卡帕还特意为周恩来拍摄了几张特写和肖像。

离开武汉之前，伊文思托人将一台35毫米埃摩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伊文思赠送的摄影机和胶片就成了延安电影团的第一批拍摄器材。吴印咸后来也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

再说1938年4月16日，延安“抗大”第4期举行开学典礼，这期学员猛增至5562人，其中有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干部907人。

此后，“抗大”每一期招收的学员都有所增加，而且还先后开设了13所分校。到1945年，“抗大”办学10年，总共培养出了10多万名军政干部。

4月17日这天，天一亮，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车队从黄河西岸的延水关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第一辆车中坐的是卫立煌和司令部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及司令部副参谋长文朝藉，与司机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着金丝眼镜、白手套，带着左轮手枪的交际副官罗香山。第二辆车中坐的是一位参谋和第9军军部参谋长杜凤翥，还有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和随从副官张学诚，与司机并排坐的是一个带盒子枪的卫士排长。紧随其后的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总指挥部几个大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的官兵们。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卫杨村一个贫农家庭。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卫士；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4师师长，1932年任国民党第14军军长，积极追随蒋介石“剿共”，成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蒋介石为奖励卫立煌，在安徽省金家寨设立一个新的县治，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早在1931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卫立煌率第45师作为中路军，向苏区进攻，遭到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军的沉重打击，仓皇败退，领教了毛泽东和红军的厉害。抗日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先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在山西忻口战役中重创日军，在太原数次会晤周恩来、朱德，对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在国民党阵营里面，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同乡，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天子门生”，所以蒋介石往往在急需用人之际才会想起他；而到了提拔封赏时，他就不如黄埔系的那些宠儿吃香了。因此，他常常耿耿于怀。

卫立煌此行本是去洛阳参加军事会议的，他借机转道延安，来拜访慕名已久的毛泽东。

延安军民在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处就贴出了红绿纸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在延安城外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边，许多机关都来了人，各学校的师生也差不多都到了。卫立煌的车队一到，欢迎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欢迎的口号此起彼伏，表达了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和对于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礼遇之隆可能是延安空前未有的，卫立煌半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的欢迎场面。

车队在离城门不远处停下来，卫立煌等人下了车。前来迎接的滕代远参谋长、八路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

滕代远等人陪同卫立煌一行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来到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一见到卫立煌，就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欢迎啊。路上辛苦了！”

他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陪同卫立煌进入客厅，分宾主落座。卫立煌说：

“八路军对日作战，机智勇猛，深表钦佩。卫某此次到延安，有机会与润之主席见面聆教，真是不胜荣幸！”

毛泽东说：

“你也非常厉害啊，‘支那虎将’可是名副其实呢。你抗日坚决，与我们八路军相处友好，我们深表感谢。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希望你能沿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情况下，要想中华不亡，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有出路啊。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所说的“支那虎将”这一称谓，源自卫立煌在忻口会战中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其为“支那虎将”。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国内政治、军事形势，谈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国际国内均有投降主义的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他还说：

“我们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只会亡国！卫将军，我们决心抗日的人都忽视不得哟。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毛泽东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他说：

“现在，你领导的山西抗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拖住了日军的‘尾巴’，使他们行动就没那么利索了，八路军在后方也就能放得开手脚了。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卫立煌是行伍出身，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连连点头说：

“有理，有理。毛先生分析得很对！”

果不其然，正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后日益迫近徐州，而蒋介石则是在一个月后才有了感觉。5月中旬，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的案前，徐州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子冷静下来。但他意识到的是日军要围歼徐州的中国军队主力，而不是打通陇海线。他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封裔忠等人研究对策。何应钦等人主张放弃徐州，赶紧突围。于是，蒋介石便口授给李宗仁的电令，令其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5月16日，第5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突围。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一直追到了开封。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前进，竟又下令炸了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河水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造成了比日祸更甚的黄祸！此事容后详述。

且说毛泽东又告诉卫立煌说：

“卫将军，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困难也是很多的。首先这弹药的消耗就很大啊，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呢？还有，我们的卫生医药器材也非常缺乏，战士负伤无法及时医治。再加上快夏天了，同志们的夏服也还没个影子。这些都拜托卫长官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啊。”

卫立煌当即表示说：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天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参加宴席的还有司令部两位参谋长和一个参谋及秘书赵荣声。作陪的有滕代远、萧劲光。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又叫赵荣生，笔名任天马，1915年出生于安徽太湖一个“四代翰林”之家，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4月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1937年冬参加了丁玲任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通讯部当记者，后接陈克寒任通讯股股长。此时，卫立煌为摆脱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大量用自己安徽同乡当秘书。当他看到延安《群众》杂志上的通讯《西线上的盛会》后，了解到这篇通讯的作者任天马本名叫赵荣声，不但是他的安徽同乡，而且还出身于名门望族，与赵朴初、赵荣琛还是堂兄弟，立即命令刘毓珩把任天马聘到他的司令部当秘书。赵荣声不愿去，丁玲就把此事汇报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找赵荣声谈话说，希望他去卫立煌处工作。傅钟还叫赵荣声到西安去请示林伯渠。次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通知丁玲说，让赵荣声到卫立煌处去报到。赵荣声到了卫立煌处，即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少校秘书。卫立煌此次到延安来，就是受了赵荣声的影响。10天前，他受命来延安联络，停留了3天，向滕代远汇报了自己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滕代远又带着他向中央军委统战部的刘向三做了汇报。

且说毛泽东设的午宴非常丰盛。延安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平时自奉虽然极其清苦，可是一旦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最好的食品拿出来飨客。这卫立煌、郭寄峤、文朝藉等人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他们对每一道菜都感到很满意。毛泽东酒量不大，却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结束后，毛泽东与卫立煌合影留念，并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员合影留念。赵荣声借机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偷偷把预先写好的一个新情报交给了滕代远，并且告诉滕代远说，卫立煌已经背熟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滕代远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

这天下午，卫立煌来到了抗日军政大学，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罗瑞卿向卫立煌介绍了抗大的历史和现状，又领着他和随从人员参观了学员们住的窑洞，看了学员们的课堂。卫立煌称赞道：

“中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

罗瑞卿请卫立煌去大操场演讲。卫立煌登上讲台，学员们立即高呼：

“国共两党紧密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和卫副司令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卫立煌立刻激动起来，丢开事先背熟的讲稿，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演。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只有和八路军合作，才能战胜日本，表示今后要继续与八路军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坚持华北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他每讲一段，下面就呼口号，越呼口号，他讲得越起劲。

是日晚，延安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步入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卫副司令长官是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路过延安，希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导。现在，请卫总司令讲话。”

全场欢声雷动。卫立煌在不断的掌声中发表了讲话，他说：

“此次奉命赴洛阳，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陕甘宁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卫立煌讲完后，毛泽东和他并排坐在一起，观看延安“鲁艺”演出的文艺节目，二人一边看，一边交谈。

第二天，卫立煌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去洛阳。他对随行人员说，这次延安之行，他感到非常满意，尤其是对毛泽东极为敬佩。他还说：“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抵达西安后，卫立煌批了一个手谕：“即发第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他还吩咐发给第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不久，这批物资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时转送给了八路军各个部队。

后来在7月7日，卫立煌让赵荣声陪他细细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认为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的，改变了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7月间，卫立煌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和在延安时的照片，其中有他和毛泽东的合影及他在抗大讲演的照片，卫立煌把这些照片珍藏了起来。1938年冬，卫立煌突然问他的秘书赵荣声：

“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赵荣声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说：

“我只参加过民先，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怎么参加，我真说不上。朱德总司令常来，你跟朱总司令谈谈不好吗？”

卫立煌说：

“朱玉阶一时来不了，你到延安去问问吧。”

赵荣声说：

“也用不着到延安。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问问林伯渠老先生吧。”

于是，赵荣声秘密到了西安，将卫立煌要求入党的事情，向林伯渠做了汇报。林伯渠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你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心实意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后来邓小平、杨尚昆在1939年初途经河南渑池，过黄河去太行山根据地，曾经与卫立煌见过面，卫立煌又向他们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因为邓小平和杨尚昆了解不多，不知虚实，只感到奇怪，就没有发表意见。

由于卫立煌同情共产党、八路军，蒋介石在1942年1月下令撤销了他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调任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西安行营只是一个转呈公文的空架子，卫立煌被剥夺了军权，赋闲在家。这是后话。

再说4月17日，在武汉被李克农控制着的张国焘向周恩来提出了3个要求：1、到上海治病；2、回江西老家；3、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立即将张国焘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后，他告诉张国焘说：

“中央不同意你的3点要求。但你可以从下面3条中选择1条：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大家最欢迎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想通后，再回党工作。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这3点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两天后答复我们。”

张国焘马上说：

“好！”

周恩来一走，张国焘慢慢掏出纸和笔，写出了自己的选择：

“兄弟已决定采取第3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周恩来将这一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捆绑不成夫妻，由他去吧。”

李克农奉命放了张国焘。一小时后，张国焘提着一口皮箱步出了旅馆。他公开向蒋介石认错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彻底背叛了革命事业。

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4月20日下午，毛远志和表姐章淼洪一起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毛远志在学校的情况，毛远志说：

“学校里有个民族先锋队组织，要我参加，我不愿参加。因为那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参加共产党。”

毛泽东笑着说：

“参加‘民先队’也不错嘛！你现在年龄还小，将来长大了才可以加入共产党。”

说罢，他问毛远志是哪一年生人？毛远志回答说：

“民国十二年，农历三月二十日。”

毛泽东随手翻了一下日历，说：

“今天不正是你的生日？”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们就在这里吃饭。”

毛泽东说罢，吩咐警卫员烧了两个猪蹄，还煮了挂面，和毛远志、章淼洪一起吃了饭。在返回学校的路上，章淼洪提醒毛远志说：

“你知道吗，伯伯今天给你过生日了！”

毛远志闻言心头一热，心想，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我过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给我过了生日！

4月20日晚，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办的晚会。

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是4月17日在延安召开的，出席代表226人。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筹委会主任毛齐华作了题为《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和今后的方针》的报告。

在晚会上，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了《结团体打日本》的简短讲话。他说：

“工人首先要团结起来，要把全国各省各业的几千几百万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结成工人的团体。我们还要结成农民的团体，商人的团体，文化人的团体，全国各种行业的人的团体。不仅要结成全国的大团体，而且要结成全世界的大团体。这样一来，就使各国的工人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要组织统一战线。3个统一战线，中国一个，全世界反法西斯一个，再加上日本无产阶级的一个，这就成了全世界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还要把它好好组织，好好扩大起来，一齐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够被打倒的。中国要打胜日本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有重大作用，所以无产阶级要好好团结起来，只有团结，才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接着，业余剧团在晚会上演出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传统戏。毛泽东对坐在身边的毛齐华说：

“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

毛齐华指着坐在后排的柯仲平说：

“文协的柯老在那儿呢，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

毛泽东转身问柯仲平：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

“应该！应该！”

柯仲平连连表态。毛泽东说：

“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

柯仲平说：

“好！我们马上动手去办。”

柯仲平说干就干，晚会一结束，他就找人商量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他开始着手筹建剧团。

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向八路军发出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示说：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广大地区，大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八路军各师根据这一指示，先后派出部队挺进平原地区，协同地方党和当地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根据地。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张国焘投奔国民党以后，蒋介石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头子戴笠“妥善运用”。自此，他便上演了一出“共产党元老反对共产党”的闹剧。1949年前，张国焘眼见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带了家人逃往台湾，后来又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他**晚年信仰基督教**，**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1979年在贫困潦倒中因冻饿而毙命，成为一个流落异邦的孤魂野鬼。他的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个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一代枭雄如此下场，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

张国焘的回忆录名曰**《我的回忆》，极尽污蔑毛泽东吹捧自己之能事，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这一部回忆录露出了他那不光彩的尾巴。**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七篇《五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说自己1924年5月遭北洋直系军阀逮捕，在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当敌人问他铁路工会的活动时，张国焘“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还向他们抗议。”时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当敌人问国民党的负责人时，张国焘“概以‘不知道’三字答复他”，当敌人问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时，张国焘也使敌人“一无所得”，甚至**张国焘还给敌人的侦探们上了题目为《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的政治课，而且“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党组织正是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整理了北京敌伪档案，这才**发现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澄清了张国焘投敌变节的历史真相。这些秘密档案曝光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自己冠以“铁狱硬汉”的桂冠被历史无情地摘了下来。**

据此，苗体君在2021年7月19日《党史博采》发文（原创），提出了一个“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变节之谜”，涉及到张国焘变节出卖恩师李大钊的问题。**

早在1923年8月底，中共中央安排张国焘到北京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职务。

1924年2月7日至10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大会还决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被选为总干事。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分别包围汉口的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人被捕。**杨德甫被捕后，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湖北方面由京汉路局密函给北京政府交通部，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3个侦缉队，抓走了彭子均、李凤林两名干事，接着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抓住了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

张国焘被捕，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声讨北洋政府的反革命暴行，并开展营救活动。

《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刊载了**《关于张国焘一九二四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一文，详细提供了张国焘在狱中变节的情况。张国焘为了保存性命向敌人出卖党的组织，并**供出了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记载》**的部分内容如下：

“……兹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有谭铭三等，北方有张昆弟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获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除李大钊等业经咨请严缉外，相应抄录各路工人姓名，咨行贵部查照。希即转令一体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路政，而遏乱萌……”

5月30日，**卫戍司令王怀庆密信给内务部总长，请求捉拿张国焘提供的北京中共首犯李大钊。**李大钊在避居地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中共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然后去了莫斯科。

由于张国焘的出卖，**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随后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各地铁路工会负责人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40人**。担任京畿卫戍司令的王怀庆把张国焘一案上报给北洋政府总统曹锟，要求枪毙张国焘，另一名军阀齐燮元提出“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的建议。张国焘才算保住了性命。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冯玉祥在思想上倾向于革命，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这个大好机会，营救了关押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的大批共产党员。10月25日，张国焘夫妇结束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向党隐瞒投敌变节出卖恩师李大钊等人之事，重返中共中央并继续担任重要职务，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血腥肃反、分裂红军分裂党、二次叛党投敌罄竹难书的大恶人。**

**第31章**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

**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

**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3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支队的具体任务是：在政治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宣传持久战战略方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在新四军主力部队开进之前，先到江南侦察了解日军、伪军情况，特别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了解江南平原的地形及风俗民情、群众生活条件，附带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为以后部队开进创造和准备条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强调：

“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项英等人决定，从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抽调团以下干部及侦察员400余人，分为3个侦察连，组成先遣支队，东进江南敌后。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熊梦辉任参谋长（后因病未到职），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陈毅将身边的副官和测绘参谋也派到了先遣支队，粟裕感动地说：

“陈毅同志把能兵强将都调来给我了。”

4月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皖南歙县潜口祠堂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陈毅在会上作了动员，他说：

“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深入江南做战略侦察，了解江南敌后情况，为主力部队挺进江南敌后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大家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机智灵活，勇敢顽强，遵守纪律，加强内外团结，依靠江南父老兄弟姊妹打击日军。”

此后，先遣支队抵达安徽南陵县，宿营在东门外。子夜时分，粟裕下令紧急集合，他说：

“群众所以欢迎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前线溃逃下来的，而是向敌人开进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定受到了敌特、汉奸的监视。这里离敌控的芜湖很近，说不定我们的行踪已经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很可能对我们发动突袭。因此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必须立即转移。”

天刚破晓，日军飞机果然来了，在东门外空中盘旋，狂轰滥炸，俯冲扫射。此时先遣支队早已安全转移到城外的山村了。

后来，先遣支队进入了南京地区，粟裕将司令部设在江苏省江宁县叶家庄，派出3个小组分头执行侦察任务。第1组由作战参谋张藩带领，到南京东南地区，对丹阳县、武进县一带进行侦察。第2组由侦察参谋张锤秀带领，到南京东北地区，对下蜀、龙潭一带进行侦察。第3组由宣传队长吴福海带领，到南京市以东地区，对镇江县一带进行侦察。其他侦察员的任务，主要是调查研究江南地理地形、社会历史、风俗民情、经济文化、各阶层思想动态。

4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生活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

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的去那样做。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1938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召集万人集会，庆祝“五一”劳动节。来延安参观学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工人代表，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一条上书“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横幅，赫然插置台前。

就在这一天，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在武汉大智路老通成侧面院内正式成立了，“代理总队长薛水秀，副总队长徐宽、萧汉庭，参谋主任魏遵轲，副官主任吕伯勋，军需主任周新起，秘书胡子超，民运组长李自然。”

原来这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亦称二七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简称“平汉铁路破坏队”，是一支活跃在平汉铁路线上的工人抗日武装。据“平汉铁路破坏队”老队员周毓松回忆说，1937年12月，“董必武、周恩来和项英召集平汉路共产党员刘文松（平汉铁路工会主任委员和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特派员——笔者注）等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开会，决定由刘文松出面组织抗日。刘文松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平汉铁路工人抗日组织的要求，可蒋介石只给了刘文松一个‘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第二团长’的空头委任状。董必武就表态说：‘先把队伍拉起来，我们支持！’于是，刘文松开始筹备‘平汉铁路破坏队’”。1938年1月，刘文松利用“特种工作团”团长的名义，号召郑州、偃城、驻马店、信阳、江岸5大站的工会负责人发动各自辖区内的工人参加抗日斗争。从2月开始，刘文松召集铁路工人和少数工人子弟到信阳李家寨柴家湾，接受“平汉铁路工人抗日训练班”（也叫特种工作团爆破训练班）的短期训练。刘文松自任班主任，潘希贤任副主任，徐宽任教导主任，胡宗良、李自然、吕伯勋、魏遵轲、刘翰章任军事教官，李积甫、魏勇仁任正、副事务主任。一期、二期先后于3月中旬和4月下旬训练结业，共培训800余人。此后，刘文松根据董必武等人的建议，组织了一部分工人代表，在“五一”前来到延安参观学习。他们在延安先后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等。

5月1日晚，一弯新月如钩。从清凉山下一孔整洁的窑洞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和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礼在隆重举行。毛泽东来了，陈云、罗瑞卿、凯丰也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大家说：

“告诉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经过我的审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二位可谓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这个判官倒要细细审来。”毛泽东笑嘻嘻地来到煤油灯前，对着煤油灯吸着了一支自产的烟卷，先注视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条斯理地说道：“朱光，你这个土包子是如何把这娇娃子从香港骗到此地的？定要从实招来！”

喜不自禁的朱光赶紧把毛泽东安排就座，接着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烧酒呷了一口，对着毛泽东躬身一揖，拉长声调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听小生慢慢道来。”

大家看着毛泽东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判官的模样，又见朱光戏剧化的一番表演，无不哈哈大笑。

5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了美国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

卡尔逊，189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西德尼，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职业军人。1927至1929年，他在驻中国的美国部队中服役，1935年7月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营长，同罗斯福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1937年开始任中国军事观察员，在抗战初期就进入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卡尔逊在访问陕甘宁边区前，曾与罗斯福约定，将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通报给总统本人。卡尔逊到共产党地区的计划，得到了美国海军和蒋介石的批准；并通过斯诺取得了毛泽东的默许。于是，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卡尔逊造访延安，拜会了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这样，他就成为1944年7月美国观察团到延安前的第一个也是唯一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官员。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卡尔逊在烛光中一边喝着茶，一边剥着花生，进行了彻夜长谈。谈话的内容从抗日战争、欧美政治局势，一直谈到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发展，乃至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等。毛泽东说：

“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愿望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只有人民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只有他们有过好一点日子的希望，人民才会建立起并保持这种意识。我们努力争取具备这些条件，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毛泽东还说：

“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一品脱等于八分之一加仑）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转向另一个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他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卡尔逊问：

“对于战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计划？”

毛泽东说：

“我们希望目前同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我们认为，银行、矿山、交通应该国有。应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我们赞成鼓励私有企业。最后，我们认为，中国应同一切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对待我们的国家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

关于欧洲局势，卡尔逊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说：

“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

这一不寻常的预言，竟然在第二年即1939年及1940年前半年得到了完全的验证。毛泽东的话题又回到了抗日问题上，他说：

“日本把我们包围在五台山，我们在这里受到包围。日本和中国都使用突出阵地战术，好像孙连仲在台儿庄所采用的一样。但我们有另外一种类型。以日本在太原府的驻军来说吧！”

他推出一只茶杯代表日本驻军的位置，以其它4件东西代表中国军队的位置，继续说：

“太原府东北五台山有聂荣臻指挥下的我军部队，西北有贺龙，西南有林彪，东南有朱德。日本人如果侵入山西，就会受到我们其中一支部队的打击。山西是华北的战略枢纽，五台山是山西的战略枢纽，只要我们占有五台山，日本就没法控制这个省份。”

毛泽东最后说：

“另外一种包围方式就是美国、苏联与中国联合起来包围日本，那是一种国际的包围。”

第二天，卡尔逊又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和他进行了第2次长谈。

卡尔逊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位谦虚、和善、寂寞的天才。在漆黑的深夜中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而奋斗着。”

在延安考察10多天后，卡尔逊要再一次进入敌后各战区了，毛泽东便介绍以刘白羽为首的5位青年文艺工作者陪伴卡尔逊去敌后考察。为此，他专门约刘白羽等人谈了话，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名义，通令八路军所属各政治部说：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去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5人，由刘白羽率领，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敬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卡尔逊前后两次对中国战区的考察，总共历时约8个月，行程8000余里，足迹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据地，会见了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几十名高级将领，经历了许多场战斗，了解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证实了看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这就是：日军推进的速度很快，与此同时，红军也神速地深入敌占区开展消耗战，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有了飞跃的变化”。他从游击战争的发展看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景，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卡尔逊激动万分，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外，还不顾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组织制度。当一位记者就他提供的关于红区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披露他的姓名时，卡尔逊说：

“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尔逊的表现，受到上级的严厉指责，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愤然辞去军职。他回到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为几家杂志社撰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中国的双星》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评论说，卡尔逊笔下的共产党人，似乎更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是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和仁慈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或纳粹极权主义者。

且说5月4日下午，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带着1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办学，毛泽东应邀来到城北门里的一个广场上给学员们讲话。他说：

“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学什么——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是第一条；再有坐地下、吃小米、爬山等等便是实行，这是第二条。现在你们是政治队，两个月毕业，也可到军队中去，如果再加上战略战术，那是更好。我们抗大的学习有三：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三、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3条就够了。”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

“我们过去和国民党分了十几年，现在又合起来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那本书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关于张国焘叛逃的问题，毛泽东说：

“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5月4日晚，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了一封指示电，史称“五四指示”。

原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给先遣支队指定了一个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毛泽东还告诫项英等人说：

“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

然而项英对这一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在毛泽东多次催促和陈毅的劝说下，才命令陈毅、张鼎丞率领第1、第2支队相继东进江南；而把第3支队仍然留在皖南。

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由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在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由张闻天兼任学院院长。

“马列学院”位于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蓝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同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毛泽东参加了马列学院成立庆典，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伯达。他说：

“这位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这是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陈伯达在北平担任过北方局宣传部长，担任过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在1937年9月从北平来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在筹备马列学院时，张闻天又把他调到马列学院任教员。

5月7日，毛泽东应邀来到陕北公学，以张国焘开小差为例，给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生作了题为《坚定革命的旗帜》的报告。

这天下午，在山沟边的露天广场上，积聚着数千人。刚到延安不久的话剧艺术家欧阳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讲台上的毛泽东，只见他身材瘦长，唇边真的没有胡须，与自己早先听到的传说完全一样。毛泽东开始演讲了，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使人听得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却不是声色俱厉。他那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显得特别平易近人。他说：

“张国焘自命是个革命的‘老资格’。他的资格究竟有多老呢？打个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从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铺就开了小差。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过小差，现在又在组织上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在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张到新疆去建立根据地。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一块鸡骨头，吃之无油，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他开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们不是看过演剧队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

“张国焘开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帜，他放下革命的旗帜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来打人民。他开小差以后，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

说着，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接着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们不要以为张国焘不在，我就随便乱说。有人可以作证，当夜‘独眼龙’就在场，张国焘要杀老蒋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毛泽东说着把脸转向主持大会的陕北公学生活指导主任周纯全：

“独眼龙，你说是不是？”

周纯全一只眼在作战中受过伤，大家都戏称他是“独眼龙”。现在毛泽东当众也叫起他的绰号来，喜得他咧开嘴巴笑着直点头。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张国焘开小差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吗？我看没有。他是个胖子，吃得很多，他开了小差，边区可以节省些小米，这倒是有好处的。”

他最后勉励学员们说：

“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毛泽东的演讲给欧阳山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5月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在延安参观学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全体工人代表。

在接见之前，毛泽东先与领队刘文松进行了10分钟的谈话，询问了工人代表们的情况，然后和代表们见了面。他在讲话中说：

“此次你们由山西、河北到这里来，是为了抗日。抗日是中国的大事情，这事办不好，一切人都没有好的生活，工农的生活自然不用谈了！所以现在要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而工农便是其中的大多数，艰苦的工作也由他们担负，没有他们就根本不行，他们在抗日运动中的责任非常之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要提倡团体，言论出版结社有自由，可以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我希望同志们回去通通到铁路上组织工会去，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毛泽东还说：

“这次你们真是‘不远千里’越过黄河而来，我们能见面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缘故。过去我们在‘山上’只看见手工业工人，大城市才有产业工人。我这次见到诸位，是十多年第一次看见铁路工人哩！十多年来我没有坐火车，因为人家说‘不能坐’，我只好上山打游击去。现在事情是弄好了，所以能大打胜仗。”

毛泽东最后说：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一心一意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从不违背无产阶级的利益。今天因为抗日，所以对资本家和地主让一点步，否则，日本帝国主义打不倒。我们要对工人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要停止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工人的生活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但不用以前的方法，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些，经过同志们出去宣传鼓动，一道儿把这个事情干好。”

此后，毛泽东又先后给工人代表们讲了5次课。到5月中旬，刘文松和代表们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热烈欢送中，乘汽车离开延安，在西安改乘火车返回战斗岗位。8月初，由刘文松接任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的总队长。

据郑州市政协编辑的《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9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等7条铁路线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日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在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学生在党校的礼堂里正在上演话剧《弃儿》。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坐在群众中观看演出。当剧中演到一对革命者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时，剧情达到了高潮：寒风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惨淡昏暗的街头奔跑哭喊：“妈妈，妈妈！”小演员演得感情真挚，催人泪下。在场的中央领导和观众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撕心裂肺地哭叫着：“妈妈！妈妈！妈妈——”

毛泽东看着舞台上的小女孩，想起自己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流浪上海，无人照料，也都沦为了弃儿，触景生情，眼窝里溢满了泪花。戏演完了，大幕徐徐落下，剧场里没有一点声音。突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台上喊道：

“把后面的那一幕，再演一遍！”

剧场里立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于是，《弃儿》的最后两幕戏又破例重演了一遍。大幕再一次落下，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祝贺演出成功。毛泽东派人把那位小演员叫到身边，抚着她的头，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

“我叫刘思齐。”小女孩说着，高兴地朝人群中一指：“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回头望了望，张文秋和陈振亚赶紧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便问陈振亚：

“这是你的孩子吗？”

“报告主席，这是烈士刘谦初和张一平的女儿，我只是她的继父。”

当毛泽东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老战友刘谦初的遗腹子时，心情无比激动。他神情异常严肃，指着思奇叮嘱陈振亚：

“刘谦初同志我是认识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地教养她。”

说到这里，毛泽东弯下腰笑着对思齐说：

“小姑娘，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啊？”

刘思齐看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的人，向妈妈爸爸投去了征询的目光，张文秋和陈振亚朝她点了点头。于是，思齐羞羞答答地喊了一声“爸爸”。

毛泽东爽朗地放声大笑，兴致勃勃地说：

“既然是我的女儿了，你就跟我一道，到我家去玩玩，好不好？”

说罢，他牵着小思齐的手，朝杨家岭走去。

不久，张文秋在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陈振亚所在的单位工作。此时陈振亚是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张文秋则在政治部主编《生活星期刊》。1938年冬，张文秋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并破例随母姓，叫张少华。

5月上旬，毛泽东鉴于“党内外都有很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为了“批驳这种观点”（前面加双引号的文字是《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语），准备写两部论述抗日战争的军事著作。为此，他来到萧劲光的窑洞里，想借一些书籍作为参考资料。他笑眯眯地说：

“萧劲光，听说你这儿藏有宝贝，借给我看看如何？”

说罢，他的目光便停留在桌子上的一大摞书籍上。萧劲光见毛泽东要借书，就说：

“我这里只有几本旧书。以前是有几本好书，可惜长征时都丢了。”

毛泽东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翻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说：

“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没有吭声。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

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说：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样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

“噢，那就也给我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

毛泽东听出了萧劲光的意思，就笑了，说：

“放心，是借，不会不还的。”

此后，毛泽东就开始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军事著作，以此“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边加双引号的文字系《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语）。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全书共分9章：1、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2、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4、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5、和正规战争相配合；6、建立根据地；7、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8、向运动战发展；9、指挥关系。

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就《大公报》上的两篇社论发表了重要意见。

早在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就4、5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评论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论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在常委会上说：

“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笔者注）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1日下午6时，毛泽东接见了从武汉来到延安的施方白先生。

施方白，1887出生于江苏省启东县北新镇附近一个普通农家，23岁时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参加陈其美为首的讨伐袁世凯活动，事败后流亡日本，进入孙中山创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1914年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赴南洋群岛槟榔屿主编《光华日报》，反对军阀政府；1921年回国。1926年经季方介绍，他在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1927年曾资助共产党员胡若愚等人脱险，他本人因“跨党分子”罪名被捕，幸得友人救援获释。1929年初，施方白回到家乡担任启东县县长，因同情和支持工农革命而被迫辞职。1930年春，他与邓演达等人发起并正式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8年春，施方白在武汉经周恩来、董必武介绍，前来延安访问。与施方白一道来延安的还有一个比他年轻12岁的同乡沈维岳。

沈维岳青年时因家境清贫，在上海崇明师范只读了一年就辍学当了小学教师，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受周恩来、恽代英的影响，倾向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参加北伐，先后任政治宣传员，连指导员、营指导员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启东。施方白任启东县长时，他担任公安队队长，因掩护共产党员顾南洲被革职。1930年春，沈维岳在上海参加邓演达、施方白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从事反帝反蒋活动。1931年8月，他被捕入狱3个月，后经宋庆龄营救出狱，不久到19路军工作，翌年参加了淞沪抗战，因蒋介石对19路军抗战不积极支持，使他加深了对蒋介石的认识，逐渐向共产党立场转变。抗战爆发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关于这次会见，沈维岳在回忆录《幸福的接见》中是这样记载的：

“那是窑洞外面一所古老的北方式房子，毛主席经常在这儿接见中外来客。我们刚一坐下，警卫员就拿出大前门牌香烟招待我们，毛主席也拿了一支陪客。我们说：

‘到延安来观光，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毛主席笑笑说：

‘你们两位同志远道而来，我们很欢迎呀！你们要谈些什么问题？’

我们先后提了9个问题，都是关于国际形势和抗日救国前途的大题目。毛主席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分析得明快而精辟，使人万分信服。

接见中，毛主席一面谈话，一面抽烟，抽得很快，一会儿，烟头快烧到手指了。他扔掉烟头，右手伸进衣袋里拿出一支板烟筒来，左手伸到桌上拿着土烟罐头，把土烟装进板烟筒，又到口袋里摸出火柴来点着。警卫员向他送上第二支大前门香烟时，他没接受，只吸自己的板烟。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请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抗大学习，他笑笑说：

‘你在黄埔军校学过军事，也打过军阀。’

我说，我想学政治。主席回答：

‘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打日本帝国主义嘛！你们的家乡是苏北的大门，和上海一江之隔。你们应该回到家乡，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敌后坚持抗日战争。我们抗大学生毕业后大都要走这一条路的。’‘共产党的大门是开着的，只要有条件的人都能进来的。你要参加共产党组织，先要准备自己的条件，到条件够了，共产党会派人来找你的。’

毛泽东微笑着为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还指示我们，要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正确道路。告别时，毛主席亲自送到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

沈维岳所说的9个问题，是由施方白提出的：“第一点，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共产主义革命是否仍要进行？第二点，如果仍要进行的话，是否放弃没收资本，没收土地的政策？第三点，对于三民主义，是否仍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执行？还是要把三民主义作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第四点，抗日战争的前途如何？敌强我弱，打败日本的把握在哪里？第五点，战胜日本后，中国的建设道路是什么？第六点，蒋一向反复无常，这一次合作能够到底吗？其保证是什么？第七点，要是蒋介石再叛变，国共再分裂，共产党可以独立担当抗战吗？第八点，现在希特勒气势汹汹，英美一再退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打得起来？第九点，如果第2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谁胜谁负，现在是否作个估计？”

毛泽东在回答问题时，关于第2次世界大战，他说：

“第2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打起来了啊！”

关于蒋介石的问题，他说：

“蒋靠不住，他要叛变，这同革命的人士没有关系，对他是没有好处的，革命总是要走向胜利的。”

施方白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备受鼓舞，当即拿出了早准备好的锦纸，请求题词。毛泽东谦让地说：

“让我想一想，就写几个字吧。”

谈话结束后，施方白非常认真地把毛泽东对他的9个问题的回答作了整理。

5月12日，毛泽东把题写的赠言和他的一张签名照片送给了施方白先生。他在赠言中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写的是：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才能达到目的。”

后来施方白曾在谈话记录的修正本中这样写道：“我于1938年5月11日18时见毛主席于延安城内，谈话一小时又十余分钟。上项九答记录，有关学术思想，为慎重起见，曾于翌日将原稿送请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

修正后的谈话记录内容如下：

施方白问：抗日胜利的把握如何？假使胜利的话，政治路线有无突变的可能？

毛泽东回答：抗战的必胜，那是确有把握的。你所说的突变，如果指政治进步而言，那我可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问：中国是不是需要社会革命？假使需要的话，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

毛泽东回答：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施方白问：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可进行社会革命？

毛泽东回答：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不久，毛泽东在第3次接见施方白和沈维岳时，关于施方白的工作问题，他提议说：

“工作地点可以不拘，但应该注意教育事业，尤其要与青年们联系，如遇优秀青年，可介绍到陕公或抗大学习。”

此后，施方白和沈维岳在延安先后听了毛泽东两次报告，还参观了延长煤油矿，两个区人民政府，延安高等法院，几个学校和托儿所及人民医院等。直到5月底，他们二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

沈维岳在回忆录中说：“在延安观光了10多天，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教导，亲眼看见边区人民团结抗日的景象，我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是民族的救星和希望。我决心回家乡，组织队伍，在敌后展开游击队。”

后来，施方白介绍了不少进步青年去陕北，为革命输送人才。1946年，施方白转入农工民主党，曾任江苏省农工民主党副主任委员。1970年1月，施方白因病去世，终年84岁。沈维岳则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回到沦陷家乡启东，组织抗日游击队。193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抗战支队第2总队副总队长。1940年新四军东进，他担任苏中第4军分区参谋长，苏中4分区抗日军政干校教育长，海、启、崇行署副主任兼启东县县长。日寇投降后，沈维岳任苏中9分区军政干校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山东渤海公学教导主任，两广纵队教导总队军教主任，第3野战军训练1团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沈维岳先后在南京、上海、南通担任领导职务，1989年病逝于南通，享年91岁。

再说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

“我们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

“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

5月13日，毛泽东就《大公报》宣传的“准决战”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说：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做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5日，毛泽东为“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和“打击”“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文采飞扬的《布告》。全文敬录如下：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它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4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5月的一天，陈先瑞在抗大教室里听完课刚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只见信上写着：“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陈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泽东的住所跑去。毛泽东见他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说：

“别急，坐下来谈。”

他向陈先瑞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后，严肃地说：

“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

他接着说：

“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地公开地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说罢，他站起身，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嘱托道：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说到这，毛泽东用力地挥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他又用很和缓的口气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陈先瑞告别了毛泽东，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李隆贵携款逃跑这件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

5月中旬，毛泽东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后，又开始忙里偷闲加紧撰写另一部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一动笔就连续奋战了7天，每天都坐在窑洞里的书桌旁昼夜不停地写着，一天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夜间，微弱的烛光照着他那苍白的脸，累得他不住地扭腰捶背。

这一天，他已经连续两天没有睡觉了，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还一个劲地伏在桌子上写，感觉热了，顾不得身上的汗水，只用毛巾擦把脸。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而酸痛，就握一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实在感觉太累太困的时候，他才叫值班卫士翟作军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椅子上闭目养一会儿神。天傍黑的时候，翟作军走进房间，照例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桌子的两头各放1支。半夜时分，毛泽东该吃饭了，翟作军端来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说：

“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

毛泽东说着，头也没有抬，手中的笔还在唰唰地写着。翟作军说：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

“好，等一会我就睡。”

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翟作军回到窑洞收拾碗筷，见毛泽东还在那儿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竟然动都没动，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他只好把饭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热了热，又送来。他说：

“主席，你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又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说：“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军回到毛泽东屋里去看看，毛泽东还在那里写着呢，饭菜呢，依然是一动没动。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那些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经积满了一书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消瘦了许多，颧骨凸了出来，眼睛布满了血丝。在那几天里，每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到了第6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累得病倒了。医生赶来给他进行诊断，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没多久就起来了，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一手托着头，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到了第9天的半夜，他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他把翟作军叫来，交给翟作军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吩咐说要送到隔着延河的清凉山解放社去。

隔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他捧着书，脸上露出了微笑。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也曾记述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一些情况，他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后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

那个时候，江青虽然还没有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她常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本传前面已经讲到了。因此，她对戚本禹叙述的那种情形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1949年7月选入北京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5月4日调入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任见习秘书；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历任秘书、《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成员、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当局强行为他办理了一个“戚文”的身份证，那承想这易名竟成谶语，后来果然以“文”闻名于世。他与关锋商定在文化战线上继续革命，编著了近200个历史人物、计200余万字的《中国历史人物论集》，与关锋等人合作编撰了《中华易学大辞典》、《论语释说与孔子批判》，还出版了他撰写的、与人合作的十几本著作。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就在他逝世前一小时，他曾花费了5年时间撰写并抱病审定的《戚本禹回忆录》，由香港友人出版了。

这正是：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 龚自珍诗）

且说在5月20日，毛泽东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信，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地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说：

“徐州失守（5月19日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中主动撤离徐州，向西向南突围。见上一章——笔者注）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中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如果欧洲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5月26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他的开篇语讲的是“问题的提出”，他说：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么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花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

毛泽东的这个讲演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全部结束。他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战争双方的基本条件，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这一客观规律。

他在演讲中提出了抗战必将出现的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一科学预见最终被历史事实所验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演讲中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论持久战》之后，曾这样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再说5月26日晚，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及其外婆周陈轩、舅父周颂年，已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回到韶山定居，但生活困苦；毛家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还询问他的侄子毛远耀等在延安的情况。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时绥！

弟 毛泽东 5月26日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闻知开封失守，大吃一惊。这个早年曾4次东渡日本深造并先后毕业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校的炮兵生、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的士官候补生，为阻止日军西进占领郑州，竟生出了一个馊主意，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可非同小可，瞬间便造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

这正是：倭寇铁蹄踏开封，吓煞当年日本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兀自生出个“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还有什么愚蠢之举？请看本传后面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满城遭焚之惨状。

东方翁曰：本章前面说到了毛泽东在1938年5月初会见美国情报官卡尔逊时谈到了欧洲局势。卡尔逊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则说：“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后来的情况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就在毛泽东发出这一预言之后不久，极力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9月同法、德、意首脑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签订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以此推动德国向苏联进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此后，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9月1日又向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但并未组织进攻，出现了前线无战事的“奇怪战争”。1940年4月，德国军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占丹麦、挪威，5月10日至5月28日，攻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其间在5月13日大举入侵法国，驻防法国的英军这才慌忙从敦刻尔克大撤退，损失惨重。你看，毛泽东不寻常的预言，不仅仅是结果，连方位都说准了。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本传在第二卷中曾经说过，毛泽东早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高兴和沉痛》一文中，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他说：“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10年20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说来真是太神奇了，就在1940年6月22日，也就是在巴黎和会上参与分赃活动20年之后，法国被迫在一战结束时德国向其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这岂止是大大的头痛，简直是亡国灭种啊！

**第32章**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

**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话说1938年6月11日，晋西北120师抽调第715团、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编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于9月间进入绥远（今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开辟了绥南、绥西和绥中区。

6月15日，毛泽东复电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

此前，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日军主力进攻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较为空虚，提议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的抗战决心。周恩来在此电中婉转地提出了要八路军配合武汉会战的问题。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我上月26日电已大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

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汉发表长篇文章，主张与日军大战，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片面强调保卫武汉的重大影响。与王明等人相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是，要点不在于死守武汉，而在于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6月27日，毛泽东第9次来到陕北公学讲学，专门将《论持久战》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向学生们作了介绍。他还讲到了保卫武汉的问题。

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参加了边区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发起组织的文艺晚会。柯仲平在晚会上朗诵他创作于5月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朗诵了一半，感到下面还有很长，怕耽搁毛泽东的时间，就停下来问道：

“还要不要念？”

毛泽东听得正高兴，兴致勃勃地说：

“把它朗诵完吧！”

柯仲平又挥舞着手臂，大声朗诵起来。待柯仲平朗诵完了，毛泽东走到台边，与他亲切握手，赞扬他把工农兵大众作了诗的主人，赞扬他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诗的大众化风格所作的辛勤努力。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柯仲平的诗稿带回去审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还写出了一个批语：“此诗很好，赶快发表。”

不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便破例在第41期、第42期上连载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

1938年7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3期、44期（合刊）正式刊出。随后，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和署名；扉页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此后，各抗日根据地印发了单行本。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论持久战》在国统区正式发行。

7月上旬，就在《解放》周刊刊登《论持久战》之后，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3阶段的科学分析。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他是这样写的：“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心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明也表露了他的心迹：“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我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转来的彭雪枫、朱理治发自6月9日的报告。彭雪枫、朱理治在报告电文中写道：

“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10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

毛泽东阅罢报告，即以他和张闻天（化名洛甫）、刘少奇（化名胡服）的名义，复电给彭雪枫、朱理治，全文如下：

雪枫、理治：

来电已收到。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须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方发动。对于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现正物色中，可派数人来。苏鲁边区郭子化已与山东省委郭洪涛接上头。洪涛现在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请将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电告。

毛 洛 胡

7月4日，彭雪枫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豫东及南阳的军事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毛主席：

1、河南自开封失守之后，各县难民之较先进者，纷纷前来联络以图揭竿而起，甚至团、旅、师长，及今在乡村间之军人，亦前来求得联系，要求指导者甚多。2、宛西之别廷芳在镇平、内乡、淅川，为我陇海路断后入陕之大道，握有极大兵力，单武装即有8万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内乡与之联络，别认为：（1）敌人一到，只有共产党不走。（2）将来为我党天下。对保卫家乡及前途发展，愿与我们切取联络。又豫东之西华民众运动，做得极好，男女老幼均有组织，一声呼唤，即可集合武装力量之脱离生产者约计7000人，枪支弹药齐全，并在我党绝对领导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区一个学校武装数百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舞阳县青年救国会约3000人，南召武装3000人，杞县1000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另外各县之零碎武装以统一战线关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装力量，均不在内。3、形势现已好转，惟所缺者军事政治干部，各地前来要干部者日内数起，无法应付。根据晋冀经验，各地武装之发展壮大为我党干部领导之力。我党对中原前途应加以重视，必须派来大批有经验之团营连各级军事政治干部，方能应付目前局面。4、抗大学生毕业来时，请另送一个保卫局干部，即来工作为要。

彭雪枫

7月4日这一天，柯仲平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筹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民众剧团是在延安师范学校“乡土剧团”和延安“群众业余剧团”基础上，经过调整、充实组建起来的，由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主任，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剧团的团旗上绣着8个大字：“大众艺术野战兵团”。剧团团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两句话：

“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

剧团演出舞台两边的对联是：

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

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横批是：“团结抗战”

这个剧团仅仅是靠着几十元钱起家的。剧团成立后，没有汽灯、幕布，甚至没有必不可少的舞台道具。柯仲平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纷纷相助，毛泽东拿出300元，买了毛驴、汽灯等；周恩来、博古从蒋管区回来，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陈云送了一台小电动机；贺龙从晋西北回来，不仅给了70元法币，还托刘白羽、林山从山西前线带回一批缴获日军的军用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等，赠给剧团做道具；张鼎丞也送了许多战利品。后来，民众剧团常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颇受陕北人民欢迎。

7月5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王明的意见，在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为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名中共方面参政员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意见》中说：

“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地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

《意见》中还说：国民参政会在产生方法和职权规定上还不是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它的召开显示着，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和走向民主化初步开端的作用与意义。《意见》提出，在参政会内应讨论怎样“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来保卫我们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并就如何保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确保各党派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普遍组织民众、扩大民主和改革政治机构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一天，毛泽东在延安致电国民参政会，称因病不能到会，向国民参政会进3言：“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7月6日，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

参加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国知名人士有：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杜重远、王云五、谭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

中共方面参政员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

王明在会上领衔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同时希望国民政府尽快根据该纲领制定具体详明的实施办法。全体参政员起立鼓掌，通过了这一提案。

7月7日上午，延安各界召开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向抗日阵亡将士献的挽词是“抗战到底，浩气长存”8个大字。他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了花圈，并在大雨中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

下午安排的是文艺演出，地点在延安钟楼东边原巡抚衙门旧址。

此前，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3个现代戏：新编京剧《松花江》、3幕话剧《流寇队长》、由丁里主演的3幕歌剧《农村曲》。据“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员张颖回忆说：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填写现代生活内容的旧戏新唱，称得上是现代革命京剧的滥觞。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亲萧恩。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大加赞扬，并表示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

这天下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最后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新编京剧《松花江》。

《松花江》成功地将抗战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常的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板式则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绪，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参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叹，“想不到在‘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这次成功的艺术尝试，正暗合了毛泽东随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据翟林椿回忆说：“江青扮演的萧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结束后，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领导们和广大观众致谢。之后，江青和演员们回到后台卸妆。临时化妆室是一间残破的小屋，点着一盏汽灯。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的谈着。”

马社香也记载说：“2002年我曾采访过一个警卫员赵登本，黄麻起义老红军。抗战初期他在中央警卫连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过一次庆祝会，毛主席也来了。江青表演京剧折子戏后，拿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签名题字。毛主席点点头，签了名。没感觉有什么亲密关系。”

此后，毛泽东在延安机关合作社宴请了参加演出的鲁艺师生。

7月中旬，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和孙子文、毛泽普、沈宁、胡觉民及其6岁的女儿毛海英等人从韶山来到了延安。

此前，王淑兰把毛华初送到大路旁，对他说：见到毛泽东“要叫他大伯，要给他鞠躬。”毛华初他们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经长沙、武汉、西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华初非常渴望尽快见到伯伯毛泽东。

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整齐清洁，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靠山是一排4孔石窑洞，他只住了两孔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间隔开，分别作为办公室和寝室。寝室里架了一张单人床，铺盖和战士们一样，是粗布被面。外边的办公室也十分简陋，谈不上有什么陈设，只在靠窗户的地方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信。靠蓝布帘的外端，摆了一张长凳做洗脸架，上面放着两个盆。

毛华初由族兄毛慎仪领着，在会客室里见到了毛泽东。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只见他穿着一套和战士一样的灰色军装，戴着一顶已经摘去了五星的八角红军帽，身体显得很单薄，脸也有点黄，眼窝有些凹陷，但他的精神充沛，两眼炯炯有神。毛华初没想到伯伯当了这么大的官，住的穿的还是这么普普通通。他激动地站在伯伯面前，遵照妈妈的嘱咐，喊了一声：“伯伯”，又毕恭毕敬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毛泽东微笑着走过来，用手摸了摸侄儿的头，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毛华初听伯伯如此说，信以为真，顿时急了，说：

“妈妈说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

“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还要背柴背米，又不发饷，你能吃得消吗？要做好思想准备啰。”

毛华初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怕苦，我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

毛泽东风趣地说：

“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吧。”

毛泽东见毛华初高兴了，又说道：

“不过，要记着，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够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而吃苦。”

毛泽普说：

“湖南还有许多进步青年向往延安，想来投奔延安。”

毛泽普比毛泽东小26岁，是毛泽东堂伯父兼塾师毛麓钟的儿子。他在1岁时父亲就死了，是母亲把他拉扯大，又供他读完了中学，是韶山冲少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见他这么说，便笑道：

“无湘不成军嘛！干革命要过两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就离开了革命队伍。”

他又兴致勃勃地问道：

“韶山到延安来的人不少，一共来了几批？”

“大概有3批。”胡觉民说：“不过，中间可能还有人来过延安。”

毛泽东说：

“你数给我听听，来了哪些人？”

胡觉民掰着手指算道：

“第一批到延安的是远耀、远翥、泽全叔、泽青叔。第二批是远志、慎仪和章淼洪。第三批就是我和泽普叔、华初、沈宁。一共是11个人。另外，韶山还有一些人想要来。”

毛泽东笑着说：

“他们都来了，都是毛家人，那我来当这个族长吧。”

客人们见毛泽东还是这么风趣，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说：

“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不过，延安条件艰苦，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背米，还没有薪水，没有官兵等级之分，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都是一样的待遇。到延安了，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为人民服务。去年，谭天民烈士的父亲谭季余先生，搭宇居大哥的信，要来延安过年。我的表哥文运昌，又写信给我要到延安谋职。我都劝他们不要来，他们家累重，不能瞻顾，免得耽误他们。”

毛泽东又向胡觉民、毛泽普问起家乡的情况，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烈士牺牲后其家属们的情况。当他得知家属们遭受迫害生活极为困难时，当即吩咐秘书给毛福轩的父亲毛俊明寄去400大洋。

后来，毛泽普、毛华初被编入抗大学员班学习。毛泽普后来转到马列学院学习。毛华初毕业后被分配到机要部门工作。

7月20日，白求恩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在晋察冀的工作情况，提出了设立一个正规的后方医院的建议。毛泽东看了电文后，给聂荣臻发了一封电报，指示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需款，请令照其计划执行。同意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

聂荣臻向白求恩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白求恩非常高兴地说：

“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职务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白求恩谢绝了每月给他100元的津贴费。聂荣臻劝他接受毛泽东的一片好意，他却说：

“我从延安来，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的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愿意过中国革命队伍里普通士兵的生活。”

白求恩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我谢绝每月100元生活补贴。军区已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钱。请将这笔钱用于前线更需要的地方。我本人若需少数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后来在8月21日，白求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做了一整天手术，确实很累。共10例，其中5例很严重。”“我从早晨5点半直到晚上9点，每分钟都有重要工作。”“我确实累了，但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我很满意，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不该高兴呢？”

且说7月28日，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在与毛泽东、林伯渠等一起聊天时，倾吐心事说，今乃家母70大寿之日，当此国难当头之际，无法回家为老人家祝寿，深感内疚。

姜齐贤，字竹林，1905年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神童镇，1925年夏毕业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护士班，投奔湘军，被分配在第3师12团1营当军医，后投奔国民革命军，曾任第9师中校军医，1931年在江西被俘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

姜齐贤说，母亲姓刘，共生育了7个孩子，姜齐贤最小，7个孩子个个都是读书人。母亲教育后人说，对穷人要有仁爱之心。她从不嫌贫爱富，常常把拖儿带女讨饭的人请进家里，用煎鸡蛋炒饭给他们吃。姜母也很严厉，家里任何人都不允许打牌、赌博，如果有谁胆敢破例，就罚他跪在祖宗牌位前悔过认错。后来，姜齐贤和3个兄弟参加了革命。他参军后就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上。国共合作后，姜齐贤到武汉开会，照片登在报纸上被姜齐贤的五哥看到了，写信告诉老太太说：“老七没有死，他已经去了延安。”姜母让五哥写了一封信，叮嘱姜齐贤：“好好干革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毛泽东非常尊敬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母亲，便叫身边工作人员找来一块红绸布，托林伯渠代笔，在这块红绸上写了“国之贤母”4个颜体大字，然后自己亲笔在右上方书写：“姜母刘太夫人七十寿辰志庆”，在左下方署名：“毛泽东敬祝”。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的建军节纪念活动。会餐时，和他同席的有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还有徐懋庸。毛泽东问徐懋庸：

“你结婚了没有？”

徐懋庸回答说：

“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儿女呢。”

“你爱人现在哪里？”

“在浙江黄岩。”

“哦，”毛泽东笑着说：“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

徐懋庸摇摇头，说：

“太不容易了。”

毛泽东对滕代远说：

“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

“可以办到。”滕代远说罢，转向徐懋庸，嘱咐他：“你开个地址，再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

过了两天，滕代远见徐懋庸还没有回音，就派通讯员去把地址和信要了来。

就在这8月间，徐懋庸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由艾思奇和张庚做为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妻子刘蕴文在内侄刘仁德陪同下，带着两个儿子执提、执模于10月间来到了延安。

8月6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武汉的王明、周恩来等人，电文中写道：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和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

8月9日晚，毛泽东在欧阳平送来的一张自己在抗大作报告时的照片背面，应欧阳平之请求，用毛笔写上了“奋斗到底”4个苍劲有力的字，落款署名：毛泽东，1938年8月9日。尔后，他让警卫员送回给欧阳平。

说起欧阳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还是在7、8月之交的时候。那时候，担任抗大6大队（又名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教员的欧阳平，随队由洛川开到延安，参加抗大学生毕业典礼。到延安住下后，大队政治部主任张正光邀他一起去见毛泽东。欧阳平说：

“毛主席这么忙，会接见我们吗？”

张正光说：

“毛主席特别喜欢青年人到他那里去聊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去他那里，不论是部队来的学员，还是国统区、沦陷区来的学生，只要通过报告，他都会让你进去。”

欧阳平闻听此言，满心欢喜，便随着张正光来到延安凤凰山下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经值班警卫员通报，果然得到应允，他们向毛泽东敬礼问好。毛泽东和大家一样穿着灰军装，和蔼可亲，招呼他们坐在板凳上，叫警卫员沏茶，又给每人递过一支烟，一一问过他们的姓名和职务，问他们伙食怎样，每人每天吃几钱油，能不能吃上肉，能不能吃饱饭。欧阳平告诉毛泽东，自己是兴国人。毛泽东兴奋地说：

“噢，你是兴国老表，兴国我去过好几次。你们那里的米粉鱼又辣又香呢，味道好极了。”

他又问欧阳平读过几年书，现在当政治教员讲些什么课。欧阳平不好意思地告诉毛泽东，因家里穷，自己只念过两年书，参加红军后，在红军学校读过书，拿到了毕业证，就留在红军学校当教员。现在在抗大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现炒现卖。现在的学生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讲课比过去更难了。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敢给知识分子上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你们都很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知识，你们应该起模范作用。”

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欧阳平、张正光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说：

“以后要来可以来，路远写信来也行。”

几天后，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干部学习理论时，提出工农干部要知识化的号召。他还以欧阳平为例，说明工农干部知识化是能够做到的。

到了8月上旬，八路军总政治部有名会摄影的学员把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时的一张照片赠给了欧阳平。欧阳平把这张照片送给毛泽东，请他题词。两天后欧阳平就收到了前边所说的毛泽东在8月9日送回给他的签名照片。

后来在1939年春，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工作的欧阳平，又托人捎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两个月后，八路军总兵站张令彬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转给欧阳平。毛泽东在信中除了勉励欧阳平安心工作外，还答应推荐他去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11月，欧阳平便接到了去延安马列主义学院读书的通知。12月，他到了延安，住在宝塔山下总后招待所，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请他吃羊肉炖土豆、豆腐炒白菜，详细询问他所率领的战地工作团的工作情况。

且说8月间，徐海东在前线患肺病吐血。毛泽东电令他回延安疗养。徐海东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

“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安慰道：

“你要好好养病，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养好病可以更好地参加抗战嘛！”

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为防止和惩治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和公营企业中的贪污现象，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共9条：

第一条 边区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凡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经所属团体控告者，亦依本条例处理。

第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

一、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二、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三、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四、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五、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六、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七、违法收募税捐者；八、仿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九、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十、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第三条 犯第二条之罪者，以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之规定惩治之：一、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至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

第四条 前第三条之未遂罪罚之。

第五条 犯本条例之罪，除依照第三条之规定处罚外，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一部分，无法追缴时,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第六条 犯本条例之罪，于发觉前自首者，除依第五条之规定令其缴出所得财物外，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第七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之。

第八条 本条例解释之权属于边区政府。

第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全文如下，以飨读者：

同志们，说了很久要来讲话，但回回没有来得成，很对不住。今天讲3个问题。第一，当学生；第二，当先生；第三，当战争领导者。

同志们现在都是学生，又何必来讲当学生呢？况且有一部分同志快毕业了，毕了业就不是学生，其他的同志也等不了多久就毕业，为什么还要说当学生呢？岂是学生要永远当下去吗？ 我说对的，学生要当一百年。什么道理呢？又是怎样讲呢？因为同志们快毕业了，其他的几个月以后也要毕业了，所以来对这个问题贡献点意见。

党校是学校，住在这里就是当学生。出了党校门是否学生就当完了呢？有人说是的，毕业了。我反对，我说不毕业，但文凭还是赞成发，毕业典礼也赞成举行，这是毕业又不毕业。毕业告一段落，毕业后还要大学特学。无论进了党校、抗大、陕公，外面的中学、大学，都是一个人，尤其是革命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的开门。学校生活是一种开门性质，把门打开是想进房子去。进了房子，事情就多得很，在里面吃饭、睡觉、做工作，可以住上十年、几十年。外面的大学三四年，此地的学校几个月，都是开门。真正要研究东西，不是在学校，学校只算一张门，房子是中华民国，那里头才有多一点、深一点的学问供你研究。

现在讲门与房子的关系，不开门就不能进房子，叫作关门主义。强盗进房子，不得其门而入就要窬墙，小偷就打一个洞开扇小门，总而言之要开门。学校虽只几个月，但学了一个方法，除了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党校所学的是马列主义的方法、革命的方法、群众工作的方法、党的工作方法。如同下河游泳，必须先学如何游法，但还不算大游泳家，必须要真的下河游一游。如果游到中间，掉下去了，就不算好角色，是进门就呜呼。我们学的方法是为了战争，就要到各个战场上去做工作，在工作中取得胜利，才算好角色，但这张门的打开是要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

第二，如果活一百岁，今年20岁，那还有80年学生可当。学校以外所学的比学校学的多得多。学校所学的只是两手的一个指头，校外学的却有几个指头。不但如此，孙中山先生是学生，学的是医；他学了三民主义没有？一点也没有学。他学了中国革命方针、方法、政策没有？一点也没有。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他的一套不是从学校来的，而是在外面的大学校学的。小党校在这里，其余如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等都是大党校。如果周游列国，到了英国、美国、法国，那里也成了大党校，大党校者地球也。假使说党校在延安东10里，这话对又不对。对的是小党校在此，的确在此；不对的是大党校在全地球，那里面的东西多得很，天文地理等等之类，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学到100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所以党校学生不可自称老爷，我们出去，要时常带着学习的态度。学校学习是第一章，以后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每到一处，不要宣布自己是大老爷，要宣布自己是学生，老老实实问一问情形，地形路途，东南西北，苛捐杂税，贫农，富农，男男女女都查个清楚。从前怎样，某年怎样，如何发展，弄个明白。在党校就把党校弄个清楚，党校历史怎样等等；出去当县委区委，首先至少把一县一区查一查清楚。不要乱下命令，更不要你的命令别人做不到立即加以处罚，不弄清情形而乱下命令是要不得的。譬如开批评会开展斗争，说某人是机会主义，但如果不把他历史的、全面的弄个清楚，他不会接受你的批评。弄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隔靴抓痒是没有用的，原因在于没有抓到痒处。解决问题也要抓住其要点才行，如说打日本如何打法，种种理论如亡国论、速胜论等都没有抓到痒处，持久战才多多少少抓住了一些。你们出去无论打游击，做党的工作，群众工作，不管对象是谁，都要找清他的底子。试问是否可以看看《列宁主义概论》？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书本以外的东西也要研究。所以书本上的与非书本上的都是可学的与应学的，而没写字的是大学校。在党校学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我们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比孙中山还强些。讲到马克思，他有没有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呢？据我所知，他不但没有学，并且相反，他学了反马克思主义。他的先生黑格尔是唯心论，马克思是唯物论，他们两个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的，是在德国、法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所看的事，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英国劳工运动，并且学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太上老君、开山老祖。他的法宝可使资产阶级头痛，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学校外面创造出来的。列宁也是在校外创造了列宁主义。中国也可以有列宁、马克思，党校七百人中间出一二十个马克思，并不稀奇。

你们在学校已经学了马克思主义，将来继续学习，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还要向日本帝国主义学，为什么他有强大的飞机大炮，他的战略战术如何，政治情况又如何等等，同时打仗一定要了解他的情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要向自己学，如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等中国人，知彼就要知道帝国主义。我们要最后胜利，如不知己知彼，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得学习，随时随地当学生。很多好同志有学习的精神，不把自己作为了不起，没有说学了游击战、社会科学等等就满足，党校没有这样自大的作风。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自己地下全知，天上一半，不肯老老实实了解客观情形，把这情形研究一下，再想个办法，施之于事，就是不肯采纳由外到里、由里到外打倒日本的办法。我所说的就是要学这个办法，这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中国有些古人也讲这话，如孙武子。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学校学习等于开张门，出去后要大规模的学习，第二种学习就是大党校，你们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不会犯大错误了。如果不用这个办法，不先了解客观情况之后经过考虑再下命令，一定很危险，我想党校同志们是有这样的意识。

第二个问题是当先生。当学生又当先生，岂不怪哉？一点也不怪，就是这样。当先生的除了学校教员外，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都有责任，在做事中间要当先生，也就是当学生同时当先生，每一个人有责任教育别人。我们中国人很多，四万万五千万，但这些人懂得不很多，什么团结抗日，什么民主政权，什么民生幸福，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什么天地人和，一二三四，赵钱孙李，等等懂得很少。所以教识字的是先生，中学大学教书的是先生。我们还要放宽些，出去开学校，不用钱，房顶是天、房底是地，开露天大学，但这不是叫每个人都去当学校教员，而是说无论做支部书记、县委区委、青年救国会、自卫军、少先队、农民会、工会、妇女工作、游击队、新闻记者，你所知道的就当先生，不知道的就当学生，学了然后再去教育他们。马克思就是这样，从无产阶级学习了，又去教无产阶级。他的先生有几百万工人，工人觉得冷，觉得饿，都教育了他，工人打机器，也教育了他。后来工人懂得剥削者是谁而不打机器了，要怪机器所有者资本家了，于是工人打资本家，这些都教了马克思，造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再去教工人。你们也如此，要从老百姓处学习，造成你们的东西，再去教老百姓，不断地教老百姓。团结干部也是如此，一定不怕麻烦地教他们。从前有个好教员孔夫子，他慢慢地来，弄清了学生脾气，使学生都喜欢，然后好好地教他们，所谓“循循善诱”。他又学而不厌，随时当学生。如果你们有人会学得厌，就不如他了。孔夫子还有一件事，当先生不打盹睡，所谓诲人不倦。你们出去无论做什么工作，也要不打盹睡，如果倦了，要用钻股法刺一下。总而言之，要好好地弄清楚，不要不耐烦。如果每人能诲人不倦，不倦地教育人家，团结干部，则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团结起来，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先提高了干部水平，继则人民水平都提高了。同志们要肯去讲，肯去说，有台就演讲，不要害羞，不会说就练习演说。有机会不演讲，有谈话机会不谈话，就不是共产党员。大家要有积极的教育人家的精神，就是当先生。

因为同志们不久要出去做各种工作，无论做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我都要同志们抱这样态度。但如果宣布“我做先生”，那就坏了，群众都会慢慢地脱离你，最后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要摆架子，先生架子摆不得，有点臭气，摆老资格是件坏事，“老子二万五千里”就是摆资格，使人讨厌。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我提倡当先生，但又反对当先生，所反对的是自称先生。同志们都不要摆臭架子，就是要恭恭敬敬，客客气气，才和人讲得通，你的心和人家的心相通起来。无论是群众、父母、朋友或最亲爱的，都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每人都要有教育人家的精神，都要有提高干部水平的责任，要说到舌子烂，喉子干，就是说要肯讲肯说，多讲多说，不倦地讲，不倦地说，有当先生的精神，但没有先生架子。

第三个问题是当战争领导者。也许有人说“要我去当排长，我尚未学会，我不去”。不是如此。党校同志大多数不去当排长或师长军长，但又不一定不当。我就当过师长，在井冈山当了一回。我既未进过党校，也未进过军校，逼上梁山，不得不当，何况你们进过党校，当过学生自卫军呢？如果一逼，还是不得不当。但党校毕业生还是不当师长的多，而要去做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那么如何说战争领导者呢？现在战争参加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如果共产党员不懂得战争的道理，不懂如何指挥，就当不成功战争的领导者，所以今天来讲一讲。

在中国今天干革命，离开了战争就不行。第一，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第二，这种国家的革命任务是要独立要自由。半殖民地是不独立、半不自由，半封建是不自由。中国既然是不独立不自由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换句话就是要独立要自由。第三，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独立自由，完成这政治口号，做到对外独立、对内自由呢？方法多得很，党的工作、工会农会、组织政府、分配土地、办报纸、办学校，各种方法，各种方式，但战争是与敌人斗争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历史看，鸦片战争是战争，太平天国是战争，辛亥革命是战争，北伐是战争，10年苏维埃是战争，今天抗日又是战争。在中国谋独立和自由，废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国民党一路干战争，共产党也干过战争3回，第一回北伐，第二回红军， 第三回抗日。因此不论做哪一项工作，都要管战争，要和战争配合。现在有一批同志到山东去干党的工作，他们除了和游击队配合以外，还有什么办法？不然只有走，或者坐监。在山东做党的工作，离不开游击队、抗日自卫队、少年先锋队。山东的梭镖很长，日本兵很怕，因为这也是武器，也是军事，也是战争。如果有步枪，那就更好，所以大家要研究战争。党校同志对战争是门外汉，这句话相当对，又不完全对。同志们未进过抗大，但可以进一进，如果不进，学学旧戏里进门的办法，两手一张，不消一个钟，也就进了去。这就是说只要有决心。研究书籍也好，到了泰山就向老百姓研究一下、调查一下，就会有办法，就会组织队伍。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同志从前是第1军团的政治委员，现在是五台山的军事总指挥，他就是用两手一张、一步进门的办法学了战争，陕北许多人民也都是这样来的。西班牙有许多军长、师长、团长也是如此，昨天在挖煤，帝国主义侵略来了，就爬出洞来去当兵，当兵有了经验，就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到军长，这些人都未进过军事学校。中国的徐海东、贺龙也是好例子。军事不用学，将来都可当军长，只要你肯干。连这也是逼上梁山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离武汉不远，如果武汉一失，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不吃则已，一吃便想再吃，他还要西安、广州、南昌，中国只剩下峨眉山。如果大家到峨眉山去当和尚，我就不赞成，你们也不赞成。但那些日本占领了的地方，除了武装，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办法呢？不干战争，如何做工作，如何办农会工会，如何办学校呢？上海、平津等地的工作要做，但是第二位，只能偷偷摸摸，小声讲话。党的主要工作要放在战区，用战争方式来扩大游击区，来挤日本。朝东一挤，挤到平汉线； 朝西一挤，挤到同蒲路；南到正太，北到平绥，中间五台山就属于我。挤得日本兵怕八路军，只剩下平汉线一条。不但挤白天，而且挤晚上，铁路在晚上就归我。其次一挤，挤到北平城，弄得火也熄了，城门紧闭。用这方法挤日本，扩大抗日政权，消灭汉奸统治，扩大党，扩大党的威信，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工会、农会，再加上外国的援助，日本内部的反对，使帝国主义的路断了。马克思算得好，说帝国主义要死，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中国抗日政权的建立、国际的援助中国和日本国内的叛乱之下而死的。于是中国的独立自由到手，开个庆祝会，党校学生散到全国各地，到那一天大家都庆祝。战争没有困难，想做就有。女同志又怎样呢，八路军不要就不干战争吗？也不！中国从前有穆桂英、樊梨花，将来中国还要产生许多女战士、抗日的女英雄。这是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问题越讲越大，要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再有没有？没有了。如果再要有点，还是没有了。我还要到党校来，将来有机会可再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月间的一天，毛泽东派江青代表他去医院看望陈士榘。这时，江青已经从鲁艺调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正式加入了军籍，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陈士榘是在3月份的晋西午城井沟战役中身上9处负伤，左耳膜被震破，成了聋子，在8月份刚刚从前线回到延安拐峁野战军医院疗养。毛泽东让江青带去了一封慰问信和200元钱。

此时的江青在延安的女青年中还是比较出众的。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头发乌黑浓密。头上有时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有时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在肩上，有时梳着两条大辫子，戴上一顶薄薄的灰色军帽，帽顶推向后面，使不太高的前额全部显露出来。她眉毛如柳叶，不浓不淡，鼻子挺秀，抿着稍大的嘴巴，那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时时流露出欣喜的光芒。

江青不但能写文章，字也写得好，特别是楷书写得好。她还会剪裁，自己动手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很漂亮。她又会织毛衣，能织出各色各种花样的毛衣。江青还比较注意和群众的关系，她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剪头发，教教女青年针线活，给警卫员们讲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江青的另一面也与众不同，学会骑马以后，反而喜欢上了烈性马，马越凶她越爱骑。

1938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穿着新发的灰布制服，一起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凤凰山下两间石头窑洞前。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出生于重庆万州，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他早期的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抗战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万州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8月底，他与沙汀、卞之琳从成都到了延安，暂住在西北旅社。

且说毛泽东身着蓝布制服，正坐在一张质地粗糙且没有油漆过的小木桌前看书。警卫员将何其芳3人领进屋内，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何其芳说：

“我们来是要写延安的。”

“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毛泽东话语幽默：“延安只有3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说一座山弯下一个手指头，环视了一下客人们，又爽朗地说道：

“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的。”

毛泽东的神态和话语，一下子把客人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9月4日，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的窑洞里开了一个哲学座谈会，参加的人有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郭化若、萧克、莫文骅、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此后“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何思敬懂德文，毛泽东就请他在哲学座谈会上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何思敬是照着本子一边翻译一边讲，讲得实在算不得高明。尤其是在他自己发挥的时候就常闹笑话。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他一边听，一边用一支红铅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有时还要插话，说明自己的观点。

莫文骅还回忆了毛泽东“请客”的往事，他说：“1938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人在毛主席住处与毛主席一起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习结束后，已经很晚了，毛主席诙谐地说：人说姓毛的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毛，请你们吃夜餐。大家高兴极了，心想，毛主席要‘拔一毛’，准能解解馋了。谁知，毛主席只是请每人吃了一碗大米饭。这在当时虽属不易，但一碗大米饭在毛主席看来已经算是心疼地‘拔一毛’了，可见毛主席的生活是多么艰辛！”

9月上旬，傅连暲走进毛泽东的窑洞，例行为他做保健工作。毛泽东正在写东西，一见傅连暲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笔，招呼他坐下。

傅连暲自到延安后，一直担任着苏区医院院长，还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这里来一趟，算是常客了。傅连暲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毛泽东看了他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说：

“傅连暲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入党？”傅连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几年的愿望，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自从结识了毛泽东，就一直想着，既然自己了解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献给这个事业，才算没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一天，党会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没想到这么多年期望的事儿，今天却由毛泽东首先说出来了。只听毛泽东又说：

“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

傅连暲激动得眼眶热热的，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心里却在沸腾着，好一会儿才说：

“我就去。”

此后，经毛泽东和陈云介绍，傅连暲参加了中央党训班。

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傅连暲的历史做了证明，傅连暲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入党申请书证明人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毛泽东”3个字。

9月11日下午2时，成仿吾、艾思奇、刘白羽、沙汀、卞之琳、陈学昭、丁玲、徐懋庸、何重芸、周扬、雪苇、沙可夫、田间、柯仲平、任白戈等延安文学界人士，在边区文协救亡室举行“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简称“文联”）的成立仪式。

会场上挂着高尔基和鲁迅的画像。由边区文协主任艾思奇担任会议主席。

刘白羽首先汇报了“文联”的筹备经过。他还说：“文联”是为适应抗战对于文艺的重大要求而诞生的，它的任务是选拔文艺干部、提供文艺食粮、创造抗战中的文艺理论。

随后，与会的其他文学界人士及中央印刷工厂文艺小组的代表相继发言。会议决定：广泛建立文艺小组，动员文艺干部深入前线，出版文艺刊物，加强文艺理论建设等。

大会推举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白羽等组成“文联”执委会。

仪式结束后，与会者举行了聚餐和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有柯仲平的诗朗诵，陈学昭的法文歌，丁玲的小调，沙可夫的俄文《游击队歌》等。

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战斗和训练之余，通过创办合作社、种菜、开磨坊、养猪、打柴、做鞋缝衣等生产和经营活动，改善了部队生活。毛泽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部队改造成为工农商学兵集合的部队，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还要求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队去。

9月中旬，王稼祥从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疗伤和工作了一年多。任弼时到了苏联以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内部近期的工作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派王稼祥回国传达国际的新指示。在王稼祥动身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时谈了话，季米特洛夫说：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了吧！”

斯大林也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每次举行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上，都要悬挂毛泽东在保安照的那张头戴红星帽、身穿黑蓝红军服的大幅照片。毛泽东终于十分巧妙地拆了王明的台。

此时国内局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随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深入，毛泽东提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重大意义，华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仗越打越精，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而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不断溃败而逐步走向破产，两相比较，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处理王明宗派团伙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稼祥在会议上如实传达了共产国际及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他说：

“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行时他（季米托洛夫——笔者注）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

王稼祥还说，共产国际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季米特洛夫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

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让王稼祥打电报通知在武汉的王明等人，要他们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接到通知后，马上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到武汉或西安去，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为此，政治局会议不得不继续进行，后来一直开到27日才结束，实际上成了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王明目无纪律、目无领导、有意抬高自己的作法，都表示了强烈不满。毛泽东讽刺王明在国统区是自己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他气愤地说：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又提出要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即遭到王稼祥的严词拒绝。经毛泽东同意，王稼祥复电王明说：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你本人自负。”

至此，王明已经无计可施了，只好乖乖地按照中央的要求回到了延安。

9月17日，奚定怀（奚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一张宣纸，请他给题一个报眉。

此前，奚定怀、柯仲平、刘白羽等人筹备出版边区第一个文学刊物《文艺突击》，已经将第一期稿件编齐了，奚定怀便按照大家的意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毛主席：

因为觉得延安文艺活动表现得很沉寂，而事实上又很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发起由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延安各学校团体爱好文艺的同志们，成立一个“文艺突击社”，并且初步工作是出版一个油印的纯文艺的旬刊，名字也就叫作《文艺突击》。这个旬刊第1号已经编好，决于20日以前出版。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眉……希望能马上替我们挥成。你近来很忙，如果有从前的文艺作品愿意给《文艺突击》，这将使我们如何兴奋！而且也将使不久以后的每一个读者如何兴奋！

此致挚爱的敬礼！

一个抗大工作者 奚定怀

这一天，毛泽东接到信后，立即在附来的宣纸上挥就了3幅“文艺突击”，并在原信右上端批复：

“写了几个字，不知可用否？”

后来《文艺突击》出了两期之后，受到了各方的好评，大家都希望将《文艺突击》的油印版改成铅印版。正当编辑部门为经费犯愁之时，毛泽东带头捐款二三百元，许多党政军领导人随即响应。不久，《文艺突击》在1938年10月16日改为铅印出版。

9月2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

“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

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的形势，说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还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统一同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

“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摩擦和共产党的反摩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29日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确定其主要议程是：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3、毛泽东做政治报告。

毛泽东建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他还总结说：

“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

欲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结果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张国焘这段话尽管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的结论尽管是“马后炮”，但他对王明的评价倒也说得上是入骨三分。王明的确是一个“嘴尖皮厚腹中空”的野心家。这样的人竟然在中国共产党内招摇数年之久，而且屡屡得逞，这中间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党内那些“墙头草”式的风派人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革命的重大损失而言，他们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33章**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

**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话说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一座旧教堂里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王 明 张闻天 刘少奇 陈 云 项 英 博 古 王稼祥 康 生 彭德怀

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关向应 林育英 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8人，他们是：贺 龙 罗荣桓 谭 政 彭 真 高 岗 罗瑞卿 林 彪 邓小平 萧劲光 萧 克 潘汉年 徐特立 曾 山 吴玉章 张文彬 朱理治 黎 玉 贾拓夫 林伯渠 谢觉哉 李 昌 冯文彬 滕代远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华 柯庆施 徐海东 程子华 谭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陈 刚 杨 松 曹轶欧 孟庆树 涂振农（后于1943年初在南方叛变投敌）

全会一致通过由12名政治局成员组成六中全会主席团；推举李富春为秘书长。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宣布了全会的主要议程。

接下来，张闻天主持会议并致了开幕词。

王稼祥向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见上一章末）。

主席团决定由毛泽东以他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由周恩来去武汉面呈蒋介石后，再回延安参加会议。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离开延安去武汉。

10月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末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

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这封信是用毛笔书写的，写满了8张纸，笔力遒劲，通篇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堪称毛体精品，值得毛体书法研究者细细鉴赏（可在互联网百度搜寻）。

10月5日，毛泽东和六中全会主席团向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军民发电慰勉，电文中说：

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聂荣臻领导边区军民从1938年9月开始，开展了粉碎日军5万多人对根据地围攻的斗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热情地宣传聂荣臻在晋察冀创造的经验，他说：

“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

后来到11月间，晋察冀边区军民共毙伤日军旅团长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日寇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构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号召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做长期的斗争，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危急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此后在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毛泽东继续作政治报告。这个长篇报告共分为8个部分：

1. 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上。其中第7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目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强调说：

“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的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坚持民族统一阵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7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的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说：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1）个人服从组织；（2）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谈到学习问题，他说：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强调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10月15日，张闻天在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此后，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在散步，就想趁机提出上前线的问题。他走近二人，只听毛泽东开玩笑说：

“中国有3部著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贺龙也笑着说：

“没看完，没看完，不过我不是外国人！”

毛泽东见徐海东凑过来了，便问道：

“海东，你看过这3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答道：

“《三国》、《水浒》看过，没有看过《红楼梦》。”

毛泽东笑着说：

“那你是个半个中国人。”

说得身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徐海东要求上前线，毛泽东摇摇头，说：

“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

在王明发言后，许多与会者纷纷发言，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观点，同时也多少涉及到了周恩来。

10月27日，毛泽东应奚定怀来信之请求，题写了3个“山脉文学”的刊名。

原来抗大、马列学院等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为了发展群众性的大众文艺活动，自发组织了一个文学社，他们受毛泽东开展敌后山地游击战思想的启发，定名为“山脉文学社”。在创刊号稿子编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给毛泽东去信，请他题写刊头，因没见到回复，便让奚定怀以山脉文学社的名义，再给毛泽东写封信催一催。10月20日，奚定怀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日前，我们给你一信，请你题‘山脉文学’4字。大概因为你近来事情非常之忙，所以没有动手来办这件事吧？近期之内，我们就准备把‘山脉文学’编出来，望你能替我们题下4个字‘山脉文学’。你一定支持我们吧！”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的确十分忙碌，但他还是在10月27日这一天，在奚定怀来信的信尾空白处，为他们题写了3款竖行题字，又在来信的上面横行批道：

“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

这个批语完全是用商讨的口气，可那些革命青年文学爱好者还不理解它的含义，只是觉得毛主席很忙，既然已经题为“山脉文学”，不宜再去要求重题。后来，由于印刷条件不具备，《山脉文学》就未能出版，而是改出了油印的《山脉诗歌》。

在10月份的会议期间，40岁的彭德怀和浦安修在延安结婚，这是彭德怀的第3次婚恋。

在此之前，彭德怀的原配夫人刘坤模学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千里迢迢来到抗日战场，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当彭德怀得知她已和人同居并生了一个女儿之时，犹如五雷轰顶，强忍着痛苦对刘坤模说：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没有妈妈，你走吧！”

就这样，彭德怀和浦安修结成了伉俪。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人们评价说，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数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怀给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书写得很特别，他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后来，新婚不久的浦安修随彭德怀奔赴前方，俩人一起度过了战争年代最艰苦的岁月。

10月下旬，武汉会战进入最后阶段。

此次会战是从1938年6月中旬开始的，国民党军李宗仁的第5战区和陈诚的第9战区共110万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地区，同日本侵略军第11军、第2军25万人展开激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国民党军的空军和海军也参加了会战，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4个月后，日军7万多人，2.7万匹马于10月11晚突然在广州大亚湾登陆，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博罗和增城，21日攻至广州近郊。余汉谋的12集团军仅仅10天就被日军击败，余部从广州撤退，21日下午，广州沦陷。10月25日，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守军溃退。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持续4个半月，国民党军以伤亡40余万人（军事委员会统计阵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超过40万）、苏军伤亡100余人的代价，毙伤了大量日军。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称，其第11军战死4506人，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人，负伤7600人，还有900人病死的，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则为25.6万人。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

此后，正像毛泽东9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9月底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所预料的那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略相持阶段。

关于在武汉会战中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指挥失误，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的《武汉会战之教训》曾这样说：“一、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二、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三、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四、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1938年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结论报告。11月6日下午，毛泽东继续作结论报告。这个结论报告共分5个问题：

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

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第五，其它问题。

后来，这个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在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说：

“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说：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谈到“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为转变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所采取的怀疑和反对的错误态度，特别强调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好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失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发展广大的和坚持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在长期的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11月6日下午，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和《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政治决议案》中写道：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会为在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萧劲光、瞿秋白、何叔衡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为被“左”倾错误路线杀害的旷继勋、曾中生、刘士奇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平反昭雪。

全会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的提议，林育英由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向政治局提出，要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

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特殊的情况下，为防止王明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那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以后的实际工作证明，书记处没人牵头不行。如果谁都像王明那样，你发一个指示，我发一个电报，中国共产党非乱套不可。所以，六中全会在进行组织调整时，做出了如下安排：

书记处书记仍是原来的5个人，只在党内分工和排名次上进行了变动：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5位书记的重新排名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

这样，张闻天由原来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免去周恩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驻重庆。南方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沦陷区的工作和港澳地区的工作；同时，领导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和新四军的工作。

充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由杨尚昆任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成立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由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由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妇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的工作。

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创办月刊《中国工人》。

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政大事。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体与会者进行了会餐。

会餐结束后，天空已经生起了一轮明月。毛泽东依然像刚刚打完胜仗那样兴奋，同大家谈笑风生。他和王稼祥等人在回住处的路上遇见了朱仲丽，便把朱仲丽介绍给王稼祥，说她是湖南故人之女，萧劲光夫人的妹妹，是一个医生。就在这时候，正好王明从窑洞里走了出来，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便把话题一转，微笑着问朱仲丽：

“小朱，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去开一家牛皮公司，由你来当老板呀？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

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

“第一，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还要会做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

尚未说完，他自己已经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引得其他领导人也会心地笑了。朱仲丽见众人这样乐，不明就里，看了王明一眼，就冲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说：

“我可当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

这次路遇，毛泽东的特意介绍和朱仲丽的言谈举止，给王稼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没过多久，王稼祥就给萧劲光写了一个便条，他写的是：

“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朱仲丽感到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当作朋友来邀请的信号，也是一种求爱的表示，就非常高兴地跟着萧劲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请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渐渐的，他们更加熟悉了。又过了几个月，王稼祥突然问朱仲丽：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此时的朱仲丽虽然已经爱上了王稼祥，可她也想不到王稼祥竟然如此直接，叫人猝不及防，便失声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快？”

王稼祥哈哈大笑起来，说：

“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就这样，朱仲丽经姐夫萧劲光牵线，终于在1939年3月5日与王稼祥正式结为夫妻了。

且说贺龙在六中全会结束后要回晋西北去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何其芳与文学系第1期的一部分学员，音乐系、戏剧系和美术系第2期的一部分学员，将随着他一起渡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去实习3个月。何其芳来向毛泽东辞行，他汇报说，他将要在前方八路军活动地区搜集材料，写一篇报告文学。毛泽东鼓励他说：

“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不过，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的。当初我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坐，就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政治局会议便移至毛泽东的住处开了，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定夺。为此，张闻天招来了一些人的讥讽，可他却坦然地说：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工作踏实，作风民主，能够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大家的意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毛泽东曾经戏称其为“开明君主”。他还曾经对王震说：

“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张闻天为毛泽东能理解他感到十分欣慰，他说：

“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这个时候，张闻天在党内的分工是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安排。此后，边区党委副书记兼中央统战部常委王观澜在桥儿沟召开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传达毛泽东在全会上的两个报告，讲了3个多小时。新任中央统战部长王明也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这个传达。

第二天，王观澜来到毛泽东住处，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泽东问王明：

“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

王明支支支吾吾地说：

“好是好，就是太长了。”

毛泽东诙谐地说：

“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王明此时为什么还要挑王观澜的刺呢？此事说来话长。早年在莫斯科留学时，二人就结成了冤家。那时候，王观澜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被王明视为托派分子。而今王观澜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自然就成了王明的眼中钉。不久前，在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上，王观澜和王明就因为在“边区”和“统战区”有无区别，发生了激烈争论。王明武断地说：“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则坚持认为，“边区”是指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二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王观澜气愤地说：

“把边区和统战区混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

王明见王观澜公然和他唱反调，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观澜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王观澜闻讯后，直接找到王明，当面责问：

“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

毛泽东闻知此事，进行了干预。他直截了当地说：

“王观澜经过我10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不久，在毛泽东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萧劲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就使王明再也难以干扰边区统战工作，施加错误影响了。

王观澜以前在长征路上得了肠胃病，此时因为劳累过度还经常发作。毛泽东关切地问他：

“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工作的？”

王观澜如实做了汇报，末了说：

“每天无论工作怎样，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

“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

欲知后来王明表现如何，待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武汉会战问题，请读者注意毛泽东9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他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的形势，说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他在9月底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也曾暗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他在10月7日起草的《关于目前日寇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构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中又强调说：“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果不其然，事态发展的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出现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事物发展的预见性和未雨绸缪、应对事变，的确是超乎常人的！

**第34章**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

**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话说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灾难——长沙大火。

原来在11日上午9时，蒋介石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电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据此，张治中传令于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命他二人负责具体实施。二人于11日下午4时就制订出了一份详细的“焚城计划”。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2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计划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此时的日军会不会前来进攻长沙呢？毛泽东11月5日在六届六中全会结论报告中曾经预言：“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的确如此，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已经没有多少兵力继续内侵了。请看事实：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11月9日、11日先后占领临湘、岳阳，与国民党军对峙于新墙河。非常明显，日军的战略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可是就在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外的一家伤兵医院偏偏失火了，因公安消防设备已被毁坏，又引发几处起火。城内的警备司令部不明真相，误以为是放火的信号，便一齐动手放起火来，一霎时，大火吞没了整个城市。因为政府当局事前并没有向市民预告，也没有采取任何疏散措施，所以当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之时，已是逃生无路，人不分男女老幼，无不哭天怆地，呼儿唤娘，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人被人群踩死，有的人被汽车压死，有的人被活活烧死，可怜30000多名居民竟然葬身于这场灾难之中。大火直烧了5天5夜，才自行熄灭。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计有5.6万余栋，经济损失约10亿元。这场大火还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毁灭殆尽，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就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使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坏最严重的城市，同时成为在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3大惨案之一。

长沙大火引起了中外的广泛谴责，蒋介石为平息民愤，不得不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将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3人判处死刑。张治中也因此被革职留用。

据张治中后来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训示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这正是：发罢大水发大火，水火无情冤魂多。

倘若真有鬼魂在，尔曹几命可够索？

再说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在击败王明宗派团伙，取得党内斗争又一次重大胜利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纯真的爱情。他和江青已经双双坠入爱河。他们准备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在延安在上海都引起了轰动。这次婚姻已是今非昔比，以他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自然是万众瞩目。因此从一开始，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嫉妒诋毁者有之，煽风点火造谣生事者有之；反共阵营中有之，共产党内部甚至在政治局里亦有之。人们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利益出发，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周恩来看到江青经常帮助毛泽东抄写文章，已经成为毛泽东离不开的助手了。他们在一起那么亲密，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已经深深地陷入爱的漩涡之中了。他对毛泽东说：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人难免会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泽东说：

“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要离婚，谁劝阻也没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周恩来不但是共产党内首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而且他还找那些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做工作，他说：

“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思想、认识和风格都非常赞赏。”

关于毛泽东的婚事，更多的人则认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干涉。张闻天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可他在看了王世英等人的来信后，便产生了新的想法。

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并参与过营救江青的工作。那时候，他在上海也不断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唐蓝风波”的绯闻。他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就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写好后，王世英觉得一个人在上面署名分量不够，就找到曾经和他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陈雷、南汉宸、王超北、谢祥荫共同署名，他们还一个个摁了手印，送给了张闻天。

关于这件事，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又冷冷一笑，说：

“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还是贺龙爽快，他骂骂咧咧地说：

“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儿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后来流传甚广的有两个小道消息：一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们结婚。二是说周恩来、朱德曾对江青“约法三章”。这些说法至今没有原始文件为据，不足凭信。以毛泽东的个性，他是决不会让政治局来讨论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所说的那样：“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优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后来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证明么！”

杨尚昆也说过：“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传》和《女皇梦》的作者朱仲丽在回忆中，也曾经说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话，她说：“应该说，还是毛泽东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这在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

朱仲丽还说：“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贺子珍之路》一书的作者王行娟也说过这样的话：“客观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讷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毛泽东与江青公开恋情就是在全会后的一天下午。那时候，毛泽东早早在院子里等着她的到来。一见面，他就握着江青的手，高兴地说：

“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

恰在此时，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了院子里。周恩来一见二人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

康生认识江青比较晚，他接任党校校长时，江青已经结业走了。他听周恩来如此说，便接口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

后来在11月20日前，45岁的毛泽东和24的江青结婚了。他们没有领什么结婚证书，也不需要任何形式，就打算在婚后和老战友们聚一聚，就算请客了。

第二天，毛泽东特意请了一个厨师到家中掌勺烧菜。这时候大家都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聚齐。况且一个厨师同时也烧不了几桌菜，毛泽东只好先请了几位老同志来吃饭。尽管有厨师帮忙，江青还是跑前跑后，忙了个不亦乐乎。

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9时后宝塔山上突然警报长鸣，日军7架飞机从山西临汾机场飞来，首次轰炸延安。延安没有防空重武器，敌机肆无忌惮地向大街上的人群扫射、投弹。人们哪里见过这阵仗，一霎时像炸了锅一样，四处乱跑。此次空袭，毁民居109间，炸死30人，伤122人。

是时，陈云躲进了窑洞里，可那孔窑洞被炸塌了，七八个人在外面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扒开土层把他救了出来。

就在日军轰炸延安的这一天，毛泽东和江青邀请张闻天、刘英、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王观澜和夫人徐明清到他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吃饭。说是请客，饭桌上也不过是比平时多了几个菜而已。

前边说过，毛泽东、江青在这之前已经请了一些领导人，此后又请了其他一些领导人。客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为他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没有说出来，大家也就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为客人们敬酒让菜。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决定，为了减少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将机关、学校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

11月21日清晨，日军飞机第二次轰炸延安，城内群众在防空司令部有关人员指挥下有序疏散隐避，伤亡较小。日机空袭的重点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凤凰山，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那3孔窑洞被炸塌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亦被炸，八路军干部战士伤亡30余人。中央领导人被迫从凤凰山麓迁至城外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也连夜搬到了杨家岭，成仿吾腾出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和江青住。

这是位于山脚下的一排3孔坐北朝南的接石口土窑。窑洞里刷上了白灰，还算敞亮。门窗是木制的，糊上薄薄的白纸，可透进光线。地上铺有砖，摆放的桌椅都没有刷过漆。窑洞外是一小块碾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留有一块菜地。

不久，贺龙从晋西北回到延安，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他走近毛泽东的窑洞，正遇着江青从里面出来。他不认识江青，却风闻毛泽东已经结婚了。江青和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简单应了一声。贺龙进了窑洞，故意问毛泽东：

“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呀？”

毛泽东知道他是明知故问，便说：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毒呀！”

贺龙哈哈一笑，说：

“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说：

“好，好！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毛泽东又为贺龙补上了一场喜酒。这顿饭虽说只是一顿便饭，但在毛泽东家里却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毛泽东除了在家招待亲戚朋友和外宾以外，一般是不招待党内的同事和部下的。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不久，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满脸带笑地指着江青向从前线赶来的领导人们说：

“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

张闻天也在人前背后都说：“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个好内助。”

刘英早就与毛泽东、贺子珍很熟悉了，又曾与贺子珍一起在苏联治病一年多，对于贺子珍与毛泽东婚姻终结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如今毛泽东选择江青结为夫妻，她既“很爱怜”贺子珍，可又觉得贺子珍的责任多一些。她说：

“贺子珍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

刘英见到毛泽东时说：

“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

毛泽东把大腿一拍，说：

“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虽然仍是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但从此以后，她就以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为主要工作了。她将那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剪成了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的短发，愈发衬托得大而明亮的眼睛平和而沉稳。她很谨慎，深知自己的革命资历比较浅，做起事来小心翼翼，在领袖夫人中间，见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

江青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她十分珍惜和毛泽东的共同生活。她给毛泽东编织了新毛衣，她还学会了从井里打水，学会了给毛泽东做充满辣味的湘菜。他们的饮食主要是由周少林负责，偶尔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无非是炒个猪肝，给毛泽东弄一碗红烧肉，再给江青炒个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员都觉得江青虽然是从上海来的演员，还是比较随和的。

江青有时候看到毛泽东工作累了，就给他点上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史沫特莱送的留声机放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时，还用脚踏着砖地，扣着节拍，嘴里也哼哼几句。有时江青也给毛泽东唱上一段京戏，毛泽东微笑着，欣赏着。

江青对贺子珍所生的女儿娇娇也很好，常常把娇娇引出来见客，大大方方地学着握手，跑来跑去逗人发笑。窑洞里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温馨，毛泽东心情愉悦。

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了客人，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递一支烟，要么倒一杯水，旋即离去。来了外国记者，出于礼节，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像个大姑娘。一位外国记者记述他对江青的印象说：“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江青还学会了射击、打篮球，她也希望毛泽东多锻炼身体。有时看到毛泽东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两手搭在毛泽东的椅背上，说：

“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身体有好处。”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

毛泽东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江青很高兴地和毛泽东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泽东引到操场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泽东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他说：

“各人的爱好不同，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哩。我如果和朱总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谁是‘毛’了嘛。我看，咱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泽东便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一项任务，他说：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毛泽东的新家是在杨家岭的沟口上，旁边还住着一家姓杨的农民。杨家的窑洞和一般陕北贫苦人家一样，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没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都变成了黑色。门口有一盘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才30几岁，不仅手很脏，脸也不常洗，连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杨家人一看见毛泽东，就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毛泽东便停下来亲切地问长问短，有时还到他们窑洞前站站。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瞧不起，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11月24日，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及其姨侄张则孙来到延安参观考察。

李公朴，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谱名永祥，字晋祥，少时自名公朴。1928年，他考取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半工半读。归国后，他与高士其在南京筹办《徐球通讯社》，与邹韬奋、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1934年，李公朴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一部中译本《资本论》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5年12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1936年11月23日“七君子”事件发生后，35岁的李公朴在庭审中据理力争。被羁押8个多月的“七君子”被无罪释放。李公朴出狱后到山西调查考察，拜访周恩来等人，并与大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青年座谈。他经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对抗日形势作了全面考察。1937年10月10日回沪后，发表《为全民动员告国人书》等一系列文章，提出“没有全民的动员，就没有全民的战争”。

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延安防空司令部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抗日有生力量，认真地进行了防空部署。林伯渠受命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敌机轰炸延安，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文中写道：

万急重庆

行政院孔院长钧鉴：

延安于本月号（即20日）马（即21日）两日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159枚，死伤军民152人，毁房屋380间。边区人民在此残暴轰炸之下，益加激愤，誓死灭此仇敌。属府本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之抗战方针，紧张一切工作，领导全边区人民为动员民众，驱逐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到底。现对伤亡军民已给予抚恤救济，市面恢复常态，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刻正加强防空设备，以防敌机再次轰炸，惟边区向属疾苦，属府力有未逮，敢祈俯府予赞助，俾有所遵循。

　　 职 林祖涵 有（即25日）叩

11月27日，李公朴拜见了毛泽东，因这天人多，没能很好谈。

11月28日晚，毛泽东来到交际处招待所看望李公朴夫妇，李公朴夫妇急忙到窑洞外迎接，同毛泽东热烈握手，笑语寒暄。走进窑洞，大家围火盆而坐。在座的还有生活书店的职员谷军，他是来投考鲁迅艺术学院的。毛泽东再次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访问参观，并向李公朴了解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出版发行方面的工作问题。李公朴一一作了回答，同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从重庆来延安途中所见、令人忧心的反共摩擦事件，并就他所感兴趣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各校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教材、校风以及华北游击区的军事、政权、教育等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战争形势，对大后方的出版发行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

“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总难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华南3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地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泽东关于抗战困难时期新闻出版的意见，使李公朴等人顿开茅塞。李公朴当即表示，读书出版社虽然规模较小，但发展趋势必定走这条道路。他叮嘱在座的谷军，将毛泽东的指示函告重庆书店领导人邹韬奋、徐伯昕。毛泽东又恳切地说：

“延安是一个抗日的实验区，一切都在试验中进行工作，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莫明其妙的坏处。”

希望他们在这里多住 一住，走一走，看一看。 夜渐渐深了，毛泽东该回去休息了。李公朴拿出一本画册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高兴地在张曼筠画的《长城》画幅上题了那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旧作《清平乐六盘山》。

毛泽东走后，李公朴和张曼筠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回忆着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精辟分析和发展趋向的科学论述，谈到毛泽东亲临窑洞会见客人的谦逊精神，以及他穿的一身灰棉军衣。后来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写道：“28日晚上，出人意料地，毛主席到我们的住处——交际科来了。一下子，灯光突然明亮起来，一股热流通过了我们全身。我们的心抑制不住地怦怦跳动着，急忙上前去迎接毛主席，但毛主席已经走进了窑洞。高高的个子，一身灰棉军衣，慈祥地和蔼地笑着。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曾多次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往着毛主席，渴望着见到毛主席啊！现在，毛主席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紧紧地握着毛主席温暖的手，久久不放。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毛主席，望着他魁伟的身影，慢慢地慢慢地远去。回到窑洞里，我们的心情还一直在激动着。公朴满怀激情地说，‘他这么忙，想不到竟亲自来了’。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这一次李公朴在延安整整参观考察了一个月，虽然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但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宜人，甚至觉得这里的空气也格外新鲜自由。他不顾严寒，拿着一根手杖，每天奔波于沟谷纵横、梁峁交错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热心的到处参观访问，考察学习。他参观了延安的民众组织，包括男女自卫军、儿童团、农救会、商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协会等组织。男自卫军战时的主要任务是后方运输和交通联络，平时则负责放哨，检查来往行人的路条。他亲身经历了从延安到安塞途中，被农民自卫军盘查路条；看到了农民自卫军自带粮食，自带工具，为扩大修筑飞机场，心甘情愿地出“公役”。关于女自卫军，他曾说，“你不要小觑她是个‘辣椒足’，乡村中的‘土豹子’”，她们出操、查路条、开小组会、讨论国家大事、主持大会做主席，样样都能干。他也目睹了儿童团帮助抗日家属挑水、拾粪、拔草、耕田；观看了由老百姓组成的民众剧团自编自演的活报剧《防空活动》，揭露日军残酷地轰炸延安的情形。他深切地感受到，由于边区政府在不妨碍抗战的原则下，允许民众言论、结社、集会、出版有充分的自由，从而使这些组织在“工作上表现得非常的活跃，并且都能合乎实际的需要，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架子”。他调查了边区的地方政治，了解到边区的村长、乡长、县长都是民众根据民主原则，采取真正的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边区的民众对于选举，也都经过认真考虑，被人拖着鼻子跑的被动现象很少。县长的文化程度，一般来说虽然不高，但都能看文件，写报告，具有执行法令的普通知识，而且对工作负责热诚，和群众打成一片，与民众密切联系，了解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能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李公朴认为，这样的县长是抗战过程中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县长才配称一个“新民之官”。

边区的建设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诸如农业、手工业、合作社以及牛、马、骡、驴的养殖场，土布、毛衣、毛巾、皮革、袜、纸及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厂，他都一一作了调查。边区政府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合作事业，发动军队帮助春耕、秋收、开荒，取得了很大成绩。近两年内开垦荒田50多万亩，种植树木90多万株，成立合作社150多个，另外还有鞋子、纺织、烧瓷等合作社。他的印象是：“边区政府对于生产建设的事，无时无刻不在积极推进中。”

他考察了边区的司法管理，参加了法庭的审判，到监狱里和犯人谈话，了解了边区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他的看法是：“没有森严，没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对待人的样子。”“边区的法律，罪犯的生活，都能合乎教育原则，都能站在教育的基础上来进行。”

延安的文化教育是他考察的重点，无论是“鲁艺”、“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还是边区中小学、民众识字班、冬学、夜校、随营学校，他都成了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不辞竟去”。不仅研究了他们的教学课程，而且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讨论会、生活检讨会。边区教育分普通和特殊两种。边区中、小学属普通教育，学生大部分是阵亡将士的后代或前后方军政工作人员的子弟。他们学习的课程主要以适合战时需要为原则，如国文、算术、自然、化学等都与抗战有关。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则属特殊教育，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吸收各阶层努力救亡的青年的学校。如“抗大”分军事队和政治队。军事队的课程比较注重军事，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到军队中做军事工作；政治队则军事课程比较少一些，毕业的学生到军队中做政治工作或到敌占区做民运工作。党校和马列学院，是为训练党员与干部而设立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研究、世界政治、中日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他对边区教育的结论是，边区在发扬战时教育，增强国防力量，造就大批抗战干部，支持长期抗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一个月的详细考察，李公朴认为边区的司法、行政、教育、民运等方面的实施方法，可供全国学习的地方很多。他说：“为着增强抗战力量，为着奠定新中国的基础，我们应当注意这一个实验区的工作，我们应当设法取其优点，推扩到其他地方去。”当然，李公朴在参观考察中，根据自己的见解，也发现了延安存在的缺点。例如，由于缺乏专门人材，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技术上尚表现得不够。又如，集体工作做得很好，个别工作就稍差，有时临时工作还妨碍了经常的工作等。唯其信之笃而爱之深，才直言批评。后来，李公朴在宜川把他的意见进行整理，坦诚相告中共。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考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十分深入细致，因而意见也提得尖锐中肯，又是积极的、善意的。

在延安期间，李公朴还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如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张光年（笔名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等人。同时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像抗大教务长罗瑞卿和11月3日才到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等。李公朴和冼星海同住“鲁艺”窑洞，还是邻居，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草拟了一首教育歌，由塞克写词，请冼星海作曲。和罗瑞卿结识，还有一段风趣的插曲。那是在抗大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李公朴夫妇和塞克3人是嘉宾。欢迎大会开始了，主持人罗瑞卿大声宣布：今天，我们延安各界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李公朴先生和塞克夫妇。罗瑞卿乱点鸳鸯谱，惹得全场人捧腹大笑。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一个月的延安之行，给李公朴留下了深刻的良好的印象。他就延安的所见所闻，写下了《革命的摇篮——延安》一文。他写道：“延安是一个实验区，是一个革命的实验区。有人说它是革命的圣地，的确，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女，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是象征着一种人类的希望，人民的愿望，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但作为我来说，与其说它是革命圣地，还不如说它是革命的摇篮。因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当李公朴离开延安之时，其夫人张曼筠则留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了一年。

再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他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看，还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看一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八路军派人讲授游击战术。

11月30日，毛泽东邀请来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湘赣特委书记谭余保到家里做客，作陪的是他的老战友张启龙和王首道。

谭余保，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舲舫乡洮水村，1926年投身革命，被选为洮水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8月当选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1933年4月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8月，红6军团西征后，他奉命留在湘赣边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7月被推选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坚持湘赣边3年游击战争。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奉命赴湘赣边江西莲花棋盘山作改编工作，谭余保误将陈毅当作国民党的说客，大骂他是叛徒，并将他捆绑起来，用烟管敲他。陈毅气愤至极，也骂谭余保是土匪。后经陈毅苦口婆心地宣讲政策，谭余保才半信半疑，派人至吉安新四军通讯处了解了真相，一面给陈毅松绑，一面说：“陈毅同志，我把你吊了几天几夜，你也把我吊几天几夜，算我赎罪吧！”陈毅说：“你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没有错嘛。”此后，二人把这支330余人的队伍带出大山，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2团2营，开赴抗日前线。此事传到延安，毛泽东称赞谭余保是“政治很强，粗中有细”。

且说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30年代初期党内的斗争，他说：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忘记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就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张启龙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上井冈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乡。1931年湘赣省委成立，王首道任书记，张启龙任省委常委兼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事部部长。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1933年，他遭到王明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了湘赣苏维埃副主席职务，罚做劳役，被迫与妻子李贞（本传前面说到的开国女将军）离婚。1934年8月起，他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随红6军团西征，后参加创建和保卫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10月起任红2方面军6军团供给部部长。1936年红2方面军党委恢复了他的党籍，到陕北后任红6军团党委常委兼军团统战部部长，1937年底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938年调马列学院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

张启龙见毛泽东这样说，激动地说：

“主席，我们在湘赣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倾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倾错误，我们是‘左’了。”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说：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

张启龙又汇报说，1933年以后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到湘赣苏区，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被错杀了。1933年4月，曾两次到井冈山巡视的袁德生亦蒙冤被捕，遭到长时间审讯折磨。1934年4月，他被害于泰和县赣江中，年仅40岁。

毛泽东沉痛地说：

“袁德生是个好同志，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8年12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加紧防空与锄奸》的社论，号召全体军民加紧防空，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慌情绪，做好锄奸等各项工作，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开展一场反击日机残酷轰炸、屠杀无辜平民的斗争。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写了一封信，要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面交邓宝珊。他在信中写道：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

12月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会见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组织合作关系采取跨党的办法的提议，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

“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二、如果此点可谈，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三、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答复说：

“第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第二，跨党的办法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第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

蒋介石说：

“如果你们考虑合并的事不可能，我也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12月8日，毛泽东把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找去谈话，他说：

“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我们现在钱虽然少，但是还有，饭不好，但是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3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是饿死呢，是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开荒种地，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来一个动员，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毛泽东的话既严肃又风趣，一下子解决了大家想解决又找不到办法的问题。3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大家都会赞同第3种办法。”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说：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

毛泽东笑着又对萧劲光说：

“至于军队的任务嘛，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此时，周恩来尚未到达重庆，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参加了约见。蒋介石再次提出关于两党合并的问题，他说：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是不变的。”

他还对吴玉章说：

“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说：

“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我‘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现在世界上固然有只要一个党的强国，如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纳粹，但也有各党并存的强国，如英、美、法等国。”

蒋介石蛮横地说：

“他党可以并存，就是共产党不能并存，如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也不会瞑目。”

他还威胁说：

“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那么，国共之间的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2日这一天，日军飞机7架次第3次空袭延安，军民们听到警报声立即隐蔽。城防高射机枪齐发，日机投弹40余枚，仓皇逃跑，毁民房100多间，无人员伤亡。

12月13日晚，毛泽东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讲话说：

“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毛泽东还说：

“各机关要振奋精神，积极参加生产运动。”“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作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12月14日，日军飞机第4次空袭延安，来袭飞机共7架次，投弹45枚。延安军民损失甚微。

12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社论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困难，估计将来某些地区被敌占领，边区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时，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质困难。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困难，迎接困难，准备办法战胜困难。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社论号召在边区内广泛开展生产运动。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都要“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

1938年冬，经毛泽东批准，林彪由夫人张梅陪同前去苏联养伤。

笔者借此机会分别介绍一下林彪和罗瑞卿各自的婚姻和爱情。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自1925年以来，一直写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而无妻子之实的汪静宜改嫁。到了陕北之后，他才把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射向了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的陕北米脂姑娘张梅。张梅原名叫刘新民，1919年出生，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皮肤细嫩，人称“陕北一枝花”。1937年夏，林彪与张梅结为夫妻，一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林小琳。到苏联后，林彪一待就是3年。在这期间，周恩来在1939年由邓颖超和革命烈士遗孤孙维世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后来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这时候，林彪和张梅两人因性格冲突，感情不和，越闹越僵了。林彪经过接触，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孙维世。1942年2月他只身回国，动身前告诉孙维世说，他已经和张梅离了婚，并信誓旦旦地说，要在国内等孙维世学成归国后就和她结婚。可后来林彪回国不久就遇上了叶群，第二年他们就结了婚。林彪让去苏联治病的罗荣桓捎给仍在苏联的张梅一封信，说他已经重组了家庭。后来张梅回国后，在1954年另嫁了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的徐介藩。

罗瑞卿则是在林彪和张梅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林彪赴苏疗养的1938年冬天，初识他的第一任妻子拱平。那时候，抗日军政大学组织了一场特殊的报告会，给学员们作报告的是32岁的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听报告的是抗大入党8个月以上的年轻党员。坐在前排的一位秀丽端庄的女学员，名叫拱平，她是抗大5大队女生队学员。

拱平，1919年生于江苏南京，12岁时考入南京有名的汇文女子中学，17岁考入金陵大学，是金陵大学有名的校花。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千方百计地追求拱平，拱平的父亲也答应了这个师长的请求，却遭到了拱平的拒绝。不久，拱平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抗战爆发后，她从上海到了江西，又从江西到了重庆，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中，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由此奔赴延安。

拱平对台上威风凛凛英姿勃勃的首长一举一动都看得非常仔细。此时的罗瑞卿是一表人才，英俊魁梧，干练洒脱。他的报告既显智慧又见学识，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博得了台下学员们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正值芳龄的拱平于朦胧之中已有几许青春少女对优秀男子的爱慕崇拜之情。散会之后，她没有马上离开，静静地站在大门外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不大一会儿，罗瑞卿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出来，见拱平一个人站在那儿，便关切地问：

“同志，你等谁呀？”

“我……”

拱平见首长站在自己跟前，有些慌乱，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罗瑞卿见状，又亲切地问道：

“你住哪里呢？”

此时，拱平的情绪已经渐渐平静了下来，她回答说：

“抗大文工团。”

罗瑞卿微笑着说：

“喔，我们是一个方向啊，一道走吧。”

自此，罗瑞卿与拱平由相识到彼此爱慕，逐渐加深了感情，组成革命家庭便水到渠成了。于是，罗瑞卿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和拱平结为伉俪。半年后，罗瑞卿奉命率部奔赴抗日前线，拱平因患妇科病不能随军行动。不久，组织上让拱平到重庆去治病，拱平竟在中途遗失了组织介绍信。由于没有任何组织和熟人能证明她的确切身份，拱平在重庆苦苦支撑了两个月后，又被人劝到了成都。在成都，仍然没有人相信她。就这样她糊里糊涂地脱离了党组织，开始了一个人的孤身奋斗。后来，当拱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底打听到罗瑞卿的消息时，罗瑞卿已经在1941年4月3日与郝治平举行了婚礼，小孩也有几岁了。后来，拱平在1949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享受副司局级离休干部待遇。

郝治平，河北临漳人，1922年出生于河南安阳，1938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4月与罗瑞卿在辽县桐峪镇结婚，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75年4月，罗瑞卿在《忆往事书赠治平》一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且说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士，赴宴者约有100余人。

席间，毛泽东鼓励文艺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创造和演出更多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1月2日晚，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全文如下：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在朱彭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揭穿了中国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此外，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现正准备配合西北友军，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认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轻视八路军，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也得到充分的反证。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中外新闻记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记载，早已连篇累牍。一切无成见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认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4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军以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地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军一道工作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3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它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 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日

不久，《八路军军政杂志》在1月15日正式创刊，由萧向荣任主编，在毛泽东、郭化若、王稼祥、萧劲光、萧向荣5人组成的编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1月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原来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和夫人陈璧君以讲演为名，由重庆偷偷飞抵云南昆明。第二天，二人携着“汪派”的干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一行人飞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了“艳电”（29号这一天在电报韵目代码中是“艳”，故称“艳电”），标题是《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提出了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主张。汪精卫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国民党中央迅速做出反应，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12月31日，“艳电”在香港见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甲、蒋介石驳斥近卫宣言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表示了中国主战派与中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摇分子已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这特征已经表现在西南西北的高级军官会议上，也将继续表现在即将召集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虽是党务与政务上的进步，一般还落后于军事上的进步。

乙、这种进步将必然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但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最近国民党各报上向本党提出的交出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及放弃共产主义等，以及在华北西北各地的许多摩擦，就是这种限共防共政策的具体表现。

丙、我们的任务：（子）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对近卫的驳斥，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寅）在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来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

丁、到处提出下列口号：（子）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丑）打倒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寅）打倒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汪精卫。（卯）打倒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反对陕甘宁边区的汉奸汪精卫（这条应依照各地情况来写，不一定全部写）。（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国反蒋反共的统一战线。

中央书记处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1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吴克坚、叶剑英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具体工作是由董必武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宣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

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议员有146名，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么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地干。”

接下来，会议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选举张邦英为副议长。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关于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阐述了目前的抗战形势和边区所处的环境，说明边区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总结了边区政府成立两年来在保卫边区和全国的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提出了边区政府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任务。他还强调说：

“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1月17日晚，毛泽东给何干之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何干之在陕北公学教书期间，曾酝酿编写一部《中国民族史》，他把这一设想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由于战争环境的困难条件所限，何干之后来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写作计划。

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第一届参议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说：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3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此后，在参议会讨论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也分别作了工作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各部门负责人的部门工作报告。

1月2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早在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李六如、和培元两人合写《陕甘宁边区实录》，此时初稿已经完成，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为工作太忙，就在信中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他在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不应轻率出版，必须把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得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

毛泽东

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

此前，蒋介石在1月20日曾约周恩来面谈，重提国共两党统一之事。他说：“汪精卫离去，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即使暂时不统一也要有新办法。”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他说：

“我们对中共不再像15、16年（指民国年，即1926、1927年——笔者注）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迹象，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便在《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中写道：

一、国民党目前的进步同时包含着防共限共工作的强化，这种进步中的恶劣现象，一时尚不会降低。最近蒋令敌后抗战部队不得擅自移驻，不得兼行政，坚持取消冀南甚至冀中行政公署，石高（国民党军石友三、高树勋部——笔者注）之开入冀南，东北军一部开入山东，某部之移驻长治消息，战地政治委员会之设立，国民党中央发出防共密令等等，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

二、因此，各方顽固分子特别是暗藏的日寇奸细，便乘机加紧对八路军的摩擦、排挤与破坏，某些过去比较同情分子亦与我为防区及政权等问题发生摩擦。

三、我们对摩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应以冷静而严正之态度对之。八路军是应当发展的，因其发展对抗战有利，而目前发展方面主要的是华中、华北，而不是东3省与察、热，因该地日寇统治较巩固，如无重大变化，八路军去必受严重损失。

四、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结束以前，八路军暂不作大的移动，以观统战形势之发展。雪枫支队可暂缓去皖北，685团暂缓过陇海路，陈旅（115师343旅，旅长陈光——笔者注）亦暂缓去山东，候五中全会后，再作行动的布置。在此短时间内，着重部队质量上的整理，以备将来之发展。

五、限制八路军重要方法之一部，为不准干政与筹款筹粮，我应公开表示，抗战部队与游击队不能不吃饭，如能加饷，可考虑改变筹粮办法。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

六、向各方广泛解释和证明日寇汪逆阴谋以反共行动来转移国人反日反汪视线。目前反共自觉的不自觉的均会为日寇汪逆所利用。

七、对各友军之工作具体方针，中央正讨论中，候后电告。

中央书记处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致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暨五中全会诸先生电》：

重庆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暨五中全会诸先生大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致民族革命之敬礼。盖自一年半以来，由于坚持抗战国策与全国英勇奋斗，已使日寇之进攻大受打击，国际之同情日益增长，中国之胜利奠定始基，牺牲虽大，效果已彰，循此奋进，定能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武汉放弃、广州不守之后，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日寇乃于军事进攻外，加重其分化中国内部之阴谋。吾人对策，唯有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实行新的战时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党务、民运、文化政策，以便增加力量，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救国之道，端在于此。伏读蒋委员长10月30日告国民书，12月26日驳斥近卫演说，名言至论，举国同钦，乃汪逆精卫自绝国人，逃奔就敌，高张亲日反共之旗，实行背党叛国之计，贵党中央开除其党籍，撤消其职务，词严义正，千古不磨。适于此时贵党五中全会开会于重庆，同人深信，必能总结过去之经验，昭示今后之方针，严整抗战阵容，密切军民联系，刷新政治，发皇民运，以慰全国国民如饥如渴之望，以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基。同人深信，抗战高于一切，团结必能胜敌，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乃与团结全国，团结抗日各党派，实现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丝毫不可分离。抗战虽为一艰难过程，团结则为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之利器。同心断金之义，同舟风雨之思，知诸先生必有同情也。

肃电致贺，敬颂勋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叩 敬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为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转蒋介石电：

恩来同志转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惠鉴：

顷得恩来同志来电，谓先生在贵党五中全会前，切望敝党提出今后国共两党合作之意见，不胜欣慰。兹特向先生坦白披沥陈之：

一、卢沟桥事变以来，举国在先生领导之下，进行对日的民族革命抗战，显示出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伟大民族团结，为世界上任何暴力不能征服之力量。胜利之基始奠，前途之希望无穷。此皆先生领导之功勋与前线将士、全国党派、全体同胞积极努力之业绩，千载而下，与有荣施。然而抗战过程，实一艰难斗争过程。日寇汉奸深知我民族团结之基础和骨干，实为国共两党之合作；因此，敌人计划遂特别努力于破坏国共两党，及两党之合作事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之际，日寇对策，厥为于军事进攻之外，加紧进行“以华制华”之毒计；其中尤特别着眼于强调反共口号，不特借以欺蔽世界之舆论，尤其企图借此以破坏国共两党之合作，并破坏与分化国民党，汪精卫在强调反共口号之下，实行逃走而叛党卖国之活动，实为日寇此种阴谋之具体表露。先生在驳斥近卫声明之讲演中，曾公开指明反共即灭华，实为一针见血之论，名言至理，中外同钦。盖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国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反共实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反共实即反对国民党抗战建国之友军，反共实即反对并分裂国民党。凡此，皆当前历史之具体真理，谅先生必有同感也。

二、抗战以来基本事实，表现两党合作日趋进步，两党同志日趋团结，中外人士皆认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此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抑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因此，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因此，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及毛泽东同志代表敝党致先生信，均诚挚具体地提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主张和方法，用意所在，无非欲与先生及国民党同志，相见以诚，相守以信，积极地拥护先生及政府之领导，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团结全国，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此物此志，凡在国人，已昭然共见。

三、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地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此不论根据抗战建国之根本利益，根据两党长期合作之要求，根据中国社会历史之事实，根据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以及根据孙中山先生之遗训，都非如此不可。

四、两党合作过程中常有现象，最近尤甚。许多地方不仅原有的共产党员政治犯未曾释放，而且常有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之事。陕甘宁边区问题，虽经先生一再承认，但政府机关延不解决，少数不明大义分子，遂借以作无谓之摩擦。查禁敝党书报，侮蔑敝党言论之事，尤层出不穷。甚至八路军伤病员在三原附近者，亦被地方当局武装包围威胁，几至酿成流血惨剧。其他歧视共产党员与八路军员兵之事，不一而足。特别在冀鲁等地敌后游击区域中，各种排挤、污蔑八路军与共产党之行为，几乎每日皆有。此等情形、殊为严重。至于摩擦增加之原因，一部分固由于日寇汉奸挑拨离间之阴谋，得逞其计，另一部分不能不归咎于少数不明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存亡者之固执成见，一意孤行。此种不幸事件积累之结果，定将不利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之事业；日寇汉奸正注视此等事件之增加，而发出得意之狞笑。因此，必须停止此种现象，断不应任其发展，致陷民族国家于不利。

五、但敝党中央深信：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之合作，为全国爱国同胞和世界先进人士所切望，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需。敝党六中全会已将保证两党长期合作办法，及敝党所能让步之点及其一定限度，恳切提供先生及国民党全党同志之前；深信贵党五中全会在先生贤明远见的领导及各中委公忠谋国的精神之下，定能对敝党中央建议加以慎重考虑，而得到有利两党长期合作之恰当的结论，以慰全国人民殷殷之望，以固抗战建国胜利之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专此，敬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月25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举办边区首届农产品竞赛展览会。

毛泽东参加了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说：

“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要衣穿，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已有了一些成绩，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们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1939年开始的时候，就开这次大会，全边区的各机关学校部队和200万老百姓大家联合起来，全体动员，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

这次展览会历时半个月，展览分为边区概况、农作物、果类、畜牧、药材、狩猎与林业6个展室，展品2000多件，展示了边区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情况。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第一天观众在8000人以上，以后平均每天在5000人左右。

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生产运动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生产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2月1、2、3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

1月28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中说：

“读书可以使人增长学问，有了学问，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关于国民党早期抗战情况，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可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以后，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就又旧病复发，开始在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了。本章所讲的蒋介石12月6日约见周恩来时的谈话，12日与中共参政员的谈话及其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便是明显的端倪。尔后不久，他便由“溶共”逐渐走向“防共、限共、反共”的道路。诸君如若不信，请继续往下看。

**第35章**

**“大生产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

**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

**来它个反封锁嘛！”**

话说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读完了陈伯达所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写了一封长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完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供你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他在另纸上写的意见是：

1、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2、事物的实质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3、“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4、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10月11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5、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做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不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法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6、“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的问题。

2月2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群众团体生产动员大会，布置留守兵团和党政机关的生产任务。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明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并号召全体军民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动员，他说：

“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工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

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举行闭幕式。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溶共方针，他说：

“‘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毛泽东还发出了“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他说：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等，确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本法规。

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12件重要提案。其中有：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案，统一战线动员案，发展国防经济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案，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案，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案等；发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告边区同胞书》。

会议最后进行边区政府委员会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的选举。

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当选为副主席，林伯渠、雷经天、周兴、王世泰、高自立、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为边区政府委员。

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子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

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高自立兼民政厅厅长；曹力如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审计处处长；周扬任教育厅厅长；刘景范任建设厅厅长，朱开铨为副厅长；张慕尧任财政厅代理厅长，艾楚南为副厅长；高岗兼保安司令，王世泰、周兴为副司令；周兴兼任保安处处长。

边区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河北摩擦的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钟麟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为真正统一指挥和统一行政见，应坚决要求撤掉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石友三副职，决不能任鹿钟麟胡干，危害抗战。敌后抗战形势，证明设立边区是正确的，维持原有各省界是错误的。因此，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的，应在山东及其他地区，依照战略形势划分新的行政区域。”

陕北的冬天，对于来自南方的干部战士来说，真是太冷了。在生产运动中，部队后勤部门做了一批毡帽，因为料子质地不好，又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做工很差，做好一看，帽壳平塌塌的，帽檐也软软地挺不起来，老往下耷拉着，那样子很难看。大家看着这样的帽子，宁可冻着谁也不愿意戴。警卫员王来音拿着一顶帽子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的，就是样子太不好看，带到头上，别人一看就笑。所以，谁都不愿意戴它。”

说着，顺手把帽子扔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拿起帽子翻过来掉过去看了看，说：

“这帽子不错嘛，没人戴我戴。”

说罢就把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他还特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看，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无论是开会，还是作报告，只要是外出，都戴上这顶毡帽。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也都先后戴上了毡帽。不久，边区的人们就编出了一段顺口溜，说是：“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像个龟孙子。”

一天，警卫班的战士们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外山坡上开会，毛泽东从窑洞里走了出来，问道：

“你们开什么会呀？”

“生产动员会。”

警卫员们回答。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这很好嘛。”

大家立刻鼓掌，请他讲话。毛泽东笑着说：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他望了望两旁的山坡，接着说：

“这杨家岭山上土地很多，我们可以种瓜、种菜，还可以养些猪，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如果再能搞好一个合作社，帮助大家解决日常生活用品，那就更好了。”

警卫员们热烈鼓掌。毛泽东临走时还笑着说：

“你们订生产计划，可不要忘了我啊！我不能走远了，不能和你们一起上山开荒，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荒地，只开一亩，不多也不少。”

大家一听他要参加生产劳动，都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劝阻起来。一个战士说：

“主席工作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我们每个人多干一点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不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我现在还能动，决不要人代耕。”

此后，警卫班战士们按照制定出来的生产计划，轮流上山，分片开荒。他们考虑到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党抗战的重任，日理万机，仍然坚持不让他参加生产劳动。可在毛泽东一再坚持下，警卫员们只好在附近的小河边上为他选了一块荒地。毛泽东办公累了，就扛起镢头去挖地，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员也拿起镢头抢着帮他挖，毛泽东一看顿时急了，大声对他们说：

“你们这么抢，不是没有我的了吗？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还挖什么？咱们各干各的，好不好？”

战士们不管他怎么急怎么嚷，只管低着头挖地，还偷偷地笑。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和他们一起干。他使劲挥动镢头，挖得又深又平，热了就脱掉外衣继续挖。战士们见他脸上全是土，衬衣也湿了，就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

“不要紧，劳动就是要流点汗水嘛。”

菜地终于开垦出来了，足足有一亩多。毛泽东问警卫员们：

“你们谁会种菜？”

警卫排长指着班长说：

“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菜是种过，可种得不好。”

毛泽东说：

“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嘛！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呀！”

不久，毛泽东便在这块土地上亲手种上了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有他最喜欢吃的辣椒，一有空儿便地里锄草、浇水。施肥的事儿一个人干不了，他就叫王来音跟他一起去掏大粪，二人抬到菜地去。王来音个子小，毛泽东就把粪桶向他那一头拉，王来音可不依了，毛泽东说：

“小鬼，别争了，我是要多吃辣子的呀！”

在他的辛勤培育下，地里的蔬菜长得特别好，西红柿又大又多，辣椒长得又长又红。后来每当家里来了贵宾和亲朋好友，他就用自己种的辣椒来招待客人。

2月17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2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干部教育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讲话，强调了干部学习的重要性。他还号召大家说：

“要在工作或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此后，中央干部教育部在3月份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这个计划把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3类，编班编组，按照他们文化素质的高低分类教学，做到因材施教。

2月20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并转陈伯达。

原来，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很重视，就请张闻天将他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转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给张闻天转陈伯达的信中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的几个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地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

　　 毛泽东 2月20日夜

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7点意见，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审阅。

2月22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他在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1. 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即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笔者注）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地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敬礼!

　　 毛泽东 2月22日夜

2月23日，新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央委派，借回乡省亲之名，和叶挺一起从重庆绕道桂林，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此行的任务一是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二是力促新四军的内部团结。

原来在六中全会期间，叶挺因和项英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致电中央和项英，去了香港，因此项英未等会议结束即返回皖南，未听到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等重要精神均不了解。六中全会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做叶挺回新四军的工作。叶挺于1939年2月初到了重庆，同周恩来、叶剑英长谈后，于2月16日陪同周恩来飞抵桂林。

2月23日这一天，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军部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在码头附近列队迎接周恩来和叶挺。

第二天，新四军军部为周恩来举行欢迎晚会，项英在会上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和叶挺并致欢迎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新四军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听取了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意见，向他们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与从前线归来的陈毅、粟裕、傅秋涛等深入交谈，召开了军部各部门人员参加的座谈会。

此时，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处于一面临敌、三面被围的极为不利的境地。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铜陵大通镇这一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地带，遇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帮助新四军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根据新四军所处的区位、周边敌情，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商谈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最后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活动方针。

2月28日，周恩来在云岭召开的新四军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

此后，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并多次与项英恳谈，中肯地指出，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中央考虑，目前叶挺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些。我们要像信任党内同志一样信任叶挺同志，军事上要放手让叶挺指挥，你着重于总的领导和东南局的工作。

据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此后叶挺、项英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状态。

3月6日，周恩来应邀给军部和驻皖南地区干部及教导总队学员作报告。

上午9时，周恩来身着绿色哔叽军装，下着马裤，足蹬马靴，系武装带，挂中将军衔，在叶挺军长陪同下，来到云岭村陈家祠堂军部大会堂。

与会者每人一个背包或蒲团，席地而坐。见到戎装入场的周恩来，会场先是一阵激动的低语，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健步走上由四张八仙桌拼成的讲台，频频挥手向与会者致意，然后以洪亮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作报告。叶挺、项英等人及美国记者艾·史沫特莱，围坐在讲台附近的几张八仙桌旁。

此后不久，周恩来在3月14日离开新四军军部，回了重庆。

2月间的一天下午，冼星海应邀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冼星海，曾用名孔宇，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192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1928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1935年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和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2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2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11月3日，他和妻子钱韵玲到了延安。在毛泽东关照下，有关部门每月发给冼星海15元津贴（此时朱德每月津贴只有5元），同时享受鲁艺的教员津贴12元。这样，冼星海每星期能吃到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

且说毛泽东正在门前小河边的坡地上种菜，见冼星海来了，便放下锄头，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

“欢迎你呀，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冼星海说：

“主席，你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怎么也种起菜来了？”

毛泽东爽朗地说：

“开荒生产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也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

冼星海说：

“你是主席，多考虑一点抗日救亡的大事，岂不是更有意义吗？”

“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毛泽东摆动了一下右手，说：“星海同志，开荒生产是有战略意义的。我们要完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第一个条件是要有饭吃，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衣穿。这粮食、衣服从哪儿来呢？向国民党政府乞求吗？他们希望我们早早饿死冻死！向边区、根据地的人民征派吗？不行！老百姓够苦的了，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动手，生产自救。”

他见冼星海没有说话，便又说：

“星海同志，我是主席，不但要带头开荒生产，而且还要求你们这些艺术家，参加到开荒生产的行列中来，要超过第一个参加农业生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自己的诗中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相信你们鲁艺的师生一定比他强得多。”

冼星海忍不住笑了。毛泽东一边引着他往自己的住处走，一边说：

“我是湖南人，你是广东人，种水稻算得上半个里手。在延安种谷子，可就变成十足的外行了。星海同志，你会打渔、种稻，再学会种谷子，比起孔老夫子来就高明多了。”

冼星海说：

“主席，我懂了，回去以后，我一定带头开荒，争当一名生产模范。”

“好，很好！这就对头了。”毛泽东满意地说：“作曲家种粮食，在欧洲有无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国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当然，你在种粮食的同时，还要积极地生产精神的粮食。换句话说，人民更需要你写的音乐！星海同志，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吧。”

走进窑洞，毛泽东示意冼星海落座，他点上了一支烟，真诚地说：

“星海同志，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盲，至多算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万事都有规律可循。我想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从西洋的音乐史看来，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

“是的，很有关系。”冼星海说：“格林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洲，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我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恩师杜卡斯教授，同样也是因为与同辈大师德彪西、拉威尔一齐倡导、创建了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印象派，而闻名于世的。”

“这就对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星海同志，艺术上的流派，恐怕是要受着时代、民族、地域等条件所制约的。你想过没有？如何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建立起科学的、民族的、为广大的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中国音乐学派？”

冼星海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你的话启发了我，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有意识地为建立中华民族的音乐学派而努力。”

“好，很好。”毛泽东说：“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又给实践以指导。无论怎样说，一种学派的诞生，总是要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实践上的。没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恐怕艺术上也不会完全确立各种不同的民族流派。”

他见冼星海不住点头，就接着说：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最后，只好把领导革命的大权交给我们无产阶级。这在艺术上也应当有所反映吧？”

冼星海觉得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新鲜，可他一时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忽然站了起来，说：

“星海同志，举个例子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大致出现了这样三大派人。”

他举起左手，伸出3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又用右手一个一个掰着左手的指头：

“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林纾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要创建中国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民粹派很快会消亡的，尽管它在一部分知识阶层还会有地盘。但是，像胡适他们那些舶来文化却会很有市场。这些舶来文化是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也是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大敌。我们如何持久地向这些舶来文化作战呢？”

冼星海已经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说道：

“一、要努力创作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二、要花大气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创建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中国音乐学派。”

“完全正确。”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中国要革命，必须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创建中国音乐学派，恐怕也要引进西洋的音乐技术，但一定要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我希望学西洋音乐的人，不要顶礼膜拜洋人，单纯地做西洋音乐的传声筒，翻译员。要立志借鉴西洋音乐的技术，创建中国的音乐学派。”

毛泽东的话使冼星海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而要他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的嘱托，更让他激动不已。后来当他见到塞克时，就将毛泽东的期望和嘱托说了出来，并说要塞克写个“厉害的、新的、带劲的”歌词，尽快“创造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

塞克，原名陈秉钧，1906年出生在河北霸县后卜庄，20年代后期曾用名陈凝秋，30年代中期取“布尔塞维克”之缩写“塞克”为名。1927年他在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演出《南归》一剧广受好评，后来又在上海明星公司担任演员，并在“新地剧社”、“狮吼剧社”担任领导和导演。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和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创作演出了《流民三千万》、《铁流》等抗日剧目。同时，他也是中国救亡歌曲的重要词作者和新音乐运动的旗手之一。著名的救亡歌曲《救国军歌》、《心头恨》、《抗日先锋队》等歌词都出于他手。1935年以后，他参与组织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和救亡演剧第1队，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11月，塞克来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一天早饭后，塞克将自己关在屋里，激情满怀地进入了写作状态。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到掌灯时分，一组以生产与抗战为主题的多场《生产大合唱》歌剧的脚本一气呵成！ 　　冼星海拿到脚本后，喜出望外，便于3月1日动笔，集中时间、精力，投入到封闭式的创作状态之中，用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生产大合唱》的谱曲工作便完成了。

1939年3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保护同情我们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摩擦的分子。”

3月18日，毛泽东接到聂荣臻送来的补充报告和照片后，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38年11月间，聂荣臻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细系统的报告，约10万字，其中包括发动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等内容。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出版成书。为此，他要求聂荣臻再进一步对这份报告进行补充修改，然后再送来。毛泽东在3月18日的复信中写道：

“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成书出版。”

他还在信中鼓励聂荣臻努力工作，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

他将书名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亲笔题写了书名，并为之作序曰：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朱德和王稼祥也为这本书作了序。该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后，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3月19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朱德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

德怀同志并告朱、杨：

电悉，复电如下：

甲、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你们的计划都看过，都对。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5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3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

乙、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当供给华中，并准备一部为西北用，一部为南方用，一部为东北用，对华北则以供给教员与教材为主。

丙、兵工厂人才求助友人一事或者有可能，但要看交涉如何，恐不一定可靠，主要靠在国内找。

丁、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曹菊如现在中央财政经济部负责，不能动。李六如（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笔者注）可以腾出给你处，惟他身体有病，养息一下才能来。同时正在物色他人，结果后告。

戊、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后方已有相当经验，当供给你们作参考。

己、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下），应有管理学习的机关与办法，在比较安定的机关中应实行两小时学习制。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后方的经验亦可供给前方。

庚、回避与鹿钟麟见面很对，对付此种人只有坚持立场，给以坚决的绝不姑息的反攻才能有效力。山东之沈鸿烈亦应此法对付之，目前沈正厉行对我进攻，请注意坚决给以回击。

辛、中央政治局会议定4月底开，讨论许多重要问题。总部及北局已定派朱瑞出席，现距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请你考虑届时能否来延一次。

毛泽东

3月21日，冼星海亲自指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了由塞克作词由他谱曲的《生产大合唱》。

《生产大合唱》是一部有人物、有布景、有简单情节的大型歌舞活报剧，整个作品的音乐主要是建立在民歌及民间歌舞的音调基础上，同时加入了一些对农村情景的造型性的描绘。它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丰富、形象、全面地表现出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间韵味，合唱粗犷质朴，不仅热情讴歌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抗战自觉性和唤醒万众的鼓动性。此后，这个大合唱响遍了全国，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唱段，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广泛演唱。特别是《二月里来》这首歌曲，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边区人民为支援前线抗日而努力生产时的豪迈心情，有力地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种瓜的得瓜呀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

冼星海在后来的《创作札记》中说：这首歌“是在风和日暖的播种场面中，以非常恬静、安适的情绪唱出的。在延安首次演出时，这首江南风味很浓重的曲子就极受观众的欢迎。”

3月29日，项英、叶挺准备在江北设立指挥部，以强化对江北新四军第4支队的领导和指挥。为此，由叶挺出面致电蒋介石说：

“职军江北支队（第4支队）官兵9000余人，职拟4月间前往巡视，暂设指挥部。”

3月30日，项英、叶挺又将此计划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迅速复电说：

“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

3月31日，蒋介石亦复电叶挺说：

“该军长拟巡视江北支队并设指挥部一节，准如所请。”

3月31日这一天，延安《新中华报》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发表题为《破坏团结的分子应当受到处分》的社论，社论中说：

“今天在敌后的中心斗争，应该是我们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切抗日力量都应该从日本侵略者、汉奸手中，夺回自己的土地与政权，而不应该是中国军队之间的斗争。”“破坏团结抗战的分子，应当受到处分。”

1939年春，美国一个3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延安，他们访问了毛泽东。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曾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教师安德鲁·罗伊，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布朗博士，美以美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的新闻记者乔伊·霍默小姐。

霍默小姐在重庆时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国民党铺开红地毯隆重地欢迎这位美国客人。佳肴之丰盛，使她“总是消化不良”。她在与共产党接触之前是亲国民党的，她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与设想也是明确的、反共的。她满以为在延安会看到凶恶的俄国代理人和冷酷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但是，当他们这个3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延安时，竟然大失所望。毛泽东给霍默小姐的印象，与她头脑中的印象一点也不同。她描述说：

这位共产党主席相当幽默，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这位中国的列宁的头脑，却“像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

乔伊·霍默的结论是：毛泽东和中国的红军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有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

欲知后来还有哪些美国人会见过毛泽东，情况怎样？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哲学如天书，特别是古典哲学。像毛泽东与陈伯达讨论的那些问题，便是如此。这门学问，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世间能读懂它的人确实不多。既然是天书，它就能够使人聪明。可惜不少人都为某种利益所驱使，宁可蝇营狗苟，也懒得去理会它！当然，一个农民不懂哲学可以种田，一个工人不懂哲学可以做工。可一个领导人不懂哲学，尤其是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可怎么得了？你如何去领导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支军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放眼中外，可圈可点的人物寥寥无几，其原因也正在于此。那些夸夸其谈者，道貌岸然者，大都是卖狗皮膏药者居多，而懂得一点哲学道理、具有真才实学者少之又少矣！

**第36章**

**“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

**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

**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

**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

话说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并说：

“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3等9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4月10日傍晚，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著名诗人、作家萧三去看望毛泽东。

萧三是由苏联经乌鲁木齐、西安于4月9日到达延安的。本传在前边第2卷已经说过，萧三原是去了法国搞勤工俭学。1923年，他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他和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一起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1924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

这天傍晚，毛泽东从中组部会议室开会出来，一见到萧三，十分激动，握着他的手说：

“啊，十多年不见了！”

说罢从衣兜里掏出“红炮台”香烟，给身边的人各发了一支，看看烟盒里只剩一支了，便抽出来递给了萧三，说：

“最后一支给你。”

“你自己呢？”

萧三说着要把那支烟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幽默地说：

“我将乞诸其邻。”

萧三随着毛泽东来到一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两人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敬了萧三一杯红葡萄酒。饭后，他俩谈到了新民学会，谈到了20年前一起在渤海大沽口冰上走了很远的旧事，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存在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他们还谈了许多学生时代的往事，谈到牺牲了的战友。毛泽东在谈到蔡和森的牺牲时，沉默了良久，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泽东又和萧三谈诗，谈文章。彼此都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无限欣慰。毛泽东对萧三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他非常认真地说：

“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临别时，毛泽东看到萧三的烟瘾很大，就从书架底下拿出一筒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进萧三的外衣口袋里。两人走出窑洞，满天星斗，毛泽东依学生时代的规矩，双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别。

从此，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座上客。不久，萧三被安排在鲁艺任教，还担任鲁艺编译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他自己也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当萧三将他的作品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总是认真阅读，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

萧三只身秘密回到延安，很想念远在瑞典的妻子叶华和未满周岁的孩子立昂。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叶华母子接来延安。叶华到延安后，萧三带着叶华和儿子立昂多次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热情，每次都请他们吃饭。有一次，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叶华中国化了。”

且说4月15日，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他写的是：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4月19日，毛泽东再次为抗大题词，他写道：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群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在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的陪同下到延河边散步，见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便放慢了脚步，弯下腰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攥了一下，又仔细看看。待农民们种到地头，他就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农民们说种的是苞谷。毛泽东又问从哪里选来的种子？他们说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掏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一口，微笑着问：

“你们种多少地？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农民们见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便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回答：

“种地不少，可山地多，平地少。如果雨水充足，打回的粮食除交公粮外，我们吃不完。如果天旱，打回的粮食仅够口粮。”

毛泽东又问：

“有优良品种没有？地里都施什么肥？”

农民们说：

“没有优良品种。地里上猪粪、牛粪、驴粪，掺合在一起施在地里。”

“粪上得很好，没有优良品种不行，你们到边区政府找农业厅长高自立要，他会给你们的。另外种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况两年要换一次。”

一位老农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大兄弟，你讲的话在理，一定是种地的老把式了，我回去后按你说的办。”

蒋泽民忍不住介绍说：

“大爷，这是毛主席。”

“什么？”老农吃惊地倒退了两步，结结巴巴地问：“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

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老农激动地说：

“毛主席呀，您的心和咱庄稼汉的心贴到一块了。”

此前，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也都在自己的垦荒田里播下了种子，大部分还没有出苗，一些刚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着身子。眼看就要到5月份了，天还没有下一场雨。陕北黄土高原最怕旱，如果照这样再旱下去，就意味着秋天将颗粒无收，别说农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就是战士们望着刚开垦出来的地也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傍晚，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垦田地边，望着山上农民们的土地说：

“天这么旱，山上的地就更旱了，快下一场透雨吧。”

这天晚上，天还真的阴了起来，黑云一层压一层，到了后半夜就下起了小雨。正在桌前煤油灯下工作的毛泽东隐隐约约听到了雨声，放下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曲美妙的音乐，欣慰的笑容挂在了脸上。后来雨越下越大，他索性离开桌子来到门口，推开门观看。警卫员以为他有事，忙走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用手指了指天，笑了。

这场雨下了大半夜又大半天，直到次日下午才停。晚饭后，毛泽东走出窑洞，高兴地对蒋泽民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不知山上下透了没有？走，到前面看看去。”

蒋泽民跟着毛泽东走出了沟口，迎面碰上几个农民。毛泽东问他们：

“山坡和山上的地下透了没有？”

农民们高兴地说：

“山上山下全下透了。这雨开始下的小，后来越下越大，全渗到地下了。真是难得的及时雨啊！”

毛泽东放心地笑了，带着蒋泽民兴致勃勃地来到延河边，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突然问：

“泽民，你说这延河水里有鱼吗？”

蒋泽民被问得楞住了，他不愿意破坏毛泽东的好心情，就向走过来的一个老农请教：

“大爷，您说这河里有鱼吗？”

毛泽东也马上凑了过来，和这位老农攀谈了起来。

4月24日，李公朴第二次访问延安，其间，他曾到晋西南考察，迫切感到需要组建一支“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战区“宣扬民族抗战意义，教育民众抗战知识，交换抗战经验，学习抗战工作，推进抗战教育，奠定建国基础”。他便重返延安，希望中共在建团人员上给以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负责。李公朴和胡耀邦多次商量，最终从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抽调了9名干部，组成了“抗战建国教学团”。

他这次在延安期间，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参加了延安纪念“五一”大会和精神总动员宣誓典礼，聆听了毛泽东、王明、王若飞的演讲，并和他们“互道别情，约时再叙”；参观了边区工业展览会、边区青救会与文艺会举办的青年展览会；观看了马列学院在陕公礼堂举办的晚会——3幕剧《歼灭战》；参加了“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会上，除毛泽东、王明、洛甫、康生、刘少奇讲话外，李公朴和新从苏联归来的萧三亦被邀讲话；李公朴为“鲁艺”写赠言：“在去年的今天，中国艺术界发生了一道光芒，这光芒一被发现就惊动了全国，振奋了艺林，它越长越大，天真活泼，坚强有力地反映出千万人的心灵，发动起千万人走上前线。这新生的力量是新阶段中抗战的支柱，是新中国艺术界的曙光。”

他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报告山西敌后情况；赴榆林县桃林参加文学座谈会；到“抗大”访问教育长许光达，畅谈“抗大”的教育特点，为纪念“抗大”成立3周年写赠言：“一座伟大的熔炉，燃烧在黄河之滨，锻炼出成千成万的优秀儿女。学习八路军的求实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抗大是新战士的产生地。”此外，他还分别为“星海纪念册”、延安市卫生人员俱乐部题词。前者题词是：“中国数千年来，虽以礼乐为本，其实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建统治的工具；乐仅成了庙堂之声，与中国的大众生活毫无关系。音乐代表着民族的呼声。抗战前后中国大众音乐的空前发展，这就象征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到来。谨以以上数言赠给我们大众音乐的倡导者冼星海同志。”后者的题词为：“武装起身体，武装起头脑，不分国界，欢聚一堂，为了民族解放。”

后来在6月15日，李公朴告别延安，应第二战区保安司令续范亭的热情邀请，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奔赴抗战前线——晋西北，随后又前往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根据地，历时17个月，开展抗战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工作，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 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做出了贡献。

再说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了《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他说：

“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工、农、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4月24日，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东南局并中原局转8团（指新四军江北部队第4支队第8团——笔者注）”，发出了《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中说：

“一、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固然不应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用主要努力去做。

二、但依皖东目前情况，我们必须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持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目的……”

4月25日，项英、叶挺等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决定由叶挺负责去江北成立一个指挥部，加强对第4支队的指挥。为此，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第1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第3支队第5团团长孙仲德等一批干部和江南新四军主力第4团第1营，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突破日军长江封锁线，向庐江进发。

4月26日，中央书记处公开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全文如下：

目前全国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正如蒋委员长所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振奋抗战到底之精神，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为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这一运动的意义，中央特指出如下各点：

一、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以前，就已向全国同胞号召全民族力量的总动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物质的总动员。在抗战以前，我党进行这种号召，为的是准备抗战。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我党不断地根据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上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民族的潜力，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果能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敝，团结一致，以抵抗外寇，则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我党和那一切简单的“唯武器论”者，很久地进行过无情的斗争。在抗战发动以后，我党发表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的有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最大的努力，去注意各方面力量的动员，其中包括着对于全国人民精神上的动员。两年以来，我党无情地反对各种式样的民族失败主义者。在去冬我党六中全会上，又复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15条，其第一条就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为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中的报告，关于一切宣传鼓动工作，曾经这样指出：“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赞助政府推行于全国，以达到“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之目的。

二、按照“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提出的“共同目标”是：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军事第一，胜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些都是根本正确的。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尤其是占人口90%的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生息休养创造奋斗的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日寇侵犯我国，就是要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必须抵抗到底，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90%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我们民族需要生存，需要繁荣，需要独立自由和幸福，我们民族首先需要从日寇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不坚决抵抗日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不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幸福，就决不是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一切汉奸、汪派、托派，投降日寇、破坏团结、制造“反蒋反共”的阴谋、出卖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而有些不明大义之人，不免受其蒙蔽，陷在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阴谋陷阱之中，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和掩盖全国家全民族的最高利益，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就等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同样没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必须给以深刻的批评。必须号召全国人民牢牢记住：“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对于一切出卖国家民族的人，则宣告和他们势不两立。

三、中国共产党老早就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号召，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我党过去一切主张与行动，都是环绕于这些号召的周围。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继续发扬自己的牺牲精神，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同时号召全国同胞，严厉地批评一切贪生怕死之徒，无情地指责在前线后方一切违反和破坏军事胜利的有害活动，无情地指责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号召全国同胞对于这些败类给予应得的制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实行这个原则：“唯求军事之胜利乃为吾国民人人共享之光荣，唯不能获得胜利为人人最大之耻辱，一切功罪，一切是非，胥当以此为标准”。必须“竭其全部之智能与全部之时间精力以求取军事之胜利”。必须抛弃一切关于“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必须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

四、为着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必须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惟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的，违反这个方针，就必然会使意志分散力量分散。过去的经验证明这一真理，现在的事实也证明这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与力量集中起来。除了争取最后胜利，不能有第二个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阵线，不能集中在第二个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个能够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为此目的，必须坚决打击日寇、汉奸、汪派、托派反蒋反共的阴谋活动，因为如果不坚决打击这种阴谋活动，必然会造成意志分散力量分散之局面。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共合作，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制造摩擦、捣乱前线后方、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家，并给予这些阴谋家以必要的制裁。

五、“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汉奸、汪派、托派之所以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叛逆，就是因为他们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抛弃了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借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六、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号召全国同胞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主要的不应从口头上看，而应从实行上看。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才能证明自己有这种信仰，否则只是证明他并没有信仰。对于那种行为上不实行三民主义，而只在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的，这是一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每个参加抗日战线的人决不应该如此。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叛徒汪精卫辈就曾经是这样一种人，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时对于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在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中，共产党员同样应成为模范。

七、为着实行三民主义，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厉行精神上的改造，“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号召和实行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实行起来。在伟大的抗战时代中，如果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不能养成，而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恶习必不能掉除。汪精卫一类人因为不能艰苦奋斗，失了朝气，而陷于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深渊，所以他出卖民族利益，叛党叛国，做了汉奸。可知一切不愿意做汉奸的人，必须在这次国民精神总动员中认识养成艰苦奋斗作风之必要，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至于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则尤为必要，这就必须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纷歧错杂的错误思想。第一，在“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的原则下，要纠正那一切有意无意曲解三民主义而成为汪精卫辈精神上俘虏的人，要纠正那一切企图利用托派奸徒把三民主义解释为反共旗帜的人，并且要纠正那一切对于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口挂三民主义之名躬行贪污腐化之实的人。第二，在“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对日寇妥协投降的邪说。要广大地动员民众反对汪精卫派，因为他们“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他们响应日寇主张所谓“东亚新秩序”“日满支共同体”，并进行所谓“共同防共”。要反对一切汉奸无耻地鼓吹超越民族，欢迎日寇做东亚的“盟主”，无耻地拱让自己国家听任敌人宰割。第三，在“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的原则下，必须根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标，要纠正一切破坏军政军令的韩复榘式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作战不力的现象，要纠正一切无纪律现象，要纠正一切企图响应伪政府破坏政权统一的人物，要纠正一切对政府抗日动员法令阳奉阴违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不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人物。第四，在“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困难策动和平妥协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排斥异己破坏团结的企图，要纠正一切为一己之私利或为少数集团的狭隘利益，为金钱地位职位等利益而妨碍与牺牲民族国家利益之行为。除了上述各点之外，像那一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言论，反蒋反共的邪说，依赖外力的空论空想，以及否认劳动人民是民族基本主干的反民族论调，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好朋友的反劳动阶级论调等等，都是属于不利抗战的纷歧错杂的思想，都应加以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才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争取抗战的胜利。

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广大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于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若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行之，必至成为虎头蛇尾，官样文章，而毫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着重宣传鼓动，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

以上8点，特指出其最要者。中央希望全体党员协同友党党员与各界先进人士，一致努力，认真地进行这一动员运动。更望全国青年，不辞艰苦，家喻户晓，使这一运动推行于全国。以期组织全国人民一体进入抗战到底的伟大运动中。全国人民真正奋起之日，就是抗日建国大功告成之时，愿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共勉之。

1939年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第70期上发表了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篇文章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20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呵！”

5月1日下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开幕典礼在桥儿沟隆重举行。

这个展览会是由中共中央提议，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等机关共同筹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会。展览大厅设在一个旧的天主教堂里，大门内迎面摆着一幅会场展览布置图，四周挂满了各方送来的贺词。正中的一块红色横幅上是中共中央的贺词：“劳动创造一切”。毛泽东书写的贺词是：“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各参展单位都有产品说明以及各种图表，边区机器厂（茶坊兵工厂）还有“工人生活一瞥”等照片和墙报，充分展现了边区的工业建设新面貌。展品近1000种，2460余件，分为原料、成品、机械、模型等几个部分，包括机床、石油、煤、盐、化工原料、织布机、弹花机、棉布、农具、各种日用品及轻工产品等。

毛泽东、李富春、林育英、高自立、刘景范、王明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之后，毛泽东在边区政府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工业展品。

在这次边区工业展览会上，最吸引参观者的展品是军工产品，如步枪、机关枪、高射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地雷、复装子弹等武器弹药，它们大多是边区机器厂及后方修械所制造的。其中最令人赞不绝口的是一支新颖、美观、短小轻巧的步枪，口径7.9毫米，一把折叠式的三棱形枪刺连接在枪管下方。这是由刘贵福和孙云龙等人在1939年4月25日制造出来的，经过试验，枪的性能良好，当时就被列为“五一”展览会的展品。这支新枪尚未命名，展览会因其短小就标了个“无名式马步枪”。

毛泽东走到崭新的马步枪前，将枪拿在手中，仔细地看来看去，掂了掂，拉拉枪栓，瞄了瞄准，高兴地对身旁的军委军工局局长李强说：

“使上我们自己造的枪啦！枪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

展览大厅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参观的人群。尤其是那新式的马步枪和高射机枪，被许多八路军的首长和战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舍不得离开，纷纷惊奇地议论：

“咱们边区也能造枪啦！真不简单！”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参观者络绎不绝，达数万之众，屡有观众要求延缓展期。

5月4日下午，延安各界青年在抗大第5大队坪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据记载：

“一列列年轻的队伍，浪潮似地拥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广场上，凝聚成钢铁似的一团。从广场上，从广场旁边的青运资料展览室的附近，嘹亮的歌声，快乐的笑语声，汇合成巨大的喧哗，在泛滥着夕阳的红光和浮游着灰尘的空中震荡着，在酝酿着夜霭的山谷里回响着”。

在大会主席的报告完了以后，“有一个面色很和蔼的人，踏着稳重的步子，走上主席台。场上的空气立刻变了。人们热情地鼓着掌，发出心灵的呼唤。一个披着黑色头发的抗大女同学，闪着颤动的喜悦的眼光，喃喃地道：‘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毛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编入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演讲中说：

“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20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泽东还说：

“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关于这次庆祝大会的记载中还这样写道：“这个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关心的巨人的指示，深深地激动了青年。解放社的青年工人笑着，拿着红缨矛子的青年在笑着，扛着枪杆的青年战士在笑着，抗大、鲁艺等单位的青年学生在笑着。突然，有两把火炬冲开了群众，绕着广场，飞奔着一转又一转，像火龙开浪似地奔到主席台前，一小队茁壮的青年紧紧地挽着手，他们高掌着辉耀的火炬，有一个人挥动着粗壮的臂膀，奋然展开一面黑色的绸旗，上面闪烁着白色的大字：‘新中国的火炬！’一个女孩走出来，读她手捧着的一封信道：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延安市全体青年，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礼；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青年最好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现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

读完了信，她郑重地献给毛泽东同志。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升起了一盏红灯。这是告诉大家，一个新颖的野火晚会快要开始了。”

冼星海走上主席台，指挥大家唱起他根据毛泽东的嘱咐与塞克共同创作的新歌《生产运动大合唱》：“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5月6日，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等一行人抵达庐江东汤池。

5月7日，叶挺等在东汤池召开干部和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4支队、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和指挥。

与此同时，根据项英的指示，江北指挥部还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

5月9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及干部配备情况：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主持，高敬亭仍任第4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任第5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并提出了各部队的编组方案。

5月9日这一天，叶挺、张云逸、邓子恢来到舒城县高敬亭的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江北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要高敬亭率领支队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皖东地区。

高敬亭，1907年出生在河南新县，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维埃政府主席，光山县委书记，豫东南道书记，红25军75师政治委员。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北上，高敬亭奉命组建红28军，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大别山坚持了3年坚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7年9月，红28军同国民党卫立煌部谈判，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不久，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和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后来，高敬亭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了第9团。

1937年底，党中央为了加强第4支队的领导力量，派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去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行前，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那样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可后来郑位三、萧望东到了4支队，高敬亭却坚拒二人在4支队任职，并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被调去中共鄂豫皖特委任书记，萧望东也被调到豫皖苏边区彭雪枫游击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4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说：“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3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

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说：“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

就在这2月间，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第4支队任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湖北黄安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在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他本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人，可他在抵达4支队的当晚，就与高敬亭发生了争论。他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为此，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

1938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党，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考察提拔的干部，长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6月下旬，高敬亭因与戴季英的矛盾激化，扬言要在第4支队搞肃反，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这便是“新开岭事件”。为此，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7月3日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张云逸无奈，只得审慎地采取率领周骏鸣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推动整个4支队东进。此前，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因高敬亭对下属亲疏有别，分配不公，曾多次向军部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此次能随张云逸东进，正中下怀。而高敬亭和4支队主力第7、9团却始终在淮南铁路以西徘徊不前，并企图把部队拉到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开辟背靠大别山的根据地。

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说：“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说：“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4月21日，项英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共中央书记处在4月25日发出了致“东南局并中原局转8团”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而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才有了上面所说的4月25日叶挺等人准备建立江北指挥部的江北之行。而叶挺等人的江北之行，谁也想不到竟会引发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荒诞的且至今推诿责任的错杀高敬亭的公案。为此，笔者才不惜笔墨在前面将高敬亭与方方面面的矛盾一一叙述出来，而且还要在下边将错杀高敬亭事件的整个过程摆在读者面前，以正视听。

就在叶挺等人北上出发以前，项英、袁国平等与叶挺又讨论了高敬亭的问题，大家还商量着“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又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其中说道：“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5月10日，叶挺在安徽舒城县西港冲主持召开第4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纵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4支队主力部队7、9团东进。

此前，高敬亭一直对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要他率部东进建立皖东根据地的决定不理解，因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行动迟缓。原因是他的部队在鄂豫皖山区作战多年，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熟悉大别山情况，擅长山区作战，所以他一直想把部队留在大别山区。

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叶挺在西港冲主持召开的会议一直开了两天，经过动员，第4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

5月18日，叶挺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去了皖东。

5月中旬，在4支队主力部队东进途中，高敬亭又命令第7、第9两团抵制执行东进命令。第9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认为不妥，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并将高敬亭的指令上缴江北指挥部。而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在5月20日带领两个警卫班投靠了国民党军桂系第21集团军。

杨克志和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这次逃跑前，他们在2月份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被人揭发了出来。高敬亭要撤销他们的职务，因戴季英说情而暂缓执行，此时惧怕再受制裁，就投了桂系。在江北指挥部发动的“反杨、曹斗争”中，不少干部对高敬亭也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揭发他以往在“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不少人，还有贪污腐化、抵制东进等问题，由此，“反杨、曹斗争”演变成了反高斗争。江北指挥部随即将这一情况电告新四军军部。

1939年5月26日，项英在皖南军部以他和叶挺的名义致电重庆的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

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召见高敬亭。高敬亭率教导大队来到合肥青龙厂，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说：

“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们的住处已安排好了。”

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挺，被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扣留，并将他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接着，叶挺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对他说：

“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

戴季英也对李世安说：

“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

李世安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他和政委江岚都讲了话，传达了叶挺军长的指示，要求部队保持稳定。

3天后，戴季英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人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

叶挺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4支队的原红4军第36团参谋长杜国平，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新四军军部复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6月21日至23日，江北指挥部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3天召开连以上干部批斗大会，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了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

会议给高敬亭加上了“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敬亭拒不认错，并以自杀相威胁。他还说：

“红28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4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

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要大家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部做了汇报。可是就在6月23日傍晚，项英转来了蒋介石批准杀高敬亭的电报：“白崇禧电 奉委座电令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关于此事，时在江北现场参加反高斗争大会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曾著文证实，就在反高斗争大会第3天傍晚正要宣告散会时，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来电，并在会上宣读。

6月24日上午8时，年仅32岁的高敬亭被押赴刑场，他大义凛然地说：

“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即高敬亭爱人——笔者注），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高敬亭被处决后，江北指挥部提出了“肃清高敬亭余毒”的口号，派工作组进驻第4支队，原红28军的许多干部受到株连，有的被降职、清洗、处决，还有100多人离开了部队。高敬亭的亲属也受到了极不人道的虐待，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她的大女儿刚10个月，被送给一户农民抚养，后被饿死。

高敬亭被杀不久，中共中央要高敬亭到延安学习的电报就到了。毛泽东得知高敬亭已经被处决，气愤地说：“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他立即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

“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是年11月间，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

“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和他谈话中说：

“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

“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对方肯定地回答：

“应该可以。”

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来在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

“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

毛泽东低沉地说：

“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后来在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小女儿高凤英（解放军一○五医院眼科主任）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28军军长、 新四军4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11月30日，病中的毛泽东批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

“请汪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12月9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 奉委座电令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毛泽东批示：

“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便是高敬亭冤案及毛泽东为其平反的来龙去脉。

再说在1939年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望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

“特来专程拜谒。”

萧三说：

“真不敢当。”

他请毛泽东来到他那间位于山下空坪的平房里。这是新盖的3间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还像同学一样和萧三说话。他们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他们所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毛泽东问萧三：

“苏联对《聊斋》有何评论？”

萧三说：

“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列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章只付给5个卢布的报酬。”

谈到写作，萧三说：

“我写东西很迟缓，难能下笔千言。”

毛泽东笑着说：

“下笔千言有时离题万里。”

萧三说：

“我在苏联时，写过主席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希望能详细谈谈。”

毛泽东说：

“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过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

毛泽东还答应待他休息时，可以和萧三再谈谈。

5月6日，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北上榆林途中到了延安，悄悄地住进了城南关一家骡马店里。晚上查店的保安人员得知此情，立即报告了上级。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

“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欢迎和优待。”

金城来到骡马店里，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

“邓总司令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店好一些，欢迎总司令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说：

“邓总司令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辞。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的对金城说：

“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金城说：

“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邓宝珊见他如此说，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不走了。

这天上午，毛泽东和高岗、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

交际处在机关食堂里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高岗、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搞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说：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

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星期，到毛泽东住处作了回访，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进行了交往，还由高岗等陪同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看望了在陕北公学上学的女儿邓友梅，出席了边区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

后来回到榆林不久，邓宝珊患牙疼，毛泽东特地派牙科医师梁智到榆林为他治疗。邓宝珊知道毛泽东爱吸烟，就回送毛泽东一些好的纸烟。他对毛泽东极为钦佩，案头经常放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他读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谈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印象很深，说毛泽东“讲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风趣幽默，引人入胜。”

5月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全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5月10日，鲁艺为庆祝建校一周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并举行了大型展览会，共设10个展览室，其中第3展室在显要位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画像。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两首诗参加了展出。

毛泽东还为鲁艺题了词，他写的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5月11日晚，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共分8个部分，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是从1939年3月下旬开始谱曲，历时6天，到3月31日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作品。他在《创作<民族交响曲>的经过》一文中写道：“这作品是我诚恳地贡献给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他是我最崇拜的民族的救星。他指示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中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

且说演出就要开始了，冼星海率领100多人的合唱团，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舞台，整装列队。随着他的指挥，乐队奏响了序曲，雄壮的歌声随之而起，时而哀怨，时而咆哮，那起伏跌宕的旋律，激动人心。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子：‘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黄水谣》。’”

毛泽东被深深地打动了，当《黄河大合唱》结束的时候，他高兴得从座位上跳将起来，激动得连声说：

“好，好！这样的作品太好了！应该送到前线去演出，可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后来，《黄河大合唱》在陕甘宁边区和大后方演唱的时候，人们都为中国有这样的音乐而感到自豪。郭沫若评价这部作品说：“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

5月12日晚，在中央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工业展览会闭幕大会。

“无名式马步枪”获得甲等产品奖，制造步枪的边区机器厂获得集体特等奖，主要设计者刘贵福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刘贵福作为劳动英雄的代表在大会上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坐在一起，并被邀在大会上发了言。

当晚，毛泽东宴请刘贵福等有功人员。毛泽东还亲自为刘贵福题词，称他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后来在1939年10月，刘贵福进一步改进无名氏马步枪，试制出了一种新枪。这年是朱德55周岁，工兵战士为表达对他的敬仰，将新枪命名为“五五式”步枪，以后正式定名为“新七九”步枪。

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注意发扬和运用国民党当局讲演、命令、谈话与出版物中“各种积极的东西”，“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

5月间，毛雪华来到延安，在延安兵站住下后，吃过晚饭就提出要去见“润之三叔”。兵站负责人给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兵站派人送毛雪华来到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毛泽东正从窑洞里走出来。毛雪华看到他那魁梧的身躯，连忙喊了一声：“三叔，我来了。”

毛雪华谱名毛远荣，是韶山第一个党支部5名党员之一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凝视着眼前这位十几岁的小伙子，问道：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

“我叫毛雪华，是从韶山来的。”

“你就是雪华？呵，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儿子。”毛泽东亲热地拉着毛雪华的手说：“你来了，好，好。”

毛泽东把毛雪华领进窑洞，让他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工作人员沏上了一杯茶水。毛泽东说：

“你先坐一坐，我有点事出去一下，等会儿就回来。”

毛雪华点点头，就坐在长凳上，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屋里简陋的陈设。大约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回来了，见毛雪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说：

“雪华，你头一次来，就让你坐冷板凳了。”

毛雪华说：

“没关系，三叔很忙。”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您不是给我写了一份介绍信吗？我拿着您的介绍信去找了地下党组织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那你怎么走了3个月？”

“我是从桂林转重庆，再转延安来的。”

原来在抗战爆发后，毛雪华的大哥、在韶山教书的地下党员毛特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向毛特夫一家表示了问候，对他们的困难深表同情，并给他寄去一些钱。自此，韶山的青年纷纷来了延安。毛特夫已经结了婚，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拖累，难以离家。毛雪华15岁的三哥毛慎仪，就拿着毛泽东的信到长沙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经王凌波批准，1938年初到了延安。毛慎仪给家里写信说，延安生活不错，还能读书，心情很舒畅，仿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毛雪华就给三哥毛慎仪写信要求来延安。毛慎仪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说毛雪华年龄太小，经毛慎仪反复要求，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给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介绍信，他写道：

毛雪华，年13岁，系革命烈士毛新梅的后裔，要来延安学习。请沿途各办事处护送至延为盼。毛泽东

毛雪华接到毛泽东的介绍信后，便去了长沙。可是长沙刚刚发生了大火，已经找不到八路军通讯处了。毛特夫通过地下党组织让毛雪华去做报务员，他在二哥毛汉章的护送下到了衡阳，又由党组织护送到桂林，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一见毛泽东的介绍信，就又把他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了毛雪华的叙述，才恍然大悟，说道：

“难怪你走了这么久啰。”

毛雪华说：

“三叔，我母亲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好，好。”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你母亲身体好吗？”

“还好，就是体质差一点，常犯气喘病。”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道：

“你过去读过书没有？”

“读过。”

“读过几年书？”

“小学5年。”

“远志、华初在延安保小学习。你读过5年小学了，那你到‘边中’去学习吧。”

“可我小学没毕业呀？”

毛雪华一听毛远志、毛华初在保小，就想继续上小学。

“行了！”毛泽东把手一挥：“你去边中吧。”

毛雪华到了边中才知道，三哥毛慎仪也正在该校上学，而且还是学会的负责人。兄弟俩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后来，毛慎仪和毛雪华所在的边中迁到了延安城门外，离毛泽东的家近了，弟兄俩每逢节假日，都要去杨家岭看望叔叔。有一次，毛雪华看到叔叔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文件，感到很新鲜，便随意翻起来。毛慎仪连忙叫住他，告诉他说：

“到了主席家要守规矩。”

毛泽东很喜欢他们兄弟俩，夸奖慎仪稳重老练，说雪华年龄小，调皮，不懂事，要好好向哥哥学习。毛泽东留他俩在家吃饭，饭菜很普通，只炒了几个家常菜，有肉片、土豆和辣椒。毛泽东问道：

“土豆好不好吃？”

毛雪华说：

“好吃。”

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知道毛雪华并不习惯吃土豆，只是肚子饿了，才觉得好吃。毛雪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挺大，吃了一碗又来一碗。毛泽东只吃一碗就放下了筷子。毛雪华吃了还想吃，他说：

“叔叔，我没吃饱。”

毛泽东怜爱地看着雪华，对江青说：

“叫周师傅再弄一点吧。”

江青就给毛雪华又端来了一碗，亲切地说：

“吃吧，要吃饱啊。”

5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中组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但是，学习的时候，死守书本也不行。有人到现在还用过去中央苏区编的《政治常识》，不求提高，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常’之慨。”

毛泽东说罢，会场里有不少人笑了，他自己也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说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作‘守书’。”“‘人到五十五，方是出山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

5月26日，毛泽东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全文如次：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比较其它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他称赞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3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抗大3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5月30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以八路军总司令部名义，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说：

“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生的军人只能升到准尉为止的弊病。”

《训令》规定了3项评级标准，即：“历史长而且革命意识坚强；能力强，工作热情高；现任职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革命忠诚，尽忠职守。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6等16级：将官：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处理军衔制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看到朱德、彭德怀1939年4月2日的电报及5月30日的《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不可妄加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看着摆在他眼前的“等级制度”、“6等16级制”这些刺眼的字眼，应该是很反感的吧！本传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从小恨的就是不平等，在学有所得之后立志要改变不平等，在创建了人民军队之后要消灭官兵之间的不平等。况且朱德、彭德怀是在民族危亡关头，是在全民抗战的条件下，提出要以“等级制度”“兴奋干部”“兴奋部队官兵”，这是极不合时宜的，也是与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相悖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朱德、彭德怀都非常熟悉的《古田会议决议》。当然，毛泽东主张在新四军内，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加紧评衔工作，那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例外。建国后，毛泽东违心地同意军队实行军衔制，又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断然取消了军衔制，完全证明了他的理想志向是要逐步地消灭等级制度、消灭阶级，而不是要建立什么好的或者说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等级制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传将在后面继续把有关军衔制的历史梳理清楚。

另：关于枪杀高敬亭一案，说它错杀，是因为高敬亭曾经有大功于人民，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也还属于教育问题，罪不至死。说它荒诞，是因为毛泽东历来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而那些新四军的高级负责人竟听命于国民党军第5战区，听命于蒋介石，罢免、枪杀自己的同志！自此以后，这一错案的少数当事人及其某些后人，又就这一问题的责任相互推诿，企图把历史搞乱。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当今的互联网上，有人著文呼吁“请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也有人极力为项英喊冤。李一氓就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为项英开脱，把责任推给了叶挺等人。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实在不应该。还有一个自称为高敬亭立传的作者，更言之凿凿地说，他曾专访过戴季英，戴季英告诉他：“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这个在战争年代“肃反”中手上沾满了战友鲜血的戴季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因新的问题被河南省委开除了党籍，倘若他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便是临死也要放上一颗烟幕弹，恶习难改。

**第37章**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主权。”**

话说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了《永久奋斗》的演讲，他说：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60年，70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作‘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

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今天是你们的3周年纪念日。抗大办了3年了，我们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3年以来培养了很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今天，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们不赞成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讲和，主张妥协、投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反对投降。”

“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赞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许有一人讲和，要全体一致地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过去3年是这样，以后3年，以后很多年也是这样。‘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方针。”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四言诗一首，以资鼓励：

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全文如下：

1.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日寇除军事进攻外，加紧其诱降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放在第一位，正在积极策动国民党一切投降分子，勾结英、美、法妥协派，以图达其瓦解抗战阵线目的。汪精卫正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投降分子、反共分子正在国内普遍地坚决地进行破坏工作。因此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摩擦，对边区的挑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二、因此党应当用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党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来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地坚决地反抗。

三、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为此目的，党应当更密切的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及国民党员群众联系，向他们说明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并与他们共同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来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动员群众和巩固国共合作，就是反对投降与反共的最好方法。党应当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公开地揭穿反共活动即是准备投降的实质。同时党不应给民族统一战线之破裂造成借口，这种统一战线无论如何是需要巩固和扩大的。

四、关于因此而产生的党内党外宣传组织任务，另有电示。

五、此指示发至省委，向下一律用口头传达。

中央书记处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反投降的报告；13日，他又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投降的结论。这个报告和结论的提纲被称为《反投降提纲》，还曾被称之为《再论持久战》。在《报告》部分，毛泽东说：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3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1、日本的诱降政策，2、国际的压力，3、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关于“当前的任务”，毛泽东说：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和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人员。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他还说：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加以严正地批驳。**”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号召说：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期间，发生了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的严重事件。

6月12日下午3时，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杨森的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当场枪杀新四军上校参谋涂正坤，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吴贺泉、赵绿莹等6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在新四军留守处十几个干部惨遭杀害的同时，在平江的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杀者一千余人，其中有一红军家属兄弟8人就被杀掉6个。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轰动全国的平江惨案。

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投降问题的结论，其中谈到了“转变问题”，他说：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反共和国的军事政变，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军投降——笔者注），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恰（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了慕尼黑协定——笔者注），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地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关于“几个策略问题”，毛泽东说：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3月会议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6月中旬，萧三把他在苏联出版的《埃弥萧诗选》送给毛泽东，同时，他为了活动方便，向毛泽东提出想要一匹马。

6月17日，毛泽东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文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果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子。敬复

毛泽东

夏季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带着保卫参谋蒋泽民到附近的农民家串门。他们来到一户农舍，这家的孩子立刻认出了毛泽东，高兴得直朝屋里喊：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孩子的父亲急忙从屋里走出来，亲热地和毛泽东打招呼，让毛泽东坐下来，一起拉家常。毛泽东问道：

“你们这一带有多少户人家？生产和生活怎么样啊？”

农民见他很亲切，便打开了话匣子，说：

“这一带有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饲养点啥。一般人家最少养一头猪，最多的养30多头。养鸡最少五六只，最多二十来只。以前不敢多养，人少卖不出去。现在好了，鸡蛋、猪肉有多少卖多少，猪肉1斤能卖1角钱，鸡蛋1角钱10斤。家家都有副业收入，少则1年十几元，多则六十多元，够零花钱了。大牲畜不是每家都有，有的养马，有的养牛，有的养驴，基本上两户一台车，一副犁。地都种在山坡上，如果风调雨顺，能把粮食全收回来。”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

“要搞好养殖业，得选些优良品种。饲养上还要注意卫生，猪和鸡不能进窑洞，那样人容易得传染病，猪和鸡也容易得传染病。”

说罢，他起身望着光秃秃的山，感慨地说：

“山坡上有这么多人家，可是没有一棵树，要植树造林啊！”

离开了农家，毛泽东边走边对蒋泽民说：

“这十几户农民有一定的代表性，生活不富裕，我们要帮他们。我们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要把家乡的农业和养殖业的好经验传授给他们。还要在他们当中举办家庭识字班，晚上派去战士教他们，一晚上学一个小时就行。”

回去后，蒋泽民把毛泽东的指示汇报给有关部门。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出了相应的措施：抽出有文化的战士办了农民识字班，派有生产经验的战士到农民中传授先进的养殖方法，还组织了机关人员上山植树。

蒋泽民后来回忆说：“两年后我离开延安时，坡坡岭岭上都栽满了小树苗，光秃秃的山穿上了绿衣。”

6月22日，八路军第3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分别致电蒋介石、程潜、卫立煌和毛泽东，报告了国民党摩擦专家张荫梧袭击围攻河北深县刘家庄八路军驻军的情形，他在电报中称：

“正当武邑、衡水、束鹿之敌分路大举向职部进攻‘扫荡’之际，深县南之陈二庄、各家庄驻军，于6月21日夜12时半突闻枪声四起，同时附近蔡家庄以北之程家、芦家庄亦均发现枪声，当职等人从梦中惊醒，而我刘家庄之驻军已陷于严密的包围中。经探悉为张荫梧亲率河北‘民军’向我攻击，及派员持函交涉，请首先停止军事行动，有何问题，自可相互开诚布公协商，共同解决。乃张氏不问来由，不分皂白，竟惨杀我派去之人员，反集中兵力，进攻益急，我刘家庄驻军在猛烈炮火下死伤过半。职闻警立即饬部驰救，不意途中‘民军’伏击，经高呼口号要求停战无效，为自卫计，不得已乃出于抵抗。故在张家寺、北马庄一带发生接战。张氏亲饬所属占据附近村落，向职部施行包围，企图全部歼灭，情况万分紧张。迄翌日黄昏，幸张氏部中有不少深明大义之士，经我宣传，士气顿挫，至此刘家庄之围乃解。”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此文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进行了修改，将题目定为《反对投降活动》。他在原文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

“抗战两周年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报》与八路军军政杂志，要我作一篇纪念文章。我手边搜集了不少材料，拟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即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笔者注）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生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呵！”

1939年7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林育英、孔原、林伯渠、张鼎丞、邓小平、高岗、谭政、滕代远。这次会议一直开到8月25日才结束。

7月3日这一天，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共讲了7个问题：（一）投降妥协的危险性问题；（二）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变化；（三）当前党的任务；（四）关于三民主义问题；（五）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六）文化政策；（七）党的工作问题。他在分析形势变化时说：

“现在日本的军事压力减弱，正面的战争减少，它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扫荡’八路军与新四军。就国民党而言，现在抗战的旗帜还存在，但正面的战争却减弱了，外来的压力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疲倦与悲观失望情绪增加。敌人军事进攻减少而政治诱降加强，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增加了。”“今天的任务是要援助全国的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目前要自力更生，就是要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退步的倾向作斗争，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

7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南方局的工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南方工作，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这是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成绩。”

毛泽东也指出了南方局工作的弱点，他说：

“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

他在讲话中还说：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

7月5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四川乐山沙湾镇病逝，享年86岁。郭沫若回家奔丧。郭家治丧期间，收到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挽联近300幅。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陈布雷、孔祥熙等要员送了挽联；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世侄”的名义，送去了由毛泽东题写的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另外，周恩来、林伯渠、林彪、贺龙、刘伯承、左权、徐向前、聂荣臻、陈光、吕正操也送了挽联。

7月7日，中共中央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一篇扛鼎之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英勇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无限之热忱与兴奋，纪念伟大神圣之民族抗战的两周年！

两年来，我前方数百万将士，以热血头颅抵抗暴寇，忠勇奋发，劳苦备尝，当此抗战两周年之日，中共中央谨向蒋委员长及我保卫国土之忠勇将士致崇高的敬礼。

两年来，我数万万民众及海外侨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协助军队，输财输力，支援前线。而在沦陷区域之同胞，虽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仍群起抗敌，奋斗不懈。中共中央谨向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致亲切的敬意。

两年来，在火线上，在敌机下，在敌人暴行中，万千壮士，英勇捐躯，老弱妇孺，惨遭蹂躏，中共中央谨向我民族英烈致沉痛的哀悼，谨向英烈之遗孤遗族致亲切的慰问！

两年来，世界各国人士，或则主持公理，仗义执言，或则慷慨输将，助我抗战，或则抵货拒运，制裁暴寇，中共中央谨向同情及援助我之友邦人士致敬佩的谢意！

同胞们，将士们！民族解放斗争的两年，对于中华民族是奋发的，进步的，光明的两年。伟大的民族战争，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奠定了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始基，开创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远景。

强盗侵略战争的两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黑暗的，困难与危机日益增长的两年。两年战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进入了心所不愿力所不及的长期战争中，差不多一百万万的战费，近百万的伤亡，换来了广大辽阔的战区，处处遭受打击的战线，迫近危机的经济状况，孤立失助的国际地位，厌战反战日益蓬勃的民情，日寇正在这种国力消竭危机四伏的穷途上迈进。

两年抗战的结果，已经最鲜明地显示了：只要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团结统一，不畏困难，不惧险阻，力求进步，奋斗勿懈，那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的，而最后胜利的时机，也一天天地更加接近了。

正因为这样，日寇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之后，采取了速和速结的政略。近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集其主力于“扫荡”游击区，对沿海各地作海盗式的袭击，而在前线上的部队只能保持相机进取的姿态，日寇侵略之现阶段已侧重于以政治上诱降的阴谋来灭亡中国了。那狡诈无赖的近卫声明，不过是这种阴谋的公开暴露。虽是这种声明，仅获得少数民族败类的无耻响应，而为全国人民伟大壮烈的巨吼所反对，然自此以后，日寇却更积极施行其政治上诱降的活动，它一方面利用丧失胜利信心阴怀贰志的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另一方面利用国际间对法西斯侵略者惯于妥协的反动力量，企图以此来达到它降服中国的目的。

在日寇策动下，汉奸汪精卫之流，公然匍伏敌前，粉墨登场，为和平之狂吠，作卖国之掮客。而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故意制造日寇可能放弃其灭亡中国之野心的梦呓，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散播国际调解应予接受的空气，散播不亡于敌即亡于共的谬论。迹其种种论调与行动，无非是替日寇之诱降灭华为内应，替汉奸之叛国亲敌作声援。盖日寇视中国之进步与团结为灭亡中国之最大障碍，乃不得不千方百计摧毁中国的进步，破裂中国的团结，而这些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起而应之，如捧纶音，蠢蠢欲动。他们暗藏于抗战阵营之中，乘间抵隙，便利私图，呼朋引类，奋其魔力。对抗战之各种进步主张与设施，或消极怠工，或破坏捣乱。对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团体，则肆意摧折，不遗余力。对赤忱为国，忠贞正义之士，则视为仇雠，排击不休。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思想与文化则目为洪水猛兽，毁之惟恐不力，去之谁恐不尽。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则更是他们造谣污蔑攻击陷害的对象，视之为眼中钉，明攻暗毁，无所不用其极。对国家民族前途所赖的青年，则束缚其思想，桎梏其行动。而尤重要者，就是尽力分裂国内团结，制造纠纷，鼓励摩擦，挑拨内哄。其所用手段，则为伪造三民主义，以破坏革命的三民主义；加紧阴谋活动，以分裂国民党；伪造情报，散布流言，以破坏共产党；造作事端，挑拨感情，以离间国共两党之团结，并引起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间的嫌隙与裂痕。凡此所为，或直接受命于日寇，或间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达投降之目的而已。这不仅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乃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亦且因为国共团结乃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三民主义乃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如不分裂这个团结，破坏这个基础，就不能造成其投降乞和的条件。阴贼险狠，愈出愈奇，国人不能不深加注意了。

至于国际反动力量……虽然我国的抗战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各先进人士的同情与援助，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反动营垒中却存在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私利主义者，存在着想以中华民族为牺牲而与侵略者妥协的阴谋家，这些分子随时准备重演慕尼黑的罪行，而以中华民族为宰割之对象。此种现象，现时虽尚未表面化，但暗中策动，渐见积极，稍不注意，便有被其牵入圈套之可能。

凡此所述，一则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二则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三则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合，便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这就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重要的特点，可能的趋向。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

同胞们！将士们！今日与日寇言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日寇诱降中国的甜言蜜语，不过是灭亡中国吞并中国的钓饵，投降妥协分子的挑拨离间，分裂团结，防共反共，制造内哄，无非是出卖民族国家投降屈膝的实际准备。东方慕尼黑即令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

同胞们！将士们！我们以热血头颅所换来的抗战的光辉成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所毁灭所断送么？我们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缔结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所破坏所分裂么？我们千百万先烈的鲜血，能让他白白的流去么？我们愿意受日寇甜蜜语言的钓饵，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么？我们愿意作国际投机交易场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么？不，决不！

同胞们！将士们！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我们要继续抗战，抗战到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的对岸！我们要巩固团结，团结得如钢铁一般的强固！我们要向前进步，进步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我们要反对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我们要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同胞们！将士们！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这就是我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

同胞们！将士们！奋斗吧！我们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

抗战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此后，毛泽东还题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延安新市场”的大门两边，其词云：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主权。

而“延安新市场”这一门楣横批，则是由毛泽东称为“马背书法家”的舒同题写的。毛泽东的对联流动飞舞，恣肆磅礴；舒同的横批含蓄善藏，筋力老健。两位大书法家唯一的一次合作，成了延安新市场的一大盛事，一个亮点。

7月7日这一天，是抗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华北联合大学藉此机会正式宣告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

此前，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和鲁艺、安吴青训班的部分人员合并在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迁到抗日根据地去办学。

这天下午，毛泽东应校长成仿吾之邀，乘坐一辆华侨捐献的汽车来到桥儿沟天主堂西侧广场前面的场院，给师生们作报告。他在东边中间的桌后边坐下，因为没有扩音器，几千听众只能密密麻麻地紧紧坐在他周围，屏声静气地聆听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

毛泽东在讲到“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的时候，引用古典小说《封神演义》里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

“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3样法宝。姜子牙用这3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抗日民族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你们不要看轻‘游击战争’这4个字，这是我们18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斯大林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现在的革命，是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它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

毛泽东还说到了江淹的《别赋》，由《别赋》联想到听众，他们是别离父母亲朋，冲破封锁，奔赴延安抗日前线的革命者，因之，他又即兴吟道：“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毛泽东讲完后，由女同学邓寿雨代表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读了“告别延安，奔赴前线的决心书”。

毛泽东高兴地接过了决心书。同学们振臂高呼：“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许多同学拥过来，拿着笔记本要毛泽东签字。毛泽东笑着写上“打日本，救中国”或“抗战到底”等词语，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后来拥上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就只好在笔记本上写了“毛泽东”3个字。

7月8日，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工作报告，汇报了南方局和南方党与军队的工作情况。

此后，博古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南方工作报告》，张鼎丞作了《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观看了《黄河大合唱》，他兴奋地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7月10日晚，周恩来准备到中央党校去，为成仿吾率领的“华北联合大学”1500名师生开赴晋察冀送行。杨家岭虽然离党校不远，可是中间隔着一条延河，而且涨了水。毛泽东便让警卫员王来音牵来他的大青马，让周恩来骑，还让他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和王来音一块儿，陪同周恩来骑马前往。他们过河之后，遇到一个小沟，周恩来的坐骑受惊，把他摔了下来，右臂正好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蒋泽民、王来音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了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疼得紧咬着牙关。蒋泽民、王来音扶着周恩来步行到了党校会议室，中央卫生处立即派了几个医生赶来，为他先作了简单包扎。

7月11日晚上，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为华北联合大学师生挺进华北敌后，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欢送会。可容纳800人的陕公礼堂，座无虚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欢送会。毛泽东问联大校长成仿吾：

“杨展来了没有？”

杨展是杨开智和前妻李一纯的女儿，是杨开慧的亲侄女，1920年10月26日生于长沙。1937年杨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长沙周南女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的杨展，曾与毛泽东直接通信联系。她在信中陈述了湖南的情况，论及了她对时局的看法。那时的杨展只有18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写到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妥协问题时，提到“有个学生从湖南来信”反映情况。他所说的这个学生就是杨展。1938年底，杨展在毛泽东来信的鼓励下，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的帮助，来到延安。她首先在陕北公学分校高级班学习结业。1939年6月，杨展为参加由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等4所学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和陕北公学分校的同学们到延安集结，于6月初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李维汉，为了抓紧对师生们奔赴华北前的教育，和华北联大的校领导罗瑞卿、成仿吾邀请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给师生们作报告，杨展聆听后深受鼓舞。原来，杨展自从到边区后，严格要求自己，从没有要求去见毛泽东。就是这一次听报告，许多同学拥上去请毛泽东签名题词，她也只是远远地望着姑父。所以，毛泽东一直挂念着还没有见到的展儿。成仿吾没想到毛泽东有此一问，正茫然间，坐在旁边的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中学部主任何干之，连忙走到台下，把杨展引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见到杨展很高兴，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亲切地握着她的手，问她家里的情况，勉励她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当一名好学员。杨展坐在自己思念多年的姑父身边，聆听着姑父的教诲，心中万分激动。

第二天，杨展随着8000多名联大学员队伍，在“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雄壮歌声中，奔赴华北敌后战场。后来，杨展在1940年、1941年三八妇女节，先后两次被联大授予“模范妇女”光荣称号；1941年又被评为“学习模范”，还被选为华北联大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代表。1941年秋，杨展在河北平山县灵寿北部大山区滚龙沟西坡转移时，为掩护身体病弱的同志不幸失足坠崖，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21岁。

且说7月1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7月20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一个简易的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中国女子大学是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和毛泽东的倡议创办的，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妇女干部的最高学府。由王明兼任校长，柯庆施任副校长，王明的老婆孟庆树任政治处主任，张琴秋任教育长，吴朝祥任总务处长。

女大的校址在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的一处山坡上，位于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八路军总部之间。从1939年3月开始，有关部门仅用一个半月，便建成了100多孔窑洞的学员宿舍，窑洞顺山坡分两层或三层，排列整齐；又在山坡平坦的地方盖起了3间简陋教室和一个简易大礼堂；还在山麓下岩洼处建起了伙房。延河岸边的广阔沙滩地平整成为球场和活动地，周围还垒起了一道比人高的土围墙，这就是中国女子大学的校园。5月间，女大开始招生，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个女生班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两个女生队也并入了女子大学，共有学员近500人。

女大的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

7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在延安的领导人以及边区各党政军机关各院校的领导人，从前线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以及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了开学典礼。

与毛泽东轻装简从不同，身兼女大校长的王明骑着马，跟着副官、秘书、勤务员、马夫等，非常排场。他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的副官事先把一大摞马恩列斯的书放在讲台上。王明一会儿翻开这一本引一段，一会儿又翻开另一本讲一节，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可谓是巧舌如簧，张口闭口之间就是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条条，大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架势。加上他曾经是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因此台下的不少青年都被他唬住了，觉得他很高明，懂马列，有学问。

毛泽东也在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同志们：

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两万万三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其次，还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我希望女大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但敌之诱降阴谋与扫荡敌后，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全党同志应该深刻认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敌后抗战尤其是艰苦，只有用一切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敌后抗战，克服反共危险，推动中国进步，增加抗战力量，坚决奋斗，才能争取相持阶段与最后胜利的到来。应该反对无根据的认为相持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但同时要坚决反对因为抗战困难、投降危险与反共危险的增加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因为这都是妨碍抗战动员妨碍争取相持阶段到来的不正确的倾向。”

7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根据各方材料（参考30号军政通讯），证明英日谈判英国对日已有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严重局势。

二、蒋介石的谈话虽然指出了独立奋斗反对依赖与观望的决心，但对英国仍抱有极大的幻想；特别由于金融上对英国的依赖，使英国对蒋仍有很大的支配力量。

三、我党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行动上，表示：（甲）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揭破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抗战的政策，这政策只有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国的侵略，促进全世界普遍的战争的到来。（乙）坚决反对中国抗战内部任何人因张伯伦的对日投降而对抗战表示动摇，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破坏抗战的活动，强调自力更生的口号，强调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打破对英国的幻想，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丙）但对英方面，应集中力量于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主张英国人民与政府应改变这种害人害己的错误政策，以争取英国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丁）指出即使英国停止援助中国与日妥协，只要克服内部投降危险，中国仍有一切办法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中央书记处

1939年8月1日下午5时，延安党政军民万余人举行隆重集会，沉痛追悼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的新四军指战员。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为牺牲烈士撰写的两副挽联：

其一曰：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其二曰：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害爱国英雄为能事；

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活，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

毛泽东还在集会上发表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说：

“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死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作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摩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长篇演讲。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后，江青觉得刘少奇的一些提法有问题。她问毛泽东：

“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

毛泽东说：

“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他长期受王明等人打击的情况，并表明坚决支持我。此人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上表现还不错。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责备。”

8月15日，日军飞机10架次空袭延安，投弹40枚，死伤6人，毁民房27间。

8月19日，中共中央就国共之间摩擦问题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局部武装冲突原则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一、在日寇挑拨与国民党反共政策下，局部武装冲突不仅可能，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应当估计到这种冲突还有加多的趋势。

二、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武装摩擦者向我进攻的行动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与教训。

三、在武装冲突中，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必须占取上风，有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必须提高警惕性，免受袭击，布置必须严密，不宜给我中下级干部以随便进行武装冲突之权，以免弄坏事情，影响统战并免吃亏。

四、必须收集对方的各种材料人证物证，以便在必要时把反共分子及分裂者的阴谋向全国公布。

8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个与八路军总部建立等级军衔制的规定有重大区别的《重新规定部队等级制度的指示》，《指示》要求部队在评级时“不拘于一般军队的成规，不迁就国民党的制度，按照我军之特殊性质，以便于确立指挥关系和工作关系及增进团结为原则”。《指示》中还强调说：“战斗员不宜分等级。”

8月23日、24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时局和南方局、东南局的工作。张闻天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南方局工作的意见，他说：

“此次政治局会议基本上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经过讨论便统一了，这也是必要的。”

他在谈到文艺问题时说：

“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指出民主化是对的。”“民间形式在某一方面是降低了些，但要真正创造民族的艺术，这是必经的阶段。中国艺术的提高须要深入民众中去。”

刘少奇发言说：

“目前时局包含着发生突变的危险，我们要有必要的准备。要团结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要加强敌后的工作。党的工作要改变，要细心谨慎地开展工作，埋头苦干。在国民党区域，要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秘密工作的任务就是保存党的组织，保存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

“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来到时，有局部妥协的渐变的现实问题。”

他还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局工作弱点的意见。

8月26日，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喜欢！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的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8月27日，周恩来在邓颖超陪同下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道格拉斯专机离开延安去兰州，经迪化去苏联治疗臂伤。与他同行的还有去苏联治病的陈昌浩及其儿子。

周恩来一行在迪化滞留了大约一周左右，转乘苏联专机顺利到达了莫斯科。经任弼时联系，9月14日下午被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据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了一个小手术。

1939年9月1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全文如下：

记者问：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其意义如何？

毛答：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订于1939年8月23日——笔者注）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英法苏3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3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从4月15日到8月23日，进行了4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9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2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3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国坚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这就是：

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摩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9月初，中共中央通知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山西的政治情况。他问毛泽东：

“主席，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是年秋季的一天，军委二局的战士们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他们跑上去一看，是毛泽东在外参加完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毛泽东被大家接到戴镜元所在的机要工作人员驻地，听取了戴镜元的汇报，并应邀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他说：

“你们在二局工作要有长期打算，准备干100年，你们不能干了，儿子、孙子接着干下去。”

他还说：

“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龙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的小石头，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会通报嘉奖的。你们只能默默无闻地做贡献，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

“你们的工作是一门科学，科学事业的成功，是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顽强钻研创造取得的。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登山不怕高，只要肯登攀。只要有毅力，有钻劲，不怕挫折，敢于走‘之’字形路，就能步步胜利。不要怕困难，只要苦干实干，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不怕难，只怕不干。”

9月8日晨5时30分，防空司令部接到了有敌机向延安飞来的报告，立即发出空袭警报。不久，敌3架侦察机轮番飞到延安上空盘旋侦察。

上午9时许，15架重轰炸机由东南飞来，投弹后向东北方向飞去。接着，又有28架敌机由东面飞来继续轰炸。直到11时，警报才解除。前后两批43架轰炸机共投弹200余枚，多数炸弹落在城内北街和西山上，毁房150余间，死伤58人。奉命来延安汇报工作的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钟蛟盘，不幸在空袭中遇难。

9月9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了延安，随同北路慰劳团一起来延安的还有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

这个全国慰劳总会的前身是1938年7月在武汉“七·七”献金活动后成立的“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迁到重庆后，改名为“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简称“全国慰劳总会”。1939年初，“全国慰劳总会”组织了南北两路“前线将士慰劳团”，分赴全国各战区去慰问。他们函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派人参加。“文协”推举老舍参加北路慰劳团，姚篷子、陆晶清两人参加了南路慰劳团。北路慰劳团的总团长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团长是贺衷寒。

9月10日下午，延安各军事机关代表百余人，在八路军政治部举行“为敌机轰炸死难之钟蛟盘同志追悼会”。会场朴素肃穆，正中挂着钟蛟盘的画像，下面一张白纸上写着几十位死难者的名字，两旁摆放着很多花圈和挽联。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致悼词并报告了钟蛟盘的简历，他说：

“延安这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日军会出动几十架飞机，频繁地进行轰炸呢？这是因为敌人对坚持抗日的人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敌人早就宣布了，要把延安炸平，把边区炸平，还要放毒瓦斯。”“我们今天开这个追悼会，一方面表示我们的沉痛、悲伤和义愤，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性，下一次不要让一个人在敌机的轰炸下牺牲。我们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用我们的伟大胜利来替他们复仇！”

9月10日晚，毛泽东在延安交际处会见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全体成员，并设宴招待他们。毛泽东还和张继、贺衷寒、老舍等人碰了杯，宴会后一同前往中央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会。

毛泽东首先在欢迎大会上致词。他针对目前的局势提出，全国人民拥护抗战，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告诫国民党说，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要做。

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接着讲了话。张继非常激动，他在谈到“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的时候，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接着，他提高语调说：

“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摩擦，但是这些摩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

毛泽东为张继的“自我检讨”热烈鼓掌。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被请上台去讲话，他还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接着，冼星海指挥鲁迅艺术学院合唱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了秧歌剧《查路条》等。老舍听到了《黄河大合唱》，极受感动，连说：

“气魄真大，好热情！”

第二天，延安的《新中华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

9月13日，江青撰写的《我与娜拉》一文，载于《中国艺坛画报》上，她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地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9月15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派八路军344旅旅长徐海东去华中，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后，4支队的干部们觉得名声不好，党不相信他们了，思想很不安定，所以毛泽东就派来自鄂豫皖的徐海东前去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将要到4支队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为胡服，以徐海东的中校副官的名义，在徐海东掩护下，同时离开延安南下。

欲知新四军后来发展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周恩来坠马受伤一事，本传引用的材料源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是由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蒋泽民1985年3月20日写给胡耀邦的信以及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王来音1979年6月的口述提供的。从时间上看，毋庸置疑，蒋泽民的信和王来音的口述材料，都是当局为了批判江青而搜集的。但在这些记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蒋泽民和王来音并没有提及江青。这应该是信史。而与此相反，周恩来坠马是因为江青骑的骡子惊了他的坐骑的说法，却有大致相同的三四个版本。在这三四个版本中，尽管表述不一，归纳起来也只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周恩来曾经说过，毛泽东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江青有关。其二是成仿吾的版本说，说是毛泽东勃然大怒，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吓得江青不敢回杨家岭。直到第二天毛泽东气消了，她才敢回去。而在这三四个版本的提供者中，没有一个是周恩来坠马现场的当事人。**尽管其中之一的成仿吾在党校处理了这件事，但他也不是事故现场的见证人。况且成仿吾的版本，并不是直接来自于成仿吾，而是来自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研究人员米世同。米世同说，是成仿吾1965年回延安时提供的**。**叶永烈的版本，也是来自于这个米氏，是1992年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得到的**。由此看来，这三四个版本并没有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

**第38章**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

话说1939年9月16日，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3人刚吃过早饭，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迎面走来。他们对金城说：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谈话，想见一见毛先生，有几个问题请教。

在这3个人之中，刘尊棋与共产党有关系，张西洛是个进步分子。金城立即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做了汇报。柯庆施请示了毛泽东之后，让金城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记者们，并让他们拟一个访问提纲。金城很快便向记者们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

“我十分欢迎记者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

金城还告诉他们说：请你们先拟出一个访问提纲，会见时间定在今天下午6点，地点就在你们住的这个交际处窑洞。

3位记者略一商量，推举刘尊棋、张西洛负责起草，很快就拿出了访问提纲。问题分为3个部分：1、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2、关于两党之间的摩擦问题。3、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3个问题，都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们迫切了解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金城马上将这份访问提纲交给了毛泽东。

这天下午，张西洛3人按照原来的安排，参观了一个工厂。还不到6点钟，他们就返回了交际处，当他们快要登上土坪的时候，猛然间看到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这个人正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同记者们紧紧握手，一边热情地说：

“欢迎你们，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这孔窑洞是交际处5孔窑洞中居中的一个，窑洞里面有一张木长桌，十几个小木凳，两盏油灯已经点着了。桌上摆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产的香烟。毛泽东坐在长桌的上方，3位记者紧靠着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人柯庆施、萧向荣，以及新华通讯社的向仲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人，参加了会见，另有两位青年担任记录。不大的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十七八个人。

毛泽东待众人坐定之后，把记者提出的访谈提纲放在桌子上摊开，一一回答记者的问题。他按照访问提纲讲完后，同3名记者合影留念，还送给3个记者每人一本签上记者名字和他的名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3名记者记录毛泽东的谈话，以刘尊棋的记录为主，张西洛和耿坚白加以补充，共同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记录，全文如下：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3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么，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么，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3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3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摩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7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8月1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摩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作友军，不叫作“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3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摩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摩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摩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么，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么，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3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后来在10月份，这份谈话记录先后刊登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华侨报纸，也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范长江主持的重庆“国际新闻社”发到海外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稿。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对毛泽东会见3记者的事却一字未提。就这样，蒋介石见到10月19日刊登有毛泽东谈话的《新华日报》后，仍然是暴跳如雷，大骂新闻检察官是饭桶，并责令他们检查失职之责。

9月18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晋东南各界人士纪念九一八、追悼杨裕民先生大会”。此前，毛泽东在延安为追悼会场亲书横额：“浩气长存”，还发去了为杨裕民撰写的挽联，他写的是：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杨裕民，又名彦伦，字灿如，在堂兄弟中排行十三，又称杨十三，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他曾参加过觉悟社，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河北工业学院教授，成为著名造纸专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他参加了抗战，任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应朱德、彭德怀电召，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

早在7月21日，杨裕民因长期劳顿，重病积疴，在与日寇九路围攻太行山作战转移至山西屯留时，病逝于担架上，享年50岁。

晋东南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也在沙坪坝南渝中学礼堂为杨裕民举行了追悼会。

9月21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由伊盟和榆林返回延安。

是日晚，延安各界又一次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慰劳团。老舍后来在他的《剑北篇》里，对这次晚会有如下记述：

“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坚决抗战的热情；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利用民歌与秦腔，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

9月22日下午4时，慰劳团和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和报界开座谈会，由艾思奇主持，毛泽东到会讲了话，老舍作了文艺形势的报告。

晚9点，毛泽东与慰劳团成员共进晚餐，至夜12点结束。

9月间，干部教育部向毛泽东反映，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普遍缺乏教材，毛泽东和有关人士研究决定，先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陈昌浩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为课本；另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简编》和一部《中国近代史》，由毛泽东、李维汉、杨松、吴亮平、陈伯达合作编写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后续课本。

此后，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小组成员，拟出了一个写作提纲，全书分为3章：第1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负责编写；第2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负责编写；第3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负责编写；并计划在10月底完稿。后来由李维汉负责的第3章，因为没有完稿而不得不放弃了。

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沟口，只见坡上坡下种的谷子都已经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着头。毛泽东被这丰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开了外衣的扣子，深深地呼吸着，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年头不错嘛，农民们又有饱饭吃了。”

他突然问：

“泽民，你说说，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是……是……”蒋泽民赶紧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问题？”

“对，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微笑了。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和中国革命是连在一起的。实行统一战线后，我们进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得到了实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种点地，种点好地，得花很多钱。减租减息后，我们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是要交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土豪们多要钱。这样，地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社会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战，而广大农民能种上地了，也能种上好地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要求参军参战。”

9月24日，毛泽东邀请第2次来到陕北的斯诺到家里做客。斯诺仔细端详着3年后再次见到的毛泽东，后来他是这样描述的：“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长谈，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在谈到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说：

“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

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

“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

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关于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毛泽东说：

“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在组织上也领导了。其它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

关于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

毛泽东还和斯诺谈到了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

9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说：

“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第二是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问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一切学问，一切科学，都是以生产为基础，阶级斗争的基础也是生产。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

9月28日，毛泽东撰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20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150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苏联大军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张，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的成功了。这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准确的。”

9月29日晚，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和斯诺及苏联朋友等。

据斯诺记载说：他到达延安于24日见过毛泽东“几天以后，当那在山西前线驻防两年的何柱国将军的军队通过边区时，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欢迎这个红军的死敌和他的官员，以及两位苏联顾问”。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有2000多人参加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他说：

“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毛泽东在介绍斯诺时说：

“1936年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也依次发表了热烈的抗日演说。接着，冼星海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了为纪念“九一八”8周年由天兰作词、由他谱曲的《九一八大合唱》；又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毛泽东问斯诺：

“你觉得怎么样？”

斯诺说：

“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

毛泽东道：

“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又和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他非常自信地对斯诺说：

“延安比保安好。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以给你一点成绩了。”

此后，斯诺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回到北平不久，写出了《为亚洲而战》一书。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

“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同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像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宵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

后来在194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第1次接见斯诺，听了斯诺的介绍后满意地说：

“你所谈的情况和埃文思·卡尔逊谈的差不多。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他问斯诺：

“除了对中国政府（指国民政府——笔者注）以外，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人民呢？”

斯诺建议直接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

1944年５月26日，罗斯福在参加开罗会议以后第2次接见斯诺，他说：

“我在开罗曾告诉蒋介石夫妇，他们必须同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不会陷入那里的内战。我们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

他还告诉斯诺，蒋介石已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去，并让外国记者进入延安。这使斯诺感到鼓舞。

再说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写了一篇《〈共产党人〉发刊词》（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3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3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8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18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0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张国焘叛变后国民党军统内设立了以他为主任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开展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并派往延安百人之多的特务，经过研究，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决议中说：

“各地党要将反奸细斗争，认为是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任务。”“党与军队的负责人，要在各种干部会议中、党员会议中、军人大会中公开讲演锄奸任务的重要性，动员全党全军来担负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在有政权的地方，则要公开动员全体革命人民学校学生进行锄奸运动。”

“要有系统的考查干部和党员，坚决地同时是慎重地个别隔开地清洗敌探奸细托匪叛徒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采取一切的方法来防止这些分子混入组织，同时防止惊慌失措的态度及敌人诬陷同志牵涉无辜的阴谋，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

10月10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题目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决定。《决定》中说：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

《决定》号召全党：

“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10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延安。上午9时，36架轰炸机投弹103枚。

下午1时45分许，敌一架侦察机窜入延安上空，往返盘旋达1小时之久。2时40分，35架轰炸机分3批相继窜入，轮流轰炸，投弹122枚，直到下午4时30分才离去。

此次轰炸死伤60余人，大批房屋被毁。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杨家岭沟下修建一座大礼堂，所需的木材要从劳山运来，而要用的石头则是就地取材。这采石场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仅一沟之隔，大声说话都能听到，一放起炮来动静就更大了，直震得窗户抖抖索索嗡嗡作响。采石民工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就根据他的作息时间，改在上午10点才开工，下午3点以后才放炮，晚上8点就收工。

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蒋泽民随着毛泽东来到了采石工地。准备收工的民工们有的收拾工具，有的坐在石块上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们打着招呼，在几个民工旁坐了下来，询问他们是哪里人，都做过什么工？民工们有的说是当地人，有的说是附近农村的，给边区政府修过银行，大多数活是打窑洞，农忙时就回家种地。毛泽东问：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一个民工乐呵呵的，他说：

“共产党和八路军来了真好，我们有饭吃，有活干，还有零花钱，这日子越过越红火。”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不错呀，出来干活，家里还有零花钱。你们村子里的人怎样呢？他们也有零花钱吗？”

“他们平时没有零花钱，秋后卖粮能换回一些钱。有的人家秋后卖猪也能换回一些零花钱。家家都能有点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你们农田里的收成怎么样？”

“只要天不旱，就有好收成。自从边区政府成立后，地主减租减息了，荒地都是国家的了，如果开荒，政府两三年内什么也不要，这日子越过越稳当。”

“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吗？”

“大部分孩子都上学了，只有偏远地方人家的孩子有的还没有上学。”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指着山坡问道：

“在这里修大礼堂行吗？山水下来能不能冲坏？”

一位老成一些的民工回答说：

“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沟很宽，保险没事。”

毛泽东故意问道：

“你们修这个大礼堂干啥用？”

民工们说：

“给毛主席开会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边山上，那个站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们还没有见着他。”

“你们为什么上午不放炮呢？”

“你这个老爷子还不知道哩！毛主席是上午休息，夜间工作。他太累了，我们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他一睡觉我们就休息，他一工作我们就干活。”

一位年轻的民工悄悄地问蒋泽民：

“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

蒋泽民告诉他说：

“他是管盖房子的，没有经验，到这里向你们取经来了。”

1939年11月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交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1章“中国社会”初稿，和他自己撰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部分，开始了紧张的修改工作。

11月2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1大队等部1500余人，分3路向河北涞源之水堡、走马驿、银坊方向进犯，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指挥机关和部队。

聂荣臻令第1军分区第1、第3团，第3军分区第2团于3日拂晓进至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令120师第715团一部及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牵制各路日军；令第1军分区第25团一部为二梯队。

11月3日上午，进犯银坊的日军第1大队在八路军一个小分队的诱击下，进入雁宿崖峡谷，被八路军主力前阻后截，包围在雁宿崖，战至下午4时，第1大队除少数逃脱外，辻村大佐以下530余人被歼，日伪军20（日军13人）余人被俘。八路军还缴获炮6门、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及部分军用品。

11月4日凌晨，敌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第2、第4大队1500余人，分3个梯队，再次由涞源向第1军分区腹地雁宿崖、银坊、营头扑来。

聂荣臻利用敌人求战心切的心理和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以第1、3分区部队和120师特务团等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集中力量再歼来犯之敌。

是日夜，阿部规秀率部越过白石口，进至雁宿崖一带，连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一个影子都没找到。日军把八路军已经埋葬的日军尸体一具具重新挖出来，用木杠子抬到一起，架上木柴，浇上汽油，点燃焚化，整条山谷弥漫着焚烧尸体的焦臭味。

11月5日，日军向涞源、易县交界的司各庄、黄土岭方向进犯，下午进至张家坟、雁宿崖、三岔口一线。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和第1团各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节节抗击，诱其深入。第1分区司令员杨成武见敌已上钩东犯，乃决心利用黄土岭以东寨头村至上庄子一线中的狭谷地带设伏歼敌。

11月6日，阿部规秀在八路军的诱惑下，果然兵分两路，向司格庄、黄土岭攻击东进。

11月7日晨，日军主力由黄土岭出发，沿山沟向东蠕动。

下午3时，当日军全部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域时，第1团、第25团迎头杀出，第3团和第2团从西南北3面合击过来，在群众的热情支援下，把日军团团围住，展开全面的猛烈攻击。敌人主力被迫聚集在黄土岭、上庄子附近东西走向峡谷的河滩中, 被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公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八路军100余挺机关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射击，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炮弹。日军依仗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寨坨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第3团紧紧扼守西、南两面阵地，第120师特务团也赶到了，从第3团的左侧加入战斗。日军伤亡惨重。

激战中，第1团发现远处一独立房舍附近猬集一群敌人，即令第1军分区炮兵连以迫击炮对其进行袭击。瞬间，炮弹在敌人指挥所附近爆炸。在独立小院中指挥作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被八路军迫击炮弹击中，顷刻毙命。

此战，八路军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900多人，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并用迫击炮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晋察冀军区颁发的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第1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人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

11月7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江苏溧阳水西村宣布成立，并在江南指挥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简称军分委。

毛泽东鉴于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在1939年8月间已赴延安，便决定将第1、第2支队领导机构合并，设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副主任；辖第2团、新6团、第4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共1. 4万余人。

江南指挥部军分委由陈毅、刘炎、粟裕、钟期光组成，陈毅任书记。

笔者在这里再插叙一个粟裕将军的婚姻趣事。就在1939年这一年江南指挥部成立前，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初次结识詹永珠，她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楚青。楚青是江苏省扬州人，生得是聪明伶俐，且喜爱看书。粟裕第一次见到楚青，可谓是一见钟情，立马给楚青写了一封夹有自己照片的求爱信。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青竟然把这封信撕得粉碎。后来，粟裕和楚青经历了两年的感情波折，这才“有情人终成眷属”。在1941年12月26日，粟裕和楚青结为终身伴侣。

11月7日这一天，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围攻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制造了“确山惨案”。

早在10月间，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用武力除掉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卫立煌便向第31集团军司令汤恩伯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为此，汤恩伯亲自拟定了进攻竹沟的方案，任命少将参议耿明轩（确山人）为进攻竹沟的总指挥。耿明轩立即纠集确山县长许工超、泌阳县长陈浴春、信阳县长马显阳等共同议定，抽调3县自卫团或联防队16个中队，约1800余人，进攻竹沟，指挥部设在竹沟镇河东黄岗。

11月7日，耿明轩签发了进攻竹沟的命令：“（一）确山县抽调自卫团6个中队，由该县大队长孙星南指挥，务于11月10日晚到达竹沟东部瓦岗，次日拂晓向竹沟进攻，先行消灭河东岸之敌继续攻占竹沟东寨门及两侧炮楼；（二）泌阳抽调8个中队，由张虎臣率领，于本月10日晚到达准备攻击位置，11日拂晓，以两个中队由磨角棚山西而攻占山顶，与信阳团队会合，以3个中队占竹沟西寨门楼，向镇内进攻，其余部队控制该寨以西高地，防止突围之敌流窜；（三）信阳抽调两个中队，由张健康率领，本月10日晚到达攻击位置，务于11日拂晓，由磨角棚山东面攻占山顶，与泌阳团队取得联络……”

此时竹沟留守处共有600多人，其中战斗部队近200人，另有竹沟县委组织的地方武装30余人，武器除100多支长枪和部分干部带的手枪外，仅有一挺苏式转盘机枪。11月11日拂晓，耿明轩亲自指挥确山县自卫团突然袭击竹沟镇东寨门，驻守东寨门的新四军指战员全部战死。河南省委、竹沟地委负责人刘子久、王国华、张旺午、危拱之等在西寨门楼组成指挥部，迅速组织全镇军民开展反击。这天上午，敌泌阳自卫团赶到竹沟西部，向西门攻击。11月12日，耿明轩重新调整部署，除信阳团队进攻毛家棚中原局印刷厂外，余部将竹沟镇团团包围，轮番进攻。是日夜，留守处500多人由参谋穆学礼、竹沟县委书记姜宗仁带领的两个班和竹沟青年队掩护，在担任泌阳联防中队长的地下党员段长贤、徐中学等人的配合下，分3批从西寨门突围。

敌人占领竹沟后，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和抢掠。耿明轩自己供认：“在我由河东岸，经东寨门沿途发现被杀尸具约有百余。”他们又在瓦岗西尖山屠杀留守处家属20余家。更有甚者，河南省委统战部长（即留守处交际副官）王恩久奉命“去确山与县长交涉”，竟被确山县常备队曹茂臣部残杀于确山西南之孤山冲。

“确山惨案”共有200多名抗日军民惨遭杀害，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抗战期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犯下的又一罪行。刘少奇、彭雪枫11月18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确山惨案”的情况，并用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张云逸的名义向卫立煌提出抗议。新四军军部在给卫立煌的急电中还提出了四项要求：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竹沟留守处工作人员速回原处办公；三、抚恤死难员兵，退还所抢劫之财物；四、惩办凶手许工超及其同谋者。《新中华报》、《抗敌报》、《拂晓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了社论和文章，揭露和抨击顽固派的罪恶行径。

欲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如何进一步破坏国共团结抗战？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39年9月16日同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3人的谈话记录，揭露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并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团结抗战、反对摩擦的大政方针和坦荡胸怀。国民党官媒对此却只字不提。尽管如此，蒋介石见到10月19日刊登有毛泽东谈话的《新华日报》后，仍然暴跳如雷，大骂新闻检察官是饭桶，并责令他们检查失职之责。这就是后来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早期，国粉们极力吹捧的抗战领袖！

**第39章**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

**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话说1939年11月7日晚，毛泽东观看了由侣朋编导、冼星海配曲、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的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

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向毛泽东介绍说，演出花钱很少，布景是从鲁艺借用的。毛泽东便找来队长陈明和侣朋、冼星海谈话，留他们吃饭，还赞助他们200元，用于开展活动。

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不幸以身殉职。消息传来，毛泽东悲痛万分，白求恩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

白求恩是在10月29日带领卫生巡视团亲临火线救治伤员，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因劳累过度，他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11月1日，白求恩受伤的中指发炎，他仍然坚持工作，在处理一名颈部丹毒发作的伤员时，受到感染，链球菌侵入血液，转化为败血症，发高烧。11月11日，白求恩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10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也要写信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3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马靴、马裤，请转交吕司令。贺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这天晚上，白求恩写了遗嘱交给身边的人，并嘱托说：

“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过了一会儿，白求恩又说：

“请转告聂司令员，建议他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前线，收容伤员。”

11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项英的指示电中写道：

“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军部应输送大批训练好的青年及尽可能抽一些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去加强苏北。”

11月间的一天早饭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党派科的寒光从杨家岭后沟出发，去找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赵毅敏，他刚转过山坳，就看到毛泽东窑洞前摆着十几条长凳，毛泽东吸着烟，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散步。寒光很想走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握手，可又想到毛泽东日夜忙于抗日救国大事，不能打扰他，便准备从一旁快步走过去。此时，毛泽东已经看见了他，健步向他走来，还伸出了手。寒光是第一次与党的领袖面对面站在一起，既兴奋又紧张，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青年同志，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

寒光赶忙回答说：

“主席，我叫寒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是韩信的‘韩’吗？”

“不，是寒冷的‘寒’。我正想改为韩信的‘韩’。”

毛泽东风趣地说：

“寒冷的‘寒’，不改也可以。不是有一首古诗说‘寒光照铁衣’嘛。”

说罢，他又问寒光上过什么学，做过什么工作。寒光回答说，他1930年在哈尔滨学院学习，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1932年在北满从城市转入农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在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3军做政治工作，代理第1军政治部主任，转战在南满和北满的广大地区，协助杨靖宇、赵尚志等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1935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8年五六月间回国到了新疆，在邓发同志领导下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刚到延安不久。

“好。”毛泽东说：“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仗，又在苏联学习过，还与盛世才打过交道，做统战工作很合适。统战工作很重要。统一战线是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之一。我们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千百万人，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说话间，一些中央领导人陆续来了，看样子是来参加会议的，赵毅敏也来了。寒光赶紧向毛泽东道别，又去与赵毅敏打过招呼，便离开了。

后来，寒光还是将他的姓氏改成了“韩”字，由“寒光”变成了“韩光”。

1939年12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在中央礼堂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白求恩大夫。在会场主席台的上方，高悬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挽词：

“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

追悼会开始后，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以低沉的声音，唱起了由朱子奇作词的《白求恩纪念歌》：

“秋风吹着细雨，延水奏着哀曲，从遥远的五台山，传来了悲痛的消息。

我们用无边的哀悼，来纪念您！

这里——河边的石头，山上的野草，也在为您流泪。

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您静静地安息吧！

在您的后面，全世界被压迫的兄弟，已经起来了，我们将追随您的光辉，高举新医学的旗帜，向着白求恩开辟的道路，勇往直前。”

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

12月1日这一天，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制造事端，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为第一线，以晋绥军陈长捷第61军为第二线，向灵石、霍县间之同蒲路进行破击。很快，决死2纵队陷入了日、阎两军的夹击之中，形势险恶。2纵政治部主任韩钧被迫致电阎锡山，痛陈陈长捷的汉奸罪行，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坚决自卫。阎接电后，立即宣布韩钧“叛变”，决死队为“叛军”，通电全国进行讨伐。

12月1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他写道：

“由于策动中日妥协的英法卷进了欧洲战场，由于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不一样，由于苏联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极大增长，由于日寇政治上积极组织汪精卫伪政府和军事上占领南京，特别是由于共产党与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及其对抗战团结政策的坚持，使得国民党内占统治力量的大资产阶级成份发生了动摇惶惑的心理，即动摇于联苏联共抗战或亲英反共降日之间，时局正处在一种转变的关头。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即转向国民党进一步联苏联共抗战的局面，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

“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方针，即是更加认真地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即一切抗战和民主的力量。”“组织这些力量的基本政治口号，应该是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实现三民主义和建国纲领。”

接着，他又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看《毛泽东选集》）的决定，决定中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12月3日，阎锡山密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19军、61军等部，突袭驻防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军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政卫第209旅和八路军115师独立第1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残杀县政府和牺盟会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史称“晋西事变”，又叫“十二月事变”。

12月4日，驻晋东南的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部袭击山西省阳城县牺牲救国同盟会《新生报》报社，编辑王良被活埋。

12月5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发动了第1次反共高潮。

12月6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左权、彭德怀、陈士榘、林枫、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

甲、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其详情如下：１、日寇占领隰县、大宁、蒲县后忽自动退出。２、正于此时，旧军61军、19军、73军突然联合，由午城、蒲县、隰县、永和、石楼包围6区新军196旅部。旅部3日在永和城附近被解决。在其它区域，旧军亦在积极调动，准备消灭新军及进步政权与进步群众团体。３、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

乙、我们方针：１、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２、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慌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战。３、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４、如叛军进攻八路时，应联合新军消灭之。５、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军委 毛 王

12月6日，晋西南新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拥阎讨逆，打倒汉奸”的统一战线口号下，以防御姿态反击围攻的阎锡山旧军。10日至15日，决死队第2纵队等部与第115师独立第1支队，在隰县东和宿、中村和中阳县暖泉等地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击溃顽军2个旅。尔后，向北转移，于27日突破离（石）军（渡）公路日军封锁线，全部抵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临县招贤镇地区。

12月8日，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奉阎锡山命令，率独立第8旅进攻决死队第1、3纵队，先后破坏了阳城、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沁水等7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二三百人，绑架上千人。

12月9日下午，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文化沟举办首届世界语展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被安放在显著位置。毛泽东的题词是：“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爱国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原来早在中央红军长征时，一部分世界语工作者随之来到了延安。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了一个世界语班，教员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世界语工作者王玉福兼任，培养出了第一批世界语急需工作人员。1938年5月6日，王玉福、黄乃、王仲芳等世界语工作者在吴玉章、徐特立等支持下，成立了边区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延安世界语者协会。1939年，世界语者协会创办了《延安世界语者》会刊。协会为了满足大家学习世界语的要求，除自己编印课本、小册子和世界语歌曲外，还与新华书店等单位联系，从西安、重庆等地想方设法购回了大量的课本和阅读书刊。

首次世界语展览会展出了大量国内外世界语运动方面的进步书刊，许多参观者留言要求学习世界语。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领导人也应邀参观了展览会。展览会获得了圆满成功，在延安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俄语的热潮，促进了延安地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12月9日，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的电报中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调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

12月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全文如下：

为补充我们6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

1. 对晋西南事件之估计：
2. 阎乘德怀同志去宜川谈判时机，发动进攻晋西新军，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

2、旧派与日本人之关系是联络好的，阎本人对投降与反共也是确定了的。但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邱仰睿、薄右丞、赵承绶等最反动分子则非常积极，有计划地造成投降反共局面，迫阎下决心。

3、阎与重庆某些投降分子是有联系的。

4、阎与汪精卫是有联系的。

5、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时期，未至实行投降时期。

6、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在投降派看来，他们在这两区是可能把抗战派压服的，但其实新军、民众、八路三者合计抗战派力量并不小，旧派与旧军内部均有矛盾，只要政策适当，抗战派是能够胜利的。

7、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

B、我们方针：

1、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1. 各有关方而，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中杨爱源、赵戴文等与王靖国、陈长捷等之间尚有若干矛盾，集中注意反对王、陈，各地新派应该搜集王、陈等罪状向阎告状，并设法拉拢杨、赵。

3、坚决保卫抗日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仅在与阎谈判时，可表示某些具体问题上让步。

4、对投降派军事进攻，新军应在防卫姿态下，即旧军攻击新军时，采用运动战给以有力与有利的反攻而消灭之；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打退旧军（最好用决死队名义）。

5、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即使如此，也不要怕，只要每区有三四千可靠兵力作核心，并掌握在忠实而能干的将领手里，采用运动战与游击战术，配合八路之援助与民众之援助，是能够打胜投降派的。

6、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7、口号应该是：（1）请求阎司令长官惩办晋西事变的祸首。（2）抗日第一，团结第一，反对分裂，反对内战。（3）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打倒摧残抗日力量的汉奸。（4）一切晋绥军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摧残抗日的就是汉奸。（6）山西军民团结起来，严防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7）山西军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以上口号应由新派公开宣传，但暂时不要写王靖国、陈长捷的名字，指出他们名字时，只用口头宣传。

8、八路军表面上应取调停态度，实际上积极支持新军。

9、为巩固晋西南阵地，总部除调还陈（指陈士榘——笔者注）支队一个团外，还应准备调一个团去。

10、为巩固晋西北阵地，120师应准备在适当时机，调一个团增强彭绍辉。

毛 王

12月9日晚，延安各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3大队操场上召开“一二九”纪念大会。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纪念大会开始，首先请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4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100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的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11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3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12月10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12月上旬，毛泽东终于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的修改工作。其间，就他自己编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曾向杨松和陈伯达等人征求了意见，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论证。

12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并贺龙、关向应说：

“你们对巩固4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4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4纵队。”“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4纵队，号召4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13日，毛泽东在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政治局会议上说：

“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月20日，毛泽东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参看《毛泽东选集》）一文。他写道：

“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的60岁生日。这个日子，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12月21日，毛泽东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满怀激情挥笔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参看《毛泽东选集》）一文。他写道：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2月22日，毛泽东设晚宴欢迎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来到延安。

马占山是在1939年冬离开重庆返回防地途经甘泉时，下车打猎，被炸裂的猎枪伤了左手指，拇指被炸飞，中指折断。他的贴身随从急忙把他送往延安医院急救。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前往医院看望马占山。他对马占山说：

“我看你伤势很重，大夫、医药，延安完全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

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世界知名人士，万一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作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

马占山也笑着说：

“不要紧，我死不了。”

毛泽东说：

“日本侵略军必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伪满地区还有其精锐部队，免不了要负隅顽抗，未来收复东北，要你搭个过渡桥。”

再说12月22日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在晚会上致词说：

“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马占山在延安住了两周多，伤势见好，已能活动，就在延安几位医生护士的护送下返回榆林。事后，马占山向毛泽东等写了表示感谢的信。

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山西新军和阎锡山各部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溶共为主不同。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摩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我们要提倡坚决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摩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从12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的一部重要论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写作之中。

原来他在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时，因受结构和篇幅的限制，在第2章中对有关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没有充分展开，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和论述。那时候他就计划在该书完成后，再写一篇这方面的专著。所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完稿后不久，他便又全力投入到了新的论著的写作之中。

这一天清晨，贺清华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收拾东西。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手中的笔不停地挥动着。桌子一旁的那盏煤油灯还在亮着。贺清华轻声说：

“主席，天都亮了，怎么还不休息呢？”

“噢，天亮了？”毛泽东向窗外瞥了一眼，一边写字，一边说：“好，好。再等一会儿就睡。”

该吃早饭了，毛泽东还在工作。贺清华从厨房打来饭菜，说：

“主席，该吃饭啦。”

毛泽东应了一声，没有抬头。贺清华轻轻地把饭菜放在一边，便出去了。约摸半个小时后，贺清华去收拾碗筷，却见饭菜原封未动，就说：

“主席，快吃吧，饭都凉了。”

“呵，我这就吃。”

毛泽东嘴里说着，身子却不动。贺清华只好端着饭菜，送到厨房热了再端来，毛泽东总算吃了几口。

这天晚上，毛泽东依然在煤油灯下写作。秘书来了，说：

“主席，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党小组决定让你休息，请你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卫士们等了好一会儿，见毛泽东桌上的灯还亮着，贺清华就又去劝了一回，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商量着让只有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去一趟。王来音是甘肃人，原名叫王来英，天生的大嗓门，常常是未见其人便闻其声，毛泽东说，你还是叫“王来音”吧。自此，王来音便将“英”字改为“音”了。他虽然年纪轻，个子小，可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人又勤快、活泼，毛泽东很喜欢他。这个王来音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带着大家的期盼，走到毛泽东跟前，坚决地说：

“主席，夜深了，你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了，该休息了。”

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

“噢，是来音呵，一会儿再睡……”

王来音不等毛泽东说完，固执地说：

“不行！我们要为组织负责。你的身体累坏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说着伸手就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炕头上。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笔，慢慢地站起身，说：

“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

王来音坚决地说。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移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走向炕边，躺在炕上睡下了，说：

“我睡下了，你们也该回去睡觉了吧。”

王来音灭了灯，掩好了门，这才高兴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他笑嘻嘻地对大家说：

“主席这回躺下睡觉了。”

一个警卫员也高兴地说：

“嘿，还是这个办法行。”

第二天早晨，贺清华和王来音起床后，听到下一班的卫士们议论说：

“嗨，主席昨夜又是一夜没睡觉！”

王来音急得直申辩：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么！”

大家说：

“你们刚睡下，主席窑洞里的灯又亮了，一直到天明。”

12月间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信，他拆开一看，非常惊喜，原来是在福建漳州分别已经8年的曾志已经到了延安。只见曾志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啊，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的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毛泽东看罢信，立即提笔写道：

曾志同志：

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毛泽东

第二天午饭后，曾志在一位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警卫员让曾志在叶子龙的窑洞里等候，他自己先去通报一声。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过来，紧紧握着曾志的手，高兴地说：

“你终于来了，很好，很好！走，到我那里去！”

曾志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见窑洞虽然比较大，可是非常简朴。窑洞的前半截是石砌的，里面摆着个小书桌，几张木椅凳，还有一张吃饭用的四方小矮桌，再就是几个木头架子上放满了书，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像毛泽东身上打着补丁的军装一样，有点寒酸。毛泽东示意曾志坐下来，关切地问：

“这么多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一直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潘汉年从白区来延安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但他同样没有你们的消息。我还以为你不在人世了！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

是啊，8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4次蒙冤，一度丢失党的关系，蔡协民惨烈牺牲，与陶铸的悲欢离合，真是百感交集！曾志向兄长般的毛泽东倾诉了别后8年的坎坷经历，最后，她告诉毛泽东说：

“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

毛泽东吸着烟，一直静静地听着曾志的倾诉。后来见曾志这么说，就点点头，他说：

“很好，很好！你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实践，总结经验，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学习方法很重要。你一直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工作，经验是有，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

曾志说：

“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一年。”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行，要学3年，至少也要2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了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自己的实践，去理解它，分析它，将理论变为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止100遍了，但遇到实际问题还要去翻，有时只看一两段就会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就是要这样经常读，重复翻阅才行。你现在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读它个两三年，将来对你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窑洞内的书架，又对曾志说：

“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毛泽东留曾志共进晚餐，他说：

“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曾志高兴地说：

“那好啊，我就吃一顿好的！”

毛泽东一听，愣了愣，立刻又笑了，说：

“哦，吃好的，吃好的。”

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1碗炒白菜，1碗烧土豆和一盘豆芽，豆芽上还带着豆壳子，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片。毛泽东把江青叫来了，陪同曾志一起吃饭。曾志回忆说：

“我们3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也不掐根，白水煮煮就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是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饭后，曾志不便久留，就起身告辞：

“天晚了，我该回去了。”

毛泽东说：

“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

曾志也不客气，就说：

“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

后来曾志在马列学院学习不足一年就中断了，原因是她东奔西跑惯了，心也野了，一听课就走神，一看书就犯困，那些马列主义理论词句根本进不到脑子里去。1940年春陶铸也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就出生了。

且说在12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中央对时局指示》中写道：

“各地的任务是：第一，必须依照中央过去的指示，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阶层。第二，深入群众工作，尤其在战区与敌后，要进一步依靠群众。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第四，极力巩固党的组织，严重注意秘密工作，千万不要疏忽。第五，在一切地方准备应付局部的突然事变。第六，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固性，绝不轻言退让。”“用所有这一切的办法，去巩固自己的阵地，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争取时局好转，争取继续抗战，并准备在局势逆转时足以应付一切。”“此指示只发到省委与师部，阅后即毁掉，下面由你们设法传达。”

12月23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等说：

阎锡山已令国民党军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决死队第4纵队，“晋西北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对此冲突，应采取的方针是：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山西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领有利阵地，采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新军反攻时，口号应是拥阎讨逆，打倒汉奸。”

同时电令罗贵波、彭绍辉率所属部队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

此时，赵承绶奉阎锡山之命，率部自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撤至兴县、临县、方山县一带，作进攻新军决死队的部署。赵承绶的司令部移驻临县后，召开进攻新军的军事会议，他请老友、暂编第1师师长续范亭参加了这次机密会议。当赵承绶传达了阎锡山消灭新军及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命令之后，续范亭在会议中借故脱身，策马飞奔岢岚县的中共晋西北驻地，立即向党委作了报告。

12月25日，胡宗南部先后侵占了八路军驻防的陕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5个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并调动大军准备进攻延安。

诸君有所不知，在此之前，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还设有县政府、县党部、邮政局等党政通讯机关，在榆林设有地方部队常驻机关，还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继续向已划定为陕甘宁边区所辖的23个县派任县长，造成两种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在任两年间，组织有绥德、清涧、吴堡3县保安队，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后，他也提出了一个“瓦解中共，并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赤化区域”的计划，并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增调400余人的保安队，在区内大量制造摩擦事件，迫害和暗杀八路军指战员及抗日人士，大肆敲诈勒索群众钱财。

朱德、彭德怀等人奉命通电全国，强烈反对国民党军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指挥八路军发起反击。王震率359旅与八路军留守兵团一道打退了胡宗南部的进攻，同时对何绍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何绍南吓得逃出了边区。

后来，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逮捕审判何绍南，并提请委任王震为绥德地区专员。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电文时特别写道：

“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对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毛泽东将电文修改为：

“查有绥米佳吴清警备区王震司令，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何绍南获悉边区政府这一道电文，再也不敢到绥德当专员了。边区政府又驱逐了绥德分区5县的国民党官吏，取消了所谓“统战区”及其政权，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带的50万人民获得解放，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2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120师主力由冀中星夜赶回晋西北，支援反顽斗争。

12月27日，毛泽东对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驳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中某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通报》中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中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5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730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等语。

毛泽东驳斥说：

“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7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化、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23县，现在剩下了20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报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显去，在内窝子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12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在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中写道：

“应付摩擦方针，已见中央过去各种电报，但在华中及江南应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办法。在淮北可激进一些，一般的与山东地区相同，除发展军队外，还应争取政权。如武装摩擦则应以武装还击之。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付一切摩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还击，绝不轻言退让。**在江南方面过去采取比较谨慎态度是必要的，但不应向战区多做报告，不应向他们经常请示，许多问题应相应不理。**如遇武装冲突有利时则反击之，不利时则转移被攻击之部队至有利地区再讲对付。同时大事宣传以争取中立分子之同情，以孤立反共最顽固的分子。”

12月29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在岚县史家庄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建立“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军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雷任民任副总指挥。

会议决定以决死4纵队全部、暂1师第36团及第120师第358旅部分部队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左纵队首先解决开府、马坊和方山城的敌人，右纵队首先解决阳坡、寨上和白文镇的敌人，然后进攻临县之敌，策应2纵队与晋西支队的北上。以八路军新第358旅第714团一部与保安第7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岚县地区，并对静乐日军警戒。以决死4纵队18团进占兴县，摧毁兴县、岚县旧政权和公安局，控制黑峪口，保障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以工卫旅两个团由岢岚开到兴县以北的魏家滩，相机消灭驻保德的顽军第200旅。以暂1师第37团警戒五寨方向的日军，调八路军警备第6团自雁北赶回保德、五寨间，相机消灭顽军杨集贤部，然后南下临县参加反顽作战。在文水、交城的工卫旅第22团及新第358旅的独立团第1营，消灭顽军暂编第1师第1旅薛文教部。

后来从1940年元旦开始，新军及八路军各部向赵承绶部进行自卫反击，1月14日即将赵承绶第七集团军总部所在地临县攻克。赵承绶率部向离军公路以南仓皇败退，沿途遭到新军截击，伤亡逃散，为数过半，一应军资器物几乎尽行丢弃。事后阎锡山向重庆国民政府除自请处分外，并请给赵承绶以撤职留任处分。

12月底，毛泽东历时10天终于在岁末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初稿。他给吴玉章写了一个便条：

吴老：

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吴玉章读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对一些问题也提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说：1940年1月初，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主席将大作在会议上演讲。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欲知毛泽东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演讲，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初期阶段所起草的一系列党内指示，为反顽斗争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这些文献值得认真研究。如12月6日给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的指示电，和9日“为补充我们6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还有他修改的以林伯渠、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在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是如何冷静地从全局利益出发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以看出他在突发事变出现的时候，对于事态发展的预见性和处理事变的原则性及灵活性。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无疑是后来者的教科书和光辉榜样！倘若诸君看完后边叙述的反顽斗争的精彩结局，便知笔者此言不虚了。

**第40章**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

**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

**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话说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全文如下：

1. 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其主要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大致规定如左：

甲，初级课程：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乙，中级课程：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丙，高级课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丁，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方面经常研究。 戊，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

三、右列课程，可作为初级党校、中级党校、高级党校的一般标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得增减伸缩之。在职干部则依其水准及其他具体条件来选择学习课目。但每人同时以学习一门为原则。

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应设法翻印中央出版的关于上述各课程的教科书与参考材料，同时编辑各种适合于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

五、必须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与学校中，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与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习和教育的工作。

六、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指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

七、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提高其质量，轮流征调干部入学，其因环境关系不能办党校者，必须征调干部送中央、中央局或区党委所办学校学习。

八、凡不识字的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必须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

九、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

十、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

　　 中央书记处

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女子大学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延安的作家、艺术家，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的文化工作者500多人。毛泽东为大会题词：

“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吴玉章在大会上致开幕词，王明作了文化统一战线问题报告，张闻天作了文化政策的报告。

此后，周扬、李维汉、李初梨等人分别作了国民教育、干部教育、边区新闻事业等方面的报告；冼星海、柯仲平等11名代表分别代表音乐、戏剧等界发言。

冼星海在发言中报告了音乐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情况。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复项英电。

此前，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联席会议，决定新四军在遇急变时向浙闽方向发展，并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中央。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1月9日，毛泽东开始带病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总结了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他的演讲共分14个部分：1、中国向何处去；2、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3、中国的历史特点；4、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新民主主义的政治；6、新民主主义的经济；7、驳资产阶级专政；8、驳“左”倾空谈主义；9、驳顽固派；10、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11、新三民主义的文化；12、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13、四个时期；14、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15、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在讲到“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说到了鲁迅，他说：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在结束演讲时激情地说道：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的讲演十分深刻，请他整理后马上发表。这个演讲最先发表在2月15日《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后来在2月20日，《解放》杂志98、99期合刊登载了此文，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参看《毛泽东选集》）。

王明则与大多数人的反映不同，他看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写了一首口语体五律：

《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通过了组织新文字委员会、少数民族文化委员会、鲁迅研究委员会等50余项提案，通过了宣言及《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总决议》。

会议最后选举了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吴玉章、周扬、李维汉、李初梨、江青、冼星海、柯仲平等97人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吴玉章当选为文化协会主任。

1940年初，毛泽东亲自安排3岁的毛娇娇去苏联找她的母亲贺子珍。黄土高原的气候是“夏日热得慌，下雨泥汪汪；冬天透心凉，刮风漫天黄。”这时候的大西北，风还是格外的狂，格外的冷，吹得人们浑身起鸡皮疙瘩，风卷起来的细沙碎石，打在人们的脸上、额头、鼻尖上，像刀割一样疼痛。

那天早上，娇娇坐在毛泽东怀里，朱德、康克清带着去苏联学习的朱敏，还有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王若飞的儿子王继飞，同乘一辆轿车向飞机场驶去。

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风在呼呼地叫，飞机在轰隆隆地响。娇娇不住地向四周张望，拉着爸爸的手，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

这是一架苏联的轰炸机，几个孩子看见这个庞然大物，竟然忘记了寒冷，一个接一个往飞机上爬。娇娇松开爸爸那温暖的大手，也跟着他们高兴地往飞机上爬。

此时的娇娇根本不懂得离别的悲伤，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孤独，会恐慌，只一味地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后面，在飞机上东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极了，和大孩子们一样开心地笑着。

毛泽东、朱德、康克清把孩子们的行李放好，悄然离去。飞机舱门也慢慢关上了。娇娇觉得飞机一阵颠簸，等她明白过来，飞机已腾空而起。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爸爸呢？他坐在哪儿呢？左瞧右瞧，都没有找见爸爸。她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身边。

这架飞机转到甘肃、新疆，最后到了苏联莫斯科。当有人把娇娇来苏联的消息告诉贺子珍的时候，贺子珍摇摇头，根本不相信。

“莫逗嘛，她怎么会来？”

贺子珍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也许是真的。当她见到娇娇的时候，一把就把娇娇搂在怀里，问着，亲着，亲着，问着：

“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娇娇。”

“娇娇干什么来了？”

“来找妈妈呀。”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

“我把娇娇带来了。”

贺子珍激动得泪流满面，哽咽着说：

“娇娇，我的孩子，我就是妈妈呀！”

娇娇也紧紧搂着她，哭喊着：

“妈妈！妈妈！”

离别两年的母女，终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聚在了一起。毛娇娇也见到了亲她爱她的大哥毛岸英和二哥毛岸青，一家人虽说是在异国团聚，其乐也融融。

1月15日，毛泽东在庆祝吴玉章60寿辰时发表了讲话，他说：

“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作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60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40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终于不变，这是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人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饥饿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定性。”

1月15日晚，毛泽东起草并发出“八路军将领致林主席蒋委员长等电”，全文如下：

重庆国民政府林主席，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行政院蒋院长，孔副院长，监察院于院长，立法院孙院长，考试院戴院长，司法院居院长，覃副院长，国民参政会诸参政员先生，中央党部各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西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程主任钧鉴：

据报，政治部陈诚主任在韶关演说，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事之真实与否未可知；然自汪精卫倡言八路军游而不击以来，好事人四方传播，竟以此为破坏职军信誉，破坏国共团结之口号，陈主任贤者，可信其不作此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然职军将士闻之，未免寒心，愤慨之情，殊难禁遏。仅以八路军抗敌所及，东至于海，北至于沙漠，可谓处在国防之最前线。敌国来华40个师团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者17个师团，占全数五分之二以上。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后退一步，归绥、大同、张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烟台、青岛、徐州、浦口、南京、镇江、无锡、芜湖，离城十里八里即飘扬我祖国国旗者，始终是八路军新四军。两年半中，我八路军伤亡达10万，而敌伪伤亡则达20余万，我军俘虏敌伪达2万，缴获敌伪枪达4万支。全军22万人，月饷不过60万元，平均每人每月不过2元7角2分。而币价跌落，实值15万元，则平均每人每月不过6角7分，全国无此待遇菲薄之军。有二三千人而升级为军者，有七八千人而升级为集团军者，我八路军则至今3个师，始终不予升级。八路军对于国家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毁谤之来，则为游而不击，谓发动民众为非，谓实行三民主义与抗建纲领为非，谓恢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为非，谓培植民众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为非，事之可怪，未有过于此者也。冰天雪地，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然而奋战未尝少懈，执行上峰之命令未尝少懈，遵循人民之指导未尝少懈，八路军之于国家于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一切怨毒之矢，不入耳之言，则集中于八路军，奇冤大辱，又有过于此者乎？我八路军在晋绥，在河北，在察热，在山东，收复沦陷区，建立根据地，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天经地义，至迫切，至正当也。而论者谓为非是，必欲破坏之。昨日败军之将，丧地之官，望风而逃，唯恐不及者，今日貌堂皇，声罄款，戟指而骂，挥军而进，从八路军阵后打入亦谓之“收复失地”，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游击队，取消我民众团体，杀戮我工作人员，百端摩擦，必欲同归于尽而后快，古今之奇事怪事，又有奇怪于此者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之后方也，区区23县，至今不予法律上之承认。且点线工作布于内，大军包围发于外，今日袭一城，明日夺一县，亦谓之“收复失地”，更谓之“打倒伪边区”，“消灭伪八路”。警报纷传，后方不固，摩擦事件，百次千回。而我前线犹死撑硬打，一步不退，八路军亦可谓无负国家民族矣。咸榆公路，陇海铁路，八路军必经之通线也。三民主义青年团，拦路劫人。特务机关，关卡林立。凡赴八路军之青年，一概阻拦，设立招待所，谓之“唤醒盲从八路者”。抗大学生，无走路之自由权，一经被劫，再无踪影。勒写悔过书，绑入干训团。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甚且盗窃八路军车，伪造八路军护照，物证具在，可以复按，如此例他，他可知矣。此等行为，伤国家之体制，毁中央之尊严，法纪坠地，遗笑万邦，其不可为训，亦彰彰明矣。特务机关，恣意横行，勾引八路军与共产党人员，立有赏格，上级200元至300元，中级150元至200元，下级40元至100元。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厉行破坏，则用无数万之金钱。在湖南则有平江惨案，在河南则有确山惨案。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不足，继之以《对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又不足，再继之以《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开训练班，上摩擦课，“限共”“溶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者又将重演10年前之惨祸乎？然而我八路军历千辛，冒万苦，忍辱负重，不敢告劳者，大敌当前，抗日第一，为国家民族负责，寄希望于光明之前途也。抗战两年半，全国事实昭示，军事有进步，政治无进步，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土豪劣绅，作恶无尽，彼辈发国难财，吃摩擦饭，黑暗重重，屈指难数。而官官相卫，壅于上闻，此亡国之气象也。古人有言，“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今且污辱及于苦战之军，纷扰及于后方之地，阻挠及于交通之途，此而隐忍，则国家民族危矣。凡此将士之呼声，德等未敢充耳不闻，默然不告，诚以如此下去，绝不利于抗战，绝不利于团结。再四思维，惟有请求钧座派遣陈主任诚，亲临前线，实地考查，究竟伤亡几人，俘获几事，复地几里，攻战几回，后方之纷扰几端，道路之阻挠几次，俱可一览了然。陈主任贤者，维护前线将士之心，至深且切，必不惮于一行。德等恭候莅临，如旱望云，如饥望岁，钧座一纸派遣之令，陈主任欣然命驾必矣。如此则流言可销，诬谤可止，纷扰可靖，阻挠可息，奸人可以敛迹，正气可以伸张，而前线与后方团结一致，抗战之胜利可期矣。所有请派陈主任诚到前线考查职军情形，以雪冤诬，杜摩擦，固团结而利抗战一节，敬谨上呈，是否有当，敬祈裁决示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第115师师长 林 彪 副师长 陈 光 政治委员 罗荣桓

第120师师长 贺龙 副师长 萧克 政治委员 关向应

第129师师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邓小平

晋察冀军区司令 聂荣臻 冀中纵队司令 吕正操 政治委员 程子华

山东纵队司令 张经武 政治委员 黎 玉

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新市沟举办了综合性的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毛泽东亲自担任展览会名誉主席。

这次展览分为边区概况一览、农业和工业3大部分，其中农业部分是这次展览中最丰富的内容。展览显示：边区种植面积呈上升趋势，1936年耕地面积仅818.630万亩，到1939年扩大到1004.019万亩。十几个重达30多斤的南瓜引起了群众的浓厚兴趣。洋芋、白菜、萝卜、番茄、木耳、金针等也出现在展览会上。南方的丝瓜、茼蒿以及美国玉米都已经试验成功。

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和边区领导人参加了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开幕式。毛泽东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同志们：

这个农展会，我还没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说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做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做出来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的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我们边区有23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摩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们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们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们讲一讲，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吃了摩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有许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们大家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摩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摩擦，将他摩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的窝子摩擦。

1月19日，毛泽东委托王稼祥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及东南局的《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项英同志并转东南局各同志：

一、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3连人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9000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10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

二、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是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哪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

三、在全国未公开投降以前，即现在的抗日反共局面继续下去的形势下面，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发展必然会引起摩擦，但只有发展力量，给摩擦者以反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坚持阵地和克服投降危险，反摩擦就是反对反共派、投降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促进分裂而是延迟分裂，阻止分裂，延迟投降，克服投降的有效办法，如不斗争，不足以巩固统一团结和坚持抗战。

四、皖南即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我们同意不再调，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五、同意4、5支队归中原局指挥，但在苏北扬州一带的部队，则仍归项英陈毅同志指挥。

中央书记处

1月25日，毛泽东就与国民党谈判条件不能让步问题为中央起草复南方局指示电：

南方局并告北方局：

来电悉。中央前电所提边区扩军等各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正当的，合理的，不能再让步，在彼方军事限共到处发展情况下，稍一让步，即可造成彼方向我进攻的机会，故如彼方能迅速承认我方所提各点，则可照此解决，否则，我们须考虑增加扩军数与经费数，并以晋察冀鲁4省及豫东、皖北、苏北全部划为我军防地，方于抗日有利。边区问题在目前形势下，不仅23县不能少，而且须考虑增至28县方能巩固后方，否则，敌在华北、西北之军事摩擦将无止境，抗日阵地将大受破坏也。

中央书记处

1月2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励。”

1月27日，毛泽东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文的大意是说：虽然陈士榘支队被攻，吕梁山八路军兵站线被消灭，八路军伤兵被残杀，晋东南7县八路军军政人员被残杀70余人，但八路军仍愿意调停新旧军之间的冲突，恢复山西团结抗战局面。

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

1. 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摩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

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2月1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2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摩擦的热潮。

1月2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书记处《关于晋西事变经过及解释方针的指示》：

甲、去年11月间进攻晋西之敌忽然自动撤退后，顽固分子陈长捷、王靖国等在阎锡山指挥下，即动员4军47个团有计划地进攻新军。11月29日陈长捷之61军包围驻在隰县黄土村之第6行政区专员公署及独立2旅，激战终日，政治主任韩钧率部突出重围。12月3日王靖国之19军在永和将新军196旅旅长白汉三扣押，同时向该旅进攻，白旅损失过半，余突出与韩钧会合，同时6区之保安旅209旅，因受旧军进攻与韩钧会合，共11个团向晋西北撤退，途中激战数次，双方均有损失。

乙、驻晋西北之赵承绶骑兵军郭宗汾之33军亦同时向晋西北新军进攻，晋西北之新军仓卒应战，但甚勇敢，旧军不支退至离石以南，现新军共约20团集中于晋西北。

丙、13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到晋东南后，秘商得中央军之同意进攻新军，并用武力解决第5行政区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12月9日由中央军93军刘戡部援助将沁水县府解决，击毙3、5两区长。陈铁军之83师陈武部将阳城县府解决。47军李其相部将晋城县府包围，激战4小时，缴去保安队公安局枪共400余支，死伤百余人，3科科长被击毙。19日14军彭毓斌部将壶关县府解决，县长洛洪章被枪决。21日40军庞炳勋部将陵川县府解决。26日27军范汉杰部之46师将高平县府解决，27军又将5区专员公署解决。除新军共被解决两团外，各县政府职员牺盟会及群众团体工作人员被惨杀者500余人，八路军干部被惨杀70余人，现旧军仍在准备联合中央军向第3行政区进攻中。

丁、当旧军进攻新军时，日寇在晋西南地区与旧军配合行动，并援助旧军粮食子弹。在双池镇日寇送给旧军大宗慰劳品，陈长捷部在兑九峪与日军互通电话并帮助日军招兵。19军王靖国部即委隰县汉奸维持会长为正式县长。郭宗汾军长对军队讲话云我们当前敌人是新军和八路军，我们向新军进攻时不必顾虑日军，他们不打我们并且还帮助我们。赵承绶电云现新军反攻如援军不能即到，我只有求第三者援助（指离石柳林之日军）。闻汪派人到太原向山西活动已非一日，阎曾派副官冯玉昆往返太原接洽，山西伪省长苏体仁曾亲到临汾与山西旧军方面联络，此等勾结敌人破坏抗战之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戊、新军态度为拥阎抗日讨伐叛逆王靖国、陈长捷等，直至现在新军行动仍向阎报告并请示，只是要求坚持抗日，惩办向新军进攻的祸首，并恢复牺盟会及群众团体组织，抚恤被杀人员家属等，并无叛变及不法行为。

己、我们对山西内部冲突始终采取调停态度，希望旧军停止进攻保全新军，继续实行阎之十大纲领，反对自相残杀。当冲突之始，彭德怀同志曾亲赴秋林向阎痛陈自相残杀对抗战之害，至今我们曾屡次向阎建议愿帮助调停和平解决，但我驻晋西南之陈士榘支队因被旧军进攻，猝不及防，致伤亡数百人，不得已现已撤至晋西北，旧军并截断我兵站线，杀死我伤兵百余人。

庚、各地对外解释应揭破旧军首领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4人自退出临汾后，一年半以来已事实上停止抗日，带领整个旧军躲在后面，在同蒲线抗日者均是八路军，新军。去春秋林会议以来，旧派积极反动，到处破坏新军牺盟及一切进步事业，反共反八路军，两个月以来，竟走到积极帮助敌人举行公开内战。新军之自卫行动完全是正当的。现旧军已占领整个晋东南及晋西南之一半，而中央军则积极援助之，八路军陈支队亦被旧军驱出晋西南，山西全境共产党被惨杀者在5000以上，如不设法制止，抗日前途是危险的。

中央书记处

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说：

“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

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武装自卫反顽进攻的指示》，他写道：

朱彭，杨，刘邓，并告朱徐，陈罗（朱瑞、徐向前，陈光、罗荣桓——笔者注）：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他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全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此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望山东亦坚决这样做。

中央书记处

1月3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致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的《关于晋西事变后晋西北当前工作任务的指示》，全文如下：

贺、关、甘及省委各同志并告朱，彭、杨：

你们须在最短期间内，完成下列各项任务：

甲、肃清晋西北全境的反动武装及反动官吏。目前主要注意河曲、保德、偏关及杨集贤之雁北全区直达平绥铁路。你们须指定可靠军政人员，率领必要的武装（以决死队及一部八路军临时混合编制而以决死队名义出之）限时向北完成此项任务，否则高双成、马占山、傅作义有乘机侵占可能，但你们对高、马、傅3部应取友好态度，力避冲突。高双成在保德部队，如不愿退，应让其暂驻。

乙、完成决死队的整理补充，提高其战斗力。

丙、完成政权的改造，从晋西北行署起至乡区机关止，均须掌握在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手中，建设真正的抗日人民政权，各级政府须根据民族革命十大纲领颁布具体切实的施政纲领，并认真实行之。

丁、整顿牺盟会，发动最广大民众加入，牺盟会要能够真正解决民众痛苦问题，要经过牺盟会在全境人民中普遍宣传赵承绶，王靖国，陈长捷、孙楚等投降叛变分子的罪恶，造成反投降、反汉奸与拥护决死队、八路军的热潮。特别注意迫近汾离公路一线的群众工作，准备南下讨逆的群众条件。

戊、完成120师与决死队南下讨逆的一切军事上、政治上、技术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工作要在2月15日以前完成（但究竟是否南下与何时南下须待那时决定）。

己、制定全境财政经济计划，并经过政府迅即发布春耕运动命令，务使不失农时。

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

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3万军民举行讨汪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题目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他说：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日本灭华的方针是坚决的。汪精卫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还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制造摩擦以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气愤是应当的，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对各部分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我们党的政策是两条：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其目的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

“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政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气，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大会发表了由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一份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通电中说：

“2月1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通电中所列“救国大计十端”分别为：“一曰全国讨汪”；“二曰加紧团结”；“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摩擦”；“五曰保护青年”；“六曰援助前线”；“七曰取缔特务机关”；“八曰取缔贪官污吏”；“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十曰实行三民主义”。

通电最后说：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实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以上两篇文章详细内容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笔者注）

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甲、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战方向两方面展开日益明显日益严重的斗争。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阻力，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阻力，全国人民的阻力，日本灭华的坚决方针，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的条件，就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使目前抗日进步势力和投降倒退势力形成了一个严重斗争的局面。双方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时局的好转，或者是时局的逆转。但好转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如有正确方针，加上全国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目前局面，争取时局好转的。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如果以为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只是一个逆转的前途，因而不去力争好转，只是消极地准备对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乙、最近日汪协定的披露，伪中央政府的准备成立，与蒋介石反汪宣言的发表，给了国内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一个新的打击，又给了抗战派联共派与进步派一个新的推动，这是对于争取时局好转有利益的。但是目前投降倒退势力不但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且有更加猖獗的可能，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还会继续发生。这是由于以汪精卫为首领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国内投降倒退势力相呼应，而抗日进步势力一时还不可能迅速团结起来去克服投降倒退势力的缘故。蒋介石宣言强调了抗战，但没有强调团结与进步，而没有全国的团结与进步，则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服逆转可能，争取时局好转，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而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事变），仍应提起高度的警觉性。

丙、为了力争时局好转，克服逆转危险，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下列的10大任务：

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

第二便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地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

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

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

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

第六便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

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必须加以坚决地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须加以肃清。

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没有这种军队，中国就会亡国。

第九便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

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问题。

如果能坚决地并具体正确地执行上述10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击破大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丁、目前宣传鼓动的口号是：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汉奸汪精卫；三、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四、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五、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一切反共的汉奸；六、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摩擦；七、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抗日民主政权；八、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九、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十、发展民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良工人生活；十一、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顽固派的阴谋破坏；十二、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三、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2月3日，毛泽东发出由他起草的《参政员毛泽东等为“华北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电》，全文如下：

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诸先生勋鉴：

近顷以来，此间迭据报告，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通令所属，略谓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行将莅临，主要任务在于搜集材料，证明此数省摩擦事件之发生，其咎均在共产党、八路军与陕甘宁边区。然后复返后方，向当局建议处理办法。并在下届参政会中提出议案，实行取消边区与八路军之特殊化，并乘机打击共产党。着各地特工人员，注意搜集材料，并配合党政军各机关，准备欢迎视察团，务达上项目的等情。鄙人等以事属离奇未敢置信。顷接尊处电示，始知果有视察团之组织。复查此视察团之团长、团员不仅无一共产党参政员被邀参加，且连第4次参政会中提出组织此类视察团之原提案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素以老成硕望公正无私著称之张一麟、黄任之、江悟源、张表芳等诸先生，亦无参加，在全体团长、团员中，除在二届参政会中，因发拥汪主和谬论而与共产党参政员及坚主抗战诸参政员发生剧烈冲突之国社党员梁实秋及国家青年党员余家菊两君外余皆国民党一党之参政员同志。由此等人选所组成之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收材料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该团之与特务机关配合行动，尤属事有必至。犹忆前年12月间，张君劢即曾著论主张取消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特殊化及取消共产主义。未几，汪精卫发表艳电，竟倡言反共。设该视察团之目的与汪、张无殊，尽可以汪、张文件为蓝本，在渝作出大文，撰成提案，何必当此朔风凛疾之际，冒此严寒，多劳往返。如以为非有实地视察之名，不足以收牢笼社会视听之效，则以此等有特殊关系之人物从特务机关手里收集向壁虚造之材料，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之视察报告书，痛骂共产党一顿，谓即足为反共、限共、溶共之法律根据，则亦仍属可笑之事。盖国内政治问题，原只能从合理之政治原则获得解决，岂有卖弄玄虚，而能真正解决问题者乎。或曰，你们共产党所云，未免估计不当，该视察团此行，盖十分正大光明，毫无腌脏龌龊之心理，其任务在于维系两党合作，立于团结与进步基础上，共谋边区等事之合理解决也。若然，则鄙人等所言幸而不中，而国事实获进步之益，鄙人等当于该团来延安时，准备以陕北特产之小米饭、高粱酒，接待诸参政员同人，与之对雪举杯畅论团结救国之大计，决不至慢待嘉宾也。敬祈贵处代为转达为荷。此复，敬颂勋祺。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林祖涵 吴玉章

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自然科学界和各机关、各学校的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在成立大会召开前夕，于光远和屈伯传曾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向他汇报延安自然科学办公室筹备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情况，请他参加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作报告。

大会开始后，首先由筹备人员致开幕词，报告研究会的筹备情况；宣布由吴玉章担任研究会会长，于光远、李苏、阎沛霖、孙鸿儒、屈伯传、丁仲文等7人为驻会干部。

大会推举蔡元培、曹菊如、饶正锡、李强、马海德、李世俊、祝志澄、傅连暲、刘景范、周扬、陈康白、屈伯传、武衡和于光远为名誉主席团和大会主席团成员；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名誉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研究会发表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

陈云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

陈云正讲着，见毛泽东来到了会场，便很快结束了自己的话。与会者们热烈欢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站起身来，发表了即席讲话。

可惜他这个讲话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会后，《新中华报》只刊登了讲话的一段摘要。后来，《新中华报》在3月15日刊登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则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讲话内容。毛泽东说：

“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改造社会是更好的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不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2月7日，毛泽东为《中国工人》月刊创刊号撰写了一篇既通俗又言简意赅的《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

“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各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

指示介绍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后方守备部队1939年的生产成绩：

“平均解决了两个月的粮食，一套夏衣，全部冬季鞋袜。给养大大改善，大部能维持菜蔬肉食，商业利润除总合作社外，全部约在12万元以上。使机关部队学校在物质艰难状况下，解决了可能和必须解决的困难，弥补了公费的短绌。”

指示中还说：

“现当阳春开始，应就这一经验在前线部队中广泛开展起来。”

2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及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全文如下：

朱、彭、杨、贺、关、聂、彭、吕、程、萧克、刘、邓、朱、徐、陈、罗、雪枫、胡服、项英、陈毅：

甲： 情况。一、日本对华方针依然非常强硬，除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资产阶级外，欧美派资产阶级现时还不愿意接受日本灭华的条件。二、欧战产生后，远东慕尼黑会议无迅速召开之可能，美日间矛盾还很大。三、苏联对中国影响日益增大。四、我们的强硬态度，使顽固派渐感棘手。五、国民党中除投降派顽固派外，多数不愿举行反共的战争。六、中产与小资产阶级不满一党专政，不愿反共。以上是国际国内的的一般情况。七、敌人在华中华北困守堡垒，多次扫荡均归失败。八、敌人与中央军同时进入广西，广西派深感地位危险，因此可能在皖、鄂两省对我减轻摩擦。九、自新军在晋西北完全胜利，在晋东南部分胜利后，阎锡山的投降倒退，受了一个打击，可能稳定于一时。十、自候如墉等投降派被我们消灭后，朱、鹿（即朱怀冰、鹿钟麟——笔者注）顽固派已感恐慌，南移至英河北岸，企图与庞炳勋、丁树本、石友三、高树勋打成一片，由南向北摧毁我直南及直豫边根据地，隔断我山东、河北之联系，而石友三业已完全变成汉奸。十一、韩德勤、沈鸿烈两个顽固力量日弱，绝无好转可能。十二、自我在陇东5县、绥德5县及富县取强硬政策后，顽固派气焰业已稍杀。以上是华中、华北、西北的具体情况。

乙：任务。根据上述情况，我应坚持中央的一贯的方针，并坚决执行中央2月1日政治决定，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而这一任务是能完成的。

丙：部署。为达上述的目的，我之部署应如下：

1. 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2万至3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武沪、沪杭、苏嘉3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3万至5万。

二、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

三、胡服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4、5两支队应由1万扩大到4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

四、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3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

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4万。

六、陈、罗、徐、朱将陇海路以北老黄河以南化为巩固根据地，扩大军队至15万，坚决消灭沈鸿烈，坚决建立政权，造成华中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七、刘、邓坚决消灭石友三及一切反动派，决不让朱、鹿顽固派稍微猖獗，将整个直南豫北化为巩固根据地。

八、晋东南是持久战争，朱、彭、杨直接指挥该区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目前应确实巩固现有的根据地，有犯我者不论何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此原则适用于任何地方），同时对旧军暴动区域实行部分的反击，保证对洛阳的交通线。

九、聂、彭、吕、程确保五台、冀中两大根据地，深入各方面建设工作，造成敌后的模范，将各种建设经验送来中央及北方局，转输至各地。

十、萧克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准备进一步向辽宁。

十一、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战略枢纽，中央给予直接帮助。

十二、对晋西南暂时只发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争。

十三、陕甘宁边区在中央直接指导之下，总方针是将23县全部民主化，造成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有进犯者，不论何部彻底消灭之。

十四、对扩大军队，在猛烈扩大的总原则下，在晋、冀、察、绥等省以巩固为主，从巩固中扩大中，巩固之。任何军队至少须有五成枪，力戒人多枪少浪费干部与经济力。

十五、收集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军队，信任他们，坚决打破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使知识分子工农化，抽调大批老兵、老干部进学校，使工农干部知识化。江南、皖南、皖东、苏北、淮北、鲁南、胶东、冀中、晋西北9地，须各办一个抗大分校，各办一个规模完备的印刷厂，各出版一个日报或3日报，晋东南及晋冀察边区两印刷厂须更扩大提高，贺、关应在晋西北办一个好印刷厂，出版日报或3日报，延安两印刷厂须更加扩大。大大发展军队与人民中的革命文化运动。

十六、所有各根据地均以自力更生为主，把外援看做偶然性。

十七、所有各根据地均以陕北、五台山两根据地为模范，各地均需学习陕北与五台山，按照自己特点而发扬光大之，陕北与五台山有输送经验给各地责任。

十八、以上任务限于一年内完成之。

丁：完成上述任务，依靠坚决消灭敌人及一切向我进攻之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但同时还依靠向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猛烈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极力孤立反动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团结一切比较进步分子，争取一切抗日知识分子，政权机关中不要排斥进步的中产阶级与进步士绅，在根据地上要发展广大的有组织的抗日自卫军，一切抗日人民均应使其加入自卫军。

中央及军委

中央及军委指示中提到的石友三，笔者需要在这里做个交代：

此前，在2月9日，八路军冀中、冀南和冀鲁豫部共17个团，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已经在平汉路东发起冀南战役，反击通敌反共的石友三部。

早在1月间，石友三部先后将第129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又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及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清河县大队大部战死。

第129师为了自卫，决定趁顽军朱怀冰部南撤、高树勋部尚在卫河以东之际，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军区部队，歼灭顽军石友三部及孙良诚部于卫河以西地区。2月9日这一天，第129师命令宋任穷、程子华率领参战部队追击与堵截南撤的朱怀冰部。2月11日，青年纵队第771团、冀南军区特务团等部在清河以西之狼窝消灭孙良诚部1个团；东进纵队第2、第3团及冀中军区第23团于威县东北之史家庄、枣科一带，与石友三部暂编第3师激战，歼其两个营；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造纵队、筑先纵队各1个团及第386旅第4团在清河西南中兴集一带，与石友三部第181师激战终日，阻滞其撤逃。接着，八路军参战各部将顽军主力包围在威县东南下堡寺、马呜堂、窑安镇地区，并发起猛攻。2月13日，孙良诚部3000余人突围南撤，逃过卫河进至南乐地区。石友三部连遭围攻，伤亡惨重，于2月15日夜突围西逃。东进纵队主力、青年纵队之第771团与冀中军区赵谭支队等部，立即沿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

此时，日伪军由河北广平、丘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出动3000余人进至广平、丘县间地区，向八路军进攻，以掩护石友三部。石友三部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向清丰东南地区撤逃。战至2月18日，八路军参战部队停止追击。此役共毙伤俘顽军2800余人。

后来在1940年4月间，石友三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受石友三节制的结义兄弟、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树勋部，二人矛盾激化。11月间，高树勋见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便与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策划谋杀石友三。12月1日，高树勋请石友三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热情款待。不一会儿，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借故离去，4名卫兵突然闯入会议室，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将他架走。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其活埋在黄河岸边。

石友三一生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先后投靠继而又背叛过多人，其中有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还有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时人称其为“倒戈将军”。这一狡诈之徒，没想到最终竟死于自己的拜把子部下之手。

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丢了卿卿性命。”

欲知后来国共之间的关系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军民讨汪大会上发表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中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联想到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早期有人企图否定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有良心的中国人是否也可以站出来问一声：“为什么要往毛主席身上泼脏水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谎言制造者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第41章**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

话说1940年2月10日晚，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他写道：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么，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究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摩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攻新军、摧残牺盟和残杀进步人员，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反对讨9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2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2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滕代远：

朱、彭、贺、关、滕：

甲、据南方局电，叶剑英见程潜，程表示如下：关于山西问题，阎对新军认为是纪纲问题，不能不讨伐。但中央对新军不能照阎的办法解决（即进剿），只能把新军调开山西使之立功，将功赎罪。由中央给经费，不归八路军，因八路军亦无经费。已电朱德转告新军，嘱其派人来行营商议等语。

乙、此间用萧劲光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斗争，并愿派人见阎，阎回电辩护其讨伐新军及攻击陈支队之不得已，但无坚决不能调解之语气，对八路军亦无强硬语气，对派人见闻谈判则云，我并不拒绝，如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等语。

丙、我们意见：1、阎在中央分化政策下，可能与新军成立妥协。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中央指挥，因为这些都是不利的。2、如朱彭接到行营电报，即转告新军领袖，要他们把行营的电报通知阎，表示新军仍旧拥阎，不超过阎而与中央联络，新军绝不宜派代表到行营或重庆去商议。3、与阎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而新军领袖则用电报与阎联络，表示希望新旧军恢复团结，共在阎领导下一致抗日。电报中只提此种愿望，不提处罚陈长捷等条件，语气须和缓些，放诚恳些，使阎面子上过得去，方有转弯余地，使阎与旧军觉得有希望，以利萧劲光前去谈判。4、于涛可留他在行（营）西北住两星期，那时如有用他之处，再决定要他去秋林。5、新军内部之团结，特别重要，梁化之屡次放出空气，新军3月内必有分化。此事请你们严重注意，新军应当独立自主求生存，求发展，八路军应多给以帮助。

毛 王 2月12日

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

　　二、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可依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以下几种党校和训练班：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

　　三、中级党校训练时间由半年至1年，区级党校3个月至6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2星期至2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

　　四、党校课程可依学生程度并参考本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之。

　　五、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因此整个党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均应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

　　六、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党校各种组织形式、会议以及课外活动，均应力求简单，以保证学生每日有8小时的学习时间，使学生在此时间内多多读书，而在此时间外，能多多休息。平均每日上课一次，约3小时，其余为自修时间。每周上课5次。

　　七、教学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之目的。

八、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小组会的集体研究只是帮助个人学习的辅助办法。自习为主的原则，无论低级和高级班都是适用的，但低级的班应取得教员的帮助。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生，应引导与帮助他们去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九、党委必须慎重地选择教授人才，学校中须有必要的专任教员。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在教员力量一般缺乏的现在情况下，可采用各班合并上大课的办法。

　　十、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为了这个目的，学校可专门指定一天为党日（每星期内5天上课，一天党日）。

　　十一、以学生程度及上述教学诸原则，学校应制定教育计划及教授提纲经当地党的领导机关审查之。

　　十二、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长由党委的负责人兼任，校长下设一总支委管理校内一切日常工作，总支委可分设教育科（管理教务）、组织科（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总务科。党委须派一得力干部担任总支书记。各班可成立一个支部，支委人数可依班的大小决定之。总支委及支委的基本工作，均为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

　　十三、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

　　十四、对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学生，首先应以消灭他们的文盲为主要的任务。只有在能看普通文件或普通信件识字近1000者，才能称为文盲之消灭。

　　十五、为了培养更高级的干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须有计划地尽可能地派送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到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

　　十六、以上办法一般适用于抗日民主的地区，在沦陷区及国内顽固分子、反动分子、反共分子的统制区，则应依照秘密工作的条件来办理短小精干的干部训练班。

　　　　　　　　　　　　　　　　　 中央书记处

2月20日，延安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他说：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11月12日召集了国民大会（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笔者注），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

2月20日晚，毛泽东为薄一波起草了致阎锡山的电报稿，他是这样写的：

长官阎钧鉴：

3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接着，他在电报稿下面又指示薄一波、续范亭等人说：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报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1拥阎抗日；2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4枪口对外，停止内争。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上述电报以薄一波的名义发出后，续范亭、戎子和等人也连续致电阎锡山，痛陈：虽然赵承绶、陈长捷、孙楚等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我们还是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这就给了阎锡山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于是，阎锡山复电说：“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续范亭早在1939年参加了秋林会议后，曾通过延安交际处，单独拜会过毛泽东，那次会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他1940年1月开始担任山西新军总指挥。

2月25日，毛泽东派萧劲光、王若飞持他的亲笔信到秋林面见阎锡山，面陈党的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亦无非受先生所赐，目前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阴谋，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未尽之意统由萧、王二同志面达”。

毛泽东还要萧劲光、王若飞告诉阎锡山：

“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弱可欺”，“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萧劲光、王若飞到了秋林，向阎锡山呈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又向各方转达了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赞成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锡山之地位的意见。

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把新军拉过去或者搞垮，他虽然扫荡了晋西南，却完全丢掉了晋西北，晋东南也让国民党中央军插了进去，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正当面临困境之时，毛泽东的信给了他一个既能保全面子，同时政治上也可挽回一些损失的机会。因此，不但他表示欢迎，连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王靖国、薄右丞等也表示欢迎。

在融洽的气氛中，萧劲光、王若飞向阎锡山提出了和平解决办法：

1. 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阎锡山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

阎锡山还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他答应新军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经过4天的谈判，阎锡山顺着毛泽东给的台阶走下来了，双方最终达成了新、旧军和八路军划界而治的协议，晋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阎锡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萧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抗战以来，端赖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使国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战第4年代，胜利业已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详情，萧主任当能面悉不赘。”

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他写道：

“上饶顾长官：第3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1940年3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和军委起草了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傅钟、陆定一、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林枫、赵林、陈士榘、黄骅、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的电报，全文如下：

朱、彭、杨、傅、陆、贺、关、甘、林、赵、陈、黄、刘、邓、聂、彭并转告新军各领袖：

甲、派萧劲光、王若飞赴秋林见阎，在秋林住4天，受到极大欢迎。当萧、王向阎及各方传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助新旧团结，拥阎抗日，赞助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某方改编，巩固阎之地位并力辟一切谣言时，不但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欢迎，即王靖国、薄右丞亦表示欢迎。

乙、我们向阎建议之和平办法如下：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领；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丙、阎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自了。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5、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6、阎对我要求恢复晋西兵站线已答应，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丁、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此种政策在现在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此次谈判业已成功。为保证此种政策之全部实现，必须实行下列各种具体办法：1、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2、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3、停止政治攻击，不骂旧军领袖，号召在阎领导下坚持二战区抗战。4、新军牺盟恢复向阎作报告的制度，政治工作报告梁化之，军事行动报告陈光斗，请他们指示。对过去事件可以不提，因阎已承认一切既成事实，阎所谓“自然演变不了自了”，即新军自动归他指挥，不受某方收编之意。5、新军牺盟派人到秋林见阎，恢复往来关系，晋西北提议派雷任民去，续范亭、韩钧、张文昂、刘岱峰、牛荫冠等均写函件带去，函内措辞诚挚恳切，表示坚决拥阎，恢复两军团结。6、晋东南新军派何人去，由朱、彭商薄、戎（即薄一波、戎子和——笔者注）决定。7、某方特务人员在阎处挑拨，谓薄一波不愿受阎指挥，又谓朱总司令与卫立煌通电，由卫收编新军，因此薄一波对阎应有所表示。8、同时加紧新军内部团结，巩固党的基础，防止任何外来破坏行为。9、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此种团结政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有与阎及旧军恢复团结，才能将外间一切阴谋家在阎及旧军方面之严重的挑拨离间、幸灾乐祸的行为加以击破。10、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过去的武装自卫是正确的，现在的恢复团结也是正确的，过去因旧军宣布新军为叛变，故新军不得不宣布旧军为逆军，现在则新军首先提出恢复团结，而旧军亦停止了对新军的政治军事攻击，故团结有完全的必要。

中央及军委

3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王稼祥关于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的方针与具体步骤给彭德怀的电报，全文如下：

德怀同志：

甲、反摩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即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笔者注）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4人及陕蒋、甘朱（即第10战区陕西司令长官蒋鼎文，第8战区绥远、宁夏、甘肃、青海司令长官朱绍良——笔者注）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23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在绥远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鲁、豫、皖4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或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双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守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证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3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3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泽东、稼祥

3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宣传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山西问题已和平解决，旧军与新军的军事冲突已经停止，并约定双方停止政治攻击，重新团结在阎司令长官领导之下，一致抗日。这是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团结抗战方针，由于阎长官的适当解决而得到的，同时是由于某方特务分子挑拨山西新旧冲突，以消灭阎系之阴谋被揭露失败所致。各地对外照此解释。

中央书记处

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唁电，向蔡元培的家属表示慰问，他写道：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家属礼鉴：

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毛泽东叩。阳。

3月5日这一天，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集中13个团，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反击屡次进犯破坏抗战的朱怀冰部。

早在2月初，国民党顽军鹿钟麟、朱怀冰、孙殿英等部进攻八路军太行区。2月中旬，朱怀冰部在武（安）、涉（县）公路以南、漳河以北，袭击八路军第129师先遣支队和青年纵队，多次制造挑衅事件。

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为反击顽军的进攻，决定集中13个团的兵力发起磁武涉林战役，消灭孤立突出的第97军朱怀冰部，争取鹿钟麟、孙殿英部中立。其部署是：

以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共7个团组成中央纵队，利用顽军第94、第24师接合部由北向南突破，消灭其第一线部队后，再东折消灭朱怀冰之军部及第94师；

以独立支队、第129师特务团、第386旅新编第1团一部为右翼纵队，由西南向东北进攻，首先占领并扼守南王庄、齐家岭，尔后分兵伸向北王庄、两岔口，兜击可能向西撤逃之顽军；

以先遣支队第1大队为左翼纵队，从东南向西北袭击顽军右侧背，防其南撤；以独立游击支队两个大队，在漳河以南地区选择隘路设伏；

另以第115师第344旅，第129师第385旅和决死第3纵队等部，在壶关、陵川地区牵制长治以南的顽军。

3月5日上午，中央纵队的青年纵队由冶陶出击，警备旅由石泊镇出击，同时向顽军第97军补充团发起进攻，战至下午4时，将其大部歼灭。敌余部向牧牛池东南溃逃。

右翼纵队于当日4时攻占南王庄、齐家岭，歼顽军1个营。3月6日晨，左翼、中央两个纵队于漳河以北分3路展开猛攻。3月7日9时，右翼纵队1个轻装团插至东南岗地区，阻滞了顽军南撤。3月8日4时，中央纵队主力于姚村以东截住顽军主力一部，经7小时激战，歼其3000余人。中央纵队另一部于当日拂晓在漳河南侧大河村歼顽军1个营。朱怀冰部主力第94师、第24师和新2师等部在第129师各部夹击下大部被歼，余部经横水南逃，途经临淇以北又被独立游击支队截歼一部，最后仅剩2000余人逃入修武境内。

为了争取蒋介石继续抗战，毛泽东命令八路军“适可而止”，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

3月9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调停。朱德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洛阳，向卫立煌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双方通过谈判，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

3月11日，磁武涉林战役结束。此战共毙伤俘顽军朱怀冰部及其他游击杂牌武装1万余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破了。

再说在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说：

“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所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指示同时强调：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

“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3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八路军总后勤部召开的技术干部座谈会，他在谈话中说，技术工作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会更加重要。他高度赞扬科技人员工作积极，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技术工作的地位。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3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3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3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说：

“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部队向彭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我军将来出路，是在中原，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部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面，使蒋、汪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立巩固。”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一份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要求袁国平汇报“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的具体措施，要他“逐一见告”。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提出：新四军要在敌人后方坚决地广泛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执行扩军计划，使1、2、3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0万左右人枪，使4、5、6及李先念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5万左右人枪，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等。

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央书记处1月3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已经一般地提到了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的学习等问题。兹对在职干部教育补充以下指示：

一、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可分4类：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干部；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

二、上述各类干部的课程，大致上可依如下的不同的次序：甲类 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 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但文化课须提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报。丙类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 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普通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

三、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党报为主要材料）；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

四、凡课本提纲、参考材料已由中央出版的，一律使用，不足的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解决之。

五、各课的进度，由各区党委、各省委及师政治部或军区政治部斟酌具体情形规定之。

六、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保证之。

七、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

八、凡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在可能条件下可将军队中和地方组织中（秘密组织除外）的同类干部集中上课，由党内适当的负责同志担任教员。党的领导机关可指定各科学习顾问（一人或一人以上）以便指导和帮助学习。

九、教学的原则，参看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

十、必须使所有在职干部了解，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法。在小组会和大课的前后，必须有充分的自习（预习或复习）。

十一、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

十二、各级党的组织须为在职干部解决必要的物质资料（书籍等），在经常预算内须列入在职干部所必要的费用。

十三、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今年五五为第一届节日。

十四、各级宣传部的报告须列入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省及区党委以上宣传部的报告，须寄中央一份。

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针对共产党部队在山东、华中的发展，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

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说：“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南北联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

在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国民党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89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92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2军骑1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何应钦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批示。在“方针”部分，蒋介石批示：

“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

在“部署概要”部分，蒋介石再次重申：

“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

在“附记”部分，蒋介石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他批示道：

“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

韩德勤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部署117师刘漫天部于3月底攻击违令进入本防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的新四军。

3月间，王明为了加强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出版了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出版过的那本“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本传前面已经讲过，中共中央曾经准备召开“七大”，王明就是为了抢占先机，制造舆论，要求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作为“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并不十分了解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

3月26日，任弼时根据中共中央2月间的决定，结束了驻共产国际的工作，和周恩来等人一起乘飞机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在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提议再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座谈一次。任弼时请周恩来再次谈到了王明回国后的情况，他的右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季米特洛夫听了生气地说：

“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

季米特洛夫还明确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任弼时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便决定由他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工青妇和西北局的工作，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项英、叶挺说：

“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顾（指顾祝同——笔者注）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3月30日，鼓吹“曲线救国”的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以陈公博为立法院长，温宗尧为司法院长，梁鸿志为监察院长，王揖唐为考试院长，陈群为内务部长，褚民谊为外交部长，周佛海为财政部长，鲍文樾为代军政部长。

1940年4月1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给国民党第90军的一封公开信：《八路军致友军90军书》。

据萧劲光回忆说：“1940年3、4月间，国民党第90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陕北人民纷纷揣测，有的说是该军将开至中阳、石楼一带，以便偷渡黄河，袭取我边区绥德地区；有的说是该军即将从山西大宁、永和渡河进攻边区。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明，对方不怀好意。大军压境，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当我们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毛主席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八路军致友军90军书》。”

毛泽东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

“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历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亟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及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与对方约法三章，建议双方互派联络人员，互相交换抗日情报，友好相处。接着，他又给萧劲光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萧主任：

一、此件即铅印500份。二、印出后以1份邮寄山西蒲县90军李军长，以3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90军61师，53师，109师师长，以1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50份寄富县嘱其散发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富县商人，以200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嘱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商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20份寄秋林王世英嘱其散发，以1份交新中华报登报并发广播，以1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泽东 4月1日

4月1日，中共中央就争取小党派及中间分子问题致电凯丰、董必武、叶剑英：

凯、董、叶：

一、蒋正在用决心实行宪政的允诺拉拢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孤立我们，同时把内战与摩擦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向我们进攻。

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中有反对内战、停止摩擦、实行宪政好意的要求，但他们对于国民党是内战的挑拨者、摩擦的主动者则不了解，他们对蒋实行宪政的口号允诺则有幻想。

三、我们对策为得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联合，必须同他们一起：（甲）提出反对内战、停止摩擦的要求，但说明谁是内战与摩擦的主动者，将反对内战、反对摩擦的口号抓在我们手中，指出只有国内的和平统一，才能真正地抗日反汪。（乙）要求实施宪政与民主政治，指出今天我们决不能以口头的允诺为满足而必须认真地实行，首先要求国民大会代表以改选及党派和爱国人士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利用具体事实揭破当局过去实施宪政之毫无诚意，说明在抗日反汪的斗争中实施宪政与民主之必要。

中央书记处

4月1日这一天，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配合，从4月10日起，对日伪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

4月2日，日军飞机第13次空袭延安。来袭飞机43架次，投弹52枚，毁房6间，石窑4孔，死马一匹，无人员伤亡。

4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的电报上说：

“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奋斗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4月2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3项办法：

1. 第52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二、第144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三、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

顾祝同最后请示说：“上3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

后来在4月5日，蒋介石回复顾祝同请示电说：

“查所拟3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

这是迄今查到的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档案实证。后因1940年夏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

再说4月3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报中，再次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被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他特别询问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

4月3日，毛泽东急电彭德怀说：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蒋90军的目的在强渡黄河攻取绥德。如我河防不守，则前后方联络隔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彼方沿淮河筑封锁线，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豫鄂西之道路被隔断。故对李文军之行动及李品仙之进攻值得严重注意。贺、关须准备以主力对付李文军，同时箝制高双成可能之南下，并抗御同蒲、汾离两线日军乘虚袭击。现颇感兵力不足，陈士榘支队恐不能东调。”

毛泽东要彭德怀除343旅外再抽调三四万兵力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彭德怀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原先发动总破袭的计划便暂时搁置下来。

4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电贺龙、关向应说：

“李文90军主要阴谋是渡河袭取绥德，威胁延安，切断西北、华北交通。估计该军实行渡河时，高双成可能南下袭击绥德、 米脂，日寇亦必乘虚攻击晋西北。因此请考虑：一、拒李、防高、抗日3方面如何布置兵力。二、现有兵力总数是否足够应付严重局面。三、陈士榘支队如东调是否不感兵力不足。四、王震旅无机动兵力如何解决。五、王震河防部署及作战指挥统属你们负责。”

萧劲光回忆说：毛泽东4月1日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名义起草的“公开信散发并登报、广播后，黄河两岸，边区内外，一传十，十传百，‘90军要进攻边区了’的讯息，不胫而走。顽固派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想反共，但又害怕别人公开指责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害怕丢掉抗日的旗号。毛主席写这封公开信，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个要害，用造成强大舆论的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占了主动，90军不能不有所顾忌，便没敢轻举妄动。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摩擦事件避免了！”

4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主张面前，经过谈判，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该线以南为阎军活动地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至此，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所发动的第1次反共高潮。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除山东和冀鲁豫外，基本上结束了两个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

经过此番打击，阎锡山这个第1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后来在国民党发动第2、第3次反共高潮时，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欲知国共关系此后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1940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是一个思虑缜密、详细周到、切实可行的群众性学习运动的指导纲领，体现了毛泽东搞教育、办学校的一贯思想，不仅正确引导了延安整风前后的学习运动，而且对于建国后的教育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指示》中不少内容，**如因材施教的方针，预习、讨论、座谈的学习方法，决定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42章**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

**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

**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话说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说：

“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陈毅接到命令后，与粟裕一起率江南新四军一部组成挺进纵队，渡江北上，开辟扬州、泰州地区。

读者诸君也许有所不知，此时的陈毅不但在军事上有大行动，而且在爱情方面也有一个独特的行动。有一次，陈毅在云岭看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从武汉参军的演员张茜扮演《一年间》中的新娘子，这位新娘子一亮相，全身红妆素裹，风姿绰约，竟然使年近不惑的陈毅出乎意料的激动。演出结束后，陈毅以一首小诗向张茜求爱，他写的是：

“小箭含胎初出岗，似是欲绽蕊露黄。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

这封特殊的求爱信，果然征服了年轻貌美的张茜。1940年春，陈毅和张茜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结为夫妻。有人说陈毅和张茜的结合，无论是新婚时的“郎才女貌”，还是多年后的爱情忠贞白头偕老，都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高层领导人中的理想夫妻。

且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为鲁艺题写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名和8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4月15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项英说：

“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能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项英说：

“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

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

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因与项英争执不下，便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东移苏南。他们认为，“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作可以开展局面。”“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完全迫使我军进入平原。我们应该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指示电，支持陈毅、粟裕等人的意见，他在电文中写道：

“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4月间，毛泽东为了揭破顽固派的欺骗宣传，让社会各界人民明了国共之间摩擦问题的事实真相，让王稼祥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将通过情报人员获取的6个国民党党内文件，集印成一本小册子，名曰《摩擦从何而来》，公开发行。这6个国民党文件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

《摩擦从何而来》一书的扉页有一篇《引言》，其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已为事实所证明”。“本书所利用之《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体即系最好之说明。”“我们发表此等事实材料之目的，不仅为将社会人士所关心之摩擦问题的真相披露，且为希望颁发此等文件和发动此等事件之有关方面，为民族国家利益打算，以抗战团结为重，正式取消此等文件，认真制止此类事件。”

萧劲光曾回忆说：“2月间，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了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什么摩擦事件是由于中共的‘不法行为’引起的。”“《摩擦从何而来》这本小册子一发行，社会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团顿释；反共顽固派则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此时的王明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与他抗衡，于是就一反目空一切傲慢自大的习惯，带头唱起了歌颂毛泽东的高调。他在讲演中说：

“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5个字：‘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始终一贯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

“第二，要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要学习毛泽东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要学习毛泽东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要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的精神。”

王明几乎把所有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如此动听的讲演，如此颂扬毛泽东，在当时党内外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东南局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史称第2个“五四指示”，全文如下：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摩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3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4、5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7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5月13日，陈毅接到第2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5月的一天，周扬向冼星海传达了中央准备派他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的决定，并告诉他说：

“晚饭前，毛主席请你到杨家岭去一趟。主席还说，要带着钱韵玲和你们的‘蜜果’小妮娜。”

这天傍晚，冼星海偕妻子钱韵玲带着女儿妮娜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学习考察的电影演员、编导袁牧之也来了。毛泽东说：

“星海同志，党派你们到苏联，有啥困难吗？”

冼星海笑了笑说：

“困难，我还没有想过哩。不过我怕完不成任务。”

“俄语会讲吗？”

“我们会学会的，主席。”

冼星海和袁牧之都这样说。毛泽东点点头，又说：

“斯大林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抗日战争以来，在最艰难的今天，是斯大林同志援助了我们。这次，你们如果能见到他，要代我向他表示问候。”

冼星海说：

“我们一定做到。”

该吃晚饭了，工作人员端上了饭菜，还有一只鸡。这是毛泽东特意让警卫员去老乡家里买来的。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鸡杂炒辣椒说：

“辣椒很好，我可以多吃一点饭。”

冼星海用筷子撕了一块鸡肉放在毛泽东的碗里，毛泽东笑着说：

“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

毛泽东殷勤招呼钱韵玲母女吃饭，还频频为她们夹菜。饭罢，毛泽东关照冼星海和袁牧之说：

“目前，还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有外交关系，你们到西安由统战部办理出境手续，但是护照不要写你们的真实姓名，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

钱韵玲拉了拉冼星海的胳膊，低声说：

“我倒想了个主意，你的名字可以随你的母姓，随我的母名，合起来就是黄训。”

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

“好得很，就叫这个名字。”

5月26日下午，沈雁冰一家和张仲实等人，跟着朱德一起来到了延安。

沈雁冰是在1938年底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到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的。1940年5月间，他离开了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了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奔赴延安的想法，尔后便随朱德来了延安。

5月31日，延安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著名华侨领袖和教育家陈嘉庚。陈嘉庚是应毛泽东电邀，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驱车到达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一个华侨世家。1910年，他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从二十年代起，陈嘉庚就倡导民主，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对日寇表示强烈抗议。抗战爆发后，他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主席，从此，确立了华侨领袖地位。1938年南京失守，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与汪的私人交谊，痛斥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陈嘉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赞扬。1939年冬，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于1940年3月25日乘飞机到了重庆。蒋介石隆重地接待了他，一顿饭花了上千大洋，这令陈嘉庚非常心痛。接下来在重庆的考察，使他对国民政府的贪污腐化、挥金如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驻重庆的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人员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特地去访问陈嘉庚，并赠送他陕北出产的羊皮衣3件，请他去参加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陈嘉庚表示，想去访问延安。董必武等立即报告给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给予蒋介石很大震动。5月间，陈嘉庚从重庆到了成都，蒋介石也来到成都，立即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请陈嘉庚参加。宴会结束后，蒋介石又邀陈嘉庚第二天同进午餐。饭后，陈嘉庚告辞，蒋介石又留他谈话。蒋介石说：“陈先生到成都后，是否它往？”陈嘉庚说：“还要去兰州、西安。”蒋介石又问：“尚往别处否？”陈嘉庚率直地告诉蒋介石：“如果延安交通方便，也要去看一看。”蒋介石一听就不高兴，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分明是不想让陈嘉庚去延安。陈嘉庚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本来就没有理由阻止陈嘉庚，又不好引起这个“财神”的反感，只好说道：“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此后，陈嘉庚费了不少周折，才经西安到了延安。

5月31日下午5点30分，延安城南门外5000多名来自各个单位、学校、商店的干部、学生、职工、八路军官兵和市民，集聚在公路两旁，欢迎陈嘉庚。当陈嘉庚与同行的李铁民、侯西反走下汽车时，“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边区卫戍司令萧劲光和吴玉章等人迎上前去，与陈嘉庚一行一一握手，陪同他们到边区政府交际处。

陈嘉庚稍事休息后，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大会，陈嘉庚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感到很高兴。”“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欢迎大会结束后，高自立、萧劲光设宴为陈嘉庚一行洗尘。

1940年6月1日上午，一批留在延安的归国华侨男女青年前往交际处看望陈嘉庚先生。陈嘉庚问他们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感受，他们回答说：

“蒋介石节节败退，半壁江山顷刻奉送日寇，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则向敌后挺进，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要抗战救国就得依靠中国共产党。”

青年们还介绍说：在归国华侨中，已有几千青年投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和前线浴血奋战，不少归侨已在血战中献出生命。抗日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的事迹，已经传遍延安和敌后战区。陈嘉庚听着频频点头，对华侨子弟为国奋战表示赞赏。

6月1日下午，陈嘉庚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学参观。朱德和康克清在女大迎候陈嘉庚。朱德赞赏陈嘉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合作，反对摩擦”的立场，他说，在这方面，嘉庚先生的立场和我们共产党是一致的。

陈嘉庚在朱德、康克清的陪同下，参观了女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观看了他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课的情景，还参观了女大附设的缝纫、制鞋车间，边参观边提问题。当陈嘉庚和女大的华侨学生交谈后，了解到还有不少华侨学生在延安鲁艺、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陈嘉庚作为一个教育家，对此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

参观结束后，陈嘉庚一行拜会了毛泽东。陈嘉庚没有想到，共产党领袖住的窑洞里竟然如此简朴，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制写字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还有一些乡村居民用的旧式家具。他更没有想到，毛泽东的衣着也非常朴素，神态安祥，亲切和蔼，温文尔雅，思路敏锐，和下属的关系很是融洽，实行的是真正的平等无阶级制度，这真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一番客套之后，陈嘉庚向毛泽东转达了海外侨胞的慰问，又询问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毛泽东说自己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睡觉。陈嘉庚劝他改变作息时间，保重身体。说话间，朱德、王明夫妇和一位南洋女学生先后来到，参加了座谈。

日落时分，毛泽东就在办公室里设晚宴款待陈嘉庚，由朱德、王明等人作陪。一张桌子上坐了10个人，没有桌布，只好用4张白纸铺在桌面上，摆上了4个菜，又特意加了一个炖鸡肉。毛泽东微笑着对陈嘉庚解释说：

“这是你今天来了，我们特意给你加的菜。邻居老乡听说我来了一位重要客人，把家里的一只鸡送来，让我招待你。”

席间，毛泽东还说：

“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陈嘉庚说：

“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后解决，此乃内部意见，稍迟无妨。”

毛泽东满口应承，他说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孤立顽固派势力的必要性。他又强调说，对国民党顽固派不经过斗争，是不能到达团结的。毛泽东还托他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

陈嘉庚表示说，一定负责到底。他也希望共产党能够宽大为怀，做出让步，不要和国民党搞摩擦，以至妨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以及全国各界合作抗战的局面。

毛泽东最后诚恳地说：

“共产党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意。希望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华侨如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

晚上，毛泽东、朱德陪同陈嘉庚来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

礼堂里既没有沙发，也没有椅子，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提前来到礼堂里的沈雁冰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得站起身来，向毛泽东走去。他们已经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致问候。毛泽东又与张仲实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晚会开始了，毛泽东和陈嘉庚互相致词。尔后，陈嘉庚毫无拘束地同毛泽东并排坐在木板上观看了由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陈嘉庚原定在延安只住三四天，因为他的秘书李铁民在参观女子大学时被汽车撞伤，送进医院治疗，一时走不了，所以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了解延安各方面的情况。

6月2日上午，陈嘉庚到医院看望李铁民，遇见了亲自为李铁民治病的卫生部长傅连暲，傅连暲告诉陈嘉庚说，他原来是闽西一家天主教医院的院长，红军到达闽西时，他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陈嘉庚对他经历很感兴趣，接连向他提了不少问题。傅连暲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介绍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等国际友人在敌后同军民一起抗战。陈嘉庚、李铁民深受感动。

2日下午，陈嘉庚应邀到抗大第3分校参加抗大师生欢迎朱德总司令返回延安、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欢迎沈雁冰、张仲实从新疆来到延安的大会。

6月3日至7日，是陈嘉庚在延安随意活动的时间。他每天从早到晚参观，不断思考，毫不疲倦。陈嘉庚对于延安市面上看不到乞丐，看不到无业游民和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感到奇怪，在与毛泽东会面时，一再询问是为什么？毛泽东便告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目标就是要使整个社会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通过实地考察，陈嘉庚看到延安的社会状况和他在国统区看到的情况大不相同，的确是两种制度两重天，在这里一是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捐税多如牛毛；二是领导人廉洁，薪金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称津贴，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丰厚薪俸，以及贪污舞弊、中饱私囊形成鲜明的对照；三是没有妓女，没有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四是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等级森严；五是治安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六是男女关系严肃；七是朴素成风。此外边区政府还提倡开荒，鼓励人民生产，并且实行县长民选等等。

这期间，毛泽东、朱德一再邀请陈嘉庚到毛泽东住处晤谈，毛泽东还多次到交际处同陈嘉庚会谈，并共进晚餐，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陈嘉庚的注意。在一次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了，不敬礼便坐下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他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还有一次，毛泽东陪同他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在一天晚上，毛泽东和他共进晚餐后，又到陪同他到来延安的一个国民党科长的住处，同这位科长交谈到很晚才回去。陈嘉庚对此感触很深，他说毛泽东能与一个小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

陈嘉庚经过考察，一再说收获良多。他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说：

“亲眼看到陕甘宁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这是克敌制胜之本。”

6月7日晚，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集会，热烈欢送陈嘉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欢送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相继致词。陈嘉庚兴奋地说：

“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通过访问，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6月8日，陈嘉庚悄然离开延安，要到山西战区“慰问考察”。陈嘉庚一出延安，就感慨地对随行团员们说：

“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毛主席。”

后来在7月25日，陈嘉庚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作了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如实地报告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说他是“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浇油”。陈嘉庚回答说：

“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以后，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室设在一个窑洞内，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英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碟上，然后去会客，及至会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后来他还回忆说：

“中国人民的希望在1940年我去延安时就看到了，去延安之前，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不知道要再过几十年，中国才会出一位伟人来治理好国家，振兴中华。到了延安后，开了眼界。延安没有见到一个乞丐，而在重庆乞丐满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虽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这就是政治好。去延安前周恩来副主席告诉我，延安有以10万计军队。但是到了延安几天都没有看到军队，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工农红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都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的衣服与老百姓的衣服同样，一时要认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当晚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世界上哪有用不着老百姓供养，而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的军队？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这样的军队。在朱总司令陪同我去检阅部队时，我看到了战士队列整齐，步伐有力，个个精神饱满，指挥员口令如洪钟，真是好军队呀！而想到国民党军队不顾民生，军风不正，四处强行抓丁，有的地方成为散兵游勇，变为侵扰百姓的兵痞。在延安毛主席请我们几位吃便饭，为了照顾客人多了一两个菜，虽然吃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很高兴，这才是为人民着想。而在重庆，大官们设宴请我们，花了很多钱，在那国难当头，在大后方大吃大喝，是吃人民的血汗，我心里深感难受，吃也吃不下去。通过那次回国参观的对比，我早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处叙及：在陈嘉庚到延安以前，延安还没有小汽车，中央领导外出都是骑马或步行。管理人员将陈嘉庚赠送的两辆小汽车，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说：

“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他坚持一辆让管军事的朱德用，一辆给延安的5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用。大家认为应该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再三坚持不要，众人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有一次骑马去枣园开会，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受了伤。朱德和5老都要把车让给他坐，车开来了，毛泽东仍然坚持骑马回去。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员悄悄把车叫来了，对毛泽东说：

“主席胳膊摔伤了，不方便，就坐这一回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

“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

说完就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再说6月7日，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谢振华受命带领10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到苏北敌后开展工作。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谢振华谈话，再三嘱咐他说：

“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谢振华佩戴上校军衔，率领穿着国民党军服化装成中央军校学员的干部队伍，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经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到达皖北。

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沈雁冰正在住处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突然来访。

“雁冰在家吗？”

沈雁冰听出了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忙把他迎进窑洞落座。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你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你们原谅。”

说罢，他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沈雁冰，又说：

“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沈雁冰惊叹不已。毛泽东又问起沈雁冰今后的创作计划，沈雁冰说：

“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沈雁冰听毛泽东如此说，十分感动，却又连连摆手，说：

“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前几天有人叫我去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因为丁玲他们都在那里。今天你劝我去鲁艺，我还是听你的。”

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沈雁冰的夫人孔德沚端上了晚餐，招呼毛泽东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那好，就打扰雁冰兄了。”

毛泽东饭量不大，吃了一些，便放下筷子，一支接一支吸烟。孔德沚劝他戒烟，他却摇了摇头，说：

“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毛泽东风趣地自嘲，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6月15日，陈毅将他与粟裕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项英、刘少奇说：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陈毅、粟裕决定将江南指挥部及所属北上部队移到茅山。粟裕率部离开水西村，过溧（水）武（进）公路，亲去茅山地区扩军。国民党第3战区第2游击区总指挥冷欣发现江南新四军主力有渡江北上的意图，连夜调集两个团赶来堵截。

6月18日，粟裕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亲自指挥反顽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各一部。接着，粟裕又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引诱前来“扫荡”的日军和顽军乒乒乓乓打了几个小时，双方才发现自己打的不是新四军。冷欣气急败坏地说：

“粟裕真厉害，我们上了大当，吃了大亏。”

后来在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渡过长江。江南与江北两支新四军部队胜利会合于江都县吴家桥地区。

6月21日，毛泽东发起的由艾思奇、何思敬牵头的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及刚回到延安的朱德和新哲学会其他成员5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开幕词和会务报告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哲学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毛泽东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得太不够了，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毛泽东问坐在他身旁的于光远：

“你是学什么的？是不是学自然科学的？”

“是。”于光远回答说：“我是学物理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毛泽东说：

“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不研究自然辩证法，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希望你多注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要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此后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演讲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了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了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演讲了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演讲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潮。

范文澜，字仲潭，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仅比毛泽东大40天。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26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脱党，“七七事变”后，在河南大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封沦陷后，在河南省委领导下进入桐柏山区打游击，1939年底抵达延安。

再说6月下旬，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新编第2旅主力在安徽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1938年5月，宋时轮、邓华曾用过这个番号，1939年2月撤销），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新编第2旅改为第2旅；第344旅改为第4旅，其第687、第688、第689团改为第7、第8、第9团；第6支队第1、第2、第3团编为第5旅；第 6支队第1、第3总队编为第6旅；另设1个游击司令部。

1940年7月初，毛泽东撰写了《团结到底》一文，他写道：

“抗日战争的3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19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

“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的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抗战的第4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7月间的一天下午，毛泽普所在的马列学院开荒队在收工时，突遇暴雨，学员们飞快地跑回住处。毛泽普则慢悠悠地走在后面，雨水淋湿了全身，走到毛泽东的窑洞前，毛泽东招呼他进屋躲雨，叫服务员找衣服给他换上，留他吃了饭。毛泽东说：

“刚下暴雨，延河涨水，不好过去。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很方便，行军床一架就行了。”

晚上，毛泽普向毛泽东汇报了开荒竞赛和步行百里背柴的情况。毛泽东问他：

“累不累？”

毛泽普老老实实地说：

“有点累。不过我们受得住。”

毛泽东说：

“敌人卡我们，我们不能坐着等着饿死。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两只手制服它。现在多打一斤粮食，就等于多生产一颗子弹，多打一个鬼子。”

后来毛泽普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处，与另一名教员共同担负警卫人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找到他，问某某警卫员最近有什么心事，某某公务人员学习如何，毛泽普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他只顾埋头讲课，不注意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说：

“据反映，你的课量太大，大道理太多，学生们受不了。讲课要注意效果嘛。”

7月12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朱德、王稼祥联名给周恩来等人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恩来、胡服、项英、陈毅、雪枫、克诚：

恩来电悉，我们均同意。

1. 叶、管（叶飞、管文瑞——笔者注）部已将顽军击溃，陈毅已抵苏北，并令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2、6两团过江，津浦路东淮北部队亦正往援中。

二、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不要截断皖省从敌区运私货通道。并请雪枫保护于学忠运饷弹道路，不要禁止通过，如通知我们时，我军应负责保护。

三、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毛 朱 王

7月16日，国民党在国共双方的谈判中提出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

早在6月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如下要求：陕甘宁边区以现状划界，包括23县；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建制，八路军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编为3个师；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人民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5省足够的战区；保证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补给；承认共产党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它游击区的行政权。

国民党在这个《提示案》中则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公署”，隶属陕西省政府。要求缩编八路军为3个军6个师，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设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限制其防地和抗日活动。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7月24日，周恩来带着《中央提示案》飞回延安，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共中央虽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绝不可能接受这个让自己困死冀察的提案，于是便提出了以华北5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的修正案。蒋介石立即予以拒绝。中共方面又提出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作战区域，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蒋介石仍然毫不通融。

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3路，1纵插到江苏泰兴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2纵插到黄桥以东，3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

新四军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陈泰运两个团。为了争取陈泰运、孤立分化韩德勤，战后新四军归还了他的被俘人员和枪支，得到了陈泰运在新四军与韩德勤冲突中不支持韩德勤的保证。随后新四军击败何克谦部，歼何部2000余人，何部一部战场倒戈。

新四军陆续占领黄桥、营溪、蒋剁、古溪等地，又乘胜攻取靖江东北之孤山、季家市、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先后建立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地政权。

欲知国共两党之间后来斗争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值得后人认真学习。文章中讲到的“同一性”和特殊性，斗争和统一，以及对时局的估计、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43章**

**“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

**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

**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话说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3人名义向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下达了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同时说明战役目的是：“1、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2、打破敌军西犯西安的企图，振奋抗战军民，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这一命令用电报发给晋察冀军区、第120师、129师和所属各区；同时上报中央。

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等人破袭敌人交通线的预备命令，还以为这只是他们部署的一个游击战中经常要进行的战役行动，不会涉及到战略问题。对于这样的作战计划，他当然是不会反对的。

关于中央军委对于彭德怀等7月22日的命令没有回复，聂荣臻是这样说的：“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1940年8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对彭雪枫、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4纵队进行改编，以新2旅、南下的苏鲁豫支队等部为八路军第5纵队，辖3个支队9个团，20000余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东渡运河，开辟淮海根据地；余部仍称第4纵队，辖9个团，17000余人，以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委，执行坚持豫皖苏边区和向西防御任务。

毛泽东指示中原局说：苏北反摩擦，应严格坚持自卫立场，可向韩德勤公开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8月3日，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出生了。此时，江青26岁，毛泽东47岁。小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这是他的第10个孩子。杨开慧所生的3个男孩，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幸存，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时又被打伤，落下了病症，父子们分离多年，直到现在还都不在身边。贺子珍所生的6个儿女，除了送人的夭折的，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女儿娇娇也远在异国他乡。如今江青生了这个小女儿，怎不使他爱怜有加？毛泽东让小女儿随了母姓，名叫李讷，取意于《论语·里仁》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特别欣赏这句格言，因为它与自己的“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理论有些相似之处。

李讷相貌清秀，宽额方脸，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均像其母。江青不溺爱孩子，她认为从小就应当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后来当李讷刚会跑时，她就坚持不让人去扶，跌倒了让她自己爬起来；一会说话，就让她见人问好；两三岁时，开始教她学唱京剧，有时随着留声机唱，有时亲自教，还教她学习表演各种动作。

据徐明清说，江青后来在1941年又怀过一次孕，但她和毛泽东都不想这么快再要孩子，便去做人工流产，没想到那位医生一时疏忽，竟把一块纱布忘在了子宫里，引起高烧不退，生命出现危险，不得不又进行了子宫摘除手术。为此，徐明清曾到医院去看望过江青。此后，江青为恢复健康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再说8月4日，日军飞机27架次分3批空袭延安，投弹100多枚，死伤6人，牲畜34头，毁房5间。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3人名义发出破袭正太路《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击战术之一般指示》，规定参战部队仍然是22个团，并说明这次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的程度，破坏工作为这次战役成果最中心的环节。

8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教育部起草了《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

一、**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各省委、区党委、各政治部，尤其是这些环节的宣传部，须经常地计划、指导、组织并检查这一方面的工作。

二、当前策略教育的材料有以下各种：（1）党中央的宣言、决议、决定及其它关于策略的指示；（2）中央领导同志的讲演、报告和论文；（3）党报及其“文摘”中关于党的政策的重要文章；（4）中央宣传部将要发布的政治情报；（5）当地高级党部关于策略的指示及策略经验的总结。

三、在公开的环境中，党的领导同志或党的领导机关在集体研究上述材料后（党的正式文件须在领导机关即党的委员会研究），须分别地召集负责干部会议和普通干部会议作报告，在他们研究之后，经过他们传达于普通党员中去。凡属有非党干部在一起工作的机关或有非党干部一起学习的学校，同样须给非党干部进行一般的公开的策略教育。一般的讲演，可集合党员同非党员一起进行。这些地区的在职党员的支部，须在领导干部的领导和帮助之下，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和党员中的策略教育，把它当作支部工作的重要部分。

四、在秘密的环境中，亦须利用个人研究的方法，有直接工作关系的干部间之集体研究的方法（如委员会内部、机关内部、党的小组内），来加强干部的策略教育。当地高级的领导机关，须负责选择材料，并将他们综合起来使之便于传达给干部，便于研究。研究中的疑问，上级党的领导机关须设法给以解答。

五、在“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联共（布）党史”及“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的教授、研究和学习中，须尽可能充实策略的部分或方面。

六、在各种干部学校中，除开充实策略教育课程外，尤须注意提高教员及其他教育干部的策略知识的水平。为此，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有计划地给他们作策略经验和策略知识的报告，帮助他们研究，在可能的不妨害秘密原则的条件之下，供给他们以策略教育的材料。**要纠正忽视提高教育干部策略知识的观点。**

中央宣传教育部

8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甲、根据七七中央决定**必须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在友军中则须扩大交朋友工作以便争取200万军队继续抗日，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你们必须根据这一决定检查你们自己的工作。

乙、3年以来有些地方党及部队根本不曾有系统的进行这种交朋友的工作，根本忽视这一工作，尤其是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以来，许多干部甚至某些重要领导干部，认为国民党及中央军都是顽固派，我们方针只是对立斗争与准备破裂，也不研究国民党的内幕了，也不研究各个中央军及非中央军的具体情况了，也不研究各个社会阶层的动态了，也不研究自己干部中的旧有社会关系以便利用这些关系开展交朋友工作了，也不研究宣传鼓动的内容形式了，也不研究统一战线的组织方式了。对于统一战线工作机关（统一战线部或连络部）及其工作人员，没有指导，没有检查，没有督促，大家觉得无事可做了，甚至根本没有设置这种机关。对于中央屡次号召加强统一战线的指示，有些人竟把它当作耳边风，当作官样文章，实际上置之不理，一味骄傲自大，等待内战，或悲观失望，束手无策。所有上述情形，是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内严重地存在着，因此许多地方对中央的报告中，只有战斗报告或其它工作报告，而很少或根本没有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央现在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凡属存在着上述错误现象的，必须立刻改正，必须在党内开展自我批评，总结过去3年的经验教训，发扬有成绩的地方，改正有错误的地方，中央现在等候着你们在电到1个月内用电报发出你们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带总结性的专门报告，尤其着重的是关于对友军工作的报告。

丙、**研究对待各友党友军及各阶级阶层的策略问题，是各级干部尤其是中级高级干部的中心问题。而要有正确策略，必须有正确认识，必须使自己及干部的头脑正确地反映各友党友军各阶级阶层的具体实际情况。**到现在止，很多干部对于当前抗日统一战线环境中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真实情况如何及其在每一时期与每一事件中的意图政策方针作法如何，并无正确理解，有的根本是模模糊糊，不闻不问，有的则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些干部的头脑根本没有政治化与策略化，必须明白，这种态度是不能对付行将到来之国际与国内的重大事变的，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加强对于干部的策略教育。而这种策略教育的首先一步，是引导干部精密研究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具体情况，及其在每一时期每一事件中的意图、政策、方针与作法。

丁、国际国内的重大变化行将到来，全党必须在精神上组织上有所准备，而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则是达到胜利的保证。我党在19年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但也有过严重的错误。在大革命时期中，有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又有李立三及苏区中白区中一切打倒否认联合（工人农民以外的某些可能部分）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这两种错误，曾使大革命失败，又使土地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现在是第三个时期，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经验，避免前两时期的错误。**在策略上，对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我们只反对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极少数人，而联合及中立极大多数人，以便各个孤立与各个击破那些坚决的投降派与反共派**。所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正确策略方针。**

8月20日晚8时，八路军各部破袭正太路的战役开始了，彭德怀在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人协助下，组织晋察冀军区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共计22个团，以正太路为重点，向华北地面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同时展开大破袭，攻克日军重要据点娘子关、井陉、涞源、东团堡、榆社等，断绝日军交通。

战役开始后，八路军很快又投入了大量兵力，实际参战的部队已经由最初的22个团增加到了105个团。

8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向彭德怀、左权报告说：破袭战役参战部队有“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苛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

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从此正太战役便称为百团大战。

8月27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蒋介石转报八路军兵力部署时说：“百团大战除职部之115师主力、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各部主力及决死队之请示参战，部署计105个团。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积极主动向敌进攻。”

8月31日，彭德怀在向部队发布的命令上是这样写的：

贺、关、荣臻、刘、邓诸同志并报毛、朱、王：

此次百团战役胜利中已暴露敌之严重弱点，是兵力不够分配，华北战场上之兵力缺乏，已抽调出去不少，因此引起我们考虑以下问题，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彻底毁灭全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并可引起华北战局某些变化，你们认为可能时请电告并同时准备继续扩大之。

彭德怀

1940年9月1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发出《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不放过一个敌探，不错办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制造一个敌人，不放过一个内奸，不冤枉一个同志。”

在初秋的一个上午，延安马列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通知教育处长邓力群、院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干事安平生和宣传干事马洪，要他们去杨家岭接毛泽东到学院作报告。邓力群一行4人刚走上延水河桥头，就和毛泽东相遇了。毛泽东开口问他们：

“你们4个风风火火地要干么子去？”

邓力群答道：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说：

“接我？嗯，我晓得了，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邓力群不好意思地说：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啦，很不像话。”

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说：

“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毛泽东故意环视一周，好像很认真的样子，说：

“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8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邓力群4人都笑了，谁也不说话。毛泽东看看他们，也笑了，一个劲地摇手说：

“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8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这一次在马列学院了解了许多情况，他作了报告后，在和马列学院的负责人分手时说：

“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9月5日，毛泽东给历史学家范文澜写了一封信。

原来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开始后，学术研究的每一场学术报告，毛泽东都要到场，吸取别人的长处，学习自己未精通的学问。他对范文澜讲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非常重视，听完报告还要向范文澜索要演讲提纲再读一遍。范文澜在9月初的第3次演讲，毛泽东因病未能参加，便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3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毛泽东

9月10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八路军以一部分作战部队转入休整，准备参加第二阶段作战。

在第一阶段中，八路军的口号是“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炮”。八路军每攻克一处，便使用各种办法，如爆破、火烧、搬拆、水淹等，将之彻底破坏。正太路大部被破坏，日军交通完全中断。

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百团大战时，告诫大家说：

“不要说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是游击性的反攻。”

9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指示中说：

“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一宣言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役，先向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的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将以缩小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华北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而给予200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万人民以良好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作用。”“一切大规模行动，应是更加有计划、有准备的，不应轻率举行。”“对于友军则不论何部，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中，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

9月13日午后，毛泽东睡觉起来对贺清华说：

“告诉老周，我们到中央医院去看看关向应政委。”

晋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关向应因长期鞍马劳顿，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久前才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中央医院疗养。

周西林开来了汽车，拉着毛泽东向中央医院驰去。中央医院在延安城北一二十里的地方。这个医院位于一座大山上，从下到上，是一排排整齐的诊疗室和病房。关向应的病房在最高一排的窑洞里。

毛泽东下了车，向山上走去。山高坡陡，天气又热，毛泽东和警卫员们吃力地走着，中途休息了两次才来到关向应的病房前。毛泽东轻轻地推开房门，走进病房，正躺在病床上的关向应看到毛泽东来了，便要坐起来。毛泽东赶紧走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问道：

“身体好些了吗？”

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忽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小姑娘，穿着洁白的衣服，戴着白帽子，她看到毛泽东，觉得很面熟，可又想不起来是谁，就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同志，对不起，医生说了，病人需要安静，现在不能会客。请你马上出去。”

“啊，对不起，小同志，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医院的纪律应当遵守，我马上就走。”

毛泽东谦和地微笑着，又对关向应说：

“好吧，你一定要安心养病。”

毛泽东走出病房，转身进了护士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他就问随身跟来的小护士：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小护士回答：

“我姓刘，人家叫我小刘。”

“噢，小刘同志，我有一点事想和你谈谈。”

小刘移过一张凳子，请毛泽东坐下。毛泽东询问了关向应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又询问了医院的工作，询问了医生和护士的生活学习情况，与小刘握手告别。小刘又回到关向应的病房，关向应说：

“小刘，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外面站着警卫员，反正是位首长。”小刘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是谁，我有责任执行大夫的吩咐，不准别人扰乱你的休息。”

“好嘛，”关向应看着小刘的那副脾气，不由得笑了，他说：“那是毛主席！”

“啊！”小刘听说是毛泽东主席，不由得怔住了。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望其他伤病员，他走进最北面的一个窑洞，见到了正处于昏迷状态中的老病号肖玉璧。

肖玉璧，陕西省清涧县马家村人，小个子，从小给财东放马为生，1933年4月加入陕甘红军游击大队清涧支队；1939年底调任边区贸易局副局长。

毛泽东看着肖玉璧问身边的医生：

“我们这位老战士患的是什么病？”

医生撩开肖玉璧的被子，指着他肚子上的几处伤疤说：

“他的这种病是由于几处掼穿伤没处理好，造成消化功能弱化，再加上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身体过度虚弱形成的重度昏迷。”

毛泽东关切地问：

“这可好治愈？”

医生说：

“其实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好饭就行了。”

“营养极度欠缺？”毛泽东非常惊讶：“到了难以维持生命的地步？”

医生点点头。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目前我们还很困难，把伙食全部提高做不到啊！”

他再度撩开肖玉璧的被子，看到密布在肖玉璧身上那疙疙瘩瘩的伤疤，总计87处枪伤、刀伤，眼睛渐渐潮湿了。走出窑洞时，他特别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中央配发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来，由院方负责取奶让肖玉璧饮用。

半个月后，毛泽东再次走进医院，专程看望肖玉璧。肖玉璧激动得挣扎着要坐起来。毛泽东轻轻地摁住了他，示意他别动，亲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并嘱咐医生一定要照顾好他的生活。

肖玉璧出院后，组织上决定安排他到家乡清涧县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这样便于家人照顾他的生活。肖玉璧想不到竟会被安排到张家畔那样一个小地方去当一个小小的税务分局局长，他质问组织部门为什么这样安排，得到的回答是：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更繁重的工作了。肖玉璧一听，立刻暴跳如雷，拍着胸脯说：

“我这身体当年4捆手榴弹都没能把他炸烂，七八把剌刀都没被捅翻，如今又不是上战场撕杀，怎么承受不了？”

他见组织部门的人一时没有表态，又气愤地说：

“你们不答应，那我就直接去找毛主席。”

说罢，肖玉璧径直来找毛泽东评理。毛泽东告诉他：要服从组织分配。肖玉璧急了，撩起衣服说：

“主席，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

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眼珠动也不动，平静地说：

“我不识数。”

肖玉璧没了招儿，只好前去上任，没承想这次竟掉进了钱堆里。

就在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肖玉璧从张家畔回到马家村的家，一个人紧随其后跟了进来。此人姓张，是肖玉璧儿时的玩伴儿，因他弟弟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这几年一直往国民党统治区跑，弄一些边区紧缺的物资过来，挣了不少钱。肖玉璧在贸易局时几次到国统区换油换粮，都是他帮的忙。

此后，肖玉璧应姓张的请求，帮助他将从外面搞来的一批土布卖给边区贸易部门，为此得到了姓张的100块大洋酬金。后来，他又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并投资与姓张的合伙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事发后，肖玉璧逃往盐池，企图从那里穿过长城逃往蒙古，最终在盐池被捕。

经查实，肖玉璧在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共贪污公款达3050 块大洋。陕甘宁边区检察署经过侦察取证，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根据1938年8月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表示不服，他说：

“不就贪污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这也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肯定不知道情况，他要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的！”

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问：

“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

林伯渠说：

“查实的数字是3050 元。”

毛泽东又问：

“他的态度如何？”

林伯渠说：

“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份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

毛泽东又问：

“你们的态度呢？”

林伯渠说：

“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主席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

毛泽东说：

“你记得我是怎样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后来在1941年12月，肖玉璧这个陕甘宁边区最大的贪污犯被执行枪决。《解放日报》如实报道了肖玉璧贪污犯罪的事实和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并发报了相关评论，以警示他人。

再说 9月20日，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在继续破击交通线的同时，歼灭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

此一阶段，八路军打了一些得不偿失的攻坚战，部队伤亡不小。

9月22日，叶挺、项英关于国民党军有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企图致电毛泽东等：

毛、朱、周、叶：

战区近来对我外表缓和，而实际加紧限制。缩小我在皖南活动地区，将友军靠近军部附近，形成包围，并密令友军以实力对实力，组织对组织，公开对公开，秘密对秘密，来打击和摧残我军周围之地方与群众组织，强迫接近我分子自首。停发我军弹药、器材（已有半年之久，4个月经费至今未发）。近日加调144师开入军部与3支队之间的地区（青阳以东中山镇、乔木湾、何家湾、六里丁、戴家汇），大构筑工事，双方步哨远则不过三五里，近则二三百米。该师师部与军部仅隔一个山，并有一部已入3支作战地区，在名义上为布放水雷与袭击长江，将我军作战地区划入该师范围。108师近有一个团开到泾县及军部以东地区，并诡计有可能派队进驻章家渡。该地区如此。144师、52师、108师一面将3支与军部截断，一面形成对我紧密包围。友军之一切移动和战区作战行动并未知道，也无通报。目前3支与友部之地区回旋甚小，特别在敌“扫荡”时，3支无法回旋，有被夹击之危险。我交涉抗议，彼则敷衍或不理。估计以目前局势，特别两党谈判之际，彼尚不敢公开向我进攻。但此企图和举动，显然系对敌人不作实际进攻准备，在形势突变中以便于随时对我攻击，使我困难防范与作战。前曾经联合要求重划作战地境，划清我友防地，均未理。当继续交涉，估计无成功。我军除严加戒备和遵守严格自卫立场外，但此种对峙形势恐难避免冲突。此情是否请恩来直向蒋、何提出抗议，并划分作战地境，以避免冲突。如此，在将来冲突时，以免彼方造谣责我。同时，请给以对策指示（请延安即转重庆）。

9月25日，叶挺关于国民党军第52师制造摩擦致电蒋介石、何应钦：

重庆蒋委员长、何部长：

窃52师与职部戍区密迩，纠纷叠出。前奉钧座电示，宜以大局为念，互让互助，职勉力奉行，无敢违怠。而该师殊未能仰体斯旨，仍不断向我军进行威胁。近如：

1. 职部兵站第3派出所（泾县东之马头）遭该师强令迁移，该站迫不得已让出，后撤十余里。二日该师又派兵一连强进住屋，遂使该派出所不能执行职务。

二、该师近两月来，时以演习为名，多至一团，少亦一连，于职部驻地附近进出不已，民心为之惶惑不安。

三、职部通信、采买人员于南陵、泾县区内，虽服装整齐，证件备具，仍遭其扣押毒打。近有职军职员在南陵旅社中被其毒打禁押，且强污以狎娼之名。

四、该师近于南陵、繁昌境内，多次召集民众大会，公开辱骂职军为匪军、异军等。

以上种种，虽遵转托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前往晤商，要求制止，而多诿为语误，变本加厉，后果堪虞。职迫不得已，谨电呈明，伏乞转令制止，实为万幸。

职 叶挺 有午

9月26日，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委员徐谦在香港病逝。徐谦是国民党的元老，他积极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共过事。毛泽东获悉徐谦逝世的消息，为他撰写了一幅挽联：

存亡攸关，抗战赖持久，而今正是新阶段；

死生同慨，团结须进步，岂能再抄旧文章。

1940年秋，边区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向边区政府反映，留守兵团在恳荒时占了他们的田地，并发生了其它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关注，他约见留守兵团及所属部队的十几位领导到杨家岭一谈。据莫文骅记载说：

“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萧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

‘今天请各路诸候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

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

‘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1940年10月3日，韩德勤调集了包括其精锐主力在内的26个团3万余人，兵分3路向新四军占领的黄桥进攻，其部署是：以嫡系李守维的89军、翁达的独立第6旅为主力，分别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

此时，陈毅、粟裕领导的江北新四军指挥部只有7000余人，实际参战兵力也不过5000人。韩德勤大兵压境，陈毅和粟裕议定，由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作战，陈毅则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

粟裕对于黄桥决战提出了3个方案：“一是乘韩德勤进攻黄桥时，我们以一部主力攻占海安。二是乘韩德勤还未向我们进攻，先以一部兵力向东发展，控制（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几县，并造成北进东台的局面，以主力守卫黄桥地区。三是以全力依托黄桥这一基点，采取攻势防御，将顽军歼灭在我工事面前。”

粟裕还对这3个方案的利弊作了比较，第一个方案好处是：“我们以主力进攻海安、东台，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并且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容易取得胜利。”坏处是：“假使韩德勤以主力向黄桥进攻，我们以主力向海安进攻，在韩军主力尚未被歼情况下，断不容易把海安攻下；如果攻海安不下，而把黄桥丢了，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士气，增加对方气焰，尤其给群众很不好的影响，可能群众会认为新四军是打游击的，不要根据地，不要后方，蹲不长，会走的，使以后发动群众增加困难；我们以主力袭击海安是一个大兵团的运动战，如果仍采取打游击的办法，把后方挑起走，那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个方案的好处是：“东进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那边他们部队少，战斗力很弱，我们东进去打他们，如探囊取物，可以绝对胜利；可以把东边那块地区很快创造成为根据地，以便同上海外围和江南连成一片，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我们东进，韩德勤会分一部兵力对付我们，并且还必须分一部兵力防止我们北进东台，这样，就使他的兵力分散，防御线宽，而利于我们作战；无论人力物力，我们都能得到迅速的补充；在东边创造一块新区后，可与西边黄桥地区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更有力地牵制敌人，取得战略优势。”但坏处是：“在韩德勤南下前我们就东进，将在政治上蒙受不利影响；他们在东边的部队是保安1旅和保安5旅，不是韩德勤的嫡系，在营溪战斗以后，保1旅就派代表来和我们接头，愿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如果我们东进，他们必定要依附于韩德勤和我们作对，妨碍我们统一战线的开展；我派一部东进，将使黄桥部队减少，那么黄桥未必能保卫得住；我们派部队东进，固可牵制、分散韩的兵力，但他如果下决心丢开东边，集中兵力来攻黄桥，攻下以后再回头去搞东边，这样对我就不利了。”

第三个方案的好处是：“以黄桥当轴心进行攻势防御，军事上的主动权仍然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利用轴心向左向右自由转动，用兵依然很自如；我们依托黄桥作战，是完全的自卫，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不仅广大群众拥护我们，上层人士也会同情、赞助，就是顽军的大部分官兵也会对他们的这种进攻不满；在黄桥作战，能得到群众有力的支援。”

经过讨论，新四军没有采取第一、第二方案，而是按照第三方案部署战斗。粟裕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

此时，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由于新四军的统战工作，对韩德勤已经心怀二志，保持中立，所以二李在接到韩德勤的命令后，只稍稍推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左路军保安旅又多系乌合之众，害怕被歼，畏缩不前。因此，进攻黄桥的实际上只剩下韩德勤本部89军1.5万人的中路军，形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粟裕便以第3纵队坚守黄桥，以第1、第2纵队隐蔽于敌主攻方向两侧，并先以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诱敌进入黄桥阵地前沿，即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一歼灭之。

10月4日下午3时，新四军第1纵队在高桥、周家庄一线将由古溪经高桥向黄桥前进的韩德勤军截成数段，其独立第6旅大部溃散，一部消灭，其第17团向古溪方向逃窜。战至黄昏，独立第6旅之大部被新四军第1纵队歼灭，仅有残余部队退守高桥西南之张家庄、八尺沟一带进行顽抗。

10月4日下午6时，新四军第1纵队仍在高桥附近与独立第6旅残部缠斗中，而第2纵队进至八字桥后行动不明。黄桥东面之韩德勤第33师正在集结，准备于5日拂晓总攻，其第2梯队已进至西官庄、刘家堡一线，有于5日拂晓配合第33师猛攻黄桥之企图。

依据上述情况，粟裕令第3纵队于4日晚12时以两个团兵力出击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以干扰其拂晓的总攻击，并配合新四军突击兵团夹击该敌；令第1纵队将围困于张家庄之独立第6旅残部交由指挥部特务营负责解决，该纵主力立即全部南下，经何家桥．太平桥向刘家堡、野屋基之韩德勤军侧后攻击。

4日午夜12时，新四军第2纵队已进占分界，与韩德勤军接触后即继续由分界向黄桥攻击前进。第1纵队已由高桥经八字桥南下。

5日凌晨2时左右，第3纵队两个团在黄桥东面袭扰韩德勤军总攻。韩德勤军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新四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很大。韩德勤89军第33师中一部突进了东门。情况十分紧急。粟裕把“前线指挥部”里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全体人员组织起来，编成突击队，亲自带队跑步冲往东门。正在此时，有报告说奉命增援的江南部队一个主力营老4团第2营己到距黄桥仅10公里的季家市。粟裕振臂高呼：

“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

部队士气大振，在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的率领下向敌人扑去，终于夺回了东门。

此后，新四军第1纵队经黄桥东北的八字桥插到东面的分界，第2纵队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的第3纵队完成了对李守维部的合围。

5日11时半，粟裕令第3纵队全部出击。在新四军的全面进攻下，韩德勤军第33师全部动摇溃退，在新四军第2、第3纵队东西突击下大部被消灭，一部向东北突围退至野屋基、何家塘之线，向其军部及第117师靠拢。

是日晚9时，韩德勤军大部主力已被新四军解决。粟裕立即下达追击命令：“（一）情况（略）（二）各部应不顾疲劳，不惜一切牺牲，不重缴获，而在于乘胜追击以占领海安。 （三）追击任务及路线区分如下：（1）第1纵队由现地（野屋基）经八字桥、古溪，向营溪、孙家庄，经胡家集渡运盐河，由海安以西向海安进击。（2）第2纵队由现地（何家塘）经太平桥、古溪以南芦家桥、小塔头桥、花园桥、祖师庙，由海安以南向海安进击。（3）第3纵队由现地（大焦庄）经分界、搬经、加力、花园桥以东，由柴湾镇以北渡运盐河，经立发桥绕攻海安东北，截断海安顽军向东台之退路。（4）各部自行酌派兵力打扫战场，收容伤兵，应将主力之大部迅速兼程前进，务于10月6日早晨到达海安。（5）我随中央纵队前进。”

但此时各部队因过于疲劳，同时由于退守野屋基之敌未能完全解决，因此没有达成于6日早晨占领海安的任务。

10月6日拂晓，各追击部队从八字桥、野屋基、黄桥附近分路向海安追击，乘势歼灭第89军军部，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失足于水中。韩德勤眼看败局己定，率残部向兴化方向逃去。

6日下午，新四军第2纵队与逃至营溪附近的韩德勤残部接触，战斗三四小时尚未解决。粟裕决定以第2纵队全力解决营溪之敌，而以第1纵队迅速出动，其先头部队经孙家庄由胡家集渡运盐河，务于1940年10月7日（次日）早晨确实占领海安。第3纵队则仍照原定路线追击前进。

从1940年10月4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黄桥决战以伤亡900余人的代价，歼灭韩德勤部11000余人，第89军军长李守维溺毙，独立第6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虏其33师师长孙启人，99旅旅长苗瑞林、117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10月6日这一天，日军由于在百团大战一二阶段中损失惨重而受到巨大震撼，便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日伪军深入根据地反复“扫荡”、“清剿”，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消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使抗日根据地遭到重大损失，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严重困难。

也就是从10月6日开始，彭德怀指挥八路军进入百团大战第3阶段，即反“扫荡”作战阶段。

10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叶挺、项英等人，关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移动方向，发出指示：

叶、项、胡服、陈毅、雪枫：

一、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摩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韩进攻陈毅部队，被消灭2000余。另有顾、冷一师到江边还有北渡增援韩之模样，而李品仙等也可在策应，但是次要的方向。

二、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3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下决心移皖北，由4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

三、苏北以全力击退韩之进攻，解决韩部。对顽方之李品仙、何柱国等力求和缓，惟同时应注意日寇之“扫荡”。日寇有可能配合此摩擦，四出“扫荡”我华中地区。

四、苏南新四军部队，应以游击战争坚持原地区。

毛 朱 王

10月9日，刘少奇关于军部应从速北移致电叶挺、项英等：

叶、项并报毛、朱、王：

一、桂军3个师已由五战区开大别山。另据立煌来人谈，鄂北东到有中央军，立煌亦到有中央军两个师，只据守据点。淮南路附近之吴山庙、高塘集到桂军一个师。

二、据确情息，李品仙在重庆令各部将于最近向皖东大举进攻。因我军在苏北之胜利，使津浦路东西直至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实为顽固派不能坐视之事。现我在皖东兵力薄弱（因4个团东进），且部队未整训好，在屡次战斗中伤亡数目甚大，棉衣未作好，今年路西灾荒我中心区又十分严重，故在顽固派大举进攻下只能以游击战争坚持，原有阵地不能巩固。

三、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阵地即用游击战争坚持，如不可能坚持即放弃亦可。因我如能巩固皖东、苏北、鄂北广大地区，使之民主化，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指挥部暂时不能北移，希夷同志及若干人员是否可以首先北来？如何处理望告，2、4支队及游纵如何策应亦望指示。

10月10日，沈雁冰偕夫人孔德沚随董必武的车队离开生活、工作了5个月的延安，奔向重庆新的工作岗位。“鲁艺”全体师生在桥儿沟西边、延河北岸列队欢送他们。沈雁冰夫妇微笑着挥手向同志们告别。

此前，毛泽东在和沈雁冰的谈话中说，中央希望他能去重庆工作，担任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沈雁冰爽快地答应了，并决定把一双儿女留在延安。临行前，他在向毛泽东告别时说：

“我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

“这很好嘛！”毛泽东风趣地对老朋友说：“你现在把俩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10月11日，项英关于皖南情况及军部北移困难致电毛泽东等人：

毛、朱、王并告胡服：

齐亥电（10月8日指示——笔者注）悉。“扫荡”皖南敌军被我追击，已向青弋江下游退走。希夷尚在泾县，明日回部，讨论后再作详报；现在我军已积极布置准备。最近32集团军指挥部移宁国，新增来88军（原在上饶）两个师，行动布置已至绩溪、宁国一带。附近友军（总共8个师）不久前曾有军官会议之举行。地方政府传说正在开会，显系战备，正从各方布置。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也不便移3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以便与3支地区连成一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

10月1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人，建议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巩固华中：

毛、朱、王：

1. 据各方情报，蒋、李将大举向皖东进攻，并有桂军两个团即将进入无为县讯（原无为有桂军一两团），江南军部北渡道路可能被切断。

二、现皖东兵力薄弱，在顽方进攻下只能坚持游击。我因苏北百事待办，拟即日去苏北。而张、邓两同志留路西，一老一新，在情况紧张时亦不无问题。

三、前次建议江南军部及3支队即速北移（因移苏南已不可能），你们意见如何？我意应速下决心放弃皖南阵地，或以游击坚持皖南，而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否则华中、皖南均不能巩固，于我不利。除华北外，如我再巩固目前华中已得阵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相当的保证，时局的好转亦有相当的保证。

四、目前华中部队仍过少，屡次作战，伤亡减员甚大，且未经过长期整训。地方干部更少，华北干部事实上不能到达。军部现有大批干部，并有工作能力的机关在皖南，又没有很多工作可作，故为巩固华中，应付摩擦与“扫荡”，军部及3支均以即速北渡为有利。望考虑速决电叶、项，办理。

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

叶、项、胡服、陈毅、黄克诚：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甲）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乙）省韩大败乞和，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理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部会合，而以主力占领兴化以北以东之广大地区（东台河以北归八路负责），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停止皖西进攻之师。而陈毅则不拒绝和议，一面整理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示我全为自卫不为已甚。我皖东部队，应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一面向桂军呼吁，反对内战，强调团结对敌。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毛 朱 王

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说：

“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摩擦在韩进攻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但胡服建议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一带战略要地，是必要的，可执行。”“对李品仙应力求和解，这是有关桂系与我们的整个关系。”

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并告叶挺、项英、刘少奇、黄克诚，电文中提出了同韩德勤谈判的主要条件，并请韩德勤及李明扬、李万里、陈泰运转告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谈判条件是：

“1、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2、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3、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

10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就建设苏北根据地问题又发出了3封电报。他在给陈毅并告刘少奇的电报中写道：

“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的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尊重李明扬、韩国钧等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问题，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在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的电报中，毛泽东写道：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但同时也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的颇大影响。黄、江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的著名代表，因此，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各方有关人员参加苏北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应设法同江浙民族资本家代表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联络，欢迎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写道：

“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

他在电报中还说，请周恩来等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外，同时亦对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加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10月17日，毛泽东为建设苏北根据地起草指示电，要晋东南、冀南及晋察冀下决心抽调300至400个有经验的党政军民工作干部，随杨得志部队南下，交刘少奇分配使用。

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

“皓电”最后以“中央提示案”的形式提出：限令大江南北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冀晋一隅，受阎锡山指挥，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还要求将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

10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粟裕说：

“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10月25日，毛泽东将周恩来的来电转发给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并说：

“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10月2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说：

“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向国民党及中间派及广大人民说明，贝当路线与英美路线两者的危险性，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再坚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期。”

10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说：

“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恐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

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央说：

“一、北渡因只能去工作人员少数与少数部队易于转移，而且要相当时间。因沿江敌人握有较密之封锁据点，易于暴露而遭敌、友打击。

二、仅少数或一部部队留皖南，依敌、友情况与地形条件，很难坚持游击战，必然限于靠近狭小地区，除非好转，相安无事，否则易遭消灭，或突破后方能生存，这又在政治上不便。

三、少数或一部部队留皖南，即或一时相安，但地方工作、广大群众组织均无法完全保持，绝大部分必遭打击和摧残。

四、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才能保证，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减弱北移。

五、坚持目前情形，当以加强江北为主要，以求控制华中一带，要坚持皖南，确难二者兼得。为了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如现放弃，将来不易取得这一个强固的支点。

六、目前总的方针，应有明确的政策，以便于各方之准备。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而不能形成顾此失彼等。应如何？请速示。”

10月29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电文中说：“国民党目前是从局部讨伐入手，一月满期后，国民党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他立即将这一电报转发给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

10月29日下午，彭德怀从黎城指挥部火速赶到武乡县蟠龙镇石门村，亲临前线督战，决心消灭在蟠龙关家垴驻扎的日军冈崎大队。

敌36师团冈崎大队指挥官为冈崎谦受步兵中佐，该大队此前接受的命令是奔袭八路军总部，即开展所谓的斩首行动。他们共有560人，其中军官16名，士兵544名；配备武器除步枪手枪外，还有两挺92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日军这区区500多人沿桐裕河谷进入了黄崖洞，顺利地破坏了八路军的兵工厂，从容撤退。**彭德怀闻讯大怒，命令将守卫兵工厂的连长就地枪毙。**此时冈崎大队已经连续奔袭16天，既找不到八路军总部，又严重缺粮，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便撤退到关家垴，准备取道武乡县再回沁县。

是日晚，彭德怀召集正在蟠龙镇附近休整的129师师、旅干部开会，正式下达总部的作战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129师386旅、新编第10旅各一部；陈赓指挥385旅一部和决死第1纵队25、38团各一部；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炮兵团的山炮连和迫击炮营，共计2万人，除一部分担任外围防御阻击任务外，其余兵力于10月30日凌晨4时对冈崎大队发起攻击。

关家垴是群岭环抱中的一个高高的山岗，山顶是一块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平地，其北面是断崖陡壁，东西两侧坡度较陡，仅有南坡较平缓，方便出入。南坡上住着50余户关姓人家，沿山壁修建了一孔连一孔的窑洞。南坡的对面是一个比关家垴更高的山岗，叫柳树垴，与关家垴互为掎角，从柳树垴上可以利用火力控制关家垴的通路。冈崎大队在关家垴构筑了简易工事，另派出一个中队占领柳树垴，在关家垴和柳树垴部署了一个防御阵地。

10月30日凌晨4时，八路军总攻开始后，山炮营的5门山炮前后发射几十发炮弹，居然极少击中目标，当即被撤下去，换上了迫击炮营，但迫击炮只能杀伤日军有生力量，却无法攻坚，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决死第1纵队38团经过2小时苦战，一举占领日军兵力空虚的柳树垴。这是一支新部队，战场经验不足，就在老部队撤走，新部队刚刚进入阵地的时候，遭到日军中队的突然反击，一个团几百名战士一下子就被区区几十名日军击溃，柳树垴阵地又被日军夺走。利用地形侧面包抄关家垴的385旅769团，被日军机枪火力压制得无法抬头，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的386旅772团，被日军交叉火力扫射，伤亡极大。战至中午，772团1营1连只剩下3人；3连只剩下指导员和2名伤员；14时，当1营被兄弟部队换下来时，只剩下了6个人。陈赓认为照这样打下去，损失会更大，便打电话给彭德怀，请示说：

“此处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是否可以把冈崎大队放下山来，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

彭德怀说：

“我的老兄，一旦放走日军，就很难再打着他了，必须在此将其消灭！”

陈赓说：

“这样打下去，代价太大了！要拼光了。”

彭德怀坚决地：

“就是拼光了，也要拿下关家垴！”

陈赓说：

“现在拼光了，将来怎么办？”

彭德怀说：

“拼光了自然以后给你补充！不能打硬仗的部队，留着也没用！”

陈赓有些急了，说：

“这样打法，我不赞成！”

彭德怀说：

“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命令必须执行！”

说完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129师又打了几个小时，伤亡更大。刘伯承也急了，打电话要求撤退。彭德怀说：

“冈崎大队所剩人已不多了，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应该一鼓作气坚决消灭他！”

刘伯承说：

“我的彭老总啊，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呀！”

彭德怀耐着性子说：

“我的老兄，敌人援兵正在逼近，一旦放虎下山，他立刻就会得到援兵的接应。”

刘伯承说：

“那就以后再收拾他！关家垴的地形对我不利，我军伤亡太大了！”

彭德怀仍坚持打下去，刘伯承也有些生气，两人大吵起来。刘伯承说：

“你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

彭德怀说：

“拿不下关家垴，我就撤销129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刘伯承无奈，只得一面强攻，一面开始挖地道。16时，第二次攻击开始，八路军集中重兵，以769团作为先锋，通过地道掩护，经过10次强攻，终于攻上关家垴山顶，和日军进行白刃战。日军毕竟人少，不敌，败退到山腰的一排窑洞里死守。

这第一天的激战，八路军经过18次强攻才勉强占领了日军第一道防线。日军仍然控制着关家垴和柳树垴核心阵地。

10月31日，八路军又强攻一天，毫无进展，伤亡却很大。16团参加进攻的一个营仅存18人，16团团长谢家庆也牺牲了。新10旅也遭受很大损失，旅长范子侠负伤。

1940年11月1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八路军只好撤退，冈崎大队得以成功突围。日军在当地报复性屠杀了6000多名中国平民。

11月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宣布全面结束“扫荡”。因此，关家垴战斗成为百团大战主要战斗结束的标志。八路军苦战两天，毙伤日军200多人，以迫击炮弹炸死了冈崎谦受；自身也伤亡了2000多人，是日军伤亡人数的10多倍。

欲知八路军后来战绩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家垴战斗是八路军在百团大战第3阶段中进行的一次最典型的、最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彭德怀以**2万余人的重兵，围攻日军一个500余人的大队**。此战非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死伤2000余人，毙伤日军200多人）之后，眼睁睁地看着日军脱围而出。**这一仗打得实在是糟糕极了。对于彭德怀的蛮干、瞎指挥，其他当事人提出了诸多批评。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关家垴战斗是他一生中4次大败仗的第2次**（其他3次是红军时期的赣州战役，解放时期的西府陇东战役和朝鲜战争中的第5次战役）。可是**这一类攻坚战的重大失误，却一直被淹没在百团大战的欢呼声中，而极少为人知之**。后来到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才由刘伯承的一份工作报告，引出了对百团大战的重新评价，一是肯定了它的功绩，二是认清了它在战略、战术上的严重失误。这种一分为二的评价，应该说是客观、公正的。

**第44章**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

**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

**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话说1940年10月30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

“现在问题，请中央决定下列3个方案，我们采哪条件作为与顾及上官谈判之方针：1、保持皖南阵地，根本不转移。2、完全放弃皖南到皖北，这会引起与桂军的摩擦。3、完全放弃皖南，移苏南。在执行第2、第3方案时，地方党必遭受重大破坏。敌后地区仅一条线，无论大、小部队均无法留下，最后必然是完全放弃。欲留一部分，转移一部分亦不可能。以上望中央速电复方针。”

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甲、30日电悉，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6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项英的电报，他写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2、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3、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答复。”

毛泽东又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说：

“（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限在11月20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据确息，蒋已令汤恩伯率9个师、李品仙率3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乙、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政治工作，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11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向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刘伯承、邓小平、陈光、罗荣桓、黎玉、罗舜初、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萧克、张云逸发出由他起草并修改的《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此指示起草于10月29日，发给了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修改于11月1日，添加了第11条），全文如下：

贺关、聂彭、吕程、刘邓、陈罗、黎罗、陈毅、克诚、雪枫、先念、萧克、云逸：

关于目前时局：

1. 一个月来英美与日德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战争，加入日德意同盟，前者要求中国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已到白热化，蒋介石态度也因之大变。

（二）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与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日意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

（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闭，阿部的回国，南宁龙州的撤兵，海通社在重庆的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与德国劝和的开端，这种形势有急转直下可能。

（四）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准备加入日德意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加入英美同盟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日德意同盟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

（五）如果带决战性质的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3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十有八九），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

（六）目前的反苏反共新高潮，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投降日本与加入德日意同盟的准备，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传所迷惑，他的联合英美是宣传，投降日本则是实际。

（七）因为要日本让步须用威迫利诱两个政策，所以蒋介石一面装腔作势地要加入英美同盟以威迫之，一面又发动反共高潮以利诱之。蒋介石知道日本南进需要一个巩固的后方，一个“太平”的中国，而共产党今天已成了破坏日本这个后方的最严重因素，于是蒋介石表示愿意替日本担负巩固后方的职务，以求得日本对他的让步。同时欧洲的德意需要交换亚洲的资源，蒋介石反共于德意亦有利益。故此次反共高潮，主要是准备投降日本与德意的步骤。

（八）**在7、8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9月已动摇，至10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

（九）但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

（十）**但无论那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不论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将给我党以大的打击，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迅速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十一）但不管怎样严重局面，我们是能够冲破的，这种信心应在全党建设起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十二）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毛泽东 东亥

11月1日晚，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

“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蒋大喜之时。”“蒋现在正处于3个阵线争夺之中。”“破裂的危机已至。务请中央迅速考虑各种办法，权衡轻重比较，如何能对时局有利，速行决策指示。”

11月2日凌晨，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今日会议讨论你一日建议，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

1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和缓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11月6日，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他写道：

恩来同志：

**江电所示重要情报今晨才阅悉。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3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根据3日来电，如能由上述4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向各方活动，应动员多数人员出马（党的、非党的）。蒋夫人处的活动值得注意，桂林方面请告克农亦如此办。

毛泽东 鱼辰

11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全文如下：

克农、项英、董老并告恩来并转告各方：

**目前日德与亲日亲德派包围蒋压迫蒋发动反共战争，投降日寇，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应动员党内外多数人员出马作上述积极热烈的活动。**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求大家注意自己的存亡问题，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只要不剿共不投降，等到因剿共投降而闹到亡党亡国之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要告诉党员与一切抗日人员，只要人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各地情形望告中央为盼。

毛泽东 鱼辰

1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1. 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德使陶德曼已有电报致中国当局实行劝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日本与亲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分裂，使国共两党互相火并，两败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

（二）迅速动员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用口头、文字、图画、书信、电报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间接向政府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地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这些正是日本的诡计，正是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的诡计，我们万万不要中此诡计。**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我们共产党始终爱护蒋、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爱护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员。所要求者只是坚持抗战团结，不投降，不分裂，不内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行我党中央今年七七宣言中的一切宣示及历来统一战线方针，愿与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团结到底。如果他们一时不慎，陷入敌人圈套，闹到亡党亡国，我们就爱莫能助了。对于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容忍的。对于一切抗日朋友，则始终爱护。今当存亡危急之时，我们不得不尽忠告之道。同时，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积极注意最近河南方面有20万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大家应要求政府制止这些军事行动，制止内战的爆发。

（三）党内外积极分子作宣传时，应当注意自己的态度。**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与黄埔系，不要骂杂牌军，不要骂三青团与复兴杜，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这不是目前斗争的中心），**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投降制止内战、驱逐亲日派的口号。我们态度要诚恳积极热烈，尽一切可能，到处奔走呼号，不惜舌敝唇焦，表现自己是一个团结全民捍卫民族的爱国志士与忠心朋友。**当此紧张时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如果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被击破，顽固派要投降就比较困难了。

（四）谁是具体的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应依据各地具体证据去决定。而其全国性的领袖，就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这一集团与日本及汪精卫秘密联系着，目前正在包围蒋介石，劝诱蒋介石下剿共命令与调动剿共军队，这一集团的目的，是在执行日本命令，挑起国共战争，使日本军队能从中国泥潭中拔出，好去对付英美，而中国一经内战，势必实行投降。但要全国投降，必须拖蒋下水，于是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共，他们以为反共战争一经爆发，便把蒋置于炉火之上，下不得台，投降就可以实现。然后要求日本把蒋踢开，自己充当中国贝当，这就是何应钦等的全部阴谋，因此也就可知蒋及蒋系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由反共而走到投降的极大危险性。这是蒋的主要危险，我们应当十分警戒，绝对不可疏忽，以免上他的当。但就目前而论，蒋还站在国际3大阵线中国3条道路（或者投降，或者加入英美集团，或者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末下作贝当的决心，因此我们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目前最危险的，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及内战挑拨者。全党应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从口头上揭穿何应钦等的巨大阴谋，用各种方法宣布何应钦等的罪状，俾众周知，深恶痛绝，仅仅暂时避免在公开文字上提出何应钦的名字。

（五）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要进到更加具体化，不失一个机会去联络每一个可能的具体对象。要研究如何接近与如何同每一具体对象协同进行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要求不要过高，那怕只有一二点微小的口头协定都是有用的。要每日每时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要紧密分析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各个人的具体情况，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可能性。**不要只看见黑漆一团，闭门不纳，望而却步，这些都是不对的。**

（六）关于国民党区域的党的一切组织，必须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全部地完全地有秩序地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

（七）关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地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八）又须告诉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与抗日人员，只要大家起来进行坚决的恰当的斗争，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有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因此我党及全国人民必须为制止投降与制止内战而奋斗。今天我党及全国人民多作一分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即是明天多得一分胜利。时局的最后结果究竟如何，主要依靠我党的政策与工作来决定。

（九）不管时局的发展如何，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我党有50万军队，有60万党员，有全国人民广大的同情，有很多中间派还可作为我们的朋友或者守中立，有苏联伟大力量的赞助，有世界革命的酝酿，有帝国主义间空前紧张的矛盾，有敌人内部的严重困难，有亲日派与顽固派、顽固派与中间派以及各派内部的严重矛盾，一切这些，都是我们有把握地来说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与中国人民。不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是有一切把握去最后战胜这些黑暗的。全世界与全中国的任何黑暗都是暂时的，只有依靠着自己坚决斗争与坚固团结的革命政党与革命人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这种信心，要在全党与全国人民中巩固的建设起来。党内外必然发生的一切悲观动摇情绪，必须予以坚决地克服。

11月9日，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起草了回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佳电”。他在“佳电”中驳斥了“皓电”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反共投降阴谋，电文中说：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惊心动魄，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泽东在“佳电”中警告国民党说：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指朱德——笔者注）**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做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在“佳电”中还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与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退让政策，允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明了“佳电”采取的基本立场是：

“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

11月10日，刘少奇致电中央说：

“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难应付”，决心以八路军第5纵队一部监视霍守义部，“主力即进攻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沟，**彻底解决韩部。**”

11月11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中央说：

“**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

11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彭雪枫说：

“一、**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你们现在应积极准备一切。一面我们仍在重庆谈判。二、对霍守义、何柱国应取争取政策。”

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第3、第5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

第二步，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以西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区，限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

11月15日，毛泽东就如何发动反内战运动以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致电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并新四军、八路军领导人说：

“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毛泽东在分析蒋介石进攻华中已具决心，但还存在几种困难时说：

“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故我应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气，**略谓苏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不咎既往，但如汤、李、霍、莫不停止进攻，则我不得不打韩德勤**，**此空气尤应直接从韩本人及顾祝同方面着手，表示我可继续保全韩德勤，**但必须停止汤、李、霍、莫进攻作交换条件。”

11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的指示》，规定华北部队的任务是：1、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2、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3、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4、强化政策工作；5、加强干部之团结及党的团结。

11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全军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

11月18日，刘少奇与陈毅等分析了苏北形势后，再次向中央报告说：

“现在**各方面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李之进攻。”

至此，刘少奇已经多次强调“苏北地区顽固派到处捣乱，地方武装叛变，中间分子动摇”，苏北根据地“不是走向巩固”，而可能“有许多地方被破坏”等情况，毛泽东终于同意江北部队以增援受到桂军进攻的皖东为名，攻击苏北大运河东侧地区，以期打通苏北与皖东交通。

11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即电复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提出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东北军112师霍守义部与韩德勤部联系，并说：

“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以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安丰等地区，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限电到5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接到中央命令后，华中总指挥部立即令八路军5纵队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攻占射阳、安丰、曹甸、平桥之战斗部署。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说：

“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到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佳电）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它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陈毅在苏北，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奋起阻止，形成反对破坏抗战反共内战的政治攻势。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1、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2、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3、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说：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物资势必被打散。”

11月2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刘少奇、陈毅说：

“攻击淮安、宝应间地域望继续作充分准备，待命实行。”

是日，刘少奇、陈毅即于盐城复电中央说：

“我对韩攻击已全部准备好，决于明日（27日）晚向沙沟、射阳攻击，解决该地之韩部（保留兴化不打）。如何，望即复。”

11月2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等说：

“同意你们意见，唯不得攻击兴化”。

兴化是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认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此次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参战各单位分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1纵队、2纵队、八路军5纵队1支队。陈毅专门作了战前动员，他说：

“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11月27日这一天，项英以他和叶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无论如何要在12月底才能开动完毕。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耍赖说：

“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假若是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在半路上要战斗，则颇不利。但如有何变动，来得快时，则请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资材与人员的损失是顾不了的，如何？盼立即复。”

这一天，项英又致电毛泽东说：经多方研究与考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妆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感酉电悉。1、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2、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11月29日拂晓，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发起曹甸战役。

11月29日、叶挺、项英尚不知曹甸战役已经发起，耽心苏北战事会给皖南新四军带来不利，便致电中央说：

“苏北动作如何？如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们安全北渡后?”

11月30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等人并转周恩来说：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开一个缺口，以便隔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转移，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

11月30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毛泽东获此消息，电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说：

“日军从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它法宝。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为挽救危机稳固内外防线起见，结成蒋桂何联盟。”“其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

1940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12项条件，他写道：

“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

1. **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

二、苏、鲁、皖3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

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

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

五、彼方释放罗世文，我方释放孙启人（第33师师长，黄桥战役中被俘——笔者注）。

六、停止陇海、咸渝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

七、**如张国焘、叶青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

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

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11月经费及10月余欠。

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

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

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

以上12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针对这一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有所放松，粮食没有实现自给比例的问题，在会上强调说：

“经济工作要适应当前的环境，要团结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晚，毛泽东致电项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项问题：

“1、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2、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3、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准备？”

接着，毛泽东批阅了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的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问号，让警卫员去把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叫来。不一会儿，李富春匆匆赶来，问道：

“主席，有事吗？”

“坐吧。”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旁边的椅子。他拿起桌子上的报告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同志的生产任务呢？”

“我们考虑书记处同志的工作太忙……”

“不！”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忙就站在生产劳动运动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为然地说：

“唉，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亲呀！”

“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毛泽东说罢，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说：

“你和朱总司令肩上的担子太重，情况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说，你还种了菜，这也可以算作生产任务嘛。”

毛泽东摇摇头，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道：

“**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领导同志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绝不做特殊公民！**我虽然不能和同志们一样去山上开荒种地，但我可以实行变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纽扣的任务，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时间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无可奈何地笑了，他说：

“我总是说不赢你。那好吧，我们就修改一下生产计划。现在大家的热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们提出也要开荒种地缴公粮。”

毛泽东一听，觉得很新鲜，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忙问道：

“缴多少？”

“缴一个月的口粮，按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计算，每人上缴45斤。”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我也要缴一份。”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不行呢？”

“你的负担太重了呀！”

“大家也不轻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还要参加生产运动，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可是大家仍在奋斗，仍在拼搏，难道我能特殊？你说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试探着问：

“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粮，由办公厅的同志们代缴行吗？”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做客，看戏，可以代替，公民缴纳公粮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说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12月4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曹甸彻底消灭韩德勤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立刻电示华中总指挥部说：

“**只待曹甸、安丰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黄克诚还提出6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4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4个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5纵队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切实可行，但是按照这个方案打起来需要时间太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央“保存韩德勤”的方针，所以刘少奇和中央都不会采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说：

“**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10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是年冬，毛泽东的警卫员高富有的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结婚。高富有陪父亲逛完延安市场返回杨家岭，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在他们面前戛然而止，车上的警卫员招手让高富有上车。高富有知道毛泽东在车上，不肯上。毛泽东拉开车门，探出头，指着高富有的父亲问：

“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亲。”

“你还有位老人家，上车，上车。”

毛泽东下了车，不由分说推着高家父子上了车，询问他们家乡的生产和家里的生活情况。高富有的父亲说着说着又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泽东笑着对高富有说：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车子很快就到了杨家岭。分手时，高富有的父亲高兴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真好，你真好！”

几天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涧县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从他们老家的敌占区接来，为他们办理了婚事。

12月5日，彭德怀指挥的华北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结束（关于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本传前边已经讲过，11月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宣布全面结束“扫荡”。因此关家垴战斗成为百团大战主要战斗结束的标志。但由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对此役的战绩统计截止日期是在12月5日，因此史学界不少人把12月5日看作是百团大战结束的标志。另一说是15日结束，还有说是1941年1月24日结束。如果承认后两种说法，百团大战就不是3个半月，而是近4个月和5个多月）。

此战的结果，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在《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也称“1940年百团大战战斗汇报”）中统计：大小战斗1824次，攻夺敌人据点293座，毙伤日军12645人，毙伤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俘虏伪军1407人，伪军反正1845人，日军投诚7人。缴获步马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关枪179挺，重机关枪45挺，山炮16门，重炮3门。破坏铁路948里，破坏公路3044里。

另据1940年12月25刊登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上的由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一文统计：毙伤日军20645人，毙伤伪军5155人，俘虏伪军18407人；拔掉敌伪据点2993个；解放煤矿工友10120人，铁路工友2055人，被迫修路同胞673人。与上一材料的统计差别很大，其它各项则大同小异。

八路军在此战中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计伤亡17000余人（另一说：阵亡约6000人，伤11700人，中毒21182人，失踪约1000人，合计约40000人。含八路军主力及晋察冀军区地方部队，不含其它地方部队及民兵）。根据地人民死伤无数，仅太岳区沁源一县，群众被杀者就多达5000余人，牲口损失近万头，大部房屋被烧毁，不少村庄完全毁灭。

再说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12月8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齐电”，电文中除了对八路军、新四军极尽污蔑之外，还强调说：“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听从军令调度”，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开到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

“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

“一、**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及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0日这一天，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发布了《百团大战总结战绩》。

12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说：

“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当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12月13日，江北新四军第1、2纵队及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奉命合力总攻曹甸。

12月14日拂晓，新四军、八路军各部在曹甸东、南、西3面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曹甸久攻不下，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12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8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收场，这样一种结果，使战役指挥者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刘少奇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刘少奇还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电报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5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其政治委员。

后来在1941年7月，日军对华中敌后的指挥中心盐城实施大“扫荡”，此时中原局已改称华中局。围绕是否保卫盐城问题，黄克诚又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发生了争论。这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停翅港召开干部会议，对黄克诚提出了措辞激烈的批评，指责黄克诚“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主力”等。黄克诚并不服气，据理争辩。他说:

“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

联系曹甸战役和盐城反“扫荡”作战的情况，他的结论是“上级处置失误”。黄克诚的观点并未被刘少奇和陈毅接受，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此负责，并要求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当时考虑，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

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有了理性的反思和总结，他说：

“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刘少奇后来对曹甸战役也有了客观地反思和自我批评。1944年7月10日，他在给黄克诚的复电中说：

“**我们在华中工作，都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因此，我们能够合作，并能够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则仍有不少错误。例如，**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2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在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3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当着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的面诚恳地对黄克诚说：

“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3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再说12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电文中说：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小姚，就是饶漱石。

12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刘少奇15日电并告陈毅、叶挺、项英说：

“**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

12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山）二人暂勿离开部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做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强调说：

**“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2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

1. 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3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5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说：

“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须在江边做周密布置。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化、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地区，**苏北应全部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

“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115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12月下旬，顾祝同即以7个师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做好了截断苏南、皖南共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

12月23日这一天，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

“对于北移，原定主力到江北，其他经苏南，同时布置除资材人员从5日起至15（日）止分批到达苏南，目前因敌增兵堵截，正设法北进。”

12月25日，毛泽东鉴于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便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舰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1、须分苏南与繁、铜两路北移。2、许由1个月时间。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4县撤出，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5、保证不受李品仙的袭击。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这一天，周恩来立即约见蒋介石。蒋介石说：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还是和你谈谈话为好。”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所说的共患难的日子，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的那一天。只听蒋介石接着说：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打内战吗？愿意塌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开到河北，其实是我为你们着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

**多么经典的一段台词！蒋介石这一番表演可真叫绝，他正是靠着这一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征服了中国大大小小无数个军阀头目，也把共产党内不少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可真是：古来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绝。

抚肩牵手虎哥们，摩顶拍腚狼外婆。

周恩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一回到住所便马上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中央，说蒋介石已经承诺：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保证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他在这个指示稿中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引子，借以强调党的政策在目前反共高潮形势下的极端重要性，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在讨论指示稿的前一部分时，竟然发生了严重分歧，不仅王明、博古等人否认他们在土地革命时期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就连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现在不应该再算老账。他们还说，王明的“左”倾错误只不过是策略上的错误，不能说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领导人的觉醒又一次做出了让步。他在修改稿中，不再提“路线”二字，只说是过左政策。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论政策》）如下：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10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是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

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1939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这里只综合地指出几点。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8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10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80%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当然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但是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动摇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当然决不是破坏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但在纠正错误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反攻等项不良现象。

这个**修改稿子虽然被通过了，但党内这一批人一被触到痛处就不认账甚至要赖账的事实，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全党对过去党的历史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二是必须纠正党内在学风、党风、文风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即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全党才有巩固的团结，才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党的历史，把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把正确与错误弄明白**。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党认识，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步调一致，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向前发展。

毛泽东首先决定**编辑一套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把这些历史的东西展示出来，要让全党都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为党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做好准备。**

**不久，他便开始着手筹划并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为此，他呕心沥血，阅读了大量文件，在王首道、陈伯达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历时将近两年，终于完成了这两部大型历史文献。其中的《六大以前》，收入的从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的各类文件，就多达199篇。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一文时所发生的严重分歧，可以说是毛泽东决定进行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之一。到了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高层中的多数人，还不承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影响，这可能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前边已经讲过，有一批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讳疾忌医，一触即跳。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远见。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要以史为鉴，教育全党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在新的条件下重犯历史的错误，是多么的艰难。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计划在毛泽东的心中开始酝酿，提拔新人！整顿党风！

**第45章**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

**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话说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一封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的复电。他在复电中写道：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接着，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项英说：

“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设宴招待来自南方参加“七大”的各位代表，宴席摆了六七桌，41位代表都参加了。

这41位代表来到延安的确很不容易。早在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到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七大”的代表会合，共41人。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由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来电指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局势恶化，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应通过敌后根据地到延安。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对外称“服务团”，指定由古大存为团长，立即出发。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安徽来安县半塔集。“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过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八路军115师师部峄县抱犊崮。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后，115师派老6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冀南军区派一个团护送过平汉路，进入冀西武安山地区。随后，“服务团”又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军总部。9月，徐向前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总部让“服务团”和徐向前同行，连闯5道封锁线，于12月26日下午到达延安。代表们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是一次艰苦的“长征”。他们尽管历尽艰险，但在新四军、八路军的掩护下，41人全部安全抵达延安，也算是一大幸事。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伯渠、博古、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各位代表。宴会开始后，毛泽东叫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他端起酒杯致词说：

“同志们旅途辛苦了，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各位致意，敬大家一杯酒。”

说罢，他端起酒杯逐一到代表席上敬酒，一一问好，询问代表们的姓名和籍贯。一位代表见毛泽东来到了自己跟前，连忙起身，激动地说：

“我是韶山的，叫毛朗明，谱名毛泽林。”

毛泽东惊喜地说：

“呵！你是韶山哪个屋场的？”

“我是龙坝湾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毛秋阶，谱名毛贻桂。”

“呵，你是秋阶二叔的儿子。嚯！好呀！老弟你也当上代表了。”

毛朗明是韶山区委书记，他见毛泽东如此亲切，就说：

“主席，韶山的父老乡亲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问候。我还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说：

“好，谢谢乡亲们。我正想知道一些乡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里来谈一谈。”

“我一定要来看您的。”

此后，毛朗明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由于他水土不服，也不习惯吃小米，得了胃病，又患上了疟疾，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有一封信转给了他，他还以为是毛泽东的回信，可仔细一看，却是自己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只见信封上写有几个字：“有意见请自己来。”后来他才知道，毛泽东并未见到这封信，是他的秘书不知情，怕影响他的工作，就在信封上批了这句话，退了回来。

12月27日，毛泽东仍然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让周恩来继续同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次严厉批评了他犹豫迟疑的态度，电文中说：

“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

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第3战区的计划，国民党第32集团军，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计划明确规定：

“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29日来电说：

“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4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毛泽东按照3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

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的运用策略。

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摩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12月底，蒋介石下达密令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此时，顾祝同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已经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电文中没有说明他们转移的具体路线。

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夜，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1个教导团、1个特务团和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分3路由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及罗里村等地向南进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部队为什么不直接向北进入苏南根据地，却偏偏要南下呢？原来，项英耍了一个小聪明，他提出**要“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命令部队向东南走，**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到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从镇江以东渡江北上。这条路线对新四军非常不利：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无异于授柄于国民党，他们可以说新四军是要进攻他们；在军事上，向国民党重兵扼守方向行动，无异于自投罗网。**

此时，国民党利用有利地形，已经在新四军东去南下的路上布下了重兵，计有新7师、40师、52师、79师、108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62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144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以国民党第25军军长张文清，为“剿匪右翼军指挥官”，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部**堵截新四军东去之路**；以第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指挥的79师、62师，**堵截新四军南去之路。**这些部队分别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

1月5日，叶挺、项英致电中央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1月5日下午，皖南新四军到达大康王、茂林、潘村铜山等地，先头部队1个团在山口隘路遭到国民党第40师前哨阻击，双方发生争夺战。

1月6日，国民党军第40师主力投入战斗，第144师、52师、79师迅速向新四军进逼。

１月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叶挺、项英5日来电说：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月7日下午，新四军3个营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于黄昏时分攻克了星潭，乘胜向廊桥河进击，3路人马只要会师于廊桥河，部队就可以冲出包围圈。可惜新四军军部与前方部队没有拉电话线，此时军部不知道星潭已经被前锋拿下，**项英还在百户坑主持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而且一讨论就是7个多小时，丧失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项英在袁国平、周子昆的支持下，**否定了叶挺坚决攻下星潭突围的正确主张，改令部队立即后撤，向西南方向行动，走高岭绕道去天目山，坚持游击战。**

1月8日凌晨，皖南新四军向石井坑方向转移，遭到国民党军第79师和新7师的拦截。项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经与叶挺、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饶漱石研究，决定**重返云岭，从铜陵、繁昌间渡长江北上。**由叶挺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

1月8日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擅自离开了军部。深夜11点左右，叶挺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离队的情况报告了刘少奇。

１月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说：

“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项、袁、周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电报，这才知道皖南事变发生了，但具体情况不详，便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复电刘少奇说：

“9日电悉。你说项、袁、周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辰（5日——笔者注）电，他们支（4日——笔者注）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9日晚，叶挺、饶漱石在给刘少奇并转中央的急电中说：

“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１月10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说：

“接希夷、小姚9日来电，说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定9日晚分批向北突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2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复电刘少奇、陈毅说：

“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并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文中说：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1日下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回到石井坑大园村军部。项英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我们的事中央知道吗？”

“已经知道了。”

“中央的意思呢？”

饶漱石没有回答，拿了一份电报给他看，电报上说，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项英把电报还给饶漱石，说：

“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就负责指挥吧。”

袁国平对叶挺说：

“军长，我向你检讨，我犯了右倾的错误。”

项英说：

“这一切由我负主要责任，如能生还，我将向中央检讨。”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指示电说：

“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电：

“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最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

毛泽东还致电刘少奇、陈毅并转告叶挺、饶漱石说：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这天晚上，刘少奇、陈毅向中央建议说：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饶漱石，周恩来、叶剑英，全文如下：

胡陈，彭左，朱，陈罗，叶衔姚（胡陈转），周叶：

甲、同意胡（指胡服，即刘少奇——笔者注）陈12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

乙、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望叶项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10天可能有办法。

丙、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丁、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

戊、为应付严重事变，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

己、对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对消灭韩沈部署，应绝对秘密。

　　 毛 朱 王 元申

接着，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起草了抗议国民党军包围皖南新四军的通电。通电中说：

“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7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至文，血战7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挺等率部遵令北移，并遵顾长官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全是诱我聚歼之计。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特电奉达，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敬恳诸公仗义执言，予以援助。临电悲愤，不尽欲言。”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

指示电中还嘱令他们立即散发抗议通电。

此后，蒋介石一面诡称：已电告顾祝同查询真相，一面密令国民党部队，切实执行已定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计划。

1月13日下午，国民党军第40师向泾县东流山发动第3次总攻，新四军5团和特务团的阵地相继失守，设在石井大院的军指挥所被冲散，新四军军部秘书、《渔光曲》的作者任光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从东流山后撤的余部，一齐拥向石井坑，原来的建制已经打乱，无法实行统一的指挥，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是日晚，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叶挺军长下令，要求大家想办法突围出去，他最后说：

“现在全面突围，走西北角穿过凤村，向铜、繁挺进。集中突围如果不成，就分散突围，三五个人一起都行，过江后到无为会合。**明月有缺也有圆，人生有散也有合，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说罢，他亲自率领大家翻过一座大山，向大京王方向退却，第二天拂晓到达大康王。此时，出坑口处已被国民党军108师堵击，封锁了新四军出路。饶漱石主持召开新四军党组织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叶挺、李一氓、张元寿、钱俊瑞、余立金、王聿先等人。会后，饶漱石对叶挺说：

“你是否可以下山去同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去？”

叶挺说：

“现在谈判是没有条件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

饶漱石说：

“过去的那些暂时不谈。这一次，是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在座的同志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就可以证明是党派你去的。”

叶挺沉思良久，说：

“好吧，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的，我就服从。”

叶挺先派了两个参谋拿着他的名片下山联系，结果被国民党军扣留了。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电，正式宣布：

“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1月14日下午4时，叶挺带着王聿先、黄炳生、徐冬梅和几个侄子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还有两名警卫员和副官、秘书，一行13人下山去和国民党谈判，在鹿角山以西山冲中，被国民党军52师扣押。

上官云相随即给所属部队下达了分区清剿新四军余部的命令，要求“各部细密打扫战场，须注意遗弃械弹及化装潜匿之匪军要员，勿使得逃。”

至此，皖南新四军指战员们经过7昼夜的英勇拚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黄火星、傅秋涛、江渭清等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和失散，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来查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人是在1月13日又擅自离开了部队，袁国平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自戕而死，项英同警卫人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五六个人，周子昆同警卫员黄诚，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张益平、王本元等四五个人，分头突出了包围。几天过后，项英等同李志高、谢忠良以及刘厚总等先后相遇。又过了几天，项英一行十多人，又与周子昆、黄诚等相遇。项英、周子昆见面时心情非常激动，都流下了眼泪。项英说：

“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

他们在石井坑的一个小茅棚里住了几天，随后又向激坑方向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项英、周子昆都曾掉到河里，烤衣服时，暴露了他身上保存的黄金、银元、钞票和首饰。

在激坑期间，又有一些指战员与项英等会合在一起，其中有军部代理协理员杨汉林、5团3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军部参谋刘查、老一团的营长李元、营教导员敖箔胜等。在2月底至3月初，他们又转移到了撅坑的石牛坞村。在蜜蜂桶附近有一个山洞，位处半山腰，地势险要，又较隐蔽，项英、周子昆便住在这个洞里。住在这个洞里的还有警卫员夏冬青、黄诚和副官刘厚总。洞下面约200米处，搭了一个茅棚，谢忠良、李德和、张益乎、郑德胜等住在那里担任警卫。3月13日晚，警卫员夏冬青有事外出，洞里点上了蜡烛，项英和周子昆在地上划了个棋盘，用小石子作棋子下棋。10点多钟，黄诚说：“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周子昆说：“小黄，你先睡吧，等一下就睡。”3月14日凌晨，黄诚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伸手就去摸枕头下面的手枪，突然一道电筒光射在他脸上，右臂挨了一抢，紧接着又是一枪，他就昏过去了。开枪的不是别人，就是刘厚总，他以为3个人都被打死了，便抄走了他们的武器和经费，急急忙忙下山逃走了。

后来，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将军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对探监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再说在１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皖南事变，他在发言中说：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摩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同志错误的决定》，全文如下：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1937年9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3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因项、袁先是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30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1月5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少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7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于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了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强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1月15日晚，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人说：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地坚决地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裂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6日，在医院休养的林育英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又见党内不少人出于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的愤怒，要求与国民党决裂，心里很不平静。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说：

“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损失，但与‘四一二’、‘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

毛泽东读了林育英的信，为他关心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马上复信嘱咐道：

“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

此后，毛泽东又来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握着他的手说：

“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

林育英说：

“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

1月17日傍晚，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通令中还说：“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同时发表军委会发言人谈话说：“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

此前，白崇禧力主取消新四军番号，蒋介石便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关于此事，王世杰在1月17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今晨予往蒋先生寓邸，面述关于处置新四军问题之意见。予力主不将处理命令公布，如有必要，仍应以密电通知各军政机关。予所顾虑者，此种公开宣示，有促成共产党军队叛变，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国际方面观感及沦陷区域人心亦应顾虑。”此意见虽未被蒋接受，但蒋明确表态说：“公布文件中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而以指斥新四军为限。”

毛泽东获悉重庆军委会发布的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立即致电周恩来说：

“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1月17号命令，坚决反攻。”“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他又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指示报纸次日刊出他书写的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会议同时决定：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8000余人于本月4日起，开始遵照党中央向国民党让步的决定，服从蒋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动，不料国民党当局早有“聚歼”计划，我军行至泾县之茂林即为国民党军队7个师重重包围，激战7昼夜，全部覆殁。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二、国民党这一表现的原因是：第一，亲日派何应钦及西西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第二，顽固派头子及英美派代表，由于英美集团与德意日集团间矛盾之扩大与英美拉拢中国之积极，及日本在中国的进攻行动受到了英美的牵制等原因，他们的气焰大为高涨，认为此乃向我党进攻以巩固其统治的有利时机。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发展。

三、皖南事变及国民党的公开处理，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前面，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暴露着他们的阴险毒辣，没有信义，没有道德，它将使国民党的威信大受损失，同时揭破其关于统一军令政令之宣传的全部虚伪性。因此，皖南事变同时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亲日派、英美派向我们的进攻以有力回击的有利条件。**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北移是服从命令的，现在得着的是被消灭，被宣布为叛变与被交军法审判。**一切理由都在我们方面。

四、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央特决定：

（甲）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并到处提出下列口号：（子）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丑）立刻停止华中20万大军前进剿共，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寅）立刻停止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线，把一万万元的碉堡建筑费，用到国防建设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去！（卯）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马寅初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陈立夫！**

（乙）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则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丙）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丁）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全文如下：

**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兴，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3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环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10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已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该军**在鄂中之李先念支队，被程汝怀等攻击多次；在苏南之陈毅支队，迭受冷欣压迫；在苏北之管文蔚部，则受韩德勤压迫；在皖东之罗炳辉、淮北之彭雪枫部，则受李品仙压迫**。该军在平江、在豫西之后方留守人员及受伤官兵，则迭被惨杀，曾发生有名之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即该军参谋长张云逸之老妻幼子，亦被拘捕。**此皆过去数年之事实，昭昭在入耳目者。**近数月来，更变本加厉，苏北、皖东、鄂中各地，大举进攻，名曰剿匪，江淮一带，早已闹得乌烟瘴气。不宁惟是，去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总参谋长之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及新四军叶项军长，不顾事实，强调所谓军政、军令，勒令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朱彭叶项为顾全大局起见，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是以有佳电之答复。至12月底，新四军叶军长等，业将移动部队准备就绪，**正欲开动之际，不意国民党各地言论机关，公开宣布该部北移消息，实际上不啻向敌人告密**；同时即闻当局已对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袭击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语。然外表则说已令各部协助通过，决无留难云云。叶军长等以言出负责当局，料可置信，乃于本月4日毅然开动，计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共约万人。不意甫经开动，即遭袭击，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村地区，**即突被52师唐云山、108师戎纪五、79师段茂林、144 师范子英、40师詹忠言、新7师田钟毅、第10师王劲修等7万余人，统受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分进合击，大举围攻**。叶军长等一面仓促应战，且战且走；一面电告当局，质问理由。乃当局在该部被围血战7昼夜中，始终佯称已电顾祝同询问真相，并诡称已令顾氏撤围放行，实则密令各部实行其聚歼计划。至13日，激战已8昼夜，我遵令北移遭遇袭击之新四军，果已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已达当局聚歼之目的矣！至昨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正式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直认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歼灭，又谓该军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在逃，正缉获中，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等语。**一篇堂皇文告，已将其阴谋消灭抗日部队之真面目，赤裸裸的表白于全国人民面前**。事有凑巧，正是17这一天，日本同盟社亦从南京发出了一个惊人电讯。该电略谓：“重庆政府严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之共产军，于12月26日以前移往江北，第3战区司令长官为使共产军早日移往江北，遂开始在东流附近围攻新四军及共产军各军队，共产军一部已于10日由荻港附近溃退江北。自14日以来，日军各部亦攻击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国民政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至此，**一幕消灭抗日武装摧残异己力量之大阴谋惨案之真实内容，乃益大白于天下。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所谓军纪国法者，不过于聚歼之后，尚有宣布叛逆交付审判之一套而已。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新四军为抗日部队，北移乃遵令行动，乃竞遭围击聚歼之惨变，军纪何在？国法何存，**盖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实已无置辩之余地。**当江南新四军惨被袭击歼灭之际，当局复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共2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之新四军，所谓“一网打尽”之计划，固不仅限于江南一隅而已。同时，在西北方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者，亦有军队20余万。西安特务机关对八路军办事处除实行封锁压迫外，竟于前数日将办事处挑水夫绑去，逼其回去在水内施放毒药；桂林军警机关则压迫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至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则早已事先调查名单，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大概快要下手了吧！？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3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此等为敌张目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和全世界主张正义之人士，亦绝对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我们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以达到下述各项目的：

1. 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

二、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

三、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

四、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

五、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

六、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

七、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

八、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

九、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

我们深信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战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前面，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大多数军民同胞深知在此艰危时局中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置。

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指示：

“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并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1年1月20日，于延安）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1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接着，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中写道：

**“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4个月或6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不发表反蒋言论。”**

1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中说：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1. 用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以动员舆论；2、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3、消灭皖南的新四军；4、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5、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施。6、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7、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8、封闭《新华日报》；9、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10、在重庆和各地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11、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12、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13、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14、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15、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7月7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7月7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11月“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1月17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1月20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9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4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7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1月17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不知读者诸君看完《谈话》原文有何感想？笔者每每读之，无不感其寓意深邃。真可谓是：

煌煌檄文，古今少见。“阴谋大纲”，妙不可言。蒋氏读罢，哭笑不得；敲敲打打，如训童顽。

1月2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人通电宣布就职，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

1月24日，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集中全力反共，日军乘虚向河南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仓促应战，丧师失地。此后，日军连续侵占了确山、驻马店、遂平、西平、舞阳、项城、沙河店、象河关、蒙城、涡阳、周口等地。

1月25日，新四军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组成新的军部，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扩编为新四军，共有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其建制是：

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主要活动于苏中地区。

第2师师长张云逸（兼），后由罗炳辉接任，政治委员郑位三；主要活动于皖东地区。

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主要活动于苏北地区。

第4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主要活动于皖东北及津浦路以西地区。

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主要活动于鄂豫皖地区。

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主要活动于苏南地区。

第7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主要活动于皖中地区。

独立旅直属军部，由原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改编，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副旅长吴世安，参谋长李梓斌，政治部主任刘兴元。

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他在电文中写道：

恩来:

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17号命令及实行其它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余详书记处电。

毛泽东 有申

1月25日这一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12条，当面交给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要他转交蒋介石。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在国际上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也表示不满。各国使节纷纷往访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反对中国分裂。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强有力地反击，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声和压力，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说，他力图缩小皖南事变性质的范围，称：“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

蒋介石被迫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允许将新四军编入八路军，增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办法。

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1月17号的命令并实行12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

“**蒋介石1月27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应公开批评蒋介石。**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

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如果在1月17日以前争取蒋介石好转还有可能性，因而这个争取政策还是正确的，在1月17日以后，这种可能性就已经没有了，因而对于蒋介石的争取政策也就不正确了。）

二、这次破裂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首领蒋介石发动的，我党维护团结的长期努力，特别是在去年11月9日经过朱彭叶项发表佳电及1月初旬我们在皖南实行撤退新四军的步骤，被蒋介石以皖南聚歼计划及“一·一七”反动命令完全破坏了。**蒋介石以皖南聚歼新四军及“一·一七”反动命令的步骤，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他使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除了和他完全对立以外，没有其他路走，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而一切人民的同情都到了我们方面。**因为蒋介石所取的反革命步骤，完全是背叛民族利益，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的，并且经过他自己的“一·一七”命令，向全国全世界充分暴露出来了。

三、为了保卫民族利益抵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步骤起见，我党中央已经采取了自己的第一个必要的革命步骤，即于1月20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命令及谈话，用以对抗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革命命令及谈话。待蒋介石又采取其他步骤时，我党再行采取其他必要步骤以对抗之。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新的时局好转）之目的**。

四、蒋介石的阴谋计划是对于我们及人民抗日力量采取各个击破政策。他现在宣称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我们必须全部揭破他的这种阴谋。必须指出他的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再消灭共产党，再消灭其他人民抗日力量的各个击破政策。**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必须指出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发动全面破裂的开始，是准备投降的重大步骤，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动蒋介石执行的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是西安事变以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

五、蒋介石发动的利于日寇不利于抗日的国内破裂，按照目前的国际国内条件（**日蒋尚未公开妥协，英美不愿中国内战，苏联不愿中国分裂，我党力量的存在，人民的反对，国民党的内部矛盾等**），**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

六、但所谓破裂是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全体人民之间的破裂。**在全体人民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破裂的，国民党中一切真心抗日的人也是不愿意破裂的；因此，我们的尖锐对抗政策，只是对付发动此次破裂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对付这个阶层的政治代表们，而不是对付其他阶层。**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则仍是以联合为主的政策，同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动摇性，则实行善意的批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七、因此，必须使全党明了，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对于实行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与抗战建国纲领必须强调。中央在12月25日指示中关于各项政策的指示，依然有效，并且在长时间中都是有效的。

八、**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用当局字样或其它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对于何应钦等亲日派首领，则指名反对之。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一七”反动命令及谈话，则公开地尖锐地反驳之。但对于日蒋间的矛盾，即使是很小，亦须加以利用。

九、对于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必须对国民党国民政府提出下列十二条要求：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十、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为此目的，**我党必须赞助实行总理遗嘱主张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与非国民党员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必须赞助各个代表中间阶层主张抗日民主的其他党派，必须赞助其他主张抗日与民主的任何政治组织、军事组织、文化组织与经济组织；必须极力巩固与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争取一切尚能抗日与不赞成反共的中国军队及其军官，而对于坚决反共不惜内战的反动军队则取消不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改变为适当的发展党的组织；必须极力争取日军士兵及下级官长，争取一切可能叛变的伪军，以瓦解这些军队。**我们经过上述这些努力，并待国际条件发生变动时，就可**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实现新的时局好转，这就是我们今后的政治方向。实现这个新的政治方向，在一切国际国内的必要条件发生变动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天，毛泽东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通告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并要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还说：

“我们不怕与蒋破裂，事实上，蒋介石迟早都会投降日本。”

接着，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说：

“**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有的。”

1月30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说：

“**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日，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党到华北，破坏日本利益。”**

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写道：

“在蒋介石未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蒋介石，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项英一贯大言不惭地自诩为“游击战专家”。可这个党内蠹虫，却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其之愚，不但累及一代名将，而且还葬送了七千壮烈之士。饶漱石也是明知事不可为而强为之，继项英之后，以党自居，白白将叶挺送入了虎口。

叶挺也是命运乖蹇，一生坎坷。在此次受命之初，他就说：“现在谈判是没有条件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可如今他只是一个党外人士，不得不受制于人。诸君，叶挺将军倒霉的事还多着呢，请继续往下看吧。

**第46章**

**“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12条，对皖南事变、1月17日**

**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

话说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挑选了60本书，寄往苏联。其中既有哲、经、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他在寄件上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毛泽东又附了一封信，他信中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而且是几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岸英的长信”是指1940年4月12日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中国儿童在苏联》一信。原来早在1940年元旦节，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到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他了解到毛岸英不仅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孩子们中间威信很高，而且还善于表达，是个小演说家，儿童院每有社会活动或外出演讲，几乎都要派他去参加，便鼓励他把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及种种见闻写下来。毛岸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长信中除了赞美中国儿童在苏联的幸福生活以外，还以火一样的激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表达了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向往。周恩来回国后将这一封长信交给了毛泽东，并推荐给《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是很高兴的，但他对孩子们的成长看得很远很深，自然免不了要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诫勉一番。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日军进攻态势及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致电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等人，全文如下：

彭左，刘邓，胡陈，雪枫，克诚，云逸，朱瑞，陈罗，黎罗（指黎玉、罗舜初——笔者注），先念，周董：

甲、敌有占洛阳可能，汤胡卫（指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笔者注）主力有被击溃可能，中条山胡卫两军、大别山桂军均有处于狼狈地位可能，西北胡军有一部援豫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

乙、我之方针：1、**政治方面，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十二条，对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此条由周董负责）。2、军事方面，八路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克诚即改新四番号，新四已成全国人民中极荣誉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

丙、统战方面，彭左、刘邓注意中条各军，雪枫注意河南各军，先念注意湖北、河南各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

丁、**苏鲁两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歼灭之。**

　　 毛 朱 王 冬亥

2月的一天，南汉宸接到通知说，要他立刻赶到杨家岭，毛泽东有要事与他商谈。南汉宸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说：

“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说：

“主席，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

毛泽东说：

“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

毛泽东又鼓励他说：

“汉宸呀，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命碰到了艰难危厄，我们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道难关闯过去！解决目前困难，不能只看重财政，单纯在财政上打圈子，那样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没有经济基础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也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毛泽东这次谈话进行了4 个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南汉宸送到窑洞门外，又叮嘱说：

“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汇报一次情况！”

就这样，南汉宸担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2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指示电《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

二、汤集团损失不小，3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4日失陷。李仙洲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亳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现与后方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这对桂原是一大打击，估计莫德宏部将来亦有西撤退可能。范汉杰军已从中条山南调，如洛阳危急，他军亦非渡河不可，原定庞炳勋出冀南隔断我冀鲁交通的部署，当然要放弃。胡部李铁军军已星夜东调，第8师从正宁撤至分州，大概是准备东调的，**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河南战况发展，有再调一部可能。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

三、蒋介石原知敌人1、2、3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4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我在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到很大，日本会坐山观虎斗罢，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中国就太平了。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倒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了。卅日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四、**在外边宣传时请将佳电中“肺腑之言”那一段（从“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蜂起之时”起至“深愿为两公一吐者”止，共102个字）着重指出，使国民党及中间派想一想，目前发生在国共间，中日间的危险状况，我们实不幸而言中，他们一定要“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所以造成了“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的结果。**

五、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此种估计是否适当，你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 虞酉

2月14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他写道：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进攻，某君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故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军事守势政治攻势8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毛泽东 寒辰

2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

此前，蒋介石指使张群、宋美龄出面拉拢小党派，以某些小让步为诱饵，使小党派对之产生幻想，借以孤立共产党；并动员小党派领袖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人，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邀请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小党派领袖虽然不相信蒋介石，对蒋不满，但也希望共产党“再忍一次”，“即使上当也是最后一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到斗争策略，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接受了民主党派的建议，同意以7个参政员的名义，将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提交给参政会。他在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中是这样写的：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钧鉴：

关于政府对新四军之处置，我党中央曾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下：（略）

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特此函达，敬希鉴察。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周恩来将这一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并将此公函抄送各党派参政员20多人。

2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发给彭德怀、左权等人的《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彭左、刘邓、贺关、聂彭、吕程、朱瑞、陈罗、陈胡：

一、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

二、**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

三、八路军尤应利用蒋差别对待政策（新四军问题不牵涉八路军），**除中下级可以声援新四军外，总部应取沉默态度（此种态度一方面表示留余地，一方面亦是示威）**，军事上则取防御姿态。

四、新四军已无合法地位，本来可以大闹，但为不使日蒋矛盾缩小，相反应使之扩大，故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

五、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准备愈快愈好，以防万一，实行愈迟愈好，以便配合国际国内的最有利条件，因此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六、因此在目前只有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才是适合上述要求的。战略的军事攻势只在必要条件成熟时才是正确的。所谓必要条件，第一是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并且投降时（他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第二是国际最有利时机的到来。只在这些条件具备时，我们才有主动权，**否则我们将陷于政治上军事上的被动地位。**这种主动权我们必须拿在自己的手中。

七、请你们根据上述方针部署军事，**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

毛 朱 王 叶

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国民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这第2个十二条是：

1、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2、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我党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3、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4、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5、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6、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7、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6个军。8、释放叶挺，回任军职。9、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10、退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11、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1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共产党代表副之。12、共产党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1941年3月2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正式开会。蒋介石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时间推迟一天，是为了争取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出席。

共产党方面代表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再次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中共中央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函文中说：

“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就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殷，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附列于后，倘此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蒋）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蒋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使蒋介石的企图完全落空了。

3月6日，蒋介石在没有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参加的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上发表演说，一方面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仍然大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老调子，可他同时也不得不宣称：

“**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3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方面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他写道：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全体参政员先生公鉴：

鱼电诵悉。诸先生关怀团结，感佩同深。4年以来，中共同人为维护民族抗战与国内团结，心力交瘁，早为国人所公认，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惟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一·一七”命令之后，敌伪抚掌，国人愤激，友邦惊疑，莫不谓国共破裂之将至。**中共中央睹此危局，自不能不采取适当步骤，力挽危局，以保团结，乃向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迁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上。**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耿耿此心，曾有前电致参政会秘书处，略述梗概，当蒙洞察**。嗣后参政员同人中颇多从中奔走以图转圜者，泽东等感此拳拳之意，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2人提出临时办法12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同时，即以此意通知参政会秘书处，亦未蒙政府置答。泽东等所提善后办法与临时办法诸条件，乃是向泽东等为参政员之政府当局提出请求解决，以为泽东等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之标准，政府固有予以解决与否之自由，泽东等亦有出席与否之自由。泽东等爱护参政会之心，今昔并无二致，**如能在此次会期内由于诸先生之努力促成，与政府诸公之当机立断，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后行。**泽东等接受政府之聘请，为团结，为抗战也。皖南事变以来，对于国共团结所加之深重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泽东等目前所处环境与诸先生不能尽同者，其故即在此。

**谨布区区，尚希谅察**。

中国共产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伯渠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3月上旬，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3科科长胡立教和作战科科长叶超，在突围中脱队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围击的情况。

3月1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胡立教、叶超汇报的皖南事变经过，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中共中央。

3月12日，毛泽东鉴于蒋介石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及参政会3月8日在董必武缺席的情况下选举他为驻会参政员一事，周恩来仍然肯定是防御性的，便致电周恩来，解释说：

“**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住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在会谈中，他表示由于先前事务繁忙，因此不便接见中共代表。对于皖南事变和一个时期以来各地的政治压迫，蒋介石推脱这不是他的意思，是下面人做的。他还说：

“国共本无事，地方摩擦即国民党内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做宣传，日本人即无事也是要造谣的。中央决不会再来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们的失败。”

蒋介石还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如释放被扣人员、继续发饷等可以提前解决。周恩来提及到防地、扩军等问题时，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词地说：

“**你们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了。

3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复电给著名旅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说起这位司徒美堂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原名叫司徒羡意，字基赞，又名彭柳，1868年出生于广东开平，1873年丧父，1877年失学，在新会县城一家小店当杂工。1880年，由其母借50元龙银，乘轮船到美国谋生，在三藩（即旧金山，华侨粤语译作三藩）市“会仙楼”食馆当厨工。1885年，他拜堂盟誓，加入三藩市洪门致公堂。1886年，他打死了一个吃“霸王饭”的白人流氓。司徒美堂从小学过武术，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六七人不能近其身。这年他20岁，见到这白人流氓吃“霸王餐”，气愤不过，三拳两脚就结果了他，为此坐了10个月苦役监，出狱后，替一个华侨家庭管带孩子。1894年，他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工。随舰到过南美及西欧一些国家。1894年冬，司徒美堂在美国波士顿致公堂内另立系统，组织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1898年，他与几名中国海员辞职，回到波士顿，推小车沿街出售水果蔬菜肉类谋生。1904年，孙中山赴美活动，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05年，司徒美堂在美国纽约成立“安良总堂”，自任安良堂总理，被称为“大佬”，尊称为“叔父”。法律顾问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后任美国总统）。1931年，司徒美堂领导侨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持19路军上海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远在美国纽约的司徒美堂觉得“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便以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名义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说中国的抗战“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需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要求蒋介石停止反共行为。

因此，毛泽东在3月14日给司徒美堂的复电中一方面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一方面又强调说：

“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

3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内容包括毛泽东早年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一书，写了一个《序言》（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的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10个有10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

3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中写道：

一、从何白《皓电》（去年10月19日）开始的第2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3月6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CC系和政学系之间，CC系和复兴系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5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11月9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12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地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12月25日的指示，**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3月24日至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柳亚子缺席的情况下，指使八中全会将在皖南事变后谴责了蒋介石，并拒绝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的柳亚子开除出国民党，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吴玉章、林伯渠、张曙时等人在柳亚子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第二天，从延安发去电报，对他慰勉有加，赞颂备至。陈毅也给柳亚子寄去了一首诗：《沁园春·慰柳亚子》。

不久，柳亚子也在香港发表声明，以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宣布“正式”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这一消息后，对柳亚子的这一惊人之举，称之为“一件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大事。”

后来，柳亚子于11月间在《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一诗中写道：“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3月间，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理论概念。

张如心，1908年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兴宁县，1926年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国民党留苏学生党部领导工作，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9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研究部部长。1931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著《哲学概论》；1931年9月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论》一文中追述道：

“这一次会面的一切真是平凡极了，普通极了，原以为毛泽东总该是特别一些，不同一些，当天若不是别人介绍我还以为他只是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呢！毛泽东对人民亲切，和蔼，诚恳，不摆架子，不耍威风，不装腔作势，这些比起旧式的‘大人物’那‘一套’来说也许是极其平凡的，然而只有这种平凡才是真正的伟大。”

1934年，张如心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先后任延安抗大主任教员、军政学院教育长、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

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期间，亲眼看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进一步地认识，开始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写道：

“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略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此后，张如心在1941年4月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1942年2月8日发表《怎样学习毛泽东》。

张如心还先后出版了多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他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一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填补了党史教材空白。他对毛泽东理论的科学、系统、正确的论述，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张如心于1976年1月因病在上海逝世，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主持，陈野苹致悼词，悼词中高度评价他说：“张如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的理论工作、教育工作勤奋努力的一生。”

再说从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

日本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烈、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办法，由以往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长驱直入地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地打击。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配合日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由于战斗频繁，伤亡严重，部队减员颇多。在华北，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不少盛产粮食的平原地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然而，任何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毛泽东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相持阶段中这一最困难的阶段，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的困难。”

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有一天，毛泽东去二十里铺参加了一个边区党的会议，当他归来走到延河河滩上时，被稀稀拉拉的几片绿色吸引住了，便停下脚步，瞧瞧四周，原来那是一些长着圆圆叶子的野菜。毛泽东对警卫员说：

“你们看，这是一种能吃的野菜，你们给我搞一点回去炒炒吃，叫老周减少一个别的菜。”

他见警卫员有些迟疑，又说：

“这叫冬寒菜，很好吃，我过去吃过。”

警卫员们这才和他一起拔起野菜来。回到住处，毛泽东接连吃了好几次冬寒菜，他见警卫员们仍然不吃，就说：

“这菜很好吃，你们也可以拔一些来当菜吃，不是现在没有菜吃吗？”

警卫员这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教育大家以野菜代替蔬菜，解决吃菜难的问题。

1941年3月，经毛泽东和朱德批准，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进了南泥湾。

359旅原先曾在绥德一带屯过田，但因驻地人稠地少，种粮代价又高，又无经验，结果失败了。此后，为了寻找适宜军屯之地，朱德便和留守兵团负责人来到南泥湾一带考察了一番。

南泥湾是个方圆几百里的平川，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以外，是延安的南大门，属于汾川河流域，是金盆湾的一个乡，与临真镇、马坊、九龙泉接壤。据说在很早以前，这里人烟稠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生产和经济都十分繁荣。到了清朝中期，统治者不断挑起回汉民族纠纷，使他们互相残杀，老百姓为避祸乱相继逃往他乡。从此，这块富饶美丽的平川，变成了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

朱德等人发现此处既是战略要地，土质又肥沃，水源也比较好，是理想的军屯之地，便向中央做了汇报。于是，毛泽东决定，由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主持延安军分区和延安卫戍区的工作，统管全旅的工农业、商业和运输生产；由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湾主持生产练兵等日常工作，将以苏鳌为团长的补充团开进南泥湾屯田。

毛泽东、朱德等还命令警4团在富县一带的槐树庄屯田；命令驻扎在陇东的王维舟的385旅开进沟深林密的大、小风川屯田。另外，豹子川、清泉镇等军屯区的生产活动也开展了起来。

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机关也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开赴南泥湾，开辟出了一个拥有300多亩地的农场。江青曾主动到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在那里一干就是二三个月。

**1941年春（这个时间是毛泽东在1965年的批示中提出的）**，毛泽东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便专心著述，对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下发的9个文件进行了解剖（师东兵在他文章中说是**在1941年10月12日以后**）。

师东兵在他的《政坛秘闻录》一书中说，这9个文件是：1931年9月20日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王明在1944年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是博古（或李竹生）起草的，绝非我起草的”。括号里的内容是笔者根据另一个材料加上去的，下同**）、1931年9月20日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周恩来起草，《王明年谱》说王明让博古起草**）、1931年12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博古或张闻天起草）、1932年1月9日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张闻天起草）、1932年2月26日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非全文，起草者待考，张闻天在2月间文章中有“抗日军阀”等术语，与文中术语同）、1932年3月30日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起草者待考）、1932年4月14日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及同一天发出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署名洛甫，即张闻天），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一气呵成写出了**5万多字**的文章，总题目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史称“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高屋建瓴，文风犀利，思想深刻，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还点出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字，刺人的话也不少。他几经修改，仍感觉有点锋芒毕露。为了团结那些犯过错误的政治局委员，他暂时还不准备在党内发表。

后来，毛泽东曾将这“九篇文章”送给任弼时和回到延安的刘少奇看，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要教育他们，首先争取他们坚定地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据**陈晋（《毛泽东传》执笔之一、《毛泽东年谱》副主编）在2017年3月31日发表的《文章千古事》**一文中说：

编辑《毛选》（即《毛泽东选集》——笔者注），毛泽东的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很富情感色彩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长达5万多字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及其政策。

**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笔者注）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

当时没有发表，**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

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既然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来，在毛泽东心目中，此文未必纯属“历史资料”，其中或许藏伏着立足现实需要让他格外珍惜的东西。的确，这篇长文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因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毛泽东倾注那样大的心血，摆出那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放纵那样锋芒毕露的犀利文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能让它永远尘封？他相信对后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则，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现“怒发冲冠”的情绪反弹了。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动手修改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完后，一番犹豫，他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印发。如何处理此文，毛泽东心里确实颇为纠结。将近10年之后，毛泽东又找出此文，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又是一番犹豫，结果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关于《九篇文章》，笔者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作为中央文献出版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的执笔和副主编的陈晋，一位历史原始资料的见证者，他的话是完全可靠的。为了将这一重要资料完整地呈献给读者，笔者不再拆解，至于毛泽东后来让中央诸领导人传阅《九篇文章》以及反复修改的情况，早已在本传后边多次叙及**（毛泽东讲的内容与上述材料略有不同，如时间问题）**，敬请读者注意。

1941年4月上旬，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人民，被人用担架抬上船，渡过黄河，来到了延安。

续范亭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胃病、肺病复发，在中共中央的催促下，才到延安治疗休养的。当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杨家岭时，毛泽东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

毛泽东对续范亭十分关心，让他住进位于延安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并专门安排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以及院里内科主任黄树则等人为他诊断。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药品分出一部分，派人送给续范亭，写信告诉他，药品的疗效和服用方法。他听说续范亭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马上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开出英文原名，交给工作人员发电报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法购买。

有一次，毛泽东专程从杨家岭走了十多公里，前往延安柳树店医科大学后山的窑洞去看望续范亭、王观澜。他一进校门，就被医科大学的学员们围住了，在众人的簇拥下，视察了学校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厨房，听取了师生们的汇报。人越来越多了，毛泽东又被师生们拉到礼堂里去讲话。他站在讲台上说道：

“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都会蓬勃发展，前途无量；失去生命力的就会枯萎、死亡。”

他指着外头山边的一棵小树说：

“医科大学像那棵小树的生长过程一样，过去是小学，现在成了大学。虽然校舍和设备还很简陋，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会不断发展的。**以后，解放了全中国，进了大城市，会发展得更大更好。只要我们真正为人民利益学习、工作、服务，我们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命力。**前进中可能会遇到曲折，但是总会不断发展的。”

毛泽东正讲着，一眼瞥见续范亭来到了礼堂，便中止了讲话，走下讲台与续范亭紧紧握手，亲切地询问他的病情。

续范亭对毛泽东非常景仰，他虽然病情很重，但听说毛泽东到了医科大学，还是带病下山到医大来看望毛泽东。他告诉毛泽东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感谢毛主席的关心。毛泽东招呼续范亭入座后，又继续上台讲下去。最后他转过脸，指着续范亭对学员们说：

“如果你们把续老的病治好了，就算你们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走下讲台，与师生们挥手告别，随着续范亭来到他的窑洞里，问寒问暖，嘱咐他安心治病。

后来，续范亭的身体渐渐康复了，便从柳树店移居到杨家岭党中央机关附近，毛泽东让他住在与自己邻近的窑洞里，方便二人见面、交谈。

4月16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一文：

一、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

二、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的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

三、**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只要中国政府的方针是坚持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只要中国政府对于苏联的援助是用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是用以反对国内同胞，例如今年1月，在皖南消灭新四军及目前在安徽湖北等省大举进攻新四军之所为，只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日本此次对于限制苏联援华的目的没有达到，是表示失望的！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要说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苏联身上的，而**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

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谓满洲国者，早为日本用为扰乱苏联与外蒙边疆的工具，张高峰、渤蒙坎两次战争，便是明证，苏联既与日本订立和平中立条约，便不能不把这一问题同时加以解决。在苏联，根据其和平中立政策，**无论与日本订约与否，都是不准备侵入东4省的**，而日本却屡图侵犯外蒙，而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4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

五、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解放事业实利赖之。

4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跋》中说：

“10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份，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毫无疑义是错误的。**”“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中写道：

“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工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和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共21条，其中七、八、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九、二十这些条款是毛泽东起草的，他对其它一些条款也作了重要修改。

4月28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他在信中写道：

“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2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新中华报》上正式发表，全文如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60万亩，增加粮食产量40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10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5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七七”事件爆发后，国民党因为要应付抗战，它的内外政策有过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它要维持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首的一党统治，它的抗战政策都是两面性的，服从于它的抗战政策的宣传政策，也是两面性的，这政治上和宣传上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抗战，另方面随时进行投降阴谋**；**一方面联共，另方面随时进行反共活动；**一方面要求精诚团结，另方面强行绝对统一；一方面要求民众参战，另方面强行统制民众；一方面高唱精神动员，另方面厉行思想统制；一方面强调三民主义，另方面修正三民主义；**一方面强调文化教育，另方面厉行复古主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为了贯彻这种两面性政策，国民党更采用各样各色的两面性的和虚伪的宣传战术，这就是在进步的东西（比抗战前）中夹着反动的东西，**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着反革命的实质；对自己则隐恶扬善，无理说成有理，坏的说成好的；对别人则隐善扬恶，有理说成无理，好的说成坏的；对老百姓及落后分子，则欺骗蒙蔽；对我党及进步人士，则造谣污蔑，**并实行“以理论对理论”、“以政治对政治”、“以文化对文化”、“以量胜质”的战术，尤其是利用它的统治地位厉行思想统制、物质统制、检查统制，并**滥用“法令”、“军纪”等作武器，来专制军民的口舌与抗议。**尤其重庆时期以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更为变本加厉。我们**必须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以正全国人民的视听。**

二、对国民党展开宣传战的总方针，是多方揭破其反动宣传，更加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更加争取广大的同盟军，以便坚持抗战到底，达到抗战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胜利。为此，我党进行宣传战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坚持抗日第一与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坚持真正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并多方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罪行，及其违反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的言论行为，以推动国民党进步分子，争取其中间分子，孤立其反动分子。又一方面，争取社会的广大同情者和同盟军，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反对其反动的复古主义和一党专制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思想、信仰、言论、研究、创作、出版、教育之自由，要赞助广大中间分子自由主义立场，要同情被压迫、被排斥的地方势力。

三、**对于国民党的抗战方面和合理方面的宣传，我们应出以拥护和赞助的态度**，但估计它在这方面的两面性、不彻底性（反动的宣传）、虚伪性（掩盖着反动的实质）、局限性（地方的、时间的与问题的局限性），不可笼统地、抽象地、一般地去拥护，而应分别对待之：1、只拥护它的真实进步和真实合理的东西。2、批评它的不彻底性，揭露它的两面性、虚伪性，冲破它的局限性。因为有推进它的进步合理的作用，所以在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有利时，即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否则采用迂回的侧面的方式。3、利用它的进步即合理的一面，以打击它的反动的错误的一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个战术，在对国民党进行宣传战时，需要灵活使用**。4、把它的进步地和合理地宣传，变成群众性的鼓动，造成“支票兑现”运动。

四、在反对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一般反动宣传时，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批评其反动理论，以真正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对抗其修正三民主义，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抗其复古主义文化，以三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解释的和我党所实行的）击破其反动政策。

五、国民党不敢正视现实（由于它自己阶级的没落性），所以在它要表扬自己打击别人时，它就**尽量搬出世界上一切没落阶级所惯用的宣传武器，这就是虚伪、夸大、造谣、掩饰。**为要击破它的这种宣传，应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立场，**我们宣传鼓动中某些夸张的东西是不必要的。**

六、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时，应注意以下原则：1、以科学立场，解释共产主义和中共适合中国国情之需要。2、以客观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合于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合于总理遗嘱，合于抗战建国纲领）。3、以真凭实据粉碎其造谣诬蔑，以公开揭露对付其秘密宣传。4、在反对一般的反共宣传中，应当遵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需要以说理明事的态度，去贯彻义正词严的立场，以便争取社会的尤其是中间分子的同情。5、但**对于顽强的、有影响的反共对手（人或言论），则应向之进行系统的斗争，直到他全军覆没，哑口无言为止。**

七、要同国民党展开全面的（国民党已开始这样做）、进攻的（国民党方面一般是防御的）宣传战。这就是说，要从理论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文艺的（今天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多多少少做了些工作），以至教育的、经济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些方面至今我们做的很少），各方面都建立和巩固我们的作战阵地。要做到这个地步，就要我们有计划的培养和调节各方面的干部（国民党在这方面有极大的困难和弱点），有系统的加深他们的专门研究。

八、在瓦解反动宣传方面，不但应当从外面来击破它，还应当乘隙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宣传堡垒里面去瓦解它，尤其要善于利用其内部矛盾而各个击破之。在反对反动宣传和扩大进步宣传方面，应当同时使用合法战与非法战，应当动员外围军和中间力量，并利用外国宣传机关。为要胜利地使用这些战术，就需要我们灵活地、正确地执行宣传战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建立、扩大和巩固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善于处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务求长期地保护宣传战方面的内线工作、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

九、在国民党区域的出版发行工作（党的和同情者的），要以精干政策战胜国民党的量胜政策，以分散政策抵抗其统制政策，以隐蔽政策对抗其摧残政策。因此，需要改变和改善宣传战方面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出版发行工作。

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要能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一方面熟悉我党政策、口号及其实际，熟悉我党和我党领袖人物的言论、文献（国民党中有些颇注意研究我们这方面），又一方面熟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历史，熟悉其文献、政府法令，熟悉其内部派别、领袖人物及言论（**国民党颇有一部分人善于引经据典）**。但要做到这地步，就必须纠正党内（同样宣传工作干部中）相当普遍的轻视或忽视研究国民党的观点。

十一、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努力（尤其是宣传工作干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努力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真正在我们宣传战上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真正使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们宣传工作还远没有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全文如下：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3月18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国民党第2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的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10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2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它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3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份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12月25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10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模糊起来了。

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10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以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

高岗担任西北局书记后，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以为自己是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和西北局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的工作不向西北局汇报，有事也不向西北局请示。高岗为此大为不满，他不仅在各种场合对留守兵团提出批评，并且还说，留守兵团如果再这样下去，西北局将不再负责他们的后勤供应和保障。一时间，西北局和留守兵团之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高岗除了和萧劲光这个矛盾之外，以前就有过节，那还是在他兼任留守兵团所属的保安司令部司令的时候。身为留守兵团司令的萧劲光一是忽视了高岗在党内的地位远比他要高得多，二是忽视了毛泽东对陕北红军干部的重视，曾多次强调外来干部要与本地干部搞好团结。正是这两个原因，萧劲光只把高岗当作自己的下级看待，按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来处理他和高岗的关系。

二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缘自有一架飞机要来延安，因飞机场正在维修，无法降落，萧劲光便让高岗去督促一下，争取快些修好。结果高岗没有按时完成任务，萧劲光就对他大发雷霆，高岗由此对萧劲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毛泽东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后，就把萧劲光和留守兵团的其他负责人叫去，要求他们尊重高岗，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搞好党政军关系。他明确地说：

“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事情就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

毛泽东还推心置腹地说：

“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要通知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知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就应该尊重哪里的地方党委和政府。”

这样，高岗总算报了修机场那一箭之仇。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在近期修改中加入了诸多毛泽东撰写的电文、党内指示、施政纲领、评论、公函和总结等文稿，不但使历史脉络更加清晰，而且也使毛泽东的文韬愈发显现出来。3月8日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一篇，半文半白，文字优雅，读起来朗朗上口，绝无冗长累赘之感。这一类原始材料，特别是信札、文告之类，笔者每每诵读，兴味盎然，爱不释手。用词口语化，用典委婉，表意出新，这些不寻常之处，充分展现出一位**语言大师、文章大家**的卓越风采！这是迄今为止很多“毛学”研究者很少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47章**

**“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将变成一个**

**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

**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

**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话说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事业亦加以改进，通为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党宣传。《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中央机关刊物是《解放》周刊。此外还有《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共产党人》等10多种报刊杂志。在1940年以前，这些报刊杂志与时代的需求基本相适应。但从1941年开始，《新中华报》就显得内容不够了，而且是3日1刊，周期长，分量也不足。《解放》周刊有时是两周合刊，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它报刊也基本类似。再加上根据地进入非常困难时期，纸张、经费严重不足，发行渠道堵塞。因此，毛泽东向中央提议停办其它报刊，集中力量创办《解放日报》。

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由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全文如下：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4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摩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摩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予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予以坚决地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予以坚决地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5月间，中原局把徐海东的病情和心情报告给毛泽东。

此前，徐海东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在皖南事变后，他对新四军的损失十分痛心，因之病情加重了，病倒在了华中战场上。

毛泽东给徐海东发了一封200多字的电报，大多是安慰他治病的话，最后是8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电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让秘书把那8个字，用毛笔写在日历牌的硬纸上，放在自己的枕边。回想起自己在延安治病时，毛泽东曾多次去看望他，知道他不能吃东西，就亲自批条子，派人送给他50块钱作为生活补贴。毛泽东对他太关心、太爱护了。徐海东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相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天不会塌下来。

徐海东在养病期间，总忘不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所说的谁看不完那3部古典小说不算中国人的笑话。他常说，只要我不死，一定要读完《红楼梦》，决不做半个中国人。他在病情稳定的时候，除了注意战局，学习共产党文件，就坚持读《红楼梦》，终于读完了这部小说。他高兴地说：“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了。”

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统战部送来了一个开会通知。这是一份出席干部会议的人员名单。韩光见名单上有其他几个科长的名字，唯独没有自己，心中很不舒服。他还听说毛泽东要在会议上作报告，便决心一定要争取去听听。他找到副部长柯庆施，说：

“柯部长，别人都有会议通知，我也想去参加会议，不知是否可以？”

柯庆施说：

“按条件，你可以参加。这样吧，你写一个简历和申请，我给你送上去。”

韩光按照要求很快就写好了。柯庆施便把他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秘书长李富春。

第二天，韩光便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长篇报告。

毛泽东作报告从来不喜欢照着稿子念，只偶尔看一眼简明扼要的讲话提纲。这一次的报告也是如此。只见他站在讲台桌前，面前放着两三页纸，讲话间，时而在桌子前走来走去，时而举起右手打着手势，以期引起听者的注意。他那生动的语言，严谨的论证，深入浅出的道理，妙语连珠的比喻，不时引起会场上阵阵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气氛十分热烈。

坐在听众席上的韩光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他感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报告。毛泽东一开始便说：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关于“研究现状”，他说：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关于“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说：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关于“主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

**“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作没有党性，或叫作党性不完全。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他的“号召，很快就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

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成为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

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组成；刘少奇兼任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全文如下：

1、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2、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3、**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

4、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做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5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之一言一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从近几月中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看来，我党的对外宣传是不适合于这个要求的。特别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这种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党所没有的极端严重的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因此中央决定：

（甲）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的公开发言，尤应严格遵守此原则。**各军事领袖不得军委许可不准公开发表有关全国性的意见。凡牵涉到全国性意义的重要政治事变，任何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及任何军事首长，在中央未指示前，不得公开发言，**以保障全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

（乙）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宣传部应负责立即停止在这方面的无监督无政府的现象，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并加强其领导。

（丙）各地方报纸下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广播台及起广播台作用的战报台，应划归通讯社，并设立广播委员会专门负责广播材料的审查编辑，并由宣传部指定一政治上坚强的同志领导之，并经常检查其工作。

（丁）**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

（戊）**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其他根据地的广播的登载与否，应根据本决定第2项来审查处理，无选择地登载是不允许的。

中央书记处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小礼堂主持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会议正进行着，突然间天降暴雨，一道闪电从屋角穿入室内，“轰隆”一声把一根木头柱子劈断了。与会人员都受到了巨大震动，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正当众人惊魂未定之际，会议室内又传出了凄厉的呼救声。林伯渠立即派人进入室内，将受伤人员一一扶了出来。延安市高市长、志丹县赵县长、延长县白县长经过抢救都脱离了危险，唯有延川县4科科长、代县长李彩荣不幸身亡。

有道是祸不单行。在延安南关市场里，拴在木桩上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它的主人是一位50来岁的安塞汉子，这汉子本来就对时下的负担过重不满意，如今又损失了毛驴，气不打一处来，站在大街上扯着嗓子便骂开了：

“老天爷不开眼，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劈了李县长，劈死我的毛驴……”

周围的老乡们都吓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劝那汉子，有的则议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那汉子抓起来，也有人建议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不久，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望着小吴问道：

“听说你们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

小吴激动地回答说：

“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你。”

“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李县长是中了雷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你。我们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他说：

“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小吴坚持说：

“不。你是人民的领袖，骂你，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问：

“你想过没有，真的汉奸特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张张嘴却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又问道：

“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小吴说：

“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吧？”

“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小吴不再吭声了。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

“小吴同志，我建议你们，不要拘留那位老乡。还要请你们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小吴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小吴来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的情况，他说：

“抗战初期，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有的人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有的人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公粮何以会猛增呢？原来到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脱产人员已经增到了7.3万人，这么多人要吃饭，自然就需要增加更多的公粮。20万石公粮，在陕北这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人均负担1斗4升。这样的负担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和前几年相比，的确是重多了。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噢”了一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他心情非常沉重，叹了口气，思索片刻，又说道：

“看来，这位老乡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们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就是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

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征收任务还是比较重，加上有些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还是难以避免发生一些损害党和群众关系的事情。

清涧县一位农妇，因为生活艰难，干部强征公粮，忍不住骂了共产党，骂了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后马上逮捕了那个妇女，说是要枪毙她。保卫处长钱益民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东西，听完汇报，气得“啪”地一声把毛笔甩在桌子上，站起身来，盯了一眼钱益民，然后在窑洞里来回踱步。停了一会儿，他才对钱益民说：

“不要为难这位农民，你把她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不久，钱益民将一名叫伍兰花的中年妇女带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农村妇女，虽说只有36岁，但看上去却像50多岁的样子，一副老实忠厚的农民形象。毛泽东马上走上前去，亲自替她松了绑，说：

“你不要怕，坐吧。”

伍兰花坐下后，毛泽东面带微笑把一杯开水送到她手上，和蔼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啊？”

伍兰花误认为是保卫部门在枪毙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认罪，她气愤地嚷道：

“枪毙我也要骂，反正咱活着也是饿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泽东问：

“为什么活着也是饿死呢？”

伍兰花没好气地说：

“你们培养出来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们老百姓交公粮，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

毛泽东问：

“你家有什么困难吗？”

伍兰花看到毛泽东比其他干部都和气，略微平静了一点，说：

“咱清涧苦啊！咱一家6口人，3个娃都小，婆婆72岁，男人又是个傻子，就靠我这一个女人维持这个家。咱住的窑还靠着沟边，发水就涝，就是想挖孔新窑，也没有钱雇人。共产党来了，咱分了5亩地，头两年还好，这两年村里官、乡里官、县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粮咱出不起，就骂咱男人和老娘。”

毛泽东问：

“村干部乡干部真的骂人？”

伍兰花说：

“妇道人家不敢撒谎，咱要说假话出门就叫挨枪子。咱不是不拥护你们八路军，只是咱家确实交不起公粮。今年遇上天旱，咱一个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点粮食，咱跟催公粮的干部求情，把公粮推到明年一块儿交，可他们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一袋粮食给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没有活路了，一气之下，是骂了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此处，气呼呼地站了起来，点着烟猛吸几口，前后踱了几步，大声叫道：

“钱益民！”

钱益民应声进了屋，说：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当着伍兰花的面，大声训斥道：

“你们保卫部门在搞什么名堂？连这样简单案子都断不明白？中央对交公粮的政策规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提下，自觉地交公粮，怎么能没收老百姓的口粮呢？这位妇女敢讲真话，是位好同志，不但没有罪，我们还要接受她的意见，赶快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地拥护。伍兰花同志现在就释放，你亲自护送她回家，还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讲，不但要把没收的粮食退还给她家，还要好好照顾，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总之，不准饿死一个人。”

伍兰花听说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惊，又听了他说的话，感动得“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大声说道：

“毛主席，咱对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连忙将她搀了起来，安慰她说：

“伍兰花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该挨骂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难不解决，你就来找我毛泽东。”

就在这年的6月初，与陕北的雷击之天灾相比，发生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大隧道惨案”可真正是人祸了。这个惨案，与前边已经说过的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和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3大惨案。

那是在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重庆市区雨后初晴，市民们正准备吃晚饭，突然间空袭警报长鸣，人们纷纷拥向较场口公共防空大隧道的3个进出口：十八梯、演武厅和石灰市。由于当局有关方面未及时对拥来的市民进行疏散，大量民众拥入了这个通风照明设备未曾验收且不能使用、洞内设计上既不能使空气对流又没有通风井，还没有排水井、出入口又狭小的特大隧道，立时呈现出饱和状态。

据当天防空部档案记载：“是日敌机24架分3批（每批8架）袭渝，自17：33起于湖北宜都松滋处发现西飞。”第一批于“19：28侵入重庆市空投弹，至19：54始经丰都东逸。”第二批于“20：4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1：20经丰都东逸。”第三批“22：1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3：13经丰都东逸。”

由此可知，3批次空袭的间隔几乎都在近1个小时左右，可是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锁了栅门，不准里边的市民在空袭间隙出入隧道喘息休息。因此，长时间的高温和严重缺氧，致使避难者因通风不畅而窒息，同时又发生了推挤践踏，最终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

有生还者朱更桃回忆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

生还者何顺征也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人群越往洞口挤，门就越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地往外挤，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往外挤。后来洞门被挤破之时，洞内的人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了出去，因此得以生还。郭伟波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他说：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这次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

“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

6月6日凌晨，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在幕僚建议下，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这些人因缺氧而死，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防护团员、服务队员不管死活把人一个个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有一丝气息，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更有甚者，一些参加抢救的人员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剥取衣裤，引起群众极大愤慨。运至朝天门河坝的人中，确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者。他们醒来后发现随身所携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放声大哭。

这一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对外宣称：“惨案死亡461人，重伤291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在致行政院的函中称：“截止本（6）日午后4时20分止，3处洞口共计运出男女尸944具，童尸74具。至于洞内余存死亡数目，因隧道太深，一时无从清查。”6月8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再次呈文行政院说：“3洞尸体已全部运出洞外，计有1115人。”

而据广东籍的幸存者刘伟波回忆说：“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避难生还的欧阳祝泽也说：“十八梯洞内死的人很多，搬了一个昼夜才勉强搬完，大约死的五六千人。”曾入演武厅避难生还的李建国说：“3个洞子都死了不少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厅洞子第三，但演武厅洞子也死了不少人，大约有二三千人，总计3洞死了万把人。”

大隧道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如今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准确的统计了，但有一个数据还是可供读者参考的，那就是防空洞设计的容纳量。这一段大隧道的长度为438. 4米，乘以宽度2. 5米，面积是1096平方米；乘以高度2米，等于2392立方米。防空部规定洞的容量标准是每平方米4人。当时的审委会的解释是：“镇静之避难者, 在换气设备之防空洞滞留1小时，每人所需之空气应为1立方公尺，通常以滞留2小时为准，每人应有3立方公尺之空气量。”据此计算，该洞常规容量是4384人；加上两侧梯道面积134. 75 平方米, 容纳555人，合起来总容量就近5000人。而当天入洞人数，从上面引述的生还者提供的资料来看，有可能超过了万人。

大隧道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一职；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桢撤职留任。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再说6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个《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国民党正用武装进攻、胁迫、自首等方法向我老苏区老游击区进攻，**这些地区党要实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则必须：

1. **隐蔽组织，避免打击**。一切仅仅有利于国民党的抗战动员不再起模范作用，应与大多数民众取同样态度，对新四军家属之互助救济则在不妨害秘密工作情况下，可暗中进行。

二、**对于不反对我党而反对国民党的土匪，不再帮助国民党剿匪。如上述的土匪要求我们帮助时，可以给以适当的帮助。**

三、**目前在大后方老苏区老游击区一般地不应当与国民党作武装斗争，但如果国民党武装进攻时在必要与可能武装自卫并能坚持的条件下，可以武装自卫，并应有不怕武装斗争扩大的决心**，但武装自卫的目的仍在求得和平和保存党的力量，因此自卫斗争必须遵守下列的原则：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乙、“有理，有利，有节”。

1. **武装自卫只有在迫不得已而且可能坚持的情况下进行**，决不是任何老苏区老游击区都可武装斗争，因此何处应武装自卫须由南委及华中局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不能武装自卫的区域应保存枪支，并迅速撤退已暴露的干部。**

五、利用社会上厌恶内战情绪，发动当地绅商、军政各界人士制止国民党的内战，分化和孤立顽固反共分子。

六、**当国民党强迫党员和群众办理自首手续时，可以允许党员和群众一起假自首，那些不能假自首的干部应迅速调开，但假自首的党员绝不准破坏机关和人员，破坏机关和人员者即是叛徒。**

七、**党内一般地不要采取小组、支部、区委、县委等等的组织形式，不要开会，只用个别联系**，选择当地能够立脚在职干部任联络员、工作员，特派员，**形成只有党员而无组织形式。**

八、**改变党的组织形式，绝不是取消党，党员不作突出的活动也不是取消工作，**每个党员应该：一方面识字读书，自我学习，另一方面以普通社会人士面目去赞助公益事业，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培养自己在群众中的信仰。

中央书记处

6月22日，德国军队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不宣而战。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

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全文如下：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任务是**：

1.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2、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3、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6月间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远远看见黄有凤和一个女学生在一起。第二天，他在作战室看地图时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黄有凤：

“黄有凤，你快30岁了吧？昨天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黄有凤老老实实回答说：

“是的。她叫赵雪明。”

赵雪明是抗大的学员，黄有凤正和她谈恋爱。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等抗战胜利后条件好了再结婚。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便红着脸把二人的交往和心愿说了一遍。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含着笑替他参谋起来。毛泽东说：

“抗日战争是个持久战，你们年纪都不小了，等到战争胜利那天，恐怕你们都老喽。我看你还是打个报告结婚吧。”

黄有凤听了毛泽东的话，就和赵雪明商量结婚的事。不久，他们就向组织上递交了结婚申请报告。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经过20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二、我们的党，虽然已有20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的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与项英反抗中央的机会主义所引起的皖南失败，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不可终日的危险，可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存在着的严重危险。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地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1）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2）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1. 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三、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

（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2）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外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7月间，17岁的毛雪华在边中毕业了，到杨家岭看望叔叔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叔叔，我毕业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当教员，您看到哪里去适合？”

毛泽东说：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龄还小呢，那些学员的年龄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边中怎么样？”

“到边中有困难，你普通话还讲不好啊！”

毛雪华哑然了，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说：

“你到自然科学院去吧，继续学习，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将来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你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祖国出力。”

毛雪华临别时，说边中校长董纯才为制作学员证书，委托他请毛泽东为证书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奋斗！”

后来，毛雪华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又应教务长魏之想委托，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拿出一张旧《解放日报》，铺在办公桌上，挥笔写下了“自然科学院”5个大字，他端详了一下，又重写了一幅，放下笔说：

“这两份随你选吧。”

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一书，同时要求见面谈一谈。

萧军是继1938年之后在1940年6月间第2次来到了延安，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为7个主席之一，还担任了《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等。在从事大量的文化社会工作的同时，仍然继续撰写他的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地在《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评论。生性豪放的他，论人论事从不注意方式方法，坦率直言，因此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就出现了矛盾。他曾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周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加上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就在这时候，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烦躁的萧军看了这篇文章就更烦躁了。**周扬这篇文章在论及延安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指责激怒了萧军。他便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3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此外，还讲到凡是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

文章寄给《解放日报》后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萧军看来，既然周扬可以写文章批评别人，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它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直接和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省得在这里生闲气。他还想在走前见一见一年来一直没有深交的毛泽东，就写出了那一封借书并求见的信。

7月15日，萧军等了一个星期未见到毛泽东的回信，便不耐烦了，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泽东同志：

本月8日曾有一函奉达，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见回示。我推测原因或许不外以下3种：一信未收到，二近来工作忙，三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如属第一、第二两项，我还愿再等一星期，如属第三项，我也就决定不再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有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的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条。

萧军

7月20日，毛泽东和萧军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次谈话的情形：

“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战斗的故事，他（主席）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接着我就谈起了我预备谈的题目：①根据施政纲领，组织的纪律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②关于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他先是问我：‘你对于施政纲领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他翻着我带去的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施政纲领。‘对于这施政纲领在原则上我是全部赞成的，只是为了其中的个别条款与我所经历的事实不合，所以引起了我的疑惑……’他接着把我在条文上所用红笔划好的地方匆忙地解说着，他指着‘把持包办’说：‘为什么要规定施政纲领呢？就因为党和群众中间有了矛盾。这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规定……你要知道，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等3年，5年，或20年。如果抵触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触了组织纪律……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

“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我把党内外作家各作了一番分析。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他很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呢？’**

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的调动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

7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联名给各兵团发出指示，要求各兵团尽可能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并给予他们特殊优待。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说：

“20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20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1. 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3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3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予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7月1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应该说，**毛泽东起草的这一个决定不仅是方法论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政论写作的经典范文之一，值得后人认真研读。**

8月2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慎思，拿起铅笔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一霎时，一个个大而粗重力透纸背的铅笔字洒满了3张信笺。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便去信表示，“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尊重感谢的！”承认“缺乏信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是在社会上碰钉子的主要原因。萧军又十分苦恼地说，“**一个人和自己格斗所费的力气，那是十倍于敌人的啊！”**同时萧军又心悦诚服的表示，“**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萧军向毛主席提出请求：“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你去谈谈。”并随信寄去了3张报纸和一篇文章。

8月4日，日军轰炸机共27架次，分3批空袭延安，投弹100多枚，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其中一颗炸弹落在林育英的窑洞门口，爆炸声和冲击波使本来就有病的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强烈刺激。他的病急剧恶化，身体出现水肿，秘书、警卫员及其妻子涂俊明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

毛泽东获悉后，指示中央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医的悉心治疗下，林育英的病才得以稳定下来。

8月6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再奉约略叙。敬祝健康！

毛泽东

萧军所寄“报纸”是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3张报纸，上面有前边已经提到的周扬的那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就是由他执笔的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合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8月10日傍晚，萧军又收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只见上边写着：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

此致敬礼！

毛泽东 8月10日下午8时半

萧军看了信，当即来到杨家岭，在昏暗的灯光下与毛泽东就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促膝长谈。萧军重提他与其他一些文艺界人士对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不能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毛泽东爽朗一笑，点拨他说：

“**你不是编了一份《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

经毛泽东一点拨，萧军心中多日来的不愉快一扫而空。他问道：

“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毛泽东说：“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呢！”

萧军建议说：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才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赞赏地说：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甭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毛泽东如此真诚坦率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萧军，他答应继续留下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夜已经很深了，萧军起身告辞，他向毛泽东建议说：

“在‘文抗’住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投奔革命，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啊！”毛泽东亲切风趣而又深表歉意地说：“你代我向大家问好，过几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傍晚，毛泽东由一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漫步来到了“文抗”的所在地杨家沟的半山腰兰家坪。萧军见毛泽东不期而至，又惊又喜，忙招呼他先到自己的窑洞里坐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找舒群和艾青、罗烽、白朗及其他作家。他虽然已经告诉了众人毛泽东最近可能要来造访，但不曾想毛泽东这么快就来了。由于事先没有约定，萧军跑了几个窑洞，也没有找到一个人，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远远望见艾青一个人姗姗而归。萧军抢上去一把抓住艾青，告诉他说毛泽东已经来了。艾青急忙脱掉身上的旧军装，换上一套笔挺的西装，系上领带，随着萧军快步来见毛泽东。

夜已经很深了，警卫员提着马灯在前边引路，萧军和艾青陪着毛泽东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一直走到山下，这才握手作别，望着毛泽东高一脚低一脚地慢慢离去。

毛泽东回到杨家岭窑洞，见重庆发来一纸电文，说是国民党要员张冲已于8月11日病逝，年仅39岁。

张冲，又名淮南，字以行，1904年出生于浙江乐清，1919年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参加新文化运动，组织“醒华会”；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组部代理副部长。他是国民党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真心主张抗战的少数人之一，长时间代表国民党方面与周恩来等人谈判。毛泽东一直敬重张冲的为人，稍加思索，便提笔为其写下了一幅挽联：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8月12日清晨，萧军刚刚起床，见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匆匆赶来，递给他一封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8月12日早

萧军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他的夫人王德芬，又跑去通知艾青、罗烽、舒群等人。艾青的夫人韦嫈昨晚在兰家坪的山路上散步，错过了见毛泽东的机会，听说毛泽东要见她们，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拍手叫好。

吃罢早饭，萧军在前边领路，王德芬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和舒群夫妇、艾青夫妇、罗烽夫妇一起随后跟着，一路下山，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前，早有江青抱着女儿李讷在门口迎候。毛泽东闻声走出窑洞，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进屋。众人进入窑洞，见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也来了，便相互之间分别握手问好，落座叙话。大家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谈得十分尽兴，不知不觉间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端上来饭菜，招呼众人围坐在一起进餐。他和大家边吃边谈，他还说，中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以便集思广益，制定一项党的文艺政策。

这时候，毛泽东住处的枣树上已经结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风吹拂着树叶，整洁的庭院里飘逸着淡淡的清香。

有一天，毛华初高高兴兴地跨进了院门。叶子龙见他来了，就说：

“啊，你来了。有客人刚过去，要见主席你快进去，过一会儿要开会，就没有时间了。”

毛华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正和王若飞、彭真握手，问好。

王若飞和彭真上身穿着白色粗布衬衫，下边穿着蓝色土布裤，坐下后，各自用草帽扇着冒汗的身子。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华初进了屋，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问候道：

“伯伯和叔叔们好！”

毛泽东向王若飞、彭真介绍说：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过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着。”

彭真笑嘻嘻地说：

“带的和亲生的也是一样。”

“别看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

毛泽东看着眼前的侄儿，自然想到了陪着妈妈坐过监的毛岸英，想到了自己那些流浪的儿女们，想到了更多的孤儿，他越说越激动：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的那一套，杀人如麻，白色恐怖，又比封建帝王、法西斯还厉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亲族，连小孩也不放过。**在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多少这样的孤儿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华初听着伯伯的话，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敌人杀害了他的生母罗醒，还把母亲的头割下来，挂在永和镇示众7天，她的身躯被丢在沙洲上，不许收尸，让狗吃，让河水冲走。**毛华初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8月19日，日军飞机35架次空袭延安，投弹35枚，死伤10人。延长县也遭到7架敌机空袭，死伤多人。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10月，在近3年里，日军飞机不定期来延安空袭，先后共17次，投弹约1690枚。军民死亡214人，伤184人，毁公房1176间，过街楼10座，石牌楼10座，石洞5座，毁民房14452间，死牲畜197头，毁粮34.4万斤。另外还炸毁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与此同时，日军飞机还对边区境内的富县、甘泉、延长、延川、清涧等县城进行了轰炸。

且说8月26日，高克林撰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高克林在1941年初对鲁忠才运盐队的3个人做了调查研究后，所写的一个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当日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作序。他写道：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3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8月2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议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准备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提出了恢复和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方案，他说：

“1、国民党释放叶挺，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出席参政会议，否则仍不出席。2、**中国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疆界**，国民党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力，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停止攻击。3、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4、**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欲知国共关系后来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十分清晰地为王明一类政治骗子画了像。那些辛辣、尖锐、深刻的语言，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觉得痛快淋漓！想当年，王明一伙人崽卖爷田，是何等的颐指气使。到如今，他们却俯首帖耳，如坐针毡。我们后人也实在有必要把‘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子贴在自家墙上，经常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48章**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

**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话说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任弼时、王明、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邓发、朱德、康生；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李富春、林伯渠、高岗、王若飞、叶剑英、李维汉、彭真、陈伯达、杨松。会议记录由王首道、胡乔木担任。

这次扩大会议此后又先后在9月11日、12日、29日和10月12日开了4次，史称第一次“九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

在这5次会议中，毛泽东作了主题报告，除了王明出面辩驳外，还有28人次先后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肯定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不少人联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重要领导人也幡然醒悟，痛心检讨。有的人发言两次，还有人3次发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还发表了胡乔木、艾思奇等人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参加整风应取的态度。

9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中，首先说明了召开这个扩大会议的原因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

接着，他重点讲了3个问题：

1、“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左”倾冒险主义自称是“国际路线”，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

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说，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3个方面。“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5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首先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反对闹独立性。他建议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并提议由王稼祥为副组长。他说，“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9月11日，张闻天在扩大会议上首先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5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

张闻天还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5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

张闻天还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

博古在发言中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作教条在苏区搬用。

接着，王明开始了在扩大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

接着，他便夸夸其谈，表明自己一贯正确。他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古、洛甫在中央苏区时对毛主席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博古是“苏维埃后期主要的错误负责者。”**声称他只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他还说，他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

接着，他又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

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者们的严重不满。

王稼祥在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9月12日，任弼时在扩大会议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

任弼时还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毛泽东、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地理论联系实际。

他又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维汉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也在扩大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检讨说，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

9月12日下午，王明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维汉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他认为李维汉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继续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9月13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他讲了3个问题，全文如下：

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地努力。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4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4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5县。这5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地努力。

二、方法。

1、**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地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4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像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1905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么，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三、答复几个问题。

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40%，富农占有土地达30，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10%，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80%，中农、贫农只占有20%。但是，地主人口不过1%，富农人口不过5%，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80%。一方面以6%的人口占有土地80%，另方面以80%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20%。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3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中说，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决定中还说，高级学习组成员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高级领导人为主，全国以300人为限，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延安和各地高级学习组通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为题。

9月29日，“九月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在10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张闻天和李维汉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

9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学习组组长的名义和副组长王稼祥起草给中央学习组及高级学习组各同志的通知，全文如下：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1939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8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4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6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和王明应邀到坐落在蓝家坪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去演讲。

这一天虽然是个晴天，还是有些凉意。在学院北边的长方形教室里，学员们大都是席地而坐，有的人捡块土砖垫着，也有的拿张报纸或自己的手帕铺在地上，静静地等候着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和王明等人从侧门悄悄地进来，走上了靠北墙的讲台。

这是一个1尺高1米多宽两三米长的土台子，上面放着一张陈旧的木桌子，摆着两三张长木凳。

毛泽东高大魁梧，蓄着浓密的黑发，笔挺的身躯穿着同干部、战士一样普通的八路军服装，裤子膝盖处还有块大补丁，脚蹬一双旧布鞋，十分朴素，脸上总露着一种和善的微笑，没有一点派头，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一样。和他相比，显得又矮又胖的王明，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穿着一身黄色呢军服，今天破例没有再穿他那双皮马靴。但他依然是神气活现，显得十分傲慢。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请王明同志先讲。王明也不客气，站起身来，瞥了毛泽东一眼，就夸夸其谈地讲起来了。他对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爆发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错误观点。

王明讲完了，毛泽东针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讲话。他不尚空谈，也没有慷慨激昂，更不是声色俱厉，而是慢慢地摆事实讲道理。他说：

“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对苏维埃根据地和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白区100%损失了，苏区损失了90%以上，**使白区和苏区牺牲了不计其数的好同志，把一块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也丢掉了，这是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倾机会主义者比猪还蠢。一头蠢猪总想用嘴拱破菜园的篱笆，拱进菜园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园的主人用棍棒打出来后，它第二次就不会再从原地拱进菜园去偷菜吃了，它会换一个地方再拱进菜园去偷菜吃**。**可是我们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今天喊要打长沙，明天喊要打南昌，还高喊要攻打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牺牲很大，还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转个弯。你们看，‘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者，是不是比猪还要蠢？”**

毛泽东的话引得学员们哄堂大笑。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说：

“1、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2、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3、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4日，中共中央学习组发出通知：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马恩列斯方法论的研究，本年内均先通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的文件选集，明年可进入研究阶段。

10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13个大窑洞里举办了一个农业展览会，陈列着谷子、糜子、小麦、荞麦、玉米、高梁等边区各类农产品的样品。每一种展品的旁边，都写着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名字。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毛泽东也赶来农业展览会参观。在农展会工作人员陪同下，他从一个窑洞走到另一个窑洞，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每一张描述边区农业概况的图表和每一种展品。当他看到写有“延安南川吴家枣园郝光华”名字的展品时，一个工作人员指着旁边一个正在参观的农民说：

“主席，他就是郝光华同志。”

毛泽东立即朝郝光华走去，热情地同他打招呼，拉着他那结满厚茧的大手，兴奋地说：

“听同志们说，你劳动得很好，打了不少粮食，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3人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王明说，抗战初期，你在武汉工作期间，对形势估计乐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战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组织问题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极不正常，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不对的。

王明不仅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批评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

“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王明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胡乔木列席会议。

王明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首先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人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国民党搞好关系，应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武汉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他还说，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发言结束时，他还气势汹汹地冲毛泽东发起挑衅，他说：

“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

毛泽东在发言中通报了7日晚上4人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他最后说：

“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王明同志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进行讨论。一气之下，肝火上升，心跳加快，扁桃腺发炎。

10月10日，黄有凤和赵雪明在中央军委办公楼2楼举行婚礼，毛泽东作为他们的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还送给他俩两瓶延安大生产时期自产的红葡萄酒和一床碎花洋布被子。

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

“‘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饶（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个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大有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专门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可此时的王明知道大势已去，便宣布有病请假，不参加会议了。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说：

“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

毛泽东根据大家发言的意见，归纳了几点看法，作为准备提交六届七中全会、再提交七次大会的一个结论草案。其要点是：1、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2、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3、我党20年来的历史问题。认为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4、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取治病救人的办法。5、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

会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员包括：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织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成员包括：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伟大任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10月14日，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从此，他借口养病，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有一天，康生见到了江青，他说：

“王明同志在医院里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将康生的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账的，该说的时候，那就狠狠碰他几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让江青代表自己去和党内的重要人物打交道。江青知道王明是个能言善辩极难缠的主儿，所以她决定在王明面前要表现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泽东的风度和气量。王明见江青来看他，就问道：

“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

江青说：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一起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我对主席是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价很高。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并不影响你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全党都希望你们在这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前进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是正人君子吧。**”

“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尊敬的，毕竟他把这支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见王明的真实嘴脸终于露出来了，就也平静地说：

“这次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训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这两种教育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王明没有想到江青说出了这一番大道理，他不想再谈下去，于是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今天还是第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是得理不饶人，她笑着问道：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讨厌两面派。张国焘也吹捧过我，后来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毛泽东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简直是哭笑不得，无奈地点点头，说：

“对，很对。看来这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堂课嘛。不过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干脆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说：

“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呀，主席还说他是个土包子，我最多也只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你们从苏联回来的人，见过大世面，才是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做出送客的姿态，走到江青面前神秘地说：

“有句话请你回去转告老毛，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不忠诚的人，老毛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问：

“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不愿意再谈下去，只是说：

“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还是请老毛多做参考。”

江青回到家里，向毛泽东汇报了她和王明的谈话，说到康生的时候，毛泽东笑了笑说：

**“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是别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后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到医院或家中去看望王明，及时解决他在医疗中遇到的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还专门到医院，嘱咐院长傅连暲要认真负责。傅连暲亲自挂帅，担任王明的主治医师，选择金茂岳大夫担任他的助手。

金茂岳，1935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1938年赴延安。先在边区医院，后调入中央医院，任妇产科和外科主任。

金茂岳提出自己是学妇科的，不宜担当傅连暲的助手。李富春、傅连暲考虑，在大夫中间，金茂岳名气最大，而且上下间人际关系也好。于是进一步做了金大夫的思想工作，事情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王明刚住院时，经医生查明是心脏不好和扁桃腺发炎。住院不久，又发现了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胆。当时的传统疗法是，凡肝胆病都用甘汞，外加静脉注射葡萄糖。治了两个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转。金茂岳通知护士停止服用甘汞。结果，他只通知了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

那时的中央医院，也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人都凭着一腔热血工作。1942年前后，在知识分子群中，思想上一度有很大波动，对延安不满的情绪，也势必影响到工作上。再加上每天上午医院都要关门参加整风，医生和护士交接班制度，也一度松了下来。

金茂岳除了给病人治病外，还要领导他所在科室进行整风，对病人的护理记录忘了检查。白班护士也忘了告诉夜班护士，每个人所关心的是如何写整风学习心得。王明继续服用甘汞，病情开始加重。西医治疗无效，请来中医李鼎铭先生，服用几剂中药，始见好转。经化验检查，查出王明尿液中有汞。于是，王明说金茂岳用药害他，把他告到了中央。

中央得知此事，命傅连暲组织人会诊，把问题查清楚。经检查会诊，确认金茂岳失职。金茂岳感到问题严重，得罪了一名中央高干，又痛心又害怕。于是，私下向王明承认过失，赔礼道歉，并跪在王明床前，喊王明“哥哥”，请求原谅。金茂岳边说边落泪。王明的警卫员巴方廷实在看不过眼，把金茂岳拉起来，劝走了。

王明是个欺软怕硬的主儿，一个劲儿地向中央告金茂岳的状，理由是，金茂岳是否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中央收到王明的控告信后，责成中央社会部调查金茂岳，并组织全延安著名医生为王明会诊。

后来在1943年7月，金茂岳被拘留审查，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直到1945年，才澄清金茂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一次医疗事故，这才又重新恢复了他的工作。

在批判王明路线时，还有一个与金茂岳的遭遇完全不相同的趣人趣事，他就是不是王明的王明。这个王明也就是1955年授上将衔的王平。

王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原名王惟允。他参加红军时，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叫王惟允时，常常喊成“王翁翁”，王惟允无奈，只得改名为王明。此时，党内军内批判王明路线，此王明一说到彼王明，也难免拗口，于是又改名为王平。后来毛泽东知道后也觉得非常有趣。有一次他召见王平，还谈起了此事。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挥笔为王平写了一纸任命书：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

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指示中说：

“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25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开幕。到会参议员219名，其中18名为候补参议员。在这219人中，有共产党员123人，民主党派25人，无党派人士61人。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敌后根据地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国民党驻第18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也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30分钟的演说（参看《毛泽东选集》中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选集》注明的时间是1941年11月21日，其依据是这篇《演说》首发于1941年11月2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故而编者把闭幕日当作了开幕日），他说：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主义的中国。”

“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力，想要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作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

“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力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在开幕式上聆听毛泽东演讲的参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李鼎铭先生。

李鼎铭，原名丰功，1881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中农家庭，1903年赴绥德应试，取为廪生，后来曾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1913年，他在担任米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产，创办了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自己兼任校长；1923年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职务；1926年因病返里，专心研究医学，对中医中药的掌握和使用比较精通。1930年后，李鼎铭住米脂县城，开业行医。他为人耿直，同情农工，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1941年作为开明绅士的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李鼎铭这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毛泽东演讲，内心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的话是这样透彻，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11月7日，医科大学举行建校10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在任弼时等人陪同下来到学校，详细地观看了学校建校10周年展览，挥笔在留言薄上写下“办得很好”4个大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参观之后，毛泽东在学校礼堂对师生们讲了话。他首先祝贺医大建校10周年，向师生们问好，然后说道：

“抗日有许多工作，学医治疗伤病员就是其中的一种工作。**做学生的要好好学习，学好了要全心全意为全体军民服务。做老师的要好好教，要教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还以**庸医杀人、良医治病**的事例，对师生们进行教育。

11月1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彭德怀的名义，从延安给在重庆的冯玉祥发去贺电，祝贺他60寿辰。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各方面发给冯玉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著文并题写“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冯玉祥曾多次派人到周恩来住处，征询革命道理和商讨抗日的主张。他在三户印刷厂秘密印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他还营救过越南的共产党人胡志明和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11月中旬，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上看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不但参加大会、小会，而且还找一些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深深地感觉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真诚的。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和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决定向大会提交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持怀疑态度，曾数度劝阻他不要提出这样的提案。但是李鼎铭还是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毅然决然和姬伯雄等10位参议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题目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的提案，其内容大略曰：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及消耗。5、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人的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以后，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在抗战救国的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们进攻，实行精兵简政，岂非束手就擒？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不良。

在一个隆冬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毛泽东在微弱的灯光下，反复翻看着引起争议的李鼎铭那个“精兵简政”的提案，用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不久，李鼎铭登上参政会讲台发言，正式将“精兵简政”这一提案提交大会讨论。他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对这一提案表示极为赞成。他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还说：

“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随着天气气温逐渐升高，衣服就逐渐的脱了下来，到了夏天就穿的很少了。**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已不适应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

毛泽东又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欲知李鼎铭的提案能否被大会通过，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王明在“九月会议”上再一次进行了拙劣表演，妄图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继续对抗下去。由于毛泽东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少犯错误的领导人幡然悔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任弼时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九月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毛泽东还是感觉到“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为此，他写出了“九篇文章”，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不断修改，还边修改边征求意见，以备不时之需。由此可见“九篇文章”是多么的重要！**只可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见到，依然被锁在“深闺”无人识，不知何时得见天日。

本章所述毛泽东委托江青去看望王明一节，也很有意思。江青对王明说：“我可是讨厌两面派。张国焘也吹捧过我，后来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毛泽东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这句话让人细细揣摩，至今还有意义。

**第49章**

**“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

**的气，受老兵的欺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

**个分区的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

**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话说1941年11月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1次会议举行闭幕式。

李鼎铭等人的“精兵简政”提案，获得165票的多数拥护被会议通过了。

大会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选举李鼎铭、谢觉哉为副议长。

大会选举了边区政府领导人员，边区政府委员会由18名委员组成，他们是：林伯渠 李鼎铭 高自立 南汉宸 萧劲光 贺连城 刘景范 马明方 柳 湜 霍子乐 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毕光斗 萧筱梅 高步范 杨正甲 马生福（回族）高崇珊 徐特立

在以上18人中，有共产党员7名，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依次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为委员。

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被选举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发表了演说，并提请续范亭、李鼎铭等人讲话。续范亭站在主席台上，怀着激动的心情说道：

“我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将来的中国是胜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保障，中国劳苦群众先进人士的保障，毛泽东政策路线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李鼎铭在讲话中说：

“我今年61岁了，本来没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10余年不出家门，纵然有点思想，也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辙。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惭愧得很。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我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处说起？于是**我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要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奉劝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第一，就是团结二字。昨天大会开会时，诸位对这团结，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诸位先生指示的团结，究竟怎样做法呢？我想，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先从自己做起。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

参政会结束后，毛泽东对李鼎铭非常关怀，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再忙也要接见他，给他讲国内外抗战的形势。毛泽东还到边区政府看望他，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他写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周折，把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回了延安。李鼎铭看见儿子安全回来，满面笑容，高兴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按照边区政府组织法规定，边区政府作出的重大决定，发布的命令和布告，除了边区政府主席签署以外，还需要边区政府副主席副署。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党内有一些人本来就不愿意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可是现在办起事来还需要请示李鼎铭，他们就更不高兴了，于是就采取了排斥态度，公开表示不愿在党外人士领导下工作。

李鼎铭对此很不满意，他说：“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只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把我当摆设。”他甚至说，要辞职回家行医。

林伯渠、李维汉等人感觉到，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中出现的这些矛盾，主要责任在共产党员。于是，他们就到李鼎铭家登门拜访，听取李鼎铭的意见，虚心接受了他的批评，作了诚心诚意的自我批评，说明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旨，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后来，林伯渠、李维汉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还谈到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不断改进工作，使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合作较好的开展起来，李鼎铭、安文钦等党外人士也有了“边区立场”。毛泽东听了非常满意，他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议论和批评，都要重视，凡是对的，就要研究解决，一定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好党外人士，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此后，毛泽东和李鼎铭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患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胃病，发作得特别厉害，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也不见效。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他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听说了毛泽东的病情后，立即给毛泽东切脉看病，他说：

“不要紧，吃3服中药就好了。”

此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很尖锐，西医说中医是封建迷信，瞧不起中医。毛泽东身边的医生也不同意他服用中药。毛泽东不听，他说，还是试试看吧。他坚持吃中药，同时接受李鼎铭的按摩治疗。3服中药吃完了，病痛果然全消失了，胳膊也活动自如了。毛泽东多次与李鼎铭谈论中药的性能、治病的道理和方法，讨论中医发展的前景。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

“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如何发展？”

李鼎铭答道：

“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共同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此后，毛泽东有病时，常常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处方。他还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先生医术高明，要求大家尊重、爱护、扶持中医。他还说：**中西医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实行中西医结合。**他又把李鼎铭介绍给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看病。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边区成立了中医保健站，中西医协会。李鼎铭不仅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还在1945年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时被推举为会长。

且说11月25日，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规定中建议各地根据高级学习组成员的情况，把高级学习组成员分成政治组与理论组，前者以研究实践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

1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通知说：

“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3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1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中央军委2局的机关干部们习惯地在晚饭后来到延河边，有的滑冰，有的散步漫谈。一辆大卡车呼隆呼隆地由远而近开来，到了延河中间，冰层突然裂开，车子的两个前轮陷入泥泞中不能动弹了。两个警卫员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前面的驾驶室边打开车门，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位年约50开外身材非常魁梧的人。

“哎呀，是毛主席！”

河边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大家飞快地向汽车奔去。毛华初也挤了上去，向毛泽东道一声：

“伯伯好！”

“好！”

毛泽东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说：

“大家好！”

这天晚上，毛泽东被安排在2局机关4科院内的办公室里休息。

第二天上午，太阳出来了，照得2局机关院子里暖融融的。干部们集合在院内，挤得满满的，大家喜气洋洋，谈笑风生。

大约在10点钟，中央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陪同毛泽东来到院子里，只见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旧蓝布中山装，左右膝盖上补了两个大补丁。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都在议论：

“后勤部门为什么不给主席做一套新棉衣服？天这么冷啊！”

“看，毛主席多么艰苦朴素啊！”

毛泽东在一张方桌前坐下来，曾希圣亮了亮嗓子，大声说：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高兴，毛主席去马家沟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路过安塞，专门来看望大家。现在，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站了起来，亲切地向大家问好。他接着给大家讲述了国内外的形势，他说，中国人民只要一致抗日，日本帝国主义就一定会失败，中国人民就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讲了大约半个钟头，他最后说：

“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你们是党的耳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很重视你们的工作，没有你们提供准确的情报，我们就不能知己知彼，运筹帷幄，就不能指挥打胜仗。你们都是无名英雄，一个人的作用等于一个师的作用。你们要当无名英雄，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还以诙谐的语调对大家说：

**“你们是无名英雄，我认为一个人还是做无名英雄好啊！你们看，我因为有了点名气，就不方便了。敌人算计我，警卫员要保护我，我的行动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我说，为了党的事业，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去工作，去战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这样，我们的革命就一定会胜利，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大卡车也开过来了，他挥手与大家告别，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容地走进驾驶室。人们目送着汽车，驶向茫茫荒原。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8日，日本公布了天皇诏书，对英美宣战；接着，德国对美国宣战；英美也宣布对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

12月9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全文如下：

本月8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已经对英美两国宣战，轰炸夏威夷、菲律宾、香港与新加坡，陆军在马来亚北部登陆。在日本宣战后，美国及英国亦已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日本法西斯这种新的侵略行为是与他10年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也是与德意法西斯对于欧洲对于苏联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在罗斯多夫胜利，伟大的苏联红军已经开始进入对德反攻阶段的情况之下，在英美两大强国具有丰富资源与极大军力的情况之下，在我们中国已经在日本侧面英勇奋战5年之久的情况之下，在德意日3国资源将届枯竭内部人心动摇的情况之下，**即使希特勒墨索里尼尚能逞凶于一时，即使日本法西斯于其在太平洋作战的初期可能获得许多胜利，并可能截断我滇缅路，还可能对我举行残酷的战争，但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5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必须实现如下各项重要任务：

一、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

二、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并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三、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

四、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向朝鲜、台湾、安南（越南——笔者注）各民族，向中国沦陷区的人民，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

五、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合作，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恢复新四军，发给八路军饷弹。

六、制裁亲日派与亲德派，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七、实行民主政治，使全中国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的代表都能在政治组织上担负抗战建国的责任。

八、加强南洋及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一部分人的挑拨离间行为，同时全体华侨应与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是日，中共中央同时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一、如同本党中央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所说，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因此，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同时应当改善各土著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组织其民众，提高其积极性，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没有这些，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

二、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三、必须大大地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行动。应该纠正侨胞中及一部分共产党员中的过左倾向，要求他们与当地中国使馆领事馆及国民党部合作。但对亲日亲德分子分裂侨胞团结妨害抗日工作的行为，必须坚决地但是适当地反对之。

四、必须努力开展华南敌占区、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应尽可能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游击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应该符合于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应该注意防止并纠正各种“左”的倾向。

五、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纠正存在着的“左”的倾向，广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

编整委员会拟定出编整方案，制订了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镇政府3个组织暂行条例。

12月16日早晨，毛泽东在傅连暲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淌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严重的失眠已经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头疼难耐。毛泽东走到他床前，在一条窄条板凳上坐下，亲切地安慰道：

“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

毛泽东回到住处，又给王观澜写了一段话：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出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全文如下：

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它将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的对阵最后的加以分明了。从经济的（战争资源）、政治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军事的（潜在力）各方面看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反侵略的国家。日本与中国战争已4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20余国为敌，而**德意侵略国经过6个月的对苏作战与苏军的反攻，其锐气已非昔比，苏联已经开始进入反攻阶段。**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本困难大大增加。目前乃是中国与英、美、荷协同作战积极准备反攻的良好时机。

乙、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在华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化，**日本进行的主要战争已经是太平洋战争，在华的空军将调到太平洋作战，在华陆军亦可能调动一部（调华中、华南的军队可能性较多，但苏联未参战，在华大部陆军不致调动），对华军队的人员及物质的补充将减弱，增兵华北的可能已经暂时消除，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形恐慌，而我军民的战胜日寇的信心亦会增长，亲日派、亲德派、分裂派的气焰将被压低，中、英、美、荷的合作更加亲密。**一切这些都是有利于正面与敌后抗战的条件。

丙、**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日本有了长期的准备，而英美准备不足；太平洋军事地理条件有利于日本，加之日本又占领海南、越南，整个南太平洋均处在日本的攻击与威胁中；日本为集中海陆空军作战，路程近捷，而英美集中兵力困难，路程遥远，因此**战争初期，英、美、荷可能受到一些挫折，日本可能取得一些战争资源，滇缅路可能被切断，太平洋战争一般地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胜是不可能的，而英美要反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国民党现时的兴高采烈，到那时悲观情绪又将发生。**加之，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紧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这些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丁、根据上述估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后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以克服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坚定胜利信心；同时说明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避免懈怠心理的可能产生。**

戊、军事方针仍旧，假如敌进行扫荡，应坚决反抗之，如不扫荡，则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外，应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但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应广为宣传，尤其对海外的宣传，应当加强。军事建设仍旧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并送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

己、应当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太平洋战争，使我们对敌伪工作，有了更有利的环境，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向敌军、伪军，伪政权宣传日本必败，中英美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及伪政权的转向抗日。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根据地特别是游击区敌占区居民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组织他们参加抗日斗争。加强薄弱区域的工作，恢复一些失地，开辟一些新的区域。

庚、**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地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3%**。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发出为人的配合，一切工作应求质量，**坚决肃清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严厉惩办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榨民财的恶棍**。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地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辛、在精兵简政政策实现之后，干部必有多余，同时为准备将来还应抽调干部，一并加以训练，除各根据地自己极端注意训练干部外，中央准备办一高级学校，训练几百个真正高级的干部。

壬、目前全世界正处在空前的大动乱中，斯大林同志说：“几个月，或者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便会被击败”。我们可以说希特勒被击败后，再过一个相当时期，中英美再加上苏联便可战败日寇。**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训练干部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12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决定锄奸政策的出发点》的社论。社论中说：抗日根据地的反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被国民党派往抗日根据地的特务原形毕露，纷纷落网。

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四二年中心任务的指示》：

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

**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1941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1942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12月13日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人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地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反而抑留敌人，引起报复扫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务须防止。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弊。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务望各同志研究实行之。

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

12月间，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出版，内容包括从1928年6月“六大”至1941年11月间的557个文件。这部大型资料是整风准备阶段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读物。

194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新年团拜会，陈云在团拜会上讲话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月1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说：

“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启程，望告。”

1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为《文化课本》写了一篇序言，他写道：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样的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

“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1月23日，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他要求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打印数千份，发给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干部，下至连长一级，每人一本。还要求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以便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残余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中的影响。

1月26日，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全文如下：

一、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迅速的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这些同志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3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地认真地深刻地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中宣部

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制定并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

在减租减息政策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不实行减租；另一种是有些农民不交租交息，甚至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尤其是党内一些负责人，在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后，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农村“过分打击地主”，对地主采取过火行为的问题很突出。因此，《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对减租减息的数额作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

1942年2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周文在1月底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延安的文风充满八股味，有冗长沉闷之感，希望对文风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自己对改革的意见。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你的意见很好，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们向解放社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和新文言。”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此时礼堂里连凳子都没有，与会者全是站着听讲。毛泽东便也站在讲台上讲话了，他说：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问题。”

“**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

据温济泽回忆说，毛泽东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时，说了一句令他为之一惊的话。毛泽东说：“**你们当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吧？有些人比猪还笨。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敌人已经有准备了，要逮捕人，他们还是不顾一切。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他们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

温济泽还说：毛主席这句话“在解放区出版的老本子上有过。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是亲耳听到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有分量，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讲到理论与理论家。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部分人，排挤一部分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毛泽东说：

“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鼓掌）”

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在苏德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与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最后明朗与剧烈斗争的时候，中华民族坚决地站在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上，在加强团结，准备反攻方面获得了更有利的客观形势。

在这种环境中来**纪念今年的“三八”节，它的政治任务是在动员各国妇女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消灭东西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在国内则应更加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抗日统一战线，配合全国各方面的动员，积极准备反攻，为最后驱逐日本法西斯出中国而斗争。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今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必须在恢复元气、积蓄力量、坚持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总方针下，更加**注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提高妇女参政能力，坚决实行妇女团体中的三三制，改组与巩固妇女组织，这些应成为今后的中心工作。**在大后方，则应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妇女团体和妇女刊物，在知识妇女和一部分劳动妇女中，进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民族民主教育，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亲密团结。

中央建议各级党委，在敌后根据地纪念今年“三八”节的办法，应灵活地采取下列各种方式：召开群众的“三八”纪念大会和晚会，分别组织各阶层妇女（如女工，女护士，女参议员，非党女领袖，女干部等等）的小型会议，调查一定地区的妇女生活及其要求，检查一年来的妇女工作，发动妇女干部、妇女团体的会员在工作、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进行深入的自我检讨，慰劳前线作战部队、受伤将士及抗日军人家属，通电世界各国妇女——英、美、苏、德、日、意、印度、缅甸、泰国，以及南洋华侨和各民族妇女等等，提议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

在大后方，于扩大妇女反法西斯运动，推进妇女抗战团结的原则下，与各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合法的条件下，共同纪念“三八”节。必须尽力纠正和避免暴露的突出的纪念方式和方法，以免影响妇女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3个附件，是综合5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使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可以争取回来。**

二、**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过左行动，而这些过左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种时候，畏首畏尾，束缚群众手足，就是右倾错误，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应被联合抗日的战略方针所限制，不能拖得过长，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以致迫使地主阶级跑到敌顽方面坚决反对我们，或跑去了也不愿回来，妨害抗日战争与妨害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党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限制这些过左行动不发生，以致妨害群众之充分发动与充分起来，而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充分起来之后，能够及时地说服群众，纠正过左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一切打倒，而是争取一部分倾向我们的地主（打中有拉）**，**中立（麻痹）一部分动摇不定的地主**，集中火力打击一部分最顽固的地主（但与内战时期打击地主的内容与形式都不相同）。在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中，我们必须极力表示宽大，认真实行三三制与交租交息，认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在这种时候，如不着重说服党员，说服农民，争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与敌顽的联合，就有使我党与农民陷于孤立以至失败的危险。但**在纠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评中，必须同时注意到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热烈情绪或热气，须知我们正确地批评过火行动与宗派主义，决不是向这种热气泼冷水，以致造成干部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争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酝酿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还是优势，农民还正在准备斗争。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则实行斗争（打）为第二阶段，团结抗日（拉）为第三阶段。在晋察冀区域，除了雁北及平西两区尚未普遍与彻底按照党的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其他基本区域是都经过了酝酿斗争团结这样3个阶段的，这是最正常的策略模范。在其他若干根据地中，也有这种模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执行联合抗日这个战略方针的总过程中，应该极力注意的策略阶段。

三、各地过去在执行土地政策中所发生的过左错误，大体已经纠正。在今天，一切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而地主又已不生严重争议的事件，应作为已经解决，不再变动，维持良好的抗日秩序。但对三三制之没有彻底实行及地主农民间尚有重大争议的事件，仍须着重纠正错误。

四、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因此，目前应当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须检查这一问题，对此问题如有某些人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须向他指明加以纠正。

五、在农民已经充分发动彻底执行了减租减息，经过了打的阶段，因而进入了拉的阶段的地区，由于我们开展自我批评，纠正过火行动，彻底实行三三制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地主阶级必然要抓住新政策之有利于己的方面，加以扩大，和农民作斗争。由于今天根据地内部在此阶段（拉的阶段）内，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而文化落后的农民群众甚至区村干部，遂**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或被地主收买操纵区村政权，或被地主打击而不敢回击**。因此必须教育县区村3级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习政府的法令，熟习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六、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在减息问题上，第一，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算公账与算私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才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允。第二，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3分4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同时政府每年的建设费中，应以70%至80%投于农村，作为对农民的低利贷款（包括合作社贷款在内），以发展各根据地的基本的农业经济。而只以20%至30%投于公营工商业及私人商业。须知发展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利益，而且就是扩大政府税收的最大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解决财政问题基本政策。

七、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其3个附件，都已公开发表，各地应即公布，广为宣传，认真实行。**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实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的。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每一根据地内，应利用会议党校及文电使党的基本干部懂得中央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然后经过他们，使下级干部懂得，使这种具体的策略教育确实收到成效。

2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有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人员参加的大型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共有800余人。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开门见山地说：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党八股的坏处，他说：

“**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作八大罪状吧。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作‘残酷斗争’，一个叫作‘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八股的第3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毛泽东顺便把钟灵1938年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的事，作为实例讲了出来。

原来钟灵在写“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时，感觉繁体的‘农’字，与‘工人’二字从美术的角度看不太对称，于是他灵机一动，把‘工人’二字写成了隶体字。毛泽东有一次从城墙边经过，一眼就看到了这条将‘工’字中间的短竖拐了两个弯、‘人’字一捺上加了3撇的标语。

毛泽东接着说：

“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革命的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他劝到会的人们多看几遍。

2月中旬，旧历年关到了，李鼎铭决定返回故里探亲搬家。

毛泽东闻讯，指示工作人员用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延安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他荣归故里。此时在边区能够享受这等殊荣待遇的党外人士，也只有李鼎铭一人。

2月1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说：

“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

2月14日，从苏联回国后在西安停留的林彪，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回到了延安。

这天早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刚走出窑洞，与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和师哲边往山下走边说：

**“林彪同志回来了，我去接他。”**

**师哲感到很意外，他心里想：朱德从前线回来，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去接他们。1940年周恩来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毛泽东通了话，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毛泽东还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往迎接，而且他去主要还是为了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好几天，中央组织部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沙滩上为周恩来等人开了一个欢迎会。而今天主席竟要亲自去迎接地位远比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低得多的年轻人林彪，师哲感到实在不可理解。**

师哲陪同毛泽东在一个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一辆大卡车开来了，林彪下了车，毛泽东迎上去和他紧紧握手。林彪看见师哲也在一旁，就用另一只手和师哲握手，毛泽东问：

“怎么，你们也认识？”

**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回到自己的窑洞，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他还让林彪住在杨家岭，靠近他。毛泽东让林彪继续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大的学员们都说：“林彪校长确实是我们八路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位杰出人才。他并没有魁梧高大八面威风的大将风貌，而是像拿破仑一样，个头不高，像韩信一样，身体消瘦。但他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人物。”**

在此前后数天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报道林彪的消息。2月13日《解放日报》3版刊登了《平型关大捷指挥者林彪师长伤愈返国》的报道；2月14日3版刊登了《林彪师长返延，沿途备受热烈招待，与地方当局晤谈甚欢》的报道；2月16日3版刊登了《一一五师全体指战员致电欢迎林彪师长》；2月18日3版刊登了《干部欢迎晚会，林彪同志畅谈苏联已获得战争主动权》的报道等。

再说2月14日下午，林彪去看望堂兄林育英，兄弟俩谈了一阵，医生来为林育英检查病情。林育英见天色不早了，就对林彪说：

“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

林彪说：

“你讲吧。”

林育英说：

“**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与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在那个非常时期，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

林彪点点头说：

“八哥，这件事我记住了。”

林育英又说：

“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说你很有军事才干，对你寄予很大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2月15日，延安美协在联防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新建的3间窑洞里主办讽刺画展，展出作品70余幅，作者是张谔、华君武、蔡若虹3人。《解放日报》对画展进行了报道。报道中说：

“边区美院的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参展的作品主要是针对延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而发的。可谓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妙笔横生，针砭各至。参观同志，无不同声称快，流连欣赏。**”

华君武等人的讽刺性漫画，在延安引起了争议，毛泽东就派舒同去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支持华君武。

画展的第3天，毛泽东、王稼祥前往观看。这天正好是华君武值班，他陪同毛泽东等人参观画展。毛泽东对这些讽刺画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一张一张地看过去，遇到那些看不懂表现主题思想的画，就问华君武：

“这是什么意思？”

华君武作了解释，他就点点头。看了有些画，他禁不住笑了起来，看到有的画则不笑不问就走了过去。看完以后，华君武送毛泽东出门，诚恳地说：

“请主席批评。”

“漫画还要发展。”

毛泽东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

2月17日晚，延安机关干部1000多人在中央礼堂举行晚会，欢迎伤愈归国的林彪和从前线回来的120师师长贺龙。许多人站在门外，等着看一眼抗战名将的风采。

毛泽东和朱德都来了，主持会议的谢觉哉请林彪先讲话。林彪说：

“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

林彪还说：

“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不但应该是战争的堡垒，还要成为要塞。苏联的党能把俄国建设成一个强国，我国的建国条件强于苏联，我们应该建立世界更强大更幸福的国家。我们的党在正确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去做，才可以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要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的党，忠于我们的领袖。**”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安排林彪的工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请读者再认真看一看毛泽东在1942年2月6日起草的《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他在这个指示中写道：“**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而且他还在这个指示的最后部分特别交代：“**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我之所以请求诸君**“再认真看一看”**，是因为每当我看到这一类资料之时，总不免想起我和一位故去的数十年的挚友关于“策略”与“阴谋”之区别的争论。我的老朋友始终认为，“策略”与“阴谋”没有本质的不同。很可惜，他再也看不到这样精彩的历史资料了。“策略”与“阴谋”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愚以为，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当事人的一言一行的出发点是为“公”还是为“私”，或者说是为“彼”还是为“己”。毫无疑问，前者便是“策略”，后者必是“阴谋”。本传讲的此类事例已经枚不胜数了，二者可谓泾渭分明，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第50章**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

**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话说1942年2月18日至19日，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批判叶青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所提出的错误观点。

叶青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本传前面的叙述中，毛泽东已经两次提到了他的名字。此人原名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四川南充人，以“叶青”的笔名著称。**他也是一名“海归”，早年留学法国，跟周恩来等人熟识，对革命有着崇高的信仰，在法国期间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底，叶青奉命返国，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叶青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年冬，因叛徒出卖被捕，他被判处死刑。这一天午时，叶青等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第一枪他没有被击中要害，刽子手用脚拨了他几下，其中一人说，这个人还没有死，再补上一枪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叶青仍然没有被击中要害。刽子手撤离刑场后，天上下起了雪，他被冻醒，意外地被‘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的人救回。康复后，叶青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又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暴动。他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叶青彻底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告别了共产党，成了可耻的叛徒。他写了大量的反动文章，受到蒋介石特别嘉奖，一跃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职，最终**在1949年1月以“文化围剿”的打手被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成为中国共产党通缉的第二批国民党战犯之一**。

再说叶青在1941年秋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评论说：“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

尽管叶青的观点是一种偏见，但他却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一命题的人。

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3个组成部分，指出“这3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他在批驳了叶青的错误观点之后，还特别强调说：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说：

“1、**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抽调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2、**保护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3、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人电，电文中说：

“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不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2月2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找王明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问题。王明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仍然以老腔调为自己辩护。王明说：

“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2、**即使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并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

王明如此态度，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中说：

“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产生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地认真地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大数量的干部，90%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在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这样做，而且我们必须这样做。”

“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者不得其法，或者轻重不分，或者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者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脱离实际，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是日，中央书记处还发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决定停止过去所定的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军事学院高级班并入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高级学习组，以300至400人为限，参加党校学习。

《新决定》并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决定取消原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等人组成负责党校日常工作的管理委员会。**邓发仍任校长，主持校务会议；彭真为教育长，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

1942年3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说：

“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够，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

3月4日，毛泽东在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精神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还在信中勉励部队指战员们说：

“要加倍努力生产，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

3月5日，林育英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涂俊明叫到身边说：

“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虽未为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尽了力。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点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突发脑溢血，英年长逝，享年45岁。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林育英的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

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3月8日上午4点至9点，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的遗体告别。

毛泽东为林育英书写了一幅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及林彪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3月8日，毛泽东借纪念国际妇女节之机，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毛泽东在公祭之前对朱德、任弼时等人提议说：

“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

朱德、任弼时都表示赞同。

上午9点，林育英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公祭仪式。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号召大家学习林育英对组织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康生报告了林育英的生平事迹。老海员工人朱宝庭代表中央职工委，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与边区200万人民，高长久代表边区几万工人，相继致词。

最后，由林育英的次子林汉雄致答谢词，他告诉大家说：“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

公祭仪式结束后，一万多人自发为林育英送行。林育英的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泽东亲自执绋。送葬队伍抵达桃花岭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毛泽东同朱德、任弼时等众多中央领导人抬着灵柩爬上山顶。队伍齐集山顶，将灵柩送入墓穴，毛泽东亲自给墓穴奠了土。

后来，毛泽东又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6个大字。

再说3月9日这一天，丁玲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暴露黑暗”的杂文《三·八节有感》。

此前，她在《解放日报》创刊后一直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编辑部里还有刘雪苇、陈企霞等人，有关文艺稿件，几乎都经博古、杨松过目。博古曾多次对丁玲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像延安青委在文化沟张贴大墙报那样的‘轻骑队’。”文艺副刊每周出1至2期，每期约占半个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队伍中已经涌现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万字的稿件。文艺副刊对有些稿件没有把住关，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就在3月7日那一天，《解放日报》社的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请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联想到延安发生的两起离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乐部周末舞会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人，一股为女人鸣不平而又怒其不争的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就挥笔撰写了那篇《三·八节有感》。她在文章中过分地强调延安存在的问题，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在党内、文艺界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人要求处理她。

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

3月16日，毛泽东审批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全文如下：

（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

（丙）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

（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

（戊）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中宣部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运动大会，因院长张闻天外出调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维汉在大会上讲了话，提出了几点意见。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带头反对李维汉的意见。他说：**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王实味反对指定一部分人当整风委员会的委员，他主张全体委员要由民主选举产生。

王实味还写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的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前两期上。他提倡**“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

这一天，毛泽东连夜打着灯笼跨过延河来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着马灯，仔细阅读了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王震发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

毛泽东看了墙报，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1925年考入北大文院预科班；在北大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活动，不久又离开了党组织；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只身来到了延安。此前，王实味在2月17日就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他在该文中写道：“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3月19日，刘少奇和随同他一起上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第13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间，毛慎仪病情严重。他给在柳树店边中学习的四弟毛雪华写信说，请转告叔叔毛泽东，能否有办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毛慎仪是1940年在边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2局，担任电讯机要工作。期间，他得了肺结核和痔疮，由于肺结核病情严重，也影响到痔疮的治疗。

毛雪华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杨家岭向毛泽东报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泽东对毛雪华说：

“快送他进医院。”

毛雪华马上赶到几十里以外的安塞县城。此时，毛慎仪已经病入膏肓，身体非常虚弱，躺在担架上起不来。毛雪华和2局的人立即组织民工，抬着担架，把毛慎仪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口，毛泽东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仪，十分惊讶，焦急地说：

“怎么病得这么厉害？赶快送他住医院！”

毛泽东亲自把毛慎仪扶下担架，让他喝了点水，又给白求恩医院院长黄树则写了一封信，介绍毛慎仪去那里治病。毛泽东写完信，用自己的汽车将毛慎仪送往柳树店白求恩医院。然而，由于延安医疗条件太差，又缺乏药物，尽管医院想了许多办法，仍无回天之术，毛慎仪不幸病逝，年仅19岁。

这天是星期日，毛雪华到杨家岭，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脸上流露出一阵哀伤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说：

“慎仪牺牲太早了！他才19岁呀，血气方刚，正是为革命出力的时候。”

毛雪华认为三哥的病并不难治，主要是医术落后造成的，因而对医院有些埋怨责备。毛泽东劝道：

“雪华，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医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你要从大局看。医院条件差，缺少药品，但他们还是尽到了责任。”

毛雪华提出想给哥哥立块碑，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碑你去立，花多少钱，你来我这儿拿，我出钱。”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将毛慎仪的母亲接到北京治病长达半年之久，安慰她说：

“慎仪是个好孩子，他是在延安病逝的，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死得很光荣，你要珍惜身体，不要难过啊！”

再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党史》的报告，全文如下：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的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3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3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1927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摩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3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1921至1924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1925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3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的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棋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1921年到1927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摩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的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作“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3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内外负责人及作家座谈会，到会70余人，内容是座谈《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

《解放日报》在1941年5月16日创刊以后，身为社长的博古没有办报经验，一味仿照苏联的办报方法，几乎每天都有社论和大块文章，对共产国际的宣传到了一种不适当的程度；报纸的文风也充满八股味。累得总编辑杨松旧病复发，过早谢世。不少人对《解放日报》有意见，直接反映到中央，还有一些人直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更为严重的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1942年3月9日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后，从3月13日到3月23日，又连续发表了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一组杂文，这组杂文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

王实味代表了一批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的倾向，以所谓的“鲁迅笔法”，“暴露”解放区的“黑暗”，含沙射影地讽刺、攻击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及陕甘宁边区。他的观点在党内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分歧。有些人支持他的观点，但更多的人反对他和丁玲的这种做法。文艺界一度出现了混乱现象。

王实味的文章也引起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并且加了编者按，其中说：“中共歌赞延安县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污染、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统区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作为攻击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情况，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整顿，重新改组《解放日报》。

博古在座谈会上就《解放日报》10个月的工作，做了简单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

毛泽东讲话后，与会者开始发言。萧军发言说，希望报纸进行改革；他还提出了改革的办法。柯仲平要求报纸要反对边区的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要开展争论，要深入下层，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对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谢觉哉以厨司作比喻，说不应总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说话。朱德强调报纸要多反映战争，反映敌后残酷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并帮助解决军民关系中的问题。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它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当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座谈会后，《解放日报》进行了人事改组和版面改版。

毛泽东为了保护丁玲，只把她调离了文艺副刊主编岗位，让她到文艺协会去工作。

文艺副刊主编则由年仅29岁的舒群继任。舒群提出，他不能胜任副刊主编之职，理由是主编工作不好干，丁玲比他年龄大，水平又高，尚且出了问题，他年轻，更没有经验。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舒群做思想工作。他对舒群说：

“**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现在，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舒群思考了片刻，欣然接受了任务，他说：

“希望主席给以不断指导。”

毛泽东点头笑了。

1942年4月1日，新版的《解放日报》出刊了，第1版是要闻，以头题发表了边区参议会减轻征收公粮公草的决议，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第2版是边区和国内消息，发表了解放区整风动态与抗战捷报；第3版是国际消息；第4版为副刊。

这期报纸还发了博古写的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4个方面检查了报纸过去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把报纸办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

改版后的第4版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其中“文艺”占半版位置，每周见报四五次，其它内容增添了学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还有问题解答，刊登各类知识性的常识，读者信箱，等等。自此，这个天天和读者见面的全版副刊成为国内新闻史上难得见到的一个大型副刊。

4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总学委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丁玲也参加了会议，这是她自文章发表后第一次听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评。

曹轶欧在发言中提出，应当把《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批判。贺龙气愤地说：

“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彭真也指着丁玲说：

“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

丁玲对《三·八节有感》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感到不可理解，她说：

“我所犯的错误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在七八个人发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这些话给丁玲的问题划定了范围，定了性，进一步保护了丁玲。

会后，丁玲找毛泽东谈话，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毛泽东说：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丁玲问道：

“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很动情地告诉她：

“**共产党是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人家当然不高兴喽。**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使丁玲深受感动。为了减少即将全面展开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可能出现对丁玲的冲击，毛泽东还提醒她最好拜访一下对《三·八节有感》不满情绪最重的贺龙。他又说：

“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丁玲说：

“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泽东的提示，主动登门拜访了贺龙。她一见贺龙便说：

“老总，我来听意见来了。老总还有啥子意见？”

贺龙笑了，说：

“没得了，昨天提完了。劳你大知识分子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

后来，贺龙真的去看了丁玲，还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贺龙指着一盘炒肉问：

“你们常吃得到吗？”

丁玲说：

“专门为你炒的。”

贺龙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盘土豆丝：

“那你们作家就天天吃这个啰？不行哟，我们关心文化人不够，要好好搞大生产运动嘞。”

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

决定中说，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要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

决定还对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3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员分工领导：

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除军事学校）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

4月4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关于文艺界的资料——笔者注）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敬礼！

毛泽东

这天下午傍晚时分，萧军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萧军同志，你改行怎么样？”

萧军为之一愣，问道：

“改行干什么？”

“入党，做领导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打量着萧军。萧军也望着毛泽东，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就忙不迭地摇着手，连连说：

“哎哟，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块材料，当领导，我也不是那块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毛泽东轻轻地挥了下手，微笑着说：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窑洞里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叫警卫员点上灯，继续和萧军谈话。他谈起自己从陈独秀右倾之时起，先后在党内受到的大小8次处分，他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成，那种滋味是如何的难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见，接受组织决定，忍着委屈进行工作，在工作中继续对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末了，他深有感触地总结道：

“这种境况，对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萧军静静地听着，深深地被感动着。他步出毛泽东的窑洞，在斑驳的月光下缓缓而行，细细品味着毛泽东的那一番话语。回到住所，他拿出纸笔，文思如泉，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第二天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鉴于自己在谈话中涉及了不少党内问题，此时尚不宜公开发表，就建议萧军删改后再行发表。萧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进行了修改，于4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反响。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克勉的来信：《“轻骑队”及其他》。作者在信中批评了延安壁报“轻骑队”，他写道：

“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有真正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壁报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疼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某某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和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此后，“轻骑队”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发表谈话，他说，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了朱德、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4月12日，“轻骑队”墙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声明，驳斥童大林。声明中说：“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过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4月23日，“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做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欲知毛泽东如何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说，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工作报告，但从实质上说，它却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学术论文，值得后人认真研读。这篇文章最早论述了中共党史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中共党史的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对于后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推动和指导以及所形成的中共史学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证，毛泽东在治史方面的造诣是不少所谓的史学家都难以企及的，因此有人称他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开山鼻祖，一点都不为过。

**第51章**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不能去爱敌人，不能爱**

**社会的丑恶现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必须暴露之，**

**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话说1942年4月初，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文艺工作上。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酝酿，决定由他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等人，先在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摸清情况，然后召开座谈会，统一文艺界人士在文艺工作上的认识。

毛泽东初步列出一些研究题目和讨论问题，开始征求意见。他请“鲁艺”、“文抗”等单位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或单独或几个人一起，到他的住处谈话。先后参加过谈话的人有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刘白羽、罗烽、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其中，谈话次数较多的有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等人。

毛泽东在向艾青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共给他写过3封信。他在第1封信写道：

“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

艾青应邀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就文艺方针的有关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在谈到目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时，毛泽东问道：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此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佩和信赖，就说：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说：

“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认真地回答说：

“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2封信，他写道：

“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

艾青见信中“反面的”3个字打了圈，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是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文艺活动的积累、体会和来延安1年的感触，从正面提意见的角度，写成一篇约8000字的长文《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寄给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在向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收到的最长的一篇书面材料。

过了几天，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3封信，他写道：

“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

艾青此时在“文抗”工作，住在蓝家坪，与杨家岭隔着一条延河。时值春雨过后，河水骤涨，毛泽东担心艾青过河发生意外，特派人把他接了来。二人分坐在窑洞中间的一张桌子两旁，毛泽东拿出艾青的那篇文章，交还给他。艾青接在手中，见在第一页上空白的地方有毛泽东手书的“请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毛泽东又拿出几张纸，上面有用铅笔写着的一些文字，说道：

“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

艾青正准备作记录，由于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他就走出窑洞去找垫桌腿的小石片，没想到毛泽东比他还利索，马上捡来小瓦片垫好了桌子。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艾青认真地把这些意见记了下来。

后来，艾青根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仍然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再说4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此后，整风运动从思想发动阶段转入了学习阶段，延安各机关掀起了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的热潮。

续范亭积极置身于整风运动之中，努力学习和热情赞颂22个文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大文如大餐，丰富复精美；使我饥肠人，欲罢不能已。

厨师费匠心，消化全靠你；本是百年粮，贪多怨自己。

出身小资产，遍体多油腻；湖水涤难尽，延河洗不去。

二十二文件，是我新武器；革命称至宝，应比匕首利。

续范亭托交际处金城处长将这首诗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他的诗后，很高兴地来到交际处找他谈心。续范亭兴奋地对毛泽东说：

“这22个文件好极了，通过整风运动，我们党的作风一年之后一定会大变。”

毛泽东却笑着说：

“我可没你那么乐观。党的作风的转变，没有那么容易，有很多困难。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在政治上建党，有纲领；在组织上建党，有党章；可在思想上建党呢？长期以来没有建好，**多次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见思想上建党之难。处于幼年时期的我党，就像一群小孩子赶一辆牛车，目标是清楚的，但路线怎样走却都不知道。刚取得点胜利就头脑发热，拼命地抽鞭子，结果翻了车。翻了车怎么办？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推到一边，说还是我来赶，可又不认真吸取教训，端正思想路线，结果还是拼命抽鞭子，还是翻车。**这个比喻是说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当初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整风运动若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变化，我就很满意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续范亭思考了很长时间。几天以后，续范亭对金城说：

“上次主席的谈话，对我启发太大了，我真犹如茅塞顿开。这两天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联想很多。的确，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的阶级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形成的世界观也不同。”“就拿我来说吧。我出身于中农家庭，在旧军队中过了大半辈子。**我对旧社会的很多东西就习以为常。比如女人小脚，你们看了一定会感到反感，当然也怜悯。而我看着就很习惯，不觉得难看。我也知道天足好，裹小脚是不对的，但就是积习难改。**这就是思想感情的差别嘛。中山先生说过，**我们的敌人有比帝国主义还要厉害的东西，就是社会的旧思想。列宁也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难克服的。**”

续范亭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他新作的一首诗，题为《积习难去——认识与改造》，诗曰：革命大敌谁为最，人类积习最难去；明知前面是光明，依然迷恋旧社会。

认识世界固不易，改造最难是积习；**社会多少罪恶事，大海沉浮不自觉。**

4月7日下午，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萧军送去了一封短信。

此时，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他借口要到延安附近的定边、靖边、安边各县去体验生活，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359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4月7日下午3时

萧军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当晚即赴约。他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对文艺方针问题的看法。之后，他又将自己的意见作了系统的整理，写成书面意见送给了毛泽东。

恰在此时，毛泽东也收到了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的一封来信。欧阳山在信中说，他感到延安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他在信中建议说：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欧阳山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参考研究。

4月9日早晨，毛泽东复信给欧阳山，他写道：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毛泽东

9日上午9时左右，欧阳山、草明夫妇应邀来见毛泽东。

欧阳山的夫人草明曾在上海“左联”工作过。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和丈夫欧阳山带着3个儿女随着从重庆撤退出来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来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

欧阳山和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被工作人员引领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看见他们，便放下笔，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让他们坐在自己对面的二人旧木板凳上。欧阳山已经是第二次见毛泽东了，比较熟，所以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党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会，和文艺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会上是不是讨论这么3个问题：一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二是立场和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作家要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他们的问题等等。”

毛泽东还就此3个问题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据草明回忆说，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因此印象很深。这些观点有：**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只有熟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

欧阳山就上述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谈到了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

草明是第一次见毛泽东，她看毛泽东和欧阳山滔滔不绝地交换着意见，自己插不上嘴，就默默地观察着毛泽东，**只见他的穿着和自己与欧阳山一样，都是灰布棉袄，而且他的袖口都破了，衣襟前还被烟灰烧了几个洞。她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时惊人的专注，听完对方的话能立刻理出对方的观点并做出反应，循循善诱地启发对方深入思考更正确的方面。**正在暗暗惊叹中，听毛泽东又讲到“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造世界观。作家要到工农兵中去，也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草明不免有些庆幸，自忖道：我还不错，生长在手工业区的乡镇，很熟悉工人；我已写了10年的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了，革命都十多年了，还用得着改造世界观吗？正得意间，毛泽东问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草明来时就没有思想准备，此时也不想发言，见毛泽东突然发问，便率直地回答道：

“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不团结。”

她还简单举出了两个例子。毛泽东一听倒很重视，说：

“这是个原则问题。**行帮恶习，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和他的小集团利益的，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个问题过去上海有、重庆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艺术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中去的自由。文艺家只有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宗派主义就会消失。不过，要彻底解决，还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到这时候，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勤务员端来饭菜，摆在餐桌上，有炒猪肚、炒猪肝，有辣椒、有豆豉，四菜一汤，大米饭。毛泽东招呼欧阳山和草明围坐在餐桌旁，又叫来江青，陪着客人一起吃饭。

后来草明回忆说：“我觉得这顿饭，比几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饭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泽东分别给萧军及欧阳山和草明写了一封信。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他在给欧阳山、草明二人的信上写道：

欧阳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

4月17日，毛泽东又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信，要求他们“正反两面都盼搜集”，并附“简明的说明书”给他。

欧阳山和草明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与魏东明、吴介民、汪琦、董迟等人一齐动手查找资料，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文艺研究室书籍杂志较多，他们找出了一堆，将其中有关的文章或者折起来，或者做个记号。欧阳山写了一篇简要说明，内容包括中国一些文艺的派别、主张和论争。材料包好后，由草明面交毛泽东。

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由工作人员领着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纸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让草明坐下来，问她工作是否顺利，生活有没有困难？草明回答说：

“一切都好，只是3个孩子缠身，送不出去，写作有困难。”

毛泽东立即叫来叶子龙，交代他写封信给叶剑英参谋长，安排草明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和欧阳天娜到军委干部子弟学校上学；毛泽东又叫来傅连暲，请他安排草明的小儿子欧阳加进入中央托儿所。

草明万分感动，不便再耽搁，她拿了信向毛泽东告辞。叶子龙送她到收发室外。

4月17日这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说：

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同志，有各种材料证明，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3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地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高潮到来时必须表现沉着态度，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必须向干部指明要认识困难的严重性，方能有步骤地克服困难。同时应指明困难的性质乃是破晓前的黑暗，整个国际国内条件都和10年内战时不同，克服困难之后，就有我们与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央书记处

4月中旬，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已经停留了两个月，当他携带家眷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又派专车接他到杨家岭，热情地把他迎进窑洞，问他搬家情况。他告诉毛泽东，已把全部家产献给边区政府了。毛泽东说：

“留一点吧。”

李鼎铭口气坚决地说：

“一点也不留。”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道：

“你真是开明人士！”

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军事斗争形势，联名给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115师、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山东纵队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报，全文如下：

各地：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同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因此，我们起草的内务条令之草案上暂时不划分干部之等级军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 军委 1942年4月24日

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出后，各部队均作出反应，表示拥护中央不划分等级的指示。

八路军总部发给军委并各兵团的电文《同意暂不分官衔等级》，是这样写的：

军委并告各兵团：

关于军队干部军职等级问题，同意暂时不分官衔等级。各级干部之津贴仍照前规定发给，以免生风波。

彭 左 罗 1942年5月11日

新四军军部在给军委的电文《同意军队目前不划分等级》中写道：

毛、朱、王、叶：

关于军队中干部等级（将校尉）问题，目前我们同意不划分等级。谨复。

陈、饶、赖 1942年5月3日

八路军120师在给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关于军衔等级问题的报告》中写道：

军委、贺，并彭、左：

关于我军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我们同意军委24日电暂时不定。除军委24日电理由外，我们补充以下理由：我军现实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扩大，有时缩小，部队的流动性和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猛烈扩大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通讯员马上升为连长**、**营长，至缩编（缩小）时，剩下红边黄边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军衔。升官易降级甚难，现时不定等级，干部对等级问题没有什么争执，如定了等级则会争执。**故现时**不定等级。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级弊多利少，**请考虑。

周 甘（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笔者注）

1942年5月6日

再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应毛泽东之邀，从桥儿沟出发，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招呼众人在中间的窑洞里落座，他首先问道：

“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毛泽东见大家都不做声，又问：

“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

何其芳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毛泽东开始严肃起来了，他说：

“**一个人没有受过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缓和了一下口气，问姚时晓：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姚时晓回答说：

“我是江苏吴兴人。”

“你从前做什么？”

“在上海做工人。”

“做过多少年工？”

“做过十多年工。”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泽东说罢，转换了话题，又问道：“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时晓说：

“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

“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得懂了。”

毛泽东说罢，又问曹葆华：

“你是哪里人？”

曹葆华回答说：

“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泽东说：

“我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1958年划归上海——笔者注）。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曹葆华马上联想到成都，他说：

“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哪五老，哪七贤？”

毛泽东问罢，举起右手，伸开手指，待曹葆华说一个名字，他就弯下一个手指头，可曹葆华说出两三个名字后，就再也说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泽东见气氛缓和得差不多了，就把话又转到正题上来，他说：

“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

中午时分，毛泽东招呼几位教师和他一起吃午饭。在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4小碗菜，还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午饭后，毛泽东到卧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间的窑洞里，小声闲聊着。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出来了。严文井问毛泽东：

“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毛泽东说：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说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题目叫作《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胆的。**”

他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说：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屠夫。道路旁边有一个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就用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屠夫出窝棚一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讲完了，毛泽东笑着说：

**“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姚时晓问毛泽东：

“主席喜不喜欢看话剧。”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姚时晓说：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说：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在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眼看时间不早了，何其芳等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出窑洞，边走边聊。何其芳他们建议说，最好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由主席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中央正有这个打算。”

看看到了一个高坡处，毛泽东这才伸出手与何其芳他们一一握别。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萧军已经遵照毛泽东的嘱咐，搜集到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这套刊物登载了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的许多争论文章。在完成任务后，他觉得自己应做的事已经做了，意见也谈完了，看看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就要动身旅行去。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4月27日早

萧军看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带来的这封信，骑上马涉水过河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又告诉他马上就要开会了，要他留下来参加会议。

至此，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集中主要精力，先后约请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罗烽、周文、于黑丁、李雷、欧阳山、草明、刘白羽、萧三、塞克、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陈荒煤、李伯钊等20多位文艺家，面对面促膝交谈。通过交谈，深入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同商讨党的文艺方针等相关问题。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随后，毛泽东约请两位作家，商议草拟了文艺界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名单。

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延安文艺界及有关人员发出了4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 凯丰

4月30日，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座谈会上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以来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的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非针对彭德怀，而是对他领导的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由大家讨论**。后来，**彭德怀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许，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小礼堂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这是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界空前的盛会。在这座青砖灰瓦镶嵌着玻璃窗的小礼堂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陈云、凯丰、康生、邓发、贺龙、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杨尚昆、李卓然、吴亮平、彭真及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毛泽东秘书兼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陈伯达、毛泽东秘书胡乔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徐一新，和许多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周扬、艾思奇、范文澜、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欧阳山、草明、吕骥、欧阳山尊、张庚、柯仲平、于黑丁、舒群、罗烽、周文、李雷、萧三、塞克、严文井、曹葆华、姚时晓、李伯钊、陈波儿、江青、丁玲、陈企霞等以及没有收到请帖而主动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文艺工作者王朝闻等，会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会场的前排位置上。

这次座谈会原计划在5月2日、5月16日分两次举行，后因与会者讨论热烈，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于是便又增加了两次，时间在5月9日、5月23日。

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来到小礼堂，和与会者一一握手。他握着从晋西北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兼演员和导演的欧阳山尊的手说：

“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握手并开玩笑说：

“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讲到这里，他还曾风趣地说：

“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与会者听他这么一说，都会意地哈哈大笑，继而是热烈鼓掌。

他在这次讲话（即《毛泽东选集》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中，提出了座谈会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他根据会前调查研究的情况，将原来设想的3个问题增加到5个，他说：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明确地说：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关于“工作问题”，即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的问题，他说：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笑着说：

“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地走上讲台，作了题为《对当前文艺诸多问题之我见》的长篇发言。他说：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的火爆脾气在延安是出了名的，他讲完了，竟没人接茬。坐在他旁边的胡乔木见大家没有反应，便站起来反驳萧军说：

“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马上予以回击。胡乔木没有再反驳。萧军认为胡乔木不说话是认输了。他在当晚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是控制着他们。”萧军哪里想得到毛泽东当晚曾请胡乔木吃饭，如果他知道了，就不会这样写了。**

且说各个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和文艺工作者们在会议上一个接一个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人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体会或建议，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论性质的相互辩驳和争论。

丁玲在发言中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

丁玲还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戏剧家张庚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说法。

这些观点一出现，就有人起来反驳。双方展开思想交锋，有时争论得非常激烈。

会议结束后，萧军因为自己已经在会上发了言，又听不惯一些人的言论，于是就又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

5月5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会（指原定的第2次会议——笔者注）到16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敬礼！

毛泽东

萧军看着毛泽东的来信，感觉到了字里行间流露着些许领袖的无奈和遗憾。王德芬也劝他说：

“你怎么可以会开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听着夫人的劝告，又想起了毛泽东过去劝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肺腑之言，想想自己也确实太任性了，太说不过去了，不禁有些惭愧，便决定改变计划，留下来继续参加座谈会。

5月9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前举行第2次会议，萧军再次“放炮”。据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中记载：

“他（指萧军）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

胡乔木因有毛泽东支持，这次反驳萧军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言辞也非常尖锐。他说：

“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每当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都恋恋不舍送了很远，给了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听他这么一说，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待笑声过后，他插话说：

“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冇得鸡蛋吃了。”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及后来16日的会议上，一直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用铅笔做笔记。每当他听到发言者精彩独到的见解或错误的言论，便用铅笔记下来；听到有趣的话，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起笑。别人发言时，他很少插话，只有个别时候才说一两句话。

5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军事指挥，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任副政委。关向应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委。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续范亭的信中写道：

“你3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张，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3次会议，欧阳山尊在会议上发言说：

“敌后的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需要是很多的，他们会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当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所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却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队干文艺工作不安心，认为到头来只算个排级干部。我的认识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满足群众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问题。”“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么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泽东听了欧阳山尊的发言，非常满意，他对周扬说：

“到底是从前方和群众一起经过炮火考验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很多人都想听毛泽东的总结报告，所以到会的人特别多，有100多人，连在延安的许多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中央礼堂实在挤不下，会议只好转移到外边的一块黄土敞坪上。黄土敞坪的中央放着一张长方桌，当作发言席，与会者们就围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样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泽东从杨家岭左边的山坡上下来了，手里拿着的一卷纸就是他准备讲的《结论》部分的提纲。他走进敞坪，站在桌边，一开始便说：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3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几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接着，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说：

“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的和我们合作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毛泽东的结论还没有讲完，天色已经渐入黄昏，大会暂时休会。负责摄影的吴印咸邀请毛泽东和大家合影留念。人们争先往前坐，要离毛泽东近些。萧军却远远站在最后的台阶上。他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几次想离会而去，不单是因为与同志们争论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尖锐批评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也包括萧军的文艺思想。**丁玲、艾青、罗烽等党员作家都纷纷做检讨，表示悔改。唯独心高气傲的萧军，在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此时，毛泽东本来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时，他站起来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丁玲，还笑着说：

“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吃到批评。”

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大笑了起来。

晚饭后，工作人员在敞坪上用3根木棍支起了一个架子，挂上一盏明亮的煤气灯。毛泽东就在灯光下继续作结论。关于文艺批评问题，他说：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针对丁玲等人所提出的糊涂观点说：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针对有的文艺家提出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观点，毛泽东说：

“**‘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为这篇《结论》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

毛泽东讲完了，大家热情地鼓起掌来。他转身跟近处的与会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场与会者招手致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萧军终于可以去“三边”了，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1942年5月25日，毛泽东给萧军回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在富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敬礼！

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写给萧军的最后一封信。萧军与毛泽东交往的黄金岁月从此就结束了。

此前，艾青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

他在信纸的边上又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

后来，天一直没有晴，艾青也没有接到毛泽东的邀约，就随着一个运盐队到定边、安边、靖边去了。

5月25日这一天，大批的日军飞机对太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十字岭狂轰滥炸，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中，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原名左纪传，号叔仁，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他考入程潜在广州举办的湘军讲武堂，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1925年11月被程潜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7年8月，他与刘伯承、屈武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1930年5月，左权与刘伯承、陈云、屈武一起归国；12月，左权被任命为闽西新红12军军长。1931年5月，左权被调到红1方面军总前委，任参谋处处长，开始了他一生中极有建树的参谋工作。

左权牺牲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将山西省辽县命名为左权县。1942年9月18日，山西辽县5000余人集会，举行将辽县改为左权县的命名典礼。

5月27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全体人员开始举行关于王实味问题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期间，历史学家范文澜批评王实味说：

“粪土堆里长了几棵小小的野百合花，不经意地望去，似乎也还有几分姿色，仔细一研究，原来枝枝叶叶都充满着要人性命的毒汁。”

诗人艾青说：

“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

作家丁玲则说：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5月30日下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邀请毛泽东给鲁艺全体人员讲话。部队艺术学校的学员们闻讯也赶来了。鲁艺礼堂小，人太多，会场不得不移到操场上。此时，尽管天上飘着雾一般的细雨，可操场上还是挤满了黑压压的听众。毛泽东站在一张小桌子旁，环顾了一下四周，待人们静下来便开始讲话，他说：

“你们不久以前不是演过《带枪的人》这么一出戏吗？那里边不是有列宁吗？在现实生活里，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我们延安，而且现在已经去世了，可是在你们演的戏里他还活着，并且还来到了延安。列宁在这出戏里和前线回来的战士交谈，向他们了解情况；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和斯大林打电话商讨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吃饭，也没有屙屎。”

大家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接着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到屙屎好笑，实际上这是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不吃饭会饿死，不屙屎呢，会胀死啊。**人们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看来是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都要来表现。文艺作品所表现的应该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完成使人民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任务。**”

“我最近和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开了个座谈会，研究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就有鲁艺在整风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广大劳动人民就是鲁艺的老师，你们要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打开大门，走出这个‘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里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你们果真这么做了，就可以学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本事，也就会作出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吓唬群众，开头也许让群众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尊敬你，等到他们看清楚了你，就不会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人了。”**

欲知此后延安的文艺界有何变化，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显然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朱德、彭德怀等人在1939年及其以后提出的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军衔制的答复，更确切地说是毛泽东在非常恰当的时候对朱德、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在军队中划分等级制度的托辞。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决定中提出的理由，的确是合乎时势、合乎人情的。读者诸君如若不信，可以看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情况。那时虽然经过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可一部分人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如果1939年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制度，结果又会如何呢？是打日本人呢？还是比资历、比贡献、争官位、闹情绪呢？这件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又出现了数次反复，那些当事人的人性、立场和品格无不尽情显现。其中的是非曲直已经成为抹不掉的历史，请读者诸君慢慢研判吧。

**第52章**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

**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

话说1942年6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

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整风最高领导机构——“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康生、凯丰、李富春、陈云组成，负责监督和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担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总学委下设4个委员会：1、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李富春。2、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王稼祥、陈云。3、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任弼时、高岗。4、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报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

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分别成立了中心学习组（甲组）；此外，还有文委系统学委会和中央党校学委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学委会，分别成立了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

延安共有10098人参加了整风学习。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到各个机关和学校检查学习的情况，听取各个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还不定期地抽查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进一步推动了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

中共中央要求各学习组在整风运动中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在分析错误时要实事求是，一般错误绝不上升为路线错误，非原则错误绝不上升为原则错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绝不上升为一贯的全局的错误。2、弄清楚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个人责任**。3、对任何问题，采取分析态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对王明等人也不要一概否定。**4、发扬民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敢于讲话。5、**对犯错误的人，要满腔热忱，不搞惩办主义。**

整风的方法，就是学习、检查、总结；即学习文件，检查对照，反省自己，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总结。

后来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对党内历次错误路线寻根追底的现象，有的人要追查错误路线的责任人，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要追究起草人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6月4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一个批判王实味的专题会议，与会者声色俱厉地对王实味提出了各种质问。王实味刚要申辩几句，即被打断，会场秩序比较乱。萧军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会议主持者说：

“大会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也得有个秩序啊！”

会后在回家的路上，萧军对妻子说：

“这开的是什么会啊！怎么把屎盆子朝一个人头上扣，这哪像高等学府！”

没想到他这牢骚话被旁边的一位女士听到了，便向党组织做了汇报。

第二天晚上10点，萧军为批判王实味的事来见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不正当方式的意见。毛泽东劝他说：

“王实味的问题很复杂，不但犯了政治错误，还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你不要管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

萧军在这天的日记里记载道：毛泽东显然很懊恼，“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4名代表给萧军送来一份有108人签名的《抗议书》。《抗议书》中说：

“你是鲁迅的学生，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我们很尊敬你。既然你是共产党的朋友，为什么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为什么反对我们批判王实味？为什么说怪话？你应当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萧军一看就火了，把4名代表轰了出去。代表们走后，他写了一份备忘录，追记了那次批判会的详细经过，先是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当众宣读，然后又亲自给毛泽东抄送了一份。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的全院座谈会结束。

在座谈会期间，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潘芳、宗铮夫妇，潘芳、宗铮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里，这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了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座谈会以此为据，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他们的来往是“托派组织活动”。

最后，座谈会把王实味与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5人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

6月12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罗烽在延安写的《高尔基论艺术思想》等几篇文章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得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途是有益的。

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6月20日，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

一、“七七”5周年纪念的时候，正是处在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日益强固的时候，苏英新条约的签订，苏美协定的成立，20余国热烈举行联合国日，特别是苏联前线的胜利，都表示反侵略同盟国的力量正在迅速增强与结集，准备最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法西斯侵略者则日益接近失败和死亡的末路。我们纪念“七七”，要庆祝苏英美协定的签订，庆祝联合国的团结与胜利，欢迎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的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二、“七七”5周年，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反对日寇的战争中的艰苦卓绝排除万难的精神。**抗战第6个年头，将是接近于战败日寇的年头，同时也是抗战最困难而应做绝大努力的年头，我们全国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度过目前的困难，迎接将来的胜利。**为此必须：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改善各抗日党派间的关系，提高军民抗战的积极性，坚持抗战到底，实行反攻日寇，与反侵略国一同打倒世界法西斯。

三、抗战5年中，我们很多的抗日英雄为国捐躯了，很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无派的人士及爱国同胞在前线在后方牺牲了，最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又在太行山战斗中英勇殉国。我们纪念“七七”5周年，应对抗战死难将士举行追悼大会，以慰死者，以励士气。

四、在延安举行纪念抗战5周年追悼抗战死难将士的大会，指定李富春、谭政、高自立、陈正人、方强、李力果、萧向荣7同志为纪念及追悼大会筹备会的委员，以李富春同志为主任。各地纪念会由各地党政军机关按照当地情况规定之。

6月25日，毛泽东关于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等问题给林哲写了一封信。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和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录记载，林哲的日本名字叫野坂参三，原是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日本共产党代表，1940年3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化名“林哲”，随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一同到了延安，执行“破坏日本军队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反战中心并确立与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联络”等任务。在延安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顾问，指导敌军工作部，具体工作是主持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日本问题研究会，同时创办教育和训练日军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

毛泽东给林哲的这封信是用毛笔写在两张纸上的，自左而右横书，笔力遒劲，潇洒脱俗，一气呵成，可以说是他“毛体”书札中的一幅力作。原文如下：

林哲同志：

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会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所说，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共同敌人而奋斗。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敬致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

毛泽东 1942年6月25日

6月间，斯大林派飞机为延安送来一批医务人员，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送给毛泽东10件皮大衣，10双筒皮靴、几双皮鞋、10条毛毯和几箱香烟。毛泽东向机组人员询问了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对他们表示欢迎。毛泽东除了留下一箱香烟和一双皮鞋外，其余物品全分给其他人了。

第二天，苏联飞机要回国了，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回信，让人缝了一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亲手种的红辣椒。毛泽东告诉苏联机组人员说：

“延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文章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这一天，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由他撰写的题目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

社论中还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同时更加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

社论强调，毛泽东“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应于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

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7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逐渐提升上来的，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能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1、2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的。**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原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5年来的实际，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1937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积极起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地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政治军事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表扬，如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加以指示和帮助纠正其错误，不指出和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诚恳坦白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是不合事实的，对干部团结是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地直率地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地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对党的认识和工作能力。

六、10年内战、5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在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想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的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地方关系而发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7月4日，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电聂荣臻。他在电文中写道：

“你的文章‘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的特点，对于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不包含这些，就不叫作党八股了。**”

“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暂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

7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说：国民党已经决定由张治中、刘斐同共产党代表谈判，并将继续派联络参谋去延安。

1942年8月1日，贺龙与薛明结为终身伴侣。

长征前，贺龙与萧克分别娶了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一对学生姐妹，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姐姐蹇先任成为贺龙的第4任夫人。到延安后，因感情不和，贺龙与蹇先任离婚。

1938年，贺龙42岁，薛明22岁。二人第一次见面，贺龙向来自天津的漂亮女学生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今后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虽经陈正人等撮合，薛明一直没有动心。

据薛明后来回忆，她对贺龙真正动心是因为一次大雨。那一回，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贺龙在前，薛明在后。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里，贺龙回头拉她。她一抬头，正好一个大闪电，她这么一看，他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子里，腿比较长，走路步子很大。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她当时觉得他很英武。就是这么一瞬间，情定终身。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佳话”。

贺龙结婚的当天，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同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重提7月21日国民党决定由张治中、刘斐与共产党代表谈判的事，问道：

“恩来，延安最近有无来电？”

周恩来说：

“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愿与张文白、刘为章谈判，以寻求解决途径。”

蒋介石说：

“目前战事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要好好解决。我一周后将去西安，想在西安约见毛泽东先生一晤。”

周恩来答复说，待请示延安后即行奉告。回到住所，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在态度上还看不出蒋介石有啥恶意。周恩来提出两条对策供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二是周恩来和蒋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周恩来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去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因为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受到斯大林的器重，在今年初回国后，由兰州返回延安的途中，蒋介石曾严令国民党军政当局好好接待，妥为护送；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带到西安的是朱德。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说：

“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说：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10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随即复电毛泽东说：

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中共“七大”代表毛朗明与堂弟毛泽普、堂侄毛远耀及另一个老乡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院里看书，见他们来了，忙起身相迎。寒暄之后，毛泽东交代担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毛泽普，要他写一个材料。毛泽普接受任务后，就和那位老乡走了。毛泽东询问了毛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接着又问道：

“你从家乡来，乡亲们都好吧？”

毛朗明回答说：

“都好。”

“你这次来延安的途中，走了不少地方吧？”

“我们路过湖南、广西、江西、浙江、安徽、山东、陕西各省的好多地方，看了不少风光。”

“你到了这些地方，心中一定有个比较。你认为，农业搞生产，哪些地方搞得好？”

“还是湖南搞得好。湖南人最勤劳，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江浙都不及湖南。北方，如山东、河北、陕西，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农民搞生产，没有南方人发狠？”

“你有什么根据？”

“比如冬天，南方农民有事干，打粪积肥，冬耕冬种，忙个不停。北方农民冬天就没事干。陕西人运东西用毛驴驮，不仅行动慢，而且一次只能驮七八十斤，而湖南人运东西用箩筐挑，一担就可挑一百七八十斤，速度也比毛驴快。”

毛泽东笑着说：

“北方没有南方的簸箕箩筐等运输工具，因此，北方人不会挑。你路上看到荒地多不多？”

毛朗明说：

“不多。延安开展大生产，荒地尤其少。”

毛泽东把话头一转，问道：

“你们党校出了个吴奚如是吗？”

毛朗明说：

“是的。”

“吴奚如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吴奚如是党的高级干部，会写文章，是个作家。他思想上有些问题，是老古董，倚老卖老，讲话不注意场合。还有，他对延安的艰苦生活不满意，有贪图安逸的想法。”

“你看，对这个人怎么办？”

“组织上已经对他做了处理，但处理有点过分。”

“为什么呢？”

“说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不对。虽然思想上有些毛病，但他毕竟是老干部，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么做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利于弄清是非、团结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不再问什么了。

也就是在这8月间，毛泽东突然接到陈潭秋、毛泽民从新疆发来的急电，建议党中央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迅速撤离。

原来，毛泽民因患有气管炎病经毛泽东和党组织批准，由妻子钱希钧陪同，在1937年冬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初，毛泽民、钱希钧行至新疆，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不得不留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此前，新疆军阀盛世才打出了“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保证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输的安全，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从1937年起，陆续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工作。此时，盛世才要求共产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政，毛泽东和中央便决定由逗留在迪化的毛泽民，与接替邓发为党代表的陈潭秋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尔后又任民政厅长。

钱希钧在1939年与毛泽民离了婚，从新疆回到了延安。因为她和毛泽民没有生育，所以在延安见到毛远志和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就格外怜爱，胜如己出。每到周末，兄妹俩也总要去看望“钱妈妈”，钱希钧便拿出自己的伙食“尾子”，给兄妹俩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后来，钱希钧又和周小鼎重新建立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钱希钧先后担任了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毛泽民则是在1939年再次被派往苏联，于6月初到达了莫斯科。

毛泽民的外孙、毛远志的儿子曹耘山，为了搞清楚外祖父去苏联“治病”的真实原因和目的，曾到莫斯科查阅了毛泽民的档案，最终还原了历史真相。

毛泽民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此后，毛泽民撰写了一系列报告，其中有《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片断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写给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两封亲笔信件等，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都陆续转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上。

毛泽民在这些报告材料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总结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反驳了王明的一系列相关说法。他还写道：**“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

曹耘山还看到了一份**由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有3000多字，内中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尖锐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报告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关系。

另据2004年8月《作家文摘》转载卢弘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记载：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提到，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曾对过往“耿耿于怀”，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1939年8月至1940年3月在莫斯科治病——笔者注）**坐在一旁，像是‘原告’**……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诸多史料说明，毛泽民也是毛泽东“**阶梯式”**地派往苏联对王明宗派主义错误路线实施釜底抽薪的重要使者之一。

后来在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离开莫斯科，回到了新疆。他与一个在新疆做统战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的姑娘，结为伴侣。朱丹华从此成为“周厅长”夫人。1941年2月14日，朱丹华在新疆迪化生下了她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发动第2次反共高潮，盛世才逐渐撕下了“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到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陈潭秋、毛泽民正是鉴于这一重大变故，立即给党中央发了急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离党员的计划。陈潭秋和毛泽民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即组织117名准备撤离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气节教育，以便应付突发事变。同时，他们探知新疆与延安的道路已经被国民党封锁了，便决定和苏联取得联系，暂时撤到苏联去。

再说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了《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中说：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

《通报》中还说：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

毛泽东在修改《通报》时加写了3段话，他写的是：

“**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在这夏秋之交的某一天，舒群通知华君武、蔡若虹、张谔3人说，毛泽东邀请他们到枣园（应是杨家岭，当事人记忆有误。毛泽东在1943年春才移居枣园）去见见面。

这天午后，华君武3人在清凉山会齐后，由舒群陪着他们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院子里有几棵枣树，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四周摆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从窑洞里出来，与华君武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围坐在桌子四周，亲切地问华君武是什么地方人，华君武回答说：

“江苏无锡。”

毛泽东又问了蔡若虹、张谔的籍贯。大家随便交流了一会儿，毛泽东请大家吃饭。华君武见桌上摆着一盘生煸青辣椒，想起人们传说的毛泽东吃辣椒的故事，便问毛泽东：

“外面传说主席连吃西瓜都要就辣椒，有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说：

“那是在长征时到了甘肃的一个村子里，吃饭时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又送来切好的西瓜，就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说罢，他把谈话切入主题，问华君武：

“有一幅画，叫《1939年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

《1939 年植的树林》是华君武的一幅漫画，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画的是在长着野草和野花的延河旁，有一棵已经种了三四年的树，枝干伸向天空，树叶被马啃得光光的。

“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

没等华君武回答，毛泽东又这样说。华君武心想，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所在地，知识分子多，我的意思也是讽刺知识分子植的树不会好好管理。只听毛泽东接着又说：

“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哪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华君武频频点头，觉得毛泽东说得很有道理。

“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毛泽东建议说：“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马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画家为难呢？”

华君武说：

“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

毛泽东转向蔡若虹和张谔，问道：

“你们说，**漫画是不是本身就有局限，有片面性？**”

华君武不等二人回答，就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喝了一口酒，说：

“**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后来，他的小学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就表扬了他，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

毛泽东的意见使3位漫画家心悦诚服。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话，时而讲些道理，时而讲些故事，时而又说些笑话，华君武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说：

“如果我在前方，叫我冲锋，我是敢冲锋的。但如果敌人把我抓去了，用严刑拷打，我怎么办？”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道：

“**你要想到为人民！**”

吃罢饭，华君武他们看天色已近黄昏，便起身告辞，结束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程，才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握着华君武的手又说了一句：

“你要想到为人民。”

1942年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全文如下：

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地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实际上是军队系统中党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根据地增强，上下的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活动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委会、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区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份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份，必须包括党委、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3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级党委的工作应该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

二、**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兵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及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机关、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报告上级党委。**在遵照各组织上级的决议解决具体问题而党委内部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责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见，亦必须执行同级党委之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有关机关。**

三、**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之。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主力军是否参加县委，由各地按具体情况决定，县委（无主力军参加之县委）及区委，只包括地方党，地方军及政府的党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应选择能掌握党政策及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担任之。因此，党委书记不仅须懂得党务，还必须懂得战争和政权工作。**区党委书记人选，由中央局分局议定，经中央批准之。地委书记人选，由区党委议定，经分局中央局批准之。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如军区、分区政委被选为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则可设副政委，专管军队工作。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应照顾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体工作。如有个别特殊情况党委书记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党委书记时，须得上级党委或中央批准，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门，与其他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平等权利和义务，不隶属其他部门或委员会，但与其他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军事政策（扩兵建军原则，政治工作等等）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如反扫荡的战略战役计划及总结等），须交党委会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治委员（即党委书记）决定之（司令员与政委对军事行动之最后决定权仍照政治工作条例），**无限制的民主讨论只会引导军事的失败**。军队主要人的任免，仍须经过军事机关依照已定规则进行之。

四、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有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过去有些根据地领导不统一，主要的是由于该地主力军某些领导同志对于该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的统一的认识，因而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如军事建设中之地方武装问题、扩兵问题，财政经济政策问题中之统筹统支等）只注意了主力军，而忽视了根据地，整个工作的配合，因而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发生争执。同时有些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对于一切服从战争的认识不深刻，对主力军人员之补充，粮食及物质保证，优抗及反逃亡斗争，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因而使军队与地方党政间的关系不协调。**今后为了实现根据地领导一元化，除实现以党委为各地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外，还必须纠正某些地方主力军，某些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人思想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实现中央关于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实行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几号指示。**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如县、区，乡）的决定，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并应当经常地彼此联系，彼此帮助。**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执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机关的责任，凡因军队之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军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反对各个组织只是向上告状，而不在本地当面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军委及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方向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及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应该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参议会及政府的威信，党的干部及党员违反参议会及政府法令时，党的组织应给予严厉的处分。**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万一没有说服参议会及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假如党团同志因为自己的意见与同级党委有分歧因而不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是党团同志违反党纪的行为，应该受到指斥与处分。**党必须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视政权工作，把干部堆在党的机关中的现象，必须纠正。**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但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在这里，应特别提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是有严重意义的。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还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必须改善；**军队中应进行拥护政府的教育；政府应保证军队的给养与运输；军队的首长应被选为政府委员及参议员。**军队应成为尊重政权执行法令的模范，军人的违法行为，军事机关必须严格处分。军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员，参议员资格对参议会及政府发表意见外，一切军事机关无权干涉参议会及政府内部工作。但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尽可能地帮助政府工作。

六、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工作。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如民众团体违反政府法令时，政府可加以处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民众团体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和军队，帮助抗战动员工作。但**民众团体并非政权机关，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对人民执行逮捕、审讯、判决等事宜。**军队与民众团体应相互帮助，但不应相互干涉。

七、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工作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军事指挥员、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则仍执行其原来的党政民的职务（如党委书记、县长、工会主席）。

八、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同级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凡带地方性的不违反上级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及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在这里，应当再一次地**提醒各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分局委员以上，师以上负责人的文章，凡带有全国及全党意义的，应事先将主要内容报告或电告中央。各级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应当深刻认识，**一个党的负责高级干部，不经过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

九、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的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在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全局，号召干部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干部管得全局，不陷于局部与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体与局部、上级与下级，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间的正确关系。要加强党政军民各组织中的教育工作，使全体同志认识领导一元化及根据地革命秩序与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这里，应特别警惕军队干部，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军队干部应负担较大的责任，**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独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因此，**军队中军政干部必须特别约束部下，检点自己。**必须号召自己的部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的法令，同时，又应纠正某些党员和干部中不合事实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党务及党的机关中工作才叫党的工作，其实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某些党员空喊或曲解服从党的领导，而对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则不认真研究，不认真执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十、**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在全党中说明，假若军队削弱，假若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军队的人员补充，粮食、服装、弹药的供给与运输，营舍的让予，伤病残废人员的输送、看护与保养，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等等，党委及政府、民众团体，应有随时加以解决的责任，一切漠不关心的现象，都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在军队本身，则都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军队的人员物资补充、运输、优待等等，必须依照政府的法令、规章去做，乱来一顿，只会损害抗战，于军队本身是不利的。

十一、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等方式规定之，以解决统一领导的许多具体问题。制定后须报告中央。

9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10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就毛泽东准备会见蒋介石的问题复电毛泽东说：

“1、**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蒋介石的政治解决是要中共屈服**，我屡次请求回延安，蒋皆不准；**蒋继续派人欲劝降狱中的叶挺，说明蒋介石仍包藏祸心，不能不防**。2、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顽固派欲借苏联对德战争处境困难之时妄图压中共屈服，若主席来此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公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我估计晤蒋前途有二：（1）表面上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2）**约主席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主席长住，不让回延安，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周恩来建议：由林彪出来打开谈判大门，“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主席是否出来。”

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题目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5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抗日的第5第6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既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的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的同敌人做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

毛泽东针对有人担心精兵简政以后无法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他写道：

“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9月间，毛泽东为自然科学院题写了院名。原自然科学院学员毛雪华回忆说：

“194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根据领导的嘱托，到延安杨家岭找毛主席为我校题校名。我到杨家岭见到了毛主席，把来意对他说了，他很高兴，他停下工作为我校题校名。勤务员为他准备了纸墨，纸是《解放日报》旧报纸代用的。每半张纸写一个字，写了‘自然科学院’5个大字。共写了两套，让我带回供选用。回校后，学校把毛主席所写的校名墨迹一比一地照搬到一块长木板上，挂在杜甫川我校的大门口。”

9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1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2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

电文中还说：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9月15日晚，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说：

“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据舒群说，影响很好，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解放（指《解放日报》——笔者注）第4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3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接着，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谢觉哉由于繁忙的政务，大量的写作，加上生活条件不好，积劳成疾，在1942年元月，毛泽东让他搬到杨家岭休养。最近，他的好友王凌波在延安病逝，谢觉哉于9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沉痛的心情。毛泽东在给他复信中写道：

谢老：

6日函悉，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谢觉哉收到信后，即复信给毛泽东说：

“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还想活10年以上。然鉴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处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热，脑筋昏胀了。你似乎看了不对叫我睡，我还能够马上静下来，否则就要发生病。我执行4小时工作制已数日，很好”

9月17日下午1时，盛世才派出军警特务，将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任新疆教育厅厅长）、李一欧、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的住处包围，以他捏造的所谓中共“在陈潭秋、毛泽民的策划指挥下，由李一欧几次召开秘密会议，与徐梦秋等共同讨论决定，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在群众大会上刺杀盛世才等军政要员”的“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由，将他们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囚禁了共产党在新疆的所有党员。

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公开审理“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和遗留积案“杜重远（新疆学院院长，1940年被软禁，1941年5月被逮捕，1943年6月被杀害）阴谋暴动案”等，请蒋介石迅速派一个懂法律的“审判团”到新疆协助审理。蒋介石收到请求信，清楚盛世才的用意，便将这一“重任”交与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徐恩曾办理。

且说毛泽民见盛世才翻脸成仇，顿时怒火满腔，当众把盛世才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请示盛世才，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说：

“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为自己开脱。毛泽民知道盛世才已经无可救药，一怒之下，把电话机砸成了碎片。

后来一直到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才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随即电告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说：“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陈潭秋的化名——笔者注）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5月间，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又向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其中说：“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

再说9月20日，毛泽东和文艺版主编舒群为《解放日报》第4版拟定了一个征稿办法，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按名单发出通知，说是晚上毛泽东要在杨家岭宴请他们。

是日晚，所邀请的人如期而至，毛泽东欣然说道：

“**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日摆宴，必有所求。**”

接着，他当众宣读拟订的征稿计划，只听他念道：

“一、《解放日报》第4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4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也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3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征补。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泽东放下征稿计划，笑嘻嘻地接着说：

“**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4版负责，**当仁不让，所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是为了征稿的事，皆乐于接受，纷纷表示，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众人边吃边交谈，直到很晚方才尽兴而散。

毛泽东送走客人，见柯仲平一个人仍然坐在那里又吃又喝，兴致正浓，便叫来舒群，又让警卫员添上两个碗，连柯仲平面前的酒碗里都一一斟满了酒，说道：

“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

柯仲平接口吟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吟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柯仲平抢着说：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吟罢，3人各饮了一碗。毛泽东见柯仲平对答如流，非常高兴，说道：

“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慰劳酒！”

柯仲平说：

“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

毛泽东说：

“让你去受苦受难。”

柯仲平说：

“过惯了，我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

月光如水，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写了个纸条，背着毛泽东递向柯仲平，欲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截住了。毛泽东看了一眼，笑了笑，撕掉纸条，劝二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了，这才散席。他把客人送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喝多了，骑在马上左摇右晃，行至半道从马上摔了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两人东倒西歪，没走多远，竟卧地呼呼大睡。不一会儿，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又赶了来，叫醒二人，扶上汽车，亲自送他们回机关。

欲知此后《解放日报》办得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曾经提到毛泽东注意到了山东根据地不团结的问题。在那种特殊条件下，不团结的问题在其它根据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像毛泽东在1942年9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他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序言部分所说：由于“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根据地增强，上下的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这些不协调的现象”。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存在，《决定》就要求各根据地“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活动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地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这个《决定》值得认真一读。毛泽东思虑严密，其指示环环相扣，在方方面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使这个《决定》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至今依然可以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重要借鉴。

另外，本章末所叙述的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征稿宴客一节，读来让人忍俊不禁，真可谓是快人快事，着实有趣得紧！

**第53章**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

**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

**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话说1942年9月21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发去了一封电报。

此前，刘少奇在山东分局停留了近4个月，为了减小目标，原来一起来延安的100多名华中干部重新返回新四军军部。刘少奇只带了几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在9月上旬到了129师师部河北涉县赤岸村。

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安抵129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做周密布置。”

9月间，中共中央派李维汉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西北局委员。李维汉走马上任前，毛泽东把他约到杨家岭，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

“罗迈同志，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你到任后，务必抓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毛泽东还嘱咐他，到任后务必加强团结，边区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边区政府周围，边区党的组织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的周围，使边区能在最佳状态下运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李维汉走出窑洞，再三叮嘱，方才道别。李维汉到任后，协助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对前几年建立起来的 1340所小学和10所中学进行了改革。

毛泽东又指示留守兵团和西北局、边区政府，要积极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活动。后来，部队经常帮助群众生产，请群众联欢，看电影、看戏，帮群众打水、劈柴等；地方政府组织慰军活动、优待军人家属，形成了融洽的党政军民关系。

延安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张的，气氛是严肃的。从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各院校的师生，都像留守兵团的战士一样，过着军事化生活。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工作和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任何懒惰、腐化、特权现象，在这里都是不允许的；贪污、失职、通敌等，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紧张的生活，并没有压垮聚集在黄河之滨的这群民族骄子。边区到处呈现出蓬勃生机。

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人们在一周紧张的工作之后，有一个充分放松的机会。每到周末，延安市内，最吸引人的要算大大小小的舞会。一到晚上，舞会就会传出中西合璧的乐队所奏出的古老的舞曲。未经修饰的男女工作人员，穿着一色的灰布制服，走进“舞场”。在这里，无所谓职务高低，大家都是平等的。负责服务的勤务员小鬼放下盘子，也加入到了跳舞的人中跳了起来。在中央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的华尔兹跳得漂亮而标准，只是略显拘谨；朱德的一步舞则像在长征中行军一样稳健，千变万化的乐曲也无法影响他的舞步。

朱德除了跳舞，还喜欢跟抗大篮球队的小伙子们挤在一起打球。毛泽东则喜欢看戏，每逢有戏只要能抽出时间就去看。他喜欢悄悄地坐在后边看，不愿意惊动大家，看完戏再到台上去看望演员们，聊上一会儿。有一次，主持人见毛泽东又坐到了后排，就对坐在前排的老乡们说：

“毛主席也来看戏了，哪位同志给主席让个座？”

他刚说完，前排的人哗啦一声全站了起来。毛泽东一看，再坐在后排是不行了，赶紧起身来到前排，将一个小孩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跟大家一块儿坐下来看戏。

毛泽东因忙于理论研究，要写文章，又要批阅文件，坐得时间太长，肩关节炎由急性转慢性。经医生会诊后，给他开了一个特殊的药方：跳交谊舞。毛泽东对跳舞毫无兴趣，可禁不住医生们连劝带磨，这才答应试一试。舞会的伴奏任务是由文工团担任，毛泽东每次都特意向文工团的演奏员们致谢，他说：

“没有你们，我们就搞不成啊！”

有一次，一曲舞毕，毛泽东问伴舞的杨泳实：

“你是无锡人，我出题考考你，无锡有座庙，庙门有一幅楹联，上联是：‘无锡有山山无锡’，下联是什么？”

杨泳实摇摇头，说：

“不知道。”

毛泽东笑了笑，说：

“那你回去想一想。”

久而久之，毛泽东通过跳舞还真的减轻了肩关节疼痛，而且舞步也愈发纯熟了，能跟着音乐的节奏变换步伐。他深有感触地说：

“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双臂双腿活动，还有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机会。它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无法和别人说话了。”

延安各种各样的歌咏、戏剧和体育比赛也是大家欢迎的项目。抗大的救亡室经常组织各种文艺晚会，搞得生动活泼。

有一次，在他们组织的晚会上，李富春和蔡畅演唱了法国的《马赛曲》，李先念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救亡室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

这里顺便说一说王树声“遭遇爱情”的故事。在延安的一次周末晚会上，已经年满38岁的“大龄青年”王树声，遇到了中央门诊部的一枝花杨炬。晚会结束后，王树声急中生智，跟着杨炬走，说自己的脚后跟裂口子，请教怎么处治。跨进了中央门诊部的门槛，王树声这才向杨炬吐露了心声。说起自己在16年前的一桩婚事，他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按照父母之命结婚了，这是一桩从小定的“摇窝亲”，女方叫胡静贤，是个小财主的女儿，人品和长相都不错，思想也挺开明，可他的心思没在这上面，婚后没过3天，就溜回了部队。有一天，胡静贤手捧几双亲手做的鞋找到了部队，王树声递给她5块大洋说，你日后自己想法混个生活吧。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在晋冀豫边区太行山期间，经人介绍，他曾与一位县级女干部结了婚，后因感情不和，经组织批准解除了婚约。王树声的坦诚，打动了杨炬的心，后来在1944年中秋节的夜晚，二人终于喜结良缘。

再说1942年10月2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转交了王实味在10月1日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王实味在信中说：“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是反革命呢？”“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哟，我要安静要安静呀！不一定要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能有一席之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必须！”

萧军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泽东同志：

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要我交给“文抗”支部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

萧军 1942年10月2日晨

毛泽东没有回信。事情到了这地步，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清清楚楚了。他对萧军不听劝告，继续过问王实味的问题，无疑十分反感。

10月9日，毛泽东将刘少奇撰写的《论党内斗争》一文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他在为该文起草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究。”

10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题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的社论，他写道：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8月23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的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9月15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48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48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10月9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10月12日这一天，《解放日报》为在10日创立的平剧研究院出版了《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泽东为特刊题词：“推陈出新”。

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

林伯渠题词：“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

特刊还发表了平剧研究院的《成立缘起》、《致全国文艺界书》、《致全国平剧界书》等文件，确立了平剧改革的总方针“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方针。一方面研究平剧理论，一方面进行改造的实践。二者互相联系，互相推进”。这些文件同时指出，平剧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是“改造平剧，一个是宣传抗战的问题，一个是继承遗产的问题。前者说明它今天的功能，后者说明它将来的转变。从而由旧时代的旧艺术，一变而为新时代的新艺术。”

10月13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

林彪是在10月7日到达重庆的。10月12日，曾家岩50号周公馆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说：蒋介石定于13日会见林彪，请中共方面做好准备。

林彪进入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办公室，看见蒋介石，走向前去叫道：

“校长，你好’”

蒋介石握住林彪的手说：

“林彪，你是我的学生，我欢迎你到重庆来。”

双方落座后，林彪说：

“毛泽东先生本拟亲自来见校长，因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无法前来，待恢复了健康后，再来重庆与你会晤。”

蒋介石问道：

“你这次来渝，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我？”

林彪说：

“我们接到校长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还约我商谈数次。毛先生托我转给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3点：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的期望。”

关于国共团结问题，林彪根据毛泽东的嘱咐，说道：

“毛先生要我转告校长，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这三个彼此，已成为我党的普遍共识，也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宣言，并已成为全党所一致遵从的、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不但现在不能动摇、违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对校长个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拥护，将来也必拥护。”

蒋介石对这段话很感兴趣。他问林彪：

“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

“当然是真拥护。”

周恩来插话说：

“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我们是坚决拥护的。对此点，我们今天当面对委员长这样讲，在我党的会议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是这样讲的。”

“那好！”

蒋介石面带笑容点头称是。林彪又说：

“国共两党的分歧问题，外传主要有两点：一是主义，二是党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点皆可趋于一致，因为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均具有一个共同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认为，只要国共两党不采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趋于救国之目的，自然能达到一致。”

蒋介石却说：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与三民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趋于一致呢？”

林彪坚持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这样认为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说：

“你们看法不对。”

林彪说：

“我们党的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上是个救国救民的政党。过去我们党制定的十大纲领，其核心就是外求民族独立，内求民权平等和自由民主。这一步实现了，我们党在现阶段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将来的社会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社会革命，那是将来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

蒋介石说：

“你们共产党人提倡和信仰的共产主义，不大切合中国的实际，也可以说是幻想。”

林彪反驳道：

“不是幻想。我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国共两党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许将来两党可以合二为一。”

蒋介石说：

“你们共产党喜欢搞阶级斗争，国民党怎么能与你们合二为一呢？”

林彪反驳说：

“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政党，对违背工农阶级利益，歧视、压迫工农阶级的任何人，任何团体，共产党均坚决反对。其实，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对极少数特权阶层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坐在旁边的张治中和周恩来都不时地观察着蒋介石的脸色。他们都发现蒋介石很不高兴了。林彪却不管蒋介石高兴不高兴，按照毛泽东事前的交代，继续说道：

“在目前，共产党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反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今后国共能长期真诚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对共产党看不惯，总想挑起内战，消灭异己。中国的现实又不允许发生内战。哪个党派挑起内战，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人民一反对，挑起内战者就必然失败。我们党虽然反对国共打内战，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怕内战。中国地域辽阔，多山，多森林，又多湖泊，如内战实在难以避免，我们可以利用辽阔的地域和空间与之周旋。此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我们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均能自给自足，也能织布、产粮食，就是在山地，也有南瓜、包谷可吃。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我们的人民军队。我讲这些，目的是使校长知道，对于政党分歧及党派问题，不是用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而要通过相互信任、协商、谈判的办法。总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地理、经济、军事各方面论，我党均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再发生内战……”

林彪的话还未讲完，蒋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听下去了。周恩来立即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就这样，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在不愉快中结束了。

10月16日，林彪、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等人举行了会谈。

林彪、周恩来在会谈中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停止全国性的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限制、打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的要求，遭到张治中等人的拒绝。

双方没谈多久就结束了。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可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少奇同志现在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开幕式。

这次会议的会期原定半个月，后因涉及问题多，至1943年1月15日闭幕，实际开了89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负责干部52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负责干部117人，参加旁听的有209人。此外，中央党校高级学习组的全体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二部学员（团级及以上）也都到会旁听。大会开幕、闭幕和讨论边区经济财政问题时，政府和财经机关的党外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林伯渠主持，首先选举高岗、林伯渠、贺龙、谢觉哉、陈正人、徐向前、萧劲光、贾拓夫、方强9人为大会主席团，贾拓夫为秘书长。接着，由高岗致了开幕词。

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讲了3个问题。

一、关于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他说：

“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摩**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

他特别强调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二、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持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前进。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

三、关于边区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5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10月19日下午，中央研究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

会议将要结束时，萧军要求在会上宣读他写于6月份的备忘录，表明他并非同情王实味，更不可能反对批判王实味。台下几位党员作家周扬、刘白羽、丁玲等和他展开了激烈争辩。萧军“舌战群儒”，毫无惧色。辩论会从晚上8点延续到午夜2点，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激烈。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各不相让，就劝解道：

“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先检讨自己。”

吴玉章的话让萧军很受感动，于是他主动承认了错误，说：

“吴老的话让人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99%都是我的错，那1%的错，你们有没有呢？”

丁玲猛地站起来说：

“我们一点错都没有，100%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对共产党毫无影响。”

萧军反驳道：

“我99%的错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不想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一角五分钱可买一颗子弹——笔者注），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

说罢，拂袖而去。此后，由于他拒绝检讨，就被扣上了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任何部门都不想接收他。此时萧军已感觉到毛泽东的冷淡和疏远，就没有再去反映问题，老老实实待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成为赋闲之人。

后来在1945年2月18日，萧军在一次舞会上和毛泽东相遇，两人虽然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萧军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我们彼此是理解的。”

10月20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始学习文件。

10月21日、22日，陈正人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连续作了《整党整民报告》。

他在报告中讲了7个问题。在讲“整党为了什么事”时，陈正人对边区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分析，认为边区党是老党，是从斗争中产生的，是比较好的党，全国很难找。但是问题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不是马列主义的，党员也有很落后的，新发展的党员思想上也有毛病。在政治上有些党员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政策，这次整党“目的就是为着把边区的党搞好，度过困难，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在讲到“本着什么原则精神来整党”时，陈正人指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风的精神，学好会议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边区党达到新的团结与新的统一。”

在讲“整党草案从何而来”中，陈正人介绍了提交这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的整党草案的起草经过。说它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派出的考察团在绥德、安定经过调查研究，后又经过组织部长联席会议的讨论后产生的。陈正人要求与会同志敞开思想，认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在讲到“党员政策”时，陈正人对边区党的基本情况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在边区党30000党员中，完全符合党员条件的有12000人，占40%，这是党的基本力量。基本符合条件的有15000人，占50%，不好的占10%。”他还提出，对好的党员要鼓励，使之更加进步；对中等水平的党员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使之尽快达到党员标准；对不好的也要以教育为主；对硬不肯前进者则淘汰；对极坏的应坚决清洗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在讲到“支部建设”问题时，陈正人对支部建设提出了巩固政权、拥护军队、团结群众、执行政策、教育党员等6项任务，尤其是提出了在支部工作的同志要加强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他还就县委与支部的关系，发挥支部工作积极性，发动乡村斗争等问题，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在“干部政策”中，陈正人对边区党的干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对狭隘经验主义、地方观念、个人地位观念、享乐腐化思想、自由主义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

在“使用干部”问题上，陈正人认为“过去强调干部资历，今后要强调干部的才与德，所谓才是看他能否胜任工作。”此外，对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 ，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等，陈正人做了全面分析，要求各方面的干部都要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真诚协作，共同前进。

最后在讲到“新区同边区工作问题”时，陈正人鉴于新区比老区多且发展快这一新形势，强调新区更要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从10月23日起，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围绕陈正人的报告，用了8天时间进行讨论。

10月23日这一天，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做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王实味坚决予以否认。

后来在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大批人员在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里。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有人提出，带着王实味行军是个拖累，不如把他给收拾了。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里掩埋，时年他41岁。关于批复杀王实味的领导人，一说是贺龙，一说是王震，在毛泽东逝世后，又有人说是康生和李克农。究竟是谁批复了杀害王实味的请求，至今依然是一个待解之谜。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以后，听说王实味早已在晋绥公安总局被杀了，大为震怒，他厉声说：“要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林彪说：

“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0月27日，毛泽东给陈正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正人同志：

整风铅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问题，康生同志在看过后有些值得考虑的不同意见，提议在讨论后暂不做结论，接着讨论其他问题，结论可以在闭会（指西北高级干部会议——笔者注）前作，而在作结论前中央可以讨论一下。请与任（任弼时）、高（高岗）商量酌定为盼。

毛泽东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关于陕甘宁边区整风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

敌后“大施精简，统一领导”，整风已见成效，困难可以克服。

10月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向他们询问冯雪峰的情况。

原来早在193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3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在3人团领导下，成立两个委员会：一是工人工作委员会，由林枫任书记，吴仲超、马纯古为委员；二是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由王尧山任书记。1937年七七事变后，冯雪峰奉命到南京参加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见到冯雪峰后，给他一份题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当他看到其中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等内容时勃然大怒，一气之下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回浙江写红军长征的小说。1937年底，他回到故乡义乌，此后近两年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1939年，冯雪峰恢复组织关系，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关于“艺术大众化”》；1940年基本完成关于长征的小说初稿《卢代之死》，约50万字，后失落；又著有《论典型的创造》、《文艺与政论》、《关于形象》。1941年，冯雪峰在金华被宪兵逮捕，先后被关押于江西上饶集中营、福建徐市集中营。

毛泽东得知冯雪峰被捕被囚的消息，立即和陈云商定，一定要想办法将他营救出来。随后，他致电周恩来，请周恩来和董必武设法营救。董必武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胡秋原帮忙，未能成功。后来在11月下旬，冯雪峰由第3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出面保释出狱。1943年5月间，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获悉冯雪峰到桂林的消息后十分高兴，要他立即到重庆。此后，冯雪峰便到了重庆，留在南方局，先后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

再说1942年11月1日，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致信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11月2日，毛泽东复信给贾拓夫，他写道：

“大约可在10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事先请你将布化12条及结束语（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笔者注）第4第5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12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译出的，请注意。”

11月5日，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对陈正人的报告已经讨论了8天，讨论中涉及到了本传前边在103章中讲到的原西北红军两个派系的形成及产生矛盾的历史问题，与会者要求充分展开讨论，许多人要求大会发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

大会主席团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集中一段时间，用整风的精神，讨论边区党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问题。

在此后的12天中，会议由5个分区分成的5个小组讨论，改为大会发言，民主、公开、激烈、严肃地对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与批判。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贾拓夫、刘景范等70多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不少人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11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短文。全文如下：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2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5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11月7日夜，毛泽东给国民党第38军中将军长赵寿山发去了一封密电。

赵寿山，原名赵生龄，1894年12月出生于陕西户县一个佃农家庭；1924年投奔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部队，历任营、团、旅、师、军长，成为第17路军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1936年，身为西北军17师11旅少将旅长的赵寿山，对杨虎城建议说：“目前的形势是处于国家兴亡的紧急关头，对我们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介石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1938年1月，在山西坚持抗战的赵寿山秘密访问了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向他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赵寿山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党的指示。赵寿山还和共产党方面约定了联系办法。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17路军编为第38军和第39军，由赵寿山任38军军长。

毛泽东在给赵寿山的密电中写道：

勤兄：

一、可否派贵处郝克勇来和我一谈，请裁复。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3字。

弟 公叩 虞辰

这天夜晚，赵寿山思绪如潮，久久未眠。次日晚，赵寿山约见郝克勇，一见面就说：

“延安来电报了，毛泽东指名要你去汇报，你知道了吧？”

郝克勇说：

“我知道了。”

两人落座后，赵寿山问道；

“毛泽东主席指名要你去汇报，你和他熟识吗？”

郝克勇说：

“我和毛泽东没有见过面。”

“没见过面，那他为何点名叫你去延安面谈？”

“毛主席知道我和你的特殊关系。”

赵寿山有点惊异地问：

“你给叔说，你究竟在共产党内担负什么责任啊？”

郝克勇的父亲郝鹏程是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赵寿山的故友，因此，二人时常以叔侄相称。郝克勇回答道：

“我代表共产党组织和你联系。”

“噢！原来是这样，这就好了。”赵寿山高兴地点点头：“咱们部队的情况你都熟悉，由你去向毛泽东汇报，我就放心了。”

他点燃了一支土雪茄烟，一边吸着，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去年，蒋介石迫害咱们部队，要37名干部受审，搞得很紧张。我们派张西鼎（中共党员——笔者注）去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请示方针，至今不但人去未归，而且杳无音信。以后又托伍云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笔者注）询问过几次，也无回音，使人十分焦急纳闷。现在好了，毛泽东来了电报，你可以作为我的代表，把咱们部队的情况如实向他汇报，请毛泽东给予指示。”

11月中旬，国民政府粮食部参事郑延卓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赈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

11月14日，毛泽东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讨论会。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枫、周士第、甘泗淇说：

“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1日，毛泽东才开始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22日停了一天，23日继续，讲完了《十二条》。

他在讲解中首先强调，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

接着，毛泽东逐条进行讲解。

斯大林的第1条说，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说：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即前面所说的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笔者注），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

斯大林的第2条说，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说：10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斯大林的第3条说，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说：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

斯大林的第4条说，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

斯大林的第5条说，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说：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

斯大林的第6条说，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地联系相结合。毛泽东说：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

斯大林的第7条说，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说：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7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

斯大林的第8条说，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说：**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斯大林的第9条说，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说：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

斯大林的第10条说，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份，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说：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

斯大林的第11条说，党必须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毛泽东说：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

斯大林的第12条说，党应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说：这次高干会议以后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有威信的人去进行。

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12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11月23日晚，毛泽东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是年秋季，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了该社政治指导员成荫创作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目，很受观众欢迎。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也观看了这些戏。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直站在台下鼓掌，并向台上谢幕的演员挥手致意。贺龙得知自己部下的剧社演出如此成功，便要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政治指导员成荫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对剧社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

11月27日，国民党自12日召开的五届十中全会专门就中共问题通过了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结果案》中说：

“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

11月2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我党的决议案，略谓：总裁盱衡时局，对内对外作政策上的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民国二十六年9月22日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11月26日晚集会，详细研究，一致认为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敬谨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彻底觉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果能如此，则不问其过去之思想与行动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为个人，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但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等语。同时，十中全会发表宣言，其中关于对待我党者有云：对外必须互相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又云：**三民主义非但国民党所信仰，实为全民必循之途径，顺此者昌，逆此者败**。时至今日，不应再有所谓政见之异，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牵制妨碍之现象。吾人愿提示全国，凡能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无扰乱社会秩序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我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为个人，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为标举，以冀引起全国有识人士之共鸣者。等语。

国民党从1939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1940年1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1次反共大摩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的第2次反共大摩擦（德意日3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摩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自1941年6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滇缅路被切断及英苏订立20年同盟条约之后，更有好转。最近苏联在斯城的伟大胜利及英美在北非与在太平洋的胜利，增强了国民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国共关系好转，亦有促进的影响。在国内，1937年以来，我党我军的极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但**至今年，我党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损失及根据地的缩小，减轻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他们估计，我党我军在今后抗日期间，还会有大的损失**（这种估计是适当的）。同时，在日寇侵苏危险减少以后（过去国民党长期地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日寇必然要加重对中国的压迫，国民党需要利用我党的抗日力量（**日寇在华31个师，我党担负了15个师**）。再则，自从远东慕尼黑危险消失之后，我党停止了反对投降危险的宣传。而从去年4月直到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批评甚少，坚持地求得和他们改善关系。虽则国民党在这一期间内，仍然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压迫（在大后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击新四军，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大的特务破坏活动与经济封锁），我们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国民党。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国民党广大人士的同情。再则，国民党自己有很多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存在着。其中，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及农民的骚动，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企图经过缓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去缓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这里特别有严重意义的是河南600万灾民的自发斗争，某些部分已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最后，1940年与1941年两次反共大摩擦，国民党企图利用武力压迫把我们屈服，但遇着了我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企图动员舆论赞助他们的反共，但多数舆论的同情却站在我们方面。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促成国民党不得不对国共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十中全会的这一处置，是我们和他们长期接洽及他们经过许多的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最近10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11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1939年到现在4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的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在某一点上和1937年2月间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所谓“根绝赤祸”的那个决议案有些类似，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各地对于十中全会的决议，应本《解放日报》发表之态度进行解释。根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所列4条（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革命，苏维埃改为民主政府，以期政权统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统辖），与国民党十中全会向我党要求的各点相比较，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外，我们不但过去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在将来也准备遵守这一诺言。

**关于组织军队一点，过去是为了抗日的需要而组织游击队，并且是遵照二十六年蒋介石“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任”这一宣言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在十中全会后，国民党会放弃军事压迫而加强政治斗争，摩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中共中央

1942年12月1日，在延安赈灾的郑延卓要返回重庆了，毛泽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往重庆。这封信是用毛笔书写的，极具书法研究价值，原文如下：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

敬颂勋祺！不具。

毛泽东 谨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郝克勇在欧阳钦的陪同下，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

原来，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赵寿山奉毛泽东11月7日的电令，派郝克勇于11月中出发，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郝克勇是共产党在第38军的地下工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他是在11月底到达延安的。

毛泽东尚未起床，欧阳钦和郝克勇就在传达室和胡乔木等人闲聊。不一会儿，江青和叶子龙的夫人蒋英从窑洞里出来了，江青非常和蔼地对郝克勇说：

“主席还没有起床，先到里面坐吧。”

郝克勇和欧阳钦随着她们进了窑洞。房子中间摆着一个方桌，四边各放着同样大小的小方凳。江青让他们坐下后，为他们倒了茶，说：

“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到下午4时起床，请你们等一下。”

她说着，取来一副扑克牌，要郝克勇和她当对家玩扑克，打所谓统一战线。江青洗牌快，分牌快，出牌也很刁。郝克勇配合得很好，二人很快就赢得了500分。

苏联记者彼德·伏拉迪米罗夫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1942年的江青：“她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柔弱身段与机灵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时候，同丈夫那伟岸的身躯相比，显得是那样弱小。”“极端的自觉性是她杰出的品质，她的理智胜过她的秉性，她好不仁慈地驾驭着自己，她的事业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急于要获得她最终得到的东西。”

且说蒋英见江青和郝克勇赢了500分，很不服气，就说江青和郝克勇有暗号。江青说：

“没有暗号呀，他是做统战工作的能手，最能了解对方意图。你要打听你父亲的下落，他一定会知道。”

蒋英一听立即兴奋起来，她对郝克勇说：

“叶子龙也给我说过，你肯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叫蒋听松，听说在第1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处当什么参议，但一直联系不上，你是否知道？”

郝克勇由于做秘密工作的习惯，警惕性高，纪律观念也强，见江青和蒋英如此说，有些为难。坐在旁边的欧阳钦说：

“你如果知道的话，说说也无妨。”

郝克勇这才对蒋英说：

“你父亲蒋听松确实在卫立煌处当参议，和赵寿山有关系，也和我们党有间接的统战关系。”

蒋英一听，喜极而泣，拉着郝克勇的手说：

“这就好了，以后别人就不能骂我是特务羔子啦，请你给我写个证明吧！”

郝克勇望了望欧阳钦，欧阳钦点点头。郝克勇就说：

“好吧，回头由组织部出面找你时，我再写。”

正在此时，毛泽东披一件延安生产的呢子上衣从另一个房间里出来了。江青知道毛泽东要谈工作了，就拉着蒋英退了出去。毛泽东首先问郝克勇现在用什么名字？他说：你回到延安，应该改个名字。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范明吧。于是，郝克勇马上改名为范明，而且此后一直使用范明这个名字。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他在国民党38军的统战工作情形。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提出要求，他想加入我们的党组织。”

毛泽东“哦”了一声，高兴地说：

“要求入党好啊！好吧，这是一个严肃的组织问题，请你详细讲一讲。”

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要求入党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在我来延安之前，接连和我谈了几次。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出乎我意料地向我详细谈起了他的身世和历史，谈了他多年来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和主席与中央领导同志关心他教育他的情况。他对我说，在西安事变后，他们部队曾和1、2方面军在三原会师，与红军领导人朝夕往返，获益甚多。有一次，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等同志由云阳到三原会见他。当时，他对放蒋一事不大理解，心存疑虑。经过彭总、弼时同志耐心解释后，他的疑虑顿释，心情格外高兴，随即叫来照相馆的人，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同红军领导人合影留念。照相毕，彭总握着他的双手说：‘赵司令，这一下你可叫蒋介石抓住啦，你这是通匪有据啊！’赵寿山认真地说：‘我不怕，请你报告毛主席，我不仅通匪，我还要上山参加哩！’”

毛泽东听到这里高兴地笑了。范明接着汇报说：

“赵寿山还说，从那时起，他不仅与共产党保持了密切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保持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入党的答复。为此事，他曾问过他的参议、我们的党员杨明轩同志。杨告诉他说，共产党不是青红帮，随便说一下就可以入党的，你必须郑重地提出申请，履行党章规定的入党手续，才算入党。”

毛泽东说：

“讲得好！”

范明说：

“他听杨明轩一说，这才明白过来。所以，他在最后一次和我谈话结束时，很严肃很郑重的委托我，代表他正式向主席提出入党的要求。”

毛泽东听到这里，欣喜地笑道：

“还有这样生动的故事啊！”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然后对范明说：

“赵寿山军长的入党问题，是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问题。你可以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讲讲你的意见嘛！”

范明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说：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看，他有3条可以入党。”

毛泽东蛮有兴趣地“哦”了一声，伸出他那宽大的左手掌，问道：

“这第一条？”

范明说：

“赵寿山是17路军中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他最早响应我党《八·一宣言》，不仅是参加西安事变的重要将领，而且在抗战中与八路军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见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在部队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他还学习八路军治军经验，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把38军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改造成团结进步、联共抗日的劲旅，赵寿山的觉悟和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毛泽东屈了一个指头，说：

“好，这是第一条。再往下讲。”

范明接着说：

“赵寿山与我们党在巩固部队、保存实力、争取生存、外抗日本、内斗重庆诸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他之所以能由11旅旅长当上17师师长，又由师长当上38军军长，表面上是当的国民党的官，实际上当的是由我们共产党员撑腰的官。”

毛泽东又屈了一个指头，说：

“在北伐战争时期也有过这样的先例。你讲第3条。”

范明说：

“赵寿山也清楚地知道，38军的人事权、财权以至兵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里。而这些共产党员又都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拥护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的中坚力量，赵寿山只有依靠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才能在日蒋两种力量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否则，要么被国民党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灭，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毛泽东听完，屈了第3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只是不住地吸烟。待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

“事情正是这样的，38军军长赵寿山和我们党有两个共同的利益基础，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灭的阴谋。所以，赵寿山领导的38军和八路军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对赵寿山应当完全相信，决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赵寿山全部公开38军的党员名单，党的重大决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一口，郑重地说：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毛泽东把烟灰轻轻地弹入烟灰缸里，又嘱咐范明说：

“你回到前方后，请代我向赵寿山军长问好，要向他转达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不仅要做好38军的工作，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做好孔从洲、李兴中、陈硕儒等西北军将领的工作，还要鼓励孙蔚如出面向蒋介石做工作、作斗争。**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现象和社交应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队腐化。又不要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以免暴露。**同时，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做好群众工作，这是你们能否生存的根本条件。”

毛泽东这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点燃一支香烟，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反复踱步，停了一会儿，走到窗口，朝外望了望，说道：

“啊！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肚皮也饿了，该吃饭了，喂饱肚皮再说。”

江青应声端上来饭菜：一盘辣椒炒肉片，一盘辣椒烧豆腐，一盘辣椒炒土豆，一盘辣椒红烧小鱼，中间放了一碗菠菜豆腐汤。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请吃饭吧！**朱夫子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咱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黎明即起，喂饱肚皮，请放开肚皮吃饭，回去好好睡觉，**明天再谈。”

范明、欧阳钦也都笑着拿起碗筷，随着毛泽东盛了大米小米混合饭，埋头吃了起来。

欲知赵寿山和38军后来情况怎样？容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中，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对10月9日刚刚结束的苦战了48天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断言：“**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当此时也，“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还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重大转折。毛泽东这一惊人的预言，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呢？说来也怪，历史的车轮果然按照毛泽东的预言转动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后，苏军凭借人力、物力上的优势，逐渐占据主动，在1943年8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又挫败了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战略攻势，从而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收复了绝大部分国土，进而占领东欧多国，在1945年4月30日攻占德国首都柏林，5月8日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在3个月后，百万苏联红军又在中国东北歼灭了60万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事情到此还远没有结束。在苏军占领的东欧地区，迅速出现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8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二战后亚洲的朝鲜、中国、越南、老挝，拉丁美洲的古巴，还有二战前建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西方到东方竟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预见是多么科学，多么高远，多么神奇！

**第54章**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

**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话说1942年12月8日晚，毛泽东为了撰写一篇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用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亲自组织收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此，他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的信中写道：

汉宸同志：

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3部分，并须在3天至多4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敬礼！

毛泽东 12月8日夜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南汉宸的信中写道：

“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1000至1500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3至4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月16日晚，林彪给毛泽东及书记处写了一个关于同蒋介石谈话经过的报告：

毛主席并书记处：

甲、14日接到召见通知，本日上午恩来同志指示了见蒋时谈话要点。午后由张文白陪同见蒋，谈约45分钟，彼问我何时回去，行前还有什么话要向他说，我当即谈：一、我党对党内、党外均发了拥护十中全会宣言与决议的文件。我赞扬了此次会的新精神，赞扬了他在十中全会中演讲。二、我党拥蒋为民族领袖确是诚意。三、两党将来关系。四、现在须求彻底实行三停，并力求二编，并如何实行二编。五、双方今后当更接近。感谢郑延卓去延安，并说明毛有信托郑带来致谢，郑已抵达西安。六、请他发点药品给我们。

乙、蒋表示如下：一、统一团结问题，他们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二、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求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零碎碎。三、只要他一天活着，解决问题与问题解决后，总会更合乎公道的，不让我们吃亏的，他死了就管不了。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不会偏私的，一视同仁的。四、过去革命5年的、10年的随便过去了，现在当求国家问题解决后，国家必能一日千里的进步。五、答应发给药品。如果我不离重庆有了时间可去找他，离重庆后，如果要再来亦可以的。

丙、谈完后，张治中陪同退去。在回来途中张说：“蒋先生既说愿意解决问题，你们可以提出具体意见，可以与他商量。”并说，蒋此次是很诚意认真的。

丁、我在向蒋报告时，我提到新四军3字时，他即插言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再提他是不听的。面红耳赤地唧唧说了这一遍。说完了才让我继续发言。他说我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才告诉我这话，他还未向别人说过此话。

以上情形望中央研究与指示。我们正准备向张治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林彪

12月20日，毛泽东致信南汉宸说：

“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4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1943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4天之内下一番苦工赶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2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12月21日，毛泽东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直到12月29日才结束。这个书面报告共10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级干部会议闭幕而来不及写了。报告中的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度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毛泽东说：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地有效地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毛泽东批判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他认为要发展经济，就要解决好公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说：

“**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毛泽东还强调说：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5项目的。”

这年冬季的一天，在军委二局工作的毛远志从安塞来到延安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看望伯伯。毛泽东和几位客人刚吃完饭，警卫员正收拾碗筷，毛远志忙说：

“不要拿走，我还没吃饭呢！”

毛泽东看着风尘仆仆的侄女，心疼地说：

“赶了50里山路还没吃饭？那就赶紧吃吧！”

他吩咐警卫员再拿个好菜来。不一会儿，警卫员端来3个烤辣椒，这的确是毛泽东最爱吃的好菜。毛远志就着辣椒，将伯伯和客人们剩下的二米饭和一个炒黄豆芽一扫而光。警卫员收拾了碗筷，抹干净桌子，转身去了。毛泽东亲切地望着侄女说：

“学了文化，会写信了，你写的信我收到了。你经常头痛，我听说了。”

一位客人问毛远志多大了？是否入党了，毛远志得意地说：

“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加入的？”

毛泽东有点半信半疑。毛远志说：

“1938年10月我就是预备党员了。只因为年龄不到18岁，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预备党员。”

“哎约，你好辛苦哟。”

“辛苦倒不辛苦，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的。”毛泽东拿了一叠纸和两支铅笔送给侄女，又嘱咐道：“你今天看完病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学习。正好你妹妹李讷和她母亲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里，吃饭就同工作人员一道吃。”

毛远志到医院看完病回到杨家岭，毛泽东又问起她在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毛远志便将谁是她的科长、谁是她的股长、工作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等等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又问道：

“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毛远志叹口气说：“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里往外流。”

“哎约，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放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勺油，漂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3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

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半人，一个是毛顺义，一个是毛华初，半个则是毛远志。后来，他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三分之一给二局做本钱，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将赚的钱补贴在工作人员的伙食里，伙食果然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天晚上，毛远志就睡在了李讷的床上。夜已经很深了，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警卫员把她推醒了。原来，毛泽东此时才吃晚饭，让警卫员送来一个小猪蹄让她吃。毛远志迷迷糊糊地啃完猪蹄，倒头又睡。又过了两天，毛泽东问毛远志：

“头痛是不是好点了？”

毛远志回答说：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大约一个星期后，江青回来了。这是毛远志第一次见到江青。尽管江青对她很亲热，很体贴，但家里住的地方实在紧张，她还怕影响伯伯工作，便去向伯伯告别，她说：

“伯伯，我想回去了。”

毛泽东不解地问：

“咱们不是有君子协定，你住两个礼拜吗？”

“我觉得头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过不来吧？”

尽管毛泽东一再挽留，毛远志还是告别伯伯回到了二局。后来在1943年，毛远志被调到西北局工作。有一次，她跟伯伯说：

“我想去前方工作。”

毛泽东笑着拍拍侄女说：

“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

果然，没几天毛远志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较厉害，组织上把她送到西北局农场养病，离毛泽东住的地方很近。毛远志住在一间干打垒平房里，自己做饭吃。毛泽东关照警卫员拿来了一些旧报纸，帮她把墙糊上，还送来了两只别人送给他的风干鸡，让她补补身子。江青也经常来看望毛远志，非常关心她的身体健康状况。

再说12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续范亭，他写道：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一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啊！其余不尽。”

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茶坊”工厂厂长毛远耀按照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和总工程师沈鸿一起从安塞策马启程，奔向延安，中午时分到达大砭沟军工局驻地。午饭后，二人稍事休息，便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临时住处。

他们一进门，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微笑着和沈鸿亲切握手，又把沈鸿介绍给旁边的彭真和高岗。落座后，毛泽东对沈鸿说：

“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咧，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

沈鸿连忙说：

“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沈先生是从哪里学会机器制造的？”

“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后来胡乱做一些机器，说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泽东听罢大笑起来，他说：

“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

说罢，他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沈鸿手中，又笑着说：

“**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

是日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了沈鸿和毛远耀。沈鸿回到“茶坊”后，仔细认真地读了毛泽东为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对有关工业方面提了一些建议。

沈鸿大部分时间是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解决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据统计，在抗战8年中，沈鸿与茶坊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使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此，他3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

1943年1月1日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1000余人的干部团拜会，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

刘少奇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周密部署下，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2月30日安全回到延安的。

毛泽东、朱德莅临元旦团拜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发出了继续战斗的号召，向前方和后方的军民提出了不同的战斗任务。他说：

“1943年胜利在望。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生产、学习。”

他号召后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及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

随同刘少奇一起来到延安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团拜会上见到了毛泽东，他喜不自支，随酿成小诗一首：回到圣地心花开，八州翘首向延安。欢迎晚会红光闪，亲聆音容乐无边。

随后，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1943年底改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

1943年初，毛泽东迁往枣园居住。

这枣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这个僻静的山村横卧在山坡和平川之间，村内村外长满了枣树、梨树、杏树，以枣树居多，故俗称枣园。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枣园成为中央社会部的驻地，遂改名为“延园”。后来枣园旧址的大门石柱两侧一直保存有康生所书的“延园”二字。

就在毛泽东移居枣园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电影纪录片《生产、战斗结合起来》已经拍摄结束了，摄制组认为大生产运动是在毛泽东号召下开展起来的，在纪录片中应该出现毛泽东的镜头，为此，摄影队长吴印咸便到枣园请求毛泽东为电影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吴印咸感觉窑洞内太暗，就在窑洞外架好了摄影机，请毛泽东到窑洞外去写。毛泽东在两张长210毫米、宽160毫米的白色凸版纸上分别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过程全被吴印咸拍摄了下来，编辑到了电影里，并将这部纪录片改名为《南泥湾》。

后来在2月4日，《南泥湾》在延安首映，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轰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随着影片广为流传。

1月5日，毛泽东向陈毅、饶漱石发去《关于新四军行动总方针》的指示电：

陈、饶：

来电悉。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军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

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40余师，包围德军22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31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

少奇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泽东

1月8日至11日，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他在第三个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第一部分“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中说：

“中央这次重新审查1935年的陕北‘肃反’问题，认为朱理治、郭洪涛两个同志应负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而不应由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来负主要负责。自然戴、聂二同志是那次错误的肃反政策之坚决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应该受到一定的处分，但主要的责任是不应该由他们来负的。中央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把陕甘边的26军的高级干部逮捕了许多，并杀害了200以上的优秀干部，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革命中的罪恶。**产生这种错误肃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当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党内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路线，而陕北的这种错误肃反也就是由于他们执行并发展了这种‘左’倾机会主议错误路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个同志的品质恶劣。**就是说，他们两个党性很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高度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自己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因此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敌人斗争的性质。当时他们所用的政治资本，就是反对所谓以刘志丹、高岗同志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经过这次高干会议检讨的结果，认为当时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路线不仅是没有错误，而且是从实事求是出发的一种正确路线。**”

“在1937年5月的苏区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已经感觉到高岗同志是陕甘宁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应真正拥护的领袖，从高岗、张秀山、王世泰等同志的具体工作中看出他们是有能力的老干部，**从那时候起，中央已经认为这些干部在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是有工作能力的，在全边区党中是有威信的。因此，在后来的边区党委以及以后组织的边区中央局和西北中央局，高岗同志都担任了这些组织的书记。”

“这次高干会对于陕北党历史问题的检讨，高岗同志作了正确的结论，这不仅对边区党、边区干部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而且因为这些问题带有全国全党的性质，因此，对于全国的党来说，也是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斗争和保存干部给陈毅、饶漱石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陈、饶：

4日电悉。（一）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隐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二）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并同意赖传珠来延安，以粟裕为参谋长。干部来延路线，主要须经华北各根据地护送，其他路线则可经刘晓送西安转延，或经北京、彰德、开封转延，交通建立办法另告。但人数不能太多，并须可靠的能在敌区国民党区行走的干部才可以。（三）在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等应设法送一些来延安，以免在敌后损失，但须估计他们的身体是难于长途行军的。

　　 中央书记处

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

吴满有在边区政府发展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号召下，订出自己周密的劳动增产计划，靠劳动致富，成为劳动英雄。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

1月14日，是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最后一天。

会议认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从实际出发，依靠山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

大会还对359旅全体指战员，对王震、何维忠、罗章、晏福生、马文瑞、习仲勋、沈鸿等22名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干部，进行表彰，颁发了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锦旗和奖状。

毛泽东在给359旅的锦旗上题写的是“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马文瑞的题词是“密切联系群众”，给沈鸿的题词是“无限忠诚”。

大会还对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惩处。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了领导的真实意义。他说：**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高级干部会议已经完成了将边区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意见集中起来的任务，现在就是坚持下去的问题了。实际上“坚持下去”的任务已经开始执行。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团都积极部署了1943年的大生产任务，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竞赛，形成了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村庄与村庄、军队与民众、部队与部队及各机关之间竞相开展生产竞赛的热烈场面。

有一天，毛泽东问部队负责人王近山：

“部队对自力更生、生产自给有什么反映？”

王近山回答说：

“战士们对丰衣足食的口号兴趣很大。”

毛泽东说：

“有兴趣就好。不过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毛泽东又说：

“**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还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理，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的决定》：

由于延安与华北华中的联系更加困难，陕甘宁及晋西北两个边区更加重要，特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直接管辖上述两个边区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及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兼任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委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兼联防军政治部第二副主任。

留守兵团政治部撤消，并入联防军政治部，委方强同志为385旅及陇东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委伍晋南同志为120师358旅及3分区政治部主任，委张平化同志为120师及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甘泗淇同志不在晋西北时代理120师及军区政治部主任。

另以总政治部一部搬至杨家岭王稼祥同志附近，组织很精小的总政治部，统管全军政治工作。

　　 中共中央

1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给彭德怀的“对战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德怀同志：

你12月18日电最近才看到，兹复于下：

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我党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9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2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3项。

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4月起学了8个月，今年3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并有成绩，准备以今年一年审查完毕。延安以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党政军民干部今年仍是整风学习，并进行审查干部。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审查干部，还未认真着手，望加注意。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100至200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只有在认真地深刻地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彻底。**过去对于审查干部，不论延安与外地大都是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各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为这两件事必须进行各种对外对内的严重斗争。

毛泽东

1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最近中美中英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美英放弃了在华的特权**。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各地党部凡在战争环境许可下，均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庆祝中美中英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均须循此目标前进。并向全国人民说明下列各点：

一、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中国逐步丧失独立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历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残暴，中国民族中败类自西太后、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抵抗主义者、直到汪精卫等等卖国求荣的无耻，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解放斗争，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红军运动直至现在的民族大抗战。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斗争。

二、中国殖民地化过程与民族解放过程的斗争，到了“七七”抗战以后，已进入到决定胜负与决定中国最后命运的阶段。**百年来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斗争涌出了领导这个斗争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七七”抗战的发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坚持，全国军民的卓绝奋斗，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英美苏（苏联还远在十月革命后即发表声明书，声明废弃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后又签订孙文越飞协定，更于1924年正式签订条约，完全取消中俄间不平等条约，完全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使中英美间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

三、中国今后命运是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得到决定。抗战已5年有半了，今后困难尚多，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巩固国内团结，反对民族败类——汪精卫及其他无耻汉奸，揭露日汪间一切奴役中国、出卖中国的协定，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

四、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我党中央在去年七七宣言中已指出战后中国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尤其重要的是历史事实证明了：当国内团结，国共合作时，中国是充满着光明与希望的，当分裂内战时，人家便来欺负，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上一次国共合作，曾经收复了汉口、九江租界，这一次国共合作，又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是保证中国独立解放的重要关键。

五、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便投入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孙中山先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改变革命方法，采取发动群众的路线，实行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共产党在大革命时代始终尽了急先烽的作用，后虽不幸破裂，被迫退入农村，继续民族解放的斗争，但自“九一八”后，共产党又不断提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与恢复国共合作，特别是“七七”抗战后，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举国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伟大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站在最前线的地位，担任最艰苦的职务，转战敌后5年有半，抗击在华日军恰好一半，前仆后继，未尝稍懈，共产党不仅是为抗战胜利而坚决斗争，并且还要在战后独立、自由、民主、与国际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同样也站在最前线。

1943年2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枣园乡的农民们穿着新衣服，吹着唢呐，捧着油馍馍、年糕、寿桃，提着米酒，抬着“为民谋利”的锦匾，来给刚搬进枣园不久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拜年。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人，也早早等在他们各自的门前，迎接拜年的乡亲们。

中央小礼堂一排排长桌上，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子桌布，摆放着红枣、苹果、香烟、瓜子。毛泽东把乡亲们领进小礼堂，和几个老年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连连招呼着老乡抽烟、吃果子，笑着问大家：

“年过得好啊！”

枣园乡乡长杨成福上前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

“乡长叫成福，有福气，居民才有福气。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是枣园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居民会可别忘了我，也要叫我哩！”

毛泽东的话逗乐了众乡亲。他问乡亲们说：

“枣园有多少户人家，过年杀几头猪？”

众人抢着说：

“全村24户，杀了18头猪。”

“不多啊！今年还要多养猪，明年过年，争取每户都杀一头猪才好哩。”毛泽东笑着说。他又问大家：“今年是大生产年，你们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众人说：

“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还要争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

“多耕地，多上肥，多锄草。”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很好！但这还不够，还要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实行变工互助。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大家组织起来，实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将来还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化，这是农民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他又问枣园村的谢村长：

“现在老乡们卫生搞得好不好？害病的人多不多？”

谢村长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笑着说：

“今日枣园村的卫生可好得很，每家都修了一个厕所。在中央警卫团的帮助下，还设了个接生站呢，婆姨们可欢笑死了！从前养娃娃不卫生，养不活，现在讲卫生，养一个活一个。”

毛泽东也笑着说：

“咱们搞革命就是要人财两旺嘛！以后每个村庄都要修一个小医院才更好。”

毛泽东最后跟大家说：

“咱们都是老邻居了，今天中央请老乡们吃顿年饭，喝杯年酒，但要多吃多喝，不准客气。”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桌分一个，轮流给乡亲们敬酒夹菜，大家也不断地给毛泽东等敬酒敬菜。

关于这次拜年的情形，毛泽东的卫士顾昌华是这样说的：“主席和其他首长在小礼堂门前忙着接待客人。经过大生产运动，延安人民丰衣足食，心情特别愉快。这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了，他们有的捧着油馍油炸糕，有的提着米酒。枣园的乡亲们还特意蒸了个白面大寿桃，缝制了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为民谋利’4个大字。他们要将这些礼物献给毛主席。小礼堂里并排放着两行桌子，上面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床单布，颜色十分鲜艳。花生、糖果、香烟、红枣、苹果摆了一桌一桌的。毛主席和几个老年人一起坐在中间那张桌子旁，主席笑着望望这边，望望那边，问大家年过得都好吧？大家说，主席好!枣园区的区长把大家一一给主席做了介绍……主席对大家说：我们是老邻居，今天请大家到一起吃顿饭，希望不要客气，多吃多喝……主席正说着，饭菜已经端来了。主席不断到各桌去劝酒，要大家多吃些。农民们也不断举杯向主席敬酒。整个小礼堂里，洋溢着一片欢笑。”

2月6日是大年初二，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到枣园回拜。毛泽东见到区乡干部都道一声：

“辛苦了，过年好哇！”

他拉着李区长9岁女娃的手，问她几岁了，上学没有？当他听说女娃还未上学时，就对李区长说：

“陕北地薄人穷，文化不发达，教育儿童是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将来总不能常住延安，今后的地方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2月6日上午，延安文化界70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与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3位劳动模范座谈。3位劳动模范分别讲述了他们的翻身经历和生产的现实情况。文化工作者们听了，深受感动。历史学家范文澜说：

“像我们这样只知道吃救国粮的文化人，对于自己应负的责任实在太惭愧了。”

哲学家艾思奇说：

“文化的源泉是生产实践，我们要好好地向你们学习。”

作家丁玲感慨地说：

“过去总有些伤感的心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

文化界人士一致接受3位劳模“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他们表示，要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鲁艺秧歌队在春节期间演出了《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人看后，认为很好。毛泽东边看边连连点头，笑着称赞道：

“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

朱德说：

“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2月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359旅。

延安县的慰问团也来到了南泥湾，慰问开荒种地的模范部队359旅的指战员们。杨步浩是县慰问团的代表，他在与战士们的交谈中，听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分配有生产任务，心头一热，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向县慰问团长要求道：

“毛主席、朱总司令日夜操劳国家大事，那么忙，还分配有生产任务，那怎么能行。这任务得由我来替他们完成。”

后来，延安县的领导向毛泽东、朱德报告说：延安县农民杨步浩要求替毛主席、朱总司令完成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为杨步浩的热心所感动，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杨步浩，1905年出生在陕西横山，8岁时母亲去世，10岁起便给地主当小长工，端屎倒尿，挨饿受冻，1929年逃荒到延安县碾庄乡石家畔村落户。1935年红军解放了石家畔，杨步浩分到了窑洞和土地，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并认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会过上好光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边区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杨步浩夫妇和其兄、侄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努力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杨步浩在1943年初被评为劳动英雄。

2月9日，毛泽东高兴地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说：

“陕甘宁财政难关已经度过。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产品的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

2月1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来到枣园前面的田野间散步，枣园村侯老汉、胡老汉正在那里抽着旱烟锅子拉家常。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亲热地问候道：

“你们辛苦了。”

老乡说：不辛苦。毛泽东询问他们高寿多少？一个老汉说：

“咱们都60多了。”

毛泽东又问：

“这大年纪的老人，村里有多少？”

两个老汉回答：

“有24个。我们两个是同年同庚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我俩的生日。”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那很好呀，你们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应该给你们贺寿才好。”

胡老汉“唉”了一声叹了口气，说：

“咱们这号受苦人过生日，还贺个啥寿哩。”

毛泽东笑着说：

“咦！如今咱们都翻身了。生产又搞得好，真是人寿年丰呀！正好明天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去玩玩，咱们大家一起来贺寿！一定都要去，千万不要讲客气。”

一个老汉说：

“哪敢领毛主席的情。”

毛泽东说：

“今非昔比，正是后生给老人贺寿的好时辰。”

毛泽东回到住处，吩咐管理员明天下午2时准备3桌酒席，还要做一些又细又长的面条，再备24份礼物。他又派人到枣园的24个老人家里，挨门挨户通知他们，说是明天毛泽东要给他们贺寿。

老汉们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的稀罕事。

据蒋秦峰记载，元宵节前夕的这天晚上，延安市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此起彼伏。

2月19日下午，还不到2点钟，枣园村24位老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会议室门前。毛泽东早早地站在门口，笑眯眯地迎接他们，一个个握手，不断地重复着祝贺生日的话。寿星们见到毛泽东都很感动。刘老汉情不自禁地流了泪，哽咽着说：

“咱祖宗3代，没人看得起，是毛主席把咱推到人前来了。”

不少老汉也都流了泪。毛泽东说：

“咱们今天都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又当了主人，以后每个年老的人都要贺寿。”

毛泽东把老人们让进会议室，分宾主坐了，陪他们抽烟、喝茶，拉着家常。3桌酒席上来了，毛泽东请众人入席，挨个给他们敬酒敬菜，每个人端了3杯酒，还不住地祝贺着：

“晚年幸福，寿比南山！”“延年益寿，老当益壮！”

当24碗长长的面条上席之后，毛泽东站起来，笑嘻嘻地说：

“祝贺各位长寿，像寿面这样长久的健康的生活下去！”

众人酒足饭饱，已是黄昏时分。毛泽东又敬烟敬茶，还给每人赠送了一份寿礼：一条毛巾，一块肥皂。

毛泽东又在会议室门口，专门给老人们放了一场《列宁在十月》的电影。直到夜深了，有些老汉还恋恋不舍和毛泽东亲热地拉话谈心。

2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祝贺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说共产主义思想是“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不适合中国国情。蒋介石还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他还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2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将方案修改后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书记处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3个月；在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

3月15日，野坂参三以“林哲”的化名在《解放日报》发表《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当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向你建议，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你考虑。”“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作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

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讲话要点如下：

一、时局。日本最近从满洲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最近国民党电台与延安联络，这是国共关系好转的表示。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2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由于日本新的进攻，国民党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内援。现在谈判仍然未停，说谈判要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在日本新的进攻中投汪的增多，日本已决定扶汪打蒋的方针，现将华北、华中等伪政权统一起来。

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整个世界形势和历史的发展对国民党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但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

二、工作方针。中央的工作方针，是研究与指导，要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之目的。研究问题：1、国际 英、美、苏、德、意、日6大国，主要是研究6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3大项。去年对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绩，其他无成绩，今年要有成绩。2、国内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根据地，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权，军事是军事建设、民兵建设，经济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去年研究成绩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3、历史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政治（范文澜），军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陈伯达），文化（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中共党史开始研究：22年的路线问题；政治局同志座谈；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4、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40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指导问题：方式——报纸、电报、党务广播、口头报告。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4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的分析具体问题。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去年工作有成绩，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绩，经过报纸与党务广播传到全国去。

今年要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方针中还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现在财经、妇委、职委、文委的工作方针都在转变。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三、工作任务。**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前方是战争、生产与教育**；**后方是生产与教育。**这种方针要向全体同志说明。**公开说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但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要说明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现在华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保存骨干不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军队的骨干。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为了保存骨干必须坚决实行精简政策，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这就是战争的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就是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要切实实行。第三就是生产的任务。

用这些方法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

3月16日这一天，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葛健豪老人病逝于湖南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蔡和森早已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

“和森、咸熙（即蔡畅——笔者注）有信回没有？”

老人嘱咐长女写信告诉蔡和森、蔡畅：

“母亲已看不到他们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后来，毛泽东为老人题写了一幅挽联，他写的是：

“挽蔡母葛太夫人：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

3月中旬，国民党军王仲廉部根据军令部的命令，自安徽蒙城地区东进，企图向新四军淮北根据地进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扩大地盘，并接应王仲廉部东进，亲率第89军、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泗县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

3月17日晚，新四军第4师主力在第2师、第3师各一部的配合下，由第4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统一指挥，冒雨对据守在山子头的韩军总部进攻。

3月18日14时，山子头战斗结束。新四军击毙保安第3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6旅旅长李仲寰等人，生擒韩德勤及韩部官兵1000余人。王仲廉部闻讯后，迅即退至津浦路以西。

陈毅与韩德勤在一个特殊场合见面了。陈毅向韩德勤阐明了中共团结抗战的基本主张，表示对韩德勤坚持敌后抗战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同时希望即使将来国共之间有大规模的摩擦发生，也力求与韩德勤保持友善态度。韩德勤说：

“贵党贵军确有顾全合作的诚意，对本人的优待，至为感激。”

接着，他检讨了自己从黄桥决战到山子头战斗的许多问题，并提出共同订立协议以示互信。

后来在3月31日，韩德勤的参谋长吕汉劲代表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部，与新四军代表彭雪枫共同拟订了一个合作抗战的协定，交陈毅、韩德勤核准执行。

在3月31日这一天，陈毅在4师师部设宴礼送韩德勤。席间，陈毅、韩德勤、彭雪枫、邓子恢、吕汉劲、张震、范长江、吴芝圃依次而坐，陈毅表示发还韩德勤一批人枪，应允给一块活动地盘，在淮北划一个乡给韩德勤驻扎。韩德勤苦笑着说：

“一个乡是不是小了点。”

陈毅说：

“1940年江南新四军开进苏北抗战，没有立足之地，你省主席连一个村子都不给。我们可不那么小气哟，开口就是一个乡。”

次日，新四军交还韩德勤400多人、300多支枪以及一部电台。另有缴获韩德勤的收音机、貂皮大衣、钢笔都发还给了他。陈毅还特别给了韩德勤8万元作为活动经费。韩德勤感谢不尽，连称以后决不再与新四军搞摩擦。在4师骑兵大队护送下，韩德勤坐上新四军为他准备的牛车，带着新四军交还的部分人枪，前往指定区域驻防。

再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康生介绍了中央组织机构调整和精简的酝酿过程，他还说：

“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1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和精简的草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会议一致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工作，任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因在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问题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错误，在整风期间为党内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为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

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组成，刘少奇为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会议决定：中央党校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邓发调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党内如何开展工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从1941年10月3日开始，一直到1942年11月16日，毛泽东为了使刘少奇能够从新四军军部安全到达延安，先后12次打电报给刘少奇本人及其他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详细交代安排刘少奇在路途上的安全问题，可见毛泽东此一时期是多么急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历史促使毛泽东选择刘少奇，除了其它一些因素外，最主要的一是因为刘少奇一直不受“左”倾机会主义头子重用，甚至还受到了张闻天的排斥；二是因为刘少奇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演讲，公开表明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反“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立场上。所以也可以说，刘少奇之所以能够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跃而成为党内最显赫的第2号领导人，与其说是毛泽东有意栽培他，倒不如说是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延安整风运动成就了他。这正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

另：毛泽东在1943年1月5日给陈毅、饶漱石发去的《关于新四军行动总方针》指示电中说：“**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40余师，包围德军22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31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后来势态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其预言何其精准也！

**第55章**

“**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

**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22年来我党**

**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

话说1943年4月1日，毛泽东为抗日殉国的国民党军将领戴安澜撰写了挽辞和挽诗，从延安发给戴安澜治丧委员会。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人，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1933年3月，他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1938年先后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1月升任第200师少将师长，该师是新建的第5军的主力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1939年，他先后率部参加随（县）枣（阳）之战、长沙保卫战、桂南昆仑关战役。1941年12月，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他率领200师开进东瓜，逐次接替了英军的防务，掩护英军撤退；1942年3月参加东瓜保卫战；1942年4月参加棠吉之战。1942年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在温佐一带掩护其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戴安澜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激战中，戴安澜胸腹部受伤。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伤重去世，享年38岁。1943年4月1日，国民党在广西全州香山寺举行戴安澜追悼会，由李济深主持。

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撰写了挽辞、挽诗、挽联和挽幛，遥奠忠魂。毛泽东书写的挽辞是：

海鸥将军千古！毛泽东 挽

其挽诗云：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1956年9月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全文如下：

自1942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党内团结空前地增长了，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极大地改造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也逐渐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审查明白了，暗藏在党政军民学机关内大批奸细分子被清查出来了。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22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它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除陕甘宁边区责成西北局重新做出整风计划外，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作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已经作成此种计划并在实施中的地方，则根据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增加了约70万新党员，他们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马列主义）的锻炼的。在数万老党员中，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拖着很长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尾巴，思想上的关节还未打通（其中并有若干重要干部）。对于上述新老两类同志（目前着手是对于干部），给予深刻的整风锻炼，借以纠正其错误思想，打通其思想上的关节，坚定其阶级立场与党的立场，改造其工作作风，是完全必要的。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正确，或对马列主义武器掌握得较好的同志，则借整风增进他们的修养，可以使他们更趋于进步与发展。因此，**凡以为整风是专整下级，不整上级；或专整上级，不整下级；或专整新干部，不整老干部；或专整老干部，不整新干部；或专整别人，不整自己；或专整自己，不整别人，都是错误的。**

又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各地内奸的严重程度虽然不一致，也不是说每个支部都一定有内奸，但就各个地区说来，可以断定，此种情况是无例外地存在着。**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被纠正，内奸问题也至今不曾引起注意。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因此，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在于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表露各种正确的意见，发扬正气纠正缺点。第二，在于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以便根据其表现而给予具体的与明确的纠正，使他们在自己经验中认识自己矛盾着的思想，因而便利于克服错误思想，转变为好同志。否则毫无生气的，平平常常的学习，必不能有多大的效益。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使领导机关与广大干部逐渐识别他们。**对于内奸分子，**凡非军事紧急时机，紧急地点与紧要环节，不要忙于宣布他们为内奸，只把他们当作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彻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至于任何同志的正确意见，更要虚心倾听，绝对不能抑制。

在采取这种政策后，在第一阶段中，一方面正确意见会生长表露，另方面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说怪话、反领导、乃至反党等各种不正确的现象，也会发生。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要使错误思想多多暴露。这一阶段是初学学风文风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强调“四三”决定上要求注重领导一方面，着重发扬正确意见，缩小民主范围，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但须注意这种克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克服，而不是武断的命令主义的克服，**不要伤害每一个还可挽救的同志。**在这一阶段内，仍然不要提内奸问题。到了第三阶段，是学习党风的阶段，这是学习深入时期，此时大家都接触了实践问题（党风），又有了思想武器，将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最开展最热烈的阶段。此时除学完党风文件外，主要地应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其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于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作用。在第三阶段中，还应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与改善工作。

这样，每一具体机关学校，从重新布置整风之日起，至少5个月内（战争时间不算在内）均须做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5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这样，一年以内（除去战争及其他繁忙任务所占时间）可以大体上结束整风学习，而把全部完成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任务，推至以后的时间。延安部分机关学校，1943年4月才结束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这些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季才开始着手审查干部，1943年4月，才正式审查干部。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但对内奸问题若过于仓卒处理，势必不能彻底，且易发生毛病。**内奸的可怕是我们的不自觉，只要我们一旦自觉，内奸就不可怕了。**有军队与政权在手，且有内战时期肃反经验的党，是有充分可能把内奸肃清的。故各地在1943年冬季以前，必须着重与深入整风，决不可放过整风的伟大思想斗争。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关于处理内奸问题，中央准备尔后再向各地作具体指示。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

会议同时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

4月2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凯丰同志：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1、**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2、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3、**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4、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3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敬礼!

　　 毛泽东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墓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联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毛泽东还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了字，正面是“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鉴于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共产国际曾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机会主义者所糟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192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再则，当1927年至1937年期间，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时候，它又声援了中国革命的人民。最后，在1937年以来的6年抗日战争中，它又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但时至今日，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书上所说，因为各国内部和国际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因为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与群众动员，借以达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因为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这种种理由，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召集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故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作出此种提议。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指出在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之后，各国工人运动是更加发展了。现在第三国际之宣布解散，无疑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到来。**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哪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贰，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自**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么，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是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一出现在会场的讲台上，全场与会者立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任弼时宣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李富春宣读了这两个文件。

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说：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4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么？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端巨大的功劳。”

“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1924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3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么，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3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3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地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718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5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

根据目前国内外情势，抗战六周年纪念之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因此，除中央将有宣言发表外，各战略根据地负责同志均须做文章。下列各同志均请作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贺龙、林枫、朱瑞、罗荣桓、陈毅、饶漱石，各同志之文章题目由新华总社另行通知，一般的文长不要超过5000字，多作生动活泼之描述与分析总结，少用枯燥无味之表格统计，文章望于6月20日前经新华社电台发总社，经中央审定后统一广播发布。

中央书记处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全文如下（见《毛泽东选集》）：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地普遍地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1942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1943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的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1942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3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12个条件的第9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4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有电悉，同意对太南处置办法。

二、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与复兴）5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励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3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

三、**我党应在此3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

6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冀鲁边区工作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他写道：

山东分局朱、罗、黎（指朱瑞、罗荣桓、黎玉——笔者注）并告北方局：

冀鲁边形势严重，已成为完全的游击区域；必须善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密切与群众联系，隐蔽自己的力量，彻底改变过去的一套工作做法与组织形式，才能适应该区的艰苦斗争，有下列提议望考虑执行：

一、关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及游击区的群众工作经验与具体作法，冀中、冀南的经验对该区极有帮助，分局、北局应经常将此种经验介绍给他们，给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二、该区脱离生产人员太多，望考虑在不妨碍坚持的条件下，将军队之一部分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减轻敌人注意和减少人民负担。

三、军、政、党在组织上应实行完全一元化，除可以隐蔽的地方干部外，其他负责干部应随军行动。统一党、政、军、民的领导，不必再保留各个机构的架子，多余的及当地难于隐蔽的干部，亦可有计划地撤出。

四、该区内有汉奸与国特的活动，希注意，我们已得有一些材料，即分别电告。

　　 书记处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区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又看了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的讲话，以及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的学习这篇谈话的文章。她感觉很不正常，就把这些东西交了给毛泽东，她说：

“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发鼓吹得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6月6日，毛泽东看了江青送来的材料后，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德怀同志：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之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还指示他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段落删去，再予以转载。还是邓小平转得快，他在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之后，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3个月后，彭德怀回到延安，还专门去找毛泽东要理论此事。详情容后再述。

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来事异有分工。

诸葛何尝耍大刀，关公未曾祭东风。

老彭倘若读历史，庐山焉能走麦城。

6月17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2次来到延安。

此时，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3次反共高潮，电召邓宝珊去重庆开会，指定他绕道宁夏、兰州到重庆。邓宝珊生气地说：“不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

6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作陪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高岗、李鼎铭、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开始前，邓宝珊一见毛泽东就高兴地说：

“毛先生发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答道：

“是啊，我们边区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了嘛！”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几天。毛泽东等人曾和他围坐在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说：

“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行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邓宝珊说：

“毛先生比我大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续范亭听他如此说，非常感动，即席赋诗一首赠邓宝珊，诗曰：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秘密布署剿共作战，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6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王稼祥夫妇的窑洞门口，王稼祥和朱仲丽连忙迎了出来，王稼祥说：

“请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泽东见院子里的枣树绿叶婆娑，新结的青枣密密麻麻地点缀在枝头，便指着树荫下的小石桌和小石凳说：

“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吧，比窑洞里空气好些。”

说罢，他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两边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丽坐在一边陪着。警卫员张志送来了茶水和香烟。毛泽东点上了烟，笑着对朱仲丽说：

“你的麻将牌打得好啊，可惜赢得少，总是输，将来衣裳输进当铺里怕赎不回来哟！”

毛泽东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来。朱仲丽也笑着说：

“是的，我欠你的‘债’大约有几千万了。”

毛泽东和朱仲丽说的笑话，是在几天前的事。那一天，朱仲丽见毛泽东不是坐着或躺着看书，就是批文件写东西，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就想法劝他打麻将。毛泽东说：“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呢。”尽管他不想停下手头的工作，但还是经不起朱仲丽软磨硬缠，只得答应了。于是，他和叶子龙、江青、朱仲丽便噼里啪啦地打起麻将来。朱仲丽为了让毛泽东保持一个好心情，不时地故意将好牌给他，果然，毛泽东一连和了好几盘。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赌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

朱仲丽也连忙笑着说：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

毛泽东依然是一脸的灿烂：

“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说笑已毕，毛泽东吸着烟看着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应该写篇理论性的文章，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说：

“是，我可以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说罢，他问毛泽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他还说：

“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说：

“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几个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说：

“好的，主席。我可以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毛泽东见他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转头对朱仲丽说：

“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他的身体每天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顾，功劳不小啊！”

朱仲丽忙说：

“不，是党和同志们的关怀。”

毛泽东起身要告辞了，又笑着对朱仲丽说：

“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

朱仲丽说：

“我会照顾好他的。”

此后，王稼祥经过几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终于脱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反复修改，润色了几遍，直到自己满意了才罢手。

6月26日，王稼祥将文稿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在大信封的正面郑重地写下：“呈主席亲阅”，并附一短笺，他写道：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他装好信笺，让警卫员马上去送给毛泽东。

6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林彪等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林彪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欲知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情况如何，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3年4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文献，对于正确理解延安整风运动和认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污蔑，是十分必要的。

**第56章**

**“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

话说1943年6月28日这一天，刘少奇将他起草的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续范亭的一封回信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在这个信稿上作了66处批改。这66个批语分别指出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最后，他又在信稿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兹将刘少奇的信稿和毛泽东的批语抄录如下：

大概如我们到了40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毛批：比较深刻**】的最基本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地认识**【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地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毛批：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地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地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地机械地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毛批：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地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地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毛批：这些是对的】**。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毛批：只是社会的】**。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地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鸟，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缘故】**。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么，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子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恻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己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4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地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地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观真理自觉地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地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把下列几句话刊登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

“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这几句话中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审干“九条方针”（见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

7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宣言中说：

“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6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

“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到了那时，东方法西斯的失败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着会要实现了。”

“整个中国战场上，6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而在过去数年中，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进。”

“抗战的第6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22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22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22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7月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的情况通报，他写道：

总部、129师、120师、聂军区、115师、新四军：

1. 去年10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后，形势似稍有好转。但不久，蒋介石即令朱绍良、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3月蒋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自己公开出面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可说是进攻的思想准备。4月甘肃民变规模日趋扩大，至5月，竟占23县，人数至数万之多，当时**蒋估计我方或将支持民变，彼即借口向我进攻。但我方依据团结抗战方针，对任何反政府民变都不干涉，边区留守部队，谨守自己的防地，不给彼方以任何借口。**但彼方挑拨性的言论及以挑衅为目的的军事布置仍然非常积极。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胡均认为此乃对共党镇服良机。6月，蒋允许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安，但不给以任何具体意见（周、林现尚在重庆至西安途中），其用意似在周、林回延，我党中央正讨论如何改进国共关系问题时，彼即发动闪击战式的军事行动，逼迫我党接受彼方提出交出军队取消边区之条件（这些条件现尚未正式提出，但已在报纸上宣传），因彼方已熟知我党一贯方针是为团结抗战而努力，竭力避免一切足以引起两党摩擦与两党破裂之事件发生，**彼方或以为在此种情况下，有将我党压服之可能，故乘周、林回延时机，急速抽调河防部队追入边区附近，并下令边区南线各军限七月八日准备完毕，待令攻击**，故边区形势现已极度紧张。至于日寇东条实行勾结中国抗战阵营叛变而不甚强调反蒋的新政策以来，蒋与日本密使（吴开先等）经常接洽，是否与此次进攻边区之准备有联系，亦值得严重注意。此外西安国民党方面则传出下列消息：半月内苏德大决战将爆发，日本将闪击苏联，集中目标于先打击苏联，再对付英美等语，蒋、胡向我进攻之准备如此急迫，或亦与此有关。兹将5、6两月及最近数日内胡宗南军事进攻准备的具体情况列举于下：

（1）令53师由韩城河防开洛川，接替暂骑2师防务，暂骑2师限5月17日到耀县集结，业已接防完毕。

（2）167师由大荔河防开邠县，已于5月13日到达。

（3）赶运粮弹补充宜川、洛川、中部、宜君一带之部队运输络驿不绝。

（4）令所属修补工事，并令调查边区地形、工事、粮食、交通情形。

（5）令潼关河防之第1师，赤水（临潼属）之第78师准备交防行动。

（6）令现驻甘肃之第38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亦作进攻边区准备。

（7）令炮2旅在淳化成立第2指挥所，王曲之装甲兵2团（战车坦克70余）装油待动。

（8）7分校教导总队刘钊铭已集结两个团，由岐山开赤水一带，接替第78师防务。

（9）165师与61师的武器均已全部换成新品。

（10）令胡公冕、侯声赴延安视察边区情形。

（11）5月20日傅作义电胡宗南商讨夹击边区，并谓应不怕破裂和牵动国家大计。胡复电极表赞同。

（12）胡得悉第三国际解散消息，突加紧张，对封锁线部队重新部署，进攻边区部署均已完成。

（13）5月23日电蒋呈报对我作战计划，共分3期：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以陶峙岳、范汉杰分任总司令，完成攻防准备，确实封锁。第二期除河防部队外，加强关中兵团，实力收复囊形地带。第三期，继第二期之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收复马栏、关中、陇东全部。并请中央派空军及令2战区协助，惟因甘南民变胡系调去了5个师兵力影响其第二期计划实施甚大（以上均系5月情形）。

（14）自6月初迄今边区形势更形紧张。6月4日胡令各部：现系军事紧张时期，部队随时有移动，兵伕不得缺额，否则以贻误论罪。

（15）驻宜川之90军长李文分工兵连开洛川，归53师指挥，修筑交河口桥梁。并令辎重连大车20辆开洛川，协助53师运输。

（16）暂骑2师6月10日已接替165师耀县防务。新27师由富平庄里镇开到洛川附近。并令暂25师、新27师、53师、暂骑2师、陕保指挥部等防务，统向右延伸，全部已于6月10日延伸完毕。

（17）6月18日胡宗南随同陶峙岳，李文及61师师长邓钟梅，暂25师长刘英，新37师师长徐保等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并召集新27师、53师官长训话。

（18）6月18日胡之副参谋长李昆岗电36军（36军在甘南进攻民变）或另有任务，希努力进剿。

（19）6月18日，李文批准第一野战医院开洛川，90军对我军之作战计划办于是日携至洛川交胡。

（20）6月28日胡令第8师（袁璞）限6月30日开陕北同官待命作战，令驻赤水之78师即开分县。第1师驻朝邑之一个团开东泉店。

（21）6月30日，胡令90军之28师，即刻秘密由韩城开赴中部集结待命。7月2日又令改开洛河（洛川南）集结。该师83及84两个团7月2日晨已出发，82团及师直7月3日晨出发，7月6日可全部到达。

（22）78师原令开宝鸡之一个团改开分县。

（23）第8师于29日全部到达同官山地，该师留商县剿匪之24团第3营亦拟调回参战。

（24）16军炮兵团第1营，已于6月28日由郃阳开耀县。

（25）重炮3团3营，6月28日已撤出河防阵地，30日已向西行动。

（26）西安办事处30日亦有电告：胡对边区之军事部署，忽趋紧张，对闪击陕北空气，由军队的紧张准备军官干训团及党政当局之议论，以及于社会，此种情形比过去为迫急。此种布置恐出自蒋及国民党估计日本半月即将攻苏借机进攻边区等语。

（27）7月2日陶峙岳令各军限7月8日准备完毕，听候胡手令动作。

总的说，胡进攻边区之部队已经集结完毕，部队的动员，粮弹的准备，均已完成，只须待命进攻，胡将河防部队大部撤出，置于边区周围，这是历来所未有。从此点看，蒋是否与日本有何谅解，值得注意。此外辎重部队的配属，兵站的开设，通讯线路的调整（非必须线路的撤收，斜线路的增设），部队非必须品为后运，战前教育实施，都表示进攻准备已经完成，可以随时作战，这些都是历来所未有的。

　　 军委 午支

7月4日，中央以朱德名义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全文如下：

西安胡副长官宗南兄勋鉴：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边区留守部队，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吾兄前派胡侯二兄来延参观，备致赞美，嗣接尊电，拟再派侯兄驻延联络，德等当即表示欢迎。不料近日形势大变，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

朱德

不久，毛泽东又在6日以朱德名义发出由他起草的“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蒋介石等电”，揭露国民党军队妄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呼吁团结、坚持抗战。

7月5日，毛泽东审阅了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满意，稍加修改后，给王稼祥打电话说：

“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还亲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谈心，他说：

“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7月6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7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358旅主力4个团由晋西北调回边区，八路军前委筹调机动兵力，做好应变准备。

7月7日，胡宗南指挥6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炮击富县柳林区和关中区，发出了第3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内战危机。

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新群众报》，向国际舆论揭露国民党封锁、进攻抗日根据地，使抗日部队得不到医药、供给，中国正处在分裂内战的危险之中。

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他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后便积极参加中国民族解放战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抗日战争。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在这3大革命斗争中生长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7月8日这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二、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三、**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四、为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

五、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及各县党政军民的广大动员。

　　 中央书记处 午齐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邠州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攻击。我已调晋西北4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6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毛泽东 午佳

7月9日下午，延安召开3万多人的纪念抗战6周年军民大会，并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各部院长官，各地方长官，各抗日将士，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及全国同胞公鉴：

正当我全国民族团结抗战已经坚持了6年，愈益接近胜利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主动权已经转移到苏英美同盟国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帮已迫近最后失败的时候，不意**中国抗战阵营内部竟有一部分丧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纵队，出来响应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汪精卫、王克敏的反共号召，宣称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他们包围军事长官，企图将原在抗日阵地的军队转变为反共内战的军队。他们现正积极策动内战，怂恿军事长官调动队伍，进攻边区。最近一个月来，除原驻陕甘宁边区周围，担任封锁边区的10余师军队，早已积极准备进攻外，近日又从河防阵地抽调抗日大军，移作进攻边区之用。根据确实消息，**第1军主力第78师，第167师，已从华阴、渭南开到邠州、淳化，第90军之第28师，第53师，已从韩城、合阳开到洛川，第57军之第8师，已由西安开到中部，第16军之重炮兵营，已由河防开到耀县，原驻西安之炮兵旅，亦已开到淳化，**除上述业已开动之部队外，尚有很多军队，正在待命出动。**陇海铁路，咸榆公路，西兰公路，兵车运输，络绎不绝，居民惊骇，奔走相告。**为了配合此种军事行动，西安的**反共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长著名托派汉奸张涤非，竟敢公开在西安召集会议，假造民意，狂吠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最奇怪的是堂堂的中国官方通讯机关之**中央社，也将此种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于7月6日发出广播，通告中外，以为发动内战之舆论准备**。内战危机，千钧一发。敌人第五纵队与中国反共分子此种丧心病狂的举措，如果实现，不仅将破坏全国人民6年以来辛苦坚持的抗战大业，并且将严重损害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行动。日寇第五纵队包围军事长官，准备发动内战之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他们此种举动，不仅背叛我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同时也背叛了同盟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他们此种举动，实际上是替垂死的法西斯主义作支持者，是掩藏在抗战营垒内的亲日派汉奸，因为在此种时机发动内战，除了牺牲民族利益，是绝对没有其他结果的。

在过去6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他曾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释放蒋委员长，达到全国的团结抗战。他曾指导了八路军中新四军中及地方民众中的共产党员，团结全体军民在敌后战场上抗击了侵华敌军50%的兵力，而没有得到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新四军甚至被诬为“叛军”，但是新四军至今在华中敌后战场坚持着英勇的抗战，而且至今仍然拥护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的“叛变”行为。这是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乃至日寇汉奸，无不知道的。八路军在华北艰难百战，不予奖励，反于妨害。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仅有的后方，少数留守部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全世界都无此种模范军队。**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都有说话机会，都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使他们各得其所。现在边区已经成了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在抗战中过着民主自由与丰衣足食的生活，比较大后方的惨淡情况，何止高出百倍**。不管国民政府怎样至今还没有实行承认边区的诺言，但边区政府却始终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我边区人民对于这样忠实于民族解放利益，这样坚持团结抗战，这样替边区人民做了无数好事的中国共产党，是竭其全力给予拥护的，对于边区的一切民主进步设施，认为不仅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坚持抗战的可靠力量，是全国人民所同声称道的模范建设。我们将誓死保卫这块地方，不许日寇及其第五纵队的阴谋活动来加以破坏。

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于死地。指挥特务，盗窃民意，今日可以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明日亦何尝不可以发布讨伐令，解散八路军。凡此反常之行为，实属惟恐天下不乱，惟恐抗日胜利，惟恐民族获得解放，惟恐人民获得自由之反革命心理所表现。**另一方面，对于投降敌人背叛祖国之33个高级将领，却一个也不责备，也不声讨，有时还替他们曲予辩护。对于像吴开先那样受敌人派遣到我抗战首都进行卖国活动的著名大汉奸，却不但不予逮捕，反而容许吴逆仍挂国民党中央委员之名，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进行阴谋活动。对于像张涤非那样的日寇第五纵队，在西安假澄民意，声言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活动，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给他们广播消息，企图以此欺骗人民，准备军事进攻的舆论。对于今天大后方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情隔阂，民变蜂起等危险情况，则不但不思所以变计，反而一味高压，惟恐民怨之不普遍，民变之不扩大。华北庞炳勋、孙殿英诸军之覆灭，其原因乃在于庞、孙领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之秘密命令，尽一切力量准备进攻太行山区域之八路军（八路军已获有确实证件），丝毫不作对日寇战斗之准备，致使日寇乘虚袭击，束手受缚，叛国降敌，不敢声张，反替庞孙作辩护之词。我华中及山东之新四军八路军，苦战奋斗，敌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可得，彼乃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限期东进，务求消灭八路军新四军而后已。**共产党则称之为“奸党”，新四军八路军则称之为“奸军”，试问天下有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么？**今日何日？不是正当日德意法西斯国家已面临失败危机，我们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为了与反法西斯各同盟友邦的配合，需要更加加紧自己抗战行动的时候么，为什么竟从抗日前线撤回大量军队，要来进攻陕甘宁边区呢？这有什么理由呢？为什么不打日本人要打中国人呢？抗战时期，只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条唯一的战线，不应该制造第二条国内战线，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内战一开，兵连祸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为什么这样痛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而那样不痛恨我们的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呢？撤了河防大军来打边区，难道就忘记了日本人么？那时日本人从剿共军背后打来，你们怎么应付呢**？庞炳勋、孙殿英的覆辙，你们难道完全忘记了么？

我们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此开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我们竭诚向国民政府呼吁，向蒋委员长呼吁，向胡宗南副长官呼吁，向正在准备进攻边区的一切官兵呼吁，向全国同胞呼吁，请你们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我们掬诚忠告那些接受密令准备进行内战的军官和士兵，共凛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祸，鉴于过去10年内战之惨，不要打共产党，不要打八路军，不要打边区，不要枪口对内。胡宗南副长官曾云，“剿共是无期徒刑”，这是一句真话。**请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再打10年内战，能打得出什么结果呢？何况内战一开，敌人乘虚而入，中国马上就会亡国，哪里有10年时间，许我们从从容容地打内战呢？**我们要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逮捕著名托派汉奸日寇第五纵队分子张涤非，并惩治其破坏团结抗战的反革命活动。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逮捕日汪密使吴开先，并予公审。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明令讨伐通敌叛国的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毕载宇、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杨汝贤、李振汾、侯冠文、王廷英、杨光有、王瑞亭、赵星彩、于光辉、侯如镛、杨志希、赵瑞、杨诚、李长江、徐继泰、杨仲华、吴漱泉、王劲哉、苏振东、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任兰圃、赵天时、薛豪平、于怀安、金亦吾等33个将级军官，并移华中山东一带剿共之师去剿伐他们。我们要求全国爱国同胞与抗日党派帮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上述各要求。

我们的口号是：（略）

与此同时，英美苏3国对中国国内的局势表示不满，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各国将停止对其援助。

7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林彪一行到达西安，收到了毛泽东发给他们的电报，要他们同胡宗南交涉，要求胡宗南撤走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胡宗南宴请了周恩来和林彪，不承认有进攻延安的企图。他在席间称周恩来为老师，称林彪为同学。

周恩来、林彪一行在西安逗留3天后继续北上。

7月10日，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命令胡宗南从陕甘宁边区撤退军队。

7月11日，毛泽东因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通讯：

【新华社延安11日电】重庆消息，《新华日报》7月1日纪念中共22周年社论，力持团结抗战，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留，不准发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4日送检，5日去取，亦被扣留。6日报馆派人找检查所负责人谈判，结果准许登载，被删去3000多字。但到晚上，新闻检查所突然通知，又不准登，报馆交涉无效。不但如此，当局又令化龙桥特务宪兵警察，全体出动，如临大敌，从新华日报馆门口直至化龙桥，设立3道检查哨，再在两路口设1道检查哨，据称：其任务是查看报纸上是否还有“七七”宣言。但查验没有宣言，亦不准发行。《新华日报》于7日6时已全份印出，报馆方面几次向检查所交涉，直到8时半，才将特务宪兵警察撤去。当日国民党中宣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纽约时报记者询问周恩来氏回延安之任务。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发出挑拨性的回答，诬称：“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合作，一派反对。”关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立即于8日将张道藩之挑拨的诬蔑的声明给予传播，帮助张道藩鼓吹。**在7日的外国记者席上，**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7月7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在修改中特意将毛泽东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共9条，见上一章），6月28日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稿上所作的66处批改，以及后来在1958年主持讨论并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一并录入书中。笔者之所以不嫌其细、不厌其多，将这些文献全文录入，一是因其无论在当时、在当今或者在将来对人们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二是因为这些文献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由此可以见证毛泽东对他的下属是如何的至诚、至爱而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这种耳提面命式的教育，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常言道，知恩图报真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在数几十年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能够记得起毛泽东的恩泽呢？

**第57章**

**“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

**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

**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话说1943年7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总学委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全文如下：

为了动员和教育广大群众，积极地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继续加紧清除奸细，中央总学委有以下的通知：

一、将中共七七宣言、朱总司令通电、托匪汉奸张涤非假造民意的消息、解放报7月9号社论、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文件（可以参考其他文件，如解放报7月6号刘少奇同志的文章和8号王稼祥同志的文章），在各机关、学校、部队、民众团体的广大群众中，展开热烈深刻的讨论。讨论时间，一般地规定为一星期。讨论方法，可以采取群众大会、军人大会、支部大会、干部会、小组会、大座谈会、小座谈会、漫谈会、作报告、上课、集体阅读、集体问答、自由辩论、个人研究、学习晚会等各种方式，根据具体环境、具体对象灵活运用。

二、在讨论文件中，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反特务斗争上，提高干部与群众的阶级觉悟。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与非无产、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些“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号召全体党员加紧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反奸细斗争的本事。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的批评、纠正与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与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如果战争真正爆发，估计一部分幼稚动摇的党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发生逃跑叛变的行为，**因此目前更要加紧进行教育，指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各种对我之有利条件，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各种不利条件，以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同时指出我们也有各种困难及能够克服困难的力量，以坚定其战斗的决心。

三、在进行干部与群众的教育中，必须与审查干部坦白运动密切的结合起来，利用这次国民党正要进攻边区的时机，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目前特别应注意下列工作：（甲）从思想上去瓦解敌人。**拿国民党撤退河防进行内战的具体行动，拿国民党33个将级军官的投敌叛国的具体事实，与欢迎日寇奸细吴开先到重庆并仍作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具体例子，打破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实质上是日寇的第五纵队，号召他们不要再为日寇第五纵队服务。告诉他们**国民党区域内民情隔阂，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等具体事实，打破他们认为“国民党尚可依靠”的心理。说明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救国的功绩，实行民主自由、丰衣足食的事实，与他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他们晓得不应破坏与不可战胜的道理。号召他们在此紧急时机赶快出来坦白自新，党的宽大政策是开着门的，但如果甘为第五纵队服务，观望等待，企图进行阴谋破坏工作，则将以军事时期的严厉办法处理之。（乙）加紧反特务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各机关、学校、保卫部门的同志应写反特务斗争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号召自首分子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充当日寇第五纵队的实质，**反对国特破坏抗战团结、挑拨内战、杀害青年、破坏共产党、八路军与边区的罪恶，号召全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丙）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突破和甄别工作，将精密细心调查研究的个别解决，与有准备的坦白大会、劝说运动结合起来。加紧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有计划地教育干部，达到10%的干部学会反奸工作。（丁）各保卫部门应继续加紧审讯工作，在监狱中进行反省运动与控诉运动。（戊）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九条方针”（见《防奸经验》第6期），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

四、加强警戒工作，严格地执行枪支登记制度与各机关学校的警卫制度。各机关学校应立刻建立有名有实的自卫军，彻底检查过去机关自卫军的工作，纠正徒有虚名而无实际，徒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一切办法，使自卫军真正成为保卫自己警戒敌人的组织，并适当地进行军事教育。

五、改造机关党的支部组织，使各机关学校的首长（特殊者例外）兼任党的组织负责人，使党、政、学的工作一元化。

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质问国民党》（请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在社论中写道：

“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正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接着，毛泽东在社论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洞开对付日寇的河防的罪恶阴谋，以辛辣的笔调驳斥了他们所散布的“第三国际既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等无耻谰言。

针对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洞开对付日寇的河防的阴谋，毛泽东写道：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作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作增强团结么？**”

“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毛泽东最后写道：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到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7月6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

我们向一切不愿撤退河防进攻边区与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提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宣布说，经过3个月的抢救，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

会后，整个边区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掀起了“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情况。有不少人在前一天还抢救别人，第二天就成了被抢救者。

7月16日，周恩来、林彪等100余人乘汽车自西安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热烈欢迎。

7月21日，毛泽东为公布《评<中国之命运>》致电留在重庆的董必武，他写道：

必武：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日前检查渝办）。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各方面。为此目的，望注意执行下列数事：

一、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二、报馆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三、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讨论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四、新华尤其群众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五、其他技术问题由恩来电告。

　　 毛泽东 马

7月间，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贺绿汀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便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一天晚上，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文艺联欢晚会。毛泽东也来了，他穿着灰布中山装，敞着领扣，左手夹着烟卷，正与旁边的人谈论着。周扬把贺绿汀领到他面前，介绍说：

“这位是《游击队之歌》的作者贺绿汀同志，刚来不久，湖南邵阳人。”

毛泽东握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

“还是老乡哟。贺果这个人你认识吗？”

贺绿汀说：

“他是我三哥。”

“啊！贺果是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毛泽东显然很兴奋：“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7月23日，杨步浩把打下的小麦选最好的装了500斤，用4头毛驴驮着，带着他的亲戚李志明，高高兴兴地赶着毛驴来到枣园，把粮食送给毛泽东和朱德。

原来在毛泽东、朱德同意由杨步浩替他们交公粮后，杨步浩感到非常荣幸，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起早贪黑，也不觉得累。到了夏季，他种的小麦果然获得了丰收。

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杨步浩。他握着杨步浩的手说：

“杨步浩同志，请坐，请坐！”

杨步浩就紧挨着毛泽东坐下了，心里“突突”直跳，满肚子的话，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毛泽东问他：

“杨劳动英雄，你为什么要替我代耕？”

杨步浩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说道：

“毛主席，要不是你来得快，我全家早就饿死了，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吃米不忘种谷人。我现在翻了身，不能忘记共产党和您的恩情呀！**你是我们劳苦人的大救星，又是人民的领袖，一天到晚为国家安危操劳，还有生产任务，我实在放不下心，就想为你代耕，公粮由我给你交。”

毛泽东感慨地说：

“这才像无产阶级闹革命啊！”

他接着问：

“你的麦子为什么种得这样好呀？”

杨步浩就把自己不违农时，如何施肥、锄草等等重要环节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很高兴，当即提笔给延安县长曹扶写了一封信，希望他重视与推广杨步浩的生产经验。

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在家里吃饭，并给他讲了边区建设和打败日本鬼子后建设新中国的事情。杨步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咧开嘴幸福地微笑着。

第二天，毛泽东请杨步浩到他住地附近的山坡上看自己种的蔬菜，随手摘下一些西红柿送给杨步浩。毛泽东还送给他一些熏肉、饼干，让他带回去给娃娃们吃。

杨步浩临走前，毛泽东让他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那里，给林伯渠谈谈农村的情况。他在给林伯渠的信上介绍道：

“兹有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及其亲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县曹扶县长介绍来谈，获知乡村情况，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70里之远。”

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问寒问暖，拉家常。

有一回，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时，遇到了一个从城里回来的文人，只见那人手中持一根拐杖，不住地在手中打转玩，他跟毛泽东打招呼时，拐杖还在手中不停地转来转去的挥动着。说来也巧，正在此时，有老乡的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那人的拐杖还是不停地转动着。乡下人一向对读书人对有钱人谦恭，老乡们见此人如此傲慢，不得不往一边靠，被挤到了一边也还是忍气吞声地赶着毛驴队过去了。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身边的人说：

“真是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7月30日，毛泽东和康生谈到了抢救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

原来在不久前，毛泽东发现一些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被怀疑，受到审查，感觉有些不对头，他说：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务。”

他让有关人员将某些被审查者的口供材料找来，认真审阅，刚看到第2份材料，便派人将负责复查案件的李克农、师哲叫了来，问道：

“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李克农说：

“还有三四十份。”

“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基本没错，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啊！”毛泽东列举了在江西搞逼供信的那一套，接着又问：“现在是否也是这样办的？”

师哲回答说：

“一些具体的做法还不太清楚。”

“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送给我了。”毛泽东看着二人疑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

师哲说：

“一句两句错话，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认真地说：

“如果有一句假话，会不会有10句假话？有10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一篇文章，不到1000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师哲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向写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不久，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抢救运动中的混乱现象。毛泽东听后说：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做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做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再说毛泽东在7月30日和康生的谈话中说：

“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指示说：立即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7月30日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通报了中央关于审干“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8项政策，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周、林（即周恩来、林彪——笔者注）返延，七大准备开会，请你及罗、薄、聂、吕（指罗瑞卿、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笔者注）来延参加大会，希预为布置。太行、太岳、北岳各区须重选代表若干，中央另有通知。

二、敌后整风有进步，可于7月9日北局关于整风经验及关于思想意识二文见之（已交广播）。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

三、审查干部之方针为：一、首长负责；二、自己动手；三、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四、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五、调查研究；六、分清是非轻重；七、争取失足者；八、培养干部；九、教育群众。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3个字。其详另有说明（见后8月15日《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笔者注）。

四、蒋、胡进攻边区计划，被我及时揭破，见我有备，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

五、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六、前电所述6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8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在陕甘宁边区，对敌斗争改称军事教育作为第8项）。

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3项。

八、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此电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几个区党委负责同志。

　　 毛泽东 午卅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欢迎他和林彪回到延安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没有比这3年来的事态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的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此后，周恩来参加了高干整风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他在整风会上为自己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做了诚恳的检查。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少发言者批评了周恩来。

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

1. **目前边区周围局势暂较缓和**，**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已告一段落**，保卫边区与审查干部的工作虽仍须继续进行不懈，但趁此时机利用活生生的事实与群众中已经激发的感情，有系统的进行一次对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应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此在实践上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而为达此目的，**三朝两日，轻描淡写，畏首畏尾，心不在焉的方式是完全不济事的**。因此，中央总学委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

二、规定在此期间以学习以下5个文件为中心：1、《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2、《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3、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4、王稼祥同志《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5、刘少奇同志《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并参考《解放日报》7月1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7月12日社论《质问国民党》，7月27日社论《论时局》，及其它有关的文章。

三、为使这一学习能够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规定8月5日至15日为浏览阶段，8月16日以后再进入讨论阶段。中央总学委决定在浏览阶段结束，讨论阶段开始前，召集一次会议，反映浏览情况，研究讨论方法，望各单位学习领导机关注意准备意见。

中央总学委

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中央党校第二部今天开学。同志们大多是从前方来的，从战场上回来的；一部分是从边区各地来的，从工作中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延安的，离开工作来学习的。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统一的思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否则，有人要学经济学，有人要学哲学，有人想看小说，有人想学外国文，那么，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也办不好。我们全党要统一，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要有一致的意见。今天开学，我主要地来做这样一个宣传。

我们要执行什么统一的意见，达到什么统一的目的呢？就是刚才彭真同志说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关于干部标准的4条：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我们要按着这4条来学习，学校里的学生、工作人员统统要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国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务呢？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

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同过去法国、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苏联的二月革命除外）由封建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是不相同的。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动群众不彻底，生怕群众觉悟起来，超出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

“**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中国几万万农民到底跟谁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中国仍是一个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跟无产阶级、跟共产党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办党校也是为了要换这个朝。

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老干部，只知道头一个换朝，不知道第二个换朝。**头一个换朝他们有经验，叫作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赞成；现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赞成；反特务斗争，他们赞成；不让胡宗南进攻边区，他们赞成。但这些都是属于刚才讲的那个头一个换朝。”

“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

关于联系群众问题，毛泽东说：

“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周恩来给董必武的电报，全文如下：

董：

甲、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不知重庆月来舆论如何？望电告。

乙、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8、9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不久将有通电、文章广播，请预为准备。

丙、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数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二、发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样的。三、尽量争取中间人，在中间刊物发表抗议。四、译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华、群众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毛泽东 周恩来 真延

8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边章五（文武兼备的军事指挥员，1954年病逝）的《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名叛国将领概观》一文，该文说，抗战迄今，国民党将领及其所率军队，叛国投敌现象，层见迭出。文章中公布了国民党58个叛国将领，他们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杨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社论借用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鞑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8月13日，毛泽东就击退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后的形势分析和关于党的政策问题，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吕正操、李先念、黄敬，他写道：

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地进行不声不响地对于我军的军事进攻；对于日军及伪军则采取消极态度，同时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的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7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36个师60万人，国民党只抗击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35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62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6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56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文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程度，降敌者日益增多。英美两国舆论对于国民党抗战不力与政治黑暗日益不满。国内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和我们同样受压迫，同情我党的倾向在增长中。**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毛泽东

8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审干“九条方针”作了详细说明。决定中说：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压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3个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的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关于“调查研究”，决定说“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的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再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关于“争取失足者”，决定中说：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干查出两千多人（其中有部分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该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去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为一条心的，许多人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二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比杀掉为有利。只要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自此，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江青作为一名军委机关的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她这是第3次接受组织审查了。

此次审查江青的材料依据主要有3个：

第1个材料：早在1939年，国民党的报纸借助江青的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发表了《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等一系列报道，目的是指桑骂槐。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看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后，指着报纸问扬帆：“你是否知道蓝苹其人，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扬帆是在1937年3月也就是江青离开上海的前两个月到上海进入戏剧界的；在江青走后的8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扬帆见项英问起蓝苹，就把他所听到的关于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传闻告诉了项英，他还说：“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项英要扬帆把他所说的情况写了1份书面材料，他自己又拟了1份电报，在电报末尾说：“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然后让李一氓将电报发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康生。

第2个材料：1939年周恩来给江苏省委发去电报，询问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是在1937年5、6月间来到上海的，此时江青已经离开了上海。刘晓是在到了上海后先建立了上海临时委员会，1937年11月成立了江苏省委。他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和其他省委负责人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联名回电，反映了有关江青的一些绯闻，结论是江青历史不清白，“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妻”。

第3个材料来自于严朴。严朴在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后，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江青来到上海时，他已经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所以，严朴的材料也是源于传闻。

此外，来自上海的周扬、袁牧之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有一次，江青要让毛泽东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赞成，他对自己的妻子也一样严格按原则办事。他说：

“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

江青不高兴了，说：

“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

毛泽东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江青说：

“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

实际上，审查江青的那些材料都是一些旧传闻，组织上早已调查过两遍了，没有可以佐证江青有历史问题的新东西。关于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过强硬的态度，也早已结了婚，更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江青过关是很容易的事。

此后，江青也接到了柯庆施的一份申诉材料，她向毛泽东汇报说：

“少奇同志在华北局时，审干工作处理得不太好。”

毛泽东问道：

“有什么问题？”

江青说：

“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证明人是张秀岩。她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张秀岩的二哥张璧是汪伪大汉奸，她的侄女张洁清是彭真同志的老婆。

他们已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被逼得跳了井。柯庆施在拘留室写给我的信中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不可思议。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

毛泽东立刻叫来康生，了解柯庆施的案件。康生说：

“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了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

“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马上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柯庆施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他后来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流着泪一个劲地说：

“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救我，我也要上黄泉路了。”

毛泽东说：

“是江青同志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

“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

柯庆施又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刘少奇在华北局时期的问题，毛泽东说：

“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你要学会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且说初秋的一天下午，天高气爽。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刚刚开学上课，学员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进了柳树店的山沟，旋即停在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主人走下车来时，被附近的几个学员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在宿舍里自习的学员们听到欢呼声，都跑出了窑洞，奔向操场，把毛泽东围了起来。

“当当当……”一阵清脆悦耳的集合钟声响了，学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听毛泽东讲话。

礼堂被席地而坐的学员们挤得满满的，老师和校领导都被挤到礼堂内东侧，从大门口到主席台排成一溜儿紧靠着墙站立着。

主席台上放着一张学员上课用的书桌。毛泽东的随行卫士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走上主席台，瘦小的个儿显得精干利索，从腰带上解下用布袋装着的军用白搪瓷茶缸，从挎袋的布口袋里拿出一个无提手的小暖水瓶，倒了半杯水，放在书桌的西侧。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礼堂门口时，学员们热烈地鼓起掌来，随着掌声的节奏，学员们齐声欢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和战士们难以区别的灰色军装，松散着裤腿，上了主席台。他唯一与众不同的是那1米8以上的魁伟身材，高大而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眼神。一头浓黑的头发使他那黝黑的面孔显得更加消瘦。他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轻轻地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坐在第一排的王鹤滨看着毛泽东的样子，立即想起了他在华北联大时学生中流传着的一句话：“毛主席像个老妈妈。”他正想着心事，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道：

“枪是可以杀人的！”

毛泽东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他讲演的第一句话，顿了顿，接着说：

“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我们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顿了顿，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

“那么，我们手里的枪是从哪里来的呀？”

毛泽东启发式的提问，一下子把学员们的思维集中了起来。一个学员大声说道：

“大概是通过地下工作者送来的吧？！”

毛泽东微笑着亮出了底牌：

“**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的嘛**！蒋介石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还是很称职的哟！他既不用牛车拉，也不用毛驴驮，而是用火车载汽车运的呀！运来了嘛，我们就统统地收下，但是，不开收条的哟！”

毛泽东的话音刚一落，会场上立即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笑出了声音，他随手拿起小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

“从前我们就是这样，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现在，我们对付日本鬼子也是这个办法……”

1943年9月初，彭德怀从华北前线回到了延安，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准备就毛泽东对他4月7日在太行山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批评意见，和毛泽东辩论一番。毛泽东已经听到了传言，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纠缠不清，就让江青接待他，跟他解释一下。江青对彭德怀说：

“主席为你讲的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很不耐烦地说：

“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来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因为事先毛泽东有交代，江青有思想准备，就耐着性子说：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后来，刘少奇和彭德怀去看望病中的关向应，关向应流着眼泪说：

“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

此时，聂荣臻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晋察冀，来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

聂荣臻长期独立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群工作，卓有成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在临行前，毛泽东特意发电报给他，要他带一支部队，兵力起码4000人，保证路上安全。安全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人，来到聂荣臻住处看望他。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共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3人因病未到会。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胡乔木，共19人。这次会议史称“第二次九月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许多干部都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彭德怀在会上报告了华北的斗争情况，总结了各阶段的经验教训，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还总结了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领袖。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会议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上提出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反对毛泽东，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

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毛泽东解释说：

“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

毛泽东很不满意有关方面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据聂荣臻说：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说：

“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多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还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在秋季的一天，任弼时曾郑重嘱咐萧三说：

“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

他希望萧三能在12月下旬完成。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萧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说：

“我曾有幸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我倍受阳光雨露的哺育，领袖良师益友的教导熏陶，自然有许多亲切的珍贵的回忆。”

后来，萧三为此遍访了在延安的许多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可是到了年底，萧三的那本毛传并未能如期完成。

有一天傍晚，毛泽东请中宣部长张闻天打电话把民众剧团的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的杨醉乡请到枣园住所谈话。

杨醉乡，原名杨增爱，1906年出生于延川县杨家圪台村，1927年5月在延安省立4中加入共产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永远区委宣传部长，列宁剧团团长，工农剧社社长，人民抗日剧社党支部书记，抗战剧团团长，创作有秦腔剧本《崔福才转变》、《王老虎》，快板剧《消灭汉奸》，陕北小调剧《送公粮》，眉户戏《求婚》、《三姐妹》、《劝妻》等小戏。他在演出中经常反串老婆婆，故有“杨妈妈”、“佘太君”之称。

毛泽东的窑洞里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西南角放着一张木板床，床上折叠整齐的被面上打着一块约2尺长的补丁。

毛泽东见客人来了，和他们一一握手，示意他们在点有小马灯的办公桌旁坐下，笑道：

“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秧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哪里。”**

他指着柯仲平说：

“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日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

他又指着民众剧团编导主任马健翎说：

“‘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汇报了两个剧团演出的情况，大家边说边笑，气氛非常活跃。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说：

“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9月底，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

前面已经说过，盛世才于1942年9月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囚禁；后来在1943年2月7日又把这些共产党人投入监狱。从4月10日起，由蒋介石派来的“审判团”等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开始动用“抽皮鞭”、“坐飞机”、“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残酷折磨共产党人。徐梦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3人叛变。

9月27日深夜，新疆警务处李英奇与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2监狱。他们指挥9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化名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索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3天，盛世才又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一个进行拍照，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邀赏。

后来在1944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笔者注）、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其间，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显然，他们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早已牺牲和徐梦秋、潘同、刘希平3人叛变了。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代表们仍然不知陈潭秋已经牺牲，又把他选为中央委员。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参看《毛泽东选集》）。指示要求：

“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毫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0月5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参看《毛泽东选集》）的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3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40至50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6、7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许多黄埔系军人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向这些先生们发出一些问题：你们忘了10年内战的经验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300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作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可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暂时拖，将来打’。**这个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别，这是在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绝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人们的方向。这些人们是可能采取此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因此迫得他们把内战阴谋推迟下去，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拖下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10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3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6月28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没有公布。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6、7月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日本把其在华兵力58%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42%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20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58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20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58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好得很，我们是欢迎这些话头的。但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时局的发展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向呢？可以有的，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么是第三种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国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针。但是依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依据目前事实看来，蒋先生和大部分当权的国民党人都没有任何事实表示他们愿意实行这种方针。

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欧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究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10月1日同盟社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毛泽东在社论中同时表示：

“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欲知此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7月12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10月5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堪称政论文中的典范之作。且不说他老人家下笔辛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理透彻，单就其政策和策略来说，一般的政论文都是无法可比的。须知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一类文章既不能像一般的辩驳文，也不同于讨伐檄文。它既要充分揭露和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恶行，又不能把老冤家一棍子打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人民和团结抗战之目的。所以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越读越觉得奥妙无穷！

**第58章**

**“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

**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

**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

话说1943年10月6日，这一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九月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首先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

接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主要讲了党内斗争的传统问题。

朱德说：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同志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同志办事的本事。”

他还回顾了亲身经历，他说：

“与毛泽东同志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泽东同志，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泽东同志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泽东同志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

周恩来是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最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小结，先讲了团结问题。他强调说：我们是要团结的，犯路线错误或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

他还讲到了党内斗争的方法，强调说，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方法；这次整风继续以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10月间的一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精神格外好，喊道：

“齐吉树，今天我们到南泥湾，9点出发，告诉贺清华通知德怀、弼时同志。”

毛泽东此去南泥湾，有3个目的，一是视察生产，二是检查战备，三是借此机会做做彭德怀的思想工作。

此前，毛泽东就百团大战问题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有点想不通。所以，此次南泥湾之行，毛泽东特意安排由江青陪同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一起去。

9点整，司机周西林把一辆大卡车开到枣园大门口。毛泽东拿着一本书，钻进了驾驶室。其他人员坐在由杨成洋开的另一辆大卡车上。

一路上，毛泽东都是专心致志地在那里看书。在另一辆车上，江青、陈琮英、浦安修凑到一起，有说有笑，可热闹了。只有彭德怀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沉默不语。他身边的几个小鬼都知道他不高兴，都晓得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谁都不敢和他搭讪。

车子爬上蟠龙山顶，突然停了下来。毛泽东从车上下来，朝大家说：

“山下就是南泥湾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齐吉树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脚未站稳，就听“咔嚓”一声，糟糕，他挎在身上的暖水瓶被碰碎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怎么回事？”毛泽东回过头来问道。齐吉树心情紧张极啦。毛泽东看了看，赶忙说：“坏了就坏了吧，以后办事小心一点就是了。”

齐吉树下车后本来是想请毛泽东喝水，没想到这一下把瓶给弄砸了，又是急又是恨自己，心中骂道：“齐吉树呀齐吉树，你怎么这么笨！”

此时的南泥湾正是遍地黄金、丰收在望的时候，毛泽东望着眼前的景象，高兴地说：

“好一派南国风光哟，咱们走走看看。”

他走进田间，一会儿掂掂沉甸甸的谷穗子，一会儿用手捻捻，看看颗粒的成色，一会儿又与劳动的农民和干部战士们交谈，了解情况。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他问道：

“几点了？”

身边的人说：

“快12点了。”

“哟，我们要晚点喽。”

中午，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泥湾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王震和团级以上的干部已经等候多时了。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大声赞赏说：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你们的庄稼长得蛮好啊，看起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王震说：

“如果没有天灾的话，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这就好。”

开饭的时间到了，王震请毛泽东到新盖的房子里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刚来就吃饭，可见你们的粮食多得很喽。”

新房子是一座全用木头盖成的会议室。董廷恒在桌子上摆满了丰盛午餐，有炖山鸡，有用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做成的各样饭菜。毛泽东说：

“怎么搞这么多菜呀，我们尝都尝不过来，这得花多少钱？”

董廷恒说：

“这些菜和粮食，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王震也自豪地说：

“一分钱也不花，菜是自己种的，野味是自己打的，这些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

毛泽东品尝着用玉米黑子做的菜，说：

“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很好吃哟，有些竹笋的味道。”

他问王震：

“战士们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王震说：

“每人每天5钱油，菜随便吃。”

“星期天改善伙食吗？”

“星期天的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说：“有时还杀头猪，有时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有没有发生柳拐子病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都消灭了。”

毛泽东的风趣话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饭后，毛泽东听着王震的汇报，不时地点头微笑。王震说：

“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今年每人种30亩。去年的口号是：‘不领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6石1斗细粮、6斤皮棉，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毛泽东说：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尔后，毛泽东来到通讯连视察，他看到一孔孔新开的窑洞，窑顶和四壁都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哪里来的？战士说是自己烧的。他高兴地说：

“真是了不起呀，你们不但会打仗种田，还会烧石灰。”

战士们睡的是通炕，炕沿是用平滑的石板和木料拼成的，炕上铺着用茅草编织的草垫子。窗前整整齐齐地摆着学习用的书桌书架。毛泽东随手拿起一个学习本，翻开看了一下，说：

“你们的字写得不错嘛！”

战士不好意思地说：

“不行，不行。”

毛泽东摸摸本子问：

“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哩。”

王震说：

“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

任弼时说：

“这很好，你们多搞点，送到延安，让他们也用点。”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什么也不用花钱，就靠你们的两只手和聪明才智，克服了困难。看起来，**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诸葛亮，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毛泽东从通讯连出来，走进厨房，老炊事员李金山正在切菜，他一见毛泽东来了，连手都忘了擦，迎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亲切地问：

“做些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连忙回答：“还熬了个粉条、菠菜、萝卜汤。”

“你一个人做多少人的饭菜？”

“不算多，40几个人的。”

“辛苦啰！”

“同志们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我辛苦得多。”

毛泽东最后鼓励李金山说：

“大师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搞生产，打敌人，你说对不对？”

他从厨房出来，又到了养猪场。饲养员老杜正在猪圈里掏猪粪。毛泽东站在栏外，看着那一群肥猪和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猪仔，笑呵呵地说：

“老同志，你养的猪好肥啊！”

老杜只顾在忙活，没注意来了这许多人，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到这里。王震提高嗓门说：

“老杜头，毛主席夸你猪喂得好呢！”

老杜这才抬起头来，左手依然拿着铁锨，抬起右手对着毛泽东敬了个礼，还不好意思地说：

“过去没养过猪，没经验。”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握了手，问他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老家在什么地方！还说：

“老同志，你的工作也很光荣哟，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你说对吧？”

老杜连连回答：

“对，对。”

毛泽东向老杜挥挥手，向营地西边田里走去。不远处的田地里，一群战士正忙着收割，毛泽东提高声音和他们打招呼：

“同志们辛苦了！”

战士们直起腰，齐声回答：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掂起沉甸甸的谷穗，用手捻一捻，看着黄澄澄饱满的谷粒，说：

“这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果实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在阳湾北面山顶上的两孔窑洞里，一间是寝室，一间作会客室。任弼时、彭德怀各住了一个窑洞。齐吉树准备去给毛泽东倒水，走到会议室外面，听见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3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争论得很激烈。他走进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彭德怀坐在一把木凳上，脸色非常严肃。毛泽东说：

“百团大战，固然成绩突出，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

任弼时接着说：

“彭总，毛主席说得很对呀，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吧！”

齐吉树不敢多耽搁，倒罢水就出去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操场上检阅了部队，观看战士们刺杀、投弹、越障碍等项目的军事表演。检阅结束后，毛泽东走进交通沟，察看新修的作战工事，他对王震说：

“你们生产是模范，练兵也是模范。我们的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生产。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如果做到这些，我们就会是孟夫子所说过的‘无敌于天下’了。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进犯边区，同志要一面备战，一面生产。”

王震汇报了军事工作，毛泽东说：

“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能放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这么好的地方，如果需要，再给你调几个团来。”

毛泽东走到718团驻地，在窑洞里和指战员们交谈。毛泽东问：

“这么大的窑洞，几天挖一个？发生过倒塌没有？砸伤过人没有？”

他摸着战士们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湿，就说：

“你们的被褥，要经常晒晒，可以减少疾病。”

彭德怀也说：

“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怎么能打胜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齐吉树见彭德怀的脸色逐渐好起来，已经有说有笑了。他心想：看来，彭总的思想已经通了。

这一天中午，蔡师傅给毛泽东做的午餐有鸡鸭肉，还有青菜和辣椒。蔡师傅问毛泽东饭菜可口不可口？毛泽东说：

“做得很好，我很爱吃。”

饭后，毛泽东对齐吉树说：

“你转告蔡师傅，饭菜做得很好吃，但数量多了。延安还很困难，吃不了不就浪费了嘛。让他给我做得和延安的标准一样就可以了。”

719团驻地附近有个九龙泉，九龙泉有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个地方方圆几十米，有几口泉眼昼夜不息地汩汩流淌泉水，晶莹透彻，清甜纯净。

下午，毛泽东来到九龙泉，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弯腰用手捧起九龙泉水喝了几口，说：

“这里的水又清又纯，真好呢！”

他来到战士们刨土豆的地里，拿起铁锹挖开了黑黝黝的土，挖出了一个很大的土豆，高兴得喊了起来：

“你们来看，这土豆长得这么大，长得真顽固哟！”

任弼时问身边的一个战士：

“小同志，你们的土豆长得这么好，主要靠什么呢？”

战士回答说：

“上级领导得好。”

“小鬼，你回答的还不全面，我看有3个原因，一是九龙泉的水好，可说是天时；二是土地肥沃，可谓地利；三是战士们不怕辛苦，上肥多，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你们都有了，这土豆哪个能有长不好的道理？”

彭德怀问王震：

“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一个郝树才，外号叫气死牛。”

毛泽东好奇地问：

“什么气死牛？”

王震说：

“郝树才1935年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平型关伏击战，在大生产中，他创造了一天开荒4亩3分地的最高记录，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被评上特等劳模。”

“一头牛一天能耕多少？”

“最多3亩多一点吧。”

“好，好，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要在边区报纸上好好宣传郝树才同志，号召大家向郝树才同志学习。”

毛泽东一行又参观了359旅办的打铁厂、食品加工厂、家属纺织厂。毛泽东说：

“你们组织起来了，生产自给，很了不起。这些工厂虽小，但解决了大问题。359旅同志们穿的、用的都比过去好多了。革命胜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体农庄，妇女都可以参加集体劳动。”

他对家属纺织厂的负责人说：

“你们那里有女工、女同志，半边天嘛，应该同工同酬。”

晚上，蔡师傅给毛泽东做了1盘辣椒、3个小菜，1碗大米饭。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嘛！”

毛泽东问警卫员们在什么地方吃饭，伙食搞得如何？齐吉树说：

“我们在阳湾上口的饭庄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在这里，你们要多吃一点，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

毛泽东一行已经在南泥湾视察了五六天了，在回延安的头天晚上，毛泽东到外面去散步。他看着从山头上一排排窑洞里透出来的灯光，映得整个山头犹如空中的楼阁一般，就对齐吉树等人说：

“你们看这些窑洞多像高楼大厦啊！将来解放了，我们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楼房。在南泥湾我们亲眼看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可见**战争不但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还是经济的斗争**。要最终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还要会做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要建设新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努力学习。”

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切实执行十大政策”的讲话，其内容摘录如下：

我们党在抗战中提出的各种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切要的有10条政策，这10条政策要联系起来执行。

一、对敌斗争。陕甘宁边区要准备对胡宗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蒋介石的摩擦进行斗争，即军事上要作准备，使军队在政治上更巩固，在军事上更提高。今年冬季要开展大练兵，全体官兵都要紧张地转到大训练的运动中去，训练得一个人能打两个敌人。边区现有50000军队，都训练好了，还不能打仗吗？须知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25000人，红军改编时只有45000人，现在边区有了50000兵而且训练精了，还不好办事吗？大练兵要认真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士兵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高干会议以后，就是各旅的团长、政委的责任了。要学习6旅的一个连长关心士兵半夜查寝室查岗哨的办法，学习陈宗尧团长与士兵一同背米、开荒的精神。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过去一个时期，部队中的有些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采取霸道、蛮横的态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今年阴历过年要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再颁布一次公约，首先从军队做起，然后是党政，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

二、精兵简政。这是重要的一条，已在实行。

三、统一领导。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比喻事权不统一，令人无所适从。语出《左传·僖公五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三公指春秋时晋献公和公子重耳、夷吾——笔者注）。如果有的领导同志心里有气，就应向大家谈出来，加以分析，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团结和统一。凡是对这一条执行得还不够的，应当立即搞好。

四、拥政爱民。每年来一次，检查一年的缺点、错误，向人民作自我批评，要每年颁布公约。中央准备颁布一个统一的各地都实行的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各10条的公约。**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才能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是会爱护军队的。

我们的军队和军队中的干部是“闯州过府”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是见闻广博而有经验的。我们的军队是中国人民的组织者与宣传者，是最有觉悟的。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人民。**只要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好，人民的态度是没有不好的。**过去留守兵团有的负责人，总是说边区人民不好，不爱护军队。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替人民干了些什么事？首先应当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就是要实行这种方法。

五、发展生产。要做到农业生产“耕三余一”，备战，备荒。

我要特别讲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35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中的有3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70%，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1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半劳动力，这也是一支劳动大军。

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1400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部队、机关、学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产方式，例如一个连队就可以作为一个合作社的形式。根据杨家岭的经验，将运输队改为合作社，采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红制，即公家以8辆大车，22个驮骡和全部用具，作为80股，22个运输队员作为20股，按斤由公家发运输费。其结果是运输力由每月只运19万斤提高到38万9千余斤，增加了100%，而且工具节省了，牲口受到爱护，替公家节约了大量经费。这个办法在中直军直各机关学校中普遍运用，都收到很大效果。中央管理局的运输营100头牲口20辆大车，在未组成合作社以前每月运输120万斤，改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输力提高到185万斤，增加了50%。因此，请大家考虑这种合作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工厂、农场。我们的农场按伙种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办法，当然不按伙种而用自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六、整顿三风。边区做得有成绩，还要继续做。

七、审查干部。反特务斗争要继续开展。

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时事教育，这次大规模地进行了3个月，还要继续做，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

九、减租减息。许多根据地开展得不彻底，边区有些地方也没有做好，还要继续搞。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我们还是实行减租减息，不实行土地革命。

十、“三三制”。要认真实行，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变，“三三制”政策也不变。

以上十大政策，坚持贯彻下去，就能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能对付国共关系可能的破裂。当前各根据地最重要的任务是4项：第一，**对敌斗争，即打敌人，挤地方；**第二，发展生产，即弄饭吃；第三，整顿三风，即整歪风；第四，审查干部，即反特务斗争。这4件做好了，党就可以巩固，现在还只是相当巩固，而不是十分巩固。

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据聂荣臻同志回来说，晋察冀挤了一些地方回来，晋东南挤了140万人口的地方回来。6年的抗战，**在敌后我们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些才行。**蒋介石如果要挤我们，要挤边区，我们就准备非同他挤不可。

讲到生产，弄饭吃，全党干部非学会这一套不可，只要半年就可以学会。过去这是总务处长、财政厅、建设厅的事，现在各部队首长、各机关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都非学会不可，连文人学士如周扬、陈伯达、范文澜等也都学会了。

部队生产，今年2月王震同志订计划时，计划每人开荒6亩，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但实际发展的结果，平均每人开荒18亩。这种群众的创造，解决了革命的大问题。军队自己可以发饷，我们养千万的军队都有办法了。

每一个旅应当建立一个后方。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进不来，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和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像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地搞一个革命家务。

抗战以来，国民党用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们，我们的反特务斗争，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

要实施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与审查干部这3项工作，就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顿三风的方法，去年的高干会议分清楚了两条路线，克服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错误，但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两种态度要分清。**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干会议、军政干部会议和120师小干部会等，都是实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正确的分析，把统一的东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个侧面，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又如财经问题，不作分析工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要做详细占有材料与详细分析的工作，何况我们呢?

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议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就是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让各种学说自流，让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也很多，不作批评，不作斗争，对工作不加严厉的督促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4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3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1943年11月初，毛泽东分别接到了陈毅和饶漱石的来电，这才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原来在1942年底，饶漱石代替刘少奇出任新四军代理政委，陈毅认为饶漱石没有政治、军事经验，对这位代理政委不太满意，就在干部会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饶漱石因此对陈毅怀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饶漱石利用整风之机，在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镇新四军军部召开干部会议，搞突然袭击，发动干部们斗争陈毅，翻出了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和红4军七大陈毅二度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老账，列举出陈毅10条错误。斗争了陈毅，饶漱石还不解恨，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1500字的电报，罗列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陈毅。他还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1、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2、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1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做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转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后来陈毅于11月25日愤而离开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向毛泽东陈述原委，要讨回公道。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说：

“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判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然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2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

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做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同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4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做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敌人面前是警觉的、坚定的、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联共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给中央写信说：

“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已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

这封信显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庆树的名义书写的。以“十万分的热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其千方百计治病表示感谢的王明夫妇，时隔30年之后，就完全变了一副嘴脸。王明在他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泽东的“蓄意谋害”。

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3次到了延安。

此前，邓宝珊曾在重庆3个月，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并让他列席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邓宝珊离开重庆在西安逗留期间，曾向共产党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到交际处看望养病的续范亭时，对交际处金城等人交代说：

“邓先生不久就要来延安了。他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我们历来是区别对待的，不能等量齐观。对进步派，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与我党谈判，然而由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坐失有利战机，最终导致19路军失败，红军也只剩下突围长征这一条路。从这一历史教训看现在，我们对邓宝珊这样长期合作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争取、团结的方针，并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不久，邓宝珊一行果然来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际处。毛泽东在和他的会晤中，谈到了国民党的第3次反共高潮和胡宗南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幽默地说：

“**胡宗南不过是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两筐鸡蛋招摇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过去，就全部砸烂了。**”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3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

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11月9日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埃及，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埃及的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开罗。

开罗会议着重讨论3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问题。罗斯福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必须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趋势，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你们“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对蒋介石说：

**“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所说的这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在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是很有道理的。但他的这个提议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过了老半天，蒋介石才说：

“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11月25日，罗斯福与蒋介石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

**“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便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做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

“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

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

“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会议期间，**蒋介石向丘吉尔提出要求，要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

开罗会议通过了在缅甸北部发动对日反攻作战的方案，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简称《开罗宣言》。《宣言》在写到打败日本后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他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

“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

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后来在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再说11月26日，金城在电话里报告毛泽东说，今天发现邓宝珊偶感风寒，可他又不愿到医院里去。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交际处探视、慰问邓宝珊。他还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为邓宝珊把脉诊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员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给金城的信中写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邓宝珊病愈之后，交际处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此时还处在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节目中安排有《血泪仇》和一些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攻、坚决保卫边区的节目。邓宝珊看着表演显得很不自然，他始终没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掌声而表示赞赏。杨令德看到话剧中蒋介石从桌子上倒栽下来，说道：

“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交际处的金城等人说：

“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他们感到有压力嘛！”

林伯渠赶紧打圆场，他说：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际处又组织了一台由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一些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这出戏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结束了，没有再演金玉奴在许公帮助下与莫稽团圆一节。邓宝珊称赞说：

“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游览了不少地方，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了劳动英雄大会，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经这样对人说：“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再说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3届生产展览会（第2届叫农工业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吴满有、杨步浩等17位特等劳动英雄的画像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画像一起挂在了主席台上。

这天下午，两大盛会隆重开幕。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

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1944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11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把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的长篇讲话，他说：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作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3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4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让其妻子孟庆树代笔，口授了一封由他签名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写道：

“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加以检讨。”“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

王明所说的他承认的错误，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而对于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则闭口不谈。接下来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再一次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9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等陪同下，参观了第3届生产展览会。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张图表和照片，生动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委托西北局邀请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吴满有、杨步浩、申长林、阎开增、李位、冯云鹏、张振财、田荣贵、张清益、高仲和、孙万福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高岗、贾拓夫陪同下，走进西北局办公厅会议室。正在室内交谈的劳动英雄们马上起立，纷纷走上前来。在贾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然后聊了起来。毛泽东一会儿同冯云鹏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等谈变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问题；一会儿又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每当劳动英雄们谈自己的生产经验时，毛泽东都仔细地听着，并不时地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指导边区生产的方针。这些劳动英雄们还兴奋地谈起了他们是怎样从贫困和饥饿中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的，他们说：

“我们在你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大翻身了！”

陇东老英雄孙万福说起这段历史，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泽东，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泽东的双肩，沾着吐沫的胡须因兴奋而不断颤动。他连声说：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和共产党给的，没有你和共产党，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这次座谈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12月16日，毛泽东就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下的敌后任务问题，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复电给邓小平，他在电文中写道：

小平同志：

（甲）亥江电悉。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山东、华中应如何注意，待朱瑞、陈毅到延了解情况后再告。

（乙）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6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两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丙）太岳、中条整风生产全无反映，望注意检查督促。

毛泽东 彭德怀

12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专题会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西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前边已经说过，在1942年10月下旬的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西北原26军和陕甘边出身的干部提出了西北的“肃反”问题。中央便在清算全党“左”倾错误的同时，从1942年11月5日开始，在30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中举行了12天的专题会议，对西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理和清算。中共中央的《决定》便是根据那个专题会议的结论作出来的。《决定》中说：

“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干部。这种将党的好干部诬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共中央这次专题会议还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主要负责人给予了组织处分。

毛泽东总结说：

“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会议才把历史问题搞清楚。”“现在作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

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中说：“毛泽东的讲话，对分清西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执行的错误路线给定了性。”

尽管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原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纠纷还远没有结束，高岗出于个人野心，又多生枝节，使矛盾更加复杂化了。就在1942年11月中央召开的西北地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专题会议期间，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说：

“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

阎红彦说：

“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

高岗慌忙换了话题，说：

“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

接着，高岗要阎红彦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阎红彦听后，批评他说：

“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3支队2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

高岗听他如此说，恼羞成怒，就利用中共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倒打一耙，诬陷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红彦“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后来到了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当高岗在会上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阎红彦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希望党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事后，阎红彦还主动向高岗说明此事，希望他改正。由此，高岗对阎红彦更加怀恨在心，在1945年7月第2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整阎红彦，并指定人揭发阎红彦，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高岗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中央对他却是非常信任的。康生奉命在会上宣布：“高岗同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高岗后来曾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一直到1954年，高岗反党阴谋被揭穿，中央查阅了当年阎红彦要求记录存档的原始档案，刘少奇、周恩来等这才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同高岗进行的斗争。周恩来说：“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

为此，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当面向阎红彦道了歉。事情到此总该结束了吧？不！谁也想不到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在1962年，还在毛泽东身后，围绕着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又多次发酵，热闹还在后头呢。

请读者诸君耐心往下看吧。

东方翁曰：本章讲到的王明和高岗这一类人最终不能成大事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低劣的人品和素质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后人往往把他们说成是毛泽东的同路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抬高了他们。他们之所以混迹于共产党内，不过是风云际会，机缘巧合罢了。无数事实证明，这一类人不是混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便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变色龙和小爬虫。他们何尝信奉过《共产党宣言》，信奉过共产主义？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不过是通过改朝换代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一旦取得了最高权力，便与原来的反动派毫无二致，一样维护私有制，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

**第59章**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

**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

**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

话说1943年12月20日晚，毛泽东给秘书胡乔木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耶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就是苏联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12月24日，毛泽东派人给刘少奇送去了一本书，并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它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毛泽东

12月27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康生关于反特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华中局并转1、2、3、4师，山东分局，5师：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5%。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1944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关于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之处理，有太行军区命令一件，发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康生 亥感

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赞扬我党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轰轰烈烈坚忍奋斗百折不回的伟大成绩，赞扬我党以坚固的马列主义为基础而在1921年开始产生的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发展与巩固，同时也将批判在我党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左”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直至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

**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8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经过七大，我党将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大与更高度的一致，向着彻底战胜敌人解放中国的大路迈进。

　　 中央政治局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向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发出由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

指示还要求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要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100到200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指示还特别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12月间，江青听说中央党校由学员组成的京剧组正在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就到党校观看了演出。她看后高兴地对编导人员说：

“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家后作了部分的修改。

1944年元旦，京剧组在中央党校首次演出由杨绍萱、齐燕铭等人集体创作、由齐燕铭导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大获成功。

此时也有一部分人对《逼上梁山》冠以新编历史剧有不同看法。胡乔木说：

“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像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也说：

“我同意胡乔木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剧本，说：

“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还对剧本的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

1944年1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向敌后军民致贺电》，全文如下：

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战斗员们，游击队员与民兵们，在战斗中负伤患病的伤病员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全体抗日同胞们：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的新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的英勇斗争致敬意，并向你们祝贺新年！

抗战6年半的长时期间，你们始终站在祖国的最前线。100万的敌伪军，一年几十次的“扫荡”，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毁灭，特务分子暗杀放毒告密的恐怖，粮饷弹药的缺乏，许多地方还加上天灾，但是你们毫不动摇地站在最前线。你们在去年一年打了大小几千次的仗，打死5万以上的敌伪军，打退了常常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进攻，打垮与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棠的主力，收复了许多的失地，许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是扩大了。许多地区，不但胜利地进行了对敌斗争，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还进行了人民和部队的生产运动、救灾运动、防奸运动与干部的整风学习运动。你们这种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你们吸引了侵华敌人的大多数，牵制了向正面进攻的敌人，掩护了抗战的后方，保证了最后的胜利，你们的大功劳，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各国人民也已明白。你们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爱国军队的战士，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长城；有了你们，中国才有资格与苏美英等同盟国站在一起。

在莫斯科、开罗、德黑兰3次会议以后，欧洲第二战场很快就要开辟了，**打倒希特勒解放全欧洲的胜利很快就要在英勇红军与英美盟军的一致行动下完全实现了**，因此，**我们中国人民打倒日寇的胜利，也就更加确定与更加逼近了**。但是在同盟国对日总反攻之前，我们必然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甚至是比前更大的困难。敌人必然要更加千方百计地来摧残你们，破坏你们，但是你们是不怕困难的！你们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锻炼，你们已经学会了怎样和敌人作斗争，而且正在学习着怎样更好的斗争。6年半的教训，使你们知道取得一切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团结，首先是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八路军新四军知道人民是自己的母亲，在抗战中间，不但为人民抵抗敌人的进攻，而且掩护人民的耕种收获，帮助人民的转移和恢复被破坏的家园，尽力减轻人民的担负和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根据地得到自由解放；人民也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自己的子弟，是自己的一家人，自愿供给军队的食粮，积极参加抗战的勤务，自动进行侦察和掩护工作，普遍组织民兵配合作战；因此，你们的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但是困难既然继续增加，你们的团结也就需要格外增强。在不休息的战斗中，一年过去，一年又开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战士，**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人民的关系还有一些什么缺陷**，还有一些什么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些吧！根据地的一切人民，也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抗日军队对抗属对抗战的一切工作还有一些什么可以做得更好些吧！一切共产党员，动员起来，更好地团结全军全民，更好地把一切坚持根据地的力量组织起来吧！在你们的铁一般地团结之下，你们今年的对敌斗争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你们的生产运动一定会在胜利的对敌斗争下得到更好的发展，你们一定会清除奸细破坏分子，把根据地十倍百倍地巩固起来。

庆祝你们已经得到的胜利和今年将要得到的更大胜利！

中华民族胜利的旗帜——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万岁！

扫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月4日，延安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张金才来到即将离开延安到重庆去的班威廉夫妇住的房间里，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充满了兴奋，告诉客人说：

“毛主席来了！他就要在我们食堂里和你们喝茶！”

班威廉颇感意外，惊异地问：

“已到了这里吗？”

“对呀！现在正在办公室和秦主任谈话。马上就要会见你们了。”

班威廉是英国物理学家，原任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早在1941年12月7日，当他和夫人从收音机里得知日美开战的消息后，便于8日清晨迅速乘车离开北平市区，在共产党人和沿途农民的帮助下，历尽艰险通过了日军防线，到达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班威廉夫妇帮助根据地开设了无线电机务高级研究班，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员，“电讯大王”王士光便是其中的一员。

且说班威廉等人来到食堂里，等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就来了，他的翻译是黄华。毛泽东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招呼大家坐下。班威廉见工作人员摆好了茶，便向毛泽东表示谢意，他还说：

“你是一个大忙人，居然还亲自来看我们。”  
毛泽东说：

“你们都在我新年拜客的名单中，还有我们党内的老同志林祖涵、徐特立等。你们到延安已有3个月了，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来看你们，很是抱歉。关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没有预备答复的时间，也很抱歉，只想在喝茶时和你们随便聊聊。”

接下来，他询问了班威廉等人在河北教授无线电技术以及战前在北平的生活状况和对英国、中国将来的看法等等，他自己则很少表示意见。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起身与客人握手告别，来到一辆写有“纽约华侨洗衣工人救国会谨赠”的敞篷汽车前，在10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上了车，回头向班威廉等人挥手致意。

后来，班威廉夫妇到了国统区，他们在敌后根据地两年间所写的笔记、保存的报刊文件均被国民党特务烧毁了，只留下一本日记，他们便根据这本日记写成了《新西行漫记》一书。关于此次会见，他们对毛泽东的印象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1月9日，毛泽东请在重庆的董必武转交给郭沫若一封电报。

在1943年底，毛泽东收到了郭沫若寄来的新话剧剧本《虎符》。《虎符》是他的6个剧本之一。该剧以魏安釐（音厘）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影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政府。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月9日晚，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观看由党校学员业余演出的京剧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看完演出，毛泽东当晚给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齐燕铭二人写了一封信（丁玲后来说：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这封信在60年代被说成是写给平剧院的），他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派人把信送到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手里，彭真把信转给了杨绍萱、齐燕铭。后来，毛泽东这封信还在演出组当众宣读了一遍，大家倍受鼓舞。

1月18日，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1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给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指示电：

小平、漱石、林枫、子华4同志：

一、对于坦白分子之处理，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绝不要将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认为是特务分子，因为在坦白运动中，固然有少数重要特务分子，常常用假坦白的手段来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警惕。但又有很多坦白分子，按其性质，并不是特务问题，他们或因问题复杂，一时难弄清楚，或因惧怕镇压，或逼于群众压力，或由于逼供信的错误，或由于特务的诬陷，而暂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这种事实，在延安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区别，笼统地将所有坦白分子，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

二、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6类：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加入了特务组织，进行过特务活动，保持着特务联系，以特务工作为职业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是自首后写过反共文件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没有实行，但也没有向党报告的。这一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是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公道团或其他党派，其中许多人**加入我党后，没有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其中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地被特务利用；有的因为半条心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欺骗组织，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人怀疑，甚至被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是有的，甚至在已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以上6类是根据延安坦白分子的情况，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其准确性，尚待今后甄别工作来证实。但职业特务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因此你们可以将这6类分析，当作一个方法，去细心分析你们那里的人，遇有不是特务而被误认为是特务者，必须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除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

三、**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这里要注意：不要将所有或多数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分子或嫌疑分子，延安许多机关，在初步复查工作中，已证明新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其中有政治问题的（轻重不等）只占20%左右，这个经验值得注意。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四、关于坦白分子的党籍问题，为了顺利地开展坦白运动，目前不要宣布停止，即对于那些杀过我们人的和假坦白的人，暂时也不明白宣布，但你们绝不要通过什么正式决议和文件。中央局及分局的负责同志也不要肯定的担保党籍，因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到解决的时期。对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的是依靠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与宽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促其觉悟，一般地不要采取逮捕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实材料与真凭实据，即使逮捕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央书记处 子敬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延安农村到处张灯结彩，呈现一派欢乐气氛。杨步浩心里惦记着毛泽东，拿着自己做的油糕、黄馍馍、白馍馍，提着鸡，到枣园给毛泽东拜年，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杨步浩回到村里后，向乡亲们传达了毛泽东对乡亲们的问候与关怀，乡亲们都很激动，憋足劲儿要搞好生产。

这一年，村里每户喂了两头猪，还搞起了变工队，办起了粉坊，日子开始过得红火了。

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赞扬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原来，艾青在1月中将他所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就给胡乔木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乔木：

此文写的很切实、生动，反映与具体解决了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子，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初，毛泽东请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杨得志到枣园吃饭，他交代警卫说：

“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杨得志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毛泽东问他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杨得志说：

“东渡黄河后，到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又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就到前方去了。不过，我在抗大时听过你几次讲演。”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

后来在“七大”闭幕后，杨得志果然去了党校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到前方去了。

有一天，毛泽东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一起过延河去杨家岭，走到女子大学的河坝时，萧劲光向毛泽东讲起一件事：女大有一女生，在石坝下洗衣服，一个战士把一块石头踢了下去，正好打在女生头上，双方争执起来了。女生说战士是有意打的，战士说自己是无意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毛泽东听后，立即说：

“不管怎样，我们的战士要做自我批评，毕竟是打了人家的头嘛。遇到问题，首先要批评自己，然后再去批评别人，别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评。这要成为一个原则。凡处理内部团结问题，都要这么做。”

后来，留守兵团的战士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自我批评，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1944年2月4日，毛泽东因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曾转达了蒋介石希望共产党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愿望，就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上写道：  
 “**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参谋见我，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我并告郭：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

2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向罗荣桓、黎玉、萧华并总部、新四军、129师、五台军区、120师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对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整个敌后根据地及所有我们部队如何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此点应有严重地注意。因**我们部队中存在着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出若干横蛮霸道的国民党作风**，而政治工作部门本身的群众观点就是不足的。过去红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3大任务：作战、筹款（现在应称为生产）与做群众工作，后来变为只着重注意第一个任务，其余两个任务是被忽视或多少被忽视了。且在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对群众工作极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我们进行群众工作，单只为着军队；殊不知道**我们军队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顾牺牲进行战斗就是为着群众**。因此，你们此次会议应很好地从干部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把这个加强群众观点的问题，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贯彻到全部议程中去。”

“现在你们的生产节约运动已在进行，并已有若干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仍必须在部队中把这一问题提到原则的认识上去。政治工作应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全体干部与战士中加强生产教育与节约教育，**从思想上改造与反对那种轻视劳动与浪费资财的观念**，因为真正把生产搞好并能进行节约，不仅对部队巩固才有物质保障，**向群众少要东西才使军民关系更加改善**，同时使官兵在亲自参加劳动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劳动观点，**改变小资产阶级与兵痞的气质**，干部更好地与战士生活打成一片，军队更好地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

“目前更需要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115师与山纵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应经过这次政工会议作到融洽无间。其办法是军队着重批评自己缺点，115师与山纵之间亦应各自着重批评自己，不着重批评对方，并由干部领导，在连队中发动坦白运动（经过很好准备，然后以一个星期进行之），将侵犯群众利益、想开小差及对坏人（奸细）隐秘不报等，一切平日不肯说的话都说出来，然后加以很好的教育，以改正官兵关系中及军民关系中一切不良现象。”

2月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信中写道：

“你的病况，中央同志都很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罗荣桓是在1942年冬患了严重的肾病，连续1个多月尿血不止，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带病工作。1944年初，山东分局将他的病情，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关心罗荣桓的病情，一方面担心他的病，另一方面更担心他到敌占区治病的安全问题。结果，罗荣桓哪里也没有去，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坚持繁重的工作。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说，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发表了讲话，“关于路线学习”，他说：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这样，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党内便于团结。”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同志过去不用脑子，不会分析具体问题，只会大喊大叫，做大块文章。**脑子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不用脑子是一个大毛病**，近来情况有些改变，特别是最近有进步。”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

“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参加。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

“今年部队中有一个人种了三四十亩地的（去年只有18亩），能产6石粮食，4石归公，2石归个人。杨家岭的个人生产平均每人是1石5斗。**现在实行的公私兼顾的分红制，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关于“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实行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对共产党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声明，**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内战了**。”“日本已经决定不向苏联进攻，这种国际局面影响到中国，使内战减少了可能性。我们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实行‘后发制人’。”“最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计划改变了，近日有4个主力师离开了边区周围。”“我们的情况也在改变，军队进行了冬训运动，生产有了成绩，军民关系比较改善了。去年我们进行了时事教育（即阶级教育），团结了内部；兵工生产发展了，**现在已能炼钢**；训练了自卫军，兵力增加了两个旅。”“最近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我们要准备让他们看。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辩证法是从过程中来规定的。我们在去年对国民党实行政治攻势时，主要是强调批评国民党的一面，现在主要是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两方面不能同时强调提出，否则就是形式逻辑。

国民党提出同我党谈判的条件是以皓电为基础，要按比例裁兵，我们提出我军编为4军12个师。我们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现在我们要答应以皓电为基础（不是完全实行皓电），才能重开谈判之门。”

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这是在分别10年之后，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这一次毕竟是饶漱石告状在先，陈毅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心中有些不安，所以，见到毛泽东，表现得毕恭毕敬。毛泽东对他这个样子很不满意，发了脾气，说：

“你这个陈毅，我们从1934年在江西分别，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感动，他要求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说：

“如果你要谈3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很赞成。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饶的这次争论问题，我看还是不提为好，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电报发到中央来，这个电报在我这儿，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马上说：

“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很好。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毛泽东给陈毅讲了许多党史上的问题，逐渐使陈毅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他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3月15日，毛泽东看到陈毅的心情有了进一步地好转，就对他说：

“你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虑，我认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可以打一个结了，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

“这样也好，我照你的意见办。”

于是，陈毅给饶漱石及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起草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情，重旧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障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尽我最大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

陈毅还在电文中表示，自己愿意在“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看了陈毅的电报稿，很高兴，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他写道：

漱石同志并转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是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 寅删

毛泽东将电文交给陈毅看，陈毅自然为毛泽东对他的总结和评价十分感激。毛泽东遂将两电于当日发给华中局和饶漱石。谁知饶漱石接到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后，仍然对陈毅不依不饶。

3月16日，饶漱石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复了一份电报，电文主要内容是：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念。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毅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说，他将另外也给陈毅回一份电报。饶漱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上，尚且没有表现出对陈毅的宽容态度，他给陈毅的电文内容就可想而知了。

此时，对于陈毅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和谭余保也闹起了别扭，起因是他在学习班上重提1937年劝说谭余保率领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而被谭余保用烟袋敲脑壳的事，他还讥笑谭余保说，农民党员要读马列主义。谭余保本来也没有忘记那时候陈毅骂他是“土匪”的事儿，如今见他旧事重提，也不高兴，因此两人又闹了起来，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了。毛泽东得知此事，就把王震召来，笑着说：

“王胡子，请你办件事。”

“什么事？主席。”

王震问。毛泽东说：

“陈毅和谭余保闹矛盾的事你知道吧？”

“好像听说过。”

毛泽东便交代说：

“你同他们两人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王震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上山打了两只野鸡，又亲自下厨房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请陈毅、谭余保赴宴。王震见他俩来了，一边让座，一边解下围裙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可不要把桌子推倒了。”

陈毅、谭余保二人为王震的诚意所感动，互相看了一眼，放声大笑起来。从此二人握手言欢，成为至交。

3月19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惨痛教训：由于若干起义军领袖因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错杀了起义军的功臣李岩，对清军进关掉以轻心，导致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认为郭沫若是在“影射当局。”而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连连击掌叫好：“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还被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区都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供全党学习。

1944年4月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此前，周扬在鲁艺主持编写一套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共分五辑，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高尔基、鲁迅有关文艺的理论。尔后，他为丛书写了一篇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篇（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笔者注）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4月上旬，毛泽东召集中宣部、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政府负责人以及边区5个区的地委书记进行座谈，他说：

“1943年我们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问题还未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有的同志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4月9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回信。

前边已经说到了毛泽东为调解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毛泽东作了不少工作，可饶漱石还是不依不饶。此时陈毅正患感冒，看到了饶漱石发给他的复电，顿时怒火中烧，激愤难平，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开导他说：

“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第二天，毛泽东找来陈毅在他的住处面谈，询问了他的病情，然后又开导他说：

“你现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说：

“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他又问陈毅对《学习和时局》草稿有什么意见。陈毅说：

“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任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

“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陈毅知道毛泽东正忙于修改《学习和时局》的草稿，不便多耽搁，就告辞退出。

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为朱德的母亲举行了追悼会。

朱德的母亲钟老夫人是在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在四川仪陇县马鞍场逝世的。蔡畅曾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钟老夫人不幸逝世的消息。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母钟太夫人传略》。

在朱德母亲的追悼会上，各界人士敬送了花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党校及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谢觉哉、陈云、邓小平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4月12日，陈毅经过一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欲知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能否化解？容后再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让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一方面是借机化解他和饶漱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要让陈毅到中央参加整风运动，受一点教育。毛泽东不让他看华中的告状电报，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以免干扰延安整风运动的大方向。尽管他在3月15日给饶漱石的电报，对陈毅在井冈山时期及红4军“七大”两度取代他前委书记及工作上的错误，做出了宽容的总结和评价，但是在整风运动中，陈毅还是受到不少人的严厉批评。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对那些批评的确是耿耿于怀的，否则他就不会在文革中大闹怀仁堂时说出那些过激的语言了。

另外，毛泽东在1944年2月4日给董必武的电报上写道：“**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后来到了七、八月间，中缅印战区果然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向延安派驻了以戴维·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从而推动了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问题更多的关注。不久，罗斯福9月6日又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其任务之一就是协调国共关系。毛泽东的判断和预言之准确，真是令人震惊！

**第60章**

**“对国民党谈判不要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

**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

**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

**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话说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演讲。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说：“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1942年到1944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

毛泽东的讲演共分3个部分。关于学习问题，他总结说：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

“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做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

毛泽东在讲演的第2部分中说：

“同志们可以看见，1937年7月起至现在止，这7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3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7年的工作的总结。”

在演讲的最后部分，毛泽东说：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指1944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笔者注），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么我们就会胜利。”

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党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周恩来说：

“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10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说：

“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一行离开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谈判。

4月29日晚，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

此前，李鼎铭先生曾将陕西米脂人李健侯所著的《永昌演义》转交给毛泽东阅读。李健侯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从1926年开始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一书，历时多年，6易其稿，终成大作，共计40回34万字。该书描写了他的同乡、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全过程。毛泽东看《永昌演义》后十分高兴，令人将书抄存了一份，便给李鼎铭先生写了这一封信，他写道：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传阅；近日鄙人阅读已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写毕，他吩咐工作人员拿出200元边币，以示对李健侯的奖励，将信及边币一并送给李鼎铭。李鼎铭立即让他的四子将毛泽东的手书及200元边币一并转交给李健侯。李健侯激动不已，即赴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又奖励他两石大米。

建国后，毛泽东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馆当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李健侯不幸于1954年病逝，没有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任务。实属可惜。

且说4月30日晚，毛泽东邀请续范亭和另外几位同志到家里小宴，亲切地询问了续范亭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还给他讲了一些有效的疗养方法。举座叙谈甚欢。

饭后，毛泽东与续范亭等人坐在院子里的丁香树下，一边品茗，一边叙话。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年纪，毛泽东说：

“光绪十九年癸巳生。”

续范亭问是何月何日，毛泽东说：

“旧历11月19日，公历12月26日。”

续范亭的出生时间是旧历10月19日，正好比毛泽东大一个月，他想到去年农历11月19日是毛泽东的50寿辰，而延安各界并没有举行庆祝活动，感到很遗憾，便即席赋诗一首，献给毛泽东，以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诗曰：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和在座的客人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天夜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景久久萦绕在续范亭的脑际，他对毛泽东的学识、人品、才能都很钦佩，便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五百字诗》，还在长序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会见，抒发了他那无比欢欣的感触：

“毛主席身体健康，器宇雄厚，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古人说：‘大智慧亦寿考’，不祝亦必寿考也。**30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

续范亭还把毛泽东看作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他在《赠毛主席》一诗中写道：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他在交际处拿出《赠毛主席》一诗给金城看，并解释说：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好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方针政策。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但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干部、战士、勤务员，还是对普通老百姓，他都平等待人，推心置腹，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所以我说他‘领袖群伦不自高’。毛主席是知识分子，博大精深，满腹经纶。从外表看，他文质彬彬，完全是学者风度，但他实际上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只有毛主席那样的政治、军事谋略家，才能在西安事变时力主释放蒋介石；才能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第2句是‘静如处子动英豪’。第3句‘先生品质难为喻’，的确，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历史上一切伟人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有句名言，当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之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还觉得不够全面。所以这首诗的前面3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句诗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是《咏怀古迹》中的一句，这里面，‘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羽上的一毛，品清质虚而体积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用诸葛亮比喻毛主席，还是不够的，但想不出更恰当的比喻，只好这样了。”

1944年5月4日至11日，林伯渠、王若飞等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明日将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你。

这份意见书是由毛泽东起草的。

5月17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等人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从西安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

毛泽东电示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在《意见》的说明部分写的是：

“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毛泽东在《意见》中提出的“希望政府方面解决”的问题共有20条。关于全国政治方面的有3条：

“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方面的有17条，主要内容是：

允许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平均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

在此期间，董必武自重庆给在桂林的柳亚子寄去一首贺寿诗，内有“诗能报国应长寿”句。柳亚子为此作了一首律诗回赠：《次韵和必武贺寿新诗，分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张曙时、邓颖超诸同志》，诗云：

“誓以心肝酬党国，岂贪姓字上旗常？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

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于5月21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全会的议事日程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会议决定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

5月21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

这次全会后来一直开到1945年4月20日才闭幕，历时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这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在党的历史上、也可能是在世界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

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从1931年初到1943年底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为“七大”的召开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出席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1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任弼时 朱德 周恩来 康生 彭德怀 张闻天 邓发 陈云 博古 李富春 吴玉章 杨尚昆 孔原 陈郁 李维汉

列席会议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有：高岗 彭真 贺龙 林彪 叶剑英 陈毅 刘伯承 聂荣臻 朱瑞 徐向前 谭政

应该出席会议而请病假的有4人：王稼祥 王明 凯丰 关向应

原定出席会议而外出的有2人：林伯渠 董必武

会议根据书记处的提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由会议主席团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向全会作简单的工作报告，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是否还需要，请大家考虑。我觉得不必作详细报告了，因为最近这个时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参加全会的同志也大体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从六大到现在的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呢？我觉得从六大到现在有16年，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这个详细报告也很难作，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准备放到历史总结中去。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报告，我们只准备对七大作政治报告，不另作工作报告，工作的总结也可以在这个报告中提到，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

我今天只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国决议（1936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5月）、洛川会议（1937年8月）、六中全会（1938年9月至11月）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我们在执行这个方针中，对于如何发展自己与团结友军，对于日本、国民党与我党的看法，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与具体政策，是有争论的。我今天讲话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央的政策作辩护。

这里有国民党河南调统室给其中央调统局的一个关于河南战争的报告，是最近时期抗战情况的典型材料之一，请王首道同志宣读一下。这个材料表明，蒋介石的3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这证明抗战中的两个方针带来的不同结果：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战斗力完全瓦解，一击即溃。**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们充分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曾经停止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达5年半之久。**现在日本进攻河南，是因为日本要救死，国民党太不行，而共产党的力量又还没有达到保护汤恩伯的程度。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3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去年我们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使外国人注意共产党的抗战力量。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胡政之访问英、美回国后，请董必武、潘梓年同志吃饭，说他在外国讲中国共产党有前途，他又说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无希望。最近孙科说要辞职，于右任不愿参加十二中全会。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况要有变化。

**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1939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当日军占领江、浙，国民党逃走一空时，我们的同志不敢当县长，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的政策是最独立自主的，美国次之，英国犹豫，在法国、意大利、波兰等问题上，英国都徘徊于两可之间。**蒋介石也是这样，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汤、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为教材教育其军队，这样的军队对日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就不同，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摩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在反摩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摩擦斗争归于缓和，**我们对于3次反共高潮都是如此。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4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000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万的党员和近50万的军队。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我们当时说长征是胜利了，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从1936年至1939年，**我们曾经希望改造国民党，所根据的是张学良进步的先例与国民党丧失了江、浙的地盘。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不过我们并没有亏本**。归根结底，主要是靠了八路军、新四军，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击了58%的日军与90%的伪军。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经过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至1940年。这一阶段的头两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也比较有朝气，国共关系比较好，我们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发展了军队，建立了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学校。**对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但是还是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在1938年受过一次挫折，后来被六中全会纠正了**。在第一阶段，我们队伍中生长了一股骄气，有些同志过于轻视日本，过于相信国民党，自以为万事大吉，骄傲得很，这一点是吃了亏的。

第二阶段是1941年至1942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举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扫荡”，实行“蚕食”政策与“三光”政策，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都缩小了。但是这种困难教育了我们的同志，我们采取了适宜的政策，例如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统一领导、“三三制”、减租减息等，都有成绩，因此我们在敌后站稳了脚。我们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得了经验，度过了困难。这一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这个政策还是从1939年就开始了的，到1941年汪精卫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对国民党差不多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则日趋反动，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发动进攻则是积极的。

第三阶段，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上升了。军队现在有47万人，战斗力提高了；党员发展到90余万；根据地人口，在第一阶段直接、间接负担粮税的近1万万，第二阶段降到不满5千万，1943年又上升到8千多万。各种政策更有进步，特别是整顿三风与发展经济。整风是为着弄通思想，团结全党。**我们党基本上是团结的，但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而在纠正之后又团结了。统一是我党第一个侧面，不统一是第二个侧面，这两个侧面都要看到。历史上的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的残余还是有的。现在还严重存在着带有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这是由于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被分割的农村根据地与我党教育工作的不足而产生的，必须加以克服。经济工作是我们在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的注意。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1927**年我们曾经配合薛岳占领了上海，但是随即受到国民党的袭击。**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六大至七大我们实际上走了根据地路线，现在也必须坚持根据地。在根据地上，我们必须发展经济。1939年陕甘宁边区只有700个工厂工人，1942年即有4000个，今年有了12000个。如果边区有30000个工厂工人，边区工人同边区人口的比例即超过全国工人同全国人口的比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来农村是供给军队粮食和干部的地方，没有我们，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大城市的。

**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七大要选出比过去23年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关于国共谈判，林伯渠同志这次出去，国民党派文武两大员迎接，每天谈4小时，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来我们的估计很低，以为这次不能解决问题，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据林彪去年提的4点来谈判，林老答以根据恩来今年提的5点来谈判，彼方又不赞成，故党中央提出了20条。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4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逐日寇出中国。

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就召集七大的准备工作，通过了《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七大”政治报告；成立了负责起草七大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4个文件的各个委员会，其中以任弼时为召集人，由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康生、彭真、高岗7人组成负责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委员会。

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了《发展工业 打倒日寇》讲话，他说：

“现在无论中国和外国都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区在5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700个产业工人，1942年有了4000个工人，到了今年就有12000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在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到了全部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会大大的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58%的日军、90%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作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延安大学开学。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校，过去有些部分是分开办的，现在合起来了。像周扬同志所讲的我们的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过去办学校办了多年没有搞好，现在有了进步，方针、办法上了轨道，这是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整个工作的进步相联系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入中国国土，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有些人反对共产党，和我们闹别扭，这些人就违背了这个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两条心。我们是一条心，开大会是一条心，开小会也是一条心，公开的、秘密的都是一条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

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整个中国凡是没有沦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据地，大后方是根据地，华北、华中是根据地，广东、海南岛是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创造了抗日的根据地。有人说根据地不好，不应该有根据地，这个话不妥当。没有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出发去打敌人。”

“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敌后是非常艰苦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站住了脚，坚持抗战7年之久。这个残酷的战争经过最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今年我们又向上发展了。中国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如果说大后方这个大根据地一点不救中国，这个话也不妥当。有的人说只有他那个大后方根据地救中国，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不救中国，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你那里是怎样救中国的？你们300万军队只负担日军的42%、伪军的10%，我们47万军队负担却那样重。我们的根据地比较小，但是担子很重，没有任何接济，就靠我们党政军和老百姓结合起来，一齐努力奋斗。这次河南战役，日军十余万，国民党军队约40万，就不挑担子，一听枪响就‘向后转，开步走’。现在许多事情难办，所以要搞一个办法，就是民主，这个办法有的人不赞成。还有一条就是团结，有的人也不搞，他那里发小册子，开大会小会，骂共产党为‘奸党’，八路军为‘奸军’，边区为‘奸区’，很不讲团结。”

“现在边区政府发了指示，要求边区人民的所有家庭，140万人口，35万家，每家有一年余粮。不仅要防备天旱，还要准备反攻。这个目标去年没有达到，要在今后两三年以内实现。我们在延安、在边区做工作，办延大，如果使得35万家农民都有一年余粮，那么我们共产党就了不得。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100棵树，35万家就种3500万棵树。搞他个10年8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外，还有工业，现在开工厂代表大会，提出日用工业品要全面自给。边区工、农、商、学、兵150万人口，一年需要31万匹布，可是我们现在每年只能生产10万匹，还差21万匹。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完全解决衣服的全部自给，根据过去经验，这是有把握的。边区过去的棉花、棉纱、布，都要从外面买，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血向外流。如果我们棉花自己种，棉纱自己纺，布自己织，150万人大家动手，血就不流出去了，我们的经济就更坚实。每年公家和老百姓需要470万斤铁，大部分不能自己生产，又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从外面买，血又要向外流。现在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做到470万斤铁完全自给，自己采矿，自己冶炼，并制造必需的机器和农具。**我们的工业生产有各个种类，主要的是纺织和炼铁这两项。这两项主要的要做到自给，其他各项也都要自给，这是全面自给。”**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件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4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对于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么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10年，就让你劳动10年，你顽固20年，就让你劳动20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作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戴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后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于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后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于审查干部，我们实行9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

今天开学，还有一件事说一下，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同时，你们也要经常去请教，走上门去，也可以打电话。如果哪一天没有来教课，便将他们的军，请他们一定来讲。”

5月2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联合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会议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来，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到各工厂去，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

5月下旬，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还是拒绝接受毛泽东提出的20条谈判意见，并不肯把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政府。

毛泽东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

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

“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屈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结果，国民党方面仍然不接受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他们拟定了《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和由陈布雷起草的《林祖涵来渝事件之应付要点》等秘密文件，企图通过宣传，逐步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

1944年6月5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中说：“第18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张治中、王世杰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进行谈判。

6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城市工作。会后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即后边提到的“**巳微”指示电**）。指示中说：

“**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

“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场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迅速地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宽广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

“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

“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6月12日早上，毛泽东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发来了一份浅红色的请柬。送请柬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希望先生们下午4时就去，为的是在晚餐之前可以和毛主席谈谈。

这个参观团来到延安，说起来也有一段缘由。此前，国民党长期对边区的封锁，反而增强了边区的神秘感，从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探密的欲望。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多次公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也起到了鼓励他们的作用。1944年2月16日，以《纽约时报》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后来国民党以其“亲共”为由，将他驱逐）为首的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到延安访问。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2月23日不得不同意记者们的请求。于是，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3名美国记者和2名英国记者与1名塔斯社苏联记者迅速组成了一个西北参观团。共产党方面立即作出积极反应。3月1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安。

国民党在西北参观团中增派了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大公报》9名中国记者，其中中央社的杨家勇是一个冒牌的记者，其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是一个CC分子，领有特殊使命。国民党还规定了由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记者团的正、副领队和中外记者统一行动的纪律。这正、副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配有“随员”4人，有一个专门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其他的人是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5月17日，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安参观。5月21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在此期间，阎锡山大放厥词，恶毒攻击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

毛泽东看到阎锡山的谈话后，要贺龙转请新军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人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续范亭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他抱病卧床口述，由秘书记录，写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痛斥了“左手提着同志头，右手拿起一等侯”的阎锡山勾结日寇、投敌卖国、压迫人民的罪行。内中还写道：

“我虽不是共产党，但我十分同情并拥护共产党的办法，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我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背叛了三民主义，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结日寇，背叛祖国，压迫山西的人民。”“我这一封信虽然批评你、骂你，但是很公正、很确实的。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朗，我今天并不是想把你骂死，我也不是诸葛亮，当然骂不死你。因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还讲些廉耻，挨了骂以后就羞愧而死，你是个自私自利不顾一切、阴柔奸诈、顽钝无耻成了精的老怪物，当然把你骂不死的。”

续范亭派人将文章送给毛泽东指正。毛泽东读了续范亭的《五千言书》，给他回信说，读了大作“振奋人心”，并称赞这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

毛泽东指示陆定一，将续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5月30日，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临、延长参观访问，后到南泥湾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于6月9日到达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

6月10日晚，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致欢迎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因为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对任何政治派别和信仰，都没有偏见或成见，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

且说6月12日这天下午近4时，中外记者先后登上汽车。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发现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觉得未免不郑重，便要回去穿一双袜子。招待人员告诉他说：

“先生，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赵超构只好上了车。过了延河，车子行驶了10分钟，在中央大礼堂前停下来。大礼堂大门前站着两名着装非常整齐的卫兵。客人们被引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赵超构感觉这个客厅是延安最漂亮的，又宽又长，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摆成丁字形的桌子，可以坐40个人，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鲜花。墙壁上除了马恩列斯4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在两边，一幅是朱德的，另一幅是毛泽东的。

赵超构靠在沙发上，习惯地伸着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延安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过了半支烟的功夫，毛泽东昂然走了进来。只见他身材颀长，穿着一套陈旧的毛呢制服，领扣照例没有扣，露出白色衬衣。他那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宽阔的前额，隆起而端正的鼻梁，显示出一副尊贵的气概。周恩来向他介绍着客人，他握着客人的手，眼睛却盯着介绍人和每一个客人，好像是在极力地记取着对方的姓名。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首先即席致词，他说：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3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3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赵超构感觉，毛泽东虽然是满口的湖南口音，“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在毛泽东致词后，不少记者纷纷提问：

斯坦因问：“毛主席能否谈一谈，林伯渠先生在重庆谈判的情况？”

夏南汗神父问：“上述问题为大家所关心，可否尽先答复？”

斯坦因说：“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请毛主席将1936年国共谈判的情形与今日谈判情形做一比较。”

爱泼斯坦问：“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否引起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对此是否准备发表宣言，阐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谢爽秋问：“为着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赵炳烺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增加问，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其他各党派做些什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准备做什么？”

毛泽东答复说：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3个：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它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结果。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的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1942年11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候，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阶段。北非和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虽然很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共中央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外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现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了决战阶段，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及抗战7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军队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国家，并发展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在中国的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和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的会议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先生们来到边区已经十几天了，今后还要有若干时间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人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以相互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谈话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之久，日色渐渐向晚。毛泽东和客人们一起共进晚餐。

是日晚，毛泽东请客人们到大礼堂观看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演出。毛泽东坐在赵超构的右侧，大概是吃了几杯酒，两颊微微红润。他殷勤地向两边的客人们让茶让烟，像朋友一样和他们谈着话。

演出开始了，演的是京剧《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4场戏。毛泽东自始至终非常有兴味地观看着，不时地发出笑声，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地笑。当看到张飞自夸“俺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他竟是捧腹大笑。他还对身边的赵超构说：  
 “我对于京剧没有研究，很喜欢看看。”

演出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毛泽东微笑着送走了客人。在归途中，有朋友问赵超构，今天有何感受？赵超构回答说：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6月14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全文如下：

今天是第3次联合国日，延安有热烈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不但是一个庆祝大会，又是一个动员民众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的大会。

1942年罗斯福总统发起以每年今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作纪念，今年是第3次了。过去的两年，是世界形势起巨大变化的两年，包括两个巨大的事变。第一个是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是本月6日英、美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使进攻转到了决战阶段，**英勇的盟军正在法境作艰苦的但是胜利的战斗，它的影响将及于全世界。**我们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

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从4月18日开始，日寇相继发动向河南、湖南与广东的进攻，洛阳失陷，长沙岌岌可危，其中最严重的是河南战事。在这个战场上，洛阳失守以前，敌以攻击第一战区蒋鼎文将军及汤恩伯将军统率下的30余万军队为主要目的，以洛阳失陷而告一段落。本月初旬，又开始第二个战役，敌以向部署在灵宝、虢略、官道口线的第8战区胡宗南将军统率下的军队进攻为主要目的。至本日为止所获情况，该线业已不守，敌向潼关前进，显有攻陕目的。据闻西安已下令疏散，西北处在极大的威胁中。中国纪念联合国日，却和欧洲及太平洋处于相反的情况，那边在进攻，这边在退却。

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中国从抗战开始，即形成了两个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敌主力向正面战场进攻，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却向敌后前进，开辟了几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后，敌人开始改变其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逐渐移转其主力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直至今年3月，整整5年半时间，主要的打击力量都落在共产党及敌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时，60万日军及90万伪军的总数中，共产党担负的几达四分之三。然而我们是没有任何接济的，各抗日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分割了的。五年半中，敌对正面战场只作过几次战役性质的作战，都是早去晚归，并无战略的与占领性质的进攻。**国民党统治人士在此期间的政策，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顽固执着，不愿稍变，以迄今日。

但是敌情起了变化，4月18日以后，过去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改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敌人所以出此，全为救死，但是敌人今天并未丧失战斗力。可是我们的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却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军队官兵脱节，军民之间又脱节，作战50余日而退入潼关，西安震动，又在准备退却。

敌后战场以1941及1942两年为最困难时期，在敌人主力重击之下，根据地人口由一万万下落到五千万，军队缩小了，土地也缩小了。但是我们坚持奋斗，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适宜的政策，打退了敌人一切进攻，终于站稳了脚。1943年及今年则举行广泛的进攻，又从敌人魔手下夺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广大的人民，**根据地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八路军、新四军恢复元气，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3大敌后战场合计，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47万，民兵200万，**主要的是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

这本是极好的形势，只要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就能振奋士气，击退敌人进攻。有如此坚强与如此广大的敌后战场存在，只要正面稍作有力的回击，即足退敌。敌人并不多，到目前为止，豫、湘、粤3处进攻部队合计不过十几个师团，难道以倾国之力还不能给它打回去吗？而无如至今还只看到自己的退却。

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站住，能够进攻（虽然现在尚不是战略性的进攻，尚不能攻破大城市），国民党反而不能站住，不能进攻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共产党团结了华北、华中、华南一切敌后战场的各界人民，实行民主，依靠人民，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对于全国则力求团结，无论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反动，总是愿意和它改善关系。国民党不然，就其统治人士来说，今天为止，尚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

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是今天一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此处若失，则威胁四川。**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国民党作好，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莱士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乘此联合国日纪念，谨致我们共产党人的热望。

6月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退，便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华莱士在与蒋介石首次会谈中，告诉蒋介石说：

“罗斯福总统认为，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若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你们可以找一个朋友从中撮合。罗斯福还表示说，他可以充当这个朋友。”

此时的美国，急于利用它的影响促成国共谅解，目的是为了让共产党的力量“充分发挥用途”，一是挽救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二是利用共产党的军队和根据地配合美军对日作战。可是蒋介石不同意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也反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蒋介石要求将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调回美国。而华莱士则一再说明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都希望美国军事观察团早日到延安去。蒋介石被迫允许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去延安。

华莱士回到美国后，向罗斯福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他说：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广大民众普遍不喜欢国民党政府”。华莱士又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取代蒋介石。他提议由魏德迈将军换回史迪威，影响蒋介石采取进步政策。他还说：“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6月28日，毛泽东因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延安一事，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说：

“美国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会议决定：要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同美国人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美军观察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美军观察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的工作报告，值得认真研究。《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方针、战略（统一战线、持久战、山地游击战）和抗战状况（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总结，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本传前面已经把这一段历史交代明白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总结，是令人信服的。包括那些曾经跟着王明跑的人，和不理解山地游击战的人，恐怕不服气都不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无数次地征服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包括敌人在内，他的坦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毛泽东在《报告》中对1945年、对“七大”以后的估计和预言——明年“夺取一些小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后来也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第61章**

**“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以防国民党**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

话说1944年6月30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文中叙述了陕北靖边县城区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先进事迹。

欧阳山在这一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文中记述了合作英雄刘建章的事迹。

1944年7月1日早晨，毛泽东看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报告文学，立即写信给两位作者，他写道：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7月1日早

这天上午，住在延安南门外边区文协的丁玲、欧阳山接到了毛泽东这一封毛体书法甚佳的亲笔信，他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

下午傍晚时分，丁玲和欧阳山来到枣园毛泽东住处，晤谈甚久。毛泽东留他们共进晚餐。席间，他对丁玲的新作仍赞不绝口，他说：

“我一口气读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毛泽东也同样鼓励了欧阳山。饭后，他与丁玲、欧阳山二人又谈了许多合作社方面的问题。

晚9时，宾主尽欢而散，毛泽东送走了两位客人。

后来，毛泽东还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丁玲，他说：

“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

丁玲对于毛泽东的赞扬很清醒，她说：“这是毛泽东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平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许多的文艺工作者。”

以后，毛泽东又读了丁玲的《三日杂记》，文中记述了她深入农村时，到一个叫柳拐子的村长家里与村长的老婆躺在一个炕上聊家常的情景。毛泽东见到丁玲高兴地说：

“哎！丁玲，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聊天了。”

再说7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示中说：

“为了适应我军发展、准备战略反攻及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突然事变的需要，整训现有部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的提高一步，为军队将来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

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

7月1日和2日，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连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看到后，几次传话让萧三停止写他个人。他还亲自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分辩说：

“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党的斗争，二者是不可分的，有重大教育意义。”

毛泽东闻言，便不做声了。自此，萧三成为党内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

7月4日，毛泽东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与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晚上，毛泽东又出席了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这天晚上，毛泽东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他们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及机场标记等。

7月5日，毛泽东为边区党政联席会议起草了“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全文如下：

**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战场后退，全国危极，西北危极。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为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决定本年11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主要的将讨论下列各项问题：

一、团结与民主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今年的参议会应检讨已有好的和不够的经验，反映各方意见，给团结与民主以更充实的内容，使各界人民，男女老少，一齐动员，增加力量。且要以边区的模范推动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从速终止一切分裂与反民主的现象。

二、军事问题。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

三、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多年以来全体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与贫穷现象斗争，这种现象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已经减轻，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丰衣足食的新现象已日渐推广。但是还没有普遍，更因抗战与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2至3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为改变边区秃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5年至10年内每户至少植活100株树。**边区各项工业品年有增加，但还不能自给，特别是**布、铁等项，要办到3年内完全自给**，并且不仅求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好。**在与愚昧斗争的事业上，年来虽有进步，但文盲还未消灭，要用一切有效方法，使男女老少在数年内至少都能认到1000字**。在与疾病斗争的事业上，更须作极大努力，方能**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应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四、选举问题。边区参议会议员应于明年改选。为使人民更能把自己爱戴的人选到参议会去，使这些新的参议员更能反映人民利益与决定抗战建国大计，关于选举条例及选举方式应在今年参议会中提出讨论。

上述4项，为今年参议会必须讨论之主要问题，本联席会议责成各级政府，各参议员及各级参议会，各抗日团体，各劳动英雄，在事先发动热烈地讨论，准备意见，以便届时反映于参议会，作出有利于增强团结抗战与发展边区各项建设之决议，至为至要！

7月初，延安平剧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由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组成的《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120回本的《水浒传》，又请齐燕铭在构思上给予指导，尔后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建议说：

“这个戏要写好3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

7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5师工作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任、陈并告华中局：

午江电悉。

一、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

二、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你们地区来。中央已令华北派部队到密县、登封、淮阳、西华一带活动，望你们由信阳、罗山逐渐向北发展。目前你们有一个团的兵力，并有一批干部组织河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是好的，但须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三、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机会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能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四、中央准备派100个以上高级和中级干部到你们地区工作，并带各种材料给你们，只要交通有办法，在两三个月以后，即可从延安起身。

五、望你们注意侦察河南及湘鄂赣敌友我3方情况，随时电告我们。

　　　　　　　　　　　　　　　 中央

7月14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接受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的采访。在斯坦因眼里，毛泽东是一个“穿着肥大裤子，操着浓重乡音，精力充沛的农民知识分子”。

毛泽东和斯坦因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

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着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共产党及其在抗战中的一些目标。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在院子里捡来一块小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腿下面。他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直到凌晨3点，毛泽东还像下午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当斯坦因站起来离开的时候，他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

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斯坦因在他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斯坦因：你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

毛泽东：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3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这就是1940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党员的观点。那时我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斯：你所考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正是由于在我们作战的区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我们才从一开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军队，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1937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你们在内战时所采取的从地主那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激进政策是否还将实行？

毛：**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仅压迫他们，而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反对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根据中国的条件，这种没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他解决民生问题纲领中的要点之一。

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来重新夺走土地**。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斯：共产党对土地政策的改变，在当时是如何决定的？

毛：这是我们党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没收土地到普遍减租和向地主交租这一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最初是由党的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我们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很明显这一建议是符合群众的愿望的。我们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要求制定政策，并普遍加以实施。

假如整个中国在一切党派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们的减租政策。尽管它还比不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可能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

**实行一切土地逐步转移给耕种者的方法，将会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向工业，同时还要制定出其他的有利于地主、佃农，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办法。**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取决于真正的国内和平和真正的民主的实现。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将来全部的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佃农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战后国民党坚持进攻我们的话，就可能再次爆发内战**。但是，**不管将来国内是和平还是内战，我们宁愿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继续实行目前的减租和交租的政策，因为总的说来这将减少前进和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我想提醒你一下，**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一个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佃农主要作物收获量的37.5%，对次要作物不得收取地租。但是事实证明，国民党不能够、也不愿意将土地法付诸实施，这项法律从未实行过**。因此，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真正实现土地改革，即使它采取的仅是减租的方式。

斯：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何种态度？

毛：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我们要以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3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斯：共产党打算在战后的中国起什么政治作用呢？

毛：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今天，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也反映了许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的意见，也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区域内一切抗日的人们的意见。**共产党愿意并且时刻准备同所有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人密切合作。**这种愿望表现在我们的民主代表制性质的“三三制”中，在一切民选机构中，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席位给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斯：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

毛：**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合作，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假使国民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话。**而且，我们将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履行我们在1937年对国民党许下的4项诺言。

斯：关于4项保证，在重庆时我常听到人们笼统地提到它及其附带的条件，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毛：我们允诺：一、不继续实行我们过去实行的那种土地革命政策；二、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三、把边区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地方民主政府；四、将我们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我们那时说过，我们将履行自己所声明的诺言，但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一、停止内战；二、对日作战；三、推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

斯：对目前的政策，或对你所阐述的中国远期目标，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反对意见？

毛：没有，现在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意见。在以前的时候有过两种偏向。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的反对意见早已毫无影响。陈独秀在1942年死了。另一种是张国焘的偏向，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抗党的正确路线，最后孤身一人离党而去。现在他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这两种偏向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团结，而且没有留下影响团结的痕迹。

斯：你是说你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或被反对过吗？

毛：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么，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在我们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们经常去了解我们哪些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众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

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和党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我们从所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并尽可能广泛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诚心诚意的，那么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进。这种观察实际情况，研究好的和坏的典型例子所用的时间，有时是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虽然用的时间比较多，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

我们有些同志有时可能没有透彻理解我们的政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对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批评和教育。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透彻地研究和分析一个工作中好的例子也是很重要的。就拿**今天的《解放日报》来说吧，有一篇长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它详细讲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如何改正缺点成为一个最好的连队。我们军队的每个连的干部和战士都要阅读、研究和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做法，利用一个连队的好经验对5000个连队进行政策教育。今后你还会看到有关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所学校、一家医院或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类似的文章。

我们再来谈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密切合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地很坚决地改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依然在犯错误，纠纷和误解仍然不断发生，到处还有我们的一些党员在包办一切。因此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在民主的“三三制”之下，使非党人士有实际权力的重要性。在我们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要向所有同志具体讲明，我们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仅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党和非党人士的相互信任，在他们必须通力合作的实际工作中增长了。

斯：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曾在政策上犯过重大的错误？

毛：在所有基本点上，我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基本政策是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只是在把这些基本政策应用于具体情况时，有时才容易出现某种偏向，有“左”的，有右的。然而，这些偏向并不是全党性的，也不是党内某个派别的，而是党内某些人的。从这些错误中，全党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某些时期，我们党内曾有几个人相信共产主义现在就可以在中国实行了**。**但是，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使共产主义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在中国实现，因此，在我们党内不可能有一个主张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小集团存在。**

**国民党断言在我们党内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这是毫无根据的**。国民党自身被派别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设想会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政党，也许这就是这样的谣言在重庆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斯：你是否有曾因处于少数地位而使你对某个问题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

毛：是的。**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但在近些年，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

斯：我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要我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国民党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去问我们的人民吧，去哪儿问都行。**他们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有在最艰难的时期同我们共患难的经验。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国内和平和民主。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我们在抗日战争之后若不能取得国内和平，这可能会影响国际上的和平关系。因为，如果在中国再爆发内战，那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23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在这重要的23年里，其第一个阶段中，从1924年到1927年，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后期，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外国军事顾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进行“剿共”战争。在第3阶段，从1937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打破了国民党“统一行动”的纪律约束，其他外国记者也就将参观团统一行动的纪律置之脑后，先后单独会见了毛泽东。美国记者哈里森·福门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毛泽东家里的情形：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6个普通的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侍卫。毛泽东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闻名遐迩的影剧演员蓝苹。这是一个极为聪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毅然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延安鲁艺学校从事戏剧艺术教育。”

“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大的劳动布服装穿在她那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上衣和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裤子。我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用砖铺地、用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的家具的窑洞。时间已经到了晚上，洞内仅有的几点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倒置茶杯上的蜡烛和几支抽着的烟头上。谈话期间总有几个儿童跑进跑出，这些儿童站下来盯了我几秒钟，然后剥一块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泽东好像根本不在乎她们的存在。”

哈里森·福门所说的这几个儿童，就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叶子龙的两个女儿。

7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

曾王林（王林，指王作尧、林平。林平，即尹林平，下同）同志并告东江纵队全体指战员，冯白驹同志并告海南岛人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

自广州沦陷，迄今6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3大战场之一**。

抗战进入了第8年度，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空前有利。

我八路军、新四军7年来不仅坚持和巩固了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和团结了敌后8600余万的人民和210万的民兵并拥有47万的正规军，克服了1941及1942两年最困难时期，而且一年来在地区和人口上均有极大的发展，冀东我军已挺进至热河、多伦、赤峰及辽宁之锦州一线。一年来党的十大政策在敌后各根据地获得伟大的成效，使全体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为着坚持根据地和准备对日反攻上空前的团结起来了。

总之，不论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中国敌后战场都是胜利的，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因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继续作战的胜利，一旦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实行对日反攻时，则我华南根据地，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国部队以直接的配合，并可能获得他们一部分帮助，为着迎接新的伟大任务，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充分准备。为此，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与强固的根据地。

为使我们能及时了解你们的斗争情形，望随时将敌伪友及我部队根据地情形电告。

关于冯白驹同志领导下之琼崖抗日部队，因交通中断，此间已无法联络，望你们东江纵队多方设法派人赴该岛与该部取得联系，并建立电台通讯，使华南两大根据地有机的配合起来，并力求与中央取得电讯联络。此电请曾王林派人转送海南岛。

　　 中共中央军委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他写道：

各同志：

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蒋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40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4个师团，蒋军近40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有10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的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缴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胡宗南已调动10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3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3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4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18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仅承认10个师即10万人的名义，其余37万军队、200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同志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3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的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

后来在7月19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发给了李先念和中共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

此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卫生状况也始终挂在心上。他经常从边区政府工作汇报和同农民的交往中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逐渐了解到边区人民习惯喝生水，生了病不去找医生，而是去找巫神。许多人耽误了医治的最佳时机，最终被巫师折磨而死。他还了解到，边区妇女生孩子还用旧的接生法，不讲究卫生，造成婴儿大量夭折，成活率仅有40%。有的妇女一辈子生十几个孩子，仅有一两个成活下来。成人的死亡率也非常高。

有一天，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说有要事相商。张汉武以为一定是关于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事，于是一路小跑来到毛泽东住处，见面就问：

“主席，有什么紧急任务？”

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问道：

“你知不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为什么不生娃子？”

张汉武被问得瞠目结舌，他说：

“不知道。”

毛泽东马上把脸一沉，严肃地说：

**“市委书记连人民群众不生娃子的大事都不关心，算不上是人民的好公仆。”**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是不是水有问题呢？请中央医院的同志，去把水化验一下，好不好？”

张汉武说：

“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情人家中央医院不干。”

毛泽东生气地说：

“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人民群众的疾苦决非小事。我马上打电话请中央医院派人去化验，请你带路，并将化验结果告诉我。”

几天后，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负责人来了，说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要他们去侯家沟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那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水进行了处理，帮助群众治病。

后来在10个月后，侯家沟那两个村子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毛泽东得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

再说7月17日，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了。

此前，毛泽东还曾指示边区和中央各医务机关，要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这卫生展览会大门口挂有一条横幅，上面是毛泽东为展览会手书的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展览会场上还挂着阿洛夫大夫的画像和白求恩大夫的遗像。

安德烈·阿洛夫是苏联医生，1942年5月来到延安。作为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阿洛夫总结了一套火线抢救、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的野战医术，为边区培养了一批野战外科人才，获得陕甘宁边区“模范医务工作者”称号，《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他的先进事迹。

这次展览会上的展品有：延安市和延安县人口出生及因病死亡人数统计表；有反巫神斗争、防疫卫生、妇婴卫生、营养以及各医务机关为群众看病治病情况统计表；还有边区自制的药品、器械等。整个展览图文并茂，用形象生动的方法说明疾病、迷信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等前往观看，徐特立整整看了一下午还没看够，第二天又接着去看。

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他首先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问题上的态度，他说：

“我们有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回顾了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演变，指出造成目前两党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他说：

“国民党的根本政策必须修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它必须采取团结人民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它愿意援助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团结和民主。”“自然，委员长是公认的中国主席。我们一直坚守诺言，并且还要坚守下去。第一，不推翻国民党。第二，不没收土地。第三，我们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第四，我们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国民军的一部分。”

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指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他在电文中说：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400万，华北有150万，绥远有22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7月22日这一天，一架满载美国外交官和士兵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抵达延安。

毛泽东乘坐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及相互关系说来话长。早在1938年，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卡尔逊对边区的两次访问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同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的接触，在美国方面来说，只限于对共产党一般地了解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打算。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美国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开向国民党表示，“美国政府决不接受在中国以‘战争对付共产党’的政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愿在各种场合与美国等盟国进行诚恳坦白的合作。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向美国驻华官员发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延安的邀请。1942年和1943年，以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驻华美国官员，在美驻华大使高斯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支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并给中国共产党以有限的军事援助的建议。由于美国政府那时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依靠国民党进行对日作战，企图通过全力扶持蒋介石政府，以保证在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所以美国驻华官员的建议未被采纳。1943年开罗会议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一是，要求蒋介石“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以避免战后内战的发生。美国开始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从中调停国共关系，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

开罗会议后不久，约翰·戴维斯在给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的报告中，再次提请白宫加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步伐。他说：“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团到共产党中国去，在政治上争取中共，削弱中国依附俄国的趋势，使美国能够在战时和战后适应中国所能出现的改组。”戴维斯的建议，白宫马上有了反映。1944年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派一个美军观察团前往“山西”和“陕西”观察军事的问题。蒋介石回电愿意“提供方便”，但又提出考察应限于国统区内。罗斯福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应在不损害美蒋现存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由此，美国同共产党正式接触的问题又被搁置。1944年春、夏，国民党战场出现的严重军事危机，最终促成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让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7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部署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

一、华中局真电悉。

二、北方局已决定由太岳派2个团渡河赴豫西工作。冀鲁豫分局已派一个营加强睢杞太（指睢县、杞县、太康——笔者注）阵地，四军5师抽7个连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这是我党向河南敌后地区发展的初期部署。同时华中局提议在4师抽5个团兵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建立阵地，打通与睢杞太的联系，并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之地区。

三、4师西进部队应配置百名以上地方干部统归雪枫、芝圃率领，加以集训，然后向西开进。

四、四军3师派一部进入淮北地区。

五、鲁南军区可接收运河支队地区，以便4师向西发展；同时冀鲁豫6分区应相机派队打开微山湖西岸局面，以策应4师在南面的发展。

六、中央正在准备派一批干部分发到河南及湘鄂等地工作，最早要到冬初才能动身，各地不要等待，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政策问题详另电。

　（此电由华中转5师）

　 中央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林平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转军政委与临委：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1、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将来此项武装在名义上不一定与东江支队联系，与余汉谋部亦应避免摩擦，以便自己发展**。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总此诸事统应由军政委会讨论施行，并统一其指挥。

2、**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之方针勿变**，惟临委可斟酌实情抽调一部分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

3、你处仍应不断设法派人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可能亦应派人至广州湾附近发展武装抗日斗争。

4、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

5、你们与潮梅闽西南最近有无联系，潮、汕附近有无发展游击战争可能，望告。

　　 中央 午有

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布置湘粤两省工作和桂林疏散给董必武的指示，他写道：

董：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因此布置湘粤两省敌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属必要。

1、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即白毛）秘密转回湘南布置敌后各县的人民武装斗争，但**在敌未到或只经过而无久占意图的地区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至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党员，仍应坚守原来隐蔽待机方针不变，周、谢等动身前应训练一两星期，请若飞亦参加此训练。

2、李应吉如由衡阳撤回，仍宜深入商业，不参加秘密工作。

3、孙仁如能由川东调出，最好派回，因他极熟习湘中情形。

4、东江由此间直接电其沿粤汉路向北谋发展。

5、**广州湾以北最空虚，该处几无国军，望设法通知该处同志一方谋武装发展，另方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

6、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对叶、廖、柳（指叶挺、廖承志、柳亚子——笔者注）3家宜多接济，以便其能早日移动。**如桂林危，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

　　 中央 午有

7月26日晚，中共以八路军总部名义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举行宴会。

毛泽东与坐在他身边的谢伟思亲切交谈，对谢伟思参加观察组表示高兴，说他从周恩来和董必武那里知道谢伟思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朋友。他还问谢伟思：

“**美国政府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谢伟思回答说：

“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

毛泽东解释说：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刻。**”

谢伟思表示可以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上级，他又不失时机地说：

“我有许多问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探讨，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

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说：

“等我安顿完以后，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交换意见的。”

谢伟思生长在中国四川成都，并长期在中国工作，且对共产党抱有友好的态度。毛泽东对他很感兴趣。毛泽东将谢伟思的情况告诉了陈毅，要他也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7月28日，毛泽东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等，请他们答复10项重大问题：

先念、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林枫同志：

下列问题，请予电复：

一、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有些什么？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10%至20%，是否不至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国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以上10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毛泽东 午俭

7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觉哉同志：

《明季南北略》及其它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到，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它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7月间的一天，毛泽东召见王震，交给他一个任务，让359旅派一个团长率领一个加强营，护送干部团经鄂豫边新四军5师根据地，到广东抗日游击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王震回到部队找几个团长商议此事，大家都感到这次护送干部要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长途行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王震见他们为难，便又找到毛泽东，主动请缨，他要亲自率领加强营护送干部团。毛泽东说：

“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党中央研究一下，我们再谈。”

隔了一天，毛泽东把王震找去谈话，他说：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晋冀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5师抽7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4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四是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

毛泽东还说：

“359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1梯队先走，等你们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2梯队再继续南下。”

毛泽东和王震谈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359旅一部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准备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朗明获得这些消息后，欣喜万分，远离故土几年了，他是多么希望回到家乡看看乡亲们。许多从湖南来的人和他一样，也纷纷要求跟随359旅南下。毛朗明打定主意，就去枣园和毛泽东道别。

这是一个星期天，毛朗明从中央党校步行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一见毛朗明，便高兴地把他迎进屋里。

“主席，我想回湖南去。”

毛朗明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在延安不习惯？”

毛朗明说：

“习惯。”

“是不是想家了？”

毛朗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毛泽东接着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毛朗明说：

“随王震司令员的第一梯队南下。”

毛泽东想了想，点头说：

“可以。”

正说着，朱德、康克清夫妇来了，毛泽东起身向他们介绍说：

“这是我的本家，从韶山来的，叫毛朗明，现在中央党校学习。”

朱德立即走过去和毛朗明握手。毛泽东说：

“他要跟359旅回湖南去。”

“那好啊！”

朱德一口四川话，和蔼可亲。这时有人进来叫毛泽东接电话，毛泽东向朱德打了招呼，就去了隔壁办公室。

“回湖南好！”朱德和气地对毛朗明说：“这次情况比以前大不相同，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朗明觉得自己不便讲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朱德接着说：

“这次回去，困难还是很多的。战争是艰苦的，要取得胜利，还很不容易，要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不过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多了，斗争的经验也多了。只是南方的力量还单薄了一点。”

朱德看着毛朗明一直不做声，以为他可能是害怕困难了，便改口说：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中午，毛泽东留毛朗明吃午饭，饭菜很简单，也没有什么荤菜。

后来，正当毛朗明准备南下时，中央组织部帅孟奇找他谈话说，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他是湖南派来的代表，要他暂不南下，等参加了“七大”以后再说。这样，毛朗明就又继续留在了延安。

再说在此时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上，最吸引人的内容，一是妇婴卫生，二是反巫神，三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和一只苍蝇。

1944年8月1日，天上下着小雨，观看的人仍然多达3000多人。白家坪一位姓殷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冒雨前来参观，她看了妇婴卫生部分，听了讲解员的解说，激动地说：

“我活了一辈子，生了13个娃，只活了两个。要是现在的话，我那13个娃都可以长大了。”

殷老太回去以后，立刻拉着毛驴赶到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接女儿回来看展览，她对招待员说：

“这是我女娃，再穷么，这会儿我也要送她去医院接生。”

在反巫神部分，摆着三山刀、表旗、神剑、铃子、麻鞭、神牌位等等什物。几位改邪归正的巫神正在现身说法。一位老巫师用粗犷的声音不停地向人们说着：

“我是柳林区的一个老神官，以前骗过人家不少东西和钱。我劝你们不要再迷信鬼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不信，你们看。”

老巫师说罢，马上表演起来。许多观众后来都把栓在腰里辟邪的红布条扯下扔了。

展览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防疫部门显微镜下的细菌。有些村里传说着这样的故事：展览会里关着一只绿苍蝇，拳头那么大，会说人话，全身长着毛毛，可厉害了，它飞到哪搭，哪搭就死人。许多人专为看这只苍蝇赶到展览会，拳头大的苍蝇没看到，却看到了显微镜下苍蝇身上那些到处乱动的细菌和水中游动的微生虫。一些人喊了起来：

“苍蝇最可怕！”

一些人则说：

“以后再也不敢喝生水了！”

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参观团的爱泼斯坦、福尔曼等人，也参观了展览，目睹了当地的群众卫生运动，他们感慨地说：

“这样的展览会，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未见过！这样的展览会，容易为群众接受。”

后来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一行东渡黄河，在8月13日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采访，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晋西北前线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后，于10月2日离开晋绥根据地返回延安。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和晋绥前线访问期间，记者们先后写出了数以百计篇的电讯和通讯，报道了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真实情况，有的还把这种情形和国民党战场及国统区的真相对比，使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错误政策对抗战的危害，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也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有的记者还写出了系统介绍边区及晋绥前线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福尔曼在1945年出版了《北行漫记》（原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中国记者赵超构在重庆《新民报》上连续发表的客观报道，也受到国民党统治区读者的欢迎，后来结集为《延安一月》出版。

欲知陕甘宁边区还有哪些新鲜事？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7月14日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的谈话，值得认真一读。这是一篇绝妙的、即席表述式的访谈录，堪称中共在抗战末期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宣言。《三国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从斯坦因的访谈录中可以看出，斯世之英雄，毛泽东当之无愧也！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的确是胸藏万壑。同时，他在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机敏、睿智、坦诚和幽默，也无不凸现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风范。

**第62章**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

**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

**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

**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

话说1944年8月3日，毛泽东以他和刘少奇、陈毅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在上海、杭州周围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和组织水手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华中局：

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毛、刘、陈 未江

8月7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

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由美军中缅作战司令部和驻华使馆的军官、专家18人组成，组长由史迪威将军的顾问戴维·包瑞德上校担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雷蒙特·卢登和约翰·谢伟思担任政治顾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军观察组，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充分的重视。毛泽东明确指示有关方面说：

“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

8月10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在回忆中说：

“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足之处。”

参加会见的谢伟思对陈毅这位老乡发生了兴趣，几天之后，他便登门拜访了陈毅，二人谈了3个小时。陈毅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

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绝对实行反攻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在盟军联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伟思说：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的。

陈毅说：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就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伟思问：有把握吗？

陈毅说：有的。

谢伟思在听取了陈毅举出的各种理由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塌台呢？

陈毅说：我们是以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们党有力量打破逆流！

谢伟思说：我一定到华中去看一看，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在这次谈话中，谢伟思约请陈毅把《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给他。

随后，包瑞德上校也提请陈毅尽快把他与谢伟思谈话中约定的两个文件，即《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

8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他扼要介绍了国共双方自5月份以来谈判的经过。他说，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无理态度，在谈判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8月14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我认为通过少量的弹药、自动武器、大炮和通讯器材援助他们，将会发生直接的效果。如果中共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而我们不给，我们也许将失掉更多的东西。”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毛泽东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战友们”3个字，并强调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

社论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成是我们在国际上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指示的政策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地让步。第二，对美军人员给予“热情而适度的接待”。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8月21日，陈毅写好《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又给包瑞德写了一封信，一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材料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正，并在《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加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1940年12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他们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毛泽东改毕，当天就派人又送给了陈毅。陈毅看到毛泽东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陈毅同志：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在《苏北事件》第6页所称1929年的均是1940年之误，均已改正，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敬礼！

毛泽东 8月21日

8月22日，毛泽东让陈毅起草一份关于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陈毅起草后，毛泽东审阅作了修改。他又写信给陈毅，谈了几点意见：

“中央整训指示中有用兵一项，今年当然不能强调，应以练兵为主，但应提及。整训指示又规定一年整训主要靠今冬完成，因不但明春春耕到来后练不成，且恐时局变动得快，故团级以上干部讨论练兵办法不宜过久，去冬边区只用5天讨论5天下操，即完成了练兵动员。又高级训练班时间亦不宜太长，以便应付时局。”

之后，这封指示电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的名义发给饶漱石、张宗逊、赖传珠：

饶、张、赖：

14日电悉。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4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10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4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4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5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评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4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材，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材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训练班。关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以上提议，请你们按实况实施之。

　　 毛 刘 陈 未养

8月23日，毛泽东约见谢伟思，二人谈话持续了6个小时。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关系问题，他说：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反共、反民主，压迫人民；在经济上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假如让这个国家在目前领导下听任自流下去，看来不可避免就会发生一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我们懂得，对中国来说，它将意味着常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蒙受影响。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怕内战。我们憎恶内战。我们不愿发动内战。我们愿全力避免它。”

毛泽东谈到了美国在防止内战问题上的作用，他说：

“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民的问题，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希望美国政府在防止中国内战方面起积极作用：第一，运用美国的影响，促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关于召开由各党派、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的临时国民大会的建议，以加快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第二，美国应承认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积极的抗日军队，承认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主中的影响。为了确保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国武装来打内战，美国应当把它的援华武器，划分给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美国可以运用援华物资及其它方式，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使得国民党不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最后谈到美国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他说：

“**不仅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会和美国有很好的合作，在战后，中国的工业化也需要同美国合作。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谢伟思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详细记录。

8月29日，谢伟思把他所写的报告交由驻华大使转呈华盛顿。他在报告中说：

照现在这样援助“只会助长目前国民党不民主的趋势。当援助能帮助国民党延续不稳定的政权时，国民党一直拒绝改革，它甚至会助长有法西斯思想的国民党领导人去发动一场内战。这场内战不仅会给中国及战后世界在这个地区的和平带来灾难，而且会给我们在这个地区平时的利益带来灾难。”

8月31日，毛泽东给博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博古同志：

此文（指《解放日报》社论草稿《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笔者注）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日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3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1944年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据《陈云年谱（1905—1995）》记载：“会议讨论关于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派部队南下、开展满洲工作和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问题。”

会议确定“联合政府”为党的主张，并决定向国民党提出；同时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

关于“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周恩来认为“明年我们可组织”。

9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林、董、王：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其进行办法为：

一、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二、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即使不得通过或改变性质地通过，我仍可向国内外宣传，你们估计此次参政会能否提出此项提案，望即告。

三、龙与华（指龙云与华岗——笔者注）商定的5条，可用，依其提议可由5方面代表商谈。我党此项主张如同意，可从各方面进行推动，以代替攻守同盟之请，因为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四、下届参政会如扩大名额，我们提议重新加入救国会（如沈陶张史等）（指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史良——笔者注），并增加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如愿增加中共名额，望先商定数目再商人选。

五、延安及敌后待你们致张王信稿到后，再定发表办法。

中央 申支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山东分局并转胶东区党委：

一、**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责成山东分局与胶东区党委，各组织一满洲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之力量，来开展满洲工作。

二、两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胶东的电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央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晋察冀分局：

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己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决定：

一、分局、冀中区党委和冀热区党委，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二、3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翼热边翼中的电可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进行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央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及5师：

一、你们接到巳微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后，对该项工作之具体布署及进行情况如何，望即电告。

二、**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准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上述干部决定后望即电告。

三、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

四、各地城市工作之进行情形及其经验教训和你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新的问题，望随时报告中央城市工作部。

（请军部转1、2、3、4、7师及浙东）

中央 9月4日

9月5日，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坍塌而牺牲。有人觉得，一个普通警卫员死了，不必惊动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得知了张思德在安塞牺牲的消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张思德同志职务虽然不高，但他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像这样的同志，不管职务高低，都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表示对他们的纪念。”

他还指示说，准备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并要亲自致悼词。

9月8日下午2点多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口的操场上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警卫团全体指战员和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分别列队在操场上。

会场前面的土台子上搭着布棚，布棚正中挂着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党旗下面是张思德的遗像。台前悬一条横额，上书“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土台周围放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圈，正中间放的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着“永垂不朽”的花圈。

会场上一派肃穆的气氛，毛泽东缓缓走来了。他穿着长征时的那件青色粗布夹袄，衣袖上和裤腿上补了好几个补丁，已经褪色的八角帽上，还依稀可以看到五星的痕迹。他一句话也不说，微微低着头走向主席台，慢慢地登上台子，静静地站着。

追悼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唱起了庄重的《国际歌》。在与会者向烈士默哀后，**毛泽东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那一个由他自己题名的花圈，敬献在张思德的遗像前，面对着烈士的遗容，瞻仰沉默了许久。**台下很多同张思德一道长征过来的人都流下泪来，与张思德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胡德山竟哭出声来。

政治处张主任报告了张思德同志的生平简历和牺牲经过。毛泽东慢慢地走到台前，开始致悼词，他的语调沉痛而激动。他说：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的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这篇悼词便是《毛泽东选集》中非常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今天读来还是大有益处。这铿锵的语言，令人反思，警醒，伟大而光辉的思想，催人奋进！故将全篇录入本传，以启迪后世。

9月11日，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率部在河南夏邑地区与顽军作战，全歼顽军一个支队，俘获其支队司令李光明等1000余人。战斗刚刚结束，彭雪枫却被一颗流弹击中，不幸为国捐躯，年仅37岁。

彭雪枫在军中享有“德才兼备，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盛誉。

9月15日，共产党方面代表林伯渠根据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9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时作了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一看6月5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10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10万人，其余37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4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9月21日，毛泽东撰写了《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一文，全文如下：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2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12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7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6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120里。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滨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上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的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份，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8、9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8月下半月与9月上半月中，连克5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郓城战役，解放村镇600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16里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16里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3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鄂城、长兴4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万五千方里，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作“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者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易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9月22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查干部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刘少奇又提出，还可以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应了。

9月24日，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名流董必武、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王昆仑、邓初民、黄炎培、张申府、胡子婴、李璜、左舜生等500余人，在重庆集会，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

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回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他写道：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9月10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5个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地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9月10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9月10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4项，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5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6月4日（于6月5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所提正式12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8条，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作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作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4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9月10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祖涵

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用推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汇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春（即富阳）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

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需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16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6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6师军政人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6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法，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中央 申感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9月8日为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明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思想正是他几十年革命光辉实践的真实写照。他在悼词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样的警句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今人竖起了一面照妖镜，让那些“**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服务的人，**无所遁其形！

**第63章**

“**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

**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

**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

话说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社论稿时，在上面加写和改写了几段话：

“**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1941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作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

“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时至今日，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师其故智，天天在强调其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而这所谓‘统一’者，不是别的，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谁也明白，这样的‘统一’，也并非‘统一’到蒋介石手里，而是实实在在地‘统一’到日本人手里。**因为五分之四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来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国国土，不就‘统一’到了日本人手里吗？真是替日本人帮忙的好计策！天皇陛下之传令嘉奖是毫无疑义的了。**”

“但是中国人民是决不准许这样的叛卖阴谋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决不准许这样的阴谋。单拿新四军来说吧，它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把它消灭，要把它赶走，日本人办不到，任何什么反动派也是办不到的。”

10月1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请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心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他又反复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做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

10月11日这一天，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边区文教大会。会场两边贴着两幅巨大的标语，一边写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武装部队与文化部队相结合。另一边写的是：文教工作与生产结合起来。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450余人，其中有工、农、兵中的文教工作者；有学者、诗人和热心文化建设的士绅、国际友人等。

毛泽东对文教大会非常重视，在会议筹备过程中曾多次过问。

10月中旬的一天，陈先瑞接到一个通知，说是要他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陈先瑞立即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毛泽东住处，一进门，就看到385旅770团团长张才千也来了。毛泽东向陈先瑞招招手，让他坐下，然后笑着对二人说：

“你们不是早就想到前方去吗？这次就答应你们的要求。中央决定，尽快在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决心把警1旅2团（陈先瑞带过的部队——笔者注）和770团放出去。这两个团都是红军老部队，在西北搞了七八年，这回要老虎出山显显威风了。”

接着，毛泽东向陈先瑞、张才千分析了河南的形势。他说，1944年4月以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会战，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在河南的40万大军不战而逃，使郑州、洛阳、许昌、南阳等30余座城镇沦入敌手。为了驱逐日军，开辟中原根据地，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联系起来，中央在7月间发出了向河南进军的命令。9月，由太行军区抽调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第1支队，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进入日军占领的箕山、嵩山地区；尔后，又从太岳军区抽调两个团进入陇海路、新安、渑池地区。中原李先念部也派部队向西进入嵖岈山地区。这次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组成河南军区，进军豫西，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还强调说：

“河南地处中原，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关系到能否把华中、华北和陕北联系起来的战略全局。因此，你们肩负的任务很重要。你们这两个团改编为两个支队，你们各率一支，迅速进入伊川、登封、汝阳地区，战略目标是三点（开封、郑州、洛阳）一线（陇海线）。这两个支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红军骨干多，部队素质好，战斗力强。到达预定地区后，要迅速扩大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站稳脚跟。脚跟站稳了，就有了开展工作的根基，就能打开局面。”

陈先瑞和张才千进入河南就要归王树声、戴季英为首的河南军区领导，毛泽东担心他俩对曾经在陕北犯过错误的戴季英信心不足，又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说：

“有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中央的方针还是团结教育他们，给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改正的机会。犯错误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中央相信他们会改正错误的。你们去后，要尊重、服从河南军区的领导，主动工作，注意团结，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好这一任务。”

毛泽东还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后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使中央及时了解和掌握河南的斗争情况。

10月1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他写道：

北局、平原、太岳：

皮徐（指皮定均、徐子荣——笔者注）申陷电，你们酉冬转来于酉文阅悉。

甲、已决定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韩钧等率河南干部约百人及770团、警2团约千六百人，11月初由延起程，照来电经太岳往河南。

乙、太岳派两个团入豫西，我们意见：A、铁道与伊河间之河水深，两岸淤泥亦深，不易随便徒涉，如遇敌顽进攻，不大便于机动，在冻冰前似不宜用大兵，在不妨害中条山发展与巩固情形下，派政治军事较强的干部，率一个小团进入该区，与地方党密切联系，巩固已有同情武装，先求站稳脚，部队小给养亦易筹。B、太岳区目前极应巩固中条山已得阵地，积极发展汾河以东（三角地区）沁河以西广大地区，特别豫北之沁、济、温、孟4县，山西之垣、平、芮3县，以及黄河与铁道间，估计有被敌控制之地区应广泛利用合法形式及建立隐蔽根据地，使华北与中原密切衔接。

丙、太行、太岳、平原区，今冬整军期间，尽可能充实小团，并每区补充两个大团（共60团），根据目前发展情形，似有必要与可能。

丁、解决河南新区军队给养问题，在根据地未具规模以前，可采取以下临时过渡办法：A、按每亩产量抽5%至7%，未减租以前，由地主出，减租以后，农民确实得到减租利益时，东佃各半。B、或者照国党田赋征实办法，每两粮银应征公粮若干，但无论那项办法，**均须比以前国党及现在敌伪统治民众的负担要轻与合理些，并保障每年只征一次，请当地士绅及富、中、贫农代表商讨上述办法或其他更适当的办法。总之力求与地主不要过早搞破脸，使自己站稳脚，如与地主过早搞破了脸，基本群众又未发动起来，将增加我们许多困难**。C、在根据地建立有初步头绪时，即应筹办征收出入口税，以保障根据地物资与帮助部分解决财政问题。其征税原则：1、对敌利大，对我利小，则抽重税甚至禁止出入口。2、对敌利小，对我利大，则抽轻税，甚至免税。3、对敌我均有利，则按我需要缓急，定出适当税率。D、为避免混乱保障安定社会秩序，便利于自己站稳脚，须**禁止乱打汉奸乱罚款，**军队须由最高司令部统一发给临时粮票，给粮户作为收据，对部队内部须按人数给以应得粮票，以免重复过去浪费。以上意见提供你们及皮徐同志参考，并望将你们意见电告。（北局转皮徐）。

　　 中央 酉寒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问题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任、陈：

申艳电悉。

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皮定均（司令）、徐子荣（政委）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申陷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疾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分向各地活动中。尚有后续部队，正从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阳、伊川、宜阳一带已有地方党员所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活动，群众对我军进入河南极为欢迎。敌情与顽情亦不十分严重。

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王、戴、刘、陈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起身。中央派到5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起身。

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军委 酉寒

毛泽东在这个电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民解放军”这一称号。此后不久，警1旅2团改称为豫西第3支队（又称第3分区），由陈先瑞任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地委书记。陈先瑞率3支队进入豫西后，很快在登封、汝阳一带站稳了脚跟；不久又进军伏牛山，在伏牛山东南地区，成立了鲁山、南召两个县级政权和5个区的区政府，使两万多人口获得解放；并与占据南召的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达成了双方之间停火、互不侵犯、互通情况的协定。

10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四师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并转淮北区党委及韦、吴（指韦国清、吴芝圃——笔者注）：

一、4师西进部队已获得极大战果，目前应以巩固已占地区为主要任务，应即迅速建立与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吴信元及其他投诚的部队与地方发展的部队为基础建立若干独立团，除派干部外并可由主力部队抽出若干连编入地方部队，使其担负地方守备任务，以便主力能迅速进行新的任务。**

二、**4师在豫皖苏时代的武装政策中有一些是错误的，如并吞过多的部队，处理胡晓初部队的失当等。**应切实研究过去的经验，**凡来投我之部队其领袖及其干部愿意进步者，均应切实忍耐的帮助其进步，不得随便撤换及调动。我们派去帮助工作的干部，应诚恳在其领袖的领导下工作，不得有盛气逼人，锋芒毕露的态度。**

三、路西应即成立地委，由区党委配备得力干部，应利用秋收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并立即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等，以便迅速组织与团结人民，巩固我军的社会地位。

四、如果能利用伪军关系在商丘、宁陵、柘城之间派一个小部队去活动，建立一处跳板以与水东打通联系，那是有战略作用的。如有可能，应设法求其实现。

五、**最近顽军一部已由涡河北进寻求你们作战，应准备集中必要兵力将其击破，并歼灭之。**

　　 中央

10月22日，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记者西奥多·怀特（又叫白修德）来到了延安，他通过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发出了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行们相似的报道，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人们难得一见的更有说服力的关于此次延安之行的珍贵历史资料，本传不忍舍弃，特摘录于此：

“1944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在重庆泥泞的跑道上，我挥手送别了史迪威。我知道我必须赶紧行动起来了。史迪威一走，短则一周，多则10天，新的美国驻华指挥官就将抵达中国了。美国大使馆正处于混乱中，毫无实权。国民党政府因为一时蛮勇逼走了史迪威，还在震惊中，不会马上处罚我，或禁止我自由行动，但很快，等他们回过神来，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夜，美军总部还在史迪威下属的掌控中，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明天会有一架美国货运飞机起飞，飞往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如果我去拜托他们，他们还能想法子把我送上飞机。第二天下午，小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已登上了去延安的飞机。”

“我和戴维斯是在那个周日下午搭乘同一班飞机前往延安的。我此行的目的是找新闻。而他的目的，他并没有告诉我；尽管我们私交甚笃，但在那些年，像戴维斯这样的外交官是不能将秘密告知我这样的媒体朋友的；我也不会硬逼他。我们在延安机场分别，他将入住美国军事观察团‘迪克西使团’的参谋处，我则会住在一英里外的民用招待所。延安是座山城，到今天，已经成为传奇之地。当时，他在延安只待两周，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目的，但其间经常碰面，因为彼此欣赏，碰面的气氛总是欢乐的；不过，直到多年后，所有文件公开出版，他写下精彩绝伦的回忆录《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我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或者说才完全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可描述当时的情况：‘天高皇帝远。’那一周，天确实高，但并没有皇帝。约翰·戴维斯没有上级，因为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重庆，并没有人负责统辖美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严格来说，戴维斯是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官员，国务院派他来华是为了给军事指挥官史迪威提供政治建议。只是在他抵达的那个周末，史迪威已经走了，美国军事指挥部已经没了。因此，戴维斯开始自己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抗日战争中能派上用场吗？他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

戴维斯在刚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忙碌起来了，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了一场深夜会议。如果我们的部队要乘飞机在中国沿海降落，共产党会有能力提供支援、切断铁路线、动员农民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但提问当时的局势并不明朗。共产党已完全掌握了蒋介石与美国因史迪威关系破裂之事，对国民党军队的堕落与崩溃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正在准备组建一个独立政府。所有伟大的中共军事领袖都在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隔16年后的第一次！他们有的已经回到延安，有的正在从开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击的地区徒步返回。”

“当时，戴维斯的任务是探索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即联盟的可能性！戴维斯出现的时机再好不过。我也一样。在这几周里，我们将见证一场革命从胚胎到成型的过程；我是当时唯一的新闻记者，加上我与周恩来是旧识，与叶剑英相熟，又机缘巧合地与约翰·戴维斯共同抵达，让旁人误以为我身份显要，因此获准参与了为实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结盟而展开的探索之旅。

在10至11月的那几周里，延安留下了我们许多的欢声笑语，友谊的美酒在流淌；朱德和周恩来会在散步时，以朋友的身份突然拜访美军的前哨基地，与美军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聊天的内容不过是消磨时光的闲谈，无关军政大事。他们自己的同志——地下党、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击队指挥官都在为参会而陆续抵达延安。当时的游击队正在无形中不断壮大，且以武力不断地取得胜利。在那几周里，共产党与美方充满着善意——温暖、开放、彼此信任。20年后却成了相互残杀的异己，在当时，他们对彼此的信任，他们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心是真实的。我无法想象在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Smolny）内为争权而斗争的苏联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但他们至少是不会欢迎美国人的，约翰·里德（John Reed）当然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而在当时那个过渡时期，延安视我们为盟友、为朋友，是欢迎我们的。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招待所的小房间内被军号声叫醒，号声悠悠，朝山峦之外传去。早餐是棕色的小麦馒头一一切片，烘烤，然后和蛋一起端上桌来。我会走出房间，到窗台边俯视这个山谷，只见一队队骆驼从北方沙漠而来，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作响。下面的市集十分热闹，有骡子，有骑马的人，有挥鞭赶牲畜的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共产党相信，士兵、军官、学生都应该有东西吃，且能吃饱，吃饱了他们才能工作，才能以雄健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光凭这一点，他们就与国民党内怠惰的军官、虚弱的士兵不同。

他们都是健康的；但我注意到，这种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于奢侈品上，比如说，牛奶就优先供应给医院中的伤病员。之后若有剩余，则会供应给高官的家人和子女。我咄咄逼人地问道：哪些人的孩子能喝到牛奶？这个问题令他们尴尬不已。因此，我没有再进一步逼问什么，毕竟他们是主，我是客。我可以一个人四处转悠：去皮革市场，那里的气味难闻得就像制革厂，去卖水果和蔬菜的货摊，爬坡下坎，畅通无阻。”“相比政治会谈，我更能理解军事会谈，因为我的中文水平可以理解简单、平实、专业的战争用语，但无法理解他们政治用语中的微妙之处，那些说法都太新，太具有革命性，西方语言都还没发明出与它们对应的术语。不过，这座山城中说过的话，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变成全世界革命者的通用语，就连20世纪60年代美国街头上的动荡制造者（Changemaker）都逃不过其影响。那时似乎一切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认为一切都是假装，一切都是虚伪。”

“在《毛泽东选集》中，收录了毛泽东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的重要讲话，它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如今看到这篇经过修饰后收录到国家文件中的讲话，已经完全看不到讲话当日毛泽东的风采了。当天下午，毛主席走进大会堂，在当地官员与受邀者间走来走去，就像美国政客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医疗与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他边走边与人握手；他穿着黄呢子中山装，扣子扣到了脖子上，很快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才进入主题。他从口袋中掏出几页笔记，先从解答听众的质疑开始，在给出答案的过程中再抛出他的问题，让台下的当地卫生官员参与到他的演讲中去，待大家都投入了，他才开始进入严肃的部分。在这里，他就像个老师一样，这次讲课的主题是使用巫医、草药医生、针灸师以及一切中国本土医药资源救助人民及军队的必要性，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他的人民与军队缺乏西医资源。

对于这堂课，我记住了两点：一是，他精彩卓绝、平易近人、极富表现力的台风；在我听过的所有美国政治演说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表现能与之媲美。在台上，毛泽东会模仿，会配合手势，会四处走动，说话时会气沉丹田，压低声音。他所说的，我有半数理解不了，但是作为一个拿出最佳状态的演讲者，他会扣动你心弦，让你移不开目光。另一个是周恩来。在这场关于医疗的劝诫式讲话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坐在第一排。他随身带着本子和笔；他也许是在展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也许是为其他人树立个好榜样，让他们注意听讲。不过，他坐在毛泽东前面的第一排，把自己的小本子高举空中，动作幅度似乎有点夸张，明显在一边听主席这次伟大的讲课，一边记笔记，向其他人展示他对这位老师的尊敬。”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蒋介石所制造的战争灾难在华东的破坏程度。国民党军队正在分裂；日本人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大口吞噬中国领土，共产党紧跟在日军身后组织抗日。无论日军抢占了什么，共产党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暗中破坏并组织力量反抗——而这一组织的移动速度甚至超过了共产党自己原本的期望。短短6个月，蒋介石百万之众的国民党部队就折损了四分之一；而共产党招募的新兵数量每周都在成倍增长。如今，他们在日军后方组织了不少于16个地区军政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被称为‘解放区’。在其中某些根据地，共产党控制地区面积甚至达到了100乘200平方英里，且日军和国民党都无胆进入，当地唯一的政府就是共产党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唯一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这些‘解放区’联合成一个‘人民政府’，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有能力管辖并保护9000万群众的政府。在他们的考虑中，所谓的蒋介石政府已经随着其华东部队消失不见了；它目前在中国西部，只是美国特许权的所有者而已。不过，你快看哪，就连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开始试探共产党对瓜分该特许权的意愿了。因此，当这些地方政府领导人齐聚一堂，且更重要的是，军方指挥官也与他们一起，考虑16年后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以及建立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史迪威被撤事件也刺激他们开始思考，这一正在孕育中的新政府是否要与美国同呼吸共命运。身处如此事态中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个个个性鲜明，思想开放，友好亲切，且热切渴望接受美国的拥抱。”

“在探索历史的过程中，我在延安直接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是：革命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不过，知识分子若能将自己的如何团结普通群众的想法结合起来，就可以诱使他们走到一起，紧密配合起来。如果他们足够精明，能够向工人和普通家庭讲清楚时局，就能够让这些单纯的人民意识到是什么在束缚他们或摧毁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调动这些老百姓来改变现状，调动他们去杀敌、去抓捕、去牺牲，让他们变得坚忍不拔。

政治局中的高级将领都很愿意与我聊天。他们（除周恩来和毛泽东外）显然都相信我服务于美国政府，是个半官方的友好记者。

政治局中的这些将领承认自己对使用现代大炮一窍不通，对航空一窍不通，他们的人员管理方式还非常原始，他们的通信网络还很基础，依靠的都是从日本线路上剪下的电线，或者是用从占领城市中偷运出的零件组装而成的无线电设备。但他们的情报系统强大得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准确知道日军师部的战斗命令，敌人的通信线路，敌占区的范围。他们的情报会深入到对日军各在野指挥官的性格研究，会按照能力、背景、卑劣程度、合作程度对蒋介石的将领分门别类。在各军事谈话中所传递出的最终信息都是：我们可以帮助你，但蒋介石不行。与这些将领的谈话都惊人相似，没有任何相互矛盾之处，而他们对自己在战时的军事部署、计划、移动的毫无保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延安时就已经开始，他是‘主席’，但就像耶稣一样，他会布道，而他布道时，其他人会仔细聆听。人们对他的这种崇敬是经年累月的积累：来自战场——在战场上，他时而要顺河漂流，时而要翻山越岭，时而要指挥步兵作战；来自令他痛苦的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妹妹都丧命于国民党之手，后来，两个弟弟也被敌人杀害，其中毛泽民是1943年被新疆军阀活活绞死的，1943年正是我见到毛泽东的前一年；来自他的以身作则——他是个老烟枪，自己耕耘了一块烟叶田。不过，这种崇敬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他革命导师的权威。**他是在所有人犯错时，还能保持正确的人：**1927年，他率先与苏联共产党决裂，当时，周恩来等人都没有认真思考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武装攻打城市的想法，后来，当事实证明这些人都错了，他重新欢迎并原谅了他们。毛泽东就像面前举着本史书一样，书中是只有他可以破译的神秘符号，然后用这本书给党内同志及其领导人上课，告诉他们中国将走向何方，他将如何带领他们走到那里，抵达之后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没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头脑具有神性的力量。他做过图书管理员，他的阅读是很庞杂的；但他的意志，他的个人意志，以及他对见到这一意志得到执行的坚持，很可能是除了列宁意志外，20世纪最令人敬畏的个人意志了。

有一天，早上7点我就被叫醒了，来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见一见主席，就得马上准备一下，去和他共进早餐。他接见我的地点并不是办公室，而是在他个人的窑洞里——里面很干净，泥土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桌面一尘不染。他年轻时是个不修边幅的人，30年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所住的学生宿舍房间是会脏乱得吓到同班同学的，这些同学后来还讲过他的故事。不过后来他养成了爱整洁的习惯，且有点强迫症的程度，该习惯后来也成了新中国所有大街小巷都必须遵守的原则——干净整洁。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强大气场。毛泽东的发际线有些后移，唇上留着几不可见的胡须，下巴上长着颗小痣，虽然身材高大雄壮，但绝对算不上英俊。他平时说话的声音轻柔，没有什么变化，与站在台上发言时不同，而且也感觉不到想要说服你的意图。**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是指导他人的圣贤。**他走路时喜欢拖着脚慢慢走，身子轻微摆动，从容悠闲，因为身材魁梧，会有点像熊走路的感觉。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坐着不动的，他的思想会通过嘴从那懒散的身体中传递出来。

我首先拿出了采访国家元首的一套例行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各派系统一起来与我们联合抗日，那么国民党是否有进行内部改革的希望，是否有‘解开这个结’的可能性？他的回答很直接：‘这个结没法子解。’谈判会不会有？希望非常渺茫，他说。谈判是国民党一直以来欺骗美国人的手段：‘国民党希望美国能打败日本，这样他们就能调转枪头，集中火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我们继续聊了很多。他说他目前不会攻打蒋介石，但若蒋介石先动手，他一定反击。毛泽东说，蒋介石指控共产党是‘苏联赤党走狗’，追求土地共享，以及共产共妻。过去4年里，蒋介石发动了3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都挺过来了。只要蒋介石仍旧坚持前线抗日，‘我们就不会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是的，他们此刻确实在考虑建立新的‘国民参政会’，以此将所有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联结起来；强烈要求开展此项工作的压力来自在前方作战的将领，不过他们‘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至于美国，他并不反对其向蒋介石军队提供数量有限的军需补给，但是，美国若给蒋介石军队的10个或20个师装备上现代武器，蒋介石就会利用它们来对付共产党。因此，比起只供应蒋介石，不如双方都别提供；如果美国非要提供，那么他的要求是，美国要按照国共双方抗日的成效给他们分配补给物资。**

这次正式采访只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们就谈了这么多。我承诺会将写好的新闻稿提交给他，以获取刊发的官方许可，毕竟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言的；不过，在我拿到他返给我的稿子时，我发现里面改动太大，已经没有发表的价值了。

正式采访后，我们随意地聊了起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泰然自若；之前蒋介石在面对我的某些问题时，思路虽然清晰，但会无意识地抖动膝盖，这一肢体语言也将他的紧张暴露无遗，毛泽东则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与在蒋介石办公室和白宫总统办公室中不同的是，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任何人拿着电话留言走进来，或者拿着记下的要事打断他。**这里是共产主义中国思想诞生之地。毛泽东显然不掌管行政，他是个圣贤，思考时是不得打断的。**闲聊中，他会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这不是一场对话；**我是他的学生，他在教导我。**他很威严，不容他人反驳或质疑。**他有着令人生畏的气场。**在正式提问结束后，我问他，他们一旦获胜，会在大城市中推行什么政策。他之前组织的是农村抗日，但大城市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大城市中有报纸杂志。他会允许支持敌对势力的报纸随心所欲地刊发文章，哪怕是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当然，毛泽东回答道。在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中，会有言论自由、权利自由、新闻自由。在他未来将建立的这个中国中，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发表自己想要发表的任何内容——除了‘人民的敌人’。我当时忘了问一个问题：人民的敌人由谁来界定？

从与他的对话中能看出他是个自学者，所读都是兴之所至，口味使然。他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谨来探讨西欧的土地私有与封建制度，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将土地重新交还给农民后法国资产阶级的突然转变。紧接着，他转换‘上课’主题，对比了现在外国记者在延安看到的中国，以及过去外国记者在乔治·华盛顿司令部所在地福吉谷看到的美国独立战争。他说，外国人现在也许只看到了延安简陋的条件，这很像过去外国人看到华盛顿位于福吉谷的总部时，只看到了简陋，却没有意识到华盛顿的思想会带领他成为战争最终的赢家。乔治·华盛顿当时有机器设备吗？乔治·华盛顿当时有电吗？没有。这些东西英国全都有，华盛顿没有，但华盛顿赢了，因为得道者多助，人民站在他那一边。我意识到，他在阅读马克思原著时，并没有将工业时代和电气化时代放到它们对应的世纪中。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个人了解他的国家。这个人知道能让人民拿起枪的是思想，枪杆子下才出政权。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争的原则，**在游击战中军装是毫无意义的，在游击战中是没有中立者的，男女老少，无论是否情愿，无论是否身着军装，都必定会被卷入战火中，都必须奋起反抗。**这是一场无休止的革命，他是这场革命的原则制定者，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

我是来与他共进早餐的，原以为这场采访会很快结束。但他似乎很享受这种像老师在指导学生一样的非正式对话，加上我的引见者说了很多好话，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在他说该吃午饭时，我吓了一跳。他还问我是否要留下用餐。当然要啊。为我们上菜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江青。参加革命前，她是上海的电影演员。当天她穿着厚厚的棕色呢绒长裤，但仍掩盖不了她令人惊艳的身材。午餐很简单，上好菜后，她就落座，与我们一同用餐，餐桌上的她也充满了魅力。当时的她32岁，比毛泽东小了差不多20岁，我当时那种养眼的感觉，毛泽东一定也曾有过。”

“在延安的那几周我见了毛泽东好几面，一年后，在重庆又见到了他。只是那些都是正式会面。真正令我难忘的还是我们初见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有思想，能拿枪，而且**可以迫使历史朝他思想所指的方向前进**。”

后来，怀特的真实报道，却遭到了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反对，赫尔利说：

“像怀特这样的记者，是成功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障碍，他们那些不利于国民党的评论，将危及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

再说10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向苏浙豫皖发展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梗电悉。

一、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1、2两师再调一部去。所有苏南及浙江归粟统一指挥，叶飞留苏中主持。

二、新四军（除5师外）在最近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现在派出之部队外，将来仍须派遣部队南进、西进，并须有主要负责人同去，望你们加以考虑并预作准备。中央为了协助新四军完成任务，准备在明年春季派遣数百个干部到新四军（长江下游）工作。

三、发展河南是已经确定的方针，但现在只能逐步发展。首先建立巩固阵地，然后向前推进。你们在津浦路两部队，已有冀鲁豫区南下水东之3个团，可以配合作战。

四、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时间可能很快。

军委 酉敬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了干部要提高原则性和警惕性，要善于识别叛徒、自首变节分子问题。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刘备的夫人来到古城，当他叫张飞出来迎接时，张飞却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羽便打，直叫道：‘我今与你拼个死活。’张飞与关羽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羽，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了，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学张飞的原则性、严肃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10月30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举行闭幕式。毛泽东来了，他走上主席台，等热烈的掌声停下来，便开始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的讲演。他说：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联系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文教大会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林伯渠也参加了闭幕式，他兴奋地说：

“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大会，从来也没有开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希望。”

1944年11月1日，天气分外晴朗。延安新机场上红旗飘扬，鼓声震天。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召开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第一梯队南下誓师大会。

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遵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率领359旅主力7个大队4000余人，党政军民干部900余人，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和全新的衣服被褥，组成南下支队第一梯队，整装列队在新飞机场上。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叶剑英都在大会上讲了话。毛泽东说：

“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毛泽东握着王震的手说：

“我们走了10年了，那里的人民在想着我们，盼着我们，你们回去后一定要站稳脚跟，再打出一个苏维埃政权来，中央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王震非常激动，他向毛泽东立正敬礼，说：

“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当选为总统。

这天下午，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飞抵延安。赫尔利到达延安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包瑞德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周恩来，我，和一大群中国人和美国人到飞机场接机。飞机着陆后，门一打开，梯子上赫然出现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军人模样、非常英俊的人物，他穿的是我历来所见剪裁最漂亮的制服，胸前佩着的绶带在我看来足以代表美国参加过的每一场战争。他就是美国总统特使巴特立克·赫尔利少将。他访问延安，显然事前没有人通知我们。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此行目的是要在国民政府和中共之间担任调停工作。

周恩来一看这位军人气派十足、服装异常漂亮的人物，显然吃了一惊，立刻问我，这位贵宾是谁？我告诉他，这就是赫尔利将军。好几年前他是陆军部长，我曾在纽约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周说：‘你留他在这儿，我去请毛主席来。’接着就在滚滚沙尘中扬长而去。

一会儿，比我所料想的还快，毛和周坐着中共在延安唯一的汽车来了。这辆司机室关闭着的破旧卡车至少是我在延安所仅见的一辆汽车。紧跟着他们而来的是一连步兵，显然是在飞机场附近兵营临时匆匆召集的。**毛以正式的礼节欢迎赫尔利将军，一连步兵排列成为仪仗队，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检阅**。赫尔利将军回敬步兵连长的敬礼，然后挺直他的高昂的身躯，像中毒的小狗一般鼓足气，发出一声印第安人的长啸。毛和周看见这位贵宾的怪异行为后的脸上表情是我毕生难忘的。

检阅仪仗队之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将军爬进破旧卡车的司机室内，我也跟着挤进去做翻译。赫尔利将军语言泼辣，说话奇特，因此翻译相当困难。此外，他的谈话缺乏条理分明的思路。他看到路上的乡下人，就回忆往事，联想俄克拉荷马州的老朋友——这些对毛都是没有意思的。他看见一个老农夫使劲扯着一只被我们的卡车惊吓逡巡不前的骡子，大声叫嚷：‘差利！打它的另一边。’我必须有敏捷的思想，才能把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谈话大意翻译出来，使毛主席和周恩来了解他的说话的一些内容。”

中共中央为赫尔利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把江青介绍给包瑞德，他指着江青说：

“包瑞德上校，这是江青。”

包瑞德后来这样描述了江青：“她的举止体态优雅端庄，俨然一个传统女明星形象；像其她所有中国女演员一样，她的普通话说得也十分可以。我记得她在其他中共领袖们的夫人中间，是最为出众、最为漂亮别致的。”

毛泽东欢迎了赫尔利以后对朱德说：

“这家伙是个小丑。”

从此，‘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

欲知赫尔利还有什么拙劣表演，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摘录的美国记者怀特关于在延安访问的历史资料，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他说延安的“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那时似乎一切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认为一切都是假装，一切都是虚伪。”“光凭这一点，他们就与国民党内怠惰的军官、虚弱的士兵不同。”怀特还说：毛泽东“**是在所有人犯错时，还能保持正确的人**”，“**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是指导他人的圣贤。**”“**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几十年后，在一些国粉蠢蠢欲动、企图篡改历史的时候，这个美国人的话，应该是击破他们那些谎言的利器。关于中美关系，怀特是这样说的：“共产党与美方充满着善意——温暖、开放、彼此信任。”“延安视我们为盟友、为朋友，是欢迎我们的。”“他们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心是真实的。”这些话，对于批驳污蔑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和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也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第64章**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

**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

**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

**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话说赫尔利来到延安的原因和目的，还得从美国军事观察组说起。前面叙述过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的谈话，给观察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观察，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将在未来中国占主导地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尽管它愿意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但是也十分重视同美国的友谊与合作。因此，美国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国共双方实行不偏袒的政策，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一些武器援助，以帮助其对日作战。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不愿意接受观察组官员的这些明智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斯诺在会见罗斯福后曾说过：“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

这样，赫尔利实际上是带着罗斯福总统交给他的调解国共关系、在中国组建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的联合政府的使命来到中国的。9月初，赫尔利到达重庆，他会见了蒋介石，说明“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经过一系列准备后，赫尔利这才飞往延安。

1944年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和赫尔利举行第1次会谈。包瑞德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形：“我觉得赫尔利将军在开场白中竭力做出一种姿态，表示他对国民政府和中共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强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愿竭尽全力最终击败日本。他进一步表明，他坚信蒋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忠心爱国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接着，他递给毛主席一份声明，说蒋委员长愿意根据其中的条件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声明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中共军队将遵守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3、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遵循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两党之政策应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

4、中国只应有一个国民政府与一支军队，共军所有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组后，将按军队接受与国军相等兵饷与津贴，所有部队皆应获得武器及物资之平等分配。

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存在。中国各政党皆享有合法地位。

以上条文的措辞无疑带着美国口味，其中‘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以及‘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等字眼尤为明显。这些不平常的措辞显然逃不过毛主席的眼光。条文一念完，他立即询问这5点内容代表谁的意见？赫尔利将军回答，这些要点是他的意见，‘但我们大家都参加起草工作’——大概他指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包括蒋委员长及其顾问。赫尔利将军继续说：这些条件并非‘不容讨价还价’的建议，而是要和毛主席及其他中共领袖坦诚进行磋商的，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态度。根据史密斯军曹（赫尔利的秘书——笔者注）对会议的报告，我当时告诉赫尔利将军，我认为毛主席想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否同意所提出的全部条件，赫尔利将军回答，他都同意了。

当时我觉得毛询问这些条件代表谁的意思似乎有些唐突。但是，我后来阅读这些文件，感到这个询问是合理的，因为其中有些措辞不像蒋委员长普通的语调。”

这天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2次会谈。包瑞德记载道：

“在第1次会谈中，多半时间是由赫尔利将军发表声明，我看他的目的是要表示美国政府真心诚意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第2次会谈的经过情形和上午的会谈不同。第1次会谈由赫尔利将军扮演主角，第2次会谈则由毛主席支配。”

毛泽东同赫尔利的谈话内容全文如下：

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忱。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到来，帮助中国人民一手，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帮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的。

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进行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希望有所改变）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的，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中国现在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所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

对于第一种区域，即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

**对于第二种区域，即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8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同时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关于国民党如何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和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

在第三种区域，即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195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国3个地区的概况，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真相。

现在日寇进攻中国西南，美军打到菲律宾急需中国配合，我们怎样才能很快解决问题，来团结全中国一切力量，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上午赫尔利将军说，美国要增加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高兴。

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点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人家有什么办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

关于“政府民主程序”一点，我感觉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因此，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现在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工作。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在解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195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77万5千人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1939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少数共产党人还被允许公开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在大后方其他各地，我们的党都被迫在地下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因此，我愿重说一遍：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63万军队和9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6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80%，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上午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说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在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17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50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了帮助中国而不辞劳瘁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们深表感谢。关于中国3个区域的实况，我们感觉到有告诉你的必要。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对于毛泽东上述谈话，包瑞德在他的记载中是这样评述的：

“毛主席首先有礼貌地作了一番最简短的挖苦，接着就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抨击。他提出好多点指责，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他宣称，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加以改组。毛强调，蒋委员长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的崩溃。毛坦率地宣称，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195万大军之中，77.5万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最近在所有对敌战役中，其余的士兵都逃跑了。他说，在另一方面，中共竭尽全力进行抗战，牵制了大批侵华日军。对于共军应领取与国军相等兵饷以津贴之建议，毛指出国军每位兵士的兵饷只足够买一包中国香烟，共军士兵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强壮，而蒋军士兵却饿着肚子，衣衫褴褛，许多人羸弱多病，甚至短程行军都不行。

毛主席关于国军的一些说话，我是同意的。我知道他们所领取的贬值货币根本没有购买力，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人体必要的维他命尤其缺乏，而且他们的制服的质地甚差。我自己曾亲眼看过一些士兵走了短短一段路程之后，就倒下来死了。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会谈中过早对国民党进行抨击，对他本身利益而言是一项错误，因为我感觉这种做法会使赫尔利将军对整个共产党的运动产生偏见。”

接下来的情况，包瑞德记载道：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谈话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指出国军最近在缅甸北部和萨尔温江赢得几次重大胜利，为此目的不得不在事前由华中前线抽调兵员物资，结果在华中地区战事失利。他说，他感觉主席所说关于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话，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所说的。

赫尔利对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话做出反应之后，我感到毛有些震惊。但是，他犹豫片刻之后，就进行有力地反击。他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是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

毛否认他的言论有如中国之敌人的言论后，赫尔利将军的回答在我看来表现了充分的谈判技巧。显然他感到继续争辩毛对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抨击并没有好处。或者，他大概承认这位中共领袖的回答是有力的，于是他改变了语调。他说，他误解了主席谈话的意思，而且，他回答毛的一项具体指责，承认国民政府确有些贪污现象。赫尔利将军明确表示承认毛真诚希望中国和平并且继续有效进行抗战之后，气氛缓和了不少。赫尔利将军接着声称，蒋委员长愿意在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意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立刻嘲笑这个建议，断然声言这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进一步说，它至少让中共一只脚踏进门来。毛加以反驳，说**如果双手给人绑在背后，一只脚踏进门户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又说，中共在国民军事委员会占有一席，就能了解所有重要的军事计划和行动。毛再嘲笑这个建议，指出许多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军事行动毫不知情，而且整个委员会好久没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于是采取一个我认为是明智的步骤。他说：‘主席，如果你认为蒋委员长邀请你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不公平，那么你在什么条件下才愿意参加呢？’

赫尔利将军要求毛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毛表示他需要花一些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和党的其他领袖讨论。他较早时已经在会谈中声明，在不破坏抗日根据地军队与不放弃民主原则的前提之下，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分歧。他建议下一次会谈在明日下午举行，那时他会提出达成协议的建议。”

1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3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的问题，拟定答复意见。

与此同时，包瑞德则驾驶着观察团的吉普车带赫尔利参观了延安和郊外的一些地方。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3次会谈。他代表中共中央把修改充实后的5点建议递交给赫尔利，其内容如次：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统一中国一切武装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颁布及实行用以实施军事、政治、文化的新的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确立思想、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及向政府请求平反冤狱权力，实行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的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接下来的情形，包瑞德是这样记载的：

“赫尔利将军念完了条件，接着这么说：‘我认为这些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以为它们还不足够。如果毛主席不反对的话，我想要加以详细研究，并且在明天上午提出一些建议。’中共代表听赫尔利将军说，要研究各项建议以便扩大其范围，似乎吃了一惊，但是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宣布休会，并定次日上午开最后一次会议。”

11月9日晚上，毛泽东得知毛泽普、毛远翥即将随南下支队出发，就把他俩请来窑洞，为他们饯行。他特意叫厨师炒了几个家乡菜，还让江青作陪。他指着毛远翥二人向江青介绍说：

“他们是我老家韶山的，玩泥巴出身，现在他们参加革命了。回南方去。”

江青打量着看上去很斯文的毛远翥，说：

“现在像个文化人样子了。”

毛泽东问毛远翥说：

“部队明天就要出发，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毛远翥高兴地说：“我早就想到南方去了。”

“是不是想家了？”

毛远翥点点头。毛泽东说：

“去吧，到家乡去看看父母，看看乡亲们，顺便也代我问问他们好。你们这次去南方，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南方大片土地还未解放，敌伪顽固势力还很猖獗，各种各样的困难都可能出现。因此，要充分依靠白区的党组织，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壮大我们的力量。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回去要像松树一样，经受风雨的考验，百折不挠；要像柳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

11月10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4次会谈。赫尔利提交了修改后的5点建议。包瑞德记载道：

“这些条件后来称为中共之5点建议，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以便立即打败日本，重建中国。

2、目前之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党与中立政治团体代表，实施新的民主政策，有效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之改革，同时国民军事委员会亦应改组成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包括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

3、联合国民政府将按照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国民政府将执行进步与民主之政策，确立公理、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向政府申诉之权利、申请人身保护之权利与居住权利。联合国民政府之政策亦将保证免于恐怖之自由及不虞匮乏之自由。

4、所有抗日军队皆必须遵守并执行联合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将受到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承认。外国供应之物资将予以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

当赫尔利将军把以上条文拿给中共代表看时，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看出他们非常高兴。由于他们知道赫尔利将军在来延安之前曾与蒋委员长举行冗长的商讨，因此他们**预料他会力求削弱他们的条件，却料想不到他居然会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在内**。经过修改的条件在11月10日上午递交中共领袖后，余下的会谈好像联谊宴会，在座者皆大欢喜。**只有观察团的一位指挥官讲了一句不开心的话，他说现在遗留下来的全部工作就是争取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件。**在会谈中提出条件和接下来的喜气洋洋的聚会花了很长的时间。时候不早了，我们来不及吃午餐，就准备去飞机场。正当我们要离开会谈场所时，赫尔利将军提出一项最后建议。我们站在会堂外的美丽的灿烂的秋天阳光下，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和我应该签名，表示我们承认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以为这样做才妥当。’于是，他们把几份有关文件摆在一块不高不矮的扁平石头上，在上面签名。我清楚记得毛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文件上还特意留下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上蒋介石的姓名。如果蒋介石日后同意的话，就可以在文件上签名。

为了对赫尔利将军表示公平起见，我要在此提起一件事。正当他和毛准备签名的时候，他说：‘毛主席，你当然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不能保证蒋委员长会接受它。’这时，周恩来提出一点警告，我认为是明智的警告，大意是说应该先把条件直接递交给蒋委员长，不能先让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阅读。

毛主席拒绝了赫尔利将军所提出的毛主席应亲自飞往重庆与蒋委员长讨论条件的建议，但周恩来和他的秘书陈家康将飞赴重庆。在赫尔利将军的建议之下，我也要随机前往重庆。”

这里尚需补充的一件事是，毛泽东在赫尔利修改后的文件上签名之后，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给罗斯福总统拟了一份电报稿，交工作人员发往美国。他在电文中写道：

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3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8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之见证。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44年11月10日于延安

11月10日下午，延安各界人士在新飞机场为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举行欢送大会，王震和王首道率部集结在机场上，接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检阅。

此前，王震曾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嘱托他，在进入湖南后，派人到韶山冲将毛泽覃和周文楠的儿子毛楚雄带到部队上。王震非常爽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大会结束后，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便出发了。

11月10日这一天，汪精卫因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在临死前一个月，汪精卫曾写下了《最后的心情》一文。他写道：“铭盖自毁其人格，置40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好一个大卖国贼，竟然是至死不悔！可谓死心塌地也！

11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委负责人尹林平，命令华南东江纵队“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

11月15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追悼邹韬奋的专刊上题了词。

邹韬奋是在1944年7月24日因患癌症病逝于上海，此时上海还处于日军的掌控中，因而有关他逝世的消息只得秘而不发。9月下旬，新华社在延安发布了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中共中央准备为他举行追悼会，由周恩来、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柳是、张仲实、张宗麟、姜君辰、林默涵、李文、陈今吾等13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有关邹韬奋的唁电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邹韬奋家属发的唁电中说：“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新华社也发布了邹韬奋逝世的消息，《解放日报》为此还发了社论。毛泽东在《解放日报》追悼邹韬奋专刊上的题词是：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后来在11月22日，即邹韬奋和救国会其他六位领导人1936年以“救国罪”被逮捕的日子，各解放区都举行了韬奋同志追悼会。其中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的追悼会最为隆重，场内场外挂满了挽联和悼词。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朱德、陈毅先后在追悼会上讲了话。

11月20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从陕西省绥德东进，于次日到达黄河西岸的佳县螅蜊峪一带，用了两天时间从这里渡过黄河，然后通过山西省离（石）临（县）公路，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吕梁山区，很快逼近日军占据的同蒲铁路。

第一梯队在通过陇海铁路南进时，遇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他们不听南下支队的耐心劝说，并开枪阻拦。南下支队忍无可忍奋起反击，越过铁路，涉渡洛河，继续向前，边打边走，在河南鲁山县城以南地区和日军进行多次激战，打退了敌人的阻击，通过平汉铁路，于1945年1月徒涉信阳浉河，向豫鄂边境急行，进入中原解放区。

11月21日晚，毛泽东因周恩来要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就给沈雁冰写了一封信让周恩来捎去重庆。他在信中写道：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上

接着，他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早在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了周恩来托林伯渠从延安带给他的延安出版的历史剧《屈原》与《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他在10月底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于毛泽东如此重视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感谢。郭沫若还在信中盛赞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与丰功伟绩，同时对共产党也提了一些建议。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来信，非常高兴，便在复信中写道：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是会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及精神焕发！

毛泽东 1944年11月21日，于延安

1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柳亚子写了一封信。

此前在11月间，柳亚子接到郭沫若的密邀，在宴会上认识了周恩来。郭沫若提议柳亚子讲几句话，口吃不畅的柳亚子沉思片刻后才说出了两句：“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将柳亚子的近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转交了柳亚子的近照。毛泽东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

亚子兄：

广州别后，18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吧？没有病吧？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再说赫尔利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在他看来，“最重要地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

11月22日，蒋介石对赫尔利已经签字的5条协议既不表示反对，也只字不提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事，而是另行提出了一个3点反建议草案，要求共产党将所有的军队改编为国军，交给国民党指挥，这样才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他这一招太极推手，顿时把赫尔利弄了个180度大转弯。赫尔利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把戏，又转而支持蒋介石了。他派巴雷特上校带着5点协议，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看是否有修改的可能。毛泽东见赫尔利如此混蛋，顿时发了脾气，怒骂蒋介石是杂种，又对着这位美国人吼道：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特雷回去向赫尔利汇报时，赫尔利也是暴跳如雷，骂“毛思同”先生是“混蛋”。就这样，美国政府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之间，再一次选择了偏袒国民党的政策。赫尔利在白宫的授意下，出尔反尔支持国民党作为反建议的3点草案。由此，国共谈判形成了僵局。赫尔利为迫使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3点草案，下令美国所有驻华机构中止与共产党商谈军事合作问题。同时，又把他认为有“倾向共产党”嫌疑的外交官和军官，或撤职或调离，连驻延安观察组的主要负责官员也均被撤换。

11月23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种步骤；另外一个步骤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

刘少奇赞成第一种步骤，他说：

“联合政府有两个，一个是以蒋为主的，一个是以我为主的。蒋介石不搞国是会议， 不改变政策，我们参加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快点成立好。半年后即可看清形势。”

11月底，吕正操和林枫一起来到延安参加“七大”。

早在1939年贺龙离开冀中时，吕正操就给毛泽东写过信，简要汇报了冀中的情况，并表示了想到延安学习和见毛泽东的愿望。1943年11月，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一年后，便作为晋绥的代表准备去延安参加“七大”，其心情之高兴可想而知。11月上旬，他带着妻子刘沙和孩子离开兴县，与晋绥军区政委林枫一道去延安。

在延安，吕正操先住在联防司令部，后移往杨家岭。联防司令部是几排平房。吕正操和林枫住隔壁，贺龙、徐向前、谭政、张经武等人住在他们后面一排平房。美军观察组就在联防司令部的左面，他们自己发电，有电灯。吕正操还去那里和他们打过桥牌。吕正操听说毛泽东为开好“七大”，要找外地来的代表谈话，就兴奋地等待着这一天。这是他早就渴望的事了。没过两天，就有人来通知他：毛泽东要接见吕正操一家和林枫。这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当愿望变成现实时，他们全家还是欣喜非常，两岁的孩子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地喊着：

“我要见毛主席了!”

吕正操走进窑洞，来到毛泽东的跟前，一时间好多心里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倒是毛泽东先开了口，微笑着说：

“你那封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3个字，干嘛要把这3个字连成一个字呢？”

吕正操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天，毛泽东留林枫和吕正操全家在他的窑洞吃了午饭。两天后，毛泽东又派人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一起用餐，并详谈到深夜。临走时，毛泽东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1944年12月1日，陈毅就自己的思想变化，给毛泽东写信说：

“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做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理解这一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情懑。近事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边阅读边点头，自然十分高兴，12月1日这一天，他在给陈毅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来信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公开后，伯承即无秘密之必要。昨日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一商。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敬礼!

毛泽东

1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4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报告。

12月8日，毛泽东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包瑞德会谈，他在谈到与国民党的会谈时说：

“由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3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将任其摆布。”“**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名额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当年的重要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也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

“**我们被告之，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毛泽东为了了解美国方面的反应，向包瑞德通报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想法。包瑞德不无担心地说：

“组成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会使蒋介石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得到证实；美国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

毛泽东给包瑞德上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包瑞德后来说：

“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极为好的演说家的印象：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说家，通过他的手势吸引他的观众，那么，他就是毛泽东。**”

包瑞德后来还承认：中国共产党“给予美国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助的程度，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12月9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5次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12月11日，王若飞致电延安，转告“包瑞德认为当我们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蒋介石会宣布我们搞分裂而打击我们”。

12月12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们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2次会议上发表了题目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他说：

“1944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1945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1944年11月止，有了65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200多万民兵，有了9千万被解放的人民。1944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1945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我认为，1945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

“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1945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亲笔信中写道：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8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应，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

专肃，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12月26日，贺龙见到住在和平医院养病的毛远志，招呼她说：

“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毛远志说：

“这儿离枣园那么远，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车子一起去嘛！”

贺龙带着毛远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见朱德早已来了，便与二人打了招呼。毛泽东指着毛远志对朱德说：

“这是我的侄女，泽民的女儿，叫远志，志向远大啊！就是头痛个要死。”

这一天，毛华初、章淼洪，还有胡觉民带着女儿海英，都来了。吃饭时，毛泽东与朱德、贺龙、江青坐在一起，毛远志、毛华初、胡觉民、章淼洪带着海英和李讷在另一间窑洞里。毛泽东走过来看望他们，毛远志等起身祝贺老人家生日快乐。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祝你们身体健康。”

12月28日，周恩来奉命致函赫尔利，拒绝了蒋介石的3点反建议。他还在公文中写道：

“如果国民党政府欲向国外表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应先自动实行：1、释放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廖承志等大批爱国政治犯；2、撤退包围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军队；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4、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欲知国民党能否向好的方面转化，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请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与赫尔利的4次会谈以及毛泽东在11月10日发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吧。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在翻历史旧账时动辄说中共破坏了团结抗战，还有一些人也时常把“闭关锁国”、“外交一边倒”挂在嘴上往领袖身上泼脏水，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无疑是击破他们谎言的铁证，也是教育那些受到蛊惑的善良人们的良好教材！

**第65章**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

**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

**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话说1945年1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等问题给冀鲁豫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冀鲁豫分局并告北方局：

一、黄（指黄敬，1944年冬到延安治病休养——笔者注）病假期间，由宋任穷兼代冀鲁豫分局书记与军区政委。

二、**冀鲁豫尚有广大地区未实行减租减息，务必在今年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在太行山整风的1000多平原干部可否从速结束整风，专心学习土地政策与减租减息工作后，望北方局及太行区党委派负责人向他们作报告，将太行区减租及生产经验告知他们，派回平原去发展大减租运动。**须知土地政策的彻底实行，是我党政军取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万不应迟缓忽视。**

　　 中央 子东

1月3日，毛泽东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一文，他写道：

延安权威人士发表对于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该评论称：

蒋介石在其广播中开始说：抗战“8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之深刻性。对于陷国家于如此危境的原因，蒋氏要求“全国上下”“彻底地反省和一致地觉悟”。可是蒋氏本人却既无反省，又不觉悟。蒋氏说：“过去这种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在蒋氏统治的区域内，人民负担占收入80%左右的时候，蒋氏竟说什么“不愿增加人民负担”，确实要有很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诿给“社会”。就这一点来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痛恨蒋氏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达到了空前高度，怒骂指责，无日无之。**为了平抑众怒，蒋氏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于他的政府工作，说了“不够”二字。但随即抬出一个“社会”，说什么“社会”也“有其责任”，借以欺骗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们。**但是“社会”里一切受蒋氏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已经逐渐清醒起来，他们知道受压迫的人民是不能担负这种责任的，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既然政府的责任只是一个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还有“顾恤人民困难”的深恩厚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万岁万万岁。可是蒋氏觉得不然，他又在其广播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岂不有些奇怪？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最近几个月来形成的极其紧张的政治形势，迫着蒋氏将其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纸币，填上一个似乎不很久就有希望的实无日期的日期。可是蒋氏这一声明，决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声明，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毫无记性这一点上。可是**中国人民是有记性的，他们记得国民党政府开过很多支票，请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限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蒋介石先生，我们要问你：你的票子不是早已填上了许多确定兑现的日期吗？第1张，“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第2张，“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3张，“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均在“七七”抗战以前，那时并无“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的情形，何以一次也不兑现？抗战七年半，不论哪一年均比现在的“军事紧张”情形要好些，何以不兑现？你现在开的一张，又答应在“候我们军事形势稳定……的时候”，请问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不改变，你的“军事形势”能够稳定么？“俟我们反攻基础确立……的时候”，请问在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之下，你的“反攻基础”能够“确立”么？“候我们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请问何时“更有把握”？你不是历来都说“绝对有把握”么？何以现在忽然觉得缺少把握了呢？**你一向压迫人民，垄断抗战，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到了1945年元旦，忽以缺乏把握宣告于世，请问你及你的一群，该当何罪**？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国民大会？孙中山还在1925年的临终遗嘱上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你违背孙中山，从人民手里篡夺政权，建立你的血腥寡头专政，人民不赞成，基础不稳，你就三番五次以召开国民大会空言骗人，过去还有确定日期，现在日期也没有了，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没有了，请问该当何罪？就拿你的话来说吧，在抗战期内召开国民大会，请问是战前贿选出来而在战后大部投汪附逆了的那个“国民大会”，还是重新选举的呢？如果是前者，谁要那个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而且烂了的“国民大会”呢，如果是后者，如何选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袁世凯开过洪宪国会，曹锟开过猪仔国会，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什么独夫民贼胆敢召开什么蒋家国民大会或猪仔国民大会么？**

延安权威人士于揭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耻欺骗之后，结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属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是**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1月7日，西北局和边区的主要负责人高岗、林伯渠、贾拓夫、刘景范、李维汉，在毛泽东处谈劳模大会总结问题，刘少奇也在座。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党外对区乡干部有意见。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原因，这才知道一是区乡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理论修养，独立执行政策的水平差；二是区乡干部处在第一线，工作任务重，上级机关在下达任务时，有时不考虑实际，下达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他非常生气，他说：

“热过头了，要泼点冷水。”

稍后，毛泽东平静下来，接着说：

“**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上级指示也不可生硬。**”

1月9日，毛泽东为了使初步建立起来的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不致破裂，他又打出了一张牌，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如果罗斯福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共产党愿意派出毛泽东或周恩来，或者他们二人，前往华盛顿同总统本人会谈。

毛泽东在信中还要求，如果罗斯福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谈判的蒋介石。

第二天，周恩来也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嘱咐他务必不要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共产党对他持不信任态度。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可惜事不凑巧，此时的魏德迈并不在重庆，而魏德迈与赫尔利之间有代为拆信之约，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两个信件全落在了赫尔利的手中，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赫尔利电告罗斯福说：“国民党是能治理中国的唯一力量，中共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赫尔利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对话。

这正是：事缘不凑巧，外交并非一边倒。中美交恶数十载，始自小丑捣。

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向463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见《毛泽东选集》）。他说：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3种长处，起了3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边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重，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经济工作，他说：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3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月18日，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1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他写道：

北方局：

**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2000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上正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而黄敬又因病离职**。为此，中央特向你们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冀鲁豫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地巩固。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去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冀鲁豫因地区广大，须要成立3个至4个区党委与军区，并须增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工作。其次，总部与野政仍留太行继续掌握与收集各大城市及交通线上的情报，以及甄别抢救运动中的干部，领导军事生产等。以上望你们与分局商量后电告。

　　 中央 子梗

1月27日，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到达鄂豫边的大悟山根据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会师，向第5师移交了从延安带来的900余名干部。

1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给周恩来的指示，他写道：

周：

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我们必需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这个工作望你与若飞商量，加以布置。

　　 中央 子俭

1月3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见《毛泽东选集》）的社论，他写道：

“根据1月28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194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5钱油和盐，1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1945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彭雪枫举行追悼会。毛泽东痛悼爱将，以他和朱德、彭德怀、陈毅的名义，为彭雪枫撰写了一幅挽联，其词云：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垂，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毛泽东还为彭雪枫题写了挽词，他写道：

“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地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2月11日，毛泽东为转发胡宗南给蒋介石的密电，起草了军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此报转发5师、北局、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笔者注）、刘子久、太岳、五台。

胡宗南给蒋介石密电

自去年8月以来，共党刘伯承129师主力，向黄河南岸窜扰。入豫旅长陈赓（军校一期，湖南人），设豫西指挥部于登封附近，向豫西各地，乘隙窜扰，建立根据地。渑池有韩钧，3000余。偃师有一支挺进军，2000余。汜水有李静，1000余。临汝有王焕成统帅之豫西独立第2支队，10000余人。叶县、舞阳、鲁山，有董必谦豫西独立第一支队，1000余。桐柏山脉有13旅周坚志，5000余。确山有李先念第5师，1000余。汝南有14旅吴林焕，1500余。正阳有华北支队李卓英，900余。汉川有萧华南支队赖朋，1000人。光山有15旅杨经营，3000人。信阳有豫南挺进纵队周映升，1000人。此皆匪军精锐，近来人数虽不多，但预想半年后，共党活动诱惑力量必更大。这些部队相当精干，及因经费充足，政工人员善于诱惑欺骗，对民众要给之粮食、柴草，均以现金法币付价，且有超过原市价者。因而彼对豫西民众，政治上成功，收获甚大。**而我方游击队，挺进队，及地方团队，吃百姓，穿百姓，百姓正当担负以外，又额外摊派。额外摊派外，甚至勒索、欺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因此，**代表抗战之国民党，所给人民之印象，与奸军恰相反。**自去年6月后，河南2000余万人口，现仅余700余万。而现存之700万人，亦正动摇于匪我之间，不能确保，此乃极大腹患，亦为吾人特应警惕者。在此局势下，如果我们不动，则5个月后，一切皆非我有。**无论美方对我军队整训如何之精，美国装备如何之好，也难打出去**。再过两月，刘伯承指挥部必移豫西，国军陷入包围封锁，联络切断，豫、鲁、皖、冀，将均非我有。应请中央下最大决心，对黄河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之奸匪，进行清剿。虽用很大兵力，用多少金钱，在所不惜，方能挽回这一局面。基于上述，拟定对策如次：

一、派新一军，以两个师，分两个纵队，给以特种装备，特种组织，及经费，以伏牛山为根据，向渑池、新安、洛阳、临汝、登封、鲁山、叶县、漯河渐进。另以周贵昌部，编成6个纵队，经侯马，临汾，向太行山，中条山区前进，以为策应。详细办法另拟。

二、在灵宝、卢氏、南阳、洛阳、登封、鲁山、叶县、驻马店、温河、新郑、郑州，各设战地学校一所，收容高中以上学生，训练两个月，分配各地区，秘密使用，组织民众。详细办法另拟。**争取民枪，不如争取农民。争取农民，不如争取青年**。有青年，自有农民，有农民，自有民枪。青年归我，则我胜利。青年归奸军，则奸军胜利。此应请中央认识。

三、毫不犹疑，毫不顾虑，在不脱离生产，不增加人民负担之原则下，大量发展河南地方团队。如陕州、洛宁、渑池、新安、伊阳、临汝、鲁山、叶县、襄城等地，请中央竭力帮助，以军队掩护民众组织，以学校收容知识青年，以团队阻止奸军发展。如此必可歼灭奸军，争取胜利。一得之愚，恭请明察。

（上件转给你们参阅。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加以兵力不够分配，胡宗南计划未必能充分实现。但我王戴、皮徐、刘韩<皮徐、刘韩，指皮定均、徐子荣和刘聚奎、韩钧——笔者注>3部，在王戴统一指挥下，应在豫西豫中两区，于最近数月内，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比较巩固之根据地，然后相机南进，打通5师联系，以防胡军之进攻。）

军委 丑真

2月12日，毛泽东读了《解放日报》刊登的《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后，写信给博古说：

“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请全文分数日播放。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2月14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告别新四军第5师战友，向鄂南挺进。前方最大的障碍是长江天险。新四军第5师特派第14旅旅长、第4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领两个团一起渡江，挺进鄂南。

此时，武汉三镇以东的大江两岸，大小城镇都被日伪军占领。国民党军在江北岸大别山一带有桂系65军和鄂东挺进第16纵队守备。在这些地区，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互相穿插，犬牙交错。南下支队南渡长江将不可避免地要同时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占领区。

国民党军获悉南下支队要南渡长江，立即调集了3个师的兵力，严密封锁这一带渡口，企图把南下支队消灭在长江北岸。南下支队在新四军第5师第44、第41团配合下，于2月19日至23日从湖北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月24日拂晓，全部踏上长江南岸，进入了鄂南地区。

2月13日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毛泽东起得很早，他对朱德说：

“今年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拜年吧！”

朱德表示赞同，他还说：

“是要早些去，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枣园人刚吃过饺子，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提着年礼，来到乡政府给乡长、文书拜年。乡长杨成福见毛泽东和这么多领导来了，笑嘻嘻地迎上来。毛泽东大步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杨乡长，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年可过得好吗？”

杨成福连连说：

“好，好！毛主席过年好！首长过年好！”

他把毛泽东一行人迎进屋里，又是拿烟沏茶，又是张罗酒席。朱德笑着说：

“杨乡长，我看你不要忙乎了，毛主席要到乡亲们家里去拜年，你就领我们挨家走走吧。”

杨乡长心想，枣园山高路窄，怎敢劳领袖大驾，便脱口说道：

“使不得，使不得！挨家拜年就免了吧！毛主席的美意，我一定转告乡亲们，我回去开个群众会，代您向群众拜年就行了。”

“拜年要乡长代理，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领我们去吧。”

毛泽东的风趣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杨成福想了想，他说：

“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我看，可以把一些群众代表请到乡政府来，一来主席能见上面，二来这样更热闹些。”

毛泽东问朱德：

“你看怎么样？”

朱德笑着说：

“这样也好！”

毛泽东转身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

杨乡长转身就去通知人，毛泽东几个人动手收拾桌子，摆上了他们带来的烟、酒、茶和花生。

在乡政府的团拜会上，世代受苦的百姓们，受到了领袖们的热情款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敬茶敬酒，无微不至；乡亲们一个个喜形于色。毛泽东询问大家：干部战士砍柴时，砍了老乡的树没有？借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东西赔了没有？对老乡态度好不好？乡亲们争着回答说：

“他们好着哩，说话和和气气，哪年不帮咱耕耕种种，收收割割，亲热得像一家人。”

毛泽东还是请大家多提意见，他说：

“批评他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改正错误，把工作做好，革命就能早日胜利。”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一行人要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为他们送行。毛泽东对大家说：

“我是这里的一户居民，和你们接近得少了。今年，得和大家多接近，希望你们常到我那里去。”

他回到住处，板凳还没暖热，新市场、柳树店、裴庄、杨家岭、桥儿沟的乡亲们都赶来拜年了，他和朱德、任弼时围坐成一圈，观看他们的扭秧歌和吹拉弹唱。

2月15日，毛泽东穿着一套打着补丁的灰色布军装，站在中央党校礼堂的正中央，给党校5部、6部的学员们做《时局问题及其它》的报告，他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他说：

“今天这个报告会是中央党校5部、6部发起的。5部、6部的同志们以及许多别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话也没有来讲过。今天就是专为5部、6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加。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志们给我出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的问题。”

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

“大家关心时局，这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能不能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3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3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么，**3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摩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这几个大国自从订立了条约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80个师，苏联出了200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3个国家团结，3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作‘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把杨虎城放出来吧！把叶挺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作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4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8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关于“山头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

关于“审查干部问题”，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承担了在审干中出现的错误的责任，他说：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作坏处，一个叫作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作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么，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

说到此处，他立正身姿，把右手举到帽沿下，给被错戴帽子的干部敬礼。全场的与会者，被毛泽东严以律己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边敬着礼，一边巡视了一下会场，见大家高兴了，就微笑着说：

**“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的人们纷纷起立，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台上领袖的陪礼，台下部众的敬礼，来而有往，使领袖的心与干部的心贴得更近了。毛泽东也激动了，他放下手，继续说：

“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作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作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4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关于“其他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3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摩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作‘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作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3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10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10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3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有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100%，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欲知毛泽东以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及审干运动是毛泽东身后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是一部分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刺激的人，公然站出来发泄私愤；二是一些社会沉渣泛起，趁机搅浑水。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敢公开辱骂毛泽东，但他们却采用项庄舞剑的老伎俩，指桑骂槐，从而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延安整风究竟有没有必要？延安整风及审干运动到底是对是错？本传已经对其前因和整个过程及最后结果作了全面的真实的叙述，毛泽东也曾多次对延安整风作出过评价。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礼堂所的报告《时局问题及其它》，又一次讲到了审干问题，而且讲得那么客观，那么真诚，那么感人！只要认真地对这些重要文献加以研究，是不难搞清楚的！

**第66章**

**“几个月内，就使敌寇打通了大陆交通线，百万军队望风而逃，豫、鄂、**

**湘、桂、赣、粤诸省，一万万同胞沦陷敌手，难道不算是抗战失败，反**

**而算是抗战胜利么？特务横行，贪污猖獗，工商破产，民怨沸腾的国民**

**党统治区域，难道不算是国家紊乱，反而算是国家上了轨道么？”**

话说1945年2月16日，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且无法再进行下去，周恩来便从重庆回到了延安。

2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谢子长新陵墓为谢子长烈士举行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两万人。

毛泽东为谢子长陵墓题了词：

“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

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国民革命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八大主张”写了一个批语。

河南人民抗日军8大主张是：一、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河南同胞联合起来，保卫国家民族，保卫河南，坚持抗战，准备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立即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放弃一党专政，成立真正抗战的、各党派、各军、各界联合的政府与统帅部。二、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团结河南各界人民，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一切河南抗日人民的生命、财产、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武装人民的自由。取缔贪官污吏，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抗日民主政府。三、团结一切抗日友军与地方武装。欢迎伪军反正，共同对日作战。消灭日寇，保卫河南，解除河南人民痛苦。四、帮助各地民众组织抗日团体，成立抗日自卫队，游击队。五、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合理负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河南人民负担，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发展农业生产，救济灾民，取缔奸商禁止抬高物价，保护工商业贸易自由发展。六、实施抗日救国教育，恢复学校，优待教员。七、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共同发挥抗战力量。八、军民合作，军爱民，民爱军。本军为河南人民的军队，誓与河南人民团结抗战到底。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一、此8条可用，转发湖南、湖北及华中局。

二、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笔者注）：1、8大主张可用，可即发布。惟在第1条中保卫河南4字下加保卫家乡4字。第5条中取缔奸商禁止抬高物价，改为取缔奸商操纵物价。2、帮助河南经费一事，正在考虑，另复。但**你们须着重自力更生**。

　　 中央 丑号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萧三送来的作品《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后，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与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这些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2月22日晚，延安平剧院公演《三打祝家庄》。

前边已经说过，该剧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平剧院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等人集体创作的。他们几易其稿，历时7个月之久，终于拿出了剧本并排练演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彭真观看了演出后说：

“《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3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

毛泽东、朱德看了《三打祝家庄》以后，也写信向作者、导演、演员们祝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2月间，王观澜的病又复发了。毛泽东去看望他，见他病情好转，非常高兴，鼓励他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七大”。王观澜身体稍有好转，就拼命地看书学文件，导致病情愈发严重，生命垂危。

毛泽东在王观澜处于生命危急的关头，写信告诉他说：

“你的病不一定没有希望，要鼓起勇气来，争取有效办法，同死亡做斗争。”

毛泽东的话对王观澜发生了特殊的效果。几个月后，他的病居然又开始好转。毛泽东知道他肠胃功能很弱，就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的铁鏊子送给他。因为他手脚发凉失眠，毛泽东又将自己的一只热水袋送给他；还把仅有的一点点营养品送过去。

2月24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江微各电、发展东南灰电、粟鱼电及你们复电，你们文电均悉，根据你们所述情况及所提意见答复如下：

一、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中央和你们是一致的，下述意见都从这点出发。

二、美军登陆是必然的。日寇为保卫沿海必须肃清其近后方，故扫荡顾祝同的可能性很大。但此两事目前尚未实现，大变化尚未到来，尚须稍有所待。因此，我苏南粟部，浙东何（指何克希，时任苏浙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笔者注）部，皖南部队，**应就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大举跃进**。**粟部占领莫干山后，暂不宜深入突进，以巩固现地，诱顽来攻为宜**。谢祥军可率两团即去皖南，他的任务暂时亦不是向顽区挺进，而是加强南陵、铜繁、宣城、当涂、芜湖一带游击工作，贯通与苏南联系并兼顾沿江西上直至鄱阳湖的游击战争，巩固皖南阵地，这是将来深入皖南和赣东北的基础；浙东部仍就现地向敌后扩张。**各部对顽方之进攻应有迎击部署，取各个诱歼政策**。

三、苏南工作，久与江北悬隔，艰苦坚持，成绩很大，但仍须从各方提高一步，这是我军将来夺取大城市最可靠基础，粟裕同志宜长驻苏南指挥。我军江南大营，应常设在苏浙皖交界地带，将来敌寇大举攻顾，及美军在沿海登陆时，应派兵进入闽浙赣敌占区（在敌占领之后），而江南军区仍应在苏浙皖3省交界处主持，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把孝丰、长兴、吴兴、郎溪、广德、宣城、溧阳、溧水、高淳、金坛、宜兴等县工作深入，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深入减租减息，训练人民武装，培养本地干部，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这一基础打定，向南扩张和将来进城才有稳妥依靠。**江北各根据地的经验，可供参考，万一将来上海变为雅典，我军仍可据农村为退路，打出局面来。为此目的，我们还提出另一重要工作，即除以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外，**应派遣许多有训练的武装工作队，去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有20多县，我们的工作很薄弱或毫无基础，这一弱点如不立即去补足，会妨害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其办法：从主力部队抽调精干连队，配置强的领导干部，犀利短小武器，配置党政军民的工作人员，**分路派遣进入沪、杭、苏、锡敌后之敌后去建立隐蔽的游击支点和广泛进行半公开的及秘密的居民工作。可学习华北武装工作队的经验，华中建立同情区的工作经验、掌握边沿区两面派的工作经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经验，**充分运用去开展敌后之敌后工作。这一工作有成效才能于盟军登陆、敌寇从农村市镇紧缩撤退时，我武工队即就现地以地方暴动方式，顺利接收那些地带一变而为我广大农村根据地，也就是造成了夺取大城市的乡村基础，没有这一条件要夺取大城市归为我有，是不可能的。大城市夺取后如遇意外挫折，亦有稳固的退路。这些武工队进入敌后还应很谨慎地去争取伪军与顽方敌后工作进行精巧的斗力与斗智的斗争，**顽方的部署是很积极的，我们必须重视压倒的对策。**为了实行上述办法，淞、沪、苏、锡线的武工队，应由苏中派遣。南京镇江外围，应由2师与苏南分担。太湖东岸，由苏南派遣。浙西、浦东，由浙东派遣。当涂、芜湖由7师派遣。每处派遣若干队以及每队兵员数目，均按实况决定之，总以布满敌后空隙、掌握一切农村为目的，且必须迅付实施，但均须经过训练方有作用。

四、震林、叶飞两部，现应在原地待机渡江，到4月后，看情况再定行期，当敌寇大举攻顾或盟军登陆时再转移，亦不会丧失时机。苏中军区，仍应保持。叶南去后，亦应保持，那时可就文蔚、期光、丕显、季方、逸峰及其他同志成立新军区，目前即可委托克诚指挥苏中工作，谭未去前2师领导，人选不变，谭去后再考虑实施你们的拟议，梁崇学可即升任2师副师长，要叶、谭安心部署1、2师工作，并对南进部队，进行各种准备。至于军部南移，更是以后的事，看将来情势再决定如何实施你们的拟议。

五、近来华中的动员较之1943年扩大部队十数万以上，证明动员力量和后备力量之强大，但应注意这类大动员，在华中各老区，也只能一次二次，再过即超过限度，不能应付将来最艰苦的局面（此点必须估计到）。你们确定以整训部队发展民兵为今后主要任务，这是很正确的，望坚决执行。部队编制目前一般仍宜采用千五六百人的中团制，2000人以上的大团制，抗战初期华北采用过，并不合乎实际，只有将来配合同盟国作战时，参加配合作战的部队应采用大团制。目前已成立大团的不必缩小，但注意不要一般采用大团制就可以了。你们对华中大扩军之后，宜就主力、地方团、县区武装3者进行适当配备，这种分散不集中的配置，仍是最好的储蓄力量的办法。23团建制，即划归山东，不调回华中。**八路军为准备应付可能的苏联参战，不能顾及陇海以南**。淮北路西方面，应由4师负责，目前发展皖北、豫东，打通水东并准备以一部向中原西进是4师的任务。3师主力留作机动部队。1、2师担任南进，52团可即南开，但苏中仍应留1个到2个主力团，那一带的坚持对整个江北有战略意义。江北各老区仍是发展东南的起点，现在任务是如何深入工作、深入积蓄力量，以备将来有决定意义的大动用。

六、华中局拟补充云逸、传珠、刘晓、粟裕、震林、子恢、克诚、汉年、炳辉为委员，连陈、饶、曾共13人成立委员会，以陈、饶、张、曾、赖5人成立常委，原来之军分委撤消。上述人员你们可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央最后决定。钟期光留苏中工作，我们正考虑派人到军政治部来。华中局还应考虑各区党委的名单，选拔有威望的地方干部，参加各区党委工作，将选定的名单交中央批准。你们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往江南工作，这是很对的，一切抽调及准备南调之军、政、经、教工作人员，均宜给予政策教育，使每人有明确的任务及政策观念。

七、以上各项请你们加以研究，然后电复，你们如有意见，请再提出为盼。

　　 中央 丑敬

2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给王若飞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若飞：

养电悉，答如下：

一、**蒋在目前方针仍是玩弄民主外衣，维持独裁实质，**不到最后关头（如苏联参战、国际干涉等等）连一点点民主让步也不会给的。旧金山会议只能有利于国内民主运动的推动，还不能说蒋在此会议前必有若干让步，**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国际方面，苏联还未参战，苏、美、英还未直接干涉中国政治；国内方面，大后方民主运动还未形成公开阵线，群众基础还很薄弱，而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还未组成，因此蒋利用目前某些情况，还可能拖一时期，国共谈判也不能望其速成，而只能运用公开谈判的形式，以援助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二、对王世杰的草案是要回答的，我们仍坚持以党派会议讨论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回案拟好后当电告。

三、关于旧金山会议，我们曾向赫尔利提出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9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绝不应由国民党单独代表出席，而应由国、共、民盟3方合组的代表团出席，国方代表只应占全数三分之一，其中且应由民主派参加。赫尔利回答：须由政府及蒋选择。现在各方既均主张代表人选应包括各抗日民主力量，望即本党之主张，发动运动，以证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公意。

四、对大后方民主运动，我们一向极力援助，且决意使**民主统一委员会能在大后方宣告成立**，你在渝，即是以党的代表资格参加此运动的，在七大前后周、董（指周恩来、董必武——笔者注）均不会出来。望向各方说明。

　　 中央 丑有

2月27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瓦解阎锡山部队扩大太岳解放区的指示，他写道：

太岳区党委并告北方局：

一、**阎锡山勾通日寇，配合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积极扶持伪军伪政，准备反攻时与我争夺太原，且成为蒋系顽固反动派进攻华北的直接桥梁。**我为争取抗战胜利计，必须削弱与瓦解阎部，堵塞国民党顽固势力过黄河伸入吕梁、中条，**准备反攻时首先夺取太原的有利条件**。因此晋西北太岳区必须加强晋西南各项工作，达到缩小阎地区，削弱与瓦解阎部队，并须于今年内做出一定成绩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阎锡山还未公开投敌以前暂不便以八路军公开名义进入吕梁山，只能以地方名义，采取复杂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由南北东3方面逐渐向吕梁山内地推进**。至于**已进入我根据地内之阎部，在有利条件下，应坚决消灭之。**

二、为着工作便利进行起见，临汾、乡宁、吉县及其以南各县划归太岳区党委领导，依靠条西及汾河南岸现有阵地，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及其他各种秘密组织，达到驱逐国民党特务队及阎之势力，逐渐向乡宁推进。该地区情况复杂，区党委似宜南移，以便就近确切领导。洪洞、赵城、蒲县、大宁及其以北各县，并洪、赵支队及洪、赵原有汾河东铁路地区（即前年划给太岳区者）仍归晋绥分局领导，依靠晋西北根据地及洪赵现有基地，发展中阳、汾阳、孝义、汾西地区，逐渐向隰县、石楼推进。

三、太岳一分区与晋西南党委，应建立密切的联系制度，当铁路西游击队万不得已转移路东时，应由太岳供给粮食，帮助东渡难民，解决土地、种子等，并给游击队子弹、手榴弹、地雷等帮助。

四、太岳、晋西北、北方局、集总应**注意挑选适宜回晋西南地方及阎部工作的干部，逐渐派回开展晋西南与瓦解阎部顽军工作**，必须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向军官士兵同时进行工作，以及**分批放回一些俘虏，进行收买工作**。切实研究阎之兵农合（即“兵农合一”，是阎锡山制定的土地政策——笔者注）极端剥削的土地政策，以及抽兵、检举、统治商业等政策。提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口号去发动群众。希望晋绥分局及太岳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详加考虑并将布置情形电告。

　　 中央

2月28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6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

2月28日这天，赫尔利回到了美国。尽管此时已经有一份由美国驻华使馆全体政治官员联合谴责赫尔利对华政策的电报已经先期到达华盛顿，可赫尔利却大言不惭地向罗斯福总统保证说，只要美国坚持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到4月底，就可以迫使中国共产党屈服。

1945年3月2日，毛泽东撰写了一篇极其精彩的檄文式的《新华社记者评论蒋介石3月1日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他写道：

新华社记者称：蒋氏这个演讲鲜明地反映了国民党内最反动集团的立场和企图。这一集团，坚持寡头独裁及其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的政治军事政策，反对联合政府，反对民主与人民，阴谋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与取消中国解放区。这一反动集团是助长敌人的侵略，造成目前国民党区域军事政治经济严重危机的负责者。蒋氏此次演说，不过是又一次充当这个极端反动集团的代言人而已。统观全篇演说，其要旨不外，一、坚持党治，严拒民主的联合政府；二、曲解国共谈判经过，污蔑中国共产党；三、玩弄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聊戏法，保持其法西斯独裁。

关于第一点，蒋氏声称：“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而我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及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这是蒋氏坚持寡头专政，拒绝联合政府的鲜明表示。也好，**与其像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王世杰氏那样的含糊吞吐，还不如蒋氏这样一掌推开，**使人感觉其立场的清楚明确。蒋氏用以拒绝联合政府的“论据”，除了所谓建国大纲之外，尚有：“如将政权与责任移交各党各派，则中央政府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怕变乱”，“因为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国民政府之基础，是革命先烈与抗战军民无量数生命鲜血的牺牲所构成的……有不容放弃的责任……决不能以国事为儿戏”等项。所有这一切，**明眼人一看，都会知道不过是专制主义者的一篇低级遁辞，本来不值一驳。但是蒋氏既然那么煞有介事的津津乐道，我们也就不能默尔而息了。**

我们首先要问：所谓不能违反建国大纲一说，是那一条法律定下来的？建国大纲只不过是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种对建国程序的设想，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孙中山晚年自己就已修改了这种程序。民国十三年孙先生北上时，主张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的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孙先生临终时，又在其遗嘱上谆谆嘱咐：“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必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他的不肖子孙，背叛遗嘱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及其首领蒋介石，却在孙先生死后20年的今天，还是背着孙先生自己修改了的那篇所谓建国大纲，当作维持自己独夫统治的护身符，岂不令人笑脱牙齿？**按照孙先生遗嘱，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战胜日本侵略者，然后由联合政府主持，在全部国土上实行无拘无束的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岂不正适合今天的需要？所谓组织联合政府将招致抗战失败国家紊乱一说，请问何以见得？**18年来中国并无联合政府，只有蒋介石的独夫统治，难道抗战还未失败，国家还未紊乱么？**远的姑且不说，即如去年河南战役以来的事实：**几个月内，就使敌寇打通了大陆交通线，百万军队望风而逃，豫、鄂、湘、桂、赣、粤诸省，一万万同胞沦陷敌手，难道不算是抗战失败，反而算是抗战胜利么？特务横行，贪污猖獗，工商破产，民怨沸腾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难道不算是国家紊乱，反而算是国家上了轨道么？**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及很多无党无派人士之所以提出立即废止一党专政，组织民主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中央政府，难道不正是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为了要挽救由于蒋介石独夫统治所造成的这种抗战失败和国家紊乱的可怕现象么？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独夫统治，一刻也不愿意它继续下去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可能还让蒋介石在这个政府中占上一席，让其痛改前非，将功赎罪以观后效。**但是18年来，尤其是抗战8年来把中国引导到如此水深火热的危境的这个独夫统治，必须立即结束，中国人民是具有了这种坚决意志的。所谓“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的负责团体”，这项论据，也属荒谬可笑。为什么18年来只有独夫统治，没有人民代表机关？这是谁的责任？我们的独夫将一切人民的自由权利剥夺干净，于今连党派会议也不愿召开，但是他却愿意在今年11月召开他那个拖延了8年不愿召开的猪仔国民大会。岂不是因为只要不是猪仔，便是最容易开的党派会议也决不愿意“征询”一下，惟有猪仔才愿“征询”么？**我的政权是流血得来的云云，这不是论据，只是一套流氓腔调，视国家为私财，以国事为儿戏，正是独夫的观点。**综观蒋氏拒绝联合政府的各项“论据”，纯是一片遁辞。其真正理由，乃是反映蒋氏及国民党内的最反动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利害，坚持其一人一派的私利。只有这一点是真的，其他都不过说说骗人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一主张，提出来还不过短短几个月，现在已轰动国内外，成了广大人民的主张，使得蒋介石不能不抛头露面，表示正面拒绝的态度。

关于国共谈判毫无结果的原因，新华社记者称：蒋氏委责于中共的企图是失败了。蒋氏力说他的“宽大”和“尽量替共产党着想”。但是他到底是怎样个“宽大”和怎样个“替共产党着想”呢？蒋氏说：“政府在行政院内设置战时政务会议，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构，特使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但是所谓行政院战时政务会议，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是没有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的”伴食机关，是粉饰独夫统治的花瓶，共产党及其他政党若果参加了这种机关，无异于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来欺蒙人民，阻碍抗战胜利。蒋氏既说：“容纳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参加”，但是他同时又说：“在宪政实施之日起，各政党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这里蒋氏在自己打嘴。照这样说，在蒋氏的“国民大会”未开以前，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是没有合法地位的，你要各党各派以不合法的地位去参加所谓战时政务会议，还说“实在没有不可接受的道理”，试问这样的话，除了蒋氏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有什么人说得出来的么？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一致拒绝了蒋氏这个无聊提议，难道有什么丝毫不对的么？

蒋氏说：“政府并准备组织一个3人委员会管理整编共产党军队为国军的一切事宜，3委员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产党，一位是美军军官。”**蒋氏又说：“可将共产党军队在最高统帅节制之下，指派一个美国将官直接统率。”在这里蒋介石神经错乱，讲疯话了。**如果不是疯话，那就应该说：组织一个人民的委员会，管理与整编蒋介石所统率的那些压迫人民与经常打败仗的军队。蒋介石指挥无能，应予撤职查办，由人民组织的委员会指派一个在抗战中立了功勋的中国将官去代替他。此外，**给予八路军新四军以崇高的褒奖，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奋战敌后，抗击了多数的敌伪，收复了广大的国土，解放了众多的人民。**只有这样，才算公道。我们不愿请出外国人来压迫异己，仅仅提出中华民族赏功罚罪的民族纪律，中国人民定会一致赞成的。

蒋介石说：在国共商谈中，“我们所得到的经验，都是一个要求方才容纳，立刻就来一个另外新的要求”。蒋氏的疯话是这样无穷无尽的。不是吗？从1943年林彪同志赴渝，1944年林祖涵同志赴渝，同年11月周恩来同志偕同赫尔利将军赴渝，今年1月周恩来同志再度赴渝，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一切建议，蒋氏曾经“容纳”了哪一件呢？即如最轻而易举地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取消镇压人民的反动法令，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等等，你在何时“容纳”了呢？

关于蒋氏所谓“还政于民”及“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一节，新华社记者称之为在政治上走死路。独夫蒋介石及国民党内最反动的专制主义者们，现在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他们不从顺从民意，废止独夫统治，成立联合政府求出路，却想找寻一件民主的外衣，来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躯壳，这就是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实质。

**我们的独夫现已穷极无聊，在政治上钻牛角，竟然钻到袁世凯的洪宪国会和曹锟的猪仔议会那里去了。好罢，我们共产党人代表中国人民向蒋氏劝告，叫他不要如此自寻死路也算仁至义尽了，你一定要钻进牛角尖里去，就让你钻去罢。只是一件，要提醒你：在你钻进去出不来时，不要妄想什么人再给你解救，因为这是任何人也解救不了的。袁世凯做皇帝之前，也曾有人劝过他不要如此，他一定不听，做了83天皇帝之后，留下了一场“新华春梦”，给中国历史添上个无足轻重的插曲，做了个“一双空手见阎王”的枉死鬼。现在有想追他踪迹的，尽可追上去罢。**

新华社记者结语称：综观蒋氏演说，最清楚地暴露了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立场与企图。此种立场与企图，与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所自由表达的意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目前的国共谈判，早已不是商谈两党之间个别悬案的问题，而是解决着国家民族生命所系的迫切的政治问题。共产党在谈判中所提的要求，不仅是中国解放区九千万人民的要求，而且是中国沦陷区人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共同要求，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海外侨胞的通电及其他无数文件，足资佐证。就是在国民党内，亦有数量众多的爱国之士对共产党的主张，深抱同感。现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深闭固拒，谈判不得结果，这是全国人民的不幸，也是国民党的不幸。蒋氏声称：“政府仍将继续寻求合理的办法”，似乎尚有转圜余地。果然如此，中共是不会拒绝的。但是所谓“合理办法”，实在无需再去寻求，这就是立即废止这个威信扫地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有威信的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来领导抗战，争取胜利，并准备在战后召集真正由无拘束的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民主的正式政府。**我们希望蒋介石不要再耍什么花枪，要么就照着这个主张去做，要么就走你自己的路，我们的立场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语，欺骗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等下流无耻行为都不行，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别人一根毫毛，那是没有希望的。**

3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同志转临委、军政委：

一、丑灰电悉，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工作布置的方针。

二、国民党为着准备配合盟国可能在华南的登陆，已将3、7、9战区放在顾祝同指挥下，成立东南行辕退保实力，等待时机。因此，在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乃极为薄弱，在将来沿海及敌占的城市要道，定将成为敌我友顽争夺的场所，同时也有可能日寇在盟国未登陆前，乃至登陆后发动新的攻势，将国民党这些军队压入山地，或部分消灭之。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你们对于地区划分原已合此方针，现再提醒你们，小北江方面可否再多派一些队伍，自然不要太削弱东江主力。北江以东，西江以南的两个地区发展，亦要与此方针相配合，好分散敌顽注意，便于我在小北江建立基础。

三、东江沿海发展亦要注意建立向北山地之基础，珠江三角洲的布置固要面对城市，但背靠东西两面山地的发展仍是必要的。

四、关于沦陷区工作，除你们规定者外，应由临委设法通知各该处过去隐蔽或隔断的党员，恢复组织和工作，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武装斗争，**在没有党员和尚不能派部队去的地方，应设法找到留在外面的干部回去活动。**

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经过单线或个别关系领导，尽力劝导一部分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基础，以便今后发动。至于一时审查不清的党员可令其单独工作，在工作中考查。

六、**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商路与李济深（闻在玉林）、张炎的联系，并告以蒋介石先后派彭泽湘、陈策等带特务去谋刺他，要其小心。**

七、中央决定将临委及军政委合并改为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领导广东包括南路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并暂时兼管闽粤赣党的工作。区党委及其常委人数名单与各人分工，望你们照顾各个地区领导成份及其能力，拟呈中央批准。

八、关于闽粤边工作另电告。

　　 中央 寅鱼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潮、梅、闽西南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并转临委：

我们对潮、梅、闽西南工作有如下建议，望考虑后转告林美南等同志。

一、沦陷区及可能沦陷区，如潮、揭、普、惠，潮、澄、饶工作，可以经审查后恢复活动，以组织保卫家乡各种式样的地方性武装为主，未能审查党员则给予任务单独活动。林美南应到潮、普、惠、揭主持工作，潮、澄、饶则由周礼平负责。

二、梅、埔等国民党区工作，应劝导一部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同时积极开展新的战略据点，梅、蕉、杭武边的放点工作，由李碧山负责。

三、闽南可能沦陷的老支点，应由阿叨乌鳅分开负责，组成2个流动武工队恢复联系。闽西仍应在群众中继续巩固秘密党的基础，此二地应统一在朱同志领导下。

四、潮汕一带敌后游击小组，可以集中行动，并求发展。调罗林回来负队长职务，在普、揭中找一干部为政委。

五、沦陷区的各式反日武装及国民党区的反蒋武装，我们均应设法与之进行统战工作，特别**澄、饶边土匪武装，更应打入工作**。

六、各地情况如何，望经过东江电告。

　　 中央 寅鱼

3月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通讯：《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8日电】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氏7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博士据说在英国学过法律的，现在看来并未学通。所谓国民参政会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是独夫蒋介石所委派的一个无聊机关吗？把所谓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交给这样一个机关去“审议”，“审议”的结果说可以召集，根据王博士的法律，难道就可以召集吗？国民参政会的大数参政员，都是我们的独夫及我们的博士那一党的“同志”，开国民大会去决定召集好了，何必要这个机关去“审议”？**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参政员们不是有被居觉生先生的司法院拿去办罪的危险吗？最使人们吃惊的，是王世杰博士的记忆力竟然差到如此程度：你的“领袖”蒋介石不是在3月1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吗？6天之后，你就忘记了，似乎有了一个什么“负责团体”，而且敢于“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了。据说是“政府决定”的，这个政府不知是世界上哪一个国里的？但是一定不是中国蒋介石那个政府，因为蒋介石刚在3月1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这是一个疑案，有请王博士答复之必要。

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氏又在反对他的“领袖”了。王氏说：“无论如何，我相信政府必将设法，使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参加国民大会。”“无党派”，不去说它。至于“各党派”，那是注定了没有福气参加这个猪仔大会的，因为按“领袖”的圣旨，他们没有合法地位。圣旨说过：共产党在交出军队以前，民主同盟等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是不给合法地位的。下这道圣旨的时间也是3月1日，我们的博士难道忘记了？或者有意反对你的“领袖”？二者必居其一。

新华社记者称：**蒋介石以下反人民集团的一群，近来丑态百出，越来越不像样子**。**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将自己家里不肖子孙们的一切胡言乱语，奇形怪相，歪心秽行扫除干净，整顿家务，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3月1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配合盟军登陆问题给林平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

寅微电悉。你们现处之环境最复杂，**英国对港九绝不放手，且视广东为其势力范围，而美国则又易于先在广东登陆。美以扶蒋为主，英在拉拢地方实力，对我均有顾虑，**对你们则较轻视，而英尤狡猾。英美在华南，一方面有矛盾，一方面也必须求得妥协，闻蒙特巴顿至重庆亦为此事有所商洽，且**曾言美国将在广州湾、大鹏湾两处登陆**，但时间未说出。国民党不会放松这个机会，必在南路和东江有所布置，可以断言。闻其在南路已将张炎杀死不知确否？在东江及广九一带，除收买伪军外，戴笠特务系统还与英美两方进行破坏工作的合作，戴之破坏方向对我重于对敌，尤注意我与英美关系，且已得到若干情报。凡此种种均应放在你们考虑的问题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面我们华南力量不仅没有像华北、华中那样大的主力和根据地，并且与华中根据地也还隔得很远，而城市工作在短期内的发展也有一定限度，一旦盟军登陆，你们会遇到种种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应预计到并作种种准备，务使你们在盟军登陆的配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上被攻击受损失，反而能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准备应付坏的条件，争取好的条件，以便进退有据。因此，你们的工作方针，应尽量运用统战关系联多数，反少数，依靠群众，扩大武装，好立于不败之地。本此方针你们对盟国军登陆事，应有下列的看法和布置：

一、**盟军所要登陆的情报，可以给他，但他说的登陆地点不要完全信他**，如大亚湾即可以登陆，其西之大鹏湾即可以登陆，其西之墺头，有公路通惠州，再西之大鹏湾，则可迂回广九线，而大亚湾以东之地形并不甚好，是否有意将我们注意力引至东边，并便牵制敌人，望注意侦察。

二、在谈情报时，你们可正式与欧乐义谈具体配合问题，并提出武装我们的要求，看他如何答法。

三、英军服务团如亦向你们提出此问题，可以同样方法处之，但不要打通。

四、你们对配合盟军登陆的可能准备和布置望告。

中央 寅元

3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1. 目前国际国内两方面形势，都给了中国抗战和民主运动以有利条件。

在国际方面，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和精神，表现出：1、**英美苏3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2、**3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3、3大国在欧洲不仅要彻底胜利，消灭法西斯主义最后残余，而且要保证所有解放区都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一决定在将来可以运用于亚洲和中国。4月间旧金山会议，将是克里米亚会议精神的发展。**日寇最后失败已不可免，但他此时正准备持久挣扎**，故我们在抗战胜利前尚有一段艰难路程。

在国内方面，自去年9月我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国内民主派及广大人民，已纷起响应，并赞成以党派会议讨论这一要求的实施办法，只有蒋及其专制集团内恃其尚有150多万军队归其指挥，外靠其尚有美国政府为之供应，仍坚持其独裁和分裂立场，反对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并企图以伪装民主的国民大会使独裁合法化，以便在他们认为时机适当时好下反共内战的讨伐令。同时，**美国目前政策，偏以扶蒋**，这更易**以助长蒋之独裁气焰和内战危机，**而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起来，蒋更要加紧压迫。因此，国共谈判，至少目前不会有何结果，而内战危机则依然存在。总之，要专制派自动向民主让步，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内外压力增加，最后恐还要引出国际干涉，才能找到问题的出路。

二、我党在坚持联合政府的方针下，目前着重于揭穿和反对蒋所要召开的国民大会之伪装的反动的实质，指出它将是一党包办的、具有分裂性质的御用猪仔国会，绝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我们所主张的国民大会，是要在国土恢复、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等条件之下，实行全民无拘束的普选，才能实现。且这些条件，必须联合政府才能保障其实行，而国民党专制政府是绝对不会实行的。在战时，我们主张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亦即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政府；在战后，我们主张建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亦即真正民选的举国一致政府。为推动此运动，并团结各解放区及全中国民主力量，积极准备反攻，以便击败日寇，建设中国起见，**中央拟于七次大会上向各解放区及全中国人民提议在延安召开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方面成为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但不称为政府，而称为解放联合会；另一方面又保持其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这一组织在政权上说，**它将是地方性的联合政权，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故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在全国没有联合政府时，它将是促进联合政府实现的一种主要动力，在全国有了联合政府时，它将是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联合政府的支持者、辅助者，而在人民中将起着极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三、现在距七大开幕之期不及一月，为使各解放区党外人士及党内负责同志，对上述提议不致感觉突然并有所准备起见，**中央责成你们于电到半月内经过各边区、各行政公署，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商谈这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尽量征求大家意见，以供中央参考。**座谈会中应注意事项：甲、参加人数应使党外知名之士及杰出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多于党内同志，以便将来解放联合会中，能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领导。乙、吸收由沦陷区逃来的党外人士及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丙、这一问题可说明是本地党的提议，由党的负责同志根据此指示加以解释，但商谈时要尽量推动党外人士及群众领袖发表意见，即使是反对意见也不要拒绝。丁、这一座谈会暂不公开登报，各种意见望先汇报中央，暂不作任何公开响应。以上执行情形望告。

　　 中央 寅删

3月15日，邓小平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形势的报告里说：每个共产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党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

3月26日，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进入湖南省平江县，对外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驻扎在县城天岳书院。

3月27日晨，王震、王首道命人公开张贴了部队南下前曾经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全文如下：

去岁湖南沦陷，日军肆虐横行。皆因抵抗不力，政府抛弃人民。

本军奉命援湘，消灭万恶敌人。实行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好人。

工农商学各界，军队地方士绅；不分阶级党派，皆愿相见以诚。

一致联合对敌，展开民族斗争。独裁贻误国事，专制违反民心。

唯有迅速改革，方能耳目一新。实行三民主义，恢复中山精神。

取缔贪官污吏，扶持好人正绅。厉行减租减息，改善社会民生。

取消苛捐杂税，买卖务求公平。反对强迫兵役，欢迎志愿从军。

保障人权财权，维持社会安宁。严惩汉奸特务，悔过可以宽容。

中国有共产党，华北有八路军。满布大江南北，则有新四大军。

广东广西一带，抗日起义纷纷。德寇正在瓦解，日寇亦将土崩。

苏联英美中法，保障战后和平。世界进步很快，中国岂能后人。

愿我三湘子弟，一致义愤填胸。起来保乡卫国，充当抗日英雄。

倘有汉奸国贼，敢于阻挠军容；自当痛击不贷，勿谓三令五申。

特此剀切布告，仰各一体遵循。

司令 王震

政治委员 王首道

3月31日，毛泽东复电给王震、王首道，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

你们占领平江、崇城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间根据地**（包括崇、通、平、浏、岳、湘、长、潭），然后再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毛泽东 寅世

3月3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7次会议，讨论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和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及军事报告。毛泽东首先对《论联合政府》作了一个说明，他说：

“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也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

“我这个报告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对此有些意见，这是因为思想不很通。《新民主主义论》讲抗日的话还要少一些。**还在1937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我说的这次有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那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同志们的意见很好，90%以上我都采取了。”

“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采取联合的态度，但也略示区别，略有批评。这一点也很重要，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对资产阶级，我说是多半与土地联系着。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之类。有的人看到3月1日蒋介石的讲话与我们的痛驳后，又慌张了；听说赫尔利回我们的电报中说不要作最后结论，就又高兴了。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3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2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10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导**。领导问题我在报告中讲了一下，除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其他民主分子。

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份。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3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刚才几位同志提到大会的精神算不算旧账的问题。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议题，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决议草案。扯到军事历史、华北历史、各个山头等等，更是扯不清楚。**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没有说品质，没有说非法，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成为缺点，而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取了这个方针。**”

会议决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内容写入党章。开始，毛泽东不同意七大党章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说：

“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经过酝酿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才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意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命名，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会议通过了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党章草案》、《军事报告》，通过了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确定了七大会议日程。

欲知中共“七大”召开的情况如何？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5年3月2日撰写了一篇极其精彩的檄文式的《新华社记者评论蒋介石3月1日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在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他最后议论道：“**袁世凯做皇帝之前，也曾有人劝过他不要如此，他一定不听，做了83天皇帝之后，留下了一场‘新华春梦’，给中国历史添上个无足轻重的插曲，做了个‘一双空手见阎王’的枉死鬼。现在有想追他踪迹的，尽可追上去罢。”毛泽东还说：“我们希望蒋介石不要再耍什么花枪，要么就照着这个主张去做，要么就走你自己的路，我们的立场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语，欺骗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等下流无耻行为都不行，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别人一根毫毛，那是没有希望的。”**多么辛辣而犀利的语言！现在是到了又需要写时评和政论的时候了，可是有不少写手的文章不是言之无物，便是索然无味，何不学一学毛公的文风和笔法呢？

**第67章**

**“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

**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中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话说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谈话说：“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这是美国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让步、打破国共谈判僵局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就采取了对苏联妥协的策略，鼓励国民政府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签订秘密协议、同苏联举行关于签订中苏条约的谈判，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压迫中国共产党妥协。赫尔利4月2日的谈话，就是在这些同苏联的不光彩交易之后发表的。

4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日苏中立条约》将于4月期满，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

4月12日，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巨头之一的罗斯福总统因病逝世。历史终于使毛泽东与这位美国伟人失之交臂。

此前在1945年3月3日，斯诺从欧洲战场采访回到美国，罗斯福第3次接见他时说，准备在对日战争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他的不幸逝世，使美国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打算被搁置了起来。后来斯诺在回忆起这一憾事时写道：“一个月后，罗斯福去世了。这就关闭了这一战时中美友好的大门。”

毛泽东在罗斯福病逝之后，与朱德谈起了美国新总统的竞选问题。他说：

“美国正在竞选总统。我估计杜鲁门可能当上美国总统。”

朱德也说：

“蒋介石支持杜威竞选总统，我看他的算盘打错了。”

毛泽东的思路跳跃性很强，他没有接朱德的话，而是很自信地说：

“蒋介石投靠他的美国主子打内战，镇压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来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杜鲁门击败了杜威，由副总统升为总统。他一上台就赤裸裸地支持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活动，开始实行向蒋介石一边倒的对华政策。是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将谢伟思等6名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美国进步人士逮捕入狱。

再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8次会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期间，王明一直在家中养病。毛泽东先后3次把准备讨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送给王明看，请他提意见。就在4月20日这天，王明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弼时，说请他阅后转交毛泽东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位与会者，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意义。”“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3次‘左’倾路线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我认为中央应立即撤销我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

王明这封信是他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系统检查自己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所犯的错误，对于维护共产党的团结和召开七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首先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一个说明，他说：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24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50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12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1940年不许提路线，1941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经过8次修改、向全会提供3次草稿、而且是每一次都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最后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极高的评价。《决议》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正确总结。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专门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作了总结：

“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4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七大预备会议。

这时候，各地的代表都已集中到了延安。萧三也是七大代表之一。可就在此时，在“审干”中所发现的一些代表的问题，又提出来了，如果不承认其代表资格，就需要他所代表的那个地区重新选举。这样一来，由于关山阻碍，交通不便，七大就又得延期举行。毛泽东听取了任弼时关于代表资格审查问题的汇报后，当机立断，说道：

“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接着，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他说：

“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24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28年。这28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28年，中国共产党的24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24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第一次大革命的7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6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10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3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3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互相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1925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60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作‘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39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36天罡星。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4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90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9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作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10年8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作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52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3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的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我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不要怕这些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起来说，我们党24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预备会议确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通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新党章和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选出15人组成“七大”主席团，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林伯渠 彭德怀 康生 陈云 陈毅 贺龙 徐向前 高岗 张闻天 彭真

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20岁左右。

此时的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

代表们坐在木制的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走过的24年的路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V”字，表示与盟军一起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灰色的砖墙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等等。

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和主席团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主席台前就座。

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3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

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见《毛泽东选集》）为题致开幕词，他说：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1943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他自己准备在这次大会上要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及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彭真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参看《毛泽东选集》）。大会印发了《论联合政府》全文。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共分5个部分：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在第三部分最后讲到了中国的“两个前途”，他说：

“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裕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

“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在第四部分，毛泽东讲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他说：

“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关于“中国解放区的任务”，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的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五部分中，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最后说：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4月27日，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见《毛泽东选集 》），他写道：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的努一把力。”

从4月30日开始，“七大”在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的同时，进行了大会发言，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志中、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和彭德怀谈话时，彭德怀就自己在百团大战后期战役指挥上失误一事，不无愧疚地对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彭德怀又说：

“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

毛泽东则说：

“锻炼了部队。”

毛泽东一席话，温暖了彭大将军的心。

1945年5月2日，毛泽东复电河南区党委书记戴季英、河南军区及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王树声，对他们在4月25日关于河南发展现状和向伏牛山腹地扩大与建立基地的请示报告作了答复。他在电文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如果你们觉得向嵩、伊、临、鲁、南召地区进展是有利的，你们可以这样做。文年生等部赴湖南广西的部队本月下旬可从延安出发。

中央 辰冬

5月4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即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

1. 顽方既以6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行动。机动办法，或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区党委组成问题，中央另电通知。三、“七大”辰有前可毕，会后数日9旅3100人，文旅2100人，即可由延出发赴湘。四、“七大”文件广播你们收到否？

毛泽东 辰支

收到电报后，王首道和王震、王恩茂、张体学等立即在通山山口铺召开边区党委会议。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由王震率领主力第一、二支队和第五、六支队之一部，跳跃式向湘北挺进；王首道随军直机关以及三、四支队偕张体学部坚持鄂南斗争，以此南北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鄂南根据地，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基础。

后来，这南下部队第一梯队反复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周旋，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与顽军作战，在长江以南、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抗日根据地。

经毛泽东批准，南下部队在湖南平江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党委、军区和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聂洪钧任行署主任。

5月11日，“七大”第一轮发言结束。

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5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名额和提名方式。

5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1日至23日，七大会议继续进行个人发言，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林彪、马凤舞、刘澜涛、张鼎丞、傅钟、叶剑英先后发了言。

乌兰夫，190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蒙古族，汉名云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发动“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抗日第一枪。

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大会选举问题的讨论情况的汇报。

各代表团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有人提出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毛泽东就大家所提出的问题，说道：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3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25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说：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3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大会结论等两天就可以做。第4个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一下。”

关于“选举的标准”，毛泽东说：

“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这次要选举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就是说，有两批人要选进中央委员会来。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人数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17年了，这17年中间，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几次的选举，现在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25个人。这25个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再就是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25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于是就提出：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可以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这个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总之，在选举方面有这样3个问题。

关于第一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跟过去历次大会都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大会我参加过3次，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10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

“关于第二点，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要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作马克思主义，叫作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作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关于第三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

关于“选举的人数”，毛泽东说：

“今天要通过选举法，选举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提两回候选名单，第一回是预选的名单，第二回是正式选举的名单。通过选举法以后，大家就要考虑，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明天或后天主席团就要提出预选的名单。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目字的提议，叫作70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70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3个方案，一个是100人左右，一个是70人左右，一个是30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3个方案。这3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100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200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70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30个人、40个人左右太少了，100个人左右太多了，70个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团提出这些意见，当然最后还是决定于大家。”

“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总之，我们大会主席团希望同志们，全体代表同志，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的。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请同志们考虑。”

欲知中国共产党“七大”接下来的情形怎样，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因为只有了解了毛泽东的完整的真实的一生，才能够正确理解他所说的“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以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其他人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一生的终极目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最终要干什么。尽管毛泽东历来都把他的终极目标像宣言一样宣示于众，但在别人眼里看来，那只不过是口号喊喊而已，并没有把它当真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为毛泽东的终极目标出现后，连他的同代人甚至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部下们，绝大多数人也都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反对。

**第68章**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

**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

**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

**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

话说1945年5月29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起草的《新华社评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5月5日在重庆开幕，21日闭幕。这次大会虽然开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危机的时候，开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已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以总结和宣布的时候，但是它对于希望国民党有所改进的国民党员与国内外人士，所给予的却是失望。**国民党的大会在该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这是在全国实现团结统一，保障国内和平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最小的民主改革的必要前提），决定仍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决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对于国共谈判，决定“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也就是说，**准备随时以所谓“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戴在共产党头上，一切问题实行武力解决。**国民党的大会，既然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它对于目前的局势就不但不能澄清和改进，而且更正式地**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已经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这样，这次大会所作出的一切“民主”的姿态就只能成为一种显然的伪善。蒋介石向大会提出：“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3个月内取消；在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在6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与各省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陆续移归政府办理。”这就是说：国民党当局决定如同把他的政权交给他所制造的国民大会一样，把他的军队青年团及其他行政工作（包括他的特务工作）交给实质上毫无变更的国民党政府；使他所制造的各省县市参议会由临时变为正式；其他政党凡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合法，不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非法。并且所谓撤销军队的党部实质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加强国民党法西斯组织控制军队，这等于在1938年蒋介石宣布废除小组织，但是实际上是加强了CC团、复兴社等法西斯小组织。国民党的这次大会吸收了几乎所有高级军官为中央委员，便是一个明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实际上是把国民党的各种反民主的活动“国家化”，所以蒋介石的开幕词也说，“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总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而这就叫作“民主”，并且不许不叫作“民主”，反对的就是“破坏统一”，就是“妨碍抗战危害国家”，就不合于“政治结社法”。国民党的大会此外还通过了很多很多“民主”的宣言和决议，在这些文件里，**国民党当局对于人民的迫切而易行的要求如减租减息、救济民营工业等等不作明白的规定，却高谈其所谓都市土地的公有，集体农场，消灭剥削，党与国家的超阶级，甚至决定要“抑制遗传缺憾分子之生育”、“调剂两性比例”**等等，而其中心只是在实际上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垄断兼并开辟更多的门路，这是政治上反民主的必然结果。因此，国民党大会的许多漂亮文件只是引起广泛的厌倦与怀疑。合众社24日的重庆电讯说：“此间独立的和自由派的中国报纸一般的论题是提醒过去漂亮的决议案和诺言太多，而兑现的太少了。”它转述国民公报的社论称：“过去20年来国民党威信日降，可以归之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没有按照它的话去做。”它又转述素来为国民党政府说话的大公报的意见：“宣言和决议案无论怎么样，除非他们立即见诸行动，他们就会经常停留在一纸诺言上的。不仅如此，全国的统一和团结，是全国最根本的也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如果能够办到，则一切就将自动解决；如果不可能办到，那么，整个8年武装抵抗所作的牺牲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国民党的宣言没有充分规定这一点。”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成就，就是如此。

必须指出，国民党的大会是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虽然大会的代表实际上出于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指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在各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与改革要求，但是这些人的意见一般地不可能在被操纵的大会上通过。例如对于国民大会问题，据中央社宣称，代表们即曾提出“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定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请修正国民大会选举法以应需要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等，但是一切这些重大问题国民党的大会都只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一句话而不加解决，可是开会的日期却又以“应依照总裁宣示”一句话而解决了。同样，虽然这次大会是为狂热反共与准备内战的反动集团所支配，但**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影响着大会的代表，反动集团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而只以“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种暖昧的阴谋家的词令来作内战的伏笔。**国民党大会所通过的若干漂亮决议，虽然只是内战阴谋的装饰品，但是仍然反映了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员对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本家统治在实际上太不漂亮的愤懑反抗，与他们对于共产党所实行的，其他民主党派所主张的民主纲领的同情向慕。国民党大会恢复该党第一次大会承认少数民族的宣言，这是纠正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错误。大会又通过没收或“征用征借”中国在美各银行的冻结存款，这也多少表示了对于蒋孔宋金融寡头及其他大存户的不满情绪。大会要求“提高各级党部工作人员素质，特别注重其经历，人格，学识与革命性”，这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使用着一批怎样的爪牙，而蒋介石本人关于撤销军队学校中党部的提议，更自己答复了国民党的统治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的问题。但是军队学校的国民党党部既然应该撤销，政府中的国民党独裁为什么反而不应该撤销呢？不但这个问题蒋介石不能答复，其他许多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蒋介石也不能答复。**在9、10两日的国民党大会上，质问的人数达一百几十人，问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准备反攻、澄清吏治、改善役政、改善士兵公教人员生活，花纱布管制局业务失职案，黄金涨价消息泄露案，等等问题，而质问的结果乃是蒋介石的一顿大骂，用中央社的说法则是“总裁莅会致训，勖勉各代表多提供根本问题而有建设性意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党外的独裁同样也实行于党内，这甚至在细节上都表现出来。国民党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与新的多至460名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因为大会主席团的职权是“于总裁不出席大会时轮流主持大会”，大会后的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比这当然要更小而且要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蒋介石虽然要大会“全体一致起立”（而不是无记名投票）“选举”他继续做总裁，但在大会选举以前的开会期间，他的总裁职务却始终没有停止，这种“选举”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国民党大会的路线既然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而这种路线又不仅违反全世界潮流和全国人民公意，并且也违反多数国民党员的意见，那么，这个路线与其支持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将丝毫不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恐吓、欺骗和摧残所动摇。中国人民将继续以一切力量，为争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阴谋，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战斗到底。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口头总结报告，这个报告记录是难得一见的重要历史文献，特将其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一、国际形势。我在报告中这样说：“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这一看法到底对不对？世界是不是会倒退？“倒退”这个问题，报告中也讲到了，说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地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作另外的一种估计，报告中的某些基本点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地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样就要经常斗争。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但是，说苏、英、美3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3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客观实际上不存在。现在有两个客观实际，我上面说的不是按照反动派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而是按照苏联和世界人民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苏联和世界人民不要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说现在反苏反世界人民的大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英、美资产阶级内部，有一部分反动派要干，一部分不愿干，一部分是想干而不敢干。旧金山会议可能无结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绩而散。苏联在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3种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圆满；2、无结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们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下次再来；3、最坏的结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现在看来，第3种可能性不大，第1、第2两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3种情况发生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推翻了，这是不是说英、美就要组织反动派进行第3次世界大战进攻苏联呢？也不能作这样的结论。莫洛托夫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声明说得对，他说即使这次会议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也不能建立，我们要努力争取建立，这次搞不好将来再搞。他的这个话是包括对整个世界情况的估计，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国人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资产阶级内部不统一，不是完全反苏的，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的。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结束了一半，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即使旧金山会议这次搞不成，也不能说就永久搞不成。在宣布欧洲胜利的那天，斯大林说，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斯大林说得对不对呢？很对。在欧洲，战争时期过去了，和平时期到来了。斯大林的判断是根据整个情况说的。苏联是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列宁曾经讲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在10至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至40年白匪恐怖的苦难”。这是在1921年讲的。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是不是20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时，斯大林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现在是胜利了。苏联的胜利是从在莫斯科打胜仗开始的，不是从斯大林格勒才开始的，没有莫斯科的胜利，也就没有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苏联红军的旗子已经插在柏林，列宁的话讲灵了。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现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的古书上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按照列宁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将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至少在几个文明国家同时胜利。**到了20世纪的时候，列宁根据新的情况，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话又说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也讲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从十月革命起，资本主义缺了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再一夹，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夹掉。**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就装上木脚来走路。你们说这剩下的资本主义，是比过去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现在英、美各国的通讯社和报纸，专为一些小问题咬住不放，吵闹不休，令人看起来很觉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就是“蚀大本，算小账”。第1次世界大战失掉一只脚，第2次世界大战又失掉一只脚，现在却抓着一根头发死也不放。本钱蚀去了，不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国本身也打得五劳七伤，这表示资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们不抓小辫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用意。世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言论，其作用在于：1、阻止苏联及欧洲人民力量的发展，在苏联及欧洲人民面前，抓着小辫子讨价还价。2、调动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给自己撑腰。要找人撑腰，就不得不唱些适合于反动派的调子，才能调动那些反动派，团结那些反动派，作为自己的基础。3、压制革命人民。丘吉尔发现他处在欧洲人民包围之中，处在英国人民包围之中，所以要唱一点反动调子，压压人民。由此看来，我们便可懂得，旧金山会议争论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将来东方问题还要争论的。这些争论，好比做文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他们还有两只脚未砍掉，还可以走路，还不甘心，所以有争论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争论反倒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波兰问题的小辫子也抓不了几天了。苏联没有挂牵，所以能主动。英、美参加第2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动的，英国原来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苏联，把苏台德区等送给德国，但是它雇佣的希特勒这个“劳动力”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顿，打得哇哇乱叫。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原是出钱雇“劳动力”去打苏联的，送铁送汽油给日本，也就是出工钱的意思。日本就在边界向苏联挑衅，从美、英拿工钱，把工钱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才对日本宣战，英国并与苏联签订有效期为20年的《同盟互助条约》，美国与苏联签订在反侵略战争中互相援助的协定。资本主义的主动性，是在18世纪的时候，19世纪上半世纪还有一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昏庸腐朽，变成帝国主义，即处于被动了。第2次世界大战，英、美是被迫打的，没有计划的。对南斯拉夫，他们不承认，后来又承认了。现在对波兰也不承认，将来还是要承认的。现在他们不承认中国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

资本主义是向下的。经过第2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1928年繁荣期间，美国的生产总值为600万万美元，现在，有人说是2000万万，有人说是1800万万，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是1500万万到2000万万。如果说过去600万万是两个指头，那么现在若为2000万万就差不多是7个指头。它的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所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

这次旧金山会议，即使搞不成，第2次旧金山会议还是会要来的。因为世界情况需要它。关于建立反苏堡垒线，英国保守党是有这种企图的，从前是以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的这道墙壁，现在被苏联拆掉了。若它再搞这一套，那就回到张伯伦那里去了，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英、美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败日本后，两只手都要做生意。

总起来讲，第1次大战以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没有了，不稳定就经常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的，大概是10年8年来一次，是有规律的有周期性的。**这次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他们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可能稳定下来，但不是长期稳定，其中包含着危机。

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二、国内形势。

第一，《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第二，3个大会。去年9月民主同盟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日前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正在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3个大会如果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大会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实际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报》上都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大会，同志们可以去看。**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有一点特殊，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上面这两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民党现在更虚弱了，更惧怕了，他们的党员中想要加入其他政党的人更多了。但这个赌咒发誓，在现在这个时代往往是不行。

第三，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100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1931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16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第四，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作“准备吃亏”。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17条：

第1条，外国大骂。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作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第2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

第3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不是说几小块，也不是说统统占光，而是被他们占去几大块，他们要打内战“收复失地”。在10年内战时期，他们就曾经占去我们几大块，这次我们还要准备被他们再占去几大块。

第4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1941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50万军队，准备被搞掉25万，还有25万。这25万是什么？**原来50万是伸开的手掌，这25万是握紧的拳头，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100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150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100万，搞掉一半，还有75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第5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第6条，爆发内战。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8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易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

第7条，出了斯科比（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人民在抗击德国占领的斗争中解放了三分之二国土，成立了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德军败退后，英国将军斯科比率英军及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向希腊人民解放军进攻，屠杀了一万多名爱国民众，并将五万余人投入监狱，希腊民族解放阵线被迫解散了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武器——笔者注），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3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30里，3舍90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3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

第8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你90年不承认，100年不承认，将来到101年，你就一定得承认。因为我们的政策正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9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散得最厉害的是1927年，还有散得多的是内战时期，有组织的党员只剩下三几万。在不好的情况下，党员中有一部分悲观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压散了，也无非就是这样，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10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从1921年到现在24年了还没有胜利，还要搞下去，还要牺牲许多党员和军队。党内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的问题，不仅要对我们大会、中央、中央局，还要对区党委、地委这些领导机关都讲清楚。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100%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第11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天灾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帮忙。最近得到报告，华北、华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今年我们边区没有收成，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要讲节省，从中央起都要讲节省，**准备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华北、华中许多地方都要准备这一条。

第12条，经济困难。有天灾经济是困难的，没有天灾经济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我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第13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有的同志问：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怎么办呢？现在日本法西斯作战是寸土必争，看样子是不会撤的。但我们要把事情往坏一点想，即使长江流域的日军统统撤到华北，难道我们就呜呼哀哉了吗？中国抗战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横行不了多久了。**敌人集中华北，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假如这件事出现了怎么办？我们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这些办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14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有准备，以防万一**。

第15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不要以为不会发生意见分歧，上述困难一来，许多情况出现，就可能产生党内意见的分歧，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如果我们准备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没有准备，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16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中国革命是长期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他们还料不到我们的困难来得这样早，就是料得到也没有办法，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第17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困难我讲了17条，下面讲我们一定要胜利。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究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掉吧。**党员中间的动摇分子，他们在革命热闹的时候来凑热闹，在困难的时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们开欢送会。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24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些经验很好。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24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三、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上面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现在讲第3个问题，关于党内思想政策问题，这里面又包括若干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解放日报》昨天发表了一篇苏联人华西里也夫写的文章，叫作《论科学的预见》。这篇文章我们很久以前就翻译过来了，这是在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几个月写的，所以文内没有讲到关于这次大战的情况，但是可以从中看到对于这次大战也有预见。

**什么叫作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地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这3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9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比如，大城市是一个大东西吧，国民党加帝国主义是大东西吧，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总叫国民党是“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我们也曾看错过，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于是产生轻敌观念、速胜论**。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10个、8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的普遍的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就属于这种预见。**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感觉不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农村，还是在关内。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24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24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48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只不过几十年。1843年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到1903年整整60年，地球上的俄国才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叫作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内出了一个派别，叫作布尔什维克派，然后全人类才找到新的方向。60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普及，没有去实现，60年以后，才产生了这样一个派别，后来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行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从1903年到1914年，11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7年，又是3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1903年到1917年，14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1903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1903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我们的同志过去不大想问题，这要怪过去的领导不提倡想问题。**脑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这个器官专门做一项工作，就是“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这次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回到各个地方去，要告诉每个同志，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等等。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略。

（三）干部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现在是一个农民问题，将来是一个全国人民的问题。从内战时期开始到今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农民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列宁在1921年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应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0年至20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20年至40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1936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26军，后头是对待红27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现在我们有100万军队，将来要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四）整风、审干、锄奸问题。这次整风、审干、锄奸工作是有成绩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我是党校校长，整风在党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缺点与错误；第二部搞得比较好，进步了。以后整风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这种进步的方法去办。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后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1929年12月作了这个决议，1930年1、2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指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请参看《罗荣桓反思肃反：只用肉刑差点全军覆没》——笔者注），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认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9条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9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9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

（五）准备转变问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比如，**我们可能要集中20到30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这也要有准备，具体的步骤交给中央军委去办**。各位同志回去后要告诉各个地方，就是要开始准备，这个问题朱总司令已经讲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东北的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六）、（七）、（八）略

（九）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十）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他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11月份。

这里还要讲一个党外合作的问题。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十一）党性与个性问题。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120万党员就是120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整风中有党性，也有个性；生产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军事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政府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

（十二）理论工作问题。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5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5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5000人到10000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5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5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5本试试。我们还应经常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外国党的宣言、纲领一类文章，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十三）实事求是问题。第一，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24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第二，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5月31日下午，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名额70人左右、正式中央委员40人左右、中央候补委员30人左右的建议。

欲知“七大”的选举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基础和重要条件。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对党内历史上各种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的彻底清算，就不会有“七大”的伟大成就。“七大”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如本传前面所述，毛泽东在1918年走上社会以后，在20年的革命活动中，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出生入死，经历了多少坎坷和挫折，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艰难困苦的生活且不说，单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来自社会上的非议和攻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来自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及党内陈独秀的打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来自下级和上级的多次夺权和罢官，在遵义会议以后来自下级的责难和张国焘的威胁，在王明回国以后来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反水危机和重重阻碍，真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就是在这艰难险阻面前，他以无比的大智大勇、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坚忍不拔的忍耐力，终于走到了今天，彻底击败了各种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从而结束了他侧着身子两面战斗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从此以后，尽管前进的道路还是不平坦的，但就毛泽东来说，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说是如脑使臂、如臂使指，一片光明了。

**第69章**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话说1945年6月9日凌晨，毛泽东就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5月27日来电作了答复。此时罗荣桓肾病恶化，他在5月27日电告毛泽东说，因健康关系，希望中央能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毛泽东在复电中说：

“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报。你可于休养中在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不久，罗荣桓在鲁南时，毛泽东又给他发电报说：

“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淮南治疗了一段时间。新四军的医疗条件也不能查出病因，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做彻底检查，并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第二天，毛泽东又发一急电说：

“罗荣桓同志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

再说6月9日，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选举中央委员会。此次选举是根据选举方针和选举条例，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小组提出，经过反复酝酿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向代表们做了许多说服动员工作，提议把王明、博古、凯丰等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说：

“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现在经过整风，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着重个人责任。”

尽管李立三不在国内，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在党的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仍然提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还专门提到王稼祥和张闻天，说他们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他说：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样，多数代表才投了王明的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代表们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在主席台上没有动，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结束，看到王明以320票过了半数，他这才起身离去。

博古和张闻天此前均在七大上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再一次做了诚恳的自我检讨，因而得到党和代表们的谅解和信任，都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

王稼祥则因为得票没过半数而落选。原因是早在1943年秋以后，由于身体状况，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44年又因病脱离工作，进行疗养；更主要的是在整风时期，毛泽东请他担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他由于对整风运动有一些看法，便对这些工作都不积极。所以很多代表都不太熟悉他，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只得了204票。

凯丰在七大上对自己追随王明、博古所犯的错误，也做了深刻检查，可在选举时还是落选了。

这样，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包括王明在内的44人为中央委员。

6月10日上午，被编入七大第11组的毛朗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尚未起床，秘书告诉他说：

“主席昨晚忙了个通宵，直到天亮时，才上炕休息。”

恰在此时，毛泽东醒了，问道：

“谁来了？”

警卫员进屋报告说：

“主席，毛朗明同志来了。”

毛泽东下了炕，毛朗明已经走进屋来，说：

“主席，我开完七大，还回湖南去，找359旅去。”

毛泽东说：

“你回湖南可以，不过你还是等开完会再说，会后由组织上决定你回去与否。”

毛泽东问毛朗明参加大会的感想，毛朗明说：

“很受教育和鼓舞。”

“是吗？”毛泽东问：“我做的政治报告，你觉得怎么样？”

毛朗明说：

“您的报告写得很好，我反复读了，很受启发。它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选举有什么情况？”

毛泽东继续问道；毛朗明说：

“代表们对王明、博古不大满意，不赞成他们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解释说：

“尽管他们犯过严重错误，党内意见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大局着想，选他们当中央委员。会上我已经向代表们讲过，做了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大多数代表的思想通了。因此，王明、博古也当上了中央委员。”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继续说：

“他们看过我的政治报告，认为报告很好，承认中央的策略和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代表们还是选了他们。王明、博古分别给我写过信，都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

6月10日下午，大会首先公布了9日选举的中央委员名单。他们是（按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任弼时 林伯渠 林 彪 董必武 陈 云 徐向前 关向应 陈潭秋（本传前面说过，党中央此时尚不知他和毛泽民等人已经牺牲——笔者注） 高 岗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罗荣桓 康 生 彭 真 王若飞 张云逸 贺 龙 陈 毅 周恩来 刘伯承 郑位三 张闻天 蔡 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 山 叶剑英 聂荣臻 彭德怀 邓子恢 吴玉章 林 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薄一波 王明 博古

接着，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问题的报告。他说：

“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中央候补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毛泽东还特意为王稼祥说了话，他说：

“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第一是四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中央苏区，他参加了2、3、4次反围剿战争；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压制时，他却赞助并信任了我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支持我们的正确主张。第二是他早就开始反对第3次‘左’倾路线，是最先从‘左’倾教条小宗派中杀出来的，在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时刻，更起了关键作用，不然，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又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六中全会时，是他及时带回并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参与解决了党内的若干严重问题。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好事，中央的许多决策性文件，都是王稼祥同志主持起草的。”

毛泽东扳着手指数着文件的名称，又让大会工作人员把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中写给他的信发给大家。王稼祥在信中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表示坚决拥护大会的各项决议。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说：

“这封信是他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4次反‘围剿’中负伤而引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3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第1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最后说：

“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大会选举出3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毛泽东的说服下，王稼祥以第2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6月10日晚上，鲁艺为七大代表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

早在1940年，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传出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逐渐完善。不久就出现了有关“白毛女”的小说、话本、报告等。1944年，周巍峙等人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晋察冀，服务团成员邵子南把这个故事带回延安，写出歌剧初稿。后来鲁艺对歌剧初稿进行了集体创作，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向隅等人作曲。1945年2月，由王大化、舒强、张水华担任导演，鲁艺开始排练《白毛女》，准备向七大献礼。

1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七大代表观看了演出。陈赓的入场票被人拿走了，他没有座位，只得坐在窗台上看演出。当歌剧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唱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同起立鼓掌。毛泽东连声叫好。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向鲁艺传达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3人的3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艺术上的创作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

后来，《白毛女》在张家口演出时，根据群众意见作了重要修改。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大会首先公布了10日下午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结果，33名中央候补委员（按选举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画为序）是：

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 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 晓 谭 政 程子华 刘长胜 粟 裕 王 震 宋任穷 张际春 乌兰夫 李葆华 王维舟 万 毅 古大存 曾镜冰 陈 郁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张宗逊 陈 赓 王从吾 习仲勋 萧劲光 刘澜涛

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朱德、吴玉章、徐特立先后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演讲；接着，毛泽东以《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为题致闭幕词，他说：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作了3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3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开了50天的“七大”终于胜利闭幕了。会议期间，一共先后开了全体会议22次，代表团会议8次及小组会议许多次。大会贯彻了民主和团结的方针。大会主席团尽可能让每个代表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都去看望王稼祥，一来探视病情，二来为大会出现的选举反常现象抚慰王稼祥。王稼祥感谢大家的好意，没有一句怨言，连一点不愉快的情绪也没有。他对自己在党内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于无动于衷。

毛泽东始终不忘这位老朋友。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递增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再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后话。

6月1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了关于建立南方战略根据地问题给王震、王首道的指示，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即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

此次作战虽有牺牲，亦有胜利，你们数月来在湘鄂边行动是有成绩的。惟王陵基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地小，已处被动。今后方针，不外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如取第二项方针，又有一、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二、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南进，留小部配合张体学创造湘鄂边区等候张启龙、文年生等。南进时之目的地又有两项：一、以3个月左右时间一直进至湘粤边，在赣州、韶州、梧州、桂林、衡州5点之间创造游击区及根据地，与广东部队靠拢打成一片，启龙、年生等亦以8个月左右时间进至同一地区，**建立南方局面，并准备被隔断；二、**你们进至衡宝地区创立根据地，张启龙率9旅后续亦进至此区，而以文旅进至湘粤边与广东打通，亦须准备被隔断。

以上各项方针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考虑电复，以便决定。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南洋战区由英国负责，美军不打广东，故日寇放弃南宁，缩短防线，巩固粤汉，并东攻三南、河源。美军由欧东调，须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望根据此种前途考虑见复。

　　 军委 巳删

6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届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16日电】新华社记者就国民政府决定于7月7日召集新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是否有人出席一项问题，询问中共中央负责人。承其答复如下：

**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今年7月7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

1. 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以便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在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几次谈判之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至于恢复团结与建立联合政府之一些起码的条件，例如取消镇压人民的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承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撤退包围与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等项，不但一项也不愿实行，反而变本加厉增强了破坏团结与破坏抗战的反动措施。

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仍和过去的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至今没有合法地位。即就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而论，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并非中共自己所推选。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在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国民党政府此种对待中共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

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而如果这样做，就将铸成大错，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就会爆发。**很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

根据上述各项理由，中共方面已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

6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和工作部署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广东区党委：

一、七大已闭幕，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两报告广播，想已收到，望发动广泛讨论，并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二、对日战争，今年尚不能达最后决战阶段，明年可能有大变化。**华南形势，因英、美划分作战地区，美国将不在华南登陆**，英军逐步东移亦需时日。故日寇目前行动似在缩短广西阵线，转向粤赣边扩大战场，还不能估计其已有从华南撤退之迹象。

三、**国民党“六大”开后，专门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但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

四、美政府目前政策是在扶蒋抗日反共，但**日如寻蒋决战，蒋尚有再败可能**，**英、美在华南矛盾甚大，苏联对华赞成《论联合政府》**，主张声援民主运动，英、美及蒋，不能对苏无顾虑。

五、因此，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

六、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中央即将电令现在湘、鄂、赣边区之王震部队，沿粤汉路，经衡阳、宝庆间，直向湘、粤、赣、桂边区发展，另由延安派出5000人部队，由文年生率领，沿平汉、粤汉路南下，向湘、粤、赣、桂边地区前进，并负责护送七大广东代表，及200名军政干部给你们，计时7至8个月可到，以至配合你们**创造南方局面，成为制止内战之一翼**。

七、为实现此战略方针，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现在小北江支队，及在紫金支队，亦应继续向北发展，以扩张左右两翼。

八、区党委会议，除决定上述战略方针及在此方针下的各种工作外，还应着重讨论在国民党区的农村散布生活在群众中的武装工作队的工作，国民党军队工作（顽军以破坏为目的，友军以统战交友便于将来改造为目的，有愿入党的重要分子，可发展为极秘密党员）及伪军工作。

九、区党委委员，应包括东江、珠江中区3纵队，及南路北江各负责同志，并推出区党委书记名单，速电告，以便中央核准。

十、琼崖不划入广东区党委管辖，你们及南路有无办法送电台及人给琼崖，望与云涌商复。你们电收之中央各项公开文件，云涌如不便带回，必须使其择要，多看数遍，以便回去传达。

十一、南路及闽西南报告俟收齐后另复。

十二、执行情形望告，并将政权工作及政策实施情形，分类电告。

　　 中央 巳铣

6月17日，“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人士根据中央“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毛泽东敬献的挽词是：“死难烈士万岁”。

毛泽东主持公祭，并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说：

“百年以来，特别是自共产党成立以后的24年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为了反抗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便是在这种伟大的斗争中牺牲了。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少。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国的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革命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起来继续革命，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中国今天的广大人民抗日民主运动，1万万人民的解放区，100万的人民抗日军队，120万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七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纲领，就是这些几百万的民主主义者与几十万的共产主义者先烈们的鲜血所创造的，就是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结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更懂得如何团结、如何奋斗了。**中国一定是人民的，**中国一定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100年来，特别是近24年来一切革命先烈的志愿，一定要胜利实现。”

6月1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在豫中、豫东建立根据地问题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根据来电，伏牛山似非敌占区，胡宗南必用全力来争，我党在伏牛山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可能性似甚小，而**比较利于建立根据地之豫中豫东广大敌占区尚未开辟，因此请你们考虑根本部署问题究以何者为宜**。大约日寇溃败，国民党反攻，仅有一年至一年半左右时间，我党如丧失这个时间则将难在河南立足。再则国民党对日寇取避战政策，对我党取坚决作战政策，其战斗力决不可轻视。请根据这一形势考虑电复。**对高树勋及其他杂牌部队必须争取其中立，对任何国民党部队必须坚守自卫立场。**

中央 巳巧

6月18日这一天，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由文年生、张启龙率领，从延安出发，开往华南。

陶铸也在这批南下干部之列。中央鉴于敌后斗争异常艰苦凶险，决定此次深入敌后一律不调女干部，也不准带家属。可是曾志下决心一定要随陶铸一同南下。因为她在审干运动中也曾被审查过，所以她在一次舞会上找到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说：

“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

毛泽东有些为难地说：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何以单单让你去呢？”

曾志倔强地说：

“不能一律不准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毛泽东见拗不过她，便宽厚地笑笑，挥着手爽朗地说：

“好好！我支持你去敌后！回去我同少奇同志讲讲。”

结果，中央还真的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了。

毛远耀、毛朗明也随队离开延安南下。毛朗明任359旅9团政治处民运干事。行前，毛泽东对毛远耀说：

“你这次随军南下湖南，到那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如果有机会回到韶山故乡，**见到家乡父老，代我问他们好。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团结起来，大家都要有这个信心。”

第二梯队开拔后，中央又组织有5万人之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梯队，以古大存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准备“相机开赴华南”。

后来，当第二梯队进至河南省新安地区时，日本帝国主义就宣布投降了，第二梯队便奉命转赴东北地区。第三梯队则由古大存率领直接由延安开往东北地区。

6月1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1次会议。会议选举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陈 云 康 生 高 岗 彭 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选举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是：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毛泽东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七届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决议中说：

“七届一中全会根据七大通过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提议，及各个解放区的热烈响应，特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及其筹备事项如下：

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定于本年11月在延安举行，各地代表统限11月1日以前到达延安。

二、代表名额定为400名左右，为适应战争环境及备荒起见，希望有半数代表能由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及各解放区留延人士中选出。”

6月24日，毛泽东鉴于欧洲战场发生的巨大变化，德国法西斯投降，日本法西斯也行将崩溃的形势，针对王震、王首道想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为敦促他们迅速进至湘粤边界，与广东部队连接，创立五岭根据地，起草了中央给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

　 一、**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二、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的有利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

三、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这一方针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但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四、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文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在以三南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州、道州、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以永明、灌阳、恭城为中心之湘桂边区（如有敌伪军占据），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惟一的直接的依靠是你们内部的团结，是你们自己的正确的军事政策与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如果你们在这些政策上犯了大错误，那便要接受失败的结果，这一点必须预计到，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

五、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虚心，力戒骄傲，十分谨慎，力戒浮躁，十分团结，避免并逐步消除可能的意见分歧。在情况许可条件下，实行委员会的民主讨论，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然后坚决执行之。

六、现在大局有利于我，只要党内能团结，不丧失时机，在政策上不犯大错误，我们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中央给你们的强大任务的。希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中央 6月24日16时

王震、王首道等人接到指示后，这才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协同张体学部继续巩固鄂南、发展湘北，主力则向南挺进。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一架美式军用飞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在山城上空盘旋了一圈，向北飞去。飞机上载着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一行是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赴延安访问的。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生于江苏川沙，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1905年，黄炎培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救国会派”，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以章伯钧为代表的第三党，以左舜生和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经过协商，3派3党联合组织成了包括张澜、罗隆基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被推举为常委会主席。

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在讨论“五五”宪法草案时，会内会外有人想甩开共产党，召开单方面的国民大会；共产党方面也表示不再参加。黄炎培极为忧虑，他在参政会上说：

“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

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人相继发言，赞成黄炎培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7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又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谈判。3周后，他们得到延安的肯定答复，并邀7人访问延安。王云五因故未能成行。黄炎培在行前发表谈话说：

“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7月1日下午1时30分，美式军用飞机降落在延河畔的简易机场上，黄炎培6人走下飞机，看到迎面而来的欢迎人群，不禁吃了一惊：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张闻天、博古、邓颖超、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一共有30多人，几乎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到机场了。

毛泽东与6位客人一一握手，他走到黄炎培跟前，开口就说：

“我们是老相识了！有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面露诧异之色，他说：

“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道：

“先生知道么，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到你。1920年5月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那个杜威博士的大会，你主持会议，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想想确有此事，便笑了起来，连称：

“不敢当！不敢当！”

他称赞毛泽东真个好记性。此时的黄炎培，嘴上说不敢当，心里却暗暗得意。后来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到延安之行，都十分得意地说：“想不到当初我作报告之时，台下大群的听众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的风趣话，使场上的气氛，霎时从宾主的客套，变得如久别重逢的家人一般。

毛泽东和傅斯年握手时，自然也说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他与傅斯年及胡适的关系。

7月2日下午，黄炎培等6 人应邀到杨家岭的会客室去会见毛泽东。

杨家岭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那高高矮矮的山坡上有一排排的窑洞，当中有一个规模比较宏伟的大礼堂，靠山朝阳。黄炎培等人从大礼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进入一个会客室里。这会客室呈长方形，光线充足，中央放着一张长条桌，四周摆满各式椅子，可容纳20余人。

黄炎培步入会客室，惊异地发现在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特熟悉的画作：这幅画上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酒壶旁有几只杯子，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的作品，画旁有黄炎培题写的一首七绝，诗云：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幅画是在1943年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中，沈叔羊为其父亲“画以娱之”；叔羊请我在画中题词，我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子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就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想不到，这幅画竟然挂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厅里！

此时的黄炎培看到自己的作品，一股知遇之感的暖流涌遍了周身。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客人，在会谈中，他一再鼓励黄炎培等人在延安“随便走走，多提意见”。他还说，你们“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

在这6位客人中，天性好动的黄炎培还真的在几天时间内几乎跑遍了小小的延安城，会晤了许多新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会见时，对他执弟子礼。

且说是日晚，毛泽东为黄炎培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致答词，他说：

“我们来延安的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国团结上努力，我们相信，现今世界有一种好的趋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在由分而合，走向团结的一条路。”“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很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它问题了。”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观看了文艺节目。秧歌剧《兄妹开荒》给黄炎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7月4日下午，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的家里做客，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政策，谈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和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说：

“中共作风，到民国三十一年那年才转变。那时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当了中共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黄炎培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育家，与毛泽东探讨了教育学上的看法。毛泽东说：

“我并没有其它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毕业生。”

黄炎培认真地说，你所讲的话，都是“教育学上的要点”。毛泽东抽着烟，问黄炎培：

“来延安考察了几天，你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毕竟是熟读古今历史，且有着60多年的丰富阅历，他感悟出中国有一条可怕的周期律，有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黄炎培坦率地道出了他心中的一团疑惑。他说：

“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人心所归的革命政党么？**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早就有所注意，他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见黄炎培如此说，他略作沉吟，朗声答道：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心头的那团疑惑涣然冰释，连连点头，心中暗暗称好。他高兴地说：

“是的，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致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以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4日晚上，毛泽东又单独邀请傅斯年到家中做客，他们交谈了大半夜，情甚融洽。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工作，肯定他在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的贡献。傅斯年说：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毛先生等人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临别时，向毛泽东求书法，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此时已是凌晨时分了，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展开宣纸，笔走龙蛇，为傅斯年写了两个条幅，又写了一封短信。他将写好的信和条幅装入一个大信封中，并在信封上写道：

“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转孟真先生 毛缄”

事情办完了，毛泽东方才入睡。

7月5日，工作人员吃过早饭，按照毛泽东的嘱咐，将他装好的大信封按时交给了王世英，王世英又转交给傅斯年。傅斯年拆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 7月5日

毛泽东书赠傅斯年的两个条幅，一个写的是北宋诗人钱惟演在《始皇》一诗中的两句，他写道：

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宋人诗句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7月5日

另一个条幅写的是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他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一首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时，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已经待了5天，其间，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3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协会议”的一致认识。

短短的五天访问结束了，黄炎培等人就要离开延安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为黄炎培6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毛泽东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

12时50分，飞机飞返重庆。

后来，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

“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一位女士笑着说：‘连妇女卫生纸都是由公家发的。’”“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诸位先生，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乎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再说7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说：

“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

他还告诉王震、王首道说，南下的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第二天，王震和王首道率领主力部队3000余人，由鄂南咸宁县的茶地铺出发，经蒲圻、崇阳，入湘北的临湘、岳阳、湘阴、平江，于7月20日抵达长沙以北的福临铺。

7月7日，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他写道：

（甲）**从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全力扶蒋不与中共合作以后，我党对美国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尔利等），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情的分子（如被捕6人等），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而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乙）在延安已公开向美军观察组表示，在美国未与我方确定军事合作以前，不许他们派人到前方去，特别不准在敌后我区建立通讯机关（现在晋绥、太行两电台已交我们代管）。我们拒绝了美军如下的要求：1、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2、在各军区分区建立通讯网；3、派人到山东降落；4、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5、在晋绥增加气象台；6、在南泥湾建立对日的侦察电台等等。**目的在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

（丙）**最近美蒋合办之特种突击队（在西安及各地训练的），已陆续派往敌后活动，有一批在新乡降落，如进入我区，你们要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监视其行动，但仍招待其生活并报告延安请示。**

（丁）**不得我许可擅自降落在晋察冀的5人，早已解除武装，停止活动，并不许其通电。**现留在晋绥、太行的美军各一人，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望各地注意执行。

军委

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见《毛泽东选集》）。他在评论中写道：

“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国民参政会，7月7日在重庆开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数290名的参政员中，出席的仅有180名。”

“**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3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屎坑里去。”

7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7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

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包括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发出通电说：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自6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与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发起以来，迅速得到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与解放区各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在短短的22天里，各方选出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已达129人。被选担任筹备工作的同人鉴于解放区人民对于这个代表会议的迫切期望，已于今日（7月13日）在延安集会，宣告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并选出周恩来、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谢觉哉、刘少白、杨秀林、成仿吾、郭任之、郭子化、李澄之、沈其震、古大存、何思敬、杨尚昆、潘汉年、蔡畅、邓发、丁玲、张宗麟、柳满、乌兰夫、李延禄、周泽昭等25人为常务委员。

在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上，通过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在延安举行，希望各地各团体选出的代表统于11月12日以前到达延安。为使这个代表会议尽可能反映最广泛的中国人民的意旨起见，筹委会又决定：代表会议的代表，除极大部分由各解放区依地域选出外，解放区各种性质的人民团体，如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妇女团体、青年团体、文化团体、宗教团体等，都有权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此外，筹委会并热诚欢迎中国的各党派，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的人民团体，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团体，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团体，南洋及其他海外各地的华侨团体，都能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这个关系中国前途的会议。”

7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创造湘粤赣桂边根据地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广东区党委并告王王（即王震、王首道——笔者注）：

一、军委估计了整个抗战发展形势，对于华南局势，认为要经过一段长期复杂而艰苦的斗争过程才能获得胜利。**没有时局的预见，没有未雨绸缪的及时准备工作，将会遭受到许多困难，甚至严重地挫折与失败。**

二、华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能否在一年内（决不可错过此种时机）建立起真正有群众基础的粤北、湘南、赣南山区根据地，以准备在一年之后，英、美、蒋军占领广州及平原地区之后，我军能有山地依靠，将华南斗争坚持下去，使你们日益发展着的主力军，获得回旋机动的群众条件、地理条件，以为将来之依靠。**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完成，那你们在一年之后就将遇到失败**。

三、我们曾电告你们，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向粤北、赣南、湘南的五岭山区，建立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合力创造华南新阵地**，配合华北、华中我军，进行对日反攻作战，并**于日寇消灭后，能够对付国民党必然发动的内战。**

四、你们接电后，执行情形如何，你们派出的北江支队已进到英德地区活动，现进到何地？人枪多少？首长为谁？与你们有无电台联系？除此以外尚有其他力量北上否？均望即告。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

五、王震，王首道二同志所率部队，由湘北已开始南下与你们会合，望你们迅速与该部取得电台联系（3局已将通信呼号等电告你们，密码不日即有电告望注意接收），加强湘南、赣南、粤北的情报工作，随时将该区敌、伪、友、顽、我的情况，电告王震、首道，协助其顺利南下，并作一切配合行动的部署和部队会合后的各种准备，达到华南全军团结一致完成党的任务。

　　 军委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河南今后作战方针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他写道：

河南区党委：

一、我军入豫后，在对敌作战、发动群众与建立党政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你们的领导是正确的。

二、**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占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5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准备一切条件，在一年之后，对付胡宗南大举进攻。**如果不能利用时间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此点必须预先想到。**

三、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要希望中央及太行、太岳再给你们以军力、财力及干部之援助。**向一切负责干部明确地说明上述任务及依靠你们自己协同河南人民解决一切问题不靠任何外援，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四、完成上述任务当然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必然会遇到种种内部的与外部的困难，对于此点你们应有充分的预见与精神准备，然后采取各项谨慎的坚决的适合情况的步骤，执行各项正确的军事政策，坚决发动群众的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展公私经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团结各部分军队各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内部政策，以求逐步地克服内外困难。

五、你们应与晋冀鲁豫中央局（不日成立）及鄂豫皖区党委建立密切联络，将各种活动通知他们，同时告知我们。

　　 中央 午删

欲知国共两党的斗争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所述毛泽东6月24日为中央给南下支队（即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起草的指示电，首先说明“**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接着说“**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他同时指出，王震、王首道要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和在延安时交代他们的“**在地区上是不同的**”，是“**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的，而且还警告他们说，如果坚持错误的政策，就有**“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这既是对二王的严厉批评，也是对他们继续南下的有力敦促。

毛泽东早已预料到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从策划开展东北地区的工作，到派支队南下开辟南方巩固的根据地，他那一系列的指示，为在抗战胜利后的内战中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描绘出了一幅多么辉煌的南北呼应的战略蓝图。只可惜彼时的南下支队和广东区党委就像两个极不情愿的少男少女，一个不愿意下轿，一个迟迟不去迎娶，就这样丧失了有利战机，南下支队最终是损兵折将，“**被迫北返**”，岂不惜哉！

**第70章**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

**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

**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

**法，也拿起刀来。**”

话说1945年7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新闻稿《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二十二日电】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时局的评论。新华社记者说：**中国政治形势在最近半年内，被赫尔利——蒋介石政策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希腊的黑暗局面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威胁着抗日战争与国际和平。这一危险形势，在中国解放区人民面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面前，也在英、美、苏三同盟国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纠正赫尔利——蒋介石政策与制止内战危机**。大家明白，要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设国际和平，决不能容许中国打内战，决不能容许赫尔利——蒋介石政策继续推行下去而不被制止。

**在赫尔利鼓励之下，蒋介石于1月1日与3月1日宣布了实质上是准备内战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形式**。这个计划，近日虽然受到了某些阻碍，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上略为修改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但是内战危机依然在继续发展。对于赫尔利——蒋介石的这个反动计划，中共自始即表示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其他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在内，也表示了反对态度。此次参政会开会的前夜，中共发表声明不派人出席，这一行动鼓励了许多民主派参政员在参政会内与会外反对“国民”大会的勇气，褚辅成、黄炎培等6参政员来延时，中共当局和他们交换了意见，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参政会开了两星期，已于20日闭会。整个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在几次的激烈辩论中，独裁派与民主派均表示了自己的立场。19日，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新华社记者指出：这个决议包含了某些妥协性，但是并未变更国民党的反动计划。

这个决议说到了4个问题：（一）国民大会的日期；（二）国民大会的代表性；（三）国民大会的职权：（四）某些民主要求。关于日期问题，决议说：“本会同人意见未尽一致，本会兹不提出具体意见，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所谓“日期”，在反动派看来，决不只是一个事关“政府威信”的问题，而是一个独裁与内战的问题。他们一定要保持一党专政即独裁的权力，不允许有非国民党人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大会的日期问题上作决定。**在内战问题上，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军事布置上都是为着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解放区“收复失地”与消灭中共这个具体目标的。**而要打内战，没有国民大会固然一样可以打，有了国民大会则更加好打。日期“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他们将斟酌些什么情形呢？当然是斟酌最有利于保持国民党独裁的时机，尤其是斟酌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机。要说这一条有它的一点积极意义，那就是以十分委婉的语调没有承认今年11月12日开国民大会这个威胁人民的确定的日期。这就是说，国民大会这个威胁人民的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他想什么时候使用都由他；不过为了应付人民的坚决反对，日子或者会稍为更动一下。**中国政治形势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独裁者争着要“还政于民”，时间越早越好；中国人民却坚决地反对。这件事看来好像奇怪而且滑稽，**实际则是表现了中国独裁者与中国人民所处的从来没有的新环境。这件事不可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初期与中期，因为那时还没有造成中国独裁制度遭受到如像现时这样严重的危机，也没有造成中国人民如像现时这样巨大的民主力量，也没有造成现时这样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国际条件。

7月19日的参政会决议，没有赞成独裁者今年开国民大会的“还政于民”的反动计划，对于独裁者说来，无损独裁制度的毫末，对于人民说来，没有增加丝毫的权利。**必须记着：“国民”大会这个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而且即使没有“国民”大会，仍然可以打内战，中国人民绝对不可稍有疏忽与大意。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

新华社记者说：参政会决议的第二条也是极其含糊的，反动派很可以利用这一条。这一条说：“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各参政员提案，衡量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尽使国民大会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这里所说的“政府”，是独裁派的政府，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独裁派的法律，现在写上了决议案，将来他们“衡量”一番的结果，依然不外强迫人民承认10年前的那一批国大“代表”依然有效。独裁派也会“衡量”“事实”，其结果不外加“选”或加派一批人。这样他们就会说：已经“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了。但是**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事实”是10年前的所谓国大代表，是由国民党一手伪造的，必须全部否定它；在敌人未完全消灭，国土未完全解放，人民无完全自由的全部时间内，不许可办理国大代表的选举。**只有全部否定旧代表，并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下重新选举新代表，才能称之为“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我们完全赞成“极完满代表性”这几个字**。从今以后，谁要召开什么绝无代表性及代表性不完满的“国民”大会，必将受到坚决地反对。

1. ：“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这一条表现了国民党独裁派的反动计划，依然坚持着。**历来只唱“制颁”宪法，反对“实施”宪法的，现在他们唱起“即予实施”的好听的调子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举”大总统，仿效袁世凯做皇帝。**今天中国的独裁派即帝制派很需要这一条，他们急于要以帝制（一名大总统）来镇压人民、发动内战，以维持其自己的反动统治。

第四条列举了几项要求。“采取可能之政治步骤”，这一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第二项，保障人民自由，加了“合法”二字。第三项，承认各政治党派，加了“依法”二字，在独裁派看来，一切都好办了。第四项，“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综合第四条各项，对于独裁派，并不会损失什么东西。仅有一点稍有意义，就是规定这些措施，应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做到，表示国民大会今年或者不会开。

新华社记者结语说：**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新华社记者说，**只有3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3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3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7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给王震、王首道，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

一、巧电悉。桃花山、金家坪在何处，沿途情况如何，**估计多少时间到达五岭山脉**？

二、日寇为对付盟军在山东登陆，由湘、桂抽调5个师团北开，并非放弃华南。但为缩短防线，已放弃南宁、柳州、赣州等处，还可能放弃若干地点。但至少它要固守广州及整个粤汉路。吉安、袁州并未被占，商人所传不确。

三、3巨头（指苏美英3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笔者注）在柏林开会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赴苏会谈10余天，尚未解决问题。3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四、**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醴、衡、宝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4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五、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

六、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例如严重的敌情，打败仗，无饭吃，部队不但无扩大而且很大缩少，内部意见分歧，不团结等等。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 午养

接到毛泽东又一次催促南下的电报后，南下支队于7月28日从湖南省宁乡新田湾出发，继续前进。1945年8月1日，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等和王震、王首道举行联席会议，违背毛泽东7月22日发来的“**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的指示，决定将一部份兵力（“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4支队”）留在湘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余部则于8月6日从湘潭与衡山间的龙船港抢渡湘江。

7月23日，毛泽东为朱德、彭德怀起草了《抗议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致蒋介石、胡宗南电》，他写道：

万万火急，重庆蒋委员长、西安胡长官勋鉴：

据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敝部报告，一周以来，西安方面，突起变化，**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大批军队，由潼关、灵宝、陕州一带抗日前线纷纷西开**。陇海路停止商运，专运军队，昼夜不息。已达同官、耀县、泾阳、乾县、兴平、淳化、栒邑一带者有第1军之第1师，第3军之第7师，新7军之暂36师，16军之预1师、预3师，36军之52师、59师，80军之新37师、165师，共计9师之众，声言反共第一，抗日第二，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本月21日，第59师部队，突然袭击我边区防地淳耀县爷台山一带，迄发电时止，业已激战3日，尚无停止象征。窃以大敌当前，国脉民命，系于国共两党之团结。当此三强会于柏林，盟军由西东调，我国正宜调整内部，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强寇之际，忽闻内战急报，实属惊骇莫名。除饬敝部谨守防地外，特电奉闻，乞予制止，并祈赐复。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7月24日，毛泽东为周恩来起草了《揭露蒋胡内战阴谋致龙云电》，他写道：

治州主席：

反攻在即，举世正属望于柏林三强会议及苏联过问远东战争之际，蒋胡忽暗调潼关防线大军8个师，集中栒邑、淳化、三原、耀县、同官等地，企图攻占边区，挑起反共大战，破坏抗日局面。现胡军之暂编59师、预备第2师，已侵入我关中囊形地带，攻打马栏镇以南之爷台山甚急。我除守自卫原则坚决抵抗外，已通电国内外，呼吁团结，要求一致反对蒋胡阴谋，制止内战扩大。特此电告，并乞转知华兄（指华岗——笔者注）。此间通电新闻，另由广播发出，请收听。

周恩来叩 午敬 延

7月29日，毛泽东在《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中写道：

福斯特同志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充分表现于白劳德所著《德黑兰》一书中），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

1945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说：

“祝贺部队已达湘潭南部，行军顺利，甚为欣慰。今后南进究走何路，由你们根据情况决定，总以出敌不意，走‘之’字路，如你们最近20余天所取办法为有利。”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开辟湘粤边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广东区党委：

午陷电悉。

一、王震、王首道率3000人7月从鄂南出发，现到湘潭、衡山间，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率6000人现到河南，4个月内可到湘粤边。

二、你们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之兵力及领导，并从东纵派出一有力支队，由一个得力同志率领，附电台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三、现到广宁、四会间并向怀集、连县、连山、阳山地区推进之珠江纵队主力，与你们有无电台连络，领导人是谁，兵力多少？该地区敌顽分布情形，均望即告。这一地区（小北江）极端重要，你们对之应加强领导。

四、盟军登陆**日寇北撤后，你们所处平原地区将处于极端困难地位**，目前即应充分考虑此种情况，在精神上与部署上作周密而适当之准备。整个广东力量应就各部现在活动地区及其附近，选择适当地点，深入群众工作，训练干部，准备将来长期奋斗，方不至临时张惶失措，遭受挫折。这些地区为小北江地区，乐昌地区，南始地区，北江地区，东江地区，珠江地区，西江地区，中路地区，高、雷、钦、廉地区，琼崖地区，潮汕地区等。每区均应有主力军、游击队、民兵之组织，极力和民众打成一片，坚决减租减息，解除民生痛苦，**准备长期奋斗，不怕内战，对国民党绝不让步**。每区均应有电台联络，并多购无线电器材。**上述各区中应有一区为中心根据地，作为建立广东军区机构及区党委所在地**。此区以在何处为宜，望考虑电告。

五、中央除给你们干部200人（由伍晋南率领随文年生部队南下）及派王震等至湘粤边建立根据地和你们配合作战外，一切依靠你们及各区同志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独立奋斗，发扬创造力，绝对不要依赖外援，即王震部亦是配合作用，不可存依赖心理。

六、你们必须将上述方针在半年内部署完毕。尤其注重精神准备，要有不怕一切困难之精神。

　　 中央 未支

（此指示正式发出日期是在8月7日18时发往广东，8月8日4时发往驻扎在安徽大悟山的新四军郑位三、李先念的第5师，8月11日午时发给王首道。）

8月4日这天，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发展豫鄂根据地对付将来的内战危险给郑位三等的指示》电文如下：

郑、李、陈（指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笔者注）：

午马电未支收阅。你们已估计到将来问题是很对的。

一、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作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至临事张惶遭受挫折。**

二、**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拍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你们应有几个根据地，其中鄂东、鄂南、鄂西、襄北，可就现根据地逐步发展之，大别、桐柏两处，现亦有相当基础，将来可集中主力夺取其一部或大部，作为主要根据地，而以其他各处为卫星。**目前极力发展豫南力量，迅速与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笔者注）**打成一片，甚为必要**。是否可将师部及区党委移至豫南，请加考虑。

三、加强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加强军训，加强财经工作及准备干部，此5项，望在扩大会上根据自己经验加以总结。此5项中，有几项是你们不甚擅长的，应加强调。军队不只是打仗一项任务，还有做群众工作及从事生产自给两项任务，这个问题，你们必须着重解决。军队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亦须于军训中很好解决。不是缺少做地方工作干部问题，而是军队帮助地方做群众工作一项任务强调不足之故，对此加以强调，转变军队作风，地方工作干部就会多起来。

四、**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中央 未支

（此指示在8月7日5时发给新四军第5师，8月7日8时，中央又将此指示分别发往华中与河南）

8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条件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山东分局：

美军登陆期近，国民党必用全力争夺山东。我为准备条件，以利在美军登陆后获得迅速发展，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力量起见，你们应注意：（一）训练军队；（二）训练干部；（三）加强武工队；（四）加强群众工作（彻底减租，但防止过左）；（五）尽可能彻底消灭顽伪；（六）加强城市工作（可能被我夺取之城市及要道）。如你们能在半年内加强这些条件，一遇美军登陆，敌军集中对美，我党即可乘机发展，控制广大地区，而不怕国民党的争夺，否则我党将处于不利地位。上述任务，在冀鲁豫及华中是相同的。山东及华中的某些沿海地区，敌将于美军登陆前加强对我扫荡，自应加以注意。并告冀鲁豫及华中局。

　　 中央 未鱼

这个指示后来在8月10日才正式发给了山东分局。

8月6日这一天，美国在日本第7大城市广岛扔下了第1颗原子弹。广岛当天死伤17万人。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百万大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中苏边界，向日本关东军75万大军发起强大攻势。

8月9日晨，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致电斯大林，欢迎苏联对日作战，他写道：

斯大林大元帅：

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 朱德

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长崎当天死伤6.6万人。

至此，原子弹的威力震慑了整个世界，同时也传递出美国核威慑的信息。

这一天，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美军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毛泽东一看就来气，把报纸推得远远的，怒道：

“怎么搞的，这是谁家办的报纸？渲染恐怖，吓唬谁？”

他摁灭烟头，抓起电话，要接线员接通延安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负责人博古。正与《解放日报》全体人员开庆祝会的博古接到毛泽东的电话，脸色顿时变了。毛泽东口气非常强硬，一口湖南话透过话筒，使室内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听清楚，他说：

“博古同志，你今天的报道是政治性的原则错误！你搞的是什么名堂，你有没有一个共产党人的立场？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和相关的同志立即到我这里来。”

尔后，毛泽东把博古和《解放日报》相关负责人、编辑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责备他们不该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渲染原子弹的威力。

翌年8月6日，面对美蒋勾结发动的全国范围内气势汹汹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轻轻一弹烟灰，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句气吞山河的话，立刻传遍了世界。

毛泽东严厉批评《解放日报》不分青红皂白渲染原子弹的威力，反映出他从一开始就未雨绸缪，高瞻远瞩，预见到了核武器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的双重作用。

再说8月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2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苏联参战后的时局和方针问题。朱德、彭德怀、陈毅、彭真、聂荣臻、叶剑英等15人作了发言，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他还说：

“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4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发表一个声明，就是从他在会议上讲话中摘录的一部分，即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内容如下：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8月9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闽粤赣边工作方针与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陈平英并转林美南、朱蔓平、魏金水、李碧山各同志：

一、**国民党正在企图利用盟军登陆之机，准备大规模内战，现时许多地区已打响**，但因国内外条件及我党坚持武装自卫反对内战的方针，一方面积极扩大解放区，发展自己力量；另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民主运动，实行有利条件下的人民武装自卫斗争，故内战出现尚不是直线发展而是断续出现的。可是，**全面打响的危机，却日益严重，尤其是华南，更为国民党首先争夺之所。**敌寇可能由华南北撤，但仍可能巩固粤汉干线及其周围，以备作大陆作战的进退要道。故闽粤赣边敌之攻势是流动的，国民党之围攻将是长期的。因此，闽粤赣边党的工作方针，应以党的政治口号，放手动员群众，坚持与发展各地武装据点，实行人民武装自卫的斗争，并领导群众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掩护党的工作，发展和保护群众利益，以达到树立华南革命根据地的右翼基础的目的。

二、**闽粤赣边既是将来内战顽我必争的战略据点，故现在必须加强一切必要准备**。闽西在巩固岩永据点下，王涛支队可依靠汀连据点以武工队向清流、宁化方向前进，在可能时设法与汀瑞县委取得秘密联系。龙岩大队应以恢复岩南漳据点为目的。而永定大队则恢复岩永靖据点。永和靖须加强大埔、平和边工作。闽南除恢复本身据点外，应加强云和韶工作，及向安南永放点。饶和埔除巩固武工队发展的据点外，应着重杭蕉武工作及韩江河边据点。潮普惠大队除巩固南南山工作外，应发展南洋山、梅林一带工作，以便取得与海陆丰支队联系，并向潮揭丰边放点。潮澄敌后小组，应向莲花山放点，以便配合闽南与饶和埔工作。以上各项作为建议，由当地领导同志依情况自行决定与变更。这些地区的星罗棋布，以一年为期，**打下基础，准备在大规模内战时能起华南一翼的牵制作用。**

三、武工队应是政治工作队，故每组应有能灵活执行政策、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者，用各种方法（主要是隐蔽的）去建立据点，切忌急躁暴露，以致群众受摧残。**杀人只能是对付个别最顽固分子，不可滥杀。没有必要和没有胜利把握的仗，绝对不打。**到处根据群众切身要求，领导改善生活斗争，采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应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并照顾其利益。一切应作长期打算，落地生根，然后用细胞分裂方式发展。故武工队，到处应能参加群众生产，使其能联系群众，取得掩护，而又减轻生活负担。武工队视环境需要及条件如何定其面目，不一定都以党的面目出现。

四、农民组织，除在国民党统治薄弱可作为我据点的地方应一般地组织农救会外，大乡村则一般地应采取各种农村旧有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以保长远。农救会在据点中应成为我党领导斗争、掌握武装、乡政的坚韧外围，通过它领导合法的乡、保长去应付敌顽，又通过它采用适当非法方法保卫群众利益。应逐渐扶植农民领袖在乡村内由参与乡政到控制乡政。在人民中有传统的两面应付经验，我们应予以研究和发扬，使之用来保护群众利益，掩护革命活动。城市民主运动，应利用民主同盟及进步中间力量的活动去发动，但应与秘密党严格分开。发动后除留必要人物支持城市工作外，原则上应着重知识青年下乡与乡村青年结合，帮农民改善生活，防止抗战初期的救亡暴露作风与下乡不切实帮助农民作好事、不与农民结合等错误。我们有办法建立的农村工作，应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同盟者束缚。

五、**已暴露干部，应尽量参加武工队，避免损失**。暴露的组织，如靠近支点或山林者，可暂避而采必要自卫，否则应停止活动，另找社会关系掩护，以待时机。同时在这些地方应很秘密地建立短小精干的平行组织，保证暴露的组织撤退，或停止活动后该地区我们仍能领导。对过去撤退至渝桂昆干部，如回来，应经过详细审查，单独使用，从不断工作中考验他们。对老干部要很好爱护，帮其总结经验，解决其一些困难，提高其政治信心，以转变其情绪和认识。罗林最好仍安插在潮澄饶以便将来开展与闽南的联系。

六、你们电台既已恢复，望速设法与东江叫通，不要经常使用，每周只通一次报，以保安全。在通电后望你们考虑是否可以恢复闽粤赣边的集体领导机关（暂时不超过5人委员会），有无适当地点可以集中和联系，均盼经东江电告我们。

七、谢育才应在独立工作中作长期考察，不应使之和林美南一起。方方有一电致谢，有便转去。

中央 未佳

8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日本无条件投降，无可避免，实现在即，**我军在华中立即实行下列部署：

一、由2师担任夺取蚌埠至浦口之线，4师担任夺取徐州，3师主力即日开动集中津浦线，与2、4师共同担任夺取该线并巩固其占领。

二、由7师担任夺取芜湖，1、6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浙东担任沪杭甬之线。

三、以上两项行动，均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津浦线至少集中10万到15万人，沪宁线至少7万人。此外，各中小城镇据点由专署、分区、县府及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就近占领之。

四、5师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

五、军部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3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5师师部即日发表武汉市长及湖北省主席，人选你们拟定之。

六、占领城市后，立即委派官员接收公共机关，出榜安民，维持秩序，发动群众，推行新政，武装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坚决镇压一切反抗。

七、以战胜者的姿态，用军师首长名义，就近令各敌伪军投降，违者即坚决解除其武装。

八、**在津浦线一面进占城市，一面要有准备击退李品仙、何柱国与我争夺城市的计划。江南要有准备击退顾祝同的来犯，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

九、具体行动办法由你们拟定令行。

十、如日本投降实现时，你们立即照上述方针办理，如敌继续抵抗，你们亦应积极准备实施上述方针，以免将来临事仓卒。

　　 中央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苏联参战后，日本政府有继续抵抗可能，亦有投降可能**。**在此伟大历史突变之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追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自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当我军进占城镇时，应宣布纲领，特别严明纪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紧防卫，并注意爱护各种资材，照顾统一战线。**在所有占领区，迅速发动群众并武装他们，主要是武装工人苦力。**

　　 中央 10日

8月10日这一天，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对日作战的中、美、英、苏4国政府，要求投降。

这天下午，蒋介石一得到日本要求投降的消息，就接连发出3道命令：第1道命令**发给国民党军队，要求“各战区加紧努力，一切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2道命令发给伪军，要他们“负责维持治安”，“趁机赎罪”；将50余万伪军改编成“国军”，成为国民党的“先遣军”。**第3道命令发给朱德，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收缴日伪枪械。**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全文如下：

转发各区党委

一、**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二、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私自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3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在此阶段内，陕甘宁、晋绥、太岳、河南、湖北、皖中、浙西、湘粤等地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其余均用于解决敌伪。某些有特殊情况的地方，中央已另发个别指示。（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按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三、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兵力使用与干部使用应有重心，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攻破据点，占领城市，应有统一的指挥与严格的纪律。迅速训练干部。迅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五、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

六、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

七、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八、望各地本此方针，参酌地方情况，考虑执行之。

中 央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创立湘粤边根据地等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广东区党委：

一、**苏联参战，敌寇投降，内战迫近，华南马上会出现蒋、余（即余汉谋——笔者注）争夺敌伪而又共同压我的局面**。

二、你区在接得未灰中央一般指示及延安总部广播命令后，应根据华南情况注意如下事项：（甲）你们应乘目前混乱状态而蒋、余两系军队又忙于进入广、韶等大城市之际，仍以最大主力用极大速度迅向粤北发展，以便**与湘粤边两周后可能到达之王震部队取得联系，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这是最要的一着，没有此，你们将无退路。（**乙）你们另以其他兵力迅速进占广九线及各路某些小城市，收缴敌伪武装，扩大自己，准备迎接国民党发动内战。（丙）港九、汕头、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一切被我占领之小城市亦须随时准备退至乡村坚持游击。（丁）望火速派员通知南路、琼崖及其他游击区，令他们于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本地区发动人民坚持游击，只要坚决依靠人民，少犯政策错误，总是会胜利的。

三、执行情形望告。

　　 中央 未真

**中共广东区党委接到指示后，这才下决心令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启程北上。**东江纵队于8月15日出发，珠江纵队于8月23日出发，分东西两线从粤汉铁路两侧向粤北推进，打向五岭，准备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会师。

8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同时致电王震、王首道，指示说：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的任务仍然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此时，国民党已洞悉了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南进的战略意图，蒋介石电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成联军，计划从3面包抄夹击，将南下支队消灭在湘粤边境。

南下支队为了摆脱敌人的堵截尾追，于8月17日进入湖南桂东以西八面山中。国民党军立即调动第4军、暂2军和第44军等共8个团，占领了八面山所有的山障、险要的通道，然后派兵前堵后追。8月19日清晨，南下支队冲出包围，到达汝城以北开山一带，8月23日到达江西崇文县的文英墟。

再说8月11日0时至11日18时，朱德代表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伪展开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各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军事管制。

此后，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向辽宁进军；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率所部向东北城市进军。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领足够建100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

毛泽东为了指挥反攻，日夜操劳。他恨不得把1天当10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地方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他一面同这些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命令，写委任状，起草评论、电报、文告、声明等等。每天都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他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时而啃几口馅饼或面包。

此时此刻，蒋介石听到延安方面的“最新情报”，暴跳如雷，他大声嚷道：

“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

8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必须力争占领的交通线及沿线城市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

依据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确定我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如下：

一、太原（含）以北之同蒲路。二、归绥（含）以东之平绥路。三、北宁路。四、正太路。五、道清路。六、白晋路。七、德石路。八、郑州以北之平汉路。九、郑州以东之陇海路。十、津浦路。十一、胶济路（美军如在青岛登陆，将占去其东段）。以上应力争占领之。平绥路西端（包头），太原以南之同蒲二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之进攻**。**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

　　 中央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给华中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

真电悉。在国共力量对比下，华中部署改变如下：

1. 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内战失利时准备转到浙南。

二、江南在内战胜利（打几个大胜仗）后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此种可能很大。但如在内战中失利，不可能在现地坚持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此点使少数领导人作精神准备，决不退回江北，或在内战发生后，先派小部开入闽浙赣起钳制作用。

三、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中央 12日

他又起草了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坚持江南斗争方针的具体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他写道：

华中局并李、郑（指李先念、郑位三——笔者注）：

关于执行中央12日指示的具体部署建议如下：

一、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各地，并**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对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可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如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而**主要的是去占领各该县的农村市镇**。**江南的任务是于占领各城镇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群众，屯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顾祝同大军各分路东进京杭沪，通过我区时，不作正面堵截，应让其通过，即截击其翼侧后尾，仍按照自卫原则。**

二、 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苏中负责解决孙良诚、李明扬、陈太运等，伪顽各部**，2师予以协助。2、3、4师主力则迅速出动，巩固占领津浦线，对徐州、蚌埠两点之占领，主要由2、3、4各师负责，八路只能配合，必需如此，才能控制津浦线，贯通华北，取得对付李品仙、何柱国的优势。7师皖南部队，要打通与苏南联系，造成整块农村的连接，7师巢无地区，于敌伪投降，准备就地坚持，不能坚持时可退集2师地区协同作战。

三、军部在运河沿线，选择适当指挥布置。

以上意见作为你们部署行动时一个参考，请电告实施办法。

军委 12日

8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见《毛泽东选集》）。评论中说：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为’。这种评论，荒谬绝伦。”“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起草了一个给蒋介石的电报（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电报中说：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

8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军委小礼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以及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干部。

毛泽东走上简陋的讲台，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开始了著名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的长篇讲演。他说：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8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力。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首次说到了原子弹，他说：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么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

毛泽东最后说：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4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在**8月14日这一天，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政府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保证不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他们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关于旅顺口、关于大连的协定，规定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港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使用；还**互换了关于蒙古等问题的照会，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延安沸腾了！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人们欢呼着，歌唱着，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汇成了欢乐的海洋。欢快的舞步，雄壮的旋律，在延河两岸通宵达旦，人们唱啊，跳啊，拥抱啊，脸上映着火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也来到了狂欢的人群中，他们谈笑风生，与延安军民的大秧歌融为一体，享受着胜利的欢乐。

毛泽东在返回驻地时，问身边的警卫员高富有说：

“高富有，听说你想去前方，有这么回子事？”

高富有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毛泽东说：

“你这个人啊，想到前方，就不想在后方？”

“主席，我不是不想在后方。前方……我现在不想去了。”

“那你可要倒霉了。” 毛泽东缓缓地说：“前方，比后方是好些，你么，起码当个营长、连长的。”

高富有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不是想当官啊！”

毛泽东说：

“和我在一起，和陕北人民在一起，小米饭好吃啊，我是有感情的啊。”

高富有听着毛泽东的话，知道他又动感情了，就连忙说：

“主席，我哪儿也不去，就跟着你！”

后来不久，高富有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手枪连副连长。

中国军民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共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多门。解放区面积扩大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达1亿，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解放区人民伤亡600余万人。

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了第1号通令，他指定中国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的权力。

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同时在这一天分别向日军发出了命令：

蒋介石致电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状态，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而朱德则电令冈村宁次说：“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这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

东方翁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刚刚经历了8年的浴血抗战，眼看着一场新的腥风血雨又要到来了。好一场中原逐鹿，究竟鹿死谁手？请看第五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